日伪暴行



主编 孙邦
副主编 于海鹰 李少伯



吉林人民出版社

伪满史料丛书

日伪暴行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吉）新登字01号

伪满史料丛书
日伪暴行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工商联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23.5印张 插页4　560 000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册
ISBN 7—206—01908—0
D·568　定价：平18.00元　精21.00元

编委会主任　刘云沼
副　主　任　方建宇　胡厚钧
　　　　　　　孙　邦　许华应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海鹰　方建宇　王承礼
孙　邦　刘云沼　朱建华
李中申　李少伯　李照武
许华应　胡厚钧　张本政
张秀枫　常　城　解学诗

主　　编　孙　邦
副 主 编　于海鹰　李少伯
本卷编者　宋梅英

序

刘云沼

反映伪满洲国历史的十卷系列丛书，在久久期盼中终于同大家见面了。这是一项巨大工程，可喜可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从而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略东北，扶持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序幕。一部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伪满洲国的历史，是我们祖国六分之一的领土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同时，也是中华儿女前仆后继、百折不挠、英勇斗争、抗日救亡的历史。回顾中华民族近百年来蒙受屈辱的历史，使我们懂得了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萎靡难以腾飞，落后必定挨打；不能崛起，必然陷入沉沦。今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反腐败斗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胜利完成四化的宏伟蓝图是何等的重要。

伪满洲国史料丛书是全国第一部有关伪满洲国史料的大型系列丛书，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八五”计划的重点书目，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它的出版发行，将进一步扩大文史资料的社会影响和利用价值，必将推

动和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全书共十卷，选用了一千二百多篇文稿，共五百五十多万字。从“九·一八”事变写起，到殖民政权、伪满军事、经济掠夺、日伪暴行、伪满文化、伪满社会、伪满人物、抗日救亡、伪满覆亡等，各卷既是独立成卷，又有内在的联系，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如此浩瀚的史料，涉及到东北沦陷后十四年的方方面面，十卷丛书既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殖民统治的概貌，又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详尽记述。同时，这又是一部以口碑史料为主，首次披露的史料丛书，与所有有关伪满的学术研究专著、论文及档案资料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辅相成的作用。作者大多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他们以亲历亲见亲闻的具体史实为根据，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充分证明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实质。这套丛书可以说是整个伪满洲国内幕的实证，既然是史料，又限于作者个人的所见所闻，虽然它是真实的，也难免有疏漏，更不可能面面俱到，因为文字量过大，在编辑过程中必须有取有舍，有详有略。在取舍详略之间，考虑不周之处，在所难免。至于编辑上的疏漏和差错，也是少不了的。无论如何，构筑如此浩瀚的史料工程，又文出多人，几经易稿，都是费了心血的。如此巨篇，如果没有全国各级政协文史办公室的鼎力相助和广大学者、专家、文史工作者的辛劳，特别是我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多年来对伪满洲国史料的锐意搜求，是很难完成这样一个在我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

的史料工程的。只有经过他们的辛勤劳动，各方面专家的指导和参与，才使这套丛书更加专题化、系列化。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人民政协确实是一个人才荟萃的群体，在挖掘整理文史资料上有独特的优势。

江泽民总书记曾多次提出，要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十卷伪满洲国历史丛书，就是这样一套回顾历史，启迪当代，教育后人的好教材。我们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有必要研究在我国东北曾出现的最野蛮最残酷的殖民统治。因为今天的中国，五十岁以下的人，对于自己的国家、民族及家乡，在半个多世纪前遭受的那一段苦难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什么国仇家恨统统说不清楚。用这些生动、具体的历史资料，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振奋民族精神，激励革命意志，很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重温历史，并不仅仅是回顾历史，而是以史为镜，教育后人。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伟大的日本人民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因此，搞这样一套历史丛书，对加强中日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和平，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现在，日本仍有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还在念念不忘过去他们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一直留恋他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甚至为东条英机等战犯涂脂抹粉，企图篡改、歪曲历史的

本来面目，这是中日两国人民绝对不答应的。

斗转星移，历史毕竟早已翻开新的一页，耻辱的历史已经过去，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崛起在世界东方，让我们引古鉴今，奋发图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不息。

谨以此书告慰无辜殉难及为国捐躯的千万个英灵。

一九九三年九月三日

编辑说明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于1932年又炮制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从此，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长达十四年之久，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浸透血泪的一页，永远记住它，具有特殊意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战败时，销毁了他们在中国的大部分档案资料，战后，在日本又有别有用心的人不断撰文著书，歪曲历史，掩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亚洲的罪行。因此，揭开历史迷雾，系统地揭露、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种种罪行，实事求是地说明历史真相，是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经过多年来搜集、挖掘，征集了大量亲历者口述整理或撰写的有关伪满的稿件和资料，在此基础上开始编纂工作。编辑过程中坚持领导、学者和编辑人员密切合作，经过多次论证、修正及精选精编，终于完成了《伪满史料丛书》。全书共分十卷，约550万字。收入1200余篇文稿，基本囊括了有关伪满的方方面面。

一、丛书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的文史资料为主，辅以历史学者

的论著及有关的档案资料。

二、丛书按内容类别分卷，各卷内又分若干专题。由于某些文稿内容往往涉及到多种专题，为保持资料完整起见，采取了集中编排。如有关“细菌部队”的文稿，均收入《日伪暴行》卷中，其它卷、专题不再收入。另外，某类稿件稿源丰富，又涉及到多方面，则根据稿件内容，分别收入所侧重反映的专题内。如有关“劳工”类的稿件，主要反映“劳工苦难”的稿件收入《伪满社会》卷中；关于“人力掠夺”收入《经济掠夺》卷中；有关修筑军事工程后劳工被残杀的稿件收入《日伪暴行》卷中。

三、丛书由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各卷均有专人负责编辑。

四、丛书选用部分日本战犯、伪满汉奸及日本历史学者等的供词或文稿，但其中某些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选用时作了适当的删节，保留史实部分，或加编者按、注释予以批驳。故请读者批判地阅读。

五、编辑体例

1. 丛书框架结构视内容而定，各卷分别采取列一层题、二层题，一、二层题并存的三种形式。

2. 对入选文稿或资料，基本保持原文格调。如需对原文改动，主要是采取删节或压缩。

3. 丛书的数字、年代的使用，以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不定数使用汉字。

4. 丛书注释分三种形式：作者简历注为＊；凡属作

者或编者加在行文中间的解释性文字，均加（ ）；其它注释一般采用脚注圈码，不用文后集中注释。

5. 凡属繁体字、古体字和异体字，除有特殊含义（如姓名）外，均改为通行简体字。

6. 文稿出处置于该文稿之后，一律注明“摘自”某某刊物或书籍。

六、丛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指导。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为此书的编辑出版给予了指导并做了大量工作；辽宁省、黑龙江省、河北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等兄弟省、市、县（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给以了热情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望读者对丛书的缺点和不足之处给予批评和指正。

卷首语

本卷是从日伪暴行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予以控诉与揭露。

本卷共分五部分，计131篇，约56万字。

第一部分选取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东北期间，制造的特大惨案，如平顶山、老黑沟、土龙山等惨案，这些惨案大都是杀人千人以上特大惨案。冀东地区惨案亦包括在内（如丰润潘家峪惨案）。

第二部分记述的是热河“三光”政策与长城无人区。1933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完成了对热河地区的武装占领，转而对抗日武装力量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武装围剿，热河地区的中国人民也遭受了一次空前的浩劫。侵略者在这里实施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归屯并户和集团部落，制造长城无人区，对人民进行一次又一次屠杀。

第三部分，除第一部分特大惨案外，又对东北各个地区较大、较有影响的惨案再一次披露。如“四·一五”事件、“三·一五”事件、三肇事件、白家堡子等惨案，此部分与第一部分互辅互补，又进一步展示出日伪的残暴。

第四部分主要揭露残杀工人的罪行。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对“特殊工人”的残害；对修筑军事工程劳工的

虐待，对矿工的压榨。

“特殊工人”大都是关内我军被俘人员和解放区政权组织、群众组织的工作人员，此外还有少部分被俘国民党官兵和平民百姓等。这些“特殊工人”被押送到抚顺、柳塘、北票等各个煤矿做苦工，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受到了敲骨吸髓的压榨和令人发指的迫害。在中国土地上形成的许许多多残害中国劳工的“万人坑”就是历史的见证。本卷所述的北票万人坑、丰满万人坑、方家坟、鹤岗“东山万人坑”、鸡西“河北万人坑”，只是日本殖民当局在中国沦陷区所制造的许许多多“万人坑”的一个缩影。本卷只反映修筑军事工程劳工和矿工所受虐待与残杀，另有一部分反映劳工苦难的篇章，为协调各卷，分别被编入伪满社会卷和经济掠夺卷。

第五部分主要记述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中，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在中国土地上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活体解剖”，大量残杀中国人民。日本侵略者成立两支细菌部队“七三一部队”和“百零部队”，这两支部队在嗜血成性的细菌战头子石井四郎等人指挥下，长期进行本世纪最野蛮、最残忍的细菌战实验。此外、本卷还披露了日军生取被捕农民的活胆、露天解剖、注射毒杀等等罪行。

编　者

目　录

一　超千人的特大惨案

平顶山惨案

老黑沟惨案

二　热河“三光”政策与长城无人区

三　日伪在东北各地的暴行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四　残害、屠杀工人的惨案

对“特殊工人”的残害

对修筑军事工程劳工的虐待与残杀

“万人坑”

五　使用细菌武器及"活体解剖"等罪行

一

超千人的特大惨案

平顶山惨案

平顶山大屠杀惨案始末

辽宁省抚顺市政协文史办

平顶山位于辽宁省抚顺市区南面，西露天矿大坑的东部，距市区约有4公里。这里原来住有400多户人家，约3000多口人，大多是矿工和小商贩。其中有钟表铺、当铺和饮食服务性行业等十几家，是一个比较热闹的地区。

1932年9月，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把平顶山的全部无辜群众集中起来，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惨案发生后，日军严密封锁消息，外间虽有所闻，但知其内幕者很少。为了弄清这次事件的内幕及全部经过，我们组成了平顶山事件专题小组，深入当地，向50余人作了调查访问，其中夏廷泽、田廷秀、李德贵、杨占有等4人，是当年从死尸堆里逃出来的。同时，我们还查阅了当年曾经参加大屠杀事件的敌伪翻译于庆级和王长春的口供笔录，经过反复核对，终于查清了这一事件的全部经过。

大刀队进攻抚顺

1932年9月，唐聚伍率领的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为向日本侵略者进行示威，表示中国人民绝不甘心当亡国奴，誓死救国雪耻的决心，计划于“九·一八”事变一周年前夕进攻被日占领的抚顺。

9月15日（即阴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夜晚开始发动进攻。主攻部队是自卫军中的大刀队；增援部队是自卫军中华九江和“老来好”骑兵团，总人数约两千多。这一仗一直打到翌日清晨3点多钟，由于我抗日部队武器装备极差，又无战斗经验，组织更不周密，战斗最后失败了。

但是，这一夜日本人却惊慌万分：抚矿全部停电停产；日本居民全部集中到安全区；还有的日本人趴在水沟里，到第二天局势平静后才悄悄爬了出来。

阴谋策划平顶山大屠杀

日军驻抚当局对这次自卫军进攻抚顺，感到极度恐慌，称之为“抚顺袭击事件”。自卫军的力量不断壮大，竟然发展到敢于打进矿区，这对日军是个严重威胁。此外，在这次事件前不几天，伪抚顺县公安大队长李海峰和副大队长邢龙九哗变起义，也给了日军以很大刺激。原来自卫军没有进攻矿区之前，早有风声要打抚顺，日军为确保矿区安全，命李、邢屯兵郊外，负责防御，同时派日系指导官岛畸和宪兵龟田二人，名义上协助布防，实则监视李、邢行动。但李、邢早有起义归正之心，一天行至搭连郊外，见机会已到，义旗一举，挟持岛畸、龟田二人一路东上，投入自卫军（龟田后来行至半路逃脱）。李、邢一起义，紧接着又发生了“抚顺袭击事件”，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

起，日本人感到问题特别严重，决心彻底镇压。他们一方面向自卫军大举追击、围攻，进行所谓“剿匪”；一方面对无辜老百姓进行大规模的血腥镇压，进行所谓“剿民”。平顶山事件就是日本人“剿民”政策的产物。

由于大刀队进攻抚顺主要是中路打得比较激烈，中路进攻的路线，又主要是从千金堡和平顶山方面来的。于是日军就想在这条进攻路线上确定一个村子，以“通匪”为罪名，作为烧杀对象。企图通过对一个村的血腥镇压，起个“杀一儆百”的作用，让市郊各村看看，如果自卫军再来而不及时向“皇军”报告，甚至替他们打掩护，那就要遭到像平顶山那样的下场，同时为其下一步开展市郊的“并村”工作，拔掉自卫军的市郊据点，铺平道路；另外为被自卫军打死的十几个日本人报复。

驻抚日军的决策人物确定了大屠杀的罪恶计划以后，就紧张地行动起来，进行具体部署。

根据当事人之一于庆级（县公署外事秘书兼伪县长夏宜的翻译）提供的两次重要紧急会议情况，可以完全看出日军决策人物是怎样急急忙忙策划这次大屠杀的。

农历八月十六日清早6时左右，自卫军全部撤退以后还不到两小时，日军几个主要头目先在日本宪兵队小川的办公室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到会的有守备队中队长川上、宪兵分遣队长小川、抚顺县公署日本参事官山下、县公署外事秘书兼县长翻译于庆级，一共4个人。据于庆级说，他当时是由宪兵队用小汽车专门接去的。他一进小川办公室，只见小川非常气愤暴躁，川上特别冷淡，山下有些不安，没有说什么“早安”等寒暄的话。川上首先说：“昨夜大刀匪的进攻是由栗家沟分所反映的。大刀匪攻矿区，平顶山周围那几个屯的老百姓是知道的，但并未向分所报告，所以肯定他们是通匪的。现在计议一下如何处理那

几个村的问题。”山下问：“怎么处理呢？”川上断然地说：“只有把他们全部烧光、杀光，你们（看看山下和于庆级）有什么意见？”山下小声地说：“我倒没有啥意见，不过这样是否有些过于厉害？”川上又断然地说：“这是应该的。”又问于庆级：“你有什么意见？”于庆级为个人安全起见，也回答说：“我也没有啥意见。”川上又说：“既然都没有意见，我们就决定这样做。现在开始把那几个村子都看起来，不准往外走人，设岗禁止通行。”同时川上向小川要了6个翻译。小川说：“宪兵队有两名，其他跟日本警察署要。”这次会议就开到这里。

会后，紧接着又召开更高一级的“机关首脑会议”，时间大约是上午8点多钟，会议地点在炭矿会议室。参加会议的人员，日本方面除川上和小川外，还有警察署长前田信二、日本参事官山下满男和原田、指导官立田以及日本炭矿长久保孚等；伪满方面有警务局长佟世勋、县长夏宜、翻译于庆级等。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精神都很紧张。首先由川上讲话。他把召集这次会议的目的说完之后，就严厉申斥情报机关工作没有做好，接着他说：“这次大刀匪进攻抚顺，是由平顶山方面来的，给我们造成了很大损失。以前对平顶山附近几个村屯的居民，曾再三告诫他们，如果发现有大刀匪的情况，要立刻报告日本分所。他们不但没有报告，而且大刀匪在他们掩护之下，竟在那里出现了。这些村屯统统的通匪，我们决定要用烧光、杀光的办法来对付他们。现在大家有什么意见？”久保孚听完，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不应当烧光、杀光，只应当对为首者进行处理。久保孚站在炭矿的角度，考虑到一旦对那几个村子烧光、杀光，人心惶惶，工人不能安心生产，他所担负的煤炭生产任务就要完不成，从而直接影响支援侵华关东军的任务。因此，他提出不同意见。久保孚说完，川上很不满，立刻威胁说：“抚顺治安由我负全责，

谁不同意，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昨晚那么样的事件，就由谁来负责。”他这一说，其余的人见气氛不对头，也都面面相觑，不再说什么了。川上又问到伪县长夏宜，夏宜表示没有意见。川上最后说：“如果各机关负责人都没有意见，就这样决定执行了。”同时决定：屠杀任务交由守备队和宪兵队负责；屠杀现场确定在平顶山东山坡；在屠杀同时把居民的所有财物和房屋都烧光；办法是告诉他们到东山坡集合，听守备队长讲话，务必用一切方法把他们都赶出来。

这两次会都开得很匆忙，不多时间就结束了。

川上通过上两次会议，确定了他所阴谋策划的大屠杀计划，下一步就是具体执行的问题。实际上，他早已抓紧进行大屠杀的准备工作。他一边召集首脑人物开会，一边早派出守备队的人去侦察地形（屠杀现场）和进行其它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善后处理工作。等开完会，他所布置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已做好，所有人员整装待发，只等命令。

根据会上决定：这次屠杀任务交守备队和宪兵队负责执行，实际主要力量是守备队，宪兵队只起配合作用。守备队8个小队，抽出6小队（约190多名士兵）来完成这次屠杀任务。

宪兵队的配合工作是怎样准备的呢？据当时宪兵队翻译王长春（又名王广维）回忆：小川到炭矿会议室开会时，就告诉宪兵队人员，非有紧急事情不要外出，全部在家等着。等他从炭矿会议室开会回来，就立即召集所属全体人员开了一次紧急会。会上，他对大家说：“今天下午扫荡平顶山。兵力主要依靠守备队，我们宪兵只去8个人，即我、镰田、武田、岛峰、龟田、王通译（即王长春）、金子守一（朝鲜人）和牟文孝，下余补助宪兵可在队留守。我们的任务是在扫荡中做掩护工作，具体扫荡及其善后处理，包括焚烧房屋和尸体，都归守备队负责。任

务完成后须得到守备队通知，方可集合回来。现在武田伍长赶快往朝鲜居留民会打电话，把金子守一叫回来，王通译通知牟文孝也要马上回来，镰田军曹立即打开仓库，准备好武器和便衣服装，等金、牟到齐后，马上出发，分3批坐小车到守备队集合。”这次会也很简单，就是布置任务。小川讲完，武田和王长春就分别打电话把金、牟找了来。金、牟一到，小川又把8个人叫在一起叮嘱一番，勉励他们要“勇敢杀敌，做好掩护工作，保证胜利完成任务。”接着，换便服的换便服，拿武器的拿武器，就要准备出发。临出发前，小川想起了一件事：用什么办法能够把平顶山居民顺利地哄骗出来？他把这个问题交给王长春和牟文孝去考虑。王就征求牟的意见。牟答：“平顶山居民差不多都是煤黑子，要他们集合，除非事务所大衙门[1]有事，否则是困难的。”这样，他们便计议确定用这样办法哄骗：“昨晚大刀会袭击，平顶山居民没有一个受伤，大衙门为庆祝大家太平无事，来给大家照相留作纪念。大家传一下，都到大庙前去集合吧！”这办法被小川欣然采纳，小川还对王、牟说：“就这样办！守备队方面还有两名密探和一名通译，你们就告诉他们都照你们的办法办吧。”说完，他们就出发到守备队去了。

到了守备队，川上把参加屠杀平顶山的人员全部集合在一起，将守备队和宪兵队在执行任务中的分工和有关事项，向大家讲了。他说的大意是：现在开始扫荡平顶山，先由宪兵队和守备队的便衣人员，通知当地的居民集合在一起，等集合齐全后，宪兵队给联络时，再向前进行扫荡。至于善后处理，由守备队负责，房屋尸体全用汽油烧毁。宪兵队的任务是掩护工作，但在现场执行中，如果守备队方面兵力不敷分配时，宪兵队亦

① 敌伪统治时期，矿工和市民都把抚顺炭矿事务所称为大衙门。

应参加扫荡。宪兵队必须得到守备队联络兵发出扫荡完了的通知时，方算完成任务。现在开始出发，守备队和宪兵队的便衣、通译先去。如果用软的办法哄不出来，就必须使硬的办法跟上去，软硬兼施，务必把人都赶出来。川上布置完，刽子手们全部出发了。随后，川上坐上小车也到现场去亲自指挥这场大屠杀。同车去的有小川和于庆级（于是机关首脑会议后被留下陪同去的）。到了平顶山附近村屯的日本分所，车子停下，川上又出来作进一步部署，把几名日本军官叫来，告诉他们如何到平顶山逼赶居民，如何具体执行他所布置的任务。布置完，稍候片刻，又驱车前进，到了距离屠杀现场约500米的南侧的一条公路上停下，等候事件的发生。这时大约是在上午11点多钟。

至此，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从阴谋策划、开会部署到其它有关准备工作，已全部进行完毕，从大刀队进攻开始到这时，中间相隔不到12个小时。

大屠杀的经过

川上到达平顶山附近日本分所，把大屠杀的任务进一步部署之后，守备队和宪兵队的特务们按照事先计划好的哄骗办法，就进到平顶山街挨家挨户叫人出来到指定地点集合。平顶山是一条很长的街，几个特务进去解决不了问题，首先是挨家叫，叫不过来，其次是群众听了并不立即见诸行动，许多人根本就不想出来，有出来的也是稀稀拉拉，动作很慢。特务们通知过几家之后，发现单靠这个办法行不通，不能在最短时间内把居民赶在一起，因此，他们就干脆代之以武力逼赶，来达到迅速集中的目的。这样，全副武装、气势汹汹的守备队就出动了。他们分乘四辆大卡车往平顶山驶去，车子到了平顶山北头就站下，只有一个车子上的刽子手下了车，进到平顶山街，其余三辆就

分散开来，一部分兵力把平顶山全村包围起来，严密封锁，不许进也不许出，大部分兵力则集中到平顶山东、西两个大山头，把住关口，严防大屠杀时大刀队为了营救居民可能再度发起袭击。进到平顶山街里来的这一群恶狼，又分成若干伙，从平顶山北头到南头，挨门挨户地把居民往外赶。据杨占有等人回忆当时的情形：这几伙刽子手叫居民出来集合的讲法很不一致，有这样说的，有那样说的，不像先前特务们进来只哼一个调子："照相。"这群恶狼手里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全副武装，面目狰狞，一闯进门，杀气腾腾，如临大敌，有的喊着："快快，红胡子要来，要打仗，快到南边躲去！"有的则说："要丢炸弹，快到南边躲去！"还有的干脆什么也不说，就是用刺刀逼着走。这时正值中午时分，许多人正准备吃午饭。人们对这种突如其来的逼赶，大为惊愕，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更无暇思索照相同红胡子有什么关系。由于事前毫无思想准备，大家只顾害怕，都不想走。刽子手们一边嚎叫着，一边用刺刀逼着居民走。就这样，人们挨家挨户地被赶了出来。每一户人家被赶出来之后，刽子手们还要翻箱倒柜，屋里屋外彻底搜查一番，不让一个漏掉。在北头开赶的时候，南头的住户知所不免，就都忙于卷铺盖，收拾贵重的东西，准备随身携带。刽子手对于你随身带什么东西一概不管，只要你走就行。不多时间，全村家家户户都被赶了出来。居民在前边走，刽子手在后边用枪托撞、脚尖踢。有一些缠足的老太太和老弱病残，因为走得慢，刽子手们就把他们打翻在地拖着走，有的干脆一枪打死或用刺刀刺死。被赶出来的男女老幼哭着叫着，满街团团打转，而刽子手们则虎狼般地咆哮："巴嘎亚娄，快快的，快快的！"在他们的刺刀逼赶下，一簇簇人群，连跌带爬地向着刽子手们已经安排好的屠场拥去。正在赶着走着，骤然一声尖叫："洋鬼子烧房子啦！"人们回头一

看，浓烟弥漫，大火冲天，刽子手们果然按照预定计划，用汽油把每家房子给点着了，人群中激起了一阵阵的紧张动荡。然而手无寸铁的人们，面对着全副武装的强盗有什么办法呢？一场大骚动被镇压下去了，人们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房子被烧掉。据夏廷泽等人回忆说："当时以为房子已被烧掉，就算是坏到头了吧，哪曾想全村人都被送上了屠场！"

刽子手们挨门挨户地逼赶，不到一个小时，全村的人都被赶到屠场去了，除留下因走不动而被当场刺死的几具尸体外，空无一人。事后才知道，有个小商人叫马长顺，在日军逼赶的慌乱之际，听孩子跑回家说，刽子手在街上打死人了，于是急中生智，用棉被包身，率领全家5口人，跳进房后厕所的大粪池里去，才得以幸免。

刽子手们选择的这块屠场，在平顶山南端，是一块播种牧草的草坪。它的西面是断崖陡壁，即当年用机器镐挖平顶山时所剩下的半边山，约有二三丈高；北面为奶牛饲养场的铁丝障所堵塞，只有东面和南面可以出入，是一块沟形的带有小坡度的平地。川上在开机关头目秘密会议的时候，就派人把这块地看好了。刽子手们利用这块有利的地形作为屠场，既便于把守，又便于进行屠杀。

午后1点多钟，人们差不多都被赶进了屠场，陷入绝境。日本守备队从四面八方紧紧向人群包围，拼命把人群向中心压缩。在人群的南面站着手端刺刀的日本兵，人群的东面放着几个用红布盖的带腿的东西。人们不知道那是何物，还以为真是照相机，将要给他们照相呢！据杨占有等人回忆说："当时各家都想坐在一块，遇事好有个照应，所以，'别散开，咱们一家都在一块坐着。'的喊声连成一片。到了草坪，一家挨一家地在地上坐着。这时人们精神紧张万分，但还没有意识到刽子手要放机关

枪。”

在人声喧嚷当中，一个面目黝黑、高个子的日本军官走了出来。他用朝鲜话喊：“腰包，腰包……”接着，有二三十个朝鲜人走了出来。在日伪统治时期，日军常常唆使朝鲜浪人欺负中国人。人们看到朝鲜人被叫出去，才知道大事不好，人群中轰然地掀起了大骚动。紧接着，带腿的东西上边盖的红布也揭开了，忽然有人一声尖叫。“不好啦，是机关枪，快跑哇！”这时，就见一个日本军官一摆手，“突突突……”6挺机关枪同时疯狂地扫射开来，四面八方的守备队亦同时向人群开枪，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许多人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已经饮弹倒地。有的人身上中了弹，鲜血四溅，方才明白不是给照相。当人们如梦初醒地知道是日本强盗在进行大屠杀时，一切都晚了，只有坐而待毙了。片刻之间，一堆堆的人群倒下去，血肉横飞，妇孺的哭叫声，人们受伤后的惨叫声和刽子手们的恶骂声，连成一片。“冲出去，快逃命啊！”受伤后的人们，自己跑不了，叮嘱着家里没有受伤的人快跑。往哪里跑呢？西面是个两丈多高的陡壁，有人不顾死活地往上爬，爬不几步就中弹落地，没有一个爬得上去，北面是铁丝障，刽子手又派重兵把守，无法冲过去。东面架着机关枪，人们不敢往机关枪方向跑。只有南面有一个缺口可以冲出去。但是，好几千人，大的小的，挤来挤去哪里跑得动！特别是一家人在一起，谁忍心丢开家里受伤的人和小孩就跑呢？互相顾来顾去，稍一迟疑，第二颗子弹飞来了，连自己什么时候中了弹也不知道，结果谁也跑不了。实际上南面这一缺口，刽子手早有严密部署，往外跑的，绝大部分被打死。在当时情况下，能够逃跑成功的是极其困难、很少有希望的。据夏廷泽回忆说：“我当时抱着一个三岁的孩子，乘一团大乱之际，迅速从南面缺口跑出去，跟我一起

跑出去的，总共不过六七人，都伏身豆地之内，避开刽子手的视线，因而侥幸获得成功。”刽子手用的大多是爆炸性子弹，枪声一响，有许多人连往下卧倒都不懂得，大多是两手把脑袋一抱，蹲在地上让机枪扫射，结果开花性子弹亦多是打中头部，脑壳崩裂，脑汁和鲜血并流，整个草坪被染成白一块红一块。刽子手的机枪，一轮又一轮地疯狂射击，人们一堆又一堆地倒下去。这边是枪声大作，刽子手进行疯狂屠杀，那边被烧的房子浓烟飞腾，烈火冲天，整个平顶山湮没在疯狂的大烧杀之中。草坪上的全体同胞都躺在血泊里，整个屠场变成一片血海。

王长春有一段供词，描绘了他当时参加屠杀的片断情景：我在等候通知居民到东山坡集合，等集合的差不多时，我就溜了，准备给守备队送信去。没等我送到，守备队的机枪响了，四面的守备队也都上来参加扫荡来了。原先约定：我和小川担负西北角掩护，我赶紧往西北角方向跑去，去找小川。我向前奔跑的时候，正赶上守备队的兵也往上奔，这时枪声大作，人群呼号乱叫，乱作一团，有拼命往前冲的，我就和守备队的兵向居民开枪了，我一连打死了好几个。小川见我跑来，就命令我："王，快打！"我开枪又打死了三名。后来我手有点软了，小川说他来打。这样，我一个人前后就打死了十四五名，至于小川和牟文孝等，他们除了用枪打，还用战刀砍，杀的人就更多了。机枪连续不停地扫射，一堆堆的人倒下去，那种惨状，的确使人目不忍睹。我因忙于开枪，没有心思去细看。一会儿扫射停止了，联络兵来报告小川："扫荡完了。"小川带着我去找川上，我一边走，一边看尸体很多，里边还有不少喘气的，我就问小川："队长，还有不少没有打死的怎么办？"小川说："由守备队负责用汽油烧。"小川、川上会面后，小川问川上："怎么样，死亡者能有多少？"川上回答说："能有2300多名，你们都回去吧，

掩护任务完了，善后我来处理。”说完，我们宪兵队的几个人就往回走了。

枪声停止之后，一切寂然无声，屠场上东倒一个，西倒一个，黑压压一大片，全是尸首。刽子手们听不出什么动静，以为全死光了，便都上了车往回走。据杨占有回忆说：“这时我正在死尸堆里，听到附近的人发出微弱的呻吟声，不一时又听到汽车开动的声音，大约先开走了3辆车，最后一辆马达一响刚开动，死人堆里就有人说话，刽子手们发现还有人没死，把车头一拨，又重新进屠场，进行第二次屠杀。这一次屠杀，比起刚才机枪扫射就更加残酷了。刽子手这次不用机枪扫射，而是用刺刀刺。刽子手们全部下车，从北到南，不管是死是活，挨个用刀刺。一刀刺下去，没有反应，就证明已经死了；一刀下去，‘爹呀，娘呀！’地叫唤，刽子手就猛力再来第二刀、第三刀，直至刺死为止。我所以还能活着逃了出来，一方面因为我被压在死尸底下，另外我咬紧牙关，任凭刽子手刺，一声不响，假充死人，刽子手刺几下没刺到要害部位，以为我死了，才幸免于难。”有的刽子手为了取乐，专挑妇女的阴部，把肠子都挑了出来，满地狼藉；有的则专挑孕妇的肚皮，把胎儿挑出来，甩到半空里。尤其残忍的是，有些孩子呼爹唤娘地爬来爬去，寻找自己死去的爸爸妈妈，刽子手走过去说：“哈哈，……小红胡子，往哪儿爬！”一刀插进去，高高举起，往后一甩，不知甩到哪里去了。有些人被刺时，破口大骂刽子手。刽子手听见骂他，就更加用力猛刺，把周身刺得稀烂。原先经机枪扫射后，有许多人还活着，而这一次经过全面复查，再能保下性命的真是万幸之至了，这第二次刺刀一过，起码要多死二三百人，剩下没有死又没有伤的，在全部逃出来的当中，数字是相当少的。

这场大屠杀直到傍晚才结束。从机枪扫射到刺刀屠杀完毕，

一共历时3个多钟头。第二次收兵后，刽子手们还到栗家沟附近一个火药厂的水池里洗刷沾满鲜血的刺刀，然后坐上汽车回去。据李德贵、夏廷泽等人回忆：这次刽子手去后，就不再有人动弹了，鸦雀无声，一片沉寂。直到天大黑之后，下了濛濛雨，才隐约听到有人说话声，慢慢有人从死尸堆里挣扎着爬起来往外逃，有些人负了重伤以后，昏迷过去，直到半夜才苏醒过来，还挣扎着逃命，但是多数丢臂断腿，遍体鳞伤，已经爬不动了。有的人爬着爬着，爬不出几步就死在高粱地里。有的人流血过多，喝不上水，张着嘴渴死。死亡前发出的凄厉的呻吟声、呼号声和惨叫声，一直到天亮。这一夜稀稀拉拉逃出来的，大约有三四十人。

这一次大屠杀，我平顶山同胞一共死多少人，确切数字现在无法查考。据刽子手说有2300多，实际远不止这个数字。据人们计算，平顶山是一条很长的街，总共约有3000多的人口，除去从死尸堆里逃生的和当时不在家的，这次死的最少有2500多人。所有的房子全部被烧光，只剩下一座老君庙。

第二天一早，刽子手们雇了一帮朝鲜浪人，按原定计划来处理善后。这帮朝鲜浪人用火钩式的大钩子，把尸首钩到山崖底下，叠起来。其中还有不少没有死的，还能说话，只是断了腿或受了重伤走不动，也同死尸堆在一起，浇上汽油焚毁，然后用炸药把山崖崩塌，掩埋烧剩的骨头和尸体。

从此，平顶山变成了一座人骨堆积的荒山。天长日久，风吹雨淋，山崖底下掩埋的人骨，不时地露了出来。人们悲痛地编出了这样一首歌谣：

当年平顶山人烟茂，

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

拣起一块砖头，

拾起一根人骨。

日寇杀死我们的父母和同胞，

血海深仇永难消！

大屠杀的继续

刽子手们干下了这种滔天罪行，深怕消息传出，引起舆论上的谴责。因此千方百计封锁消息，妄图一手遮住天下人之耳目。但是人们的嘴巴是封不住的，屠杀事件一过，人们奔走相告，消息很快传至沈阳、关内各地。国内外报纸都报道了平顶山事件，一时舆论大哗，轰动全世界。日寇当局意想不到消息走漏得这样快，便急忙命伪奉天省公署派专使常守臣到抚顺，对平顶山事件作善后处理。常到抚顺后，纠集一部分“韩国侨民会”人员，到屠杀现场进一步进行掩埋灭迹工作，并将现场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不准人进去看；同时把烧毁的颓垣断壁推倒，铺成砂路，使平顶山面貌全部改变，看不出原有痕迹，以此来掩盖其血腥的罪行。

但是，残暴的日寇并不以血洗平顶山，平白地杀死我无辜居民2 500余人为满足。就在这所谓“处理善后”的同一天，以及其后连续几天里，他们紧接着又进了一系列新的血腥屠杀。举其大者有：

（一）烧杀千金堡无辜居民和房屋。千金堡离平顶山约2.5公里，大刀队是经过这里到平顶山的。日寇便也以“通匪”为罪名，还想采用平顶山那种集体屠杀的办法，将千金堡的居民杀尽烧光，便连日派出守备队“扫荡”。但千金堡居民有了平顶山惨案的前车之鉴，早有准备，听说日军要来，就纷纷逃跑。他们无奈，便改变做法，一进村逢人就开枪，就这样死在日寇枪刀之下的，也不下40余人。千金堡的前、中、后三条街300多

户，1000多栋房屋，全部被烧光。同平顶山一样，经过这次烧杀，剩下的亦只是一片瓦砾。

（二）追剿自卫军，疯狂屠杀自卫军活动地区的人民。日军从“抚顺袭击事件”中，感到抚顺以东的自卫军活动已如燎原之势，如不及时彻底扑灭，对他们是严重的威胁。因此，日军倾尽全力，星夜从沈阳调出大批军队（包括一部分伪军——红袖头队），配备了重型武器，出动了飞机，紧紧尾随大刀队、自卫军之后，进行空前规模的跟踪追击。日军于农历九月十五日占领了新宾城之后，把所有认为与自卫军有“瓜葛之嫌”的人，全部投入牢狱，施以种种酷刑，然后杀死或活埋。新宾县周围十几个堡子被烧杀殆尽，前后被杀的人数以万计，毁房一千多间。新宾县有两个著名的“万人坑”①，就是日寇屠杀我无辜居民的罪证。

（三）大批捕杀“通匪”嫌疑犯。事件过后，日寇派出特务爪牙，四处侦察所谓“通匪”分子。特务们查来查去，查不出个头绪，于是就把工人中具有“反满抗日”思想的人给密报到宪兵队，然后安上“通匪”和“煽动”等罪名，予以逮捕。先后被逮捕的有距平顶山不远的杨柏堡矿工20多人。日本特务们对他们先施以灌洋油、通电流和压杠子等种种酷刑来逼供，等昏迷过去醒来之后，再投入“狗圈”里，指挥他们训练好的狼狗去扑噬，最后拉出来砍掉脑袋，弃尸野外，不准亲人认尸，任凭鸟兽啄食。

（四）烧平抚顺市郊10公里以内所有村屯。日军的疯狂烧杀，除了暴露他们的极端残酷野蛮外，同时也暴露了他们内心的恐惧。自卫军退走之后，日军就在抚顺市区通往四乡的各个

① 万人坑位于新宾县人民委员会机关后山上，至今遗迹犹存。

要冲道口，都构筑起工事，派重兵把守，切断同外围交通，许出不许入。又在杨柏堡采炭所、东乡坑、大山坑（旧矿井名）现场道口及“独身大房子”（从外地招骗来的单身矿工住的集体宿舍）设立铁丝网和监视岗哨。日系舍宅及其附属地的交界要害，也采取了同样防卫措施，同外部隔绝。这样做，他们还认为不够，还感觉不够安全。因此，又决定进一步把郊区10公里内的所有村屯全部烧平，目的在于使自卫军失去周围据点，无从潜伏。这个罪恶计划，已部分地付诸实施，如抚顺南郊的前孤家子已被烧光。其余村屯，有的汽油已经运到，只待点火，后来由于炭矿方面的极力反对而中止。

大屠杀的后果

“日出斗金”的千金寨，原是繁华富庶之地，经此空前浩劫，顿时变成一座死城。人们眼看刽子手们还要继续大烧大杀，无不紧张万分，奔走相告，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几天之内，市面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现象，几个集市如南站、欢乐园、大官屯等地摆满了地摊，地摊上又尽是绫罗绸缎、金银首饰、器皿家具等物，琳琅满目，贱价拍卖。原来人们都急于把衣物卖掉，以便及早脱离险境。抚顺南站，一天到晚，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人们争先恐后，抢上火车，尽管铁路当局一天增加了多少车次和加挂了多少车厢，也解决不了拥挤问题。商人、公教人员、工人等所有各阶层人士，凡是有办法的，拿得起路费的，外地有亲友可投的，无不扶老携幼，纷纷往沈阳、大连和关内跑。一时人心惶惶，秩序大乱。影响所及，抚矿制油厂（今之石油一厂）被迫停产了；抚矿各矿井亦处于半停产状态。原因是工人走的走，没有人上班了。日军头目们至此才感到事态严重，才感到继续采取硬办法已经不行了，如果再烧杀下去，人们死的

死、逃的逃，矿井就要全部关闭。这种情况特别使久保孚大伤脑筋。没有工人上班，烧炭、汽油出不来，直接影响侵华关东军的经济和军事给养，这还了得。久保孚焦急起来了，他先前所预料到的严重后果出现了。他身上所担负的重大任务，迫使他出来干预和反对守备队和宪兵队的做法。前面提到过的准备把郊区10公里内的村屯都放火烧光的罪恶计划，就是在他的坚决反对下制止的。秩序这样乱，人口不断外流，情况非常严重，怎么办呢？久保孚觉得事已至此，没有旁的办法，只好自己挺身而出，扮个"和事佬"的角色，采取一些措施，来收拾局面，以挽回影响，安定民心。

第一个措施，出安民布告。这个布告是久保孚同夏宜联名出的。布告的内容大意是："平顶山事件是出于人心不良进行反满抗日活动，勾结大刀匪，屠杀日本公民，扰乱本街秩序而引起。日本皇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已予以必要的惩处。但是惩处的范围只限于平顶山一个区域。现在已由日满双方负责同军警方面联络妥善，绝对保护居民安全。只要各色人等不再做通匪事宜，安分守己，则日本皇军绝不枉杀一人，亦不扩大烧杀范围。如果大家不听劝告，继续自作恐慌，自相惊扰，则市内居民的吃、烧一切都成问题。我们两人绝不离开此地，保障各自生命财产的安全。仰所有居民勿再惊慌、惰勤（旷工），安心工作，恢复秩序为要。"

这个布告是在事件后一周左右出的，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人们该跑的还是一样跑。

第二个措施，发放抚恤金。大约在事件后一个来月，在炭矿系统内发出通知，凡是平顶山遇难者，到炭矿衙门领取抚恤

金①：

（1）死难者一个人给5元（伪满币，下同），由现存亲属去领；

（2）生存者，大人10元，小孩20元，孤身小孩30元。

（3）被烧房子，瓦房一间20元，草房或臭油房一间10元。

当时狗的价钱，是伪币五六元。这就是说，在日本侵略者的眼睛里，中国人的一条命还顶不上一条狗！

日本侵略者的用意，在于愚弄和麻痹受害者忘掉这笔血泪仇，在于用此作诱饵，把平顶山还活着的人们骗回来，好继续给他们当奴隶，下井挖煤去，以解决他们当时极度缺乏“苦力”的问题。

血海深仇，谁要这点臭钱！惊魂未定，谁又敢到刽子手跟前去？通知发出去好长时间，没有人去领。于是炭矿方面通过日本工头，婉求中国工人多方写信或想办法通知所相识的平顶山遇害者，劝说他们回来。

久保孚采取了上述这类措施，想竭力挽回影响，把紧张空气缓和下来。但是穷凶极恶的日本守备队和宪兵队，并不听久保孚那一套，特务爪牙秘密搜捕枪杀仍在继续进行。在那些恐怖的日子里，人们“谈虎色变”，谁也不敢提起平顶山。在抚顺的不敢说是平顶山的人，在外地的不敢说是抚顺的人。白色恐怖岂止限于抚顺一地。据当时曾在伪满民政部供职的李连俊述称：平顶山事件传到长春后，人们大为震惊，一些有爱国心的同胞们听此噩耗，莫不为之悲痛落泪。但是谁落泪一被发觉，列上“黑表”（即黑名单一类），就随时有掉脑袋的危险。他说：平顶山事件后十几天，他所供职的伪民政部，从日本新派来一位

① 抚恤金数目，其说不一。但上下出入不大，这里是根据杨占有提供的数字。

员司，伪民政部一部分人员为了表示欢迎，在长春头道沟宾宴楼设宴招待，他也参加了这次宴会。按照当时惯例，设宴必须招妓侑酒以助兴。席间有一位歌妓，唱了一段京剧武家坡，他的同事张志诚（沈阳人）听了，想起平顶山惨案，无限感伤，就哼了一句唐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一哼，立即被人密报到长春宪兵队，列入"黑表"，不出几日，就被宪兵队抓走了。10余日后送回家中，已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日军送他回家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株连，结果亲朋不敢去看，延医无人敢应诊。放回3天又被重新逮走。5日后，通知领尸，家人一看，尸体模糊，有些认不得了，手、脚、耳朵、前胸等处，被狼狗啃得残缺不全，惨不可言。

平顶山事件，迄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这笔血债，我东北人民、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

（摘自《辽宁文史资料》第四辑）

一个幸存者的自述

杨占有口述

平顶山事件当时，我在日本霸占的煤矿上当矿工。日军灭绝人性，血洗平顶山，我是身受重伤后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我原籍是热河省人，自幼家贫，父母双亡，一家8个兄弟为生活所迫，四处奔波谋生。大哥、二哥、三哥早年流落到抚顺来替日本人挖煤，那时我还小，才10岁，没有跟着哥哥们走，在家乡给地主看牛，后来又替人扛小活，终年劳累，不得温饱。15岁那年，家乡闹起大灾荒，人们四处逃荒，我呆不下去，也跟

着跑了出来，一路要饭，走了一个来月，才来到抚顺，找到了哥哥。从这一年起，我也变成了“煤黑子”。过后几年，我的其余几个兄弟也都陆续来到抚顺当矿工。我们8个兄弟先住在杨柏堡，后来杨柏堡要揭盖（因开拓露天矿），就搬到了平顶山住。几年后，人口大增，发展成了24口的大家庭。在我8个兄弟中我排行第六，人们就唤我“六哥”。

1932年我36岁那年，农历八月十五夜晚11点多钟，一阵阵“冲呀”、“杀呀”的喊叫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这天夜晚正是明亮的月夜，我爬起来往窗外一看，一群群的人拿梭镖、大刀，身穿土布衣，头上包块布，从平顶山大街上疾步而过，也有二三个人抬一个土炮，扛一个大扎枪的，还有少数骑马的。头一回见到这样的一帮人，这是什么队伍呢？会不会伤害老百姓呢？我偷偷地溜到房后的苞米地里躲了起来，看看这帮人究竟有什么动静。啊！真奇怪，他们好得很，他们不惊动老百姓，敲敲老百姓家的门，人家不答理也就走了，只是嘴里不停地喊冲呀、杀呀，有的则忙于吃什么似的，象是辣椒粉往嘴里边倒，看上去很有纪律，不像“胡子”。一会儿栗家沟的把头卖店着火了，又过一会儿腰截子的日本街也着了火。这时我有点儿明白了，恐怕就是最近以来听传闻的救国军、大刀队来杀日本侵略军的吧，准是。接着，枪声大作，我知道他们同日本守备队打了起来。打了一阵看来没有打进去，匆忙沿着原路往回走。这一夜乱哄哄，一直闹到天亮。

天一亮，一切归于沉寂，人们三三五五议论昨晚发生的事情：大刀会打日本，替中国人出了一口气。出去一看，看不出什么动静，只见平顶山到东岗这一路遍地横尸，大刀会伤亡相当重，他们只依仗满腔的杀敌热血，哪里抵得住日本侵略军的机关枪呢！所以死的人不少。吃了早饭，我也跟大家出去，抬

的抬、扛的扛，把抗日军的尸首给收拾起来。一直抬到晌午才收拾完。我回家正准备吃中午饭，锅里正在煮饺子，忽然来了几辆满载日本兵的大卡车，在平顶山的北头站下，日本兵一下车立刻把整个堡子包围起来，不许进也不许出，然后分成十几伙，从北头到南头挨门挨户把我们赶出来。我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5个日本兵已经出现在跟前："快，快，到南边去，给你们照相去！""红胡子要来，要打仗，快到南边躲去。"他们头戴钢帽，脚穿皮靴，全副武装，手里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一进门就如临大敌，大声咆哮着，那样子凶得很，真叫人可怕。孩子们吓得直打哆嗦。我无暇思索红胡子同照相有什么关系，一下子给怔住了。"巴戛亚喽，什么慢慢地有，快快！南边去！"五把刺刀一齐指向我们几个兄弟胸前。我见事不好，想躲，往哪里躲呢？二哥说："走就走吧，大伙都走，咱们家也走。"这样，我抱起孩子，全家除我四哥杨占青在栗家沟公房唠嗑没有回来外，23个人全被赶了出来。出了门一看，满街上乱作一团，嗷嗷乱叫，日本兵用脚踢，枪托撞，拼命赶着人群向前走。我看有不少乡亲身上还背上被，手上拿点值钱的东西，而我却什么也来不及拿。走不几步，我的邻居一位老太太，小脚女人，走的慢，日本兵一嚎叫："巴戛亚喽，看你慢慢的有……"一刀刺过去，这位老太太立刻躺在血泊里。我吓得魂不附体，回头一看，房子也被点着了，熊熊烈火，红了半边天。我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哪里招来这么一场大祸呢？我不敢往下想，好吧，一切听天由命。这时，我已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日本兵会用机关枪来对准我们这些无辜百姓进行集体屠杀。

午后1点多钟，我们都被赶到牧场草坪上来了。这个草坪，北头是奶牛房，有铁丝障围着，西头是两丈多高的山崖，只有

东面和南面可以出入，这是一个沟形。我们被赶到这里，鬼子兵就紧紧地把我们围住了。在草坪上一家挨一家地坐着，我一家23口人也都坐在一块。在我坐位的前面不远，架了两脚的东西，上面蒙块三角布，我心犯猜疑，有人却说那是照相机，人们交头接耳惊慌地议论着。在这紧张时刻，一个日本军官模样的出来喊话："腰包，腰包……，"接着，有二三十个朝鲜人走了出来。朝鲜人一走出来，人们警觉起来了，知道事情不好，立刻掀起了骚动，一阵嘈杂。正骚乱之际，日本兵把架子上的三角布揭开了，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呀！我没有见过机关枪，但分明知道不是照相机。有人一声尖叫："不好啦，日本人放机关枪啦！"话还没有落音，这个军官模样的鬼子嚎叫一声，"突突突突……"一排子弹射了过来。没等我定神，只见我旁边的一位山东老太太举起血淋淋的双手，我方才明白这不是照相机了。山东老太太倒下去，我老婆接着也中弹了。我赶紧蹲下去，问我老婆，怎么样啦？她说："你早不听我说，早听我说，昨天上姐姐家串门多好，现在已经晚了。你赶紧抱孩子逃命吧。如果不再来子弹，我还能行，你快跑吧。"我说："子弹这样密集，跑不出去啦！"机关枪一个劲地扫射，震耳欲聋，"突突突突……"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一簇簇的人群倒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插翅难飞，我上哪里逃啊！我同老婆话还没有说完，我左臂一凉，一个子弹穿进去了，同时我老婆再中第二弹，一命呜呼躺在我两条腿上。我左臂流血很多痛不堪言，有点昏过去了。我不知道紧挨在我旁边的弟媳什么时候受了伤，只听她对我说："六哥，起来吧，让他们打死痛快，何必这样受罪呢！"她挣扎着坐起来，没等坐住，一头栽下来，压在我头部和胸部，死去了。弟媳的鲜血，直往我身上流，往我嘴里流，往我眼睛里流，一会我眼睛给蒙住了，张不开眼。这时我身上压了好几个

死人，上半身是弟媳，下半身是我老婆，弟媳和老婆的上边各压有死人，我在最底下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左臂负伤后的痛苦，我觉得还差一些，最使我难受的是：我身上虽然压有死人，但有半边脖子是露在外边，刽子手机枪打出来的子弹壳，雨点般地落到我脖子上，我又动弹不得，烫得我脖子都烂了。这时，是死是活已经不由自己了，我也不知道死亡的可怕。至于这时我周围的家人谁死谁活，我也一概顾不得了。也许是因为我身上死人压得多，从我弟媳躺倒我身上后，鬼子的机枪子弹就不再"光顾"我了，这样，机枪疯狂扫射的头一关就给我闯过去了。

现在回忆起这一段情景，真是不堪回首。万恶的旧社会把我们折磨得只知道当牛马，别的啥也不懂得。日本帝国主义者看透这一点，所以才敢于这样欺负我们。我记得当时机关枪就架在我们眼前，只隔五六步远，一挺机关枪只配一个刽子手，一共我只看到两挺，但是有的人说有五六挺，而日本兵，主要兵力不在屠场上，而在离屠场还相当远的两边东、西山头，目的是看守大刀队，怕他们冲进来营救我们这些被害者。在刽子手们的心目中，怕的是救国军、大刀会，对于我们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则根本不放在眼里。他们完全知道，把刀子放在我们脖子上，我们也是不会反抗的，所以，他们才敢于那样满不在乎，毫不考虑我们会从他们手中抢走武器。要是在今天，别说是三千同胞，就是几十个人，象当时那种情况，什么机关枪抢不过来，还能那样老老实实，任凭刽子手们象宰鸡宰羊一样宰割，一个个乖乖地躺在刽子手的屠刀下等死。想起了这些，真叫人痛心！

机枪连续打了近一个钟头，停了，在昏迷中听到日本鬼子咕噜说了几句什么话，一会儿又听到汽车的马达开动声，我知

道日本鬼子屠杀完要走了。最后一车刚刚开走，我听见有人说话声，还有人爬起来．没有死的人都挣扎着往外跑。这一跑糟了，日本兵发现还有人没有死，马上车头一转，再来第二次屠杀。这一次屠杀比起机枪扫射要惨得多，日本兵跳下车，一个个端起刺刀，从北到南挨个地往死人身上刺。我张不开眼，也不敢抬头看，只听日本兵“库啦，库啦”的喊杀声和刺刀刺到人身上的“克吃、克吃”声。刺到死人身上，只听“克吃”声没有反映；刺到活人身上“哎呀”！“爹呀”！“娘呀”！发出各种凄厉的惨叫声。特别是刺到孩子们身上，听到小孩的哇哇尖叫声，人间再没有比这再残忍的事了。有的孩子在血泊里爬来爬去呼爹叫娘地寻找自己死去的爸爸妈妈，日本兵走过去，“哈哈，小红胡子，……”一刺刀进去，不知甩到哪去了。刺刀声越来越近，很快轮到我身上来了。我整个发痴了，简直不知道害怕，心想这一下报销了，命该如此，在劫难逃，爱怎么刺就怎么刺吧。我咬紧牙，屏住气，等着日本兵刺。一个日本兵一脚踩到我肚皮上，“克吃，克吃”两下，都刺到我身上的死人身上，而我在最底下，全身沾满了血，鬼子以为我早死了，这就把我免了，这样在十死无生的情况下，我又闯过了第二关。但是，我的哥哥这次全死在刺刀下，我亲耳听到他们被刺后的惨叫声。我还听见一位山东摊煎饼的老大娘，骂日本人：“他妈的，操你娘……”日本兵知道是骂他们，狂怒起来，一连在她身上猛扎20几下。“克吃、克吃，……”一直刺到太阳快要落山，日本人才收兵登上车回去。这次刺刀整刺了两个多钟头，连同前半部机枪扫射，整个大屠杀历时将近四个钟头。

这回日本兵车开走，再没人吱声了，过了很长时间才慢慢听到有点动静。我知道，这回日本兵确实走了，有人起来了，我也就使尽全身力气，推开身上尸首，挣扎着爬起来。我搓搓眼

睛，怎么也搓不开，想用衣服搓，衣服也变成了血板，我费了好大劲，才把眼睛张开。张眼一看，黑压压一大片，东倒一个，西倒一个全是尸首。有的脑袋崩裂，有的胸腔开花，有的丢了臂，有的断了腿，有的身受几十处重伤，血肉模糊，看不出人样来。有的在作绝命前的惨叫，有的在发出低微的呻吟声。特别残忍的是：有的日本兵专挑孕妇的肚皮，挑出没有出生的婴儿；有的日本兵则专挑妇女的阴户，把肠肚都挑出来了。还有各种各样没法形容的惨状，叫人目不忍睹。再往远处一看，整个平顶山堡子全烧平了，只剩下一点余火还在燃烧。我看看我自己，几乎认不得我自己。我从头发到脚底，全身都沾透了血，我简直成了一个血人，我才知道我原来是在血泊里躺了好几个钟头。整个草坪被鲜血染红了，成了一片血海。

这时天下起了濛濛雨，我环顾了一下，我们一家人都死去了，就剩下两个小丫头还活着，一个7岁，一个4岁，一点伤也没有。据我事后了解，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毫不受伤逃出来的是太少了，真是老天有眼，特别保佑！但是这两个丫头吓得发痴，不知哭也不知怕，面无人色，双眼红肿，走是走不动了。我先抱走一个放在高粱地，回来再抱走另一个。就这样在夜茫茫里，我又饥又渴又痛又冷，领着两个孩子从虎口里逃了出来。

我漫无目标地往南走，走到一间破庙里。在那里，我遇到了两个难友，他们也是刚刚逃出来的，一个姓赵，一个姓王。姓赵的炸掉左臂，姓王的下腭整个崩掉，用手托，流血不止。我看他们够呛，逃出来也怕活不成。一个月后，我发现我一家人又逃出来两个，侄女杨小丫，侄儿杨春明。小丫打伤了腿，春明受伤极重，身伤二十多处。他们也是那天下晚逃出来的，但比我晚一些时候。春明是在后半夜才醒过来，他在渴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双手捧着自己撒的尿往嘴里喝，这才咬牙爬了出来，

完全是拣的一条命。另外，还有我的一位亲戚（儿媳的弟弟）赵树林，一家都死了，只剩下他一人，当时才11岁，据他说，他也没有受伤，那天夜晚他没有走，在死人堆里守了一夜他看许多人没有死，爹呀娘呀乱叫，渴得要死，他就一回一回地替他们寻找水喝，其中包括我二哥在内。天快亮的时候，我二哥告诉他："快跑吧，天亮后日本兵还要来，我是不能走了。"这样，他才走开。这个孩子以后就在我家养大。后来，我又听我四哥杨占春说：第二天日本兵又来，雇了一帮韩国人用汽油烧尸，那真够惨。他亲眼看到里边有不少没有死的只是断了腿或伤势较重走不了的，韩国人用火钩式的大钩子把他们同死人一样钩起来摞在一块，浇上汽油，同死人一起烧掉了。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第三辑）

平顶山惨案

方树荣等

林喜岳笔供

（1951年9月29日）

1932年9月15日（中秋）夜11时许，抗日军进入抚顺。此情报是日本宪兵队分室知道后，首先报告日本宪兵分遣队的。抗日军来抚顺市途经平顶山，到抚顺后烧毁了杨柏堡炭矿好几处建筑，袭击了老虎台，到半夜3点钟以后才撤出。撤走时也经过平顶山区，又打死了8名日本人，还带走了平顶山大把头郑辅臣的白面，烧了平顶山日本人的配给店。

当晚，抚顺守备队长川上精一正在沈阳（因当时据说抗日军进攻沈阳北关，为应援沈阳守备队），听到这个消息后，翌日晨即赶回抚顺。上午10时左右，由守备队长川上精一指挥，在平顶山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在平顶山屠杀后又到栗子沟屠杀了一百三十多名无辜百姓。随后又在东西两个千金堡屠杀了五六十名老百姓。事后，我曾亲眼看见在栗子沟有一个孕妇，因火烧而腹部爆裂，婴儿掉在外边。那种情形是非常凄惨的。

当时，本打算去平顶山看看日本守备队制造这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的惨状，但到平顶山下时，有日本在乡军人、警察守备队挡住，不准上去，没见着。但见到山沟里流下的水都是血沫子。

为了消灭痕迹，日本守备队用32桶汽油，把平顶山上的尸体都烧掉了，并崩下半壁土山，掩盖痕迹。同时，以守备队的名义，命令夏县长，尽速在栗子沟和东西两个千金堡的废墟上作做假房子。之后，把那些假房子都拍照了照片，企图表明这三个地方并未遭受破坏；另一方面，守备队长川上精一亲自到抚顺县署借6万元钱送给当时在沈阳的国联调查团的新闻记者，要他们不要把平顶山的事登报。另外，依川上精一当时的意见，是要把矿区附近的二十几个堡子完全毁掉，怕以后再同抗日军有什么勾连。这个计划最后没有实现。

编者注 林喜岳当时系伪抚顺县公署总务科长。

夏宜笔供

（1953年3月7日）

在平顶山事件发生那天，小川一郎到县公署对我说，平顶山发生事情了，死了不少人。还有17个村子，也要准备同样做。

我就领着实业处长刁桂章去找炭矿长久保孚、翻译高久肇一同去守备队长川上精一家，求他不要这样做。川上队长说，是后藤干的。他叫我放心，马上把部队收回来。

编者注 夏宜当时系伪抚顺县县长。

冯士文口供

（1953年2月27日）

问：你过去都干过些什么事情，详细讲一讲？

答：我原本在辽阳县城日本街卖牛肉，因日本人欠我很多钱，为了多挣几个钱，就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3月，由沈阳警察署介绍到旅顺市，受训10天就来抚顺，在日本警察署当巡捕。康德4年12月1日，警察署改为警察厅，此时，我亦由巡捕升为警长。当警长2年多又升为警尉补，光复那年5月又升为警尉。

问：警察署和警察厅有什么区别？

答：警察署只管日本管辖的矿区和铁路附近。警察厅则管辖整个抚顺。

问：你将平顶山事件的经过情况谈谈。

答：据我所知，（农历）八月十五那天晚上12点多钟，抗日义勇军大刀队是从南边大岭上过来的，据警察报告说，有八百多人。两点多钟，大刀队将杨柏堡炭矿化工系、劳务系、派出所，东岗采炭所化工系、劳务系、卖店（经理为坂田）一齐给放火烧毁。当晚还和日本人进行了战斗，还打死了几名日本人。（农历）八月十六日上午守备队来平顶山报复，10点钟以后开枪打老百姓，接着烧房子。

问：当时平顶山村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答：知道。当时抚顺一个较大的派出所管四五千人，中等

的也管二千多人，最少的也管二千多人。而杨柏堡派出所是当时一个较大的派出所。杨柏堡派出所管辖栗子沟、平顶山、杨柏堡三处。当时，杨柏堡仅三十来户，共约一二百人；栗子沟、大房子住有日本人七八百人，另有住户五十来户，二三百人，两处共约一千多人，因此，平顶山村就该有三千人左右。

李凤琴控诉

我母亲中弹死了，身下压着只有八个月的用夹被包着的小妹妹哭叫不止，鬼子过来了，一脚蹬在地上，另一脚踩在我身上，先把我母亲脑袋扒拉一边，然后朝我妹妹"克吃"就是一刀，挑起甩到一边去了。我左边的半个脸被鬼子踩贴在地上，沙子都进到肉里，我的左眼就是沙子进去弄瞎的。

方树荣控诉书

（1954 年 12 月 3 日）

我本姓韩，父亲叫韩延东。平顶山惨案前我家共有 8 口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姑姑、两个弟弟和我。平顶山惨案后只剩我 1 人。

1932 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晚上（中秋节），我听到外面有喊“杀”“杀”的声音，当时我很害怕。第二天，我和弟弟在门口玩，看见很多汽车载着戴铁帽子、扛枪的日本鬼子，我问我的祖父：“爷爷，那是什么？”我父亲看情况不好，乘机翻墙逃走，鬼子就“叭”的一枪，把我父亲给打死了。接着鬼子就连推带拉，把人都赶到山顶，说要给我们照相。到了山上，妇女、小孩有的坐在地上，有的站着，鬼子就向人群开枪。我爷爷抱着我，把我压在身底下，这时我昏迷了。后来我睁开眼一看，只见我的爷爷、奶奶、弟弟……都被打死了，我母亲的头被打破了，白白的脑浆流了很多，两岁的小弟弟还在我母亲身边抓着叫：“妈呀！妈呀！”鬼子用刺刀一扎，往远处一摔。这时，我一动也不敢动。天快黑了，鬼子都走了，受伤而未死的人都哭着叫着：“救命呀！救命呀！”我回家看看，见房子已被烧，我又回到死了的爷爷身边呆了一宿。

第二天，我到大房子（工人单身宿舍）里，就被煤矿工人藏起来了。当时我满身是血，好几处伤口，如今我的脖子、胳膊、腰部等处还有 8 处伤痕。事后鬼子还出布告：“不准收留平顶山的人，谁要收留就把谁处死。”我姥姥得知我的下落后，才把我接到家里。为了避免别人怀疑我是平顶山的人，只好把姓改为我姥姥的姓，姓方。

洪振儒控诉书

（1954 年 12 月 1 日）

我名洪振儒，现年56 岁，家住抚顺市胜利区栗家沟街二十八组六十四栋十号。

我要控诉，要替千百万人控诉，控诉日本鬼子的滔天罪行。1932 年9 月15 日夜(中秋节的晚上)，抗日义勇军从东进入平顶山，袭击了杨柏堡采炭所，击毙日寇所长渡边宽一及小岛，烧毁了日本的栗家沟“卖店”后，天未明就转移到南大岭的山林中。

抗日义勇军走后，鬼子恼羞成怒，用汽车载来很多守备队及黑帽子（警察），用机枪来镇压平顶山3 000 余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鬼子下车后，用刺刀把人都推赶到山坡上，并说：“去照相，照相没有关系，不照相就是通匪。”到了山坡上，看见好几台用黑布盖着的东西，有些人就喊：“这不是照相机，是机关枪，跑吧！”鬼子开枪了，一排排的人随着密密的枪声倒下了，鲜血洒满地。这里有男有女，有未满月的婴儿，也有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还有怀孕的媳 妇。有的婴儿还衔着母亲的乳头，有的依在母亲身旁啼哭，而狠毒的鬼子竟一刀把他扎死了。人死得差不多了，鬼子上车要走，没有死的人急得要跑，鬼子又重新下车，挨个用刀扎了一遍。残暴的鬼子还用刺刀扎着婴儿举起一丈多高再摔在地上。就这样，平顶山三千之众的人民就在鬼子的枪弹屠刀下惨死了。

当时我家共有5 口人，住在平顶山村，同样被赶到山坡上，首先我9 岁的小子被打死了，倒在我的身上，接着我的媳妇也被打死了，两个姑娘（3 岁、5 岁）也被鬼子用刺刀扎死了。他们的鲜血染满了我的全身，鬼子认为我也死了，这才使我得以死

望着生。

惨无人道的鬼子，不但杀了我三千同胞，还把平顶山几百户人家的住宅焚烧光，使无数爱好和平的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惨案发生的第二天，鬼子还强迫好多朝鲜人把尸体拉到山坡的洼地里，堆在一起，烧上汽油，用火烧掉。然后，在山上挖了几个洞眼，装进炸药，崩下土掩埋了尸体，种上树木，企图毁灭罪证。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东北历次大惨案》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

老黑沟惨案

老黑沟惨案纪实

郭志明

一、德林部队屯兵老黑沟

老黑沟，亦谓霍伦川、呼兰川，在呼兰河的上游，现舒兰县榆树沟乡全境。沟谷自东南向西北走向，全长40公里，最大宽度4公里。两侧是连绵起伏的张广才岭支脉，重峦叠嶂，山高林密，古木参天，沟壑纵横，地势险要。"九·一八"事变后至1935年老黑沟惨案发生前，四合川、老黑沟一带广大山区，是

日军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当时活跃在舒兰、五常东部山区的影响最大、人数最多的抗日武装是宋德林领导的反日山林队。老黑沟是这支抗日武装的根据地之一，经常屯兵千余人。这里既便于隐避藏身，又能够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宋德林部队凭借这里优越的地理环境，坚持抗日游击斗争。

这支号称“德林”、“太平”的抗日武装部队的全称是“东北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大队”，宋德林任大队长（见《东北抗日斗争史论丛》第一辑114页）。大队下有若干支队，支队下有若干分队。据老黑沟事件卷和张保桴提供的资料，“德林”、“太平”大队的支队有10多个，分队有30多个。现在知道的有24个支、分队的报号，即：双阳、双山、双龙、双胜、九海、九洲、九龙山、金山好、西来好、老来好、占山好、六阎王、大金字、老二哥、串山红、广林、天元、野猫、德平、访友、平阳、忠义、姚二楞、占中华等。其中，有的支、分队不属德林、太平领导，如双胜。经常驻扎在老黑沟的支、分队有16个。

这支相随东北沦陷而崛起的抗日武装部队，主要活动在舒兰、五常、榆树、蛟河（包括当时的额穆县）四县，在舒兰境内他们以老黑沟为依托，经常活动在四合川（当时拉林河以西为舒兰县境内）、呼兰川、暴马川、珠琪川、金马川一带，主动控制拉滨铁路的中、南段。1932年3月，宋德林部为阻止日本侵略者“鹿岛铁路株式会社”由马鞍山往上营铺设铁路，派第三支队长邢文奎带两名警卫员，通过启发爱国思想和利用家乡关系，结识了筑路小队长，搞到三个筑路袖标。当日军开早饭时，邢队长混进领料工人队伍，只身闯入食堂，双枪轮射，把正在吃饭的58名日军全部击毙，拔掉了牛头山炮楼。缴获机枪3挺，八二迫击炮1门，子弹30多箱，炮弹20余箱，步枪50余支。救国义勇军共来20多人，加上筑路工人帮助，将所有的筑

路资材和大部分粮食（一部分分给工人）运往二甲沟。

自1931年9月23日日军侵入舒兰后，不断强化法西斯统治，1932年开始在县公署委任日籍“参事官”，总揽军政财文实权，全县境内碉堡林立，遍布日军守备队，到处是特、警、宪、探。面对日本侵略军阴森恐怖的殖民统治，我抗日救国义勇军针锋相对，处处给敌人以重创。1932年农历五月十日①，救国义勇军一支队18人，带4挺机枪，在筑路队掩护下，进入上营东干沟，埋伏在大桥碉堡南山上。翌日清晨，将要进入碉堡的12名日军全部击毙，缴获机枪1挺、步枪9支，炸掉碉堡。同年，抗日救国义勇军的“太平”、“广林”部队，袭击了水曲柳岗街的日本守备队，击毙日军多人。1934年3月，抗日救国义勇军宋德林率部摧毁驻上营日军守备队炮楼，击毙日军5人，缴获其武器。

日军屡遭重创，驻守在新站、上营、小城、平安、山河屯、五常一带的日军守备队，像坐在火山口上，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一面派密探四处侦察，一面派守备部队和伪军、警察到处讨伐围剿。1933年2月19日，日军探得我德林部队正在榉曲柳顶子开会，当日下午日军出动9辆汽车，载300余人，突然包围了榉曲柳顶子。德林、太平部队虽无作战准备，兵力不足，仍然顽强地与日军战斗到天黑，才突围出去，打死了不少日军，自己损失也很重。

敌人的残酷围剿，更激起抗日战士对敌人的仇恨。德林、太平部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对日军的讨伐围剿展开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经常出没在拉滨、吉敦铁路线和老爷岭一带，和日军打一仗就回到老黑沟一带山区休整。他们来无影去无踪，打

① 本文中月、日凡用汉字表示的，系农历的时间。

得日本兵晕头转向。1934年初，小城日军守备队，探得救国义勇军在上营牛心顶子休整，便出动130名日军、80名伪护路军，从太平沟进山，企图一举歼灭义勇军。但是，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义勇军早有准备，做好埋伏，决定放过伪护路军，全歼日军。当伪护路军接近前沿阵地时，义勇军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日军已进入我伏击圈，护路军兄弟卧倒吧！"义勇军复仇的子弹暴风雨般射向日军，当场击毙击伤日军60多人。这一仗不仅缴获近百支步枪、机枪及20余箱弹药，还壮大了队伍，伪护路军50多人参加了救国军。1934年5月，抗日武装"占东洋"部，智袭上营萝卜顶子，击毙日军5人，缴获步枪8支、轻机枪1挺、手提式枪1支。1934年种地时，48名日军到碾子沟讨伐抗日队伍。有父子二人住沟口窝棚里种地，日军问这沟里有没有"红胡子"，老头说："有"。于是，日军让老头带队进沟。当走到四垧地处，老头让日军看草趟子，日军认为是多人走过。转个弯，老头拣到一个肩章给日军看，日军认为确有"红胡子"。追至碾子沟里，老头要找水喝，日军官让2名日军随去找水。这时枪声大作，老头跳沟入水逃走。日军47人被击毙，只逃走1人送信。第二天，日军用兵车运回47具尸体，在小城子裹白布火化。

日军遭此重挫后，为了割断我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疯狂地向我抗日军民进行反扑，以残暴手段制造"无人区"。1934年旧历四月初一上午11时，日本守备队开进上营太廉村柳条沟屯，枪杀柳条沟屯大人、小孩32人，只有4人死里逃生。制造了一起灭绝人性的屠杀中国无辜百姓的柳条沟事件。

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我抗日战士只能用更沉重的打击来回答。1934年中秋节后，抗日救国义勇军的西来好、黑虎队、占德山部队，计110多人，在小城的荒凉岭围歼了小城守备队的讨

伐军34名，20名伪军全部缴械投降，缴获长枪53支、短枪3支、机枪2挺、子弹1万发、马4匹。战后，当地群众编出歌谣："日本鬼，你别来，到了荒凉岭，就上望乡台。"1935年1月8日，伪舒兰县公署高等参事官高比虎之助（日本人）在前往吉林途中，被我抗日部队拦截袭击，当场与他同时毙命的还有4名伪警察。同年2月，德林部在五常通口一带激战，打死1名日军指挥官。

日本侵略者屡遭失败，几经损兵折将，对我抗日救国义勇军恨得咬牙切齿。于是，在小城街里贴出布告：悬赏"捉住王德林者一两骨头，一两黄金；一两肉，一两白银"（此证见《老黑沟事件补充卷》[①] 53页、58页。疑敌误以为"德林"者为王德林，实为宋德林——笔者注释）。在县城里贴出布告："抓住太平、德林、西来好、姚二楞赏一万元，拿人头五千元；广林、双龙、占中华、平阳，活的五千元，人头三千元"（见《舒兰文史资料》张保桴《西来好》一文）。在山河屯贴出布告："抓住宋德林赏二万元，打死赏一万元"（见《老黑沟事件》一卷48页）。同时，多次派出奸细到处侦察抗日救国义勇军的活动情况。

活动在老黑沟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在得不到外界任何支持下，武装弹药、吃穿都靠自己克服，要坚持斗争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们并没失去信心，没吃的靠群众，他们帮助群众种地、打柴；没有弹药，就向日军要。德林、太平部队经常在老爷岭一带用地雷崩大车，打兵车，在拉滨线、吉敦线上劫火车。有时也到平地沟、窝瓜站、额勒赫及蛟河、舒兰一带绑架富户豪门，向他们索要钱物，这些人放回去后就向当地日本守备队报

① 《老黑沟事件卷》系解放后，历年来查询当年受害人及审讯当事人（当时充当日军翻译、向导）的证词，汇集成卷，称之《老黑沟事件卷》。此卷现存吉林省舒兰县榆树乡党委。

告，说老黑沟都是“胡子”，老百姓都通匪。于是，驻蛟河、新站、小城的日本守备大队派出的奸细开始进入老黑沟进行侦探。日军翻译金采龙，从事密探活动，经常进入老黑沟刺探我军情报。金采龙家住窝瓜站，平时在家溜溜达达，啥也不干，抽大烟，捣卖白面（毒品），成天和日本朴翻译喝酒。金采龙与蛟河的日本领事馆金山关系甚密，通过金山介信，将金采龙的儿子介绍到蛟河日军守备队当翻译。德林、太平部队为除掉金采龙，经侦察，终于在1934年6月由天元队在老爷岭站将其抓获。部队走到哪里就把他带到哪里，开始在桦曲柳顶子老张家，拴在房里的磨架子上。8月带到柳树河的石家店，让两个姑娘和一个媳妇看着。在两个姑娘去抬水，媳妇睡觉时，金采龙乘机跑掉了。跑到新站向日军守备队报告："老黑沟没有好人，都是胡子，男的当胡子，女的看票。"

抗日武装对日军的打击，使日军如芒在背，奸细的报告，更使这些杀人如麻的日军火上浇油。于是，日军为扑灭抗日烈火，急忙调集兵力，于1935年初从齐齐哈尔调防日本满洲派遣军第十六师团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进驻蛟河。一个预谋剿灭宋德林部队，血洗老黑沟的血腥计划就这样形成了。

据《老黑沟事件》原卷载，经常进入老黑沟刺探我军情报的还有陈生。

陈生严加看管，原吉林“江西”（即松花江西）人，1922年在他十几岁时来到窝瓜站，在孙喜武家落脚。长大后曾于民国年间在张广才岭下三道河子的十连当兵，日本军队侵占东北后不干了。当兵回来后住在平地沟口张庆朋家，作过一段木帮把头。此人是个二流子，游手好闲，整天耍大钱。张庆朋在自卫团，经常不在家，陈生便与张妻鬼混。大同2年（1933年），吉林市岔路乡朱家床子朱老四（朱子岐）经常到平地沟、窝瓜站

来收山货，便与陈生相识，后经朱子岐引荐，陈生作了日军的密探，经常以木帮把头的身份进入老黑沟，侦探老黑沟抗日部队的活动情况。1935年春被宋德林部“六阎王”队在平地沟将他抓获，同时被绑来的还有朱恩祥①。抓来后放到柳树河的一个住户家，绑在磨道上。“六阎王”队在里屋，这家妇女在外屋做饭，陈生向妇女要饭吃，妇女给他米汤喝，他又向妇女要板子坐，妇女发现陈生解松绑绳要跑，急忙报告“六阎王”队，将陈生严加看管，后把陈生带到刘喜林家。旧历四月二十六日午前，陈生乘“六阎王”队看守人员睡着了，偷偷解开绑绳跑掉了，妇女见陈生已跑就报告看守人员，看守人员便追他。当陈生跑到刘书汉家门前时，见刘书汉正在喂猪，就说：“快、快，小孩把我藏起来，胡子撵上来了。抓住就没命了。”于是，刘书汉便将他藏到西仓房的米仓子里。追兵过后，陈生当天逃回窝瓜站，正赶上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来到这里，陈生便找到在这里已做日本翻译官的朱子岐进行报告，并主动要求拉道（充当向导）血洗老黑沟。在拉道血洗老黑沟时，人称二等翻译（陈会朝鲜语，向朝鲜族翻译说后，再向日军说），带领日军到柳树河先把看守他的那些人家全部杀掉，把房子烧掉，并领日军各沟岔搜杀无辜百姓，成了血债累累的刽子手。

二、日军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的讨伐计划和行军路线

（一）

日本满洲派遣军第十六师团三十八联队，亦称奈良联队，是

① 在有关“老黑沟惨案”的“原始资料附录”中张连清回忆中的“朱文国”及“朱恩国”，与本文中此处提到的“朱恩祥”，均系一人。因回忆有误或笔录有误等原因，造成差误，确切姓名待考。

1934年4月由日本奈良开赴东北进驻齐齐哈尔的，队部设在齐齐哈尔，至1936年4月随日本关东军开赴关内，1937年12月13日，“就是这个三十八联队登上过南京大惨杀的舞台，是参加攻克南京城的部队之一”。

三十八联队联队长为田路大佐。下设3个大队，第一大队，活动在哈东哈南，在五常、阿城、珠河、宾县、榆树一带对抗日武装进行讨伐；第二大队，进驻间岛省（即延吉）；第三大队进驻蛟河。每个大队下设4个中队，按数字序列排为12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设3个小队，共36个小队。每个小队有40人，全大队共600人。据《老黑沟事件》卷提供的资料，现知道日方军官和翻译的名单是：第三大队长车少佐，翻译朱子岐，第十二中队长佐泽，翻译高宽瑞，第十二中队的第一小队长中村，翻译金立，第三小队长松源，翻译金永汉。

（二）

日军三十八联队不同于驻守地方的守备队，是专门执行讨伐任务的部队。来到蛟河后，车少佐依据当地守备队得到的情报，很快制订了春季大讨伐的行动计划，讨伐的目的是剿灭宋德林部队，讨伐的重点区域是老黑沟，讨伐的政策是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为了这次讨伐，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作了周密的准备：

1. 每个兵配1名苦力背小背，全大队共有600名苦力。大多数苦力是从锦州、沈阳、长春、吉林抓来的商人、学生、市民。这些背小背的苦力，日军看管很严，但也不断跑掉，流失和死亡，大量减员，他们便从当地抓苦力补充，单从窝瓜站抓背小背的就有200来名。对背小背的、拉道的给一定报酬，背小背的一天给六角，拉道的一天一元五角。

2. 招考翻译。1935年旧历四月上旬，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在蛟河招考日本翻译，不论朝鲜族还是汉族，凡会日语的即可报考。考试方法很简单，主要考核会话能力，拿汉族小学二三年级的书念念，对几句话，就算考试合格。凡考试合格者当即换上日军军装，每天报酬二三元钱，另外没收的钱、鸦片、物品“翻译的给，统统发财”。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都配上1名翻译，全大队共配翻译17名。

3. 绘制讨伐地图。在日军军部制的军事地图上，第三大队绘制了日军行动计划地图，把抗日部队走过的路线都划上红线表示。抗日部队住过的地方，称为“匪窝”，都划上红圈表示。每个小队长以上日军军官手里都有一份。

4. 提前到老黑沟进行“安抚”。按照第三大队血洗老黑沟的预谋计划，为了摸清老黑沟的地理环境，稳住老黑沟的老百姓，曾在1935年旧历正月末、二月初，部分日军先到老黑沟进行“安抚”。住在老百姓家分毫不取，并告诉十家长、百家长，要在五月节开会，叫老百姓不要出门。当时十家长、百家长以为是如何宣传满洲国成立内容，没料到是来杀人。

（三）

经周密的讨伐准备后，日本满洲派遣军第十六师团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于1935年旧历四月十三日（公历5月15日）开始春季大讨伐。第三大队全体日军和苦力计1200多人，从蛟河出发，沿吉敦铁路徒步行军，当日到柳树河车站附近15公里处的一个屯子住下。第二天经白石山车站进入南山沟，又走20公里到某高地住一星期。驻扎在这里的目的是截击宋德林部队，每天四外山上调查“匪情”，熟悉山头，碰见1名挖药的山民，当场打死。从某高地出发，十二中队到黄松甸子，其他中队和部

到二道河。当晚，队部在二道河开会，将新招考的翻译官分配到各中、小队。第二天，经黄松甸子由西北过岭，在岭上住一宿，枪杀了1名50多岁采药山民。第二天到额勒赫，在这里住一星期。当时驻守这一带的日军守备队，驻防在窝瓜站（也叫退抟），队长大河田，管辖平地沟、八里堡、额勒赫。讨伐队到额勒赫的第四天，即旧历四月二十六日便准备在这里开始清剿，进行屠杀，按讨伐的行动计划，窝瓜站也在清剿的范围之内，地图上画了红圈。旧历四月二十五日日军用25辆汽车往窝瓜站拉给养。傍晚，日军先头部队150人开进窝瓜站，部队一到发现南山约一里处的地里有火堆冒烟，就架上机枪向南山扫射。后日军守备队与他们通话后才停止。天黑后，日军先头部队和日军守备队写了一封说明这里不是"匪窝"的信，插上鸡毛，让3名自卫团人员往额勒赫送信。到额勒赫的河对岸，由于手电晃动的暗号不对，对岸开枪打伤1人，3人跑回窝瓜站，跑时将信丢在河岸边。讨伐队追到岸边拣到信后，决定不在窝瓜站一带讨伐。于是，第三大队队部开始向退抟运动。于此同时，从老黑沟逃回去的日军奸细陈生到退抟找第三大队翻译官朱子岐报告，说老黑沟没有好人，老百姓都通匪。并主动要求为日军拉道。于是，旧历四月二十七日，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兵分三路向老黑沟进发，开始血洗老黑沟。一路约200人从退抟出发奔北大秧，北折西北岔，走不过去，又回呼兰岭，奔四合川，到平安。这一路没有走到老黑沟。第二路是从退抟出发，向北过腰呼兰岭，过岭见人就杀，直杀到榆树沟，这一路的后续部队直接到青顶子，第二天开始屠杀。第三路从额勒赫出发，奔小北沟、保林，从石门子过威虎岭，到青顶子，第二天开始回过头往榆树沟、蔡家、福安一带屠杀。四月二十七日从退抟出发的日军，来到火烧岗（蛟河龙凤辖地），碰人就抓，共抓12人，杀

了9人，跑了3人。后自卫团找到日军，一看地图说错了，回头就往老黑沟去了。从额勒赫过来的日军，到蛟河界内的保林就开始杀人，在西门外杀了8人。这时自卫团长王瑞生找到日军，说这地方归双顶子管，于是日军向老黑沟那边去了。日军血洗老黑沟后，于旧历五月初五、初六两日，大部队陆续由新安撤出老黑沟，经珠琪口进入金马川到向阳山，由向阳山到平安站；第十二中队于五月初七由柳树河北山进入珠琪川，途中，在汪江店东山杀死两伙逃入山中避难的山民，路经六滴、五滴、四滴，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东西就抢。听上头被杀，人们便往沟下跑，跑到四道滴达时，有七八百无辜老百姓被日军截住，日军已支上机枪准备屠杀。这时，由珠琪沟口骑马来些日本人，双方说阵话，同时，又见飞机撒的小报，才免于被杀。十二中队由珠琪开赴向阳山，休整后开到山河屯，由山河屯到平安站。这时，第三大队开始执行归屯并户搞集团部落的任务。大队部设在凤凰顶子，各中小队分散到各村屯搞集团部落。第三大队的春季大讨伐，由蛟河出发，到凤凰顶子为止，共40天时间。

三、日军血洗老黑沟

日本满洲派遣军第十六师团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血洗老黑沟的时间，是1935年旧历四月二十七日到五月六日，共10天。从老杉沟、桦曲柳顶子（今长安、万寿一带）直杀到八台。屠杀的重点区域有两个，一是老杉沟（桦曲柳顶子）；二是青顶子、柳树河子、榆树沟，以青顶子、柳树河子为中心区。在屠杀过程中，日军是空、陆配合，从旧历四月二十八日开始，日军飞机经常飞到老黑沟，撒传单，投饼干等给养和军需物资。日军佩带战刀、长短枪、轻重机枪，每个中队还携带一部电台，各中队与大队间用电台相互联系。

（一）杀人路线和方式

野兽般凶残的日本强盗闯进老黑沟，顿时使平静的老黑沟变成了阴森恐怖的杀人场。二十七日上午，从腰呼兰岭进入老黑沟的日军，除一部分直接进入青顶子中心区外，其他日军一过呼兰岭就开始从上往下杀人，奔突追逐，远的用枪打，近的用刺刀扎，房屋里有人就堵到屋里杀，杀完人，抢走东西，就放火烧房。老杉沟、桦曲柳顶子一时浓烟四起，火光冲天，喊杀声、枪声、惨叫声此起彼伏，到处是血泊、尸体，密林中弥漫着黑烟，这里的无辜百姓，侥幸逃生者没有几个。这些逃出来的人，有的逃到山里，有的顺路往下跑，见人便报告日军杀人的消息。于是，榆树沟一带的农民都跑到山上躲了起来，留在家里的只有老人和妇女。

从石门子进入老黑沟的日军，在岔路口住了一宿，第二天经过榆树沟时，见人都跑了，就向老人和妇女伸出大姆指，说"苦力的大大的好，杀的没有"。吃粮、吃菜、杀鸡、杀猪都给钱。日军先告诉他们把跑走的人都找回来好好种地，跑到山上要像土匪一样杀掉。善良的庄稼人被日军的假仁假义"稳人计"欺骗了，以为自己是根本的庄稼人，"日本鬼子不能咋的"，便从山上下来，回家睡觉了。

这部分日军在榆树沟作好"安抚"后，直接开赴桂家街住下。第二天早晨鸡叫时，这些日军便从桂家往回杀，各路口都放上岗哨。见人就抓，到各家把人叫起来，说是"拉道"，可出来就绑上了，然后集中屠杀。

从腰呼兰岭直接进入青顶子、柳树河中心区的日军，在岭上住一宿，四月二十八日到达青顶子，住在河北刘家店，在河两岸搭帐篷，也有一部分住在蔡家沟。这时天已黑了。他们晚

上磨刀，凌晨一二点钟，开始到各户抓人，然后集中屠杀。此后几天都是白天休息，晚上抓人，送大队部集体屠杀。第二天开始，除在中心区继续抓人杀人外，还抽出五六人的小部队，到各沟岔进行搜、抓、杀。

日本侵略者——这群如狼似虎的杀人魔王，在青顶子以上地区进行屠杀后，除留12中队在中心区继续到各沟岔进行搜杀外，大部队于五月四日天刚放亮时进入桂家街和八台岭。在桂家街抓了120人，在庙里抓和尚、老道90人，计200多人，捆绑到慈善会大院里，让他们跪下，等待用机枪集体屠杀。上午10点钟，驻守在新站、小城、新安一带的守备大队长山回派人送来急信，要求停止屠杀。当时将和尚老道放了，把老百姓带到八台曹永茂店。11时，山回大队长亲自骑马来到八台，同时伪县长和日本参事官也赶来阻止屠杀。于是，这场血腥的大屠杀才暂告结束。大规模的屠杀共持续了8天。

（二）残忍的杀人手段

先看看几个大杀人场的杀人情景：

现在的长安一带，过去无屯，人们叫那里是桦曲柳顶子、老杉沟、三岔口。日本强盗在这里杀害我无辜百姓二百多人。农历四月二十七日，日军过呼兰岭如恶狼般地扑向桦曲柳顶子，多是把人们堵在屋里杀死，把东西抢走后，放火烧掉房子，把尸体烧焦。第二种杀人手段是活埋，把抓到的老百姓驱赶到现长安东边的桦树林边，让被埋者自己挖坑，然后把人推进坑里，把土埋到人的大半截，用刺刀向老百姓的胸部、脖子上刺进去，把人杀死，顿时鲜血横飞，黑土染成了红色。这里共有7个坑，每坑埋10人左右，李奎江家11口人就杀了9口，埋了一坑。长安屯的西北角一个大坑，后来见人的头骨就有30多个。

柳树河子胡万昌开的客店，人称胡家店。店房是一个大筒屋，这屋里便成了日军的杀人场，在这里杀害无辜百姓72人。杀害在这里的多是柳树河屯居民。四月二十九日上午，他们被抓住绑上后，先在西边老孙家院里“过堂”，然后牵到胡家店令被害者脸朝南跪下。日头偏西时，日军将他们一个一个地牵到屋里杀害。每进屋一个人，便听着“哎呀”一声惨叫，就被杀死了。日军杀完人就把房子烧着。废墟上看到奇形怪状的尸体，尸体被烧焦而弯曲了、变形了，有的耸立着烧成炭样发黑的手和脚，有的被烤焦而萎缩，哪一具尸体是谁也无法辨认。

青顶子屯坐落在呼兰河北岸，河南不到一华里处，有一个月牙形的水泡子，长约200米，宽约20米，人们称它为月牙泡。多么秀美的名字，然而，日军血洗老黑沟时，这里却是最大的杀人场。旧历四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五月一日，残暴的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屠杀了老黑沟无辜百姓300多人，每天这里都是百人左右丧生。在月牙泡岸边屠杀时，让老百姓脸朝月牙泡成排在岸边跪下，日军用机枪向他们扫射，然后把尸体推入月牙泡，清净的泡子水立刻被鲜血染成了红色。有的上半身在水里，下半身在水外倒立着，有的全身泡在水中，头部搭在岸边上。四月三十日下午在这里屠杀时更是惨不忍睹，凶恶的日军把被害者带到月牙泡西100米的西山根树林中，每个人捆绑在一棵树上，将上衣解开露出胸膛，1个日军刺杀1名无辜百姓，日军倒退3米，然后呀呀叫喊着向老百姓胸部、颈部猛刺，日军野兽般狂叫声和被害者的惨叫声混在一起，使寂静的山林也发出了对残暴的日寇的愤恨，对惨遭杀害者的呻吟的回声。在月牙泡南200米处，又是另一种形式的杀人场，将无辜百姓的手背过去，用铁线拧紧，从两臂中间穿一根水曲柳木杆子，每杆穿20人左右，和月牙泡平行地排成两排，每排6根杆，被害者脸朝南跪下，

凶残的日军用机枪扫射，尸体的脚朝月牙泡，脸朝下躺着，木杆子压在尸体的脊背上。

杀人场还有榆树沟北小屯大泡子、榆树沟东山头、柳树河屯西、山东会坟等处，由于没有死里逃生者和当事人提供资料，实难进行具体记述。

凶恶残暴的日本强盗，在屠杀老黑沟无辜山民时，其残忍、疯狂的屠杀情况还有如下四例：

①以屠杀中国人民玩耍取乐。

旧历四月二十七日，桦曲柳顶子（现长安屯）李显廷全家被杀。日军闯入李显廷家，先把李的妻子杀死在炕上，二三岁的孩子哭叫着向妈妈身上爬去找奶吃。凶残的日军用刺刀从孩子的背部刺进去，随着孩子哭叫声，日军将孩子挑起来玩耍，再在墙上顶一下。日军看着孩子在刺刀尖上挣扎乱动，狰狞地哈哈大笑。

老黑沟的曹邦二儿媳妇，怀孕快临产了。日军将她衣服扒光，用刺刀把孕妇的腹部剖开，让孩子从母腹中崩出来。日本强盗看到这令人肠断心碎的惨景，却开心地乐了。

②日军在屠杀老黑沟时搞杀人比赛。

日军刚进入老黑沟时，杀人大多用枪杀，后来他们怕“浪费”子弹，就多数用刺刀杀，在屠杀时有逃跑的，就用枪打。每天杀完人回到兵营（临时帐篷），日本兵一边磨刺刀一边说，谁杀了几个，谁杀了几个，以多杀人为荣耀。

③旧历四月二十九日，柳树河于家趟子的孟乃云被抓去，在胡家店屠杀时，残忍的日军将他的身体用刀锯成三截。

④旧历五月初四晚上，日本军队进入八台，将邢俊、李先抓到曹家店东河沿，用火活活烤死。

（三）幸存者的回忆

为了真实地展示历史事实，下面请读幸存者的回忆。他们是大惨案的目击者，是虎口余生的幸存者。姜桐彬、兰天喜是在杀人场上被惨遭杀害时，九死一生侥幸活下来的人，他们的身上伤疤犹存，这是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铁的见证。刘海晏是在被绑后借弄菜之机逃出虎口免遭杀害的。刘淑珍、张文江、费德庆、李仁、孙德福、王占武等都亲眼目睹日军抓人、过堂、训话、杀人、烧房的暴行，是日军制造老黑沟惨案的见证人。

姜桐彬，男，1915年生人，汉族，现为黑龙江省山河屯林业局奋斗林场的退休工人。下面是他1966年10月22日和1986年10月11日的两次回忆材料的综合：

我没念过书，不识字，可日本鬼子当年惨无人道大屠杀的场面，我是亲身经历的受害者，至今仍记忆犹新。每当我想起这事，就更想念被害的亲人和被害的乡邻父老兄弟，他们死的太惨啦……

我原在黑龙江省克山县一家砖窑当长工，由于家中感到日子不好过，我父亲在康德元年春，举家投亲搬到舒兰县东部山区桂家街，想以种地维持生活。我在窑上打长工不满一年没能随家同行。同年腊月，父母对我一人在外放心不下，父去克山把我接回家。到家后，我一看这原始的大山沟，山高林密，荒废的土地，山洼里多得是，只要肯出力气，开荒种地，还是能吃上饭的。当时我看到一股一股的队伍，多的三五十人，少的七八人一伙，有时进山，有时到老百姓家打尖休息。问屯邻，回答不一，有说是打小日本的救国军，也有说是胡子，可这些队伍不欺负穷人。

康德2年（1935年）春，到了种地的时候，我家在桂家种了一垧地苞米。不够种，距桂家十里地的青顶子我姑爷家捎信来，让我们去那里拣撂荒地种黄豆，我父亲打发我去了。是几家插到一起种的，种了两方。旧历四月二十七，因黄豆种不够，我回家取两斗豆种，又牵匹马来。四月二十八早上，我牵着驮豆种的牲口回到青顶子。这时大伙都议论说，上头沟里来了很多日本子兵，不知道要干什么。上午种地时就见沟里烟气大。下午我们又套上犁杖下地了。刚到地里，日本鬼子就上来了，到我们跟前什么也没说，直奔青顶子屯里去了。我想日本子来准没好事，去年我在克山时就看到日本兵到处挂中国人的人头，并说杀的都不是好人。可我们是好人呀，但心里还是担惊受怕的。我们就提前卸了犁杖，想早点回屯看个究竟。到屯里一看，日本兵住到屯里不走了，又不打扰我们，只是让我们把正房倒出来让他们住，我同姑爷家人住下屋仓房。一宿没有动静。四月二十九吃过早饭，日本兵开拔了，把我们五付犁杖上的十三四匹马都给牵走了。我预感到事情不妙，心里害怕，要回桂家去。我姑爷让我留下，并说他要去把牲口要回来，继续开荒种地。我们十几个人正在核计着怎么办，9点半钟日本兵又折回来30来人，站在大道上高喊："你们统通地过来，不过来就开枪了。"边喊边比划着，我们无可奈何地走了过去，到了他们跟前，一个挎洋刀的日本官哇拉了几句日本话，过来两个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看着我们，其余的兵用绳子捆上木拌子扛走了。过了一个时辰，日本兵回来用绳子把我们绑上连在一起，押到了柳树河子胡家大院，让我们并排坐在厢房地上。坐好后，过来一个穿着日本兵服装的翻译（朝鲜人），对我们说："今天天黑了，你们就在这里过夜，明天放你们回去种地。今晚谁也不许跑。"说完走了。其实，我们被绳子绑得牢牢的，又被连在一起，是

谁也跑不掉的，况且门口还有一个日本兵端枪看着我们，就这样过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日本兵擦枪磨刺刀，一直没理我们。我们盼着，不是说今天放我们回去种地吗？我们忍饥挨饿等待被放走的时刻。

旧历四月三十日中午，日本兵吃过午饭，从厢房里把我们带出来，我想可算熬到时候了。可一到外面，日本兵又把我们分 3 人一组重新绑上连在一起。每组由一个日本兵牵着，让我们横着排好队，给我们照了相。这些举动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照完相就带着我们往回走(向青顶子方向)，一直走到月牙泡跟前，让我们站住了。

我是刚到这个屯的，被绑的人大多数不认识。我们一绳三人中有一个姓郎的小伙，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老头。由 3 个日本兵带着我们离开大道，向西山根一个沟岔里走了百十米远后停住了。其余的每伙三人也都带到沟岔里去。有的把眼睛勒上了，有的把手剁去了。解开绳子分别把我们捆在三棵榆树上，三个日本兵枪上上了刺刀。一个日本兵负责刺杀一个。先刺的老头，第二个刺的姓郎的小伙。我斜着眼睛瞧见了雪亮的刺刀刺进了他们的胸膛，拔出来的刺刀上滴着鲜血。我听到了日本鬼子像练刺杀时用力刺的呀呀声，几乎是同时听到了被刺人的惨叫声，也听到了远处不时传来同样的哀叫声。看来被带来的同伴们都遭到了不幸，这回全没命了。日本鬼子刺杀前先把我们的衣服扒开，露出胸膛。负责刺我的日本鬼子想要扒掉我的棉衣，上前来解我的棉衣扣，钮扣是用布带打结做的，解了几个没解开，他就不解了。他瞪着野兽样的凶恶的眼睛，后退几步，端着刺刀呀地向我刺来。这一刀刺在我的肋下，我眼睛一闭叫了几声。随着他的喊叫，又朝我刺了第二刀。这时，我的两个同伴已经

奄奄一息毫无动静了。我想：是惨叫引来的灾难，是惨叫引来的死亡。我就眼睛一闭，一声不吭地挺着。紧接着又从侧面刺我一刀，只刺破了衣服，划伤了肚皮。喉头挨了一刀，这时我也实在喊叫不出来了。日本鬼子见我没声了，以为我死了，动手解开了绑我的绳子，我就随着松梆自然地脸朝前瘫在地上。这个残暴的野兽，直至这时又朝我右腰扎了一刺刀，没刺进去，扎在了坐骨上。

我身上共被刺了6刀。回想起来我大难不死，除我不吱声装死外，我的小棉袄也帮了我的大忙。

两个同伴一点声音也没有了，是死去了。我知道我没被刺中要害，我就静静地等着。小日本用刺刀削了些蒿草扔在我们3人身上，用随身佩戴的军用小锹往我们身上添了些土。做完了这些事后，3个日本兵满意地回到了他们的大帮里。我听着他们远去了，悄悄地坐了起来，顺着山沟向前爬去。我想离开这个野兽吃人的地方，不能再被这群野兽抓住。我忍着伤口剧烈地疼痛，拖着流满鲜血的身躯，爬过了一道山梁。心里只想远远地离开这帮畜牲。爬到沟底一棵倒木上坐下休息一会儿。这时我感到渴，已经有一天多没吃到东西没喝水了。我爬到小河边想喝顿甜甜的、凉凉的山泉水，可当时感觉不到这个味道了。喉管被刺穿了，血和水混浊在一起，不知道是啥味。喉咙上的小洞不停地向外渗透着血和水。喝到了水，我精神了许多，就向青顶子方向爬去。爬到青顶子村外，见青顶子满屯灰烟，房子被烧光了，鬼子是否在村里还不清楚，我不能进屯，又爬回了河套。

天黑了，下起了小雨。雨水冲洗着我的伤口。我忍着疼痛、寒冷、饥饿。黑灯瞎火，我又不熟悉这里的山路，更不知鬼子隐藏在什么地方，我不能随便行动。就这样，我挨到天朦朦亮，

我又顺着山沟小道爬，爬上了通向桂家街的大道。我仔细观察了道上确实没有鬼子走过的皮鞋印，说明鬼子还在上沟没下来。我放心了，我总算有活路了。

这回我不再爬，忍着剧痛站了起来，摇晃着走到永太屯。屯里没有受日本鬼子洗劫的痕迹，可满屯找不到一个人，可能他们听到日本鬼子杀人放火的事，都跑到山上去了。我走出永太屯，山上有一人喊我，问鬼子来了没有。我浑身疼痛，喉管漏气，不能大声回答他。我就摆手示意，这人下山来到我跟前，我把日本鬼子杀人烧房子的事和他说了，他听后跑上山了。

我顺道回到桂家街，见到了表叔，表叔见我伤成这样，急忙带我到曹家店修记药铺敷了药。表叔告诉我，你身上伤重，鬼子来了跑不动，你不能回屯里，去河东老宋家躲着，那里只他们一户人家，鬼子不易摸去，万一鬼子去了，你就往山上跑。我到老宋家住下了。到掌灯时分，来了30多人的队伍，站在院子里喊："屋里有外人没有?"宋家回答"没有"后，他们进屋了。一个挎匣枪的人见我倒在炕上呻吟，问明了情况，他点上了烟灯，自己抽了两口后，传给我说："你抽两口吧，能止疼。"我抽了两口，只觉眼发黑，迷迷糊糊的，伤口还是疼，怎么也睡不着。这些兵也没睡，他们争吵着说：日本子来了咱就打。可挎匣枪的人说不能打，鬼子多咱人少，一打起来，咱还得往山里撤，老乡就要遭殃。现在想起来，这伙人可能是德林的队伍。我在宋家住了七八天，伤势逐渐好了。

那一次我们一起被杀的有二十多人。我们一起去种地的都被杀害了，只有我一个人死里逃生活下来了。

兰天喜，男，1911年生人，汉族。1966年新安公社冒山大队冒山屯社员。下文是他1966年提供的证实材料：

我原在榆树沟公社青顶子屯住，杀大沟后在龙潭山住二年，后搬到这里来住的。

杀老黑沟是在康德7年阴历四月末。当时我给张会家扛活。日本军队是在四月二十八日去的，当天住在青顶子河北刘家店。二十九日早晨，鬼子的翻译告诉百家长张会（当时张会已到新街基开会好几天没在家）他爹张玉发（翻译和张玉发谈话时我没有在家）：每十家给送一担苞米糙子，糙子越好，给钱越多。并叫告诉每家在一个月内不要上山去，没有菜吃也不要去，明天开始他们进行搜山，谁要上山搜着就当胡子打死。我回去张玉发就把翻译给他说的话告诉我，叫我挨家告诉河南的7家。走到最后一家老周家，周云生（当时他在地里干活）老婆就叫我在他家吃饭，我坐下拿起干粮咬了两口，就从东边来了3个鬼子。一个翻译进屋就看门牌，打听男的上哪里去了。周云生老婆告诉他们男的在道边地里。这时他们就往外走，我送他们到院心，就把我绑上了，套上脖绳，两手背过去绑上了，牵到张会家门前大道上，这时共抓了我们94人，有老张家4个，老高家爷5个，其他都说不上姓啥了。

抓我的那个翻译中等个，长脸，红赤面子，30多岁，穿的黄衣服，带的枪，象是个"官"。鼻子下有小胡子，一杠一个花。抓我的这个翻译有点象你（指调查人）带来的照片上这个人。

在张会门前大道上站成两排，由翻译从头到尾挨个审问。问："你是干什么的？"我们说："苦大力的。"他说："你什么的苦大力的，红胡子的大大的有。"这样挨个问完了，翻译对我们说："没有客气。"又转回脸去给日本官（一个杠，三个花，中上等个儿，胖不大的，大胡子有半尺多长）说了一阵话。这个日本官背起背兜，翻译冲鬼子兵吼唠一声，就把我们牵着奔西南去了。

晌午歪点，到了青顶子西山根河南沿，让我们排两行，脸朝西跪着。这时，他们就砍木头、砍条子的，鬼子每人拿根条子，看谁嘴动就打谁一下。这时有一人见事不好就奔西岗头跑了（以后这人是否被抓，还是打死了，不知道）。这时鬼子就开枪了，是用机枪嘟嘟的。我觉有人在我左肋下踹了一脚似的，我就侧横倒下，再也没有动。这时鬼子就往身上压土，脚上一道，腰上一道。

在开枪之前，他们把每人脖绳都解下拿去了，有好衣好鞋的都给扒下去。我的都是破的，没有扒。后边一趟用桦曲柳杆给链上，前边一排用大绳隔4人穿上一趟，绑的很结实。打完当时没有全打死的就给摞到前趟两头，压些土、树楂子、倒木。鬼子走不久，有一个没有死的老刘，叫刘万起的（是个兽医）就叫，说压的慌，叫别人往一边靠。鬼子听见回来走了四遍刀，都扎死了。走到我跟前，听了三次，我也没敢动，没敢出气。后在我身上站了一点钟，我也没动。就认为我死了，他们走了。周广生挨了7刀没死，跑出去活了7天死了。

当快黑天时，飞机还在头上一遍一遍地转，我也没敢动。傍日头落时我才慢慢地动，但绑的结实，压的土多，也动不了。以后被去认尸的周广生父亲给我解开，救出来了。以后经过治疗好了。我挨的一枪是从左腋下肋骨缝打进去，从肩上出来的。

在杀我们时，这些家伙很凶、很恶。

刘海晏，男，1904年生人，汉族。1966年住在榆树沟公社青顶子四队。下面是他1960年2月18日和1966年的两次回忆材料的综合：

我是这屯土生土长的老户，日本杀大沟我正赶上。

杀大沟是日军从岭前过来杀的。是胡子从窝瓜站那边绑来

的朝鲜人（“瞎双阳”绑的）回去后向日本人报告了，说老黑沟没有好人，男的当胡子，女的也是胡子（在家看票），康德2年四月间来杀的。三十八联队来了1000多人，到我们这个沟，先是在长安屯、老黑沟、榆树沟等屯往下杀的。当时柳树河子老孙家给我们送信，可是大家认为都是老庄稼人，跑什么。所以当时谁也没跑。

旧历四月间的一天晌午时，由南来了1000多鬼子（包括背小背的老百姓）。当时来到这屯没动手，都是忙着搭帐篷。我们想庄稼人还是没啥，所以都下地干活。我也正在地里干活，不一会儿，日军来了，来到就把我绑上了，牵到屯里，把我绑在我们院的木头上。午后我看他们做饭，见一个大官（肩牌上有穗子），我问：“太君，你们需要什么菜，我家大大有。”他找来一个朝鲜翻译翻了一阵，翻译对我说：“你家有大葱吗？”我说有，就把我松开了。当时四外都是岗哨，这个官说：“你慢慢的。”我不懂他的意思，背小背的中国人说：“叫你站下。”我就站下了。这个大官就写了1寸宽、2寸长的一个白条子，上边写了“通行”二字，我走到岗哨那，他们一看就叫我过去。我到房后不远地方给拔了一筐大葱，回来交给做饭的人。我就上我父亲家，我把给我开的通行证交给我父亲，叫我父亲走，我父亲不走。我就往家走，当时我家在这东山地窝棚里，我领着我老婆带孩子往山上跑了。正是这天后半夜，才动手，各家都堵着抓住了。

刘淑珍，女，1898年生人，汉族。1966年在榆树沟公社万寿大队二队住。这是她1966年10月7日回忆材料的一部分。

四月二十八日早晨，日军来到这老黑沟，连杀带烧，人发现就往下跑，说不好了，房子烧了，我们也就往山上跑了。跑

到山坡上住了一天，午后我们在山上瞅着日军来了，他们见人就说：种地是好人，不管，就过去了。这时我男人从山上下来打听，听说日本子来也不能咋的，黑天时就都回来了。我男的说都睡觉吧，没事了。睡到后半夜，听到狗叫，不好，鬼子来了。那时我们在榆树沟河北沿靠山跟住。听到不好，我们家人就从后窗户往外跑。跑到后边就听到不是好声地叫，就被抓去了。

当时抓去的有我两个侄子（一个18岁，一个15岁），后来把柳树河子那边抓来六七十人，男女、大人小孩都有，在我们当院子过堂。女的过一个放一个，把女的都放了。小孩11岁以下的都放了，男的和大孩子都没放。这时把我两个大伯哥哥绑上了（他俩是喊求救时绑的）。我侄子要水喝，我嫂子给拿水，日军用刺刀把手给砍了。这时，把绑的人都带到胡家店房杀了。把我们都推到屋里，日本子就把房子点着了，等他们走了，我们就跑出来，奔北山跑出去七八天。

张文江：杀大沟前我在蔡家沟住。五月初一开杀，我跑了。跑不多远被一个站岗的兵抓住了，比划着叫我跟他走。到王国发门口，碰上日本兵约70多人。日本军在烧完王国发的房子后，由一个翻译给未被杀的老娘们、小姑娘及六七十岁的老头讲话："老娘们的红胡子不能干，死了的没有，小孩子十五六岁的红胡崽子，大枪不能使，小枪的那边那边的能干，十二三岁的不能当胡子，死了的没有，六七十岁老头红胡子干不了，死了的没有，三四十岁的大胡子死了的给。"

这个翻译穿的是黄呢子衣服，戴个黄战斗帽，脑袋后边背着个铁帽子，腰外边挎个战刀，腰里别个小撸子，个儿不高，中国话说的不太好。……这个翻译和日本官在一起走，在一起核

计事，日本兵的一切活动都是日本官和翻译说了算。这个日本官是个大个儿，胡子挺长，约有三四寸。这个翻译问我："小孩，你十几啦？"我想了想，如果我说16岁，一定整死我。我就不吱声。他又问我，我说"十二岁"。我问翻译："我哪边去？"翻译说："那边那边不去，你的溜达溜达吧。"

从王国发门前问完我话后，日本军又领着我往蔡家沟走。在一个岔股道上，碰见一个农民，外号叫赵大嘴（名忘了），当年30多岁。他手里拿着锄头，腰里别着菜籽。这个翻译将赵大嘴叫住了，把锄头给扔了，把从腰里搜出的菜籽也给扔了，然后翻译又抽出战刀，照着赵大嘴的脖子就刺进去了，赵大嘴叫了一声就倒下了。接着上来几个日本兵用刺刀就对赵大嘴一阵乱刺，刺死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事情。接着他们又领着我走，到日本鬼子住的地方，即蔡家沟，就把我放了。

费德庆：大约绑了百把名左右，将这些人带到柳树河子西边的胡家店。当时他们把妇女给放回来了，男子没有放。在这些男子中有我的父亲费长升，还有我亲大哥费德珍，有我的叔伯大哥费德福，我家共被绑去3个人，他们都是在柳树河子胡家店房里被杀害的。方法是在屋子里让自己挖坑，一个坑里两个人，然后用刺刀刺杀死，以后就把胡家店房子用火烧掉。

李仁：该队（指日军军官）假仁假义地表扬说："你们上高的好人。"并吃鸡、猪都给钱，烧柴吃水也都给钱，叫在家的人把跑出去的人都找回来。同时晚上磨刺刀，半夜时假装走了，未等天明时，上由岔路口、蔡家沟，下至柳树河子开始烧杀，各路口都放哨，遇一个杀一个，被杀的都是农民。在耕地或堵在屋内，掳绑烧杀约1000人左右。

孙德福：第二天一早就抓人，见着一个绑一个。我听外边抓我父亲、弟弟，不是好声，我就没敢动。等鬼子都到我们东院去抓人，我一推门跑出。鬼子听门响来抓我，刺我一刀没刺着，我跑到房西甸子藏起来，等鬼子走了，院没动静了，奔北山跑了。

王占武：杀大沟时我在八台住，五月四日晚上鬼子到八台，把房子点着烧了。我出屋一看，他们到处烧房。我叔伯兄弟跑出去（从后窗户），日本鬼子在房头堵上，当时被日军杀死了，我兄弟媳妇当时怀孕快生了，同我弟弟一起跑，同时被刺死了，房子烧倒了，把尸体也给烧了。我跑到西山没有被杀着。

1935年日军血洗老黑沟日程表

时 间	活 动 地 点	活 动 形 式
农历 四月二十七日	过腰呼兰岭就开始抓人、杀人，杀到老杉沟、桦曲柳顶子	见人就杀，堵屋杀、集体杀、活埋、烧房
四月二十八日	1. 一部分日军继续在老杉沟、桦曲柳顶子烧杀	见人就杀，堵屋杀、集体杀、活埋、烧房
	2. 日军大部队进入蔡家沟、青顶子屯	住民房、搭帐篷、搞“稳人计”，夜里磨刀
四月二十九日	活动在福安、蔡家、榆树沟、青顶子、柳树河子	上头部队往下杀，住青顶子日军往回杀，把人抓起来集中到中队部，把房烧掉，对抓起来的人集体屠杀，有的用刺刀杀，有的用机枪杀
四月三十日	活动在福安、蔡家、榆树沟、青顶子、柳树河子，附近各沟岔	抓人、烧房、集体屠杀；从这天开始小部队搜山，到各沟岔抓人、杀人、烧房
五月一日	活动在福安、蔡家、榆树沟、青顶子、柳树河子，附近各沟岔	抓人、烧房、集体屠杀；从这天开始小部队搜山，到各沟岔抓人、杀人、烧房
五月二日	活动在福安、蔡家、榆树沟、青顶子、柳树河子，附近各沟岔	抓人、烧房、集体屠杀；从这天开始小部队搜山，到各沟岔抓人、杀人、烧房
五月三日	活动在福安、蔡家、榆树沟、青顶子、柳树河子，附近各沟岔	抓人、烧房、集体屠杀；从这天开始小部队搜山，到各沟岔抓人、杀人、烧房
五月四日	1. 小部队留守柳树河子	搜山、到各沟岔抓人、杀人、烧房
	2. 大部队进入桂家、八台	天刚亮进村抓人、烧房、杀人
五月五日	桂家、八台	大部队从新安撤出
	柳树河子	留守小部队休息
五月六日	柳树河子	小部队过北山奔老汰沟撤出

四、死难人数的基本统计

日军血洗老黑沟，究竟杀死我无辜同胞多少人；这是一个很难精确统计的数字。《老黑沟事件》一卷23页，在榆树沟乡人民委员会1957年3月19日《关于日本军杀大沟的综合情况》一文中载："现在据老年人及从日本杀人坑逃出来的人口述，根据不完全统计，在我榆树沟乡一带即杀死八百多人，约占当时三百多户1200人口的66%强"。同卷37页孙德福老人回忆："这一道沟杀人很多，当时日本鬼子是由这岭南过来的，由长安、万寿、榆树沟、柳树河子、七贤、青顶子……据不完全记忆杀了一千来人"。同卷53页《摘金立卷124页调查报告部分》载："由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这4天当中，自榆树沟到八台，60里地当中连沟岔共计杀死1000多人，烧毁民房千余间。"《老黑沟事件》二卷46页李仁证言："上由岔路口，下至蔡家沟、柳树河子开始烧杀，各路口都放哨，遇一个杀一个，都是农民，在耕地或堵在屋内，掠绑烧杀约1 000左右。进行两天时，到桂家屯绑赴大庙200人左右，预计枪决，机枪都支上了……"。

上述资料所供死亡人数都是"不完全"统计。所以不能精确统计，主要原因有三个：1. 当时在老黑沟一带的山民，多是关里的逃荒难民在这里落脚谋生，靠刀耕火种一点山地和上山搞点副业养家糊口，定居时间长的，落了户，还有一大部分居民并没有在户口上。所以，只按户口的66%来统计是不准确的；2. 日军血洗老黑沟，除集体屠杀外，还有"遇一个杀一个"的，如金立供词（二卷22页）中"但在小队也有个别的也枪毙"，这样被杀的死难者的人数是很难统计的；3. 日军多是分小队或小组活动，抓杀人的数字无任何史料可查；幸存者提供的死亡人数，虽同一地点，各自提供的数字互不相同。又如二卷52页刘

海晏提供："榆树沟北小屯后大泡子光漂起来的就30来人"，没漂起来有多少？为此，很难统计得准确。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据《老黑沟事件》卷中幸存者对死难人数的约略估计，只能作大约的统计，具体死难人数和地点如下：

1. 青顶子西山根100人；
2. 青顶子东山根70人；
3. 柳树河胡家店72人；
4. 北小屯后大泡子30人；
5. 月牙泡300人；
6. 青顶山东会坟40人；
7. 綦家、联合、福安90人；
8. 桦曲柳顶子200人；
9. 桂家7人；
10. 八台5人；
11. 老汰沟10人；
12. 六滴子8人；
13. 于家趟子1人；
14. 大王砬子1人；
15. 唐万禄门前3人；
16. 西山头沟口30人；
17. 榆树沟30人；
18. 陈大缸店20人；

上述死难人数合计为1017人。

五、饮恨跪请山回

日军山回大队，是日本独立守备队第十一大队，大队长山

回。这个大队的主要任务是控制拉滨线中南段和铁路两侧的活动区域，保护铁路，经常对四合川、霍伦川、暴马川、珠琪川、金马川等我抗日部队进行讨伐。

这个大队下设四个中队。大队部设在新站北大营。大队翻译金得星。一中队驻守蛟河，二中队驻守五常，翻译林惠普，三中队驻守小城，中队长棉宗，翻译原为中山，后为高昌瑞，四中队驻守平安，翻译姓金，在桂家街有四中队的分遣队。

新街基（现名新安），1935年是舒兰县第五区区公所所在地，这里有警察署。伪军郑营长带一两个连在这里驻防（见《老黑沟事件》二卷92页）。在日军屠杀老黑沟前一两天，新街基区公所召集各地的百家长、十家长、保甲长开会，部署向下摊钱的事。这期间，日军独立守备队第十一大队的山回大队长，也正领部分守备队活动在新街基（见《老黑沟事件》一卷41页）。

日军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在桦曲柳顶子、榆树沟、青顶子、柳树河子一带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时，侥幸逃出来的山民，有的顺大路跑到新街基，多数妇女、孩子和老人，躲进山里，其中有一部分拉山过岭从石头河来到新街基。这些逃难的老百姓，纷纷找到在这里开会的保甲长、百家长、十家长，向他们诉说亲人惨遭屠杀的情景，恳求他们向警察、驻军和山回大队长求情。柳树河村百家长胡万昌听到家里乡亲遭屠杀的情况后，立即找到新安警察署于永开署长："胡子都跑了，剩下的都是好老百姓。日本人说都是胡子，见人就杀，杀的都睁不开眼睛，这可如何是好！"于署长便去找驻军郑营长商量，郑营长说："没什么办法，和山回大队长说说吧。"于是，于署长和张文明保长一起去见山回大队长（见《老黑沟事件》二卷95页）。同时，新街基警察署向县里汇报了日军血洗老黑沟的情况，说明情况非

常严重，要求县里来人。

农历五月初三，新街基已涌进逃难山民二三百人，五月初四清晨，集聚在新街基的逃难山民，加上新街基当地老百姓共约500多人，整整跪满了一条街，人们流着泪向山回大队长请愿："我们都是种地的庄稼人，求求大队长，快去说说别杀了！"山回大队长写了一封信，叫警士王德山骑马送到桂家街。

桂家街和八台相距六里路，是人口比较集中的村屯。这里的老百姓听到上头遭到屠杀的消息后，大部分已逃山上躲避或离家出走，投亲靠友，少部分人留在家里，有的想护家产，有的战战兢兢地观察势态变化，抱着一线希望和侥幸心理。可是，穷凶极恶的杀人如麻的日本兵，并没使这部分人逃出厄运。旧历五月初四，天刚放亮，日军到桂家街和八台，见人就抓，见房就烧。使这本来就笼罩在恐怖氛围中的村屯，顿时火光冲天，枪声四起，人们的惨叫声和呼救声此起彼伏，宁静的山村变成了人间地狱。

在桂家街，日军将抓到的老百姓和庙里的和尚，共计200人左右，绑赴到慈善会院里，让他们脸朝南成排地跪在那里，等待枪决。日军已经支上了机枪，血腥的大屠杀就要开始了。

恰恰这时（上午10点来钟），只见一名警察骑马飞驰桂家街，将山回大队长的亲笔信交给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的大队长车少佐。送信的警察刚走，县长张树珊和日本参事官柴琦章雄也骑马赶到桂家街（见《老黑沟事件》一卷46页）。县长和日本参事官向车少佐说明老黑沟居民都是好老百姓，这样杀的不行。可是车少佐却说："这是我们日本军的一定的章程，你们管不着，你们回去吧。"

县长和日本参事官走后，日军将和尚老道都放了，剩下的百姓带到八台曹永茂店。上午11点来钟，山回大队长从新街基

来到八台，他逐一地看被绑人的手，认为是庄稼人便都放了，杀了两个人。至此，日军血洗老黑沟大规模的屠杀结束了。

六、逃难者的灾难

日军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血洗老黑沟时，是从上往下杀的，所以，从死亡线上逃出来的山民，沿途各屯都通报了日军杀人的消息，除桦曲柳顶子一带的山民几乎全部被杀光外，沟下各屯都逃出一部分山民百姓。这些逃离山村的百姓，有的沿路往下跑，有的远离老黑沟，到别地投亲靠友，而绝大多数人则逃匿山中躲避起来。

1935年旧历五月开初几天，天空阴霾，经常淋着细雨。这些逃离虎口的老百姓，在深山莽林中避难，每天都有日本的飞机在头顶上盘旋。他们在恐怖、饥饿、寒冷的死亡线上挣扎。有的在蓊郁的大森林中偶然找到一棵空心树，几个人挤在里面栖息。然而，碰上搜山的日军，便被枪杀了。有的采掠山菜充饥，竟将周围的山茄子都吃光了。

任何历史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为了避免概括地陈述，还是举出历史事实来说明当时逃难者的遭遇吧！

1. 胡田氏的遭遇

胡田氏是柳树河子百家长胡万昌的兄弟媳妇，男人叫胡万全。旧历四月二十四日，他男人被杀死在胡家店房里，房子被烧光，东西被抢光。倾刻间，这个家庭家破人亡，一贫如洗。遭血洗后，胡田氏领着大姑娘（当时17岁，已嫁给平安姓刘的，是回来探亲的）、12岁的儿子和10岁的丫头，跑到平安他大姑娘家，后又搬到山河镇，找了一所房子。那时没吃没穿，睡凉炕得了腿痛病，右腿萎缩，落下终生残废。

2. 孙海一家的遭遇

孙海一家在杀大沟时是有30多口人的大户，当时家住在榆树沟河北沿靠山跟处。1935年旧历四月二十九日，他家被杀4人，房子被烧掉，全家人都逃到北山，在山上躲避七八天后，又跑到新街基，在白家屯住2年，又回桂家街住2年，后搬到柳树河子定居。在举家逃命时，孙海的侄子孙德福抱着只生9天的小女孩，当时想父亲和弟弟都被杀了，还要个小孩干啥，就把孩子扔在一个石塘沟里。孙德福妻子知道后，痛哭不止，后来孙德福又把孩子找回来抱走了。孙海的三嫂怀孕已近临产，当跑到舒兰大岭西韩家大泡子时，生了一对双（孪生），当时为了逃命，用黄泥把小孩嘴塞上就扔在大河的桥底下。在山上避难时，一家人饥寒交迫，因无食物充饥，饿死3口；在逃命的路上，因发烧拉痢疾，病死3口。杀大沟的第二年，孙海的妻子生了孙德跃，因家境清贫，为糊口度命，孙海将孩子卖了60元，后来妻子哭闹不同意才没有卖成。

3. 费陈氏一家的遭遇

费陈氏是费德珍的妻子，杀大沟时家住柳树河子。旧历四月二十九日，她的男人、公公和大伯哥被杀后，她领着7个小孩和姨娘、婆婆共10个人，逃到四方砬子山上。第三天，日军去搜山，他们钻到木头底下，日军从上边过去没有发现。在山上他们呆了9天，没东西吃，天还下雨，她的14岁的姑娘冻饿的不行了，后来偷着下山弄点火和土豆子，烤火烧土豆子给她吃，才没有死。9天后在往下跑时，由于挨饿受冻，在桂家街死了一个10个月的孩子，跑到新街基时死了一个4岁的孩子。后为了全家人度命，她领着孩子到处要饭，回来后便住在猪圈里。

4. 李淑珍的自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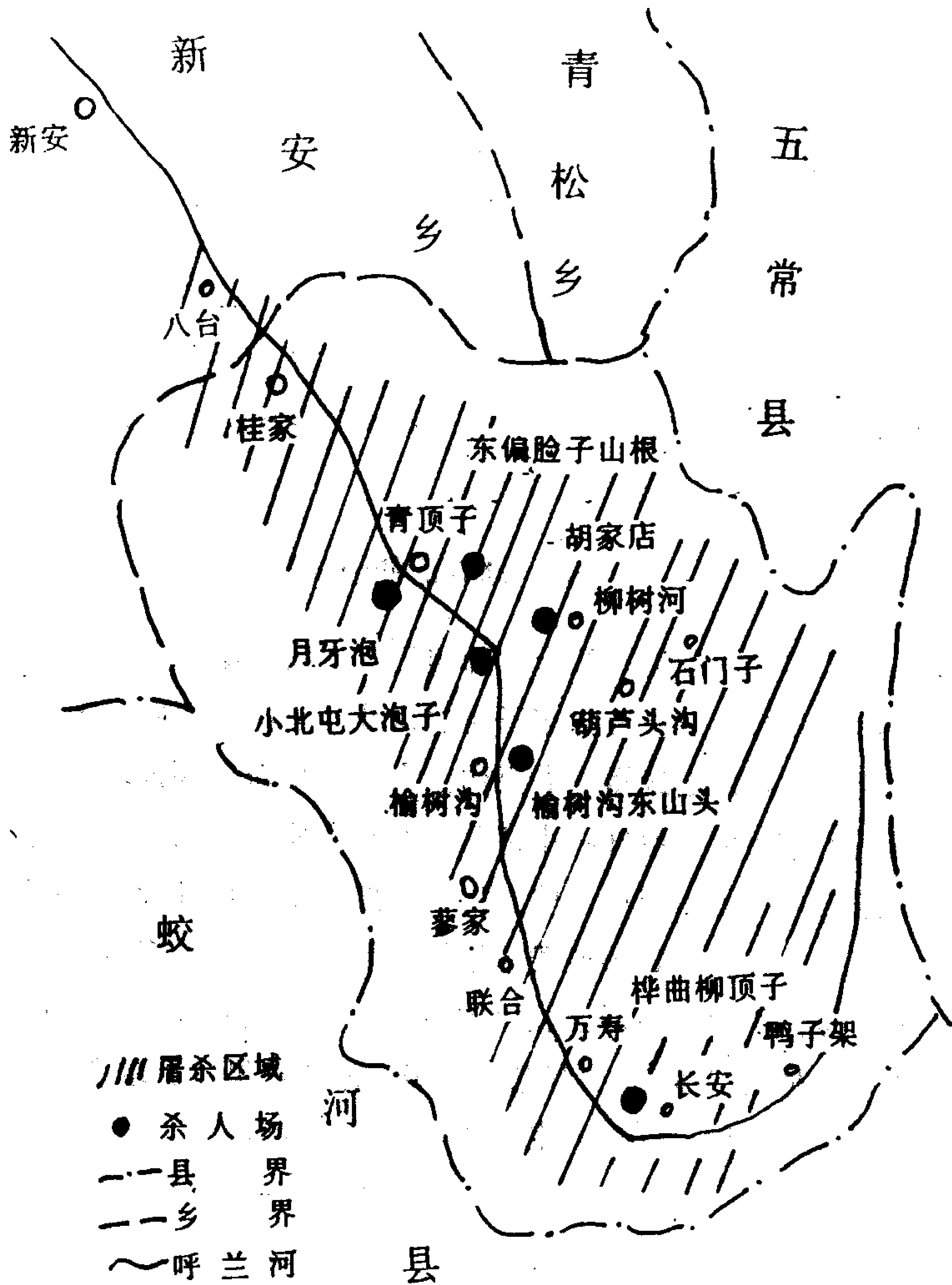
杀大沟那年我15岁。鬼子来的头一天没有抓人，也没有杀人，这天我们那里（榆树沟腰砬子屯——作者注）没有住鬼子，

蔡家沟住了。听我姑姑说（我姑姑那时住在蔡家沟），日本子住下就磨刺刀，第二天开始杀的。我们听到杀人的事，全家8口人就都跑到山上去了，在倒木上棚些木板，就在底下呆着，一直呆了八十多天。我父亲到桂家找到我嫂子的娘家，一说，他们就叫我们到桂家去。这时，我和我妹妹都不能走了，我哥哥背我，我妈背我妹妹到了桂家。以前我身体很好，从那时起，就不能下地了，全身疼痛，腿伸不开。当时生活很困难，治不起。不久手指也伸不开了。20年前还能坐着，以后坐都不能坐了，一直瘫躺在床上，全身瘦弱，依靠我哥哥和弟弟供给我生活。我妈妈曾因生活困难上过吊，没吊死（《老黑沟事件》二卷：8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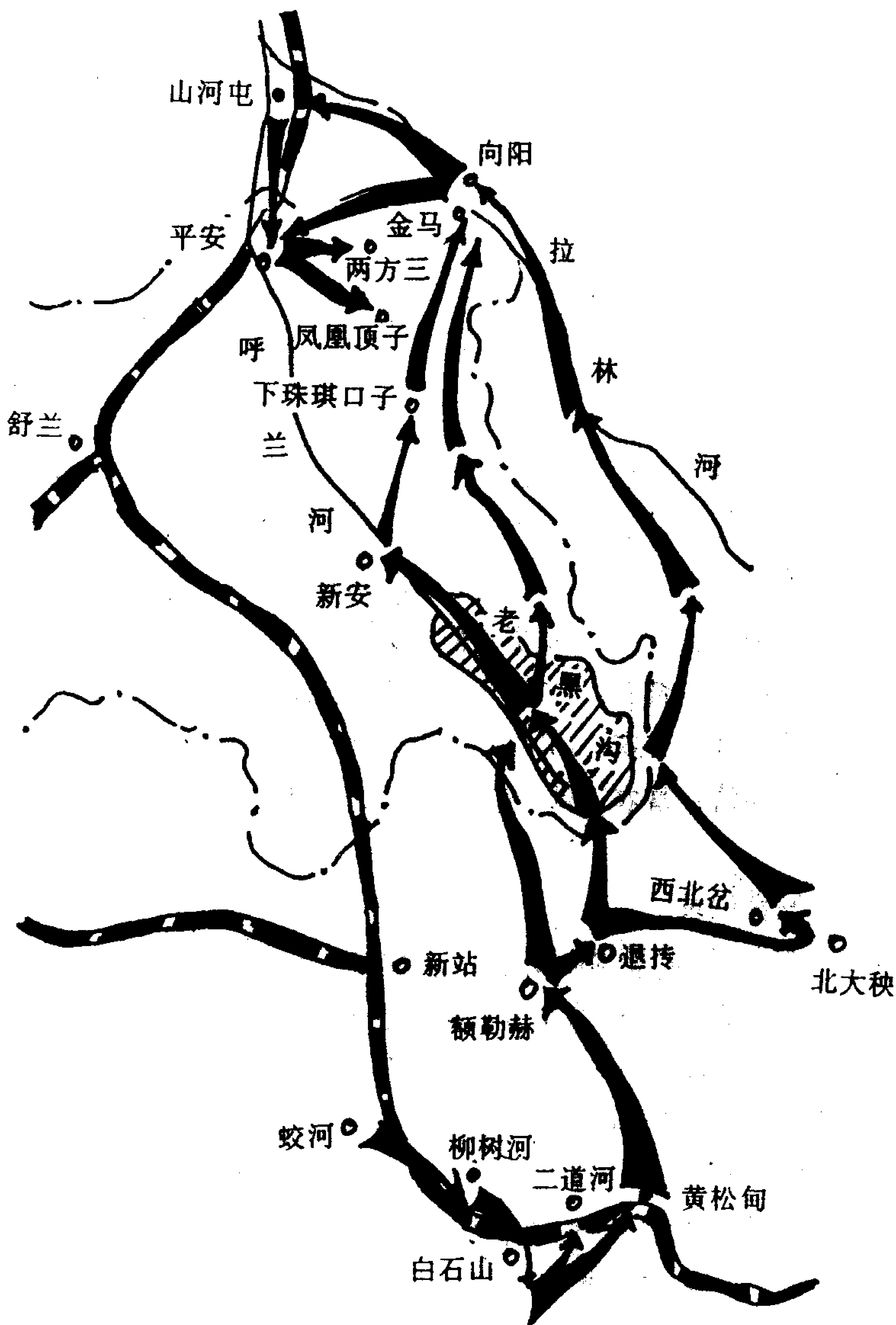
七、劫难后的恐怖

日本满洲派遣军第十六师团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1935年旧历五月初制造了震惊东三省的血洗老黑沟事件后，于五月初五至五月初六陆续撤出老黑沟。大部队从新街基奔珠琪川、金马川到山河屯，留守的小部队从柳树河北山奔汪江店，从珠琪川到金马川去山河屯。曾支持、帮助过德林抗日武装部队的老黑沟，经过日军野兽般残暴地烧杀抢掠，一下子变得死一般沉寂、恐怖，除零星回去验尸的亲人外，再没有人到这里来，这里到处是横尸血迹，没有燃尽的房屋的灰烬里冒出缕缕残烟。旧历五月初五后，这里天空转晴，气温逐渐升高，一千多具尸体在腐烂发臭，一种人们看不见的瘟疫从这里飘散出去，很快在舒兰农村发生了一种疟疾病，也叫傻子病、窝子病，传染快、死亡率高，不知又有多少人被这种瘟疫吞噬了生命。

日军血洗老黑沟屠杀区域示意图



1935年日军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
春季大讨伐行军路线示意图



血洗老黑沟原始资料附录

1. 关于日军屠杀老黑沟问题群众座谈会记录

（见《老黑沟事件》三卷36页）

时间：1966年10月10日晚

地点：蛟河县前进公社

参加会议人员：

李万林：（党小组长），63岁，敬老院院长

贾光福：贫农，66岁，前进大队七队

崔允祥：贫农，60岁，前进大队二队

崔凤山：下中农，52岁，前进大队二队

李书奎：贫农，58岁，前进大队一队

于明德：贫农，72岁，前进大队三队

孔繁林：贫农，61岁，前进大队三队

张连清：富农，伪警察，54岁，前进大队四队

发言记录：

贾光福：老黑沟闹胡子，“六阎王”是个头，共有一二千人。

张连清：大同2年，开始我在新站、蛟河、松江、退抟等地当警察。康德2年杀老黑沟时，我在蛟河警察大队当警察，康德3年——5年到这退抟警察署当警察。

康德元年、2年有个叫“天缘（元）”的胡子，姓施；还有一个胡子头“忠义”的都在岭前退抟、前进地区活动，共有40来个人。老黑沟大胡子头“德林”的，姓宋；一个叫“六阎王”的，共千八百人，在舒兰山区老黑沟住。日本一去讨伐他

们就进山里。六阎王在老黑沟娶媳妇以后，被德林队毙了。

从这屯子（杀老黑沟前四月间）把陈生（长脸，尖下颏，中等个，不胖不瘦，右腮下有趟沟，有点公鸭嗓）、朱文国等人绑去，不久就跑回来了。后从吉林来的守备队，共一百一二十人来到退抟，这个部队有个朱翻译（贾光福说：我知道他是朱家床的朱老四。都没有见到过这人，特征、去向不知道），陈生向朱报告了，并带去杀的大沟。

原来这有个宋万禄，他的媳妇原来是张庆朋的媳妇，那时陈生就与这个女人勾搭连环，杀老黑沟后不久，张有病去逝（抽大烟），后嫁给宋万禄。康德4年四月二十七日，宋万禄一家3口被杀（他老婆及她带来的4岁小孩），当时怀疑是陈生杀的。退抟警察署打电话给蛟河警察署，将他逮捕，送回退抟。经审讯和动刑也未承认是他杀的。朱汉章证明杀人那天晚上，陈生在蛟河打一宿牌，保出。

在过堂时问他，你前几年都干过什么？他说："就要钱，不干别的。"又说："×××年××月我被岭后'六阎王'胡子队绑去过，不是拿钱抽的，是我自己跑回来的。当时胡子没有在家，是一个妇女看着，我解开绳子跑了。这个妇女就告诉胡子了，这时我就跑了。我跑回来时，就遇上吉林来的守备队，我报告了朱翻译：岭后都是胡子，住户与匪通道，没有好人，我领守备队去岭后杀的。"这事是我和退抟警察署长王中正两人亲自过陈生堂时他说的（在退抟审的）。

李书奎：陈生与朱老四一起被绑去，听朱老四回来说，住在柳树河子一家，他要跑，老娘们告诉胡子。抓回来打了一顿，他们后跑回来就报告给日本子朱翻译了，他说岭后无好人，就领着去杀的。

日本子杀老黑沟时，在这派了些老百姓去给背背（即背给养），还派的牛给驮东西。……我在杀老黑沟四五天后去的，是给满军背东西去的，去时见烧的房子还冒烟，都杀完了。

陈生从十几岁就到这里来，落在孙喜武他们家，以后大了就离开孙家，以要钱为生，靠女人，不干正事。

宁守权问：杀老黑沟与陈生有什么关系？

群众：日军来就是要去杀老黑沟的，不报告，日军也是要去杀的。

李书奎：杀老黑沟前跑桃花水时，老黑沟的胡子“太平”救国军在桦曲柳顶子打劫过日本的汽车，把日本子打死不少。

张连清：红军和抗日联军不绑票，胡子实行拨大排。当前警察掌握的，太平和德林队是东北抗日救国军，都带袖标。绑票的是土匪。陈翰章是红军。伪省长曾发出布告：抓住陈翰章，活的给2万元，死的1万元。

群众：抗日救国军太平、德林队都带袖标，他们是抗日救国军，不是胡子，他们是打鬼子的。

座谈会负责人：李万林

2. 张连清的证实材料

（见《老黑沟事件》三卷40页）

张连清，54岁，富农，伪警察警尉职务，现住蛟河县前进公社前进村四队。

伪满吾当警察是在大同2年6月1日。当时是警察大队，驻蛟河，到康德3年3月转到退抟站警察署当巡官。当时退抟驻日本军30名守备队，队长叫大河田，那时没有署长。到康德4年4月1日，由蛟河转来署长名王中正，在四月二十七日（旧历）

晚间在退抟街中心路北作买卖的名叫宋万禄和媳妇及1个小孩4岁，3人被杀死，房子屋被烧了一半。当时警察署检查被害一切情况，调查捉拿凶犯，其中最为可疑者陈生，原因，被杀妇女先是张庆朋的媳妇，住平地沟，陈生是和这媳妇通奸，明铺夜盖。陈生无职业，专以要钱骗人为生，游手好闲。张庆朋死了，媳妇就嫁给宋万禄了，所以先抓陈生。是给蛟河警察署打电话把陈生逮捕送来退抟，经署长和吾严刑审问，灌凉水、吊打，结果陈生一字未招认，押了十几天。后经朱汉章保证放出。在审问陈生当中，问他事变前后你干些什么事，他说吾总也没种地，专以要钱为生，在康德2年春天被土匪六阎王绑去了，带到老黑沟，外有被绑朱恩国（以外还有，吾不记了），土匪住民户家，几天过后，土匪到房子外边去，告住户妇女代看陈生和朱恩国，乘不备时就跑了。跑出不远，妇女告土匪说你的票跑了，匪打两枪之后，陈生和朱一同跑回平地沟，正赶由吉林来了日本军的讨伐队到了退抟，日军翻译姓朱，陈生就向朱翻译报告：岭后普遍是胡子，住民也与匪通道，陈生领着日军讨伐队上老黑沟去，日军人数在100名以上，过了岭后老黑沟，日本军就枪杀火烧，有用机枪排死，以后日本军往哪去也不知道了。陈生回来以后，常来往蛟河、退抟之间，专门要钱，他说在以外的事情没有做过。

1966年10月11日。

3. 孙德发的证实材料

（见《老黑沟事件》三卷47页）

孙德发，44岁，榆树沟公社柳树河大队四队，在这生人。

日本鬼子杀大沟前，这沟尽住的德林队、太平队、双阳队、老来好队、六阎王等胡子队，1000多人。这沟里群众家他们都

住过，在谁家住就在谁家吃。粮食是他们从下边要来的。当时他们经常从舒兰那边、蛟河那边绑一些地主和有钱的人，钱拿来就抽回去。绑的人有朝鲜族、有汉族。穷人不绑。在这住时，有的穷人没衣没吃的，他们还给吃穿的。他们就是抗日联军性质的军队。

我知道抓过一个朝鲜人，在我们家住过，在刘书汉家也住过。是中等个儿，脸方不方，圆不圆，当时连绑带饿的脸发黑，还留着长头发，绑来在这呆一个半月，以后不知怎么的，他跑了。他跑了四五天后就领日本人来杀的。凡是他住过的地方，他都领日本人把人抓住杀了，房子给烧了。刘书汉是这个姓陈的向朝鲜翻译说刘是好人，没杀他，因姓陈的被绑时在刘家住过。陈和朝鲜翻译都是蛟河那边人。杀大沟的这些日本军队，是从葫芦岭那边过来的，先到青顶子那边，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早鸡叫时，他们就上来，挨家堵，见一个绑一个。我父亲、我大爷、两个哥哥、两个锯匠（关里人）等6人是从我家一起绑去的，他们都是听外边有人，出外就被绑上了。他们绑去不久就被杀了。那时我们见出去的都绑上了，我们在屋里就不敢动了。日本子过去，后边给日军背小背的，告诉我们叫快跑，剩下的我们都跑到山上才免遭杀害。

那时在这屯子杀了3伙，一堆40来个。在西山头泡子那杀一伙，大小屯大泡子杀了一伙，在胡家店房子杀了一伙。在胡家房子是用刺刀杀的，那两伙是用枪打死的。在西山头跑出一个（是老关家的雇工），姓什么不知道，现在不知在哪住。

日军杀完，在这呆十来天才走的，走时把刘书汉也带去了，两个半月他才回来。

1966年10月5日

4. 张靖祥的证实材料

张靖祥原系蛟河镇胜利小学教员。此材料是老黑沟惨案调查人李希石抄于日本守备队翻译高昌瑞档案（见《老黑沟事件》一卷54页）。

证明的问题：1935年日寇清剿呼伦川事件（康德2年）。

事件发生是这样的：从1931年9月18日事变以后至1935年春，日寇没有到过呼伦川（老黑沟）。在这个长约80里路的沟川里有相遂东北沦陷而崛起的东北救国义勇军在此地驻扎着，即太平、德林队，约三四千人。此外还有小股流匪，如天元、六阎王、大金字……。小股流匪经常以剽掠为主，绑去的有日本人什么公司经理、朝鲜人、中国人等，以待拿钱赎取。赎回去的人即到新站宪兵队报告了。报告人是一个朝鲜人，还有一个中国人陈宝生（陈生，笔者注）。陈宝生原住在退抟平地沟一带，后搬到江北去了（不是吉林江北，泛指松花江以北）。报告理由是老黑沟一个好人也没有，老爷们绑票，老娘们（女人）在家看秧子①，小孩将来长大也得当胡崽子。但虽如此还不是日寇清剿的主要理由。日寇也是为受打击而苦恼，太平、德林两队经常在老爷岭一带活动，用地雷崩大车，打兵车，并兼老黑沟无法收服，终为心腹大患。故此在1935年春，即旧历正月末、二月初去一次，这时救国军去别地活动去了，日本兵住在老百姓家分毫不取，以稳中国人之心而别有所图。当地中国老百姓经过此次以为日本人并无坏意，所以也敢见日本人了。并且告诉十家长、百家长，要在五月节开会，叫老百姓不要出门，当地十家长、百家长，也以为如何宣传满洲国成立内容等。四月二

---

① 秧子：被绑票的人质。

十七日日本陆军部队从新站分二路出发，一路奔石门子，一路出发呼伦岭，本日早晨到老黑沟最上头即老杉沟、桦曲柳顶子一带，即动手大肆枪杀中国老百姓，离着远的用枪打，近的用刺刀扎。约四日间清剿75里长的地面，从老黑沟——桂家街，在户口数的有1300多人，不在户口的单身汉六七百人。日本兵是陆空配合进行的。

1957年2月10日

5. 金立、刘书汉供词

金立，男，朝鲜族，1903年生人，屠杀老黑沟时是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第十二中队第一小队长中村的翻译。家庭出身城贫，本人成份自由职业，籍贯黑龙江省密山县，文化程度初中，1959年住延吉市进学街29组，延吉市工程队职员。别名金浦光雄。

《老黑沟事件》卷二18页——28页：

我今年56岁，自23岁到31岁由金龙福介绍在延吉市国际运输株式会社延吉营业所任现场员，主要任务是发送、接受货物等工作。

我31岁即1934年秋辞职去蛟河县新站国际运输株式会社营业所。辞职去新站的原因是，原在延吉营业所的一个日本人名叫松岗的调到新站后，来信告诉我，新站挣钱是个好地方，叫我辞职来新站。我听说能挣钱，我就辞职去新站入了国际运输株式会社营业所，业务是搬运日本独立守备队军用物品，雇用个人马车搬运，运价中我剥削利益二倍。

可是生活过的不怎么的。所以在新站过了一冬，1935年春（32岁）领全家返回延吉市的途中，在火车上有人讲：现在蛟河日军守备队招翻译。听完后，我有点心思。故叫家属先返回延

吉市，我和那个人在蛟河下车，找到日本守备队考试。考试内容是念一段书本，对几句话，并说“好”，就考试合格。……当天晚间着守备队军服，第二天开始讨伐。当时讨伐部队番号是三十八联队，队部设在齐齐哈尔，驻蛟河是一个大队，是第三大队，即（下辖）九中队、十中队、十一中队、十二中队，共有4个中队。每个中队有3个小队，共12个小队。这个大队共有约600余名军人，随部队的苦力（劳工）约600余人，合起来共有1 200余名。当时的苦力都是来自锦州、沈阳、长春、吉林等地抓来的商人、学生、居民。其中考翻译合格的约有50名左右。大队、中队、小队都配有翻译。

大队长和三大队翻译是谁记不清。我们中队，也就是十二中队的队长是佐泽，翻译是高汉（宽）瑞，十二中队第一小队，队长是中村，翻译是金立，即是我本人。高汉（宽）瑞解放后在蛟河病死。十二中队第二小队，队长和翻译是谁记不清。第三小队队长是松野，翻译是金永汉（解放后去朝鲜）。

讨伐事实经过：

头一天，在蛟河的三大队全体人员，约1 200人，包括军队、劳力，全体出发，沿着上敦化的铁路沿线，到了叫柳树河子的地方，睡了一夜，第二天，经由白石山到了某山沟，又走了40里地，上了某高地。上高地时还打无线电，并守备了一周。当时在这个高地抓住了一名约60余岁的汉族老汉，把他枪毙了。枪毙当时我们在这地方看的，所以情况不太清楚。据说是个挖药材的，但在他身上发现了火药，所以枪毙了。那时我们还没有被分配翻译工作，只是管理苦力。因为当时有的苦力跑掉了，所以对苦力严加看管。在这个高地时觉也睡不好，很遭罪，我心想跑掉，但没有办法。后到了黄松甸又睡了一宿。第二天二道河守备队派一名军人找我，同他一起到了大队部，并通知我

从今日起是十二中队第一小队翻译了，从此我当了十二中队第一小队中村的翻译。十二中队，军人约有130名，苦力130名，这个中队有3个小队，第一小队、二小队、三小队，每个小队军人约有40名，苦力40名。十二中队在二道河睡了一宿，第二天又出发返蛟河县二里河、八里堡等地为目的地行军（此处供词与一卷44页有出人，应以一卷44页为准）。到了黄松甸子，当晚乘车去二道河子，第二天由二道经过黄松甸子由西北边过岭。离开黄松甸走出20余里地时，抓住了一名50余岁左右的汉族老人枪毙了。当时听说枪毙，我去看，还没有走到地方，就已经枪毙了，开始埋葬。所以当时事实不了解。枪毙是由中队执行的。

《老黑沟事件》二卷34页：去额勒赫方向，在岭上住了一宿，第二天到额勒赫，在额勒赫住了一个星期。《老黑沟事件》卷二29页：我们到额勒赫，日本人见着朝鲜人心里乐，还给小孩糖、罐头啥的。我们是晚上去的，到那里就是休息。《老黑沟事件》卷二35页：在额勒赫住的一个朝鲜族人，到日军去帮助找房子安排住处。他当我们说：一过岭都是胡子，我好几个月前被绑走了，跑回来的。我对他说：你领我们去打吧。他不去，他说你们一过去就到了，我在这边住家，怕再来绑我，命就没了。他指给我们岭后那个方向，我们去了，他没有去。在当地有派的、还有被抓去的老百姓给领道，有的在道上跑了，有时到了一个屯子再换，具体人记不住。《老黑沟事件》卷二21页：我们约一周没离开此地向舒兰县柳树河方面进行大讨伐。大讨伐的目的是为了抓共匪宋德林和消灭其部队。当时出发行动计划是三十八联队三大队全部出动，各中队分别行军的。我们十二中队进军方向是柳树河中心沟里。

我们离开额勒赫，叫一名朝鲜老汉带路，过了大岭把老汉

打发回家去了。《老黑沟事件》卷二29页：过了这个岭不远（半里多地）就发现在山坡上有一个庙，到那一看，这个庙烧着了，听说一个老道被打死了。是前头部队打死的，哪个队不知道。从那顺一个靠小河的道往下走的。走约10里地的地方，发现有些几年没种的稻田地（里边柳树、草都很高），在这段路上没有遇到老百姓，也没有看见房子，什么也没有见到。从额勒赫一直走了约60多里地到柳树河子。《老黑沟事件》卷二22页：柳树河山坡上有10户人家，都是空房子，还漏雨，这些房子中队占用了，其他小队在附近搭帐篷住的。这个地方居民全是散在户，分散户都有居民。我们十二中队到达柳树河后以各小队活动的。这柳树河地带共匪很多，凡是散在户都是和共匪有关系，所以军队白天不活动，到了夜间3点开始到亮天为止进行活动。活动的方法是小队或小队分组活动，搜查散在户居民，搜查当中发现有男的，自15岁到60岁以下全部抓起来枪毙，枪毙的方法是集中到中队部进行枪毙。但在小队有个别的也枪毙。我们十二中队枪毙的达37名，数字不太准确。这些人都是小队活动时抓来的居民。其中把我们第一小队活动的事实谈一下：

我们一小队到了柳树河子后，头一天晚间开始的，活动时有没有人家男的回来睡觉的，利用机会，我们小队当天晚上组织充实力量，大约20名兵力。中村小队长和翻译金立一同出发的，走了一段路到了一个地方，发现一家汉族人家。这家用木棍夹的院套，大门很简单。我们看到这样环境，部队在小队长的命令下把这家周围全部包围起来了。中村和我开始进这个人家，中村小队长持手枪站在我后面。我把障子扒开，偷偷进了院，门是朝南开的。推门，门是一个滑棍闩着。我突然把门踢开进了屋，是个对面炕，一个炕上有老太婆，领着儿孙睡觉，另一个炕上有2名青年在睡觉。我上去大声喊叫，同时把被子揭

开，没有说二话，上去就捆绑。当时中村没有动手，站在门外的兵出来进去，可能是想帮助一下。捆绑人是我，主动首先上去捆的，这是事实。原则上包围这个人家的兵，没有小队长命令谁也不准乱动的。把人捆绑后搜查东西，目的是有没有共匪的物品，即手枪等武器。搜查结果，有了好东西全部拿走，搜查时兵是不准进来的，只有小队长和我进行搜查，如果需要搜查的东西多时，小队长命令班长以上进来一起搜查。主要是因为翻译懂话，所以在前头，在搜查中，学小队长大喊大叫。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有查出来，查出了由日本来的物品如肥皂、粉、牙具等物品，拿走了几块肥皂用了。当天三更又到了一家搜查，这个人家有老太婆和大约45岁的妇女领着小孩睡觉，当中约有40多岁的男人给抓走了。第三个人家是有约50多岁老太婆领着小孩睡觉，还有55岁左右的男子和20多岁男子1名，可能是父子关系，也抓走了。就这样，当天晚上就抓了5名交给了中队部。抓人方法是和头一个人家一样，不管哪一次都是我站在前头，先动手。搜完3家就亮天回来了。搜了3个人家，什么宝贵的物品和手枪等没有查出来。

第二天三更又出动，又到了一个人家，又把这个人家包围起来，进屋，见有一个男的从窗户想跑掉，腰部挂上窗户上，我抓起来一看，约70多岁，还是个拐子。我向中村小队长说，象这样的人抓去有什么用？中村小队长看了一看："啊，什么"，就说算了吧，因此没有抓走。这就搜查了一家。回来的途中距离很远的山谷有一个人，并向他开了枪，但距离太远没有击中就回来了。

第三天三更又出发活动，所有的居民都跑掉了，只剩下女人，一个男子也没有抓着。这样搜查活动了3天。3天后十二中队抓来人全部枪毙了。事后马上把住户的房子点火烧掉，烧房

子时屋内有物品硬烧，我和军队一样参加行动的。

讨伐柳树河的总目的是：说这个地方是共匪窝，全部抓起来杀掉，把东西抢光，把房子烧掉，把共匪扫光。当时讨伐使民心不安，由舒兰县来了一名参事官，骑着马来到战地，说了几句。但大队部说：这是军部的指示，没有法子。故日本参事官就回去了。在柳树河共活动三四天，约二三天没有活动，在柳树河共是一周，活动范围以柳树河为中心方圆10余里地。

《老黑沟事件》卷二30页：当时子弹需钱买，给国家浪费，就用刺刀杀的。在杀时有跑的，就又用枪打的，步枪机枪都用了。杀完，日本兵（都是十二中队的）回去磨刺刀，他们乐的说：杀了几个，几个。《老黑沟事件》卷二32页：我们从柳树河出发到沟里一个山上沟里河边住了五六天，目的是截击宋德林部队，没等着。接到电报撤回到了向阳山，后到山河屯。

《老黑沟事件》卷二26页：到达了拉林河，我们一小队改编为"变胜"小队。"变胜"就是全大队选拔了20余名以重机、轻机、无线电等武器装备的一个小队。改编后为阻击共匪宋德林部队，继续约三四天的行军，到了山河屯。在山河屯的有三十八联队、三十四联队，全部集合在山河屯，山河屯的苦力全部打发回去。我们从蛟河出发到达山河屯这一段讨伐期间共40余天行军，主要目的为了全部扫荡宋德林部队。这次讨伐叫春季大讨伐。

我们小队离开拉林河，向其他方向进军，走出约20余里发现了树在摇动，小队全部到了目标地，在两个树洞里（空心树）抓住6个老百姓，绑起来。吃午饭时，中村小队长命令枪毙，打死5个，跑了1个，开枪没有击中。向向阳山行军。

从那时起部队行动和作风及时转变，向居民实行奴化政策教育。当时向阳山一带住的三十四联队、独立守备队、满洲国

军，目的共同打击宋德林部队，消灭在此地，结果都失败了。4个大队失败后向居民户点火烧房子，当时火气冲天。

从向阳山到山河屯，我们十二中队在柳树河抢的30多头牛，道上杀吃，到山河屯还剩20多头，卖给哈尔滨的商人，1500元，我与金永汉分了，每人750元。我回延吉市休假不到一周，就返回山河屯，回到自己部队。到部队不久，就马上经平安站到凤凰顶子，分两路驻扎，中队和三小队驻扎在凤凰顶子，第二小队驻扎在什么地方记不清，我们一小队驻扎在两方三。主要任务是建立居民户口，一周内出去查户口。目的是居民是否和共匪有来往，另一方面，组织集团部落。

调查户口时，中村小队长看到某家有年轻女子，就在门上点点。我也奸污了叫姓×家女人。来到两方三后没有干别的事。在百家长那里收的鹿茸、鸡蛋、鸡等都是事实，和以前交待没有两样，有时个别出去抓小鸡回来吃过。

金　立

1959年9月19日

刘书汉，男，汉族，贫农，1917年生人，舒兰县榆树沟乡柳树河子村。日军屠杀老黑沟前曾放跑汉奸特务陈生，日军屠杀时被陈生救出，认陈生“干老”，并为日军到柳树河附近各沟岔烧杀时“拉道”。

我从伪满就在柳树河子住，是老户，在这种地。1935年阴历四月二十七日日本鬼子来杀老黑沟时把我抓去，在要杀我时由陈生将我救出，之后就为日军效劳，给他们领道搜山，抓人、杀人、烧房子。后又给日军（陈生交给我的）牵一瘸马领道，离开柳树河经过老汰沟、六道滴子奔向阳山，后到山河屯住了十

几天将我放回，由山河屯上火车，陈生领我到了蛟河，到窝瓜站住三四天后回柳树河。

在杀老黑沟前，老黑沟这趟沟里住的是德林抗日救国军，他们有时到蛟河、新站那边去绑票。1935年春天，他们从蛟河县窝瓜站把陈生抓来放在我叔叔刘喜林家，四月的一天，我老婶刘黄氏（黄秀英，笔者注）见看票的军人睡着了的时候（这时是午前）就把陈生放跑，看票的人发现跑了就在后边撵。陈生从我老叔家跑出来后跑到我们家门口，这时我在院子里喂猪，陈生对我说："快、快，小孩把我藏起来，胡子撵我来了，抓住我没命了。"我心想救他一命吧。我就告诉他："快，西仓房里有米仓子（四节板的米仓子），快藏在那里去。"他进去不久，就追来了三四个救国军战士赶到我们家问我过没过来人，我说："没有过来，没看见。"他们问完了就走了。他们走了我就把陈生快放走了，从那他就认识我了，在要杀我时他救了我，我还给他磕头认了他干老。他跑回窝瓜站后报告了日军，说："岭后（指老黑沟）都是胡子，没有一个好人。"日本鬼子给他换了军衣，在旧历四月二十八日他就亲自领日军来杀的。我亲眼见到陈生把他被绑时曾住过的老费家（费德珍、费德福）、老孙家（三四个）、老朱家（三个）以及李兆贤、秦麻子、老杜头、我等，连男带女共抓了60多人，把女的和小孩都放了，还剩下我们22个男的，午后把我们牵到胡家店房院里，约干一气活的时间一个一个地牵到胡家店里都杀了，共杀了21个人。因陈生被救国军绑来时就在这沟住，对这地方他很熟悉，所以他亲自领日军抓的。

在柳树河子杀完后住了七八天，他和我两人领着日军在五月六日过北岭奔老汰沟去了。到老汰沟上，边走边抓人，到老汰沟时（离柳树河子五六十里）共抓了十几个人。晚上还见被

抓的这些人在那里，第二天我到屯外割草喂马时（陈生交给我一匹瘸马牵着）看见一堆死人，才知道鬼子把抓来的那十几个人都杀了。这一天又奔六道滴子走，第二天走到六道滴子时又抓了七八个人，住了一宿，被抓的这些人又不见了，可能又给杀了。住了一宿又奔向阳山走，一路走遇着人就打死，共打死了有十几个。在向阳山住了三四天后又奔山河屯去的，从向阳山到山河屯没有伤着人。

杀老黑沟的日军是三十八联队三大队，我在的这个队是××中队三小队。队长是小个，大胡子，稍胖，忘记叫啥名了，翻译姓皮，陈生会些朝鲜话，常和翻译在一起。

刘书汉

1966年11月12日

1966年11月11日在柳树河生产大队部分群众座谈会上，刘书汉的部分供词：

杀大沟时陈生把我救出来后，在胡家店房时，我给他磕了一个头，认了陈生"干老"。

孟兆龙头一趟去直接找的日本官，他到屋里说的啥我不知道，他那时当十家长，去是为保人。日本鬼子和翻译说，翻译就问我："他（指孟兆龙）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说："是好人"。日本子拿着刀威胁我说："什么的好人。"我怕他杀我，我就马上说："他不是好人，他不是好人"。日本子就立即把孟兆龙绑上了，在胡家店把他杀了。

从那以后，我就和陈生常在一起，他时常和我说："你们这里不说都是胡子，也差不多。杀的没有好人"。我说这些人都不是胡子，有些都是我的亲戚。我问他怎么被胡子抓的，怎么跑的。他说是抓来放在一家一个妇女把他放了。他说他在岭前窝

瓜站向日军报告"岭后都是胡子"。他还说他被抓来十多天，熟悉道，自愿领来杀的，日军就给他换上黄衣服领来的。

四月二十九日，在胡家店杀人时放的我，第二天（三十日）就叫我领他们到山上各个沟岔去抓人、杀人、烧房子。这一天就烧了三座房子。第三天（五月一日）到东边黄柏璃庙岭，没抓着人。第四天（五月二日）到榆家趟子（在柳树河南边10来里地）遇着一个人在木头堆上坐着，鬼子一枪打死了。这个人是李大癞子。第五天（五月三日）到大王砬子（在这西边七八里），隔一个甸子见一人，鬼子打一枪，把那人打倒了。在这屯南边三里半地的唐万禄家门前把一个妇女和两个小孩（都是十来岁的小子）用刺刀刺死了。第六天（五月四日）奔葫芦头沟，途中打了两枪，不知打着人没有。第七天没有出动。第八天（五月初六）一早我和陈生领道，全队奔老汰沟、珠琪、六道漓子、向阳山去了。

赶走（一边走，笔者注）他们就烧房子，一直烧到沟里。走到老汰沟，黑天住下了。在那抓了十几个人。第二天这些被抓的人就没有了。我给牵马，到外边割草遇见七八个尸体，才知道是把他们杀了。午后我们就又奔珠琪走了。赶走赶抓人，走到六道漓子，这一天抓了有十一二个人，晚上人都还在那里，我们走时就看不到被抓的这些人了，可能给杀了。走了一道，不断枪响，走到跟前一看，是打死了一个。从六道漓子到向阳山，共打死约二十多个。第三天，走到向阳山街外，就没有再杀。在向阳山街里住了3天，后又向山河屯走的，到山河屯就住下了。住在山河屯屯里一个烧锅。在那住了七八天，就把人都放回去了（背小背的老百姓），用的是闷罐，连人带牛马一起上车。姓陈的就领我也上车了，走到蛟河，姓陈的在蛟河买的鸡蛋背着，有个朝鲜人牵一头牛，一起回到窝瓜站。他是用自己的牛给日

本子驮东西的，他姓金。到姓陈的家，他叫我给他铲了三四天地。我们这屯有个刘狗崩子（刘景生，他儿子在"联合"住）和陈生认识，陈对他说我在那，叫刘捎信给我父亲，我父亲把我领回来的。

手无寸铁的千余居民被伪满日军杀害在老黑沟

北京大学留学生　石切山　英彬

（1988年2月12日日本《朝日新闻》杂志第76—86页现场报告）

1935年的旧历四月末①，日本关东军第三十八联队调一千多兵力"讨伐"了中国吉林省舒兰县境内的老黑沟，惨杀了这里的1017名居民。

老黑沟座落在距离吉林市东北方向大约80公里处的一个山沟。现在改名为榆树沟乡。1987年秋，我访问了这个长40公里，最大宽度为4公里的山沟乡村。

首先，在乡政府招待所听取了当地史志办工作人员卢喜军先生介绍的惨杀背景概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强占东北，抗日的烈火很快就燃烧在整个中国东北地区。当时，老黑沟这个山沟当然也就成为抗日队伍活动的一个据点。

日本侵略军队企图歼灭抗日队伍的同时，也计划屠杀无辜

① 此文用汉字表示的时间均系旧历。

居民。日军分两路，奔袭了老黑沟。在这个山沟里，居住着三百多户人家的农民，种植苞米、大豆，靠着辛勤耕耘来维持生活。日本军队在这里杀人、放火，反反复复地折磨了整个山沟。骇人听闻的惨杀，是从上方的长安开始向着四清方向进行下去的。

要详细确凿地了解当时按小队分别进行的惨杀情景是困难的。但是根据迄今为止的调查，可以肯定惨杀是分别在山沟里的6个地点进行的：①桦曲柳顶子（现在的长安）；②北大泡；③胡家店；④月牙泡；⑤桂家（现在的四清）；⑥柳树河屯西边。

惨杀持续了5天。在以上6处集中被惨杀的有980人之外，还有个别被抓惨遭杀害37人。手无寸铁的无辜的1 017名一般居民，竟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关于老黑沟事件，在《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刊印）一书上有惨杀持续“八九天，被惨遭杀害的居民有三十多名”的记载，我这里采用的是卢先生提供的数字。

卢先生接着说：“外国人访问这个山沟，日本投降后是第一次。我们希望你们日本青年以真挚的态度对待日中间的历史事实。”

下面是由幸存者亲自用汉语叙述的，个别地方我没有听懂的由舒兰县教育局于洪林先生帮助翻译的。

桦曲柳顶子

车窗外面的呼兰河，随着车的奔驰忽隐忽现。据说发生惨杀的那一年，这条河水被居民的鲜血染红了。吉普车顺着收割前的田野高速地向南奔驰，最后到达山沟的最高地点——桦曲柳顶子（现长安）。

尹凤山（男、70岁、农民）站在50多年前的集中惨杀现场上介绍说：“开始惨杀后的一天傍晚，我在这看见了躺在血泊里

的四五十具尸体。尸体在离道路四五米的林子里，一个摞一个地躺着。我是农民，有一天在地里干活儿，看到日本军队突然放火烧九云山庙，霎时天空黑云弥漫，我家5口人很快逃进山里幸免于难。"这位尹老人把惨杀事件叫"杀大沟"。

老黑沟大屠杀是这样从桦曲柳顶子开始了。

胡家店

孙德发（男、65岁、农民）和他的侄儿孙恩（男、57岁、农民），惨杀事件当时住在柳树河子。这两位讲的当时惨杀经过情形是这样的：旧历四月末的一天清早，我们全家男女老幼还在被窝里。屋外喧嚣异常，突然窗户从外面给砸坏了。

孙恩被惊醒了。他睁开眼一看祖父、两个叔父、祖父的弟弟等4人已经被日本兵抓住了。他在发暗的屋里紧紧地贴伏在窗口目睹了屋外的可怕情形。

孙德发老人说："我爹他们四五个人用铁线被穿成一串。日本军队把八号铁线弯成钩形，贴近锁骨穿进皮肤钩住锁骨后再穿透出来。穿好第一个人再穿第二个第三个，这样把好多中国人穿成了串儿。除了我爹，还有很多的居民都把锁骨被剜穿成串了"。

日本军队把孙家的家族骨肉带走了，留下来的就慌慌忙忙地逃进了山里。

逃到山里熬过十七八天后，孙德发他们兄弟5人下山去寻找亲人。在路上碰见了刘书汉。他说不必去寻找了，他们都死在胡家店。

孙德发他们跑到胡家店，看到所有的房屋被焚毁，废墟上到处是相貌全非、奇形怪状的尸体。每一具尸体被烧焦而弯曲了，变形了，有的耸立着烧成炭样发黑的手和脚，有的还被烤焦而萎缩，没有办法辨认是人体变成的尸首。

全部尸体都用八号铁线，三四人到五人左右为一串的穿联了锁骨，由于陈翻译官讲情，孙德发一个人侥幸免于灾难。

下面是刘书汉讲的胡家店惨杀情形。他说："日本军队将强迫驱赶出来的人用八号铁线穿透锁骨拴在一起，集中到胡家店。被铁线拴住了的人们，疼痛异常，不用说逃，连动一动身子都疼得难忍。日本军队把这三四人为一串的中国人排列成队，站立在他们面前。一个日本兵包杀一个中国人。杀人是用刺刀挑死的。被抓来的每一个人都用刺刀挑一刀，不管刺得深浅，事后葬身于烈焰之中。

难以忘怀的死难者

孙德发他们5人，在废墟旁边挖掘了2米深的坑，用铁锹挖好了坑，从废墟上把尸体一个个拉过来掩埋掉了。

在柳树河，还见到了幸存下来的费淑珍（女，63岁，农民）。她讲："我们一般民众，害怕日本军队来，也害怕土匪来，有什么好吃的，哪边来了就给哪边。"费的祖父、父、叔父3人是被日本军杀害的。

到了集中惨杀现场，曾经是茂密的森林，采伐了树木，现在是水田地了。只有孙德发他们5人修的坟墓座落在池埂对面，是直径三四米，高一米五左右的土馒头形，上面还有繁茂的杂草。

我向周围的人打听是否知道曾在这个地方做过什么事时，在场人齐声回答："知道，比谁知道得都清楚"。

鱼网上现今尚能打上来人骨的泡子——青顶子月牙泡

吉普车驰离乡政府往西北方向跑了一段路，就进入了长满杂草的乡间路。我们请了一位妇女做向导继续向前跑，目的地

——青顶子静悄悄地伫立在呼兰河北侧。

现在是300多户、900多人口的这个村，遭了惨杀后暂时成了无人地带。当时把青顶子居民集中起来进行惨杀的地点就在这个村南边500米处的月牙泡泡沿一带。

全长200米，最大宽度10米左右（惨杀当时20米左右）。这个半月形泡子的水，不知是为什么好象发着淡黄色。我问讯在泡子南沿上莳弄苞米的老农妇。她说："都说好多人的骨头沉在水下面才发出黄色的。很多的血也流了出来，肉也腐烂在里面了才……"。

泡子的周围象是漂垡湿地，低洼处都浸在水里。岸边的树木郁郁葱葱地挡住了泡子。姓林的向导（女、20岁左右、农民）说："大白天姑且不论，天一黑了女孩子们就不能靠近这个泡子"。

"在这里检出不少人的头盖骨和大腿骨呢。"这样反映的是原学校的一位教员（男、20多岁、农民），在泡子的东边他见到我时这样说的。他接着说："1966年捞鱼网上打捞出来的。"好象是青顶子小学的3名学生也给我讲：他们在1987年的春天捞鱼时，网上挂上来了人骨。

"土生土长在青顶子，对惨杀事件知情的恐怕只有我一个人了。"说这般话的是现在住在青顶子南边的绍喜双（男、69岁、农民），是月牙泡集中惨杀场上的尸体发现者。他面对着一个日本人，我看出了他的心情很不平静，频繁地眨着眼睛。但过了一会儿稍微融洽了起来，从嘴里迸流52年前他亲眼看到的种种情景。坐在火炕上给我讲了下面的事情。他对日期、时间的记忆清楚，所以我的报告也用了日期、时间（均为1935年旧历）。

当时绍住在青顶子偏北的舅舅家里。邻居有刘家和高家。刘家是寡妇家，她有晚得的10岁前后的两个儿子，共3口人家；高

家6口人。

四月二十八日午前10点多钟，日本军队来到了青顶子。绍和往常一样在苞米、谷子地里劳动着。“看来日本军队大约是80多名，都穿着黄呢毛料制服。”他心想：“我们是农民，种地是我们的职业，没有做过什么骇怕人的事。”这样继续在地里劳动。

二十人穿连成串被杀害

日本军队这天什么也没有做，从绍喜双劳动的北面绕了个弯就往上边回去了。他们的钢盔光滑，发着刺眼的光。

绍接着说：二十九日中午刚过，有人从山沟上方慌慌张张地跑下来说：“日本人在沟上边杀人啦，你们赶快逃啊。”绍跟他的父亲两人逃进了山里。这时，青顶子村落乱了，变成了活地狱。“有战战兢兢吓瘫了的，男的喊叫，女的痛哭，听得很清楚，总之是中国人的喊叫声”。

日本军队为了集中杀人，把居民用刺刀威逼赶到一块儿。后来，绍喜双才知道被赶出来的中国人双手用铁线上绑拧紧，从两臂中间穿上一根水曲柳杆子。每一根杆子能穿上20左右的人。

居民的房子，人被赶出后就依次放火烧掉。绍在逃进的山上看到了青顶子到处是冲天的滚滚黑烟，也看到了村落里窜来窜去的日本士兵。

第二天借没有日本军队之机，绍喜双下了山。青顶子一夜之间变样了。在废墟上看到了人的骨头，是在家个别被抓惨遭杀害的。绍和其他从山下下来的十多人，一起去寻找日军带走了的人的下落。

很快发现青顶子南边月牙泡沿一带集中被惨杀的尸体。月牙泡那边有两处集中惨杀现场。现在这个泡子的周围是稻田和

苞米地，可当时这里是林子，是杂草丛生的湿地。

绍等人首先在泡子里和泡子沿边上发现了无数的尸体。绍说“谁也没有数过尸体”。

泡子里，泡子沿的这里那里到处都是尸体。上半身在水中，下半身在水外倒立着的，全身泡在水中头部搭在岸边上的……。

从这儿再稍微往南走200米，则可以看到另一个集中惨杀现场。所有拴连在木杆上的尸体，是和月牙泡平行着排列成两排。每一排由3根木杆组成，共是6根。每一根大体拴上20人。尸体的脚都朝泡子，脸朝下躺着。木杆子压在尸体的脊背上。

120具尸体上留有枪弹和刺刀两种伤痕。不少尸体的头部后面都留有刺刀刺伤的痕迹。这是杀后再刺咽喉以断最后的气息而留下来的。老的和少的，昨天还是好好的在地里耕种劳动，欢蹦乱跳过啊，今天变得这样的可怕。刘寡妇的10岁左右的儿子也混在大人里边死去了。

绍喜双把眼缝眯得细细地接着讲述往事。

他的语气原来就有点强，谈到这儿就更加激动起来了。“他妈的！”像吐出似地骂了娘。姓高的他们5个人也都死了。幸存下来三四岁的幼儿来绍家玩过，后来听说寄养在吉林市娘家的一位叔叔家里。

我的胸膛被刺，然后脖子也……

在月牙泡附近亲身体验过被捕杀，以后又获得九死一生的姜桐彬（男，72岁，1987年9月居住于五常县）。由于健康上的理由这次没有得到会面。但他在1986年、向舒兰县史志办谈过惨杀事件的见证。下面介绍的是他的见证：

姜等3人被绑在3根榆树上，日本军队枪上上了刺刀。先刺了一个老的，其次是姓郎的一个青年人，目睹了闪闪白亮的刺

刀刺进胸膛，同时也听到了两个被刺者的惨痛喊叫声。这样凄凉悲惨的喊叫声由远处也不断传来。"我心想我就这样完了"。

"担当刺杀我的'日本鬼子'解开了我的棉袄扣子。他的手在哆哆嗦嗦地发抖。他后退了五六步，端起枪向我喊着杀声刺来。刺到我的肋骨下面，闭着眼睛喊叫了几声。随着喊叫又刺我一下。两个伙伴已经奄奄一息，连动都不动了。我暗想：喊叫是不是会招来刺刀？我闭上了眼睛，一点呻吟也不出，忍了下去，可是马上从侧面又刺来一刀，刺上了脖颈。人到了这个地步，真的没有再喊叫的劲儿了。'日本鬼子'看到我不能再喊叫以为死了，就把绑绳给解开了。我俯伏倒在地上。这群残暴的野兽还刺了我的腰部一刀。刺刀没有深进，在坐骨上边停住了"。

第二天，他得到了现住舒兰镇的郭书堂（男、87岁、农民）的救助。郭书堂向笔者说：当时看到姜的脖颈上有2个、胸部3个伤处，是我帮他治疗的。（本文中的年龄均系1987年9月的虚岁。）

（金　恒译）

黯淡了的记忆
——奈良联队的点与线

日本《朝日新闻》杂志社　藤森　研　金恒译

"老黑沟"这个地名连同53年前在那里曾经发生过有千人规模的村民被惨杀的事情，恐怕在日本几乎是不会有人知道。

根据日本方面的历史史料，它能够得到多大程度的证实呢？

中国现场报告所提供的线索不过就是“1933年农历四月末”这一时间，“吉林省舒兰县老黑沟”这样一个地点和被指名的“加害者”是“关东军第三十八联队”这个部队名，根据这三点去弄清事情的真相是成功度很少的。

首先走访了东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很快闹清了“第三十八联队”这一“加害者”指的是奈良县出身的步兵“第三十八联队”。根据查阅该馆收存的《奈良联队战记》(1963年大和时报版)，自1934年4月至1936年4月期间，该联队确驻扎在伪满齐齐哈尔市。

可是对于需要说明问题的1935年春季讨伐行动，该《战记》上是空白着。只在《特记事项摘录》上记载着：①1934年10月—11月，参加吉林省大讨伐联合作战，转战五常——阿城——珠河——宾县——榆树等地域（照抄原文）；②1935年6月8日，第二大队前往间岛省讨伐残匪。这样，把中间（上述两个时间之间的）时间给漏掉了。操纵该图书馆微机检索卡片深入查寻，所找到的“三十八联队战斗详报”仅仅收存保留着1937年以后的。

或许现场报告上的日期，是否将1934年之秋误记为1935年之夏？倘若事情真是这样，那么实际转战的地域又不吻合了。

给北京石切山（编者注：石切山即前文作者，与本文作者分别在中日两国同时对此惨案进行联合调查。)的国际电话挂通了。传达了所有疑问点，委托他重新取得中国方面对确定时间的根据的证实材料。笔者飞到了奈良。

在《奈良新闻》当时的报道上发现了线索。1935年7月10日，载有由田路联队长向奈良县民写的近况报告。

“自15日以来，出动于吉林方面30余日的春季讨匪行动业已结束，现在已转入夏季讨匪行动……”从该报其他报道文章，

可以推断上述文中的“15日”所指的肯定是指1935年5月15日。虽然不知什么原因“奈良联队战记”上是漏记了，但三十八联队从5月中旬以后的一个多月的期间，确实是在吉林省施行了春季讨伐。

奈良县添上郡田原村（现在奈良市）帝国在乡军人会田原村分会，在1937年刊行了非卖品的《随军史录》，这是这次发现的又一个贵重的史料。它记载着当时分会员聆听归乡士兵（现役）的“武勇传集”。

看一下夹杂着空白符号（指当时军事上不得公开的机密，即地点、人物等都以○○等符号表示——译者注）的每一个“证言”（指武勇事迹——译者注），就会象解开线团似地把三十八联队1935年的春季讨伐足迹浮现出来。

某一个人的“证言”写道：“5月15日，参加吉林省方面的讨伐，护卫一货车的弹药，向着敦化……。”

另外一个人的“证言”是“5月14日从驻地出发。15日到达吉林省。20日黄泥河。不断地向腹地前进。30日到达○○○○。6月8日参加三人班儿附近的扫荡战。”这个“证言”者还健在，他向笔者说：“在吉林省下了火车后向北笔直地行军，翻山过湿地，最后我想是到了哈尔滨。我跟随在部队的尾部行军的。”

请参照地图。大概从叫做敦化的车站出发的部队，经由黄泥河向哈尔滨方向行军，30日前后到达于某个村落，6月8日，还说到达三人班儿附近了。

比这个更进一步，从《随军史录》上翻到了决定性的记述。那就是A步兵上等兵的下述“证言”：

“5月30日，到达于叫做青顶子的村落，宿营于该地。中队于31日半夜，自从该地出发，前进中清早遭遇了大湿地”（照抄

原文)。

这样，步兵第三十八联队以讨伐土匪为目的，在1935年5月30日，进入了老黑沟的青顶子这一事实是确认下来了。中国方面的调查结果同日本方面的史料是没有矛盾的。

需要澄清的下一个问题是对千余居民的惨杀行为。

还是要继续归纳《随军史录》上的A上等兵的“证言”：

“31日，通过大湿地的进军中听到是‘砰’的枪声，是从侧面射击的。准是土匪，中队应战了。‘匪不退，我不进’的对峙状态。此时飞来一弹，命中了上等兵。‘妈的要报仇！’中队开始了猛烈攻击。土匪终于遗弃数具尸体逃走。”

这个记述既没有证明对老黑沟各地点的集中惨杀，也没有加以否定。A氏等人在大湿地所听到的枪声，说不定会是日本军的《奈良新闻》当时所报道的31日前后的死者，只有A上等兵一人。那么“猛烈的攻击”了什么呢？是个疑问。

日本军当时所称呼的所谓“土匪”这一实体，一般指的是反满抗日的游击队，“……根据不同地域的实际，识别匪民是极为困难的……”（关东军参谋，1935年）。情况就这样。那么被遗弃了的尸体，是不是真“土匪”？A氏于1945年阵亡了。他的亲人们说：“没有留下任何资料。”

寻找了生存者。但在当时所遇到障碍比预想到的还要大。访问了提供给《奈良联队战记》有关资料的旧军人战后组织——“至诚会”。互相扯皮，推来推去，循环回转之后得到是：“没有资料，了解当时情况的生存者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答复是极其冷淡的。

“那，不可能！我一个也没有杀”

找到了健在的原三十八联队一位军官。但是，他的家属还

没有听完取材意图的说明，就以因是“高龄”而郑重地插嘴谢绝了证实。

“奈良县对同旧军队有过关系的所有人员施行着缄口令”。这是关西（大坂、京都）某历史学者说的。1935年的下一年，就是这个三十八联队登上过南京大惨杀的舞台，是参加攻克南京战的部队之一。

线索还要回到《随军史录》。会见了3位生存者。

曾经参加过春季讨伐的C氏（73岁）明快地说：“在那次春季讨伐上未曾有过战斗和惨杀，因为没有与土匪遭遇过。”

《随军史录》中的C氏条款上有这样一节记载：“6月12日雨。在野营地见到同乡D氏。‘喂！C君，模样变了’，‘你的变化也很大呀’，‘C，你杀多少人？’，‘杀了三个，你呢？’，‘嗯，干掉了十五六个’。现在家里都会想些什么呢”。

把这个部分指给C氏，看后，他的表情微妙地变暗了。

“哪有的事，在那个地方没有见到过D呀。《史录》上写的是D氏杜撰虚构的。人，我一个也没有杀过。”

过了不久，“有过这样的事”，他转了话题后这样说：“1935年春，参加齐齐哈尔附近的河边演习，在淤水处看到一百多具漂在水上的土匪尸体。打那时以后，我就没有心思再想喝鲤鱼熬的酱汤了。”

“1938年，驻扎在华中一带时，我看见其他士兵常把逃在山里的中国人当成‘便衣队’捉来杀掉。其实，是‘便衣队’还是农民无法知道。我对他们说过：‘枪弹会吼叫的’，并提醒他们‘即使杀的是中国人，也会因果报应的’，但是一遇上机会，杀害也就继续下去了。”

原是一位伍长（下士）E氏（74岁）在《随军史录》上51年前这样讲的：“土匪非常地○○。用刺刀这么一刺就很容易刺

进去，可以毫不费事地刺杀得了，要讲这类故事，那就多得很……”。

双方的记录指向一致的那个时刻

给E氏挂通了电话。他明确地回答说：“讨伐当时做了治安工作。要我具体地讲？凡是反抗军队的都加以肃清……。”E氏有事，不得不等待到第二天上午访问他的住宅，他变卦了，否定了说过的事。

“屠杀居民等事情我是没有怎么听说过。日本军队一到村庄，人家骇怕都会逃山里去的……”。背着不放心离开老伴身旁的老妇，悄悄地给他看了《史录》，打听关于惨杀的一些事情。笔者感到：他的谈吐，往往界限模糊，真伪混淆。他说：“具体的事儿干脆忘了”，“好事儿还记忆着……”。

老妇终于察觉到谈的是什么。她插嘴说：“那个人告诉你去E处打听的吧，是这样告诉你的吧。肯定是这样的。”她向她老伴的战友开始了大骂。

F氏（74岁）是当时一位上等兵。在他的庄户住宅的洋灰地上进行交谈。“那样的话我是没有听见过呀。”

给他看了《史录》。

“又弄出这样的东西啦。”这句话，他重复了多次。

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东京，给北京的石切山氏挂去电话。

“日期还是没有错。”在电话里石切山这样讲。

“不，根据后来的调查证实，三十八联队在1935年的春季，也去过吉林省。可是你知道绍喜双所说的1935年旧历四月二十八日是新历的什么时候？”笔者这样打听。

石切山在电话机旁，从中国的历史系学生们常用的“新编万年历”（1986年修订版）确认出了时间。他说：“新历是5月

30日”。

老黑沟的绍喜双所记忆着的“那个日期”和已故上等兵所留下日期是恰恰相符了。

日本方面的证据，现在仍然只不过是个情况而已。

但是，“当时的中国”，“当时的日本”，随着“现在的中国”，准确地将“老黑沟”显露于光亮之处时，只有“现在的日本”将记忆拼命地推向黯淡而在挣扎着——没有办法甩掉紧紧缠绕着的这个印象。

（载1988年2月12日日本《朝日新闻》杂志80—82页）

土龙山惨案

土龙山地区惨案

黑龙江省桦南县政协文史办

1934年3月10日，土龙山暴动农民在白家沟打死日本关东军饭塚大佐以后，日军对土龙山地区各村屯的爱国志士和无辜同胞，进行了极其残酷的烧杀。先后血洗村屯12个，烧毁大小房屋1 000余间，杀戮我无辜同胞1 100多人。粮食70余万斤，死伤牲畜290余头。自3月12日起，日军用机枪扫、刺刀捅、战刀砍头、劈脑以及火烧、水溺、严刑拷打等多种多样的方法杀害我同胞。现将日军自土龙山农民武装暴动后，对土龙山地区各村屯逢人便杀、见房就烧的事实经过，分别由当时的见闻者回忆如下：

血洗北半截河子

吴　和口述

1934年3月12日早晨，日本骑兵队和弥荣（孟家岗）开拓团守备队，前面以3辆汽车开路，满载日本兵，带着机关枪、迫

击炮等武器，马队在后面，向北半截河子杀来，先到后居园屯开始烧杀，屯里20几户人家，除不在家的人外，都被日军用刺刀、机枪杀害了。所有房屋、柴禾垛甚至垃圾堆都用火点着了。我那时才12岁，家住前居园屯，在院子里望见后居园浓烟滚滚，一片火海，我们屯子的人，都逃到前面小门傅家（现在的六分村）去了。

日军在后居园屯烧杀后，接着血洗了马青山、崔和、綦奎武、韩国文、王德花（现在的团结村）、兰四先生（现在的曙光农场一分场）等村屯。把村子里人杀光、房屋等烧光。尤其血洗韩国文院套时，把附近村屯逃难到他院套里的200多乡亲们，全部用机枪扫射打死。

日军这次用不到10个小时的时间，血洗了北半截河子一带的8个村屯，杀害无辜同胞440余人，烧毁大小房屋200余间，烧毁粮食20余万斤，牲畜一百七八十头。

对五保地区的烧杀

阚遇章　徐万福　尚属岐口述

徐万福说：日本人派往白家沟收敛饭塚等人尸体的河野部队，于1934年3月15日在徐爽屯（现在的四合村东二华里）附近，遭到了民众抗日救国军冯丙辰部的阻击，冯部撤走后，日本兵兽性大发，向屯子里猛烈射击。孟大骡子屯（现在的小四合村）的张人贵，正走在路上，被一枪打死。我的父亲徐振明在屋里坐着，也被机枪打死。日本兵一进屯就烧房子、点柴禾垛。赵廷禄的三间房和王学忠的两间房全给烧了。屯子里火光冲天，哭声一片。后来一连下了好几天大雪，足有四尺多深。被打死的十几口人，四五天以后，才抬出去埋了。

尚春岐说：日军烧完徐爽屯，汽车绕道来到我们四合屯，一进屯个个拿着火把烧房子。李义、鲁学贤、宣洋、王子扬、孔宪礼、老钱家和我家的房子，全给点着了。整个屯子浓烟滚滚，一片火海。全屯共烧掉70多间房屋，大人孩子都吓跑了。衣服、家具、粮食全烧光了。

阚运章说：日本兵烧了四合屯，往西直奔白家沟。路过梁喜春院套时，遭到抗日救国军20余人的阻击，打了不到一个小时，救国军撤走后，日本兵砸开院门，进院就开枪把梁振东、梁××、梁××等3位老人打死，然后放火把15间房屋和院内的一切东西都烧光了。

血洗九里六屯

梁秀文　许　庆　李福申口述

梁文秀老人说：我今年55岁，父亲当年是土龙山区三保五甲甲长。他在世的时候，常讲日军血洗九里六罪行。

1934年3月10日，土龙山事件之后，九里六的老乡听说日军在北半截河子一带一天就血洗了8个村屯，还要对土龙山全区进行血洗，人们都提心吊胆。后来，一连下了几天大雪，积雪一米多深，道路堵塞，车马难行，人们紧缩的心稍有平息。可就在刚刚通车的3月19日这天早8时许，从阎家方面来了3辆日军军车，前2辆停在屯里饭馆门前，后1辆停在屯子边上，看样子是日军的侦察车。当时驻守在屯子里的抗日民众救国军后卫部队井龙潭团和屯里的大排队，共100多人，都上买卖铺孙启元家的炮台上，乘敌人下车时，一枪一个，把鬼子停在屯里的两辆汽车打坏了，只因没有重武器，屯边那辆车没被打中要害，跑回湖南营报信去了。

下午2时许，敌军又开来四五十辆汽车，对九里六开始了大反扑。战斗直打到半夜，最后终因寡不敌众，抗日民众救国军在大排队的掩护下，带领部分老百姓撤出九里六。日军见屯里枪声不响了，冲进屯子，开始血洗。他们手拿汽油火把，见房就点，连下屋、猪圈、狗窝、柴草垛都不放过。全屯顿时火光冲天。日本兵见人就杀，甚至被打伤还有口气的人，也要捅上一刺刀。躲在草垛里的人被活活烧死，钻进炕洞里的人也被揪出来，用刺刀捅死。

大半夜的血洗，九里六房子全部被烧毁，被害群众600多，尸横遍地，到处是血，惨不忍睹。

许庆老人说：我今年67岁，日军血洗九里六时，我13岁，住在下九里六南二里多地的山坡上的姑姑家。3月19日上午天还挺晴，过午就下起雪来了。大约2点多钟我听见汽车声。爬上土墙一看，日军来了48辆汽车，车上架着机关枪、大炮，大约有千把人。不大一会儿，双方就接火了，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从下午一直打到半夜。后来抗日军撤走了，日军闯进屯子开始烧房子，当时大人哭、小孩叫，猪叫狗咬，牛马在圈里烧得乱叫乱撞，真是令人心惊，惨不忍睹。

天刚放亮时，日军开始了大搜查、大追捕，对逃难的群众尾追不放。他们追上逃到东南山根下的28名群众，用草绳子把人一个个捆起来，叫并排跪在地上，然后用机枪都给打死了。

接着日本兵又把东山坡上的老王家围了起来，老王家是三间大草房，80来名群众躲在里面，危急时刻，一个老头走出屋，想向日军为大家说情，没等他开口，就被日军开枪打死了。屋里人谁也不敢再出来，日军就把门窗封严，用机枪往屋里扫射，然后放火烧了这所房子。事后，房框里只见一大堆烧焦的人骨露着白碴，横躺竖卧，好不凄惨！

李福申老人说：我今年已76岁了，下九里六屯经过那次大难的人只剩我一个了。那年我25岁，家住在九里六屯东头山根底下，日本兵是从西头进来的，听到炮响，我们全家就从东头跑到上九里六，幸未遭杀害。

北山根下的老麻家，听到炮声，大人小孩都往外跑，日本兵发现后，用枪把他们都打死了。事后我到现场，看见他家十几岁的小女孩死后手还捂着睛睛，可见，是在恐惧状态中被日军枪杀的。老朱家12口人死得更惨，老人被挑死在炕上，女人抱着孩子被挑死在炕下，男人被挑死在门前，一家12口横躺竖卧在血泊之中。康希久一家7口人，躲进猪圈，也未能逃脱敌人的魔掌，全部被枪杀。梁俊峰一家12口人，也都被日军用刀挑死在屋里，两个20来岁的大姑娘，被他们祸害后也被枪杀。余永录一家躲在萝卜窖里，敌人发现后，用机枪都给突突（扫射）死了。其余人家，除了不在家的没遭到杀害外，没有一人幸免。

日军撤走的第二天，我们回去收尸，当时看到遍地是死尸，到处是血腥，尸首能认出的就单埋了，认不出的就一起埋掉。

那时人死得太多了，究竟谁死了、谁伤了是说不清的，但能在敌人屠刀上活过来的人，据我知道有4个，一个是老徐头，嘴巴被子弹从左边穿到右边，算是幸存者；另一个是王贞，他的大腿被打个眼子，当时昏死在血泊中，日军走后，他醒过来逃到河南高家街；再就是老金家娘俩，在炮轰时，她们躲在一条土墙下，尘土把娘俩身上盖了一层，没被日军发现，算是拣了两条性命。

当时的九里六，分上九里六（现在的八浪乡九里六屯）、下九里六（现在的阎家乡老街基南二里多的地方）。下九里六东西长3华里、南北宽2华里。二百多户人家，好几条大街。正街两

旁有油坊、粉坊、杂货铺、成衣铺、饭店、皮铺、大车店、磨房、铁匠炉等工商行业门市。日军对九里六的血洗，据当地老户提供的情况和县志记载，被杀群众600多人，全家灭绝的近一半。烧毁房屋700多间，死伤牲畜一百多头（匹），毁掉粮食20多万斤。

偌大的集市，一夜之间变成了废墟。

对老张乡屯的烧杀

张洪仁口述

1932年日军侵占我家乡（土龙山五保老张乡屯）的时候，我家是拥有100多垧地、41口人的大户。

1934年旧历腊月的一天，抗日军"明山队"队长祁宝堂率部在大洼与日本开拓团吉田带领的守备队打了一仗。下午两点多钟，"明山队"退到老张乡屯（现在的五道岗乡兴中村），屯里早已关门闭户。我父亲见是抗日队伍，忙将他们让进院里，还给他们准备了饭。正在吃饭时，日军的6辆汽车追上来了，"明山队"在队长指挥下，又与日军战斗到天黑，才砸开后墙撤走。日军砸开院门一看，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了，于是将37间房全用火点着。躲在屋里的张作喜19岁的瞎姑娘和两匹耕马被活活烧死，并烧毁粮食14万多斤。日军又到前屯把张万财的父亲、何老九和他的嫂子抓来都用刺刀捅死了。

三天后，这帮日本兵又来老张乡屯，看见老张家还剩一间西厢房没被烧完，又用火点着。找老张家的人没找着，到屯西头赵金家，把他家3个扛活的长工傅友、"帮赵"、小木子3人抓起来，问老张家的人跑到哪里去了，他们谁也不说，吉田说他们"统统是马胡子"！一刀一个全砍死了。

对爱国志士的残酷迫害

王金有　宋裕光　尚春岐口述

太平镇是伪满土龙山区的政府所在地，自土龙山农民武装暴动以后，日军除对这一地区进行疯狂报复外，在太平镇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除守备队外，还在镇上设立了警察署，在荣家、东袁家、肖正、金沙河等6村屯，都设立了警察分驻所。在盖家、孙财等5村屯，设立了警察分遣所。专门打探抗日部队情况，搜捕我爱国人士。

王金有说：当时我伯父王景全是中共金区（现在的金沙乡）书记，我八叔王景贵是抗日救国会会长，我父亲王景海是抗日救国军的连长，母亲王李氏是救国会的妇女主任。1937年（康德4年）旧历腊月上旬的一天，已是下午2点多钟，由特务王富领着太平镇守备队的几十个日本兵，乘一辆汽车进屯就将李家院套围住，把我伯父、父亲、八叔都抓走了。在太平镇押了一个多月，又把他们押送到依兰县宪兵队关了两个多月。后来把我伯父和父亲扔到依兰大江里去了，把我八叔押送到长春。祖国光复前，他病死在监狱里。

宋裕光说：1938年（康德5年）的秋天，从千镇（现在的桦南镇）来了守备队的几名日本兵，到金沙乡新立屯把孙来有、张殿文、艾××、吕××4个人抓到太平镇，硬说他们“通匪”。进行严刑拷打，他们啥也说不出来，一个日本人最后说：“他们统统的不是好人。”把他们4个人枪毙了。

尚春岐说：土龙山镇的四合村里，当时有两名抗联的联络员，一个叫王景阳，一个叫温继亮。1939年（康德6年）旧历七月下旬的一天，太平镇守备队的几名日本兵，由警察署一个

姓潘的特务领着，到四合村将他俩抓了起来，押到警察署，经过几次严刑拷打，没有从他俩口中捞到任何东西，就把他俩押送到长春。不久被日本人扔进狗圈让狗吃了。

洗劫韩国文院套

马龙江

1934年3月11日的下午，听说一支日本骑兵队已开往孟家岗，要和那里开拓团的守备队来血洗土龙山。于是我们这一带的那小店（现在的八虎力车站）、张麻花、桑殿荣、双汉屯、火烧沟、马青山、刘海楼等十几个村屯的乡亲们，连夜套上大车，往北半截河子（现在的曙光农场二分场朝阳屯）一带跑。当晚，大部分人集居在韩国文院套。韩国文当时是依兰县土龙山区六保六甲甲长。院子里都是用炕席搭成棚的大车，有的还在棚里生了炭火盆，院里院外停了50多辆车。

3月12日是旧历的正月二十五，快到二月二了，这些逃难户，还想在难中过个龙头节，讨个吉利。家家都利用屋内屋外所有的锅灶，轮班蒸干粮、煮饺子。刚过晌午，日本兵来了，前面是3辆大汽车，满载兵员和枪炮，后面是马队。手无寸铁的逃难人们惊慌失措，煮好的饺子也顾不上吃了，有的忙着套车逃跑，整个大院顿时人喊马叫乱成一团。韩国文看此情形忙对大家说："大家不要慌，我这院套的4个炮台里，有快枪、洋炮、母猪炮等十多棵，鬼子来到跟前还能抵挡一阵子，一时半会儿是进不来的。"说罢，就拿起大枪上了东南炮台。那时我在东北炮台里，眼见日军的汽车越来越近，只离里把地时，炮台里的小伙子们沉不住气了，洋炮、抬杆子"呼通！呼通！"一齐向日本人开了火。怎奈距离太远，没有打中，但日本人也不敢再往前

进。他们停下汽车，从车上抬下机关枪，对着逃难的大车扫射起来。这时，几十辆大小不等的马车，长蛇似地从韩国文门前大道向西奔逃，跑在前头的不知是谁家马车的辕马“打压子”，道路堵住了，所有车辆都堵在横垄地里。这一来，日本人的机关枪更得把了，“哒哒哒哒”爆豆似地响着，马被击中倒下了，车上的人在一声声惨叫中也都倒了下去。只见韩国文的弟弟骑上一匹快马，朝西面王乃花屯跑去，去求驻在那里的大排队赶来救援。东南和西南两个炮台里有快枪，他们还不错，一气撂倒了十来个日本兵。突然，一发炮弹落在东南炮台顶上，炮台炸塌了，人守不住了。韩国文从炮台里撤出来往西北跑去。这时，我看到南边离炮台较远的地方，有两个便衣特务领着两个日本人指着韩国文说些什么，只见一个日本兵跪在地上端枪瞄准，“啪！”一声枪响，韩国文才跑一里多地，就一头栽倒在高粱川上（地里的高粱秸，那时还没拉回去）。住在院外的老左家3口人，除一个小子逃出去了，其余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这时，日军从望远镜里看见王乃花屯方向来了大排队，才匆匆撤走。

这次韩国文院套遭日军洗劫，不到半小时，从韩国文门前到西沟子，这六里地的大道上，死尸横躺竖卧，遍地是血，有的老太太和儿媳妇死在一起，有不懂事的小孩，还趴在死去妈妈的怀里找奶吃，只剩一口气的人，还在呻吟。这次惨遭日军杀害的无辜同胞有60余户的216人。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海兰江大血案

海兰江血案

李宪虎

1931年10月至1932年12月，在近一年多的时间里，日伪军警对延吉县海兰区以花莲里为中心，进行了大小94次讨伐，杀害共产党员、抗日群众达1700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江大血案”。

花莲里，三面环山，峰峦迭起，一条小河由西向东，曲折地流过三十多里长的谷地，是联结延吉、龙井、图们等地的交通要道，是反日斗争的前哨阵地。中共海兰区委机关就设在这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海兰区委领导全区的革命群众开始了清除汉奸走狗、斗争恶霸地主和夺取枪支的斗争，并组织游击队，有力地打击了附近的敌伪势力，开辟了海兰游击区。这样，花莲里就成了日伪军统治的“心腹之患”。敌人叫嚷：“翻花莲里的天，覆花莲里的地”、“打死100个朝鲜人，其中至少有1个共产党。”日寇暗地唆使崔南顺、朴熙善、金东厚等汉奸、走狗，答应他们杀一个共产党员给7元奖，杀一个干部

给15元奖，活捉一个就多发给1支枪。于是1931年10月15日，以日寇的忠实走狗崔南顺、朴熙善、金东厚等人为骨干的自卫团，在日本领事馆的指使和日伪军警的配合下，对海兰游击区发动了突然袭击。这股敌人在不到6天的时间里，杀害了金明浩、金学善、朴得男等27名抗日干部和无辜群众。残暴的敌人用刺刀刺死了7岁儿童金石松，用火烧死金学善怀孕的妻子和他的3个兄妹，以及金泰极等15人。

1932年7月中旬，游击队的干部在柳亭村李三达家开会，决定夺取驻鸡林村的铁路护路队的枪支。在他们讨论具体行动日期时，县委组织部长白昌宪却以准备工作不充分为理由，把行动日期硬是推迟到阴历八月初，原来白昌宪已叛变投敌。他一面拖延行动日期，一面把区委和抗日游击队夺取武器的计划密告敌人。日寇接到密告后，紧急动员守备队和以汉奸走狗李振宇为首的自卫团70多人的“讨伐队”，于阴历八月七日凌晨，架上四五门追击炮和重机枪，包围了只有10余户人家的柳亭村，发动了突然袭击。我游击队虽然奋力抵抗，但由于敌众我寡，日寇讨伐队还是闯进了柳亭村。日本鬼子挨家挨户放火搜杀，无论男女老少一个也不放过，顿时使柳亭村变成了废墟。在这次惨案中从火海里撤出的只有张时雨等30多游击队员和村里的几位老人。中共海兰区委的李相根、张相淳、金正奎、吴用默等22名游击队员和30多名群众惨遭杀害。这就是震惊全东满的“八·七惨案”。同年农历十二月十二日，延吉日本守备队和警察、自卫团组成混合讨伐队向花莲里发动进剿。敌人用最残忍的手段，杀戮了成百的革命同志和群众。残暴的敌人把患伤寒病躲在地洞里的5名革命同志逮捕，放在柴垛上活活烧死。日寇或把人劈死抛进火堆里，或把人剁成几块，扔进开水锅里，甚至把人绑在碾子杆上，用刺刀刺入喉部，或者抠出眼

睛，然后用棍子打死。敌人把游击队员俞一男用碾子活活轧死，接着砍死他的弟弟，杀死他4岁的儿子和妻子，活埋了几十名抗日同志。这群野兽抓住我一名朝鲜族女游击队员，对她调戏、侮辱。可是她坚贞不屈，毅然投井自尽，表现出她宁死不可侮的革命气节。

任何武力镇压也永远扑不灭革命的火种，不久，海兰区游击队转移到王隅沟游击根据地，编入到延吉县游击大队。金顺德任中队长，南昌益任政治指导员，开始了新的战斗。

（摘自《吉林党史资料》1987年第四辑）

海兰江大血案

金仁哲

1931年10月至1933年12月，日本军警及自卫团对延吉县海兰区花莲里一带，进行大小94次“讨伐”，屠杀朝鲜族革命者和无辜群众1 700余人的血腥惨案。花莲里距延吉市东35里，位于海兰江下游20余里狭谷，北端即为布尔哈通河合流处。这里曾有水砧洞、柳亭村、学校村、上仲介洞、下仲介洞、北花莲里、南花莲里、上村、中村、卢家屯、上獾勒村、下獾勒屯等12个自然村和200多户朝鲜族人家。1931年10月初成立的中共海兰区委，把区委机关设在花莲里柳亭村，并发动全区人民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清除汉奸走狗和夺取枪支的斗争。同时，组建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开辟了海兰抗日游击区。花莲里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心腹之患”。敌人曾叫嚷：“翻花莲里的天，覆花莲里的地”，“杀死100个朝鲜人，就定有

一两个共产党”。龙井日本总领事馆头目纠集大批日本军警和自卫团，向以花莲里为中心的海兰游击区发动了疯狂“讨伐”。同年10月30日，河东、小营子、五岩洞的自卫团配合龙井日本总领事馆警察和保安队，突然袭击花莲里。残暴的敌人用刺刀刺死7岁的儿童金石松，用火烧死怀孕的金学善之妻和他的3个兄妹，杀害了金明浩、金学善、朴得男等共27名抗日干部和无辜群众。日本总领事馆为表彰自卫团的“功劳”，赏给10余支步枪。1932年5月3日（农历三月二十八日），日本守备队50多人，突袭南花莲里、中村、学校村和柳亭村，烧杀掠夺，无恶不作。南花莲里的金龙洙、中村的金道济、柳亭村的李东根、学校村的金某，以及通往石建坪的路上行人，共18人被残杀。1932年9月6日（农历八月六日），中共海兰区委负责人和抗日游击队干部多人在柳亭村李三达家开会，讨论夺取驻鸡林村铁路护路队枪支一事，会后，60余名干部和游击队员分住李三达等3户人家过夜。不料，敌人接到叛变投敌的原延吉县委组织部长白昌宪告密，即派小盘岭日军守备队、河南站守备队和河东、小营子自卫团共70多人，7日凌晨3时团团围住了只有10户人家的柳亭村，用3挺机枪和1门迫击炮突然开火，发动了袭击。当人们被猛烈的枪炮声惊醒时，已有不少人中弹牺牲。区委干部和游击队员们虽奋力抵抗，因寡不敌众，不少人未能突围。敌人闯进村里，见房就烧，见人就杀。牺牲者有海兰区委书记李相根、组织委员张相淳、宣传委员金正奎、海兰区游击小队队长金麻子、开区游击队队长柳基龙，游击队员28名，村民20名，共53人，仅李三达一家就有11人遇难。这就是震惊东满地区的“八·七惨案”。11月16日，日军守备队和河东、小营子自卫团再次袭击花莲里。在山岗上放哨的金尚益，被敌人围住了。他掏出手榴弹，拉响导火索，冲进敌群，与敌同归于尽。正患伤

寒病的金某等3位革命者，躲进地洞里也不幸被捕。残忍的敌人将他们3人放在柴禾堆上活活烧死。同年农历十二月十二日，延吉日军守备队、警察和自卫团组成混合“讨伐队”，又闯进花莲里。正在这里进行革命活动的金贵松、朴元石、俞一男、金雇农、金奎植等人，不幸被捕。敌人将金贵松用刺刀刺死后，扔进火堆里；将朴元石割下四肢扔进沸腾的开水锅里；将金奎植剜去眼睛后乱棒打死；将金雇农绑在磨盘上用刀刺脖子慢慢折磨死；将俞一男的脖子上捅一刀后，又将他搁在磨盘上碾死。他的弟弟被砍死，4岁的儿子被刺死，妻子被扒光衣服，受尽凌辱后，拖到山沟里弄死。接着，敌人活埋了几十名抗日干部和群众。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就是这样制造了一起起血淋淋的惨案。海兰江水被烈士们的鲜血染红，花莲里的许多村庄化为灰烬，成了荒芜人烟的废墟。然而，敌人的野蛮暴行并没有吓倒这里的革命群众。后来，他们转移到依兰区王隅沟，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继续坚持了抗日斗争。

1946年10月，召开一万多群众参加的“海兰江大血案清算大会”，揪出18名主犯交付审判，崔南顺等7名首恶分子当即处决，其余罪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终于清算了十多年的血债。

潘家峪大惨案

丰润潘家峪大惨案

河北省政协文史办

在河北省东部燕山山脉的腰带山东麓，离丰润县城60里的地方，有一座美丽的村庄叫潘家峪。这里群山环抱，溪水长流，广阔的平地五谷丰登，四周的山坡果树葱葱。20世纪30年代，这个村庄有220户人家，1700多口勤劳的人民在这里安居乐业。自从日本侵略军侵入中国以后，这里的人民基于爱国热情和对侵略者的无比愤恨，不少人加入了抗日斗争的队伍。特别是1938年著名的冀东抗日大暴动，吸引了潘家峪不少青壮年参加。这里的群众曾为暴动捐粮、献款；妇女们曾为抗日军民做衣、做鞋。潘家峪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搞得有声有色。抗日暴动队伍撤走以后，潘家峪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坚持分散隐蔽的斗争。潘家峪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堡垒村，是当时冀东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丰（润）、滦（县）、迁（安）联合抗日民主政权的主要活动基地，经常给予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由于这里的人民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万恶的日本侵略者对潘家峪人民恨之入骨，必欲灭之而

后快。但是日伪军的多次围攻计划都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粉碎了，于是日本侵略者策划了一个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阴谋。

1941年1月24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日军驻伪丰润县政府顾问佐佐木二郎召集丰润县日伪有关人员会议，在会上传达了上级关于“扫荡”潘家峪的命令，具体部署了围剿潘家峪的计划。据参加会议的伪丰润县长凌亮丞供称，佐佐木在会上要求丰润县警备队配备充分的兵力以供调派，并说上级也命令了遵化、玉田等县预备相当的兵力届时同时出发，要把潘家峪团团围住，不让村里有一个人跑掉。如果有逃走的，要立即开枪射击。会议还对日伪军的交通、伙食等问题做了具体安排。

1941年1月25日，这一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八，正是中国旧历年除夕的前一天。拂晓前，当人们还在梦乡的时候，从丰润、遵化、玉田、迁安、滦县、唐山等地来的日伪军，已经从四面八方把潘家峪团团围住。天刚亮，日伪军就挨门挨户搜查，强迫人们都到村西冰封的大坑听“太君”训话。潘凤柱的老母已经78岁了，年老有病，不能动弹，当场就被日军枪杀在家里。其他去不了的一些老人，也都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了。

全村1000多人扶老携幼，被赶进了西大坑。大坑附近的胡同、路口，都架上了机枪。大坑的四周，站满了端着刺刀的日本兵。日本军官先讲了一通“中日亲善”、“王道乐土”之类的话，然后就逼问谁是八路军？粮食藏在哪里？结果没有一个人吭声。

这时，敌人正在策划着一个更凶残的阴谋。

在大坑的东南坎上，有一所四四方方的大院。这是村民潘惠林家的院子，有二三亩大，四周有一丈多高的院墙。日本兵和特务们发现了这个大院，就报告了日本顾问佐佐木二郎。按照佐佐木的指挥，日伪军在院子里铺满了松枝、柴草。门口摆

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架上一挺机枪。四周墙上、屋顶上，全站满了日本兵，他们都凶狠狠地端着刺刀。一个杀人场布置好了。

上午10点钟左右，村民们在日本兵刺刀的威逼下，被赶进了潘家大院。

人们被赶进院子后，一个日本军官站在凳子上叫嚷了一通，翻译说："皇军说了，你们这里老百姓统统地通八路，今天统统地死啦！"说完大门就被关上了。人们一看敌人杀气腾腾的样子，知道事情不好，将要大难临头，于是开始骚动，有10多个青年人从人群中挤出来，想冲出大门。他们还没到院门口，就被把守在那里的日本兵用刺刀刺死了。院里愤怒的人们大骂日军惨无人道。这时日军的机枪响了，手榴弹也在人群中爆炸了。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立刻拥向后门，想从那里冲出去。日军的机枪凶恶地朝拥向后门的群众射击，霎时，门口就倒下了一片尸体。突然，从人群中跳出一个人来，他不顾周身烟火，冲到一个端着机枪的日本兵跟前，踢倒日军，夺过机枪。就在这一瞬间，有些人冲出了门口。可惜这位夺枪的英雄不会使用机枪只能用枪托朝日军砸去。一群日本兵围上来，朝他身上一阵乱刺，这位英雄倒在血泊中。他的名字叫潘国生。

这时，大院周围的步枪、机枪一齐向人群猛射，尸体把后门都堵塞了。人们一看这里冲不出去了，又转身奔向大院的东北墙角。

人们正在大院里东冲西突的时候，日军又把一捆捆点着火的玉米秸扔进大院，很快引燃了院内的松枝干柴，一时浓烟四起，大火冲天。刺刀、枪弹和烈火，无情地吞噬着人们的生命，手无寸铁的群众英勇地反抗着，在绝望中寻找着生路。潘树密的妈妈正掩护着一群妇女向院子东面一个地方躲避，她见日军扔过来的一颗手榴弹正冒着黄烟，就猛地推开身旁的妇女，抓

起冒烟的手榴弹向日军扔去。潘国林等十多人冲到东院，冒着密集的枪弹，拆开用砖已经堵死的东院北门冲出大院。他们刚跨进过道对面一家人的门槛，端着刺刀的日本兵追过来，人们急忙关门，日军的刺刀一下刺进了铁皮门扇。因为刺刀一时拔不出来，这几个人才逃脱了。潘辅庭等20多人冲进了东北角的仓房里，因为仓房是泥顶，窗口又用土坯堵着，没有被烧着。他们进去后，用一个石碾堵上门，然后每人拣起一个家什，准备同日军拼个死活。因为院内烟火过大，日军没发现他们，20几人才算保住了性命。潘善佑的小儿子刚10来岁，他从大火里冲到西院，想从这里逃走。他被大人们拉上猪圈棚顶以后，看到被大火吞噬的亲人，就跺着脚大骂日军，结果被抓住残杀了。

有50多名乡亲，为了躲避日军的枪弹，挤进了潘家的牲口棚里。大火把牲口棚烧塌了屋顶，人们被压埋在里边，全部遇难。潘成的老母已70多岁，她被抓去给日军做饭，饭做熟后，日军用战刀把老人的脑袋一劈两半，又点火焚烧尸体，还把老人7岁的小孙女，也扔进火堆中。

日本侵略者为了把潘家峪人民斩尽杀绝，大火过后，还从尸堆中搜索尚未死去的人。发现奄奄一息的人，就补上几枪，有的还用手榴弹炸，炸得血肉横飞。

大火从上午一直烧到下午，日军的枪声从早晨一直响到黄昏。天快黑时，侵略者们带着屠杀的快乐和掠夺的东西，滚回了巢穴，然而给潘家峪却留下了一片焦土和哀声。街头、道边，到处是尸体和血迹。潘家大院更是令人惨不忍睹，靠大门口的地方，有大堆尸体，那是被日军用机枪射死的；小屋门前的一堆尸体是人们冲向小屋避难时，被日军用刺刀挑死的；院南面有3个大石槽，旁边横躺着4具孕妇尸体，腹内已成形的胎儿，都被日军用刺刀挑出腹外；在东墙根下，有40多具10来岁的小

孩尸体，他们一个个脑碎骨裂，墙上还粘有斑斑的脑浆和稚发，这是日军把幼儿摔死在墙上的罪证；在南山坡上，还有32具尸体，这是住在山坡上没下来的人，被日军用刺刀挑下山崖的。

惨案发生后，当时有一名记者赶到现场，对日本侵略军的法西斯暴行进行了实地调查。他在《惨杀现场视察记》中记下了下面的场景：

“特别惊心触目引我注意的是，宅门右手石槽上一女尸，她赤身裸体，有半个脑袋被炸得血脑殷红……她的肚腹若不是被火烧得崩裂，那一定是遭鬼子以刺刀划开，灰色的肠子翻露出来，将要到月的胎儿两只小手抱着小头，横在母亲的肚肠上。

最使我愤痛的是老人、妇女、儿童的惨死。这些弱者的尸体，也触目皆是。单就大院来说，孩子们小小的尸肢不是一两个，也不是百十个，在尸场中就很难以将孩子的尸首数清楚。那些弯曲污黑的小手，焦黑模糊的小头，焦炭似的小腿、小棉鞋，在大院里几乎随处可见……一个被烧得身首异处的孩子，据来认尸的人说只有4岁。

暴露在白薯窖边的女尸，据一个青年农民告诉我，这些都是些年青貌俊的女子，有闺女，也有媳妇。鬼子把全庄的人圈在西大坑以后，说让她们去做饭，硬把她们推下白薯窖。以后只听到白薯窖里的怒骂、嚷叫、哭喊。不一会儿女人的声音慢慢低哑了，又歇一会儿，突然一声女人的惨叫，就没声音了。这时才看见鬼子爬出窖来，点燃几捆玉米秸往窖里扔。

我们所看到的大约30多个女尸都是如此：赤身裸体，身上没有一块布片，暴露在人们面前。死者的惨死过程是先遭鬼子奸污，再是戳死，最后是遭火焚烧。死者的下身最惨：鬼子奸污了她们又以刺刀挑破她们的下身，肚肠拖出，头发、上身、脸上沾满血污。

惨死的母亲还抱着哺乳的婴尸。从许多位母亲的尸体旁也躺着死孩子的情形看起来，母亲总想保住可怜的小生命，以自己的身子挡护着孩子，母亲死了，羔羊似的婴儿也死在鬼子的血手里。”

这次大惨案，潘家峪有1 237名平民惨遭杀害，一千一百多间房屋被烧毁，全村有31户被杀绝，所有的财物被抢掠一空。

（摘自《河北文史资料》）

潘家戴庄惨案

潘家戴庄千人坑

田益廷　刘作云　王树增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9日上午8点30分在沈阳市开庭审判8名日本战争罪犯。日本陆军第一一七师团长铃木启久在法庭上供认："1942年十月二十八日（农历），为推行'三光政策'，我下令所属第一联队骑兵队彻底'肃正'潘家戴庄，集体屠杀千余和平居民，烧毁民房一千余间，把财物抢劫一空……""我杀害中国人民的手段是残忍的，毫无人性的，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忘记的，我诚恳地接受中国政府对我的正义判决……"

潘家戴庄现属河北省滦南县，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冀东八路军北宁路南（下简称路南）游击区中的一个拥有371户、1765口人的大村。北距张各庄8公里，南距倴城8公里，是倴（城）、张（各庄）公路的必经之处。1942年12月5日（农历十月二十八日），驻张各庄、司各庄的日伪军250余人，在日本骑兵队长铃木信指挥下，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潘家戴庄“千人坑”大惨案。屠杀我同胞1 128人，烧毁民房1 030间，财物被抢劫一空，美丽富饶的村庄变成了一片焦土。杀人现场惨不忍睹：30户被杀绝，31户只剩下孤儿寡母。惨案至今虽已过去40多年，但对日本侵略者欠下中国人民的这笔血债，人们是刻骨铭心，永志不忘的！

一

1942年10月，日本侵略者在冀东推行所谓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并规定自12月2日至8日期间，配合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活动，使本次“治安强化运动”达到最高潮。

日寇先是以北为重点，沿长城各县制造“无人区”，驱赶路南地区16岁至60岁的男人去路北挖沟筑垒。尔后，在路南挖“遮断壕”，搞“清水摸鱼”。日寇伪军驾着大板车大肆抓捕男性青壮年去做劳工，违者枪决、刀砍或被就地活埋。对于没有“良民证”的外乡客商、走亲访友和赶集上店的农民，则视为“通共”、“通八路”分子，枪挑、刀砍于“杀人坑”并下令不准收尸，收尸者也以通共治罪。

为了配合路南地区群众的抗日活动，八路军迁（安）滦（县）卢（龙）县基干队大队长张鹤鸣率二连、新三连和地方游击队一部，挺进路南，经常活动于唐官营、川林和潘家戴庄一带，寻隙打击敌人。12月4日下午4点时分，当我部队由唐官营

——潘家戴庄——向程庄转移时，日寇派出一个骑毛驴的密探，尾随在我部队的后边，探清我部队的人员、装备后，从潘家戴庄踅回张各庄据点。晚饭前我部队刚到程庄，准备在该村宿营，伪保长程殿栋同伪办事员程为平、徐俊3人溜进倴城据点，将程庄驻有八路军的情报呈递给倴城伪警察分局长王星寿。王星寿这个汉奸，为献媚请赏，马上通电他的主子——驻张各庄日本骑兵队队长铃木信。在此之前，负责在冀东执行五次治强的日军第二十七步兵团少将兵团长铃木启久（他后升为第一一七师团中将师团长），曾指令所属第一联队骑兵队“迅来对该村（指八路军活动的村庄）进行‘剔抉’，彻底消灭该地的祸根”。所以，铃木信得知王星寿和密探的情报后，如获至宝。当夜就调集张各庄、司各庄两处日寇、特务、伪警备队250余人，深夜12点出发，在柱王庄会合后，直扑程庄去执行“剔抉”计划。

迁滦卢基干队在得知程庄伪保长程殿栋逃跑的消息后，即刻撤离该村，午夜12点，从店子村迂回到潘家戴庄。天将拂晓，从村西传来了稀疏的马蹄声，隐隐约约的人影也凝眸可见。我隐蔽在村西高坟、岭地上的哨兵，断定是敌人摸上来了，即刻朝敌人射出一阵排子枪。走在前面的两个鬼子尖兵，应着枪声栽下马来，一个当即毙命，一个捂着中弹伤口嚎叫不止。一心想到程庄围歼“土八路”、稳操胜券的铃木信，万万没有想到会在潘家戴庄挨打，他不知所措，慌忙拨马败逃。特务和伪警备队也有如丧家之犬，尾随其主子掉头西窜；失魂落魄的鬼子、特务逃至皂户村，按兵未动，伺机反扑；被吓得胆战心惊的伪警备队，趴在潘家戴庄村西的沙岗下边，等待“皇军”命令。

我初战获胜的迁滦卢基干队，为保存实力，决定暂时避开敌人的锋芒，迅速转移。部队行动前，怕老百姓身遭不测，动员他们一同转移。村东头的几家群众随着转移出去了，但多数

群众未及转走。他们哪里知道一场浩劫就要降到他们的头上！

二

12月5日天亮后，鬼子派出的密探回报："八路已经跑了。"铃木信惊魂稍定，转而声嘶力竭地喝令部下，重新整队，杀回潘家戴庄。把村庄包围后，鬼子、特务们端枪、持棒，挨门挨户喝令男女老少，统统到村东南角的大场里听"皇军"讲说。慢者棍棒打，违者杀头！少数群众早饭刚进半餐，多数群众还在空腹饿肚，就被豺狼野兽赶出家门。全村老老少少，不管盲人、残废还是病人都被驱赶到"会场"，所谓会场就是杀人场。东、北两面的房子上站满了端着刺刀的伪警备队，场南的围墙上和路口中间，还架着几挺机枪，鬼子和特务头目们，齐聚"会场"中央，他们是：

铃木信（日本驻张各庄骑兵队长）、郭成信（日本骑兵队翻译官）、张占鳌（张各庄伪清乡办事处主任）、间岛（日本驻伪清乡办事处顾问）、安田（日本驻张各庄骑兵小队长）、曾广昭（伪清乡自卫队队长）、牛田（日本驻张各庄骑兵小队长）、程凌阁（驻司各庄的伪警备队小队长）、杨××（驻司各庄日本骑兵队翻译）。

铃木信面对群众虎视眈眈，阵阵狂笑；特务爪牙横眉立目，提着棍棒，端着步枪，围着群众荡来荡去。场上的百姓们预感到一场大祸就要临头。

9点时分，心狠手毒的鬼子、特务，从人群中第一个抓出了教师马文焕，厉声问道："八路的有多少？都往哪里去了？"马文焕刚说出"不知道！"一群特务蜂拥而上，朝他一阵乱棒，打得他遍体鳞伤，鲜血淋漓。最后，一个特务对准马文焕的脑袋狠狠一棒，立刻殷红的血浆从耳朵里喷了出来，惨死在血泊中。

几个鬼子、特务盯着喷血的耳朵，跺脚狂笑。接着，一个特务又从人群中拽出齐盘成，先用凶狠的目光扫视一遍人群，然后回过头来，大声喝道："要不说出八路军的下落，同样下场!"未等齐盘成回话，就被打死在地上。此刻，一个鬼子又从人群中拉出青年李庆发，随后扒走他的棉袄，另外4个鬼子端着刺刀，对着他的前胸后背，连声逼问："八路军的哪里去了?"李庆发回答"不知道!"鬼子再次逼问，李庆发还是回答"不知道!"这时，豺狼成性的日本强盗，一刺刀扎在李庆发的肚子上，热血喷了一地，肠子流出肚外，惨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之下。潘思田，因躲避鬼子藏在自家的幔子上，被特务发觉后，赶进杀人场。他刚走进人群，就被鬼子、特务抓出来，先是一阵乱棒，后又扎了他一刺刀。潘死后1小时，鬼子特务又杀了他的母亲，活埋了他的妻子、妹妹，摔死了他那刚满4岁的儿子。时近中午，鬼子、特务按照铃木信的指令，窜入人群，一起抓出了李忠海、潘思和、戴运成、戈振久等19名群众，他们都先后惨死在刀枪棍棒之下：有的七窍出血，有的脑浆四溢，有的被砍掉头颅。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泄露八路军的机密和领导者的姓名。

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特务，一看问不出八路军的去向，便从人群中挑选出二十多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用枪逼着他们将地主潘俊章的场北挡车霸道的老沟，加深加宽，挖成了一条长10丈，宽7丈，深6尺的大坑。大坑挖好后，鬼子、特务从挖坑人手中夺过锹、镐，驱赶群众进坑。群众面对死亡，挣扎外闯。敌人手持刀枪、棍棒，开始了血腥大屠杀。在人群里棒起刀落、锹镐乱舞，善良的百姓成片成片地倒下去。万恶的鬼子、特务，把打死打伤的人们，扯着双腿扔进大坑，然后纵火焚烧。周树全誓死不进杀人坑，被鬼子一镐刨死在坑沿上。戴昌田被鬼子推进坑里后，他奋力争着往外爬，又被鬼子一镐砸碎了脑袋。周

树清刚从坑里爬出，又被两个特务扔进火堆。周树恩被敌人打掉胛子，左腿上挨了一刺刀，数小时后，活过来了，他忍着剧痛，从死人堆里爬了起来，逃出了虎口。

时过正午，敌人用过午饭，又把杀人魔爪扑向妇女。开始，敌人用刺刀、棍棒、锹镐驱赶妇女进坑。特务汤兴辉等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们，嫌妇女进坑太慢，他们就用绳子拉、扁担赶。大坑里堆满了死人和活人。鬼子、特务逼着挖坑的人又挖了一个长20丈，宽1.5丈，深1丈多的大方坑。齐安居的妻子，从坑里往外爬，一个鬼子朝她狠狠就是一刺刀，刀尖透过前胸，躺在了血泊中。她的两个女孩子，一个叫菊勾，一个叫白勾，见到妈妈被敌人扎死了，趴在母亲身上放声大哭，万恶的日寇又用刺刀把两个孩子挑进坑中。周树昌的妻子正顺着坑沿往上爬，被鬼子一刺刀挑开肚子，立刻肠胃落地，胎婴流出。

在大肆屠杀妇女之前，鬼子、特务轮奸了年轻的妇女之后，将她们拖回杀人场，枪挑、活埋了。

孩子的妈妈们，只知道自己的惨死，哪里知道她们的亲生骨肉比自己死得更惨！这些丧尽天良的强盗们，把嗷嗷待哺的孩子们抓起来就往大坑里扔，或顺手一刀砍掉脑袋，或一脚踢进火坑。特务张占鳌是个杀人成性的刽子手。他凶狠地拎着孩子们的小腿往碌碡上摔，被摔得脑浆四溅，血肉横飞。一群特务也学着他的招术杀人，30多名天真活泼的幼童被活活摔死在碌碡上。

这群吃人的豺狼，一心要把潘家戴庄斩尽杀绝，最后把30多名挖坑的青年枪挑、锹铲于杀人坑。

血洗之后，250多名鬼子、特务从杀人场窜回村里，他们先砸门落锁，翻箱倒柜，抢劫财物，后纵火烧房。顿时，火光冲天，浓烟蔽日。熊熊大火一直燃烧了3天3夜。第二天正遇西北

大风，柴草木灰随风飘出三十多里。潘家戴庄变成一片焦土。

日寇血洗、凶杀潘家戴庄的野蛮暴行，很快传遍铁路以南各地。各村群众遥望着大火，焦虑不安，愤恨不已；与潘家戴庄有亲属关系的人们，无不牵肠挂肚，甚至失声痛哭；虎口余生的人们，特别是趁给敌人抱草，而逃出杀人场的学生们，虽得到乡亲们的热情照料，但因思念亲人，而终日哭泣不止。被日寇征去路北（杏山、干河草和长城一线）挖战沟、服劳役的150多名青壮年，听到自己的家乡被烧、亲人被杀，心急如焚，他们扔掉锹镐，闯过敌人的数道哨卡，甩掉敌人的追击，星夜跑回潘家戴庄。去他乡走访亲友的潘恩普老大爷回村后，一见全家（9口）亲人被杀，房子被烧，立刻昏倒在地。他想亲人想疯了，一连几昼夜不离杀人场，呼天唤地，哭儿叫女。后来，他疯癫愈甚，离开人世。

在抗日政府的关怀、组织、发动下，活下来的潘家戴庄人，三四天后陆续回村，附近村庄的群众和亲友也都先后赶来。第五天头上开始收殓亲人尸体。众亲人一进杀人场，悲痛欲绝，声泪俱下，哭声震天，十里以外，怆然可闻。

人们滚动着泪水，从坑里往外挖亲人，可是大坑里被烧杀的尸体已经腐烂发臭，血肉模糊，尸骨凌乱，缺脚断臂，手足成灰，额烂头焦。孩子们的小小身躯，已经蜷缩一团。被埋在大坑最上层的人们，已被野犬撕得残缺不全。"千人坑"里惨状奇凄。齐广礼被烧得全身焦黑，腿已成灰。戴文秀的闺女，是被鬼子头朝下活埋的，双脚烧焦，眼和舌头全被挤压出来。六十多名孕妇肚子被烧崩，或被压开，胎婴流出体外。

抠尸的人尽管小心慎重，但是，拉胳膊，胳膊断；拽腿，腿掉下来。无奈，用绳子拴在死者腰上往上拽，把抠出来的尸体摆了一场。亲属们凭带血的"良民证"、领袖不全的衣着或生理

特征来辨认亲人。最后，有200多具尸体，实在无法辨认，只好合葬于一个肉丘坟。

三

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我迁滦卢联合县三总区区长蔡永为、助理吴兴洲、白虹（陈风）赶到潘家戴庄，观察了惨案现场，并向殉难同胞肃穆默哀，告慰惨死的父老姐妹们，我们一定向敌人讨还这笔血债！为死难的同胞报仇！

在十几天以后的一个夜间，蔡永为、吴兴洲、白虹和染各庄小学教员潘化民（潘家戴庄人）等一行6人，又来到潘家戴庄，在一间教室里召开了幸免于难的群众会。蔡永为让潘化民宣读了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同志亲笔写给潘家戴庄人民的慰问信，信中写道：

……听到潘家戴庄人民惨遭日寇杀害，心里万分悲痛。日寇的暴行，极为令人发指，活着的潘家戴庄人民，要有骨气，不要因此而倒下去。要效仿路北地区的潘家峪人民，组织起复仇团，为惨遭杀害的同胞报仇。全冀东的八路军做你们的后盾。今派人送去步枪6支，手枪1支，武装起来，向敌人讨还血债！

不久，我冀东抗日政府先后2次给潘家戴庄送来了2车玉米、3车种子、12头骡马和大批土布等物，以支援惨案后人民的生产、生活。鼓励他们要团结一致，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打击日寇，重建家园。

日寇集体屠杀潘家戴庄居民的根本目的，在于镇压铁路沿线人民，顺利推行其"沟壕堡垒"政策，扑灭抗日烽火，确保北宁铁路的安全。但却适得其反。用战犯铃木启久的话说，"由于潘家戴庄事件，附近一带居民尽向他方避难，所以骑兵队负责修筑的壕沟，连三分之一都没有完成。……不但壕沟没有完

成，而且‘最平稳’的‘治安区’的铁路以南地区有数百名八路军出现，并逼近北宁铁路线。”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潘家戴庄人，并没有被日寇的野蛮屠杀吓倒，他们怀着满腔怒火，庄严宣誓：“誓死为亲人报仇，向敌人讨还血债，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惨案发生后的一个月，即1943年1月，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组织起“复仇团”，小顺更名“齐心”，二义改名“报仇”。他们二人当天晚上同戴仲全一起报名，第一批参加了“复仇团”。从“复仇团”建立到日寇投降前，潘家戴庄又有30名青壮年参加了地方游击队和八路军路南地区主力部队——一区队，走上抗日第一线。

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给潘家戴庄人报仇，在惨案后月余，一区队调集第一、第二连，分别埋伏在崔新庄和北夏庄一带。早6点时分，司各庄据点之敌，大摇大摆地走进我埋伏圈。瞬间，机枪、步枪响成一片，杀声震天，敌人死的死、亡的亡。屠杀潘家戴庄人民的刽子手、怙恶不悛的汉奸杨翻译和日本探长都被我当场击毙。

我抗日政府为了给潘家戴庄人民报仇雪恨，惨案发生不久，就逮捕、处决了给日寇送情报的汉奸程殿栋。解放后，在镇反和肃反运动中，又把参与惨案暴行的特务、汉奸曾广昭、张占鳌、汤光辉、杨广洲、马荣钦、张殿臣、侯福喜等二十多名反革命分子逮捕归案。党和政府依据他们的罪恶，分别将他们判处了死刑、死缓和徒刑。

1956年6月，在沈阳公开审判铃木启久等8名日本战犯。当年潘家戴庄惨案中虎口余生的周树恩，应我国特别军事法庭的邀请出庭作证，控诉日寇暴行。当周树恩在法庭上敞开衣襟，露出块块伤疤时，这个当年不可一世的“皇军”师团长，吓得面如土色，跪下认罪。按照国际公法，铃木启久被我国特别军事

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消息传到潘家戴庄，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摘自《唐山文史资料》第四辑）

血债累累的张占鳌

杨海桥

编者按：本文所揭露的张占鳌是一个血债累累的汉奸特务。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残酷地推行“三光政策”时，他参与制造了河北省滦县潘家戴庄活埋无辜群众1 283人的大惨案，他作恶多端，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解放后张占鳌潜逃到黑龙江省龙江县，在“镇反”中漏网，在“肃反”中被查获归案，就地正法。

张占鳌的罪恶史和他在“肃反”中被查获的经过，曾在北京1958年的“肃反的伟大胜利”展览中展出，并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成纪录片，其主要内容还被载入《时事手册》。

张占鳌一案是由黑龙江省公安厅、龙江县公安局、龙江县肃反五人领导小组联合调查，共同努力查获的，共历时3年，耗资上万元。

本文就是在访问了当时的主要办案人，现龙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波同志之后，又查阅龙江县公安局、人民法院保存的两本张占鳌卷宗，综合整理而成的。它较详细地揭露了张占鳌的罪恶历史，记述了“肃反”时查获此案的经过。是一份较为翔实的史料。

梁耀华到底是什么人

1952年，我们党领导和发动了镇反运动。龙江县四区繁荣小学教员梁耀华，主动交待了自己的罪恶历史：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二区明庄子村，父梁建业。本人当过伪职员，曾勒款200元；又在乐亭一区甘草坨子乡先后在催款中贪污290元；在汤河乡小张庄催款时打了李乡丁两个嘴巴子；1947年在乐亭县甘草坨子参加国民党，介绍人是王存明、韩步清，现分别住长春、肇东，组长李树文，证人张文祥；以后又参加蒋匪甘草坨子救济委员会，任办事员，进行反动宣传，散发过传单，先后贪污救济物资：面袋50条，大衣18件，西服2件等。当时，由于是他主动交待的，又无力全面外调，就定为历史反革命，控制使用。后来，县公安局对凡是有历史问题的人，都要进行调查，特别是对既不接来妻儿，又不回家探亲的梁耀华，尤其重视。从1954年起，派专人按照他的交代和他填写的干部履历表，进行了外调。但是，他所交待的那些地方无人认识他；他所交待的证明人，一个也查不到；他交代的罪行也无一属实。于是把他的情况报告给省公安厅，并呈送其全部卷宗。省公安厅拟定调查提纲，组成调查组，从1955年3月至10月两次进行调查，仍无一核实。如：调查人傅洪志报告："在长春市通过公安局卡片室进行仔细查找，未有查到张文祥踪迹。"调查人雷云清报告：乐亭县并无国民党甘草坨子支部组织，县公安局掌握的国民党员中也无韩步清、李树文等人；乐亭县也并无救济委员会组织，有个救济组，但组织档案中也无梁耀华；乐亭县也无小张庄，因此，打人之事也无法查对；拿梁耀华的照片到他所交待的出生地明庄子调查，无一人认识他。根据上述情况，省公安厅认为梁耀华有可能是假坦白，至少是未交待真实作恶地点。故将材

料退回龙江县公安局，并批示："此人更名改姓，有重大历史问题。"把此案作为省重大案件之一。

梁耀华到底是什么人？根据党的八大提出的"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要求，于1956年开始了肃反运动。龙江县委五人领导小组，把调查梁耀华作为重点之一，委派当时的文教科长梁波和刘连春同志，带上梁耀华的照片，拟定提纲，再次进行外调查证。但路线基本和前两次一致，所到之处，接待者都问："你们怎么又来了？"经过10天查证无一收获。于是他们向乐亭县委组织部请求开一个"满天飞"介绍信，先到梁姓庄和姓梁多的庄子去调查，都无收获。后来，他俩决定到各乡屯去开座谈会，出示照片，念梁耀华履历。他们到董各庄时，找6位老人开座谈会。会上先让大家传看照片，无人认识；再念简历和证明人，当念到东海村崔秉香时，有人说："蒋各庄共同湾村有个崔秉祥。"任何一点线索，都使人高兴。第二天，二人直奔蒋各庄乡。韩乡长接待了他们，但拿出照片，他不认识；提到崔秉祥，他尽力在想。这时，团委书记苏广善进来，韩乡长问："小苏，你认不认识照片上这个人？"苏广善同志看了足有四五分钟，最后，他眉头一皱说："是张占鳌！"梁波只注意姓了，忙追问："叫什么？"苏广善肯定地回答："张占鳌！"又问："他是干啥的？"回答："他是特务！潘家戴庄惨案就是他干的！"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原来，苏广善同志和张占鳌于1948年在一起教过学。知道张占鳌的罪恶历史。后来梁、刘二同志来到滦县潘家戴庄，看了解放后新建的村庄和为死难者立的碑，还找到了几位惨案的幸存者，当群众听说张占鳌更名改姓潜伏在黑龙江省龙江县时，恨得咬牙切齿说："抓他回来点天灯！"二同志又到滦县公安局抄录了有关潘家戴庄惨案材料，并向滦县县委做了汇报。县委决定：按政策，张占鳌一案应黑龙江处理。

张占鳌的罪恶

张占鳌，1921年生于河北省滦县偏城镇东八户庄，1940年5月到滦县第一警察分所当贴写，由于他一心充当日本侵略者的走狗，1943年便被县公署委任为二区张各庄清乡办事处组织组组长。在日本守备队长铃木和顾问间岛的直接领导下，大干搜集情报、清查和肃清八路军及与八路军有联系的人的罪恶勾当。1942年农历十月二十八日，他与日寇一起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戴庄惨案。

是日晨，他带领办事处人员跟随日寇守备队从张各庄出发，奔向东南去清乡。天刚亮，到了潘家戴庄屯西，八路军从庄内开枪，打死日军一人两马，其他人马转头逃跑。跑到霍各庄，日军马队又返回，再到潘家戴庄时，我八路军已撤走。日军领队安田命令：集合群众。这时，身穿黑色警服、腰别匣枪、眼带墨镜的张占鳌，右手拎一根四尺来长、二寸多粗的木棒，带领办事处的人从屯西往屯东赶人，并挨户搜查。他领头从路南赶出四五名妇女，又到路北一家赶出3名妇女。妇女不愿走，他就口骂棒打。把老百姓都集中到屯东场院里。张占鳌先从人堆中找出五十多岁的齐攀成①问："八路军昨晚住在哪里？又哪儿去了？"回答："不知道！"他飞起棒子就打。最后一棒子打在齐攀成左耳上，立刻倒地身亡。接着又打跪在一边的齐天成。齐天成回答："实在不知道！"他挥棒又打，把齐天成打得满地乱滚，遍体鳞伤。这时妇女中张占鳌的姨姥喊："赢协（张占鳌的乳名。生他时，正赶上他爷爷赌博赢了，故起此名）！那是我们家的人啊！"他的连姑辫头也喊："张占鳌，那是我叔啊！"他住了手

① 上文中为"齐盘成"，与本文中的"齐攀成"均系一人。

（后来借找铁锹挖埋人坑的机会，把齐天成带出放了，但不到一年齐就死了）。接着又挖起了埋人坑。当挖完二十多丈长，一丈多深，一丈多宽的大坑后，安田下令："统统埋了！"张占鳌就命令办事处和自卫团的人往坑里赶男人。他挥舞棒子，边推边打，先把两个男人推进坑中，接着又有数不清的人被推进坑里，坑中人挤人，人压人，呼天喊地，真是惨不忍睹。边推边埋，埋不过了，安田又下令抱柴草烧露在上边的人头。张占鳌就带人抱来草往人头上扔，点火烧。往上拱的人，日寇用刺刀扎，张占鳌带人用木棒戳。埋完男人，已到午间，张占鳌向安田求情，先放出他姨姥，又放出他连姑辫头，还跟出一个姑娘霍小丫。张占鳌把她们送进屯里，放走了辫头，把霍小丫领进一间屋里问道："我把你救出来了，你愿意不愿意跟着我？"姑娘吓得直抖，不从。他竟凶狠地威胁说："你不同意，我就把你带回去！"在他的淫威下，姑娘被奸污了。霍小丫不久含恨而死。下午，又挖了一个大坑，3 点多钟，"呼"地开始埋女人和小孩。更是哭爹喊娘，万分悲惨。当剩下 200 多人时，一个妇女喊："你们怎么不跑啊？左右也是个死！"妇女们一哄而散，把旁边的障子都挤倒了。但有日寇守备队设卡，哪里跑得出去？张占鳌带队往回圈人，木棒一齐挥打。他先撵上两个妇女，硬拉回，用棒子打进坑中；他又撵上一个抱小孩的妇女，那妇女跪下求饶，他恶狠狠地说："不行！你不进坑也跑不了！"又用棒子把她打入坑中。那妇女把小孩放在坑沿上边，张占鳌抓起小孩的腿，狠掼在地上摔死，又扔入坑中。真是灭绝人性。傍晚埋完了 1 283 人后，安田又下令烧房子。张占鳌带领办事处的人到处点火，他亲手把屯西一户三间正房和一个大草垛点着。整个潘家戴庄一片火海，几十里外都看见火光冲天。张占鳌这个效忠日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的汉奸特务，深知自己在家乡附近又有亲属

居住的潘家戴庄做恶多端、罪恶深重，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但是，他并不肯放下屠刀，而是继续为日寇效劳，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汉奸走狗的下场

1945年9月，滦县被国民党接收，将张占鳌逮捕，判了4年徒刑，押在唐山监狱。1948年10月12日，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唐山，他出了唐山监狱，跑到乐亭县东海村他祖父处，隐瞒罪恶历史，混入了教育队伍。1949年8月，当他闻讯滦县侪城公安局要抓他时，他逃往东北。先到沈阳又转锦州，连续几年避开了公安局的追捕。后又潜逃到碾子山他舅舅家，更名改姓为梁耀华，又混进教育队伍，并且以伪造的简历和假坦白，混过了镇反这一关。

肃反运动一开始，有关部门就把梁耀华控制起来了，采取的是内紧外松的策略。当梁波、刘连春二同志返回黑龙江后，县委五人领导小组责成梁波同志审理梁耀华。当开始审问他时，他仍故作镇静地重复他伪造的历史和罪恶。梁波同志突然问："你姓什么？"梁耀华吃了一惊，冷汗立刻冒出来了。在步步紧逼的攻势下，他报出了真名"张占鳌"，承认参与了潘家戴庄惨案。但是，他又把自己打扮成随从者，把自己的罪恶全部推到另一名汉奸张玺华身上，妄图再次蒙混过关。还谎说他借抱柴草之机放出不少小学生，借做午饭之机放走几个妇女。但是在多份证言面前，他的伪装全部被剥掉，现出原形，不得已坦白交待了全部罪恶。1957年1月29日，张占鳌被逮捕归案。中央肃反五人领导小组调阅了张占鳌的审理卷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验印。1957年10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57年度刑复字第174号判决："判处被告人张占鳌死刑，立即执行。"

龙江县召开了公审大会，将其押赴刑场，验明证身，就地正法。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辑）

二

热河“三光”政策与长城无人区

一个特殊的战略地带——“长城无人区”

陈　平

1942年和1943年，我是在冀热辽地区长城线上“无人区”里度过的。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制造“无人区”的残暴罪行。1942年8月上旬，日本侵华主要战犯冈村宁次，在北京召开兵团长会议并亲自做了布置后，日寇出动重兵对冀东进行连续疯狂“扫荡”，强征几十万民工沿密云、平谷、蓟县、遵化、迁安等山区边缘挖成封锁沟，将长城线上直至封锁沟以内的村庄全部烧光，将群众全部赶走。根据敌人的统计数字，仅迁安、遵化两县长城线上的山区就有1.57万多间房屋被烧毁，64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毁为焦土，即成为所谓“无住禁作地带”，近10万居民被赶出了家园。

伪满洲国方面，由关东军负责实施。从长白山一带调来专门搞“无人区”的讨伐大队，在承德、兴隆、滦平、平泉、青龙、凌源等县，制造更大规模的“无人区”。其办法与关内略有不同，不是把群众全部赶走，而是通过连续的疯狂“扫荡”，实行集家并村，将山地的群众赶到“部落”村。

“无人区”虽然出现在冀热辽局部地区，可是日本侵略者所以要在长城线上大规模制造“无人区”，却是出于整个侵略战争的战略决策的考虑。绝不是一个时期战役的需要或某些战斗的刺激而采取的临时措施。所以，进攻扫荡之疯狂，摧残手段之凶狠毒辣，都无所不用其极，而且是那样旷日持久地坚持搞了数年之久，直到其最后覆亡的前夕，仍然不遗余力地在这一带

垂死挣扎着。

日本侵略者这种"确保满洲"的战略部署，一方面是准备对苏作战，而更现实更直接的战略目的，还是把满洲从中国版图中彻底割裂出去，实现永久占领，特别是要坚决阻止共产党八路军向东北挺进。所以，在长城线上划定其所谓"大满洲国西南国境线"，并且制造纵深千里的"无人区"封锁线，从而这一带也就成了最敏感的战略争夺地带。

一、关于敌人制造"无人区"的时限和地域范围

过去由于资料不完备，对敌人制造"无人区"的时限、地域范围等一些基本情况搞不清楚，所以，在一些发表过的文章中其说不一。根据我掌握的一些不完备的材料，提供一些线索。

关于时限

最常见的说法，"无人区"的制造是在1942年至1943年间，这是不够确切的。据我所知，敌人在长城内外搞集家并村是1940年冬和1941年春，在马兰峪陵圈内（当时是伪满洲国一个特区）开始的。现在的六合村就是那时由6个自然村集家并村搞成的。据姚依林同志1940年写的关于《冀东游击战争是怎么坚持的》报告中说："在我部队活动的热河南部承德附近，并村的办法已开始实行"，敌人"企图减少甚至消灭山沟小道中三五户的小村庄，便于其军事政治的控制，增多我游击队活动的困难"。但没有谈及当时实施的具体情况。当然，规模很小，不关大局。至于敌人在长城线上大范围地搞集家并村，究竟是从1941年或1942年算起，也还值得研究。热河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那份《西南防特情灭共对策资料——国境地带无人区化》的文件，就是1941年9月形成的。而且，当年我们在热南一带活动

的时候，敌人宣扬集家并村的消息闹得满城风雨。后来几次到“无人区”访问，一些老同志和当地群众也说敌人在1941年秋后就闹着要集家并村，并且开始大规模烧毁长城线上的村庄，这正是集家并村的前奏。我曾看到过一本残破的《东方》杂志，上面有一篇署名厂民的关于滦平县“无人区”的专题访问记，题名《人圈》，开篇就说：“从1941年，伪满洲国康德八年开始，敌人为了明朗热河，为了防止八路军的积极活动，实行了毒辣的集家并村政策。”不但写明是1941年，而且写明是伪满康德8年，不至于是笔误。

至于敌人制造“无人区”时间的下限，更不是到1943年截止的，而1943年是个高潮，尔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随着我们向东北地区的挺进，敌人不断扩大制造“无人区”的范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一血腥的措施才随着日本法西斯的覆亡而终止。

关于“无人区”的地域范围

据《热河抗日简史》记载：“至1944年，热东、热南及辽西峰峦千里的土地上，展开了历史上罕见的扫荡与反扫荡、集家与反集家、割青与反割青的激烈斗争。敌寇所制造之‘无人区’及集家区，东西长700里（从绥中至滦平），南北宽250里（从长城到锦承路北），面积175000平方里，包括8县地区。伪热河省400万人口，有105万人被敌驱入人圈。”

据我掌握的一些材料，还应该有所补充。

1942年秋冬之际，在热南大搞集家并村的同时，关内敌人也沿长城线内侧大搞“无人区”。

另外，我还曾见到过一份伪蒙军政府宣化省推行集家并村的布告，布告所划定的地域是：“松树岭、请安堡、松树洼、苏

家河、五里坡、下河、×河、关水沟、五于家地、小庄科、降棚山、下棚、上棚、蒋口子、营盘沟、面差山、大融山、小融山、滥角。”

布告限定集家日期是：“自成纪七三八年九月一日起实施，至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这份布告的内容与当年我们在热南活动时见到的日本和伪满机关颁发的集家并村布告如出一辙，其内容与前边引证的日本宪兵队的文件也完全合拍，颇可作为一份佐证。布告所说的“成纪七三八年”，是伪蒙军政府沿用的成吉思汗的纪元，即公元1943年，也正是在热河大规模制造“无人区”的高潮期间。据说由于兵力不足和我方反击没有搞成。另外，据有关的老同志讲，在平北龙关、赤城一带长城线上敌人也搞过集家并村。据说搞得也不彻底，然而，已经可以清楚看出敌人是有着统一部署的，而且范围较大，并且想要与热河一带“无人区”衔接起来，那么这“无人区”封锁带，就远远超过“西至滦平县”的界限了。

关于长城内外敌人之协作

过去一般的说法，都认为制造“无人区”是伪满境内关东军干的。而从当年驻冀东日军二十七师团步兵团长铃木启久少将（后为一一七师团中将团长）的交代材料中得的证实，1942年间在长城线内外两侧大规模制造“无人区”，是关内、关外敌人协同动作搞起来的，而且战略目的也基本一致。据铃木启久交代，1942年7月间，他向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报告四次“强化治安”后冀东的形势时说：“失掉了鲁家峪，对八路军来说确实是很大的打击，但丢掉了阵地不等于八路军就是削弱了。阵地被毁掉，他们分散上山了，另外转入地下工作的

力量增强了。这样相反地可以说是增强了力量。……当然，像过去那样八路军大活动在表面上是看不见了，所以，在这地区里好像是很白的了，但经深入一下扒层皮，实际上里面是通红的……”基于这种分析，经冈村宁次亲自策划，一面在冀东基本区大挖“遮断壕”，把我们的游击根据地分割封锁起来，实行反复扫荡剔抉，破坏我方基层抗日组织；一方面沿长城线制造“无住地带”。其具体措施不是像关外那样修建“人圈”搞“集家并村”，而是用封锁沟封锁起来，“禁止一切活动，禁止居住，禁止耕作，交通也要狠狠限制”，制造所谓“真空绝缘地带”。在冈村宁次统一指挥下，冀东地区东西部（敌伪分冀东道和燕京道两个建制）敌人协同动作，西起平谷县峪口镇（重点是蓟县盘山地区），与东部遵化、迁安的封锁沟相连接，在长城内侧山区大规模制造“无人区”。

耐人寻味的是，长年来关内关外的日伪之间在统一指挥下，在军事行动上有过不少的协同动作，但是，为了争夺势力范围和经济利益，也是有着很多矛盾的，铃木启久称之为“圈绳定界”之争。诸如马兰峪特区的归属之争，北宁路收益和开滦煤炭分配之争等等。除非有特殊任务经许可，关外敌人是不能随意进入关内活动的；关内敌人则更不能越过长城。成为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和活动空隙。可是，自1942年制造“无人区”这个战略行动开始，关内关外敌伪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长城内外协同动作，大力圈剿，共同制造“无人区”。而且冈村宁次还特别关照，要“与关东军接壤驻地警备部队密切联系实行之”。从此，关内关外敌人的协同动作越来越密切，伪满敌军经常毫无顾忌地进入关内扫荡，对冀热辽地区造成了内外夹击的不利形势。

二、彻底的“三光政策”

敌人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对山区根据地推行了彻底的“三光政策”。

杀光：从1942年大规模驱赶群众集家并村，就是以血腥屠杀开始的。对坚持不进“人圈”的人见一个杀一个。当时在日本侵略军中搞杀人比赛。疯狂的敌人进了山区根据地就像追捕猎物一般追逐中国人，杀死后将耳朵割下用铁丝串起来，回去可以按数领赏。从1943年后，屠杀更是步步加紧，就连牲畜、家禽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不放过。在热南山区根据地里几乎连一头驴一只鸡都没有了。兴隆县羊羔峪张村长家养着一只小猪，大家都当成稀罕物。这头小猪对当时的战斗环境似乎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山头一喊哨报警，它就从圈里窜出，乖觉地跟在人的后头跑敌情。

烧光：据不完全统计，热河省在抗战期间被烧毁几千个村庄，房屋382万间。而且这些房屋大部分被重复烧过多次，象我们住过的平谷、兴隆县境内的罗家沟、朱家沟、大小段注、南北水峪一带，从1941年到日本投降，差不多都已烧过十多次以上，驴儿叫村先后被烧18次之多。敌人为了摧毁我军民赖以隐蔽的山林，每年冬春扫荡时，就到处放火烧毁森林。几年中，长城线上遍山野火烈焰冲天，整个“无人区”成了一片焦土。

抢光：敌人的掠夺更是疯狂到了极点。从开始集家并村起，伴随着杀光、烧光的就是彻底抢光。穷苦山民赖以生存的一点点粮食、衣物被抢劫一空，可是还不罢手，数年中千百次的扫荡中，依旧是到处搜索抢掠，就连半口破锅、一个空瓶也要被抢走或砸毁。群众藏东西的办法也是巧妙得很，一个瓶、一个罐、一把锄、一张锨，都各有一个正可身的小洞。至于粮食和

衣物，则是随身携带，人在物在。据统计，抗战期间热河省被抢走粮食达96亿斤，牲畜248 000余头。

敌人还有最灭绝人性的一招，就是“割光”。从1943年开始，每年春夏之交，青苗正在茁壮生长之际，敌人就要举行大规模的“割青扫荡”。开始由于“经验”不足，割得早，群众又种晚茬，敌人又来割二遍，群众再种些蔓菁、萝卜等，敌人来了还是给割掉。就是要彻底摧毁我军民一切生存条件。

三、人间地狱——人圈

“人圈”，这是群众愤慨的说法，意思是猪有猪圈，羊有羊圈，日本统治下的中国人也被圈了起来，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所以通常都叫“人圈”，其实正名叫“集团部落”。“部落”，是日本封建时代“贱民”聚居的地方，这里又冠以“集团”二字，是“组织”起来加强控制的意思。

生活无着

群众被驱赶进“人圈”，碰到的头一个大困难就是生活失去着落。据统计，兴隆县原有2000多个自然村，被指定的集家部落199个，约10个自然村并成一个部落村。人所共知，山区的特点是山高路远，地广人稀，十几个自然村相距几十里的山路。像我们居住过的平谷县罗家沟一带几个自然村，当时被指定的集家地点是陡子峪，相距几十里，隔着几架大山，怎么回去耕种呢！何况家乡已被划定为“大满洲国无住禁作地带”，根本就不许有人迹存在。

在集家过程中，群众住房被烧得片瓦无存，粮食衣物被抢夺一空。可是被赶进“人圈”时，还是要被彻底搜查，随身携带的一点点破烂衣裳和粮食，又被搜掠一空。农民失去了土地，

就意味着失去一切，进了“人圈”后，只能向当地的地主租种一点土地。可是“人圈”周围被划定允许耕种的土地也是极少的，被集家去的群众即使肯出极高额的租金想租得赖以糊口的土地也是极难的事。

非人的居住环境

“人圈”四周是1.5丈左右的高墙，墙顶上是铁丝网或插满枣树刺枝。墙上有垛口，里侧有“马道”，距几十米设一个站台，围墙四角和大门顶上是碉堡。“马道”站台上由群众被迫组织的“义勇奉公队”（即（自卫团）日夜守望着，碉堡和大门由伪军或武装部落警把守着。通常每座“人圈”只留两个大门，门上写着“××部落村”，还有“建设部落，自兴乡土”或“共存共荣，王道乐土”之类的标语。为了防范八路军，夜里经常鸣锣吹号，群众闻得信号，就得立即跑上围墙去跟着呐喊呼叫。白天总是日头升得老高，看看确实“平安无事”，才开门放人去耕作，傍晚太阳未下山就关门戒严了。稍有风吹草动，就几天不开门。可是，在“人圈”内的一般人家是必须“门户开放”的，勒令“夜不闭户”，以便于日伪警特人员横行无阻地去奸淫掠夺。“人圈”内是划定范围由各户自建住房的，一般3丈见方，地势狭窄的地方也有1.5丈或2丈见方的。山里群众被赶进“人圈”后，无依无靠，糊口的生活都维持不了，又哪有力量建房，多半是搭个马架子窝棚。有不少人家从1942年被赶进“人圈”，直到日本投降，几个寒暑，始终住着原来那个窝棚。冬天，塞上的暴风雪袭来，满屋飞雪，冰冷彻骨。仅兴隆县，几年中冻死群众1000多人。到了夏天，屋里、街上一个样，遍地是泥泞、污水、粪便，臭气熏天。苍蝇、蚊子、臭虫、虱子、蟑螂，恣意肆虐。鼠疫、伤寒、霍乱、痢疾、疟疾广泛流行，还有可怕的

败血病，得了病的人鼻口喷血，死亡率极高。据统计仅1943年夏季一次瘟疫流行，兴隆县就死了6000多人。靳杖子村一天就死了40多人。一次可怕的鼠疫流行中，村村死了不少人，大水泉村就死了300人左右。家家陈尸，户户嚎啕，死了人没人往外抬，尸体臭在家里。

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

敌人对"人圈"群众的经济掠夺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什么都要，什么都不给"。

"人圈"内实行的伪满洲国的"组合配给"制。群众打下的粮食要交到"组合"，名之曰"谷物出荷"；棉花更是一斤一两也不准存留，叫作"棉花出荷"。此外，还有"大豆出荷"、"油类出荷"、"报国出荷"、"民主出荷"、"部落出荷"等等。捐税更是五花八门，什么门牌捐、户籍捐、牲畜捐、飞机捐等等，数也数不清。另外，还要献储金、献钢铁、献毛皮、血粉、鸡、蛋、菜、杏仁、栗子、核桃等等。"人圈"的群众早已被榨干了汁水，可是捐税依然有增无减。如滦平县玻璃庙村，原有羊3 000只，建"人圈"两年间，被伪军警任意屠宰，只剩下11只了，可是征税时，仍然按3 000只计算。

群众的劳动所获被全部搜刮干净，就只能靠"配给"物资过活。配给的粮食叫"共合面"，都是豆饼、苦橡子和霉烂的粮食混合磨制成的。群众私藏一点粮食被搜出，就要当成"经济犯"，甚至以"通敌资匪"的罪名治罪。兴隆六道河子一个人闹了病，弄来点米熬粥吃了，不料在街上呕吐了出来，被伪警看见有米粒，就被抓起来，逼问粮食是哪里来的，受尽了折磨。

按规定每年每人配给10尺布，可是至多给上三四尺，不少地方几年中一尺也没给过，都被官吏、警察、特务层层克扣去

了。而配给到群众手的布料，都是质量极为低劣的人造纤维，下了水一揉搓就破烂了，群众称为“唾沫缎”。我们在那一带活动时，见到“人圈”里群众出来种地，许多人只是身前挂着一条破布或麻袋片；有的成年只有一身破皮袄，冬天毛朝里，夏天毛朝外，下田时脱在地头上，光着身子干活。一次，部队进入滦平黄土梁子“人圈”，几个战士到一家找水喝，屋里女人惊慌喊叫：“同志，不要进来！”原来屋里两个青年姑娘，一个光着身子，一个的裤子是穿洞的百鹑衣，出不得门。战士们含着热泪脱下自己贴身的衣裳扔进屋去，她们才腼腆地出来招呼子弟兵。象这类的事，在“无人区”活动过的人谁都见过。

在“无人区”里，只有一样物资的供应是充裕的，就是鸦片。各级政府里都设有名曰“禁烟局”实为种烟局的正式行政机构；经济体制中设有“大烟组合”。“无住禁作”的措施，把耕地压缩到人民难以维持生命的程度，可是种植鸦片的面积却逐年扩大，“出荷”的数量也逐年增加。而且规定，不交足“鸦片出荷”，就不配给生活物资。人民被剥夺了一切自由，独有吸毒不受限制。吸毒、扎毒针泛滥成灾，一般约占成年男子的百分之六七十，女人中吸毒比例数也很大。因吸毒太麻烦也不解瘾，“瘾君子”们大都改成扎毒针，随身携带一支注射器，同你谈不上几句话，他那里就打哈欠流眼泪犯了瘾，弄个酒盅，冲开点鸦片水，隔着极肮脏的破裤子就扎了进去。扎得浑身结成大大小小的硬疙瘩，遍体烂疮；扎到无处下针的程度，也就毒死、瘾死了。

血腥的“大检举”

敌人对“人圈”中的群众更是像猪羊一般地任意宰割。什么国事犯、思想犯、经济犯、泄密犯，通匪、济匪、资匪等等

数不清的罪名，可以随意加在任何人的头上。搜出几个信封，就被加上通匪罪；读四书也会被加上“思想犯”的罪名；说上一句：“我是中国人，”就会被扣上“反满抗日”的罪名，治以重罪。其实也不须有什么罪名，在侵略者心目中，中华民族的存在，中国人的生存就是弥天大罪，兽性发作就可以任意宰割。连年累月一次又一次的“大检举”（即大搜捕），每次都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被逮捕和屠杀。每年不知要抓多少次劳工，大批青壮年被抓走，有的发配到北满或日本去服苦役；也有的被秘密送到细菌战研究所或武器试验场去当试验品，或者被弄到日本军队中做对新兵进行“胆量教练”的活人靶。“大检举”中集体屠杀的血案更是层出不穷，兴隆县秋木林子和大莫峪两村共有130户人家，一次就被杀了男人180人。像这样的“寡妇村”在“无人区”是很多的。承德监狱是残害中国人的一座大魔窟。在那里面，像灌凉水、压杠子已经是“一般化”的刑罚了，什么电磨粉身、军犬撕尸、挖肝摘心、活拔神经等酷刑就有十多种。1945年夏季，一次搞电刑试验，就杀死300多人。据统计，从1943年至1945年日本投降，就有37 690人死在这座监狱中。承德市西郊的水泉沟，就是最大的屠杀场和万人坑。几年中，总有几百头野狗聚在那里扒尸吃。都吃红了眼，行人谁也不敢接近，伪军警去埋尸时都得先鸣枪驱赶狗群。

兴隆县是敌人制造“无人区”的重点地区。1933年3月被日军占领时，总人口约14万，到1945年日本投降，近12年半的时间，如果按旧时代和平时期正常人口增殖率计算，总人口约可达十八九万。可是，在这12年中，特别是制造成“无人区”后的几年过程中，全县被屠杀三万四千多人。死于冻饿和疫病万余人。再加上极度困苦的生活，绝大多数妇女失去生育能力。到日本投降时，总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到不足

10万。日本法西斯制造“无人区”，就是要我们种族绝灭。

热河日本宪兵司令官长岛玉次郎，就是制造“无人区”的主要刽子手之一，连日本人见了他都象见了毒蛇一样毛骨悚然，称他为“魔鬼中的魔鬼”。可是，由于他统治手段残虐，屠杀中国人民“得力”，制造无人区“有功”，曾受到褒奖，得了勋章，并且把他的“经验”在整个伪满洲国宪、警、特系统中推广之。

（摘自《河北文史资料》第十二辑）

伪满热河省的坚壁清野

春　风

我堕身于伪满13年，在热河省竟达10年。前7年职位是在省公署，任务是经常下乡调查宗教寺庙、古寺古物、学校教育等事。所以省政乡情大都耳闻目睹。后3年任热河省隆化县长，直到解放。

一、伪满坚壁清野的开端

伪满的坚壁清野政策，一般人都以为是在热河省开始施行的，其实来源于通化。由于通化省在“九·一八”事变后，有爱国志士杨靖宇、邓铁梅等义勇军，风起云涌，愈来愈盛。致使日伪满军讨不胜讨，一时计穷智竭，莫可如何。适有通化省警务所长岸谷隆一郎（后任通化省次长），是一个“满洲通”（会说中国话，对满州事情比较熟悉）。鬼计多端，具有一副假仁义真狠恶的心肠。他一方面组织警察讨伐队，进行讨伐，一方面利用地痞流氓，悬赏捍缉，终把杨靖宇部下的叛徒程斌捉

获。程斌曾任抗联的参谋、师长等职，深知义勇军的底细，心肠非常毒狠。竟将义勇军食粮接应情况，隐身屯处所，一一暴露。并向岸谷献策“清乡断粮就可置义勇军于死命”。此计正对岸谷心头，就在这一带开始了坚壁清野政策：十家连坐，百户同科，一人犯法，各户均受牵连；清理人口，合屯并户，限制谷物出入，禁止人畜上山……岗哨林立，昼夜巡视，无辜居民，每遭诛戮！义勇军见此情况，遂转移阵地。日本鬼子认为得计，喜气洋洋，提升岸谷为伪满国务院地方处长，让他企划整个伪满洲国的坚壁清野政策。当时热河省情况紧急，他们不得不把这条诡计先搬热河去了。

当时的热河省情况怎样？他们在通化的简单的坚壁清野能否用得上？事实出乎他们的意料。当时的伪热河省西部有冀热辽军区的八路军，向热河省内进攻。因为是人民的军队，到处可以为家，是反对侵略的战争，人人都愿相助。人民军队巧妙地施行了蜂蝶战术，这个战术是聚散无常，变化多端，说聚则遍地飞来，说散则踪影不见。明明是锄地农夫，紧急就变成战士，眼看是放羊童子，扬鞭举手都是通讯的暗号，追之于前，忽然出现于后，围之于中，转瞬反被包围于内。在伪康德5年春，滦平县红梅寺警察署，买了一车烧柴是一个村姑赶车，一进院就由车内钻出八路军数名，全警察署都被缴械。同年秋季，日本鬼子听说八路军攻打兴隆，动员全省军警都去围剿，赶到兴隆一看，只见驻守兴隆的鬼子死尸在地，标语满墙。正在撕标语开追悼会的时候，距此三百多里的青龙又被攻下。待到青龙，而西北部的丰宁、滦平等县（青龙西北四百多里）都告紧急。东奔西奔，不知所以，南瞻北望，草木皆兵，欲退不得，欲罢不能，遂使日本鬼子数万军警部队疲于奔命。但是帝国主义者向来不会甘心死亡的，每到穷途末路就向百姓张牙舞爪，这是他

们的本性使然。约在康德5年，这个万恶的坚壁清野政策，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在热河施行了。

二、坚壁清野政策的具体内容

伪热河省的坚壁清野政策，是从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进行的，共分四个步骤。第一是清乡，第二是划定无人区（也叫无住地带），第三是集家，第四是三光政策。在形式上看，有时各自为政，从本质来看，浑然连成一体。是步步紧、步步狠，狼狈为奸，相互为用，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一）严格的清乡制度

首先是整理街村机构，重新规定村界，按照地形人口、情势险要程度等，规定每个县、旗为10至20个村。每村设有村长、助理员、司计（会计）、行政（管户籍等）、烟政、弘报（类似特务）等股。村内职员大约不下20多人，小村也有10几个人，重要地带的村公所还设置1至2名日本人，名为村副，实为掌握全村大权。凡事都得通过他，否则就是藐视皇军，违背王道。村长多是当地的土豪劣绅有财有势的人，其他办公人员，或由县、旗公署委派，或由本村推选，大都是认为政治可靠、家道殷实，有线索牵连具备着一定把握的人。每村公所内都暗设监视人1名（形同特务），村公所处还有专门对该村公所监视的一二人，定期向县旗公署弘报股和警务科汇报，情节较重的还得直接送交日满当地宪兵队。至于村长和村副唯一的职责，就是定期向上级汇报村民的动向。有书面汇报、定期汇报、紧急汇报、临时口头汇报，各有指定时期，逾期或漏报，即按西南防卫司令部的军法处罚，有功的也按规定行赏。其中比较最突出的是人口调查工作（也叫村势调查），这个工作不仅是一般地把户数、人口数、年龄、住址、职业等项了解清楚，还要把每个人都划

定类型。第一类是良民，多数是地主富农，守财如命，不能逃跑，害怕八路军闹革命的人。第二类是次良民，所谓殷实人家，随着地主一边倒的人。第三类是“要视查人”。这一类人包括很广，一般无产业、光棍汉、旧军人、旧职员（指旧中国或伪满退辞的）、部分村长和个别警察署等都划为这一类。第四类是由关内或远处新迁来的住户，或临时寄居的人。第五类是形迹可疑，或家中人有在关内工作长期不归的住户。分门别类，登记在暗中的簿册，由警察或日满宪兵特务保管，逐区（按特务特殊规定的区域，经常交换，外人摸不清）、逐户都有专职监视人员，一举一动都得汇报。

此外各村还有协和分会的设置，名目是日满协和，伪装着一副慈善面孔，实际上是最阴险最毒辣、杀人不见血的特务机关。在坚壁清野的政策上，专搞村民思想工作，他们和地主富农勾结在一起，专找穷人的破绽、机关单位行政部门的漏洞、各个级层的底细，暗中向特务机关汇报。但是表面上却处处要显示出同情群众的样子，如张罗救济粮，发放救济衣，帮助医疗疾病，有时还出头保释犯人等装腔作势的假仁假义，无非借以掩人耳目而已，骗取群众的信任和好感。如此等等，鬼子以为是在政治清乡的基本工作上，作了万全的准备，有了必胜把握了，于是就开始坚壁清野第一步的屠杀政策，进行镇压。约在康德5年秋季，就在承德大抓通匪嫌疑犯（指和八路军有联系的人），把省公署的张实科长、王股长、科员，以及税务监督署科股长、警察、司法、工业、商业、一般住户等四五十人，都抓进监狱。轻的长期监禁，重的就地枪杀，以示坚壁清野政策的威力。弄得人心惶惶，恐怖万状！接着各县旗乡村大肆地进行同样的逮捕，凡是他们爪牙认为有嫌疑者，都难幸免。每日有大车小辆或成帮成伙的向承德押送。这时承德有3个大杀人场，

是承德有名的3个大杀人窟。这是伴随坚壁清野政策益形扩大的最残忍的产物。第一是鬼子的西南防卫司令部（承德离宫），凡是百人左右的大型集体屠杀，都在这里执行。因为这个地区是旧日离宫，周围城墙二丈来高，方圆四十多里，无论如何烧杀，外人都难看见，免露王道主义的丑态。并且有日军把守，不易遭到意外的抢袭。第二个是承德监狱，能关押千余人，备有刑台、绞架、枪杀室、炼人炉、电烙室等，极尽其残，天天都有一二十人的生命葬送在这里。第三为日本宪兵队部，是个专门逼罪问供的地方。他们的刑具颇多，据说有百余种。按抓来人的年龄、性别、犯罪情节使用刑具。一人受刑众人陪场，弄得人欲生不能，欲死不得！一经吐露真情，承认罪状，立即烧杀，尸骨无存，恐怕泄露底细。这就是“王道”，这就是“皇道”，这就是王道、皇道结合而成的坚壁清野政策的一端。

这样做，鬼子认为他们所谓的坏人，就都能斩尽杀绝了。而乡可清，祸可避，高枕无忧了。谁知越杀八路军的攻势越猛，越清八路军的耳目越多。各地此起彼伏，八路军日见增多。于是日寇又布置了警察密网，张大爪牙，凡是大一点的村庄，几乎都有警察署和分驻所。这些豺狼的毒辣更非言语可以形容，人民自然遭到很大的涂炭，可是他们对于八路军的行动是无法弄清的。不但如此，他们这些警察署、所往往遭到八路军的袭击和消灭，如在兴隆、滦平等县活动的八路军王抗部队，是专能打警察的，好象是接取伪警察枪械的别动队，每攻一处大都是满载而归。伪警察机构倒成了八路军的供应站。日本鬼子狼狈益甚，于是就开始了第二个坚壁清野步骤。

（二）残酷划定无人区

啥叫无人区？无人区也叫无住地带，就是把热河西部、八路时常出入地带，或比较难于防守的地方，指定不准有人，名

为无人区域。将原有住民，用扫荡方式撵走，房屋不自己拆除就被烧毁，鸡犬不留。设置监视哨所和扫荡部队，经常巡视。原则是见人就杀，见树必毁，蒿草没人头的都得焚烧，几乎使这里成为一片焦土！用意是想用这个办法筑起无形的长城。当然他们是挡不住八路军游击队的。可是这一带的人民就遭到了难以形容的灾难，有家不能归，有房不能住，几辈子血汗积累的庄园，就在这个坚壁清野的政策上化为灰尘！流离失所，啼饥号寒，腿快的逃走了，老弱病残、恋恋不舍的，大都尽被杀戮！从热河的西南起，沿长城附近的山区，即凌南、兴隆、滦平、丰宁等县的西部，直至大西北和察哈尔永宁县接壤的四海野（俗称樊梨花城）等地方，长约五六百里，宽有一二十里，人口不下10余万，就这样悲惨地葬送在坚壁清野政策的刽子手的手里了。

这时候我们考查古迹古物一行，经常去到长城一带附近无人地区的地方。大的部落如程子玉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白马关、樊梨花城，辽时的兴州城、韩昌府、辽皇肖银宗的梳妆楼、大阁镇，宋时的八郎村、令公庙、孟良盗骨的红阳洞、白草山，传说的是李陵碑、苏武庙等处，无人地带的惨事悲音常常催下人们的酸心泪水。一般的古迹古物，也都在这坚壁清野的政策下被摧毁了。如苏武庙中的碑文、姜女庙中的记载、玄阳洞的栈道夫、红梅寺的红莲遗迹等等，虽属传称，也是足资验证的珍贵材料，也都同归于尽了。

有一次我去到热河最西北部的一个接近无人区的地方——樊梨花庙，在这接近无人区的田间里，锄地拔草的人，都是一些老弱不堪的女人，全不穿衣裤，多数腰中围一块破布或麻袋，好象是不顾羞耻似的。我向当地领我去的人问，他们为什么裸腿露胸呢？天气热吗？他说：不是。他们没有衣服吗？他说：也

不是。这是当地的规矩。谁定的这规矩呢？他说既不是前唐定的，也不是大清国定的。说完这些话他向四下望一望说："先生你不知道，这是接近无人区的地带啦，从去年扫荡队来到这里发现耕地的人身藏武装、干粮袋，暗结八路以后，就给我们下个禁令，不许男人到这里种地，女人种地也不许穿衣服，经大家要求才允许围在腰间一块布，这可就笑话了……"我追问再三，他才说："不但这样，有时鬼子来了，还让他们扯掉围布，任意耍笑、调戏，那些样子可就难说了。年青女子有的疯了，有的跑了，所以就这些老弱锄地拔草了。唉！前几天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还被他们拉去了呢，先生，你知道咱这仅是接近无人区，那无人区比这还惨呢！唉！哪说哪了罢，先生！"

这是在坚壁清野政策下，划定的无人区，是热河省的最西北的一角。热河的西部还有更甚者，就以我在兴隆县的水场沟所见的一幕来说，有一位受苦最深的老大爷说："哎呀，你来了，你再晚来两天连我也看不见了，我一家11口人，全变成鬼了，给你讲修长城的那个老太太，被火烧死了。我的大儿子被吊在树上点天灯了。我3个小儿子1个被枪杀，2个被扔在火炕里。最可怜的是我那2个青年媳妇，3个小孙子，一个将及14岁的老闺女！都活活地被鬼子拉走弄死了。我，我还能活着吗？我们的祖先是修长城时死的，我的父亲是直奉战争给军队拉道（引路）被枪打死的。我的母亲不是前二年你来时被鬼子搜家时吓死了吗？我还活着干啥？这次是鬼子有意让我看这些情景，以好宣传皇军的厉害，所以没把我绑在树上弄死。咳！家家有死人，户户遭火烧。还用我说吗？谁不害怕呀！我过几天就跳长城找我们祖先去……"这是伪康德5年日军扫荡热河西部的情况。这不过是悲惨中的一点点。沿着长城这一带，人家星散的山沟里，多数是这样。时常尸横遍野，臭味相闻五六里，哀号

声音彻云霄，令人毛骨悚然！

（三）凄惨的集家

无人区这是日本鬼子对待八路军第二道挡箭牌，既能坚壁，尤可清野，似乎是一个得意的阴谋，可是事实恰得其反，不但未挡住八路军，反被八路军攻入热河省的内地，不但未减少八路军的力量，反倒壮大了八路军的队伍。无人区的青壮年除死者外，大部都成了八路军的坚强战士。地理熟悉，人情透彻，不仅到处可以为家，还能得知敌人的底细。

白日隐蔽，夜间行军。在康德5年末，部分八路军已攻到热河中部，直到东部的平泉县、凌源县、喀喇沁旗左右旗等处。连承德街的伪西南防卫司令部、日满宪兵队、省公署、警察署等机关门口，都被贴上了反满抗日的标语。有时岗哨丢枪，有时手榴弹炸到院内，甚至有时伪军失踪和丢失密件等等，层出不穷。把一些鬼头鬼脑的家伙们，都弄成昏头昏脑的东西了。于是又想出了集家的政策，对照美国16世纪时的圈地政策来进行圈人。按照地理环境，防守策备，把全省各地人民都集中在各个指定的村屯，用圈墙圈起，设置门岗警卫，检查来往行人，以断绝和八路军的联系。这样好像是得以安诸了。

集家政策的规定：

1. 为实行王道主义，“保护”人民利益，便于皇军“剿匪”工作，进行全省集家。

2. 凡不满10户或稍多一点的“通匪”地区住民，一律迁移指定部落或地点，不准有任何留恋。

3. 一经被指定迁移的人民，不拘远近，一律限期搬净，过期即是有意资匪，尽行烧除。

4. 不向指定地点迁移，逃亡山里者，均为不法，枪毙不贷。

5. 所遗田园，须按驻在警防机关指定时期耕种，遇有违犯，

即行严加法办。

6. 所有指定的集居部落周围，都得修1丈2尺以上的高墙，开2门或3门，最多不超过4个门，每门修炮台1所，守卫室3间，昼夜设置岗哨，遇有外来串亲等人，均须验证登记，否则不准入内。

7. 为锻炼国民道德，尊皇"爱国"思想，凡出入卡门时，须向日满国旗和门卫人员敬礼，必要时得令背国民训。夜间禁止出入，遇有特殊事故，必经保甲长证明事实，门卫批准方可放行。

8. 门卫有检查盘问搜身权限，无论何人不分男女老幼均不得拒绝。

诸如以上20余条规定，形同监狱，没有两样。根据这些法则，由康德6年起，就开始了严格的集家工作。散居的山乡农民都得向指定地点搬家。祖祖辈辈燕子垒窝一样一砖一瓦修盖起来的房屋，眼看着被拆除，被焚毁！爷爷奶奶所栽培的果树，眼看着被砍伐，被烧掉（特别是热河西南果树最多，人多依以为生），多年血汗化成泡影！有的性急投河跳井，有的悬梁自尽！差不多哪个村庄都有这样惨状，若以全省来说，死者更不知多少了！

集家后的部落，都得严格执行保甲制度（伪满除热河外其他都是街村制）。10家连坐为1保，10保相邻为1甲，甲上为村，村属于县。每村设一警察署或分驻所，要塞地方布置军警讨伐队，或固定的监视据点，备有各村攻守设施，层层节制，步步森严，不异天罗地网。

整个热可全省，至伪康德12年止，除隆化县外（隆化只集家一部分）全部集家，也就是把全省人民都圈在这样的人圈里了。财产的损失，人命的牺牲，真是一个不可估计的数目！至

于对人民侮辱的情况，更是不堪设想。每个部落都有一至二三个警卫室，备有刑讯看押的屋子，几乎天天有人被押，夜夜有人被侮辱。就以围墙的卡门来说，那种非人性的搜查，一般妇女都认为是一个鬼门关。天天必须经过，经常受到警卫人员的耍戏。偶一触动这些豺狼，就被提到关押室内，百般侮辱，莫可言状！被关押人有的被折磨死，有的忍辱自绝。但这些兽类还不以为足，有时插圈弄套，夺人妻女。试看警卫人员，或讨伐队的头头脑脑，谁不是三妻两妾呢？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越这样做，和人民的结怨越深，而八路军的行动就越得劲。结果，把集家变成了给八路军的让路工作。遍野无人可以任意出入，地点集中攻击的目标非常好找。用粮即到部落攻取，用枪械弹药即向警察署所提拿。今天这里陷落，明天那处被包围，致使鬼子顾不了头脚。不得已他们就在各部落大量屯驻日满军警，殊不知进时容易退时难，多数都被八路军困在部落的核心，周围埋伏许多地雷炸药。仅用少数人提防，他们就不敢出越围墙一步。如此圈人竟成了圈已。

（四）血腥的三光政策

三光政策是日本鬼子穷途末路的一着，也是热河省坚壁清野中最后的丑态。他们的目的是，宁可把热河省人民杀绝，不让八路军进犯雷池一步，决心是很大的。殊不知历史的发展规律，早已注定了帝国主义者必死的命运，这些垂死挣扎又何济于事呢？

约在伪康德七八年以后，尤其是伪满末年，驻在热河省的西南防卫司令部和伪热河省军政当局，曾一再奉行日本关东军的命令，伪满国务院的指示，必须把热河省的八路军铲草除根，否则就以军法从事。这一严格的要求，就冲起了魑魅魍魉——伪日满军的凶头凶脑，动起无恶不作的屠刀，用着他们所称的

三无政策，群众所遭的三光暴行。何谓三无？就是使热河全省境地，无八路军的踪影，无通匪的人员，无资匪的财物……。有则杀光、烧光、抢光，所以人们管他叫三光政策。他们为完成这段政策，把在东边道大显凶手的“岸谷隆一郎”，由国务院地方处长，调任热省特任（一般省次长是简任）。他又把他豢养的爪牙警察讨伐队程臧部队、范文部队、鹏飞部队、徐景部队、陈天部队等调到热河。再加上日冠伪军，不下十来万人，组成西部防卫的攻势，也就是三光政策大型集团的刽子手。他们的分工是以行政警宪深入各村搜根摸底，洗清思想，以日伪军讨伐队，展开扫荡，洗光山野；以司法特务，毒刑论罪，洗净“匪源”。进一部落清一部落，见一“坏人”杀一“坏人”。何谓坏人？凡财产少，以劳动为生，光棍汉，或捎带民族气节的人都属于这个范畴。见着这种人，就得追踪问底决不放松，偶有破绽，即行烧杀，认可错杀、错烧、错抢，不可不杀不烧不抢。少杀少烧少抢者无功；不杀不烧不抢者有罪。什么罪呢？不是通匪，就是思想须要矫正，要送法院关押或关在矫正院。一经触犯，就决不赦免。各地配有日本宪兵队，从侧面监视，无论哪个讨伐队人，都得走这条杀人放火的道路。特别是凶残屠暴的刽子手程臧伪警察讨伐队，不但尽可能的杀人放火，还借机大肆抢掠，每人都发了一笔横财。有一位名叫“阿部军副”的，就是指挥官，别号“大鬼头”，曾以卖棉被絮钱向本国邮寄。他还有个兽性嗜好，专门搜集妇女花枕、衬衣、裤袄、小娃用物之类的东西，所以人们又都暗地称他为猪八戒。他又是一个极凶恶极残忍的野兽，他在滦平县烟筒梁一带讨伐时，吃过人心，喝过人血。如是形形色色不止阿部一个人，一般日本鬼子和丧心病狂的伪警察多数是这样。至于大型屠杀的情形，更是有甚于无人区的扫荡和集家工作的凶残，天天以汽车大车络绎不绝地

向承德三大杀人窟送人，日日可闻烧杀不绝的哀音！如青龙县玉耳崖南边一个部落，据特务腿子报告，曾住过几次八路军，这些屠夫就大发雷霆之怒，在一个早晨，鬼子军队就把这个部落围住，假称集合讲话，把全部落30余户200多人口，不论男女老幼，都驱逐到街头，用机枪射杀，接着就纵火焚烧，哀号震天。正在这时，他们又拉来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孩，就用枪挑到火堆里去了。他们还说："老八路、小八路统统的死了的好……"杀人臭气数日不绝。其他如汤河口、盘道梁、玄阳洞、茨榆沟、三义岭等沿着长城附近的山沟里劳动人家，更可想见杀了多少！烧了几何！抢去若干！原来鸡犬相闻，人烟在望，这时30里40里找不到一个人家。到处是烧杀遗迹，破户残梁。草木半生半死，山里尽变焦黑，形成一片阴森凄凉景象！

八路军为减少人民的灾难，一时暂避收兵，不大出动，鬼子们以为得计，喜上眉头，就大开庆祝第四步坚壁清野的成功。没想到仅过两个月，而东部北部的八路军就纷纷出动。部落据点，时闻陷落。伪警、伪军节节败北。鬼子大慌其神，调兵遣将，昼夜奔忙。正忙于东北的堵击，突然八路军肖克、王抗率领大军，由西部分两路攻来，西部情势倒呈紧急。弄得鬼子仓皇失措，慌作一团，垂头丧气，伎俩全无。据说西南防卫司令官稻田降职调转。永幡傺二大队长由于在围场御道口，全军被歼，破腹自杀。

这时，岸谷隆一郎竟倡出悬赏缉拿八路军首领的口号，拿获肖克为10万元，李运昌为5万元，王抗为3万元。连级以上干部由2 000元至2万元。有私报住处因以捕获者，各赏各该金的十分之一。穷途末路的日伪军，丑态毕现，这段坚壁清野政策就这样苟延至1945年"八·一五"时才收场。

（摘自《锦州文史资料》）

封锁长城的热河日本宪兵队

傅大中

“西南肃正”在1942年至1944年达到了高潮，其中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1943年最为残酷。当时受害最重的是承德、滦平、丰宁、青龙、兴隆5个靠近长城的县。这场大规模的武装镇压的最高指挥者，是关东军西南防卫军司令官。主要参加者有日伪军、警、宪、政、协和会五部分，人数在30万以上。这场讨伐中，日伪方面搬用了对通化地区讨伐的经验，并把参与策划通化地区讨伐的主要罪魁，都调到这一地区指挥讨伐。在通化大讨伐中罪恶累累的程斌、唐振东等8个通化警察大队，全部被调到热河，改编成热河警察大队，伪满宪兵总团也临时从各地抽调宪兵编成“西南特务宪兵队”。

承德宪兵队也根据讨伐的需要，改变了机构。除原设的各分队、分遣队继续保留外，1943年1月，又从作战部队抽调数百名“补助宪兵”，与宪补、宪兵补编成3个宪兵游击队，每队120余人，下设3个小队、9个分队。从全伪满挑选政治镇压经验丰富的宪兵干部出任队长、分队长。当时第一游击队长是“闻名”全伪满的日本宪兵中尉长岛玉次郎，他以古北口宪兵分队长身份指挥第一游击队在承德、滦平、兴隆等县活动，主要目标是镇压中共滦承兴县委；第二游击队以承德宪兵分队长生田为首，活动在承兴两县交界的半壁山地区，以镇压中共迁遵兴县委为主要任务；第三游击队以喜峰口分队长笠井神夫为首，重点活动在在青龙县内，以镇压中共迁青平县委为主要活动目

标。

1944年3月，日军调整了热河的兵力部署，从华北调来一个师团，接替热河独立守备队，进热河地区进行讨伐。该师团长接任西南防卫军司令官后，根据热河地区的特殊情况，把华北特殊警备队的组织活动方式移入到热河，重新改组了热河的宪兵组织。

首先他将承德宪兵队原有的承德、青龙、喜峰口、赤峰、平泉、古北口5个分队的兵力压缩，使其专门担当军事警察业务。同时在交通要道，"治安不良"地区的茶棚、宽城、双山、峪耳崖、琉璃庙、白城子、马兰峪、叶伯寿、上谷、凌源等地设立了宪兵分遣队，由承德宪兵队本部统一指挥，配合宪兵特别警备小队活动，这些宪兵派遣队以后都改编成宪兵分遣队。

同时，又将3个宪兵游击队编成8个特别警备小队，每队50人，下设3个分队9个组，全部改成轻装，专门对付八路军的小股部队和中共地下县委的干部。1944年改编后的宪兵特别警备小队配备情况如下：

第一小队：队长　承德分队长笠井神夫中尉兼，主要活动在喀左旗和凌源地区。

第二小队：队长　古北口分队长长岛玉次郎中尉兼，主要在喀中黄土梁子一带活动。

第三小队：队长　赤峰分队长百鸟少尉兼，主要在青龙县、宽城子地区活动。

第四小队：队长　青龙（喜峰口）宪兵分队长佐佐木宪兵少尉兼，在青龙地区活动。

第五小队：队长　青龙宪兵队附高山准尉兼，在青龙县双山子一带活动。

第六小队：队长　平泉宪兵分遣队木下宪兵准尉兼，在喀

左、宁城地区活动。

第七小队：队长　承德宪兵分队附仓岗准尉兼，在承德地区活动。

第八小队：不清楚。

1943年6月，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木村光明，还与西南防卫军参谋、热河省警备厅特高科长、协和会事务等人，共同策划了对“家理教”的收买活动。历史上由于热河地区是蒙汉民族杂居区，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导致“家理教”、“红枪会”一类邪教团体在这一地区民众中有相当的影响。承德宪兵队为利用这些邪教团体配合讨伐和镇压活动，决定对其进行收买，结果承德宪兵队将“家理教”的20余名头目都收买成特务班长，责令热河省协和会和警务厅为其提供经费，指挥他们大力发展教徒，以此搜集八路军和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情报。

“西南肃正”期间，日伪警宪配合军事讨伐，在这一地区疯狂地进行搜捕、抓人，制造了无数起血案，承德宪兵队便是其元凶罪魁。承德宪兵队直接参与指挥的重大血案有：

一、半壁山地区的三次大逮捕

半壁山地区位于兴隆县东南部的五指山下，是八路军晋察冀第十三分军区在冀热边开辟的五指山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39年这一地区就是敌后游击区。1940年3月，中共迁遵兴联合县委成立后，领导该地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在这一地区，村村都有中共的基层组织，大部分村庄都建立了两面政权，少数村庄还建立了抗日武装，抗日民众配合敌后政权征粮征物，转储物资，坚壁清野；配合主力部队破坏日伪的交通，传递情报，开展游击战争。因此，这一地区也成了“西南肃正”中日伪讨伐的重点。在1942年、1943年、

1944年三个春节，承德宪兵队在日伪军警的配合下，利用中国人民在家过春节的民族风俗，连续进行了3次大逮捕，据统计有1 890名群众被捕，数百人被处死。

1942年旧历腊月二十五开始的第一次大逮捕，是喜峰口宪兵分队直接指挥的。在此之前，喜峰口分队指挥伪半壁山警察署派出大量便衣特务潜入到这一地区，对抗日家属、区村干部、进步人士、接近八路军者、积极交公粮的人等进行调查，之后在大批日伪军警的配合下，将这一地区的各个村庄包围，宪兵按名单抓人，然后送兴隆特别治安庭审判。这次镇压相当残酷，共有五六百人被捕，近百人被处死。余者多被课以重刑后，押到东北各地做劳工。第二次大逮捕是在1943年旧历腊月二十九至正月初进行，逮捕的方式和第一次相同。由于这一年是“西南肃正”最残酷的一年，因此这次在半壁山地区的逮捕也最为残酷，有九百多人被捕。锦州特别治安庭派出人员在当地设置“临时治安庭”，随抓随开庭审判。不出数日，即有百余人被审判处死刑，由宪兵和警察就地进行集体屠杀。第三次大逮捕是在1944年旧历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四进行的。在这次大逮捕中，敌人采用了和前两次完全不同的作法，见到中国人就抓，尤其是在靠近长城的靳杖子、冷嘴头、赵杖子等村最为残酷，其中仅靳杖子一村就有100多人被捕。这次大逮捕，半壁山地区数十个村庄无一幸免，共有一千三四百人被捕。

据当地调查证实，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屠杀暴行令人发指，被杀绝斩尽的不下几十户，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不满周岁的儿童，以至哑巴、残疾人都无一幸免。由于屠杀在兰旗营村造成了“万人坑”，在大莫峪村造成了“寡妇庄”，1944年以后，这一地区成了无人区。

二、九虎岭惨案

九虎岭村位于青龙县西部的迁青平抗日根据地内。1941 年以后中共冀东党分委领导下的迁青平联合县委经常在这地区活动。在九岭虎岭村中有一个仅有30 来户的小庄叫九虎岭庄，1942 年7 月和1943 年1 月，曾两次受到日寇的血洗，数次遭到劫难，其中1943 年1 月的一次最为悲惨。

这年1 月，喜峰口宪兵分队宽城子派遣队的密探侦知，八路军迁青平县委正在九虎岭村开会，承德宪兵队长收到喜峰口宪兵分队长的报告后，鉴于这一带抗日武装的强大，遂立即从承德、古北口两地调集了100 余名宪兵，加之喜峰口分队的60 余名宪兵，联合组成搜索队，在本部特高课长木村光明的带领下，连夜便装将九虎岭庄包围。由于县委干部撤走，宪兵遂对民众采取了残忍的报复手段。抓捕了19 人，将14 人当场杀害。其残害的手段令人发指：有的被打碎下颌致死；有的被按在地上挖去双眼；有的被挖去心；有的被塞进冰窟窿；有的用三角尖木棍穿透胸膛钉在地上钉死。宪兵在过堂审讯时，使用的手段更加残酷：有的被烧红的烙铁烙掉了鼻子，有的被烙得露出了天灵盖骨；不仅对成年人如此，对未满周岁的婴儿也不放过，村民刘文振8 个月的小孩，被日本宪兵从其母亲的怀里夺去，活活摔死。由于日寇的残暴杀戮，这个仅30 来户的小村庄就绝户了7 家。

三、“二·一”惨案

“二·一”惨案是1943 年春节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今河北省承德县鹰手营子、南双庙、三道河子、大杖子、东涝洼、苇子岭等14 个村庄制造的一起骇人听闻的大惨案。承德宪兵队宪

兵，驻下板城日军讨伐队和伪承德县警务科警务讨伐队分三股以清乡为名，同时将上述14个村庄包围，上千人被捕，数百人被判刑，254人被残杀致死。在这次惨案中，由于亲人被害造成孤寡愁病、无法生活而死去者又达600多人，遭劫后的14个村庄，有近60户人家死绝；致伤、致残者更是无法统计。这一带是家家有血恨，户户有怨魂。

"二·一"惨案发生地，位于承德南部的五指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内，这里从1938年起就是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游击区，14个村庄的人民为抵御外侮，很早就参加了抗日活动。1940年以后，这里属中共迁遵兴联合县委第十三区管辖，是雾灵山抗日根据地与冀东抗日根据地秘密联络的一条交通要道。

1943年初，十三区抗日干部在胖和尚村开会时被日寇讨伐队包围，突围中区文书高云峰同志不幸牺牲，身上携带的各村干部名单被敌人得到，"二·一"惨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承德宪兵队是这次惨案的最大罪魁祸首，在逮捕前，特高课长木树光明将各地活动的近600名宪兵、宪补、宪兵补和补助宪兵集中到了这里，在1月31日晚和2月1日晨分别将14个村中的7个重点村庄包围。上至60多岁以上的老人，下至15岁的少年，只要是男人都三五个用绳子捆在一起，按掌握的村干部名单抓人，然后追查谁给八路军送过公粮，做过鞋，传过信，站过岗。经过四五天的血腥拷问后，2月6日（大年初二）将一部分认为是重点的人物押送到承德监狱，一部分押到靳杖子村东头杀害，杀害时还拉去了很多人陪榜。其余的青壮年都押送到东北各地当劳工。承德宪兵队搜捕的7个村庄中，以鹰手营子、东涝洼、南双庙3个村最惨，其中东涝洼村在2月1日被抓到靳仗子的129人中，有2人被当场杀死，74人被押到承德处死和判刑，被判刑者光复后仅有17人有幸生还。全村共120户人家，死绝了

20户。南双庙村被押到靳杖子的110人中，85人被送到承德审判，其中6人被判死刑，1人被刑讯打死，余者被判刑后送到本溪、丹东、阜新当劳工，光复后仅有8个逃回，其他人全部葬身他乡，全村80户人家，死绝了14户，400多口人剩下不到一半。鹰手营、南双庙、东涝洼村成了当地闻名的“寡妇村”。

“西南肃正”期间，承德宪兵队除直接参与制造了上述几起大惨案外，在最残酷的1943年还指挥了全热河的日伪警察，两次对中共地下组织和外围团体进行了大逮捕，敌人将这两次活动称之为“剔抉”工作。据伪热河省警务厅长皆川富之亟向伪警务总局长山田俊介的报告：第一次大逮捕是在9月11日到9月27日进行，主要对象是承德东南部和兴隆县东部的迁遵兴联合县委；青龙县西部的迁青平联合县委；青龙东南部的青绥凌联合县委和平泉西南部的承平宁联合县委。由承德、古北口、喜峰口分队和平泉分遣队分别指挥上述4个地区的伪满警察、伪满宪兵、铁警在日伪军的配合下进行。第一次“剔抉”总共逮捕了958人，其中456人被送伪法院判刑。第二次大逮捕是在10月6日到10月19日进行，这次除继续在第一次逮捕的地区重新逮捕外，喜峰口分队还将逮捕范围扩展到了长城以南的迁安县滦阳、铁门关和碾子岭等地区。第二次“剔抉”总共逮捕了292人，其中68人被送到伪高等法院判刑。

“西南肃正”中，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的是军、警、宪、特、行政、司法、协和会等机构联合镇压的办法。伪锦州省高等检察厅和高等法院配合讨伐，在热河很多地方设立了“临时特别治安庭”，对逮捕的抗日军民随时起诉，随时开庭，一审判决。当时伪锦州高等法院在讨伐最残酷的青龙、宽城、喜峰口、平泉、半壁山、鹰手营子等地，都开设过“临时特别治安庭”，审判后将判处死刑的人，随时交给当地日本宪兵就地屠杀。

"西南肃正"中，日本法西斯为彻底割断人民群众和八路军的血肉联系，疯狂地推行了"集团部落"政策，热河的广大地区被划成无人区，严禁老百姓进入。1943年以后，承德宪兵队还编成了宪兵游击队，在长城两侧的无人区进行游动搜捕，发现有人脱离"集团部落"进入无人区活动，就当即杀死。下面是日本和歌县人岛津西二郎于1954年8月16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一段供述。他1942年来到中国，1943年时是承德宪兵队所属长岛玉次郎部下的第一宪兵游击队宪兵伍长，他说：

"1943年11月15日，我们长岛游击队第一小队在河北省密云县兵马营西北方活动，逮捕了1名怀疑是八路军联络员的行商，我对其进行了审问，该商闭口不答，小野曹长当即命令我等7人对其刑讯拷打，我将这名行商打倒后，用他自带的扁担压在他脖子上，用脚踩着两头，一直把这个人压死。"

"1944年2月20日，我们在密云县东南地区活动，夜12点左右，见有一农民在耕田，长岛队长认为此人在夜间耕田稀奇，可能是八路军的联络员，故命令将其逮捕杀死，当我持刀去砍杀时，该人已被别人砍倒，正在痛苦挣扎，我又连砍了几刀，将该人杀死。"

"1945年6月，我们在遵化县马兰峪南搜索时，发现了一对新婚夫妇，我指挥部下将他们逮捕先打成半死状态，然后将男的拉到田中用军刀杀死，女的交给新兵练刺杀，但女的用手抓住刺刀不放，新兵不能刺中，于是我上前将这个女人摔倒，用军刀砍了她的脖子，将她斩杀。"

从这个宪兵伍长血淋淋的供述中，就可想而知宪兵在热河地区的残忍凶暴。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按计划承德宪兵队和特务机关要被改编成关东军第3特别警备队第6大队，准备配合关东

军第4方面军阻击从外蒙和中苏西部国境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为关东军主力撤至通化、朝鲜一线后，在苏军占领地开展游击战。但由于苏军迅速进入东北，承德宪兵队还未来得及改编完，就随日本投降而被解除了武装。

兴隆惨案

朱呈云

一、大灰窑惨案

在兴隆县城南土门东山的山坳里，有一座象山丘般的坟墓，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用枪弹和刺刀一次杀害我一百二十多名无辜同胞，用尸骨堆起的“肉丘坟”。

1942年1月，兴隆县的抗日斗争，由深山区扩展到平川，直至县城和敌人据点附近。我抗日军民经常出没在县城和敌据点附近，秘密投放《救国报》和抗日传单，宣传我党抗日主张，鼓舞群众斗志，分化瓦解敌人，扰得敌人坐卧不宁，心神不安。伪兴隆县日本副县长西山密令宪兵、特务和警察四出活动，加紧在县城附近戒备巡逻，随时搜查可疑之人，抓捕入狱。

2月1日，正是农历腊月十六，逢兴隆县城的集日，有成千上万的人去城里赶集，准备过年。这天县城里的宪兵、特务和警察也四处活动，遇有可疑之人，即抓捕入狱。有个名叫马祥瑞的农民，从兴隆城东大灰窑沟里走出山来去县城赶集，刚行至小东区村边，就看到驻在天主教堂院内的一伙特务，在拦路搜查赶集的人。马祥瑞这天身上带有几十元钱，用一张旧报纸把钱包好，藏在腰中准备进城买些过年物品。他怕被特务们搜

去，就悄悄地溜下大路，沿着一片杨树林绕道而行，想借此逃避特务搜身之害。他刚走到一个小河边，就被特务们发现了。一个特务小头目命令鸣枪拦击，马祥瑞被打倒在冰上。特务们把马祥瑞连拖带拉，扯到河岸，进行人身搜查。除把马祥瑞身上买年货的几十元钱搜出以外，还搜出了包钱的那张旧报纸。特务们一见报纸是抗日救国报纸，如获至宝，赶忙送到日本副县长那里报功。西山一见到送到眼前的报纸，以为真的抓住了共产党，要亲自审理。西山到了临时监狱，马祥瑞已经停止了呼吸。他见再也无法审出口供，就命令宪兵队、特搜班和武装警察，明日拂晓前对马祥瑞的家乡——大灰窑沟进行大搜捕。

2月2日凌晨（农历腊月十七日），兴隆县宪兵队、特搜班和武装警察共100多人，按照日本副县长西山搜捕大灰窑沟的命令，荷枪实弹把大灰窑沟围了个水泄不通，挨门挨户地进行搜捕。在几个小时的时间就抓捕了大灰窑沟无辜群众140多人。他们把这些被抓捕的群众，一个个捆绑起来，排成一条长队，在宪兵队、特搜班和伪警察棍棒、刺刀押解下，关押在县城临时监狱内。日本副县长西山亲临现场，坐镇审问，一定要问出共产党的下落。可是尽管敌人对这些无辜的群众用尽了各种酷刑，也没得到任何结果。日本副县长西山见用强硬手段达不到目的，就改用软的招术，想从甲长、牌长中打开缺口。这些甲长、牌长也看穿了他们的鬼把戏，都以理争辩说："大灰窑沟山穷地薄，老百姓土里刨食，腹中饥饿，还缴粮纳税，从无二心。如果这里出了差错，应当由我们头行人承担，民众没有责任，理应放走被抓捕的农民。"鬼子费尽心机，全不奏效。嗜杀成性的日本副县长西山再也按捺不住，霍地站起来，气得大声嚎叫道："大灰窑沟山高地狭，全是刁民，勾结八路，毒化太深，硬的不招，软的不认，背离皇军，坏了良心，统统处决，根除祸根！"言罢，

拂袖而去。

日本副县长西山走后，被敌人抓捕的群众知道大难即将临头，有的向敌人冲去，要与敌人厮拚；有的咬破舌唇用鲜血向敌人猛喷。群众的这一行动，弄得敌人手足无措，慌忙调动日本警备司令部的军队，从人群中拉出80多人，押解到县城南土门东山的万人坑。这个万人坑是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场所。这天，鬼子在万人坑四周布好了警戒，四周架起十几挺机枪。敌人把大灰窑沟群众围在中间，几架机枪同时射击，八十多名无辜群众全部惨遭杀害，无一幸免。接着，敌人又从监狱里拖出其他村的群众40多人，也全部杀害。被害者的亲属和附近居民来收领尸骨时，都无法一一分辨，只好把120多人埋成一个坟墓，群众称之为“肉丘坟”。

这次大屠杀后，大灰窑沟其余的60多人，一个月后都以私通八路的罪名，被关进热河监狱。

二、大磨峪惨案

大磨峪位于兴隆县东南120华里的长城北侧，是个仅有42户的小山村。

1943年2月7日的夜晚（即农历正月初三日），大磨峪村民曹万章去洒河南岸马圈子村一个亲友家去拜年。他刚走到村口外的公路旁，就听到从半壁山方向传来脚步声。曹万章为了减少麻烦，暂时躲到路旁的一个壕沟里。只见有个人由远而近悄悄地向大磨峪村而来。这个人不走大路，直下壕沟，正巧走到曹万章身前，差一点儿踏到曹万章的前额。这时，曹万章猛然踏起，大声问道：“你是什么人?”

来人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吓得浑身打颤，结结巴巴地回答：“我是半壁山的王特工。”稍停片刻，这个家伙反问一句：

"你是什么人?"

曹万章听说是半壁山据点的特务，恨得火冒三丈，他强压怒火，来了个随机应变，回答说:"我是兰旗营据点的警察，今夜派我到这里巡视。"说着，猛地向前扑去，想把特务生擒。没想到这个特务早有提防，一个急转身，躲过了曹万章，然后对准黑影连击数枪，仓皇逃去。

兰旗营据点离大磨峪仅五华里，那里驻着沙鼎警察讨伐大队。他们深夜听到大磨峪方向有枪声，立即来了个紧急集合，派遣200多名伪军，全副武装，把大磨峪包围得水泄不通。村里的人们，听到村南枪声响，又见敌人围了村，察觉到形势不妙，青壮年们有的藏在干草垛里，有的钻进柴禾堆里，暂时隐蔽起来。这群丧尽天良的狗强盗，提着灯笼，挨门挨户搜查可疑之人。足足搜了半个小时，没见到一个男性青壮年，更起了疑心，于是兽性发作，放火烧村。

顿时，整个山村化为一片火海。妇女和儿童被烧得焦头烂额，四处奔跑，连呼救命。

干草堆和柴禾垛也都被点着了，藏在里面的男性青壮年，被烧着了衣服。他们再也忍不下去了，一个个从火堆里跳出来，有的拿起木棍，有的操起木柴，与敌人拚命。但是这些手无寸铁的农民，在强敌面前，最后终难脱险，有73名群众遭抓捕。他们被敌人用绳索捆得紧紧的，押到兰旗营据点沙鼎队部。到了伪沙鼎队部，这些伪军请来日本宪兵队残害自己的同胞。日本宪兵队对这些无辜的百姓，用皮鞋踢，木板打，灌辣椒水，烧红烙铁烙，逼问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谁为八路军办事?有一个姓梁的哑巴，被追逼审问，一声不吭。日本宪兵断定这个哑吧是装的，就用烧红的烙铁烙他。梁哑巴一见红烙铁急了眼，怒目圆睁，哇哇乱叫，猛地一脚，把烙铁踢出老远，正好踢在

一个日本宪兵队长的脸上，把这个宪兵的一只眼给烧瞎了。敌人经过一天的严刑烤打，没得到什么结果，最后把一些群众押到兰旗营村南一个土坎下，用刺刀挑死32人（这天其他村庄被抓捕群众遭杀害80多人，总共杀死110多人）。还有的被解到兴隆、承德、锦州、本溪等地，被处死40人，仅有一人在日本投降后幸存。大磨峪一个小小山村，这次遭杀害的达72人，其中8户被杀绝，有30户丧失了男人，成为又一个“寡妇村”。

惨案过后，因烧伤致残、无钱医治又死去24人，病魔和冻饿而死62人，被日本宪兵、特务逼迫致死8人。到日本侵略者投降时止，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在一个42户的小山村，就死掉106人。幸存者只有老少残疾41人，死去80%以上。真是家家戴孝，户户哭声，泪水成河，血染山村。

三、楸木村惨案

楸木村，位于兴隆县城东南100华里处的一个山脚下。这里住着55户人家，都是被日本侵略者赶下山的新迁户。这些住户从1938年开始，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自愿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活动。一些年轻人经常利用深夜有利时机，悄悄地走出家门，来到公路两旁割电线，破坏交通，抓特务，捕汉奸，抗日工作搞得很活跃，使敌伪寝食不安，坐卧不宁。

伪兴隆县日本宪兵队长潘大胡子见楸木村一带总有抗日活动，就在1943年1月下旬亲自派遣200多日本侵略军，对楸木村北部山区进行“扫荡”。偏巧正逢我冀东八路军十三团一部由关内转战关外在这里休整。指战员见日本侵略者进山“扫荡”，一个个怒不可遏，纷纷请战要求歼灭这伙送上门的敌人。指挥员根据广大抗日军民的意见，决定在楸木村北山伏击敌人。

6

当日本侵略军进入我部的伏击圈后，军民协力，密切配合，来了个关门打狗。只半个多小时的紧张战斗，就歼灭日本侵略者80多名，其余敌人狼狈逃窜。

日本宪兵队长潘大胡子，见这次“扫荡”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亏了老本，恼羞成怒，发誓要血洗楸木村。他命令日本宪兵队再度“讨伐”，见到楸木村的青壮年，只要是有气的，一律抓捕，押至县城，亲自处理。

1943年2月9日，这天正是农历正月初五。就在这天深夜，兴隆县城和半壁山据点的300多日本侵略军，偷偷地包围了这个山村。10日，天刚蒙蒙亮，楸木村的众百姓尚未起床，敌人端着上了刺刀的钢枪，挨门挨户地抓人捕人。温老二是个暴性小伙子，他知道被日军抓捕后有死无生，就空手和敌人夺枪，全身被刺刀扎得血肉模糊，遍体皆伤，至死瞪着仇恨的目光。有个姓白的小青年，用木棒与敌人拚搏，打死了1个日本兵，最后壮烈献身。这一天，日本侵略军在楸木村这个小小山村，一次抓走99人，其中男青壮年几乎被抓绝，占全村210人的47%。他们一个个被敌人用绳子捆绑得很紧，装上4辆汽车，押往兴隆县城。头两辆车里的56人，被送进监狱。

被抓走的人受尽严刑拷打，最后都死在兴隆和承德；后两辆车里的43人，直接押到距县城1公里的南土门东沟，敌人把他们从汽车上一个个地抛下来，排成几行，被重兵包围着。日本宪兵队长潘大胡子亲临杀场，好似一条吃人的豺狼。他站在队伍之前，声音嘶哑地嚎叫着：“统统地枪毙！”这时，鬼子的十多挺机枪对准这些无辜的群众，疯狂地扫射起来，当场打死42人。有1人中弹后没有死，深夜逃回家里，但因伤势过重，无钱医治，不到10天，就停止了呼吸。

就在2月10日这一天，楸木村总共有101人被惨杀。使一

个55户、210人的小山村，有10户被杀绝，21户丧失了男人，使兴隆县又多了一个“寡妇村”。

（摘自《河北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兴隆境内的“无人区”

史　光

兴隆县北靠雾灵山，南环万里长城，隔一带雄关，与迁西、遵化、蓟县、平谷、密云五县接壤，是联系冀东、热南的战略要地之一。1933年，日军侵占兴隆后，即派关东军第八师团第三十一联队沿长城驻守。1934年就把这里划为伪满洲国的“西南国境”。

1940年，日伪当局指令在西南国境试行“治安肃正政策”（即制造“无人区”，推行“三光政策”）。为此，日伪在锦州成立了“西南防卫司令部”，并将在“东满”推行“治安肃正”有功的日伪头目调到热河，充任要职。接着，就宣布兴隆县进入“非常时期”，实行“集家并村”，搞大“检举”，大逮捕，大屠杀。

1942年1月下旬，敌人在大川各村进行了全县规模的大“检举”。几天之内，就逮捕了2000多人，屠杀了400多人，其中在兴隆街南土门山沟就集体屠杀200多人。没有杀害的被运至东北各地充当劳工，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洒河川上的楸木林村，仅80多户，被抓走百余名男人。这些人被押到兴隆街南土门山沟，日寇用10多挺机枪扫射，100人当场死亡，仅1人夜间逃出，因伤重死在家里。从此，楸木林成了“寡妇庄”。

1942年春，敌人秘密策划"无住禁作地带"(即"无人区")，和集家部落（老乡叫"人圈"）。1942年秋，日伪军警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开始推行集家并村，他们强迫居民搬进大村，谁要不搬，便烧毁房屋，并以"通八路"治罪。入冬后，日伪军多次到"无人区"扫荡，见着居民就杀光，见着房子就烧光，见着财物就抢光。前干涧村有19人被围住，日寇将我男女乡亲全身扒个精光，用木棍乱打，然后又把他（她）们扔到萝卜窖里，点着干柴，全部薰死。敌人在清水湖村的一个小山沟，光是小孩就杀死48人。全县被残杀的群众达数千人。

1943年2月初，敌人又在大川各村进行了第二次全县规模的大"检举"，逮捕四千多人。在县内屠杀数百名，其余全部送往东北各地当劳工。2月4日夜，敌人将洒河川上的大莫峪村包围。这个村五十多户，除3名男子逃走外，其余七十多名男子全被敌人绑押到兰旗营子村（警察讨伐队队部和警察分驻所所在地），挨个过堂审讯，有的用火烧，有的用刀砍。农民张凤阳被吊打时挣断了绳子，抓起劈柴朝敌人打去，然后逃走，正在越墙时被鬼子赶上，用刺刀挑死。这七十多名农民全被敌人打死，尸体垛成垛。自此，大莫峪也成了"寡妇村"。高台子、灰窑峪是临近龙井关的两个小自然村。一天，日寇和警察突然包围了这两个村。两村的青壮年男人七十多名全部被抓走，后来一直下落不明。

1943年4月至6月，敌人倾巢而出，疯狂地搞了3个月全县大集家。敌人杀人放火，烧房拆屋，白天百里烟，黑夜千山火，白色恐怖笼罩着千家万户。全县近一半地区被划为"无人区"，16万亩以上的耕地禁止耕种（全县耕地约40万亩），毁了二千多个村庄，将12万口人赶进199座"人圈"（占全县16万人口的75%）。

日寇制造的“人圈”，就是在公路旁的平地上，划上一个大圈子，强迫被“扫荡”下山的人们和平川居民在指定的圈子里盖简易房子居住。并命令“人圈”里10岁以上的男女居民一律先修“人圈”墙和炮楼。“人圈”墙宽5尺，高1.2丈。圈墙设4门，有警察站岗放哨，白天开门，晚上关门。围墙四角均盖有炮楼。围墙外，挖了大壕沟，架起铁丝网。围墙内，沿着墙根，修一环形巡逻道。“人圈”中有正街一条，纵横交错许多8尺宽的小胡同。每家居民均给三间小房的盖房处，房子宽不超过1.5丈，院子宽只有8尺。家家都是厕所、猪圈紧挨着正屋窗户。

每个“人圈”常驻10名至50名警察。他们把“人圈”居民编成“自卫团”或叫“灭共义勇队”。发给每个18岁至35岁的男子大枪1支，子弹50发。发给每个35岁至50岁的男子火枪1支，火药2斤。发给每个青壮年妇女扎枪1支。在警察监督下，让居民们站岗放哨，配合夜间巡逻。夜间让巡逻者手敲木梆，此敲彼应，彻夜不绝。

“人圈”内的农民凭“居住证明书”在规定时间内出部落门，在租种的土地上做活。如赶集、串亲迟归者，必须请假挂号。情况稍紧，常是多少天不开大门，居民没有一点自由。警察特务每夜都挨门清查户口，见着年轻妇女就强奸，见着财物就掠夺，见着猪、鸡就抓去吃掉。

“人圈”里居民的生活用品，美其名曰“配给”。每年每户洋布7.5尺，每人一年白面1.8斤，豆油4两，每人每月盐7.5两，每户每月火1柴盒。此外，还配给少得可怜的一点碱、糖、大米等。这些配给品，经过县、村、甲、排层层克扣，发到居民手里时就很少了。农民没有火柴用，只好用火石打火和保存火种。没有灯油，就用松柴照明（当地百姓叫油松明子），薰得人们鼻子、眼睛等处都是一片黑。许多居民全家只有一条裤子，

谁出门谁穿。我工作人员化装进“人圈”，常见到农民许多人在火炕上围被而坐，只有一个妇女给做饭烧水。当时曾经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大好山河敌侵占，烧杀抢掠修人圈，死走逃亡家破产，十七八的姑娘没裤穿。”

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消耗，使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危机日益加深，随之，日寇对“人圈”里的农民的压榨也日趋残酷。

仅粮食租税，就有六项。合计每亩地年缴粮78斤。当时，贫农、中农生活无路，耕作粗放，又遭自然灾害，平均亩产粮食不足百斤。农民缴了苛捐，所剩无几，为了生存，不得不向地主、富农借债。

“人圈”里的居民，很快出现了“四多”。即：讨饭的多，病死的多，吃糠咽菜的多，披麻片、光肩膀、露乳房的多。

此外，在“人圈”里，警察、特务时时监视居民。他们巧立罪名，任意抓人入狱。见到两三人结伙闲谈或夜间点灯唠嗑，家中有茶缸、小铁锅、灰色和草绿色衣服，衣服超过5个扣子，布鞋超过2双，出外做农活日落后归圈等，皆以“通八路”罪名列为思想犯，抓入监狱。家中存有中华民国书籍，书写的抗日语句，搜出无证明书的人、枪支弹药、八路军粮票等，皆以共产党员罪名列为政治犯逮捕入狱。家中存有大米、白面、纸烟、手电等物品，皆列为经济犯入狱。

我抗日政府做过一次统计，1942年1月至1943年12月，全县被日寇“检举”入狱死亡的达一万二千多人。1943年“人圈”里发生了伤寒病等瘟疫，死亡6000多人，厂沟“人圈”700人，两年就死亡265口，占人口总数的38%。真是无村不戴孝，处处有哭声。日寇制造的“人圈”，简直是人间地狱。

1944年，德、意法西斯战争失利，日军在各个战场也陷入

被动局面。为了控制摇摇欲坠的200座“人圈”，半年内，敌人策划了两次大“检举”。

敌人嗅到“人圈”并未切断广大人民群众与八路军、游击队的联系，非常仇视洒河、横河一带居民。1944年2月（旧历腊月二十八日至正月四日），他们在各个“人圈”里进行了第三次全县规模的大“检举”。兴隆日本宪兵队曾向锦州“西南防卫”司令呈报情况说，洒河流域一带（主要指迁、遵、兴县八区）居民“完全当八路匪，没有好人”。因而，伪锦州军事特别法庭人员于旧历正月初二日，秘密到达洒河川兰旗营子“人圈”，当日即将“人圈”内的烟绳搜寻一空。初二夜，大批日伪军警在全县的“人圈”里逮捕2000多人。最残酷的是兰旗营附近的一些“人圈”，被捕的数百人全部被捆绑押进兰旗营，几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直到正月初八日午后，才给每人两碗粥吃。军事特别法庭的日寇就地过堂，手持墨笔，在每个被刑讯逼问的人的鼻梁上点点，有的点红点，有的点蓝点。假说点蓝点的人释放。于是就将鼻子上点蓝点的120人带到“人圈”外的西下坡，用多挺机枪扫射，将这些人全部打死。这次大“检举”，在全县各地屠杀几百人，其余全部送往东北充当劳工。

1944年6月间，在全县进行第四次大“检举”，即所谓“投匪家族大检举”。敌人将所有“人圈”内的八路军和地方革命干部的家属，不分男女老幼全部逮捕。据不完全统计，共逮捕500人之多。经过野蛮地拷打和污辱，又全部运往东北充当劳工。

1944年初，敌人发觉我冀热地区党委、军分区等领导机关在五指山楼上村一带，便集中两万多日伪军警包围我黑河川，狂妄叫喊要“消灭八路军，活捉李运昌”。边区党委派组织部长苏林宴和十一团团长赵文晋率千余名战士从五指山冲出，用重武器沉重打击敌人，诱敌西上。日军果然上当。我十一团利用有

利条件，牵着敌人鼻子绕了一圈，打了一次胜利的游击战，然后绕车河，渡滦河，又与我领导机关会合。敌人扑空，以1万多兵力“扫荡”我八区根据地黑河川、中田、驴叫、西首等地，又以5 000兵力“扫荡”我大小黄崖根据地。敌人搞“铁壁合围”，带着帐篷，住在山上，扬言要把“无人区”的每块石头都翻过来。由于敌人野兽般地连续“扫荡”，我根据地居民牺牲3000多人，冻饿死1000多人。中田村被“扫荡”11昼夜，被屠杀近200人。敌人围剿成功村，一次残杀30多人，将眼睛、心脏、生殖器都挖出来，真是丧尽人性，惨绝人寰。然而，中华儿女的抗日气节，是日寇永远也征服不了的。我成功村党支部组织委员、18岁的共产党员傅春，掩护60多名乡亲脱险，最后自己被敌人围住，便拉响手榴弹，英勇牺牲。黄土坡村孙连举妻，为了不暴露集体目标，将怀里刚要哭的婴儿毅然抛进山涧。黑河川有一位怀孕的妇女，为了不影响集体行动，自己躲进深山密林，在冰地上降生了一个婴儿，自己接生后起名叫“冰儿”。年轻妇女被捉住后，便被“配给”士兵。中华民族的女性是不容敌人污辱的，很多人宁可舍掉生命，也不肯屈辱偷生。全县守节而死的，不下千人。

1944年夏季，敌人再次对“无人区”实行“割青”“扫荡”。敌人进山时带着镰刀，把山里的庄稼割掉，妄图将山区人民饿死。山区人民用大量的地雷、石雷保护庄稼，与敌人展开夺粮斗争。每座山上都有消息树，敌人来了，我军民拿起枪战斗，敌人走了，我军民又拿起镐生产。敌人割了大庄稼，我们种早熟作物；敌人再割，我们再种荞麦、萝卜。当时，人民生活极其艰苦，衣服更是困难。男人赤脚光背，身穿裤衩，头戴树枝帽；妇女穿着短裤，露着肩膀。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我英雄的兴隆人民，仍坚持一边战斗，一边生产。

1945年，我们转入大反攻。到抗战胜利前夕，兴隆的根据地发展到全县总面积的70%以上，敌人制造“无人区”的企图彻底破产了。

日本侵略者制造“无人区”的3年，共计屠杀我同胞15 400人，搞“检举”抓走15 000人，除在本县集体屠杀约1 000人外，其余全部送往东北和日本内地充当劳工，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是被日寇押送到东北国境上，被强迫抢修地下军事工程，完工后全部被杀害。3年中，敌人烧毁民房7万多间，抢走大、小牲畜3万多头。1941年统计，全县有16万余人，抗战胜利后统计，只剩10万余人，合计被杀害、抓走、监禁、瘟病、冻饿等非正常死亡的就达5万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3。

（摘自《河北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日伪时期的兴隆监狱酷刑

朱呈云

兴隆县地处河北省明代长城北侧，是一个峰峦起伏、沟壑纵横的深山区。日本侵略者于1933年4月21日攻占兴隆县城后，即以长城为界，将其划归“满洲国”的版图。由伪热河第五军管区牵头，抽调日本关东军一个团、满洲军四个团、十四个武装警察讨伐大队，共两万余众，开赴兴隆县境，实行惨绝人寰的烧、杀、抢的“三光”政策。他们毁掉村庄两千多个，烧毁房屋7万多间，抢走牲畜2.5万多头，粮物无法计算，制造“无人区”面积1 301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41.7%。直接杀害无辜群众一万五千多人，其中一次枪杀10人以上惨案28

起，有大磨峪、楸木林、黄花峪成为“寡妇村”。抓捕入狱而致死一万五千多人，因冻饿和疾病而死二万五千多人。死亡人数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34%以上。有十一万多人被敌赶进218个“人圈”里，惨遭法西斯殖民统治。

日本侵略者在兴隆血债累累，罄竹难书，这里将其利用监狱残害无辜群众的野蛮酷刑记述如下：

兴隆县日伪机关授权给各警察署和日伪军，在讨伐地的各大村镇设置临时治安法庭，运用一审的终审权力，将抓捕群众就地宣判，就地处决。这样，日伪统治者从1938年始，即利用“清匪大检举”、“通匪大检举”、“投匪家族大检举”、“清乡大检举”、“反集家大检举”、“破交大检举”等繁多的名目，频繁“扫荡”，反复“围剿”，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抓捕无辜群众入狱者两万多人。敌人将群众投进在各大村镇设置的临时法庭和监狱里。在狱中，有1.5万余人被迫害致死。敌人施用的酷刑主要有：

断肠空腹。不给被关押入狱者饭吃，施以吊打手法，强迫招供。如兴特区区长任和被捕后关进兴隆特号监，多次审讯，被打得血肉淋漓，敌人不给饭吃，活活被饿死了。

倒栽莲花，也叫倒头活埋。强迫被捕入狱的人自己挖坑，然后把人的双手用绳索捆绑，头朝地，脚朝上，放在坑内，用土活埋。兴隆县监狱曾在南土门杀人场，被抓捕的无辜群众就是这样活埋的。

军犬狂舞。将被关押入狱之人双腿用绳索捆紧，然后呼来训养的狼犬，一纵一跳地扑到人们身上乱咬。1943年夏季，半壁山警察署长常大伦在大河西、槐木林抓捕群众60多人，关押在临时法庭，指使被训练的几十条军犬将人咬得血肉模糊，直至死亡。

肉滚绣球。把被捕的人衣服扒光，塞进一个内部钉满钢钉的大木箱内，然后盖上盖子，把人在钉笼中活活滚死。

电磨粉身。专门在河边设置一种磨人的电磨，把被捕的无辜群众放在电磨里，磨成肉酱致死。

枪刺布袋。把被捕的人装进布袋内，让新兵用刺刀练习刺杀，称之为试胆量。日本宪兵队队长植松酋数就多次用步枪刺杀布袋以壮胆，后来直接持刀杀人。

虾公见龙王。把被捕之人手脚捆在一起，象弯曲之虾，投入河内，将人淹死。日伪曾在滦河、洒河，用此法残害无辜群众。

开膛取心。把被抓捕的人，用战刀或刺刀挑开腹腔，取出人心。双庙据点的日本兵中川吃活人心达50多个。宪兵股长黑烟悦二也多次杀人取心煮食。

钢针刺骨。敌人审讯时，因被捕入狱的无辜群众不认罪，则用钢针或竹签往人的头顶、咽喉、手指、胸口和致命处乱刺。兴隆监狱经常施用此法把人活活扎死。

薰烧活人。敌人把被抓捕之人放进地窖里，装上干柴，放上石油，点燃后把人烧死或薰死。1941年秋，日伪军在前干涧村“扫荡”时，将抓捕的男女群众19人，扒光衣服，赶进一个萝卜窖内，将人全部活活薰死了。

木桩勒人。就是把被抓捕的群众捆绑在木桩子，用绳索活活将人勒死。

电动绞死。敌人把被抓捕的人放在绞刑架台上，扳动电纽，脚下铁板一翻，掉到陷阱内，绞索勒紧死去。

皮鞭沾水。在审讯时，用皮鞭沾凉水把被抓捕之人抽打而死。

灌辣椒水。在审讯时，强行将辣椒水或石油，灌入被抓捕

之人腹内。灌入后压杠子逼供，活活将人灌死。这种刑法，在临时法庭和监狱里，到处可见。

活剥人皮。1943年夏，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六区区长刘握抠、区干部依林，被敌抓捕后关在特号监。敌人活剥其皮，将他们致死。

坐老虎凳。在审讯被抓捕群众时，在凳子上安装铁钉子，或通上电，强行让人去坐。

梁上悬人。把被抓捕之人悬吊在木梁上追问。

背炭火炉。在审讯时，让被审之人身背烧得火红的炭炉跑步，活活把人烧死。

铁器烙人。敌人审讯被抓捕之人，往往用烧红的烙铁、火钩子烫人肉体，强迫招供。兰旗营临时法庭审讯大磨峪村一个姓梁的哑巴，因其不语，用烧红的烙铁逼供，活活将其肉体烧焦。

此外，敌人在审讯时，拳打脚踢，用木棒打，更是司空见惯之事。那个时候，敌人除枪杀被抓捕的无辜群众数以万计之外，在狱中刑讯逼供致死者也难以数计。

（摘自《河北文史资料》第四十二辑）

遵化境内的“无人区”

李永春　陆占山

遵化县境内长城沿线共61公里，日寇出于对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表示“友好”，把清东陵所在的马兰峪10公里地段划为“特区”，由伪满洲国直接管辖。下剩51公里长城沿线全划为“无住

禁作地带”。日伪抓来大批民工在长城以南5公里处，挖一条横贯东西的“防共沟”。沟宽、深各一丈左右。沟的北沿夹上树栅子——鹿砦。隔一公里修炮楼一个，重要山头、道口都有伪治安军安上据点把守。整个“防共沟”边共筑大碉堡26个，日伪约派了4个团的兵力驻扎。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可分为三种情况：最惨的是成立“部落”，即“人圈”。长城沿线东端17个村居民被赶进洪山口人圈；西端的9个村被赶进新立村人圈，把老百姓从世代居住的地方一律强行搬出，原住房统统拆掉，群众有家不能归，有地不能种，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过着非人的生活。第二种是强迫毁掉住房，赶走居民。这类村有93个。第三种是集家并村。对处于纯山区的32个村，人被撵走，房子被封，以防我军站脚。

据统计，遵化县境内无人区总面积为288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19%，包括6 680户，约31 000口人，其中落入人圈的共950户，4 600口人。

在制造无人区过程中，日寇疯狂推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除了夹击、包剿还专门组成快速部队，不论沟谷川道，还是崇山峻岭，反复搜索，所过之处，草木过刀，宅舍过火，挖洞、推墙、填死水井，把群众掩藏的最后一点粮食和财物也给抢光。日伪军限期强迫群众进人圈，稍一迟缓就见一个杀一个，还把人头悬挂在街头示众。全县无人区群众惨遭杀害的1200多人。光马蹄峪、沙坡峪、冷嘴头、北下营等10个重点村，就有647人被杀。盆楼峪的廖振富集家并村时实在没处投奔，一家老小抱头痛哭，为求活路，让妻子领着两个男孩往南走，他领着仨闺女往北走。他妻子讨饭流落外乡，廖振富爷四个活活饿死在口外。冷嘴头张森、张斌哥儿俩，多年苦熬肚攒盖上了三间房，敌人硬逼他们搬家。故土难离，结果误了期限，鬼子放火

烧了房还不算，哥儿俩也被开枪打死。寨主沟群众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舍不得离开抗日的八路军，敌人无数次的"扫荡"，烧房180多间，连马架子窝棚都不放过，前后烧过19次，他们翻盖了19次。一次赶走牛羊200多头，驴36头。掠夺的财物用170盘驮子，整运了6天。两年光景，遵化县无人区共计有112个村变为废墟。罗泉峪村处在偏僻的深山沟，连鬼子的军用地图上也找不到它。因此，那里21间住房没被发现。后来，有坏人告密，敌快速部队闻讯即大规模搜山，终于被发现。说这地方是八路军的老窝，终于给烧光了。

日寇划定的"禁作地带"，一律不准种庄稼，每当春夏之交，敌人使出最恶毒的一招——割青。群众冒生命危险种出的庄稼苗，竟给连割两三次，栽的萝卜、蔓菁、南瓜也都给铲掉。秋季地里庄稼成熟了，敌人四处抢粮，辛苦一年用血汗换来的劳动果实眼睁睁地落入敌手。头道城子的滕傑义、方平、方占相等7人，正在抢收玉米，讨伐队围上来，当场枪杀了方平、方占相，抓走的另外5人一直下落不明。

由于"三光"政策的摧残破坏，无人区人民过着极端悲惨的生活。有的没房子，竟跟牲口挤在一块儿。起初，马架子窝棚还用石块垒上围墙，老挨烧，无法垒了，只好四面通风，夏不挡雨，冬不避寒。一个山洞子往往几家同住。当时流传这样一首歌谣："百姓无出路，拆房盖草庐，七家子，八家子，同住一个'屋'……"，穴居野处延续到日本投降前夕。穿的呢，有十几岁的大姑娘没衣穿，一家子抻一条破被，轮穿一件老羊皮筒，夏天毛朝外，冬天毛朝里。实在冷得受不了，就钻柴堆取暖，拢火烤，许多人大腿上烤出硬皮茧。吃饭成了大问题。秋天还能煮青玉米、老南瓜充饥，平时只有吃野菜、野果、树叶、树皮、胡绿豆、核桃花。吃饭没碗，用碎石板、菠萝叶、窝瓜

皮对付。做饭没锅，用破锅碴、破洋桶、破钢盔代替。敌人黑夜观火，白日看烟，一缕青烟暴露出去，就可能招致日伪的清剿。老百姓想出办法，就让炊烟通过地窨散开。如果吃着饭突然发生敌情，便把"锅"、"碗"背上转移或者就地埋藏。最紧急时，群众隐蔽在洞子里，三四天不食不动。冷嘴头的何荣，年岁大，又正闹病，家里人进了口外小水泉人圈，他留在家里，临走时给做了一笼榧树叶饽饽当干粮，等过几天亲人看他，饽饽没顾得吃，何荣早饿死了。

被赶进人圈，如同陷入人间地狱。仅以新立村人圈为例，它包括9个自然村，当时530户，2 400口人，1942年秋季就成立了"部落"，四周筑起高大的围墙，围墙四角和大门口设有岗楼。凡成年的男子统统编为反共自卫团（棍团），昼夜轮流巡查。青壮年还得去修公路、筑碉堡、开矿、挖沟，打死累死没人管。

敌伪对人圈控制极严。每10户为1甲，30户为1保，全圈为1乡。成年男子发给"良民证"，只证明身份，禁止与圈外发生联系。汉奸、特务在圈内横行霸道，时常通过"检举"，把政治犯、经济犯、思想犯、偷运犯之类罪名，强加在无辜群众头上，杀人简直好比碾个蚂蚁。报国队员王雅如、张文奎，被特务盯上，敌兵包围了他们的家，以"政治犯"论罪，被枪杀。1942年大"扫荡"，伪军把新立村人圈的群众圈到太后陵附近的广场上，抓出5名所谓"可疑分子"，当众杀害。汉奸告密说陈敏、段文龙"私通八路"，被绑上扔进火堆。日寇要抓劳工了，以"检举"为名，把许多青壮年抓到外地做苦工，新立村人圈的谢振邦、金连青等31人，集体押送承德服劳役，一去未归。

兵劫、病疫紧相连，传染病给无人区带来的灾难更大。无人区的群众连衣食住全没保障，几乎丧失了起码的生存条件。污水滥流，粪便遍地，蚊蝇随处孳生，有病无医无药，造成各种

传染病蔓延。1943年夏季，鸡鸣村流行瘟疫，一下病倒百十多人。不几天，死亡50口子。人圈的情况更严重。1943年5月到8月，新立村人圈闹瘟病、霍乱、痢疾，刘福贵一家4口，没出3天都离开了人世。这个人圈因传染病死去530多人。那时候，家家停尸，户户号哭，十分凄惨。

曹致福、年焕兴领导的遵兴支队，王定国、胡光领导的丰玉遵游击大队，时常战斗在遵化地区，配合八路军十一团、十二团和十三团，密切依靠当地干部群众，在无人区里打出自己的天下。

1943年冬，伪军以三个团的兵力突然袭击，包围了驻马兰关西无人区的蓟遵兴游击队。游击队由县委书记兼政委占中率领，巧妙迂回，乘黑夜突出重围，插入敌后，攻其不备，歼灭马兰峪东门守敌50余人。敌人为此曾一连清剿多次，不料我游击大队早已转移。接着，占中又领导新立村人圈坚持在无人区的党支部书记果海等，奇袭马兰峪府金山炮楼，缴获步枪12支，马克沁重机枪1挺，猛挫守敌气焰。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敢露头讨伐。

游击队与报国队采用游击战术与敌周旋，既打麻雀战，也打地雷战。日伪军最怕"地雷请客"，一请客就使他们中计挨炸。1944年腊月降雪前后，迂回在人圈外的杨志革带领战斗小组，秘密出动，在南大圈敌据点大门附近，埋下地雷。可巧，第二天下了雪，路面丝毫不露痕迹，据点的伪军满以为外出讨伐定保平安了，没想到刚出大门，地雷响了，日本皇亲、特务头子千叶手下的国际警察上士滕景被炸死。原来日本鬼子老散布说"无人区里消灭了八路"，铁的事实彻底戳穿了他们的谎言。

同时，在长城沿线的侯家寨、刁山、马兰峪、前后杖子、寨主沟等村建立起隐蔽的联络站，作为筹集、保存、供应物资的

基地。光寨主沟就有洞子19个，成批的粮食、鞋袜、军装、子弹保存在里面，从没出过差失。我十四军分区供给处干部纪润身，与沙坡峪党支部负责人纪德存结合，用真假洞子巧妙地掩藏我军360匹布、5000多包桐油、400多斤炸药、20箱手榴弹、3万斤公粮。在极端困难的时期，供给处战士袁增，经不起考验，叛变投敌。纪润身立即组织群众把物资转移到其他山洞。日本守备队中队长板下、小队长常昭，带领日寇和治安军，分三路围剿。敌人由叛徒带路，来到沙坡峪山沟里找地洞，挖开一看，全是成捆的秫秸，敌人扑空了。经追问叛徒，又搜查看管这些军需品的纪润身。他在老党员邢德福的帮助下，和十三团侦察员王永一起，隐蔽在长城顶上大箭楼。凭两支步枪、两支手枪、13颗手榴弹，踞楼反击搜剿的敌人。子弹打光了，就拆城砖往下砸。在敌人冲锋之前的刹那间，纪润身背着腿部受伤的邢德福，首先由箭楼跳下去，攀援陡壁脱险。然后，他又带伤转移到遵京公路边的张家洼埋设地雷，炸毁了日本4辆军车。在人圈里，敌人还建立了乡、保、甲连坐制度，成立了两个连的棍团，站岗放哨，"监视八路"。实际上人圈里有我们的办事员，有我们报国队组织，敌人的组织被我们利用。一次日本守备队大队长范田，要考验考验新立村人圈的棍团，便把队伍隐蔽在人圈一里以外，命令两个特务化装成八路军，到圈里要军鞋军袜。当时站岗的棍团孙怀璧、王连全，一看来的人贼眉鼠眼，趾高气扬，又没带介绍信，心里就明白了。他俩说是带领他们去取鞋袜，走着走着，乘其不备，一棍子打昏了前边的特务，又一棍子打伤了后边的特务。然后大叫：来八路了！来八路了！于是锣声四起，300多名棍团追赶着打伤的特务。同时派谢玉如（棍团小头头）去据点（离据点二里多地）给日本守备队送信。在村边上碰见鬼子范田，"认真"地汇报了情况，范田哈哈大笑，

马上到人圈开大会，表扬棍团做得好。第二天又叫送情报的带回来11条金枪烟，作为嘉奖。倒霉的是两个特务，一个只活了两天，一个病倒三个多月。

刁山村的党员邵山，与报国队员一起破坏交通、割电线、送信、放哨，腿脚不停，人们给他起个外号叫“山神老爷”。前杖子村老党员王如、韩庆余，为我军看管供给处山洞子，誓死不下山。为照顾好被掩护的一位从延安过来的领导干部，韩庆余打发独生儿子偷偷越过壕沟去背粮食，回来的路上遇到伪军，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寨主沟的王洪臣、徐贵才、郑方明、郑启田等4家21口人看管一个隐藏军需品的山洞。1942年10月9日，日本鬼子和伪治安军到村里清剿，站到一个场面上整队训话，场面底下就是王洪臣等4家掩藏军需品的洞子。当时，他们和八路军贾文来、老山钟22口人藏在这个洞子里，洞子人多、气眼少，大人勉强可以忍受，孩子就架不住了，王洪臣两岁的小儿子群头，憋得直要哭喊，王洪臣的妻子徐桂英，立时用手捂住孩子的嘴。1943年春秋两季日伪军多次来清剿，王洪臣这四家子和八路军地方工作人员，先后藏进葫芦头沟、扒杈沟的洞子里，敌人通过洞门，叽哩哇啦的声音都听得着，恐怕孩子哭叫，徐桂英仍然用手捂住孩子的嘴，等鬼子撤退后，孩子才还过气来。就这样，两岁的小群头，在战乱中，一年竟冒了三个死。

（摘自《河北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遵化鲁家峪、东新庄惨案

河北省政协文史办

一、鲁家峪惨案

鲁家峪位于遵化县城西南，在遵（化）、玉（田）、丰（润）三县接壤地带。所谓鲁家峪，包括东峪、西峪、北峪、龙宝峪、井峪、前山屯、鲁家峪大庄等7个自然村，加上一些分散的住户，号称“九沟十八峪”。这里群山耸立，地势险要，山上密林葱葱，山下沟壑纵横。在军事上，是宜于隐蔽的好地方。

这里革命势力发展较早，在1927年就建立了共产党组织。1938年有130多人参加了冀东抗日大暴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冀东军分区司令部和丰玉遵联合县政府等都相继设在这里，还建有兵工厂、被服厂、电台、报社等。鲁家峪当时成了冀东中部抗日领导中心。日伪军曾多次到鲁家峪“清剿”，都被八路军和民兵打败了。日军恼羞成怒，决定对鲁家峪人民进行毁灭性的“围剿”。

1941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十九日)，驻唐山日本侵略军副司令米左纠集了遵化县城、王各庄、玉田的孟四朱官屯，丰润沙流河、三女河等地的日伪军1000多人，将鲁家峪四面包围。他们这次来势很凶，一是要寻找我军主力进行报复；二是要摧毁鲁家峪根据地的一切抗日设施；三是找出村干部，破坏抗日村政权。

敌人“围剿”前，我方曾得到敌人将要“清剿”的情报，党政人员和部队一面帮助驻地乡亲收藏物资，一面安排群众隐蔽。

然后，部队和青年报国队员就撤出了鲁家峪。

天近晌午，日伪军进了鲁家峪大庄。他们象一群恶狼砸门落锁，翻箱倒柜，从村内到村外，从山上到山下搜了个遍。藏在山沟里和附近洞子里的近千名百姓被逼出来，都被日伪军驱赶到该村虫王庙前的干河沟里。四周架起机枪，日伪军端着刺刀包围着人们。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米左带着一群特务、卫兵和1名翻译官来到人们面前，冲着人们说了几句，只听翻译说："皇军是帮助你们消灭八路军、建立王道乐土的。说出谁是八路军，皇军有赏。"说着从人群中拽出一个妇女，逼着她在人群中认谁是八路军，要她走到八路面前点一下头。翻译官押着她走遍了人群，她也没点一下头。气得米左"啪！啪！"给了这个妇女两个耳光。接着就指挥日伪军对老百姓狠狠地打。日军和特务从人群中拉出30多人，棒打石头砸，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打得四脚伤残。还把两个农民按倒在雪地上，又踢又踩，逼问隐藏八路军的地点。任凭敌人怎么折磨，人们一句话也不说。

米左见这一招不行，就把男青壮年集中到一起，逼他们脱光衣服，逐个进行查看。还逼着赤身裸体的男人向妇女们走去，妇女谁要用手捂一下眼，就痛打一顿。日本侵略军把人们折磨了半天，也没有得到一点儿八路军和村干部的下落。

太阳偏西了，侵略者一无所获，又施出了放火烧光的伎俩。在米左指挥下，日伪军举着火把，见柴就点，见房就烧。不一会儿，鲁家峪大庄就成了一片火海。65岁的老人刘恩号原来藏在柴草里，柴草被点着火后，他跑了出来，又被日本侵略军逮住，把他捆在门板上，扔进火堆里，被烧成了糊炭。李贵祥的老母亲没有爬出房门就被烧死了。

大火整整烧了半天，天快黑时，日伪军才离开了鲁家峪。日军这次进剿，鲁家峪有9人被烧死，6人被烧伤，30人被打伤，

20 多头大牲畜被烧死，1900 多间房屋被烧毁，所有粮食、衣物被掠焚烧一空，人们衣食无着，无家可归。

到7月份，日伪军又分别在16日和19日，两次进剿鲁家峪。16日，进剿鲁家峪大庄把残存的房子和刚搭起来的窝棚又焚烧干净，还用毒瓦斯毒死了70多岁的老人刘继顺。7月19日敌人知道鲁家峪前街武装班长高万盛和后街武装班长李有凡在家，高万盛脸上有麻子，李有凡正给死去的母亲戴孝，所以敌军一进村就叫嚷："逮住有麻子的和戴孝的。"戴孝的可以撕掉，而脸上的麻子无法改变。敌人把人们都集中起来，从中找出高万盛等七个脸上有麻子的人，进行严刑拷打，逼问谁是高万盛。不管鬼子怎么折磨，没有一个人说出高万盛。高万盛自己则装哑叭，怎么挨打，怎么受折磨，他都是哇啦哇啦叫，不说一句话。敌人这次进剿，没有辨认出高万盛和李有凡，却杀害了我8名无辜同胞。

1941年，日本侵略军三次进剿鲁家峪，有18名无辜百姓惨遭杀害。

鲁家峪人民尽管遭受残酷的烧杀和巨大的损失，但没有暴露一个隐藏抗日人员和抗战物资的山洞。敌人撤走后，抗日政府马上派人慰问鲁家峪的人民，帮助他们搭起简易窝棚，解决穿衣吃饭问题，使根据地很快恢复了生机。

1942年4月，由于一个八路军干部在玉田郭屯一带活动被捕叛变，日本侵略军得到了鲁家峪根据地的秘密。这次由日酋铃木启久亲自指挥，调集了驻唐山、丰润、玉田、遵化等地的日伪军几千人对鲁家峪进行了历时半月之久的空前大"扫荡"，使鲁家峪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在东峪村的东北沟底部有一座大山叫鸡冠山。这个山的半山腰山洞最多，其中有一个大洞叫狐仙洞，洞里还有小洞。大

洞能容二三百人，小洞能容几十人。这里住着八路军伤病员和卫生部保卫班战士共30多人。

4月16日，100多名日伪军在那个叛徒带领下，来到鸡冠山。他们见山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山洞，断定这里一定藏着八路军和军用物资，于是就安营扎寨，分头到各洞找人找物。

一部分日伪军来到狐仙洞，在洞口一直等了3天，也没见动静。他们就派了1个人进洞探索虚实。这人一进洞，就被打了一枪。鬼子听到枪声，只知里边有人，但又不敢进去，就施放毒瓦斯，一直等到第5天，确信里边的人都被毒死，这群吃人的禽兽才离开了狐仙洞。狐仙洞里30多人全部遇难。

在狐仙洞下边，有一个洞叫水洞。那个叛徒领一队日本兵来到这里。日军队长让叛徒进洞看看有没有人。叛徒不敢进，但又没办法，只好壮着胆子一边喊一边往里慢慢地蹭。洞里有八路军战士叶奎和东峪村武装班班长梁志民等人。叶奎正守卫在洞口，他见叛徒进了洞，“叭！”就是一枪，打伤了叛徒的胳膊。叛徒逃出洞口，日本队长高兴了，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的，为皇军立了大功，皇军大大的有赏！”说完就命令日伪军向洞内施放毒瓦斯。

一股辛辣的毒气冲进洞里，呛得人透不过气来。洞里的干部、战士赶紧指挥人们用湿手巾捂上嘴，并让大家沉住气，坚持下去。有一部分群众实在受不了毒气的折磨，还是爬出了洞口。这些人刚一出洞口，就被日伪军捉住了，把他们集中起来审问。

日军队长拉出一个60多岁的老大娘，让她说，洞里有多少八路军。她回答说不知道，被打得死去活来。最后敌人见从她嘴里得不到什么东西，就用刺刀把这个善良的老人杀害了。敌人又连续拷问了几个群众，都一无所获。日军队长一面命令把

这些人看管起来，一面命令继续往洞里施放毒瓦斯。一连3天向洞内放毒瓦斯十多次。敌人以为洞里人都被熏死了，让伪军带路进洞检查，在洞内看到二十几具尸体和两条破枪，于是便放松了对洞口的监视。

被围困的第4天夜里，梁志民和叶奎见洞口没有一点儿动静，就商量趁敌人放松监视的机会，把洞里的群众转移出去。梁志民是当地人，地形熟，他就先出去探路。后半夜，梁志民探路回来，把洞里还活着的群众转移出去。

在北峪村影壁山周围的山洞里，隐藏着十几名村干部、报国队员和200多名伤病员。4月17日，日军包围了北峪村，20日开始搜山。洞里的村干部、报国队员轮流守在洞口，坚持了7天7夜。最后敌人用炮弹炸塌了洞口，里边大部分战士牺牲了，活着的也被逮住杀害了。

在南山出口处，有一座不高的圆形孤山，名叫馒头山，山腰上也有许多山洞。这里隐藏着后勤部、武装部的机关干部和区小队战士、报国队员和附近群众200多人。

4月24日早晨，驻遵化据点的日军大队长渡边带领200多名日伪军封锁了馒头山上的各个洞口。日军上山时，从义五庄抓来两位老人，一个叫梁德普，一个叫庞永海。日军逼着他俩去挖一个堵着的洞口。两位老人不肯动手，伪军就用枪托打，用刺刀逼着去挖。两位老人大骂伪军丧尽天良，被日本侵略军挑死在洞前。

敌人不敢进洞，就一面守住洞口，一面往洞内施放毒瓦斯。几天过后，洞内粮水用完，群众受不住毒瓦斯的折磨，被逼了出来。冀东行署秘书林峰，冒险突围，刚出洞口，就中弹牺牲。区小队的杨德山，随着人群出了洞口，打死1名鬼子，就向山下滚去。不幸被树棵挡住，也中弹牺牲。王文龙、轩敬宜等几名

党政干部见突围无望，又不甘心当俘虏，就在洞内饮弹殉国。

据1956年曾到特别军事法庭作证的张俊金回忆：1942年4月20日，他和另外70多人被日军从山洞里逼出来，都被圈到北峪村张景深家的院子里，关在一个厢房里。4月21日，日军叫龙宝峪的报国队员李有章领着去找藏人的山洞。李有章领着鬼子到处转，哪里没人没物就把敌人往哪里领，结果什么也没找到。日军气急了，回来后把他打得浑身是血，又被架到屋里继续审问。在堂屋里李有章发现了张景存给日军杀猪的一把刀，抄起刀就向押送他的日本兵砍去。第一刀砍下了日军半个脸，又跑出去砍站岗的日军的肩膀。刀被肩胛夹住，一时抽不出来。李有章撒腿就跑，冲出院子，向金门山跑去，跑到一个坎子下边被敌人开枪打死了。这天晚上，一个姓金的翻译来到关押他们的房间，对他们说："皇军说了，你们这里是匪区，今天竟有人砍死皇军，皇军非常恼火。今后这里不能再住人了，让你们到玉田县去种菜，有吃有喝还发工钱，谁愿意去就出来。"在他的欺骗下，有28个人出去了，还有4个小孩。他们全被串绑在一起。押到张景存家的白薯窖前，大人用刀砍死，小孩用铡刀铡死，尸体扔进白薯窖里。

第二天早晨，这个翻译又来到屋里对剩下的40多个人说："昨天走的已到了玉田，今天你们都走。"这些人也被串绑起来向南走。给日本人做饭的张景存看到他二儿子和张俊金拴在一个绳扣上，就小声对他儿子说："小二，注意，咱们白薯窖里死人不少，你可要小心。"

敌人把这些人押到鲁家峪刘万的房子前，把刘友正、李自胜、刘景有和张俊金等10人拉出来，押到房后的白薯窖前，让赵三挑来一担水，又找来一个板凳。先把张小二拉到窖前，脸朝窖口，按在凳子上，蒙上眼睛。鬼子抽出洋刀，沾一下凉水，

一刀就把张小二的脑袋砍下来了，尸体立即掉进窨里。第二个就是张俊金。他一看事不好，撒腿就跑，刚跑了几步就让鬼子给抓了回来了。敌人把他按在凳子上，被蒙上眼睛。他穿的棉袄领子长，趁鬼子掖袄领子的时候，他一口咬住了日军的手指头，疼得日本兵直叫。旁边一个鬼子一脚把他踢下窨去，随后又向窨里打了两枪，所幸未被打中要害。等敌人走后才被乡亲们救上来。

这次大屠杀，从4月16日一直到5月2日，整整16天的时间，鲁家峪的人民遭受了重大的牺牲和损失。

从1941年1月以后的几年之内，鲁家峪前后7次惨遭日军围剿烧杀。我抗日军民810多人被杀害，房子烧了盖，盖了烧，累计被烧毁四千多间，损失物资难以数计。

二、东新庄惨案

东新庄是河北省遵化县的一个小村庄。1942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制造了一起惨案。

东新庄是一个抗日斗争很活跃的村庄，群众基础较好。当时的抗日政府有时就在村里的堡垒户召开会议，研究对敌斗争策略。

1942年10月22日清晨，人们还在睡梦中被突然的枪声和狗叫声惊醒，接着听到各处的砸门声和叫骂声、人们这才知道日伪军进村了。大家事先没有准备，全被堵在家里。日伪军把各家各户的老老小小都从家中撵出来，赶到大庙西侧的广场上。

广场的东面是一口水井，这口井的井台凸出地面有半人高；广场的西面是一个打制农具的烘炉，北面是一个院子。

侵略者让村里人都在水井的北面朝南站着。这时只见日军小队长常昭站到井台上，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说：“你们这个村

共产党、八路军的有？说出来，大大的良民。”开始，人们没吭声。过了一会儿，有人说了一句：“我们都是百姓，没有共产党、八路军。”别人也有的附和着。常昭一听，鬼脸往下一沉，朝日本兵叽哩哇啦地说了几句。不久两个日本兵拉来一具尸体。大家一看都惊呆了，原来是抗日政府区长徐志，他已经牺牲了。人们悲愤地低下头。常昭见人们沉默不语，就从人群中拉出来5个年轻人，逼问他们：“到底有没有？不说死了死了的！”“我们只知道种地收粮，别的什么也不知道。”5个人的话音刚落，常昭甩枪便打，5个小伙子当即被打死。常昭又让日本兵拉出曹万贵等10人，指着他们叫道：“不说的，同他们一样！”这10个人都怒视不语。常昭见状，就朝日本兵咕噜了几句，日本兵把这10个人全扔进水井里，然后用炕席盖上进口，往井里施放毒瓦斯。10个人全被熏死。常昭又从人群中抓出张文元，瞪圆了布满血丝的三角眼喝道：“说不说？”“我什么也不知道，让我说什么？”常昭听完，马上从烘炉里拿出烧红的烙铁往张文元的脸上烙，一边烙一边逼问：“你的快说，不说死了死了的！”张文元身受酷刑一言不发。他被日军连烧带烙，活活被折磨死了。

常昭见搞了半天没有捞到东西，便逼着几个人在井南面挖了一个大坑，从人群中拉出17个人，让他们站到坑边上，一个挨一个地杀。柳宪章是第14个被杀的。被杀前赤手空拳与敌人进行搏斗，曾三次甩开敌人要逃跑，但都没有跑成。第17人是王印宣。常昭先问他：“你的说不说？”他说：“我家有八路军的物资，我交出来。”常昭一听高兴了，立刻派了两个鬼子押着他去取。王印宣到了家故意磨蹭时间，想寻找机会逃跑，由于两个日军盯的太紧，一直也没有机会逃脱。王印宣就把家里的破衣服、破鞋袜拿出来给他们，说这就是八路军的东西。日军一看不对头，打了他两个嘴巴，又把他押回到广场的大坑边上。常

昭见自己受了骗，举刀就要砍。因为王印宣穿的是长领的夹衣，不好砍，常昭就让王印宣把衣领子掖进去。王印宣照常昭说的做了，把衣领子折了进去。常昭举刀要砍，王印宣把脖子一挺，衣领子又出来了。一连3次，都没砍成，王印宣这才死里逃生。日军一直杀到天黑，没有得到一点儿需要的东西。这一天，日军在东新庄共杀害无辜群众53人。

事后人们才知道，在农历九月十二日夜里，区长徐志带着通训员鞠小丰在东新庄张敬斋家正召集各村抗日干部开会，被村里的3个坏蛋知道了，他们就向据点的日军告了密。日军小队长常昭便带着日伪军连夜包围了这个村子。惨案发生后没几天，3个告密的坏蛋被抗日政府逮住处决了。

（摘自《河北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丰润马家峪惨案

李永春整理

1942年11月19日（农历十月二十日），丰润县的日本驻军和特务200多人，在大官屯杀害了23名老人以后，离大官屯10里的马家峪村的青壮年绝大多数都逃到深山里躲避了。一些老头和妇女仍留在村里。

20日起大早，日伪军就包围了马家峪。他们把全村50多名老头和200多名妇女圈到庄中心五道庙子前，让老头跪在北边，妇女跪在南边，在两堆人的中间，点起了一堆大火。

开始，先由日本队长佐佐木嘟噜了几句，翻译官说："这里是'匪窝'，隐藏着八路的伤病员和物资，今天交出来没事，如

果不交出来……”他顺手一指在会场挖好的大坑说：“统统地死了死了！”他讲完了，群众没人回答。

这时鬼子从外边又抓来一个老头，大家一看是徐浩林。敌人随手扯下他的棉袄，扔在火堆里，接着抽出洋刀，在老人的脖子上猛砍一刀，脑袋一下就掉下来在人群前面直滚，吓得人们大哭。翻译官大喊道：“不准哭！”鬼子又让保长徐兆兴提着徐浩林的人头在人群前面来回走。翻译官说：“看见了没有，如果不说，都这样！说不说？”群众一声不语。鬼子从人群中又拽出1个人，问他：“谁是八路，哪里有八路的东西？”他摇摇头，没有回答。鬼子一刀把他砍死。鬼子从人群中把王贺奎拉到西坎上的院子里猛打，直打得昏了过去。接着又拉出八九个人，也都打昏过去。

中午，鬼子吃饱了饭，把从外边抓回来的徐兆喜、徐兆明、徐青林和徐兆耕4个老头，赶到会场西面一个柴禾垛上，然后点着火烧。他们往回跑，敌人又把他们打回去。几个人身上烧着火跑来跑去，只有徐兆耕忍痛冲过火堆，奔到火堆北面土坎根下，倒下装死，幸免于难。其他3个人，都被活活烧死了。正在患病的徐景贤，也被鬼子赶来。他拄着棍子站在人群北边，一个鬼子从他后面猛砍一刀，人头没掉，垂在胸前，其惨状目不忍睹。天快黑时，鬼子把还没被折腾死的老头，都拉到坑沿上，用刺刀逐个捅死。

天黑了鬼子们才撤走。外出逃难的人们回来，赶紧抢救被打昏的人，有几个人经过抢救又活了。清点一下被杀害的老人共43人。

（摘自《河北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承德县南双庙惨案

承德市政协

南双庙是承德县的一个小山村，抗日战争时期仅有50多户，400口人。村前的白河水潺潺地流过，四周群山环抱，山上青松翠柏，树木成林，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善良而勤劳的双庙人民，自古以来就生息在这块土地上。

1942年的腊月二十七日深夜，天空阴云密布，寒风刺骨，鬼子宪兵队100多人偷偷地从承德来到南双庙。进村后他们就挨门挨户搜人，不管男女老少，不管病残体弱，都必须出来，一直闹到天亮，把人们聚集到村南庙前的空地上。开始，敌人先问："谁是八路军""谁给八路军办过事?""谁是村干部?"群众没有一个吱声，一些汉奸特务就念名单抓人，这个仅有400口人的小村一下子就被抓走了110人。他们把抓住了的群众，用绳子一个一个地连接着拴起来拉到离南双庙十里地远的靳杖子。在那里敌人严刑拷打，刑讯逼供，追问谁是八路军?谁是村干部?谁给八路军办过事?人们都回答说不知道。敌人就动用多种刑具。有的用烙铁烙，有的灌辣椒水，有的压杠子、刺指甲、吊大桄，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这时，有个姓靳的壮小伙子，看见这种惨状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拿起二齿镐，乘放哨的日本鬼子不备，对准他脑袋就是一下，这个鬼子脑浆迸裂，呜呼哀哉了。这个小伙子也牺牲在敌人的枪弹之下。敌人在这里对这些无辜的群众进行了5天严刑拷打，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又有4名同胞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鬼子毫无所获，就假惺惺地释放了20人，余下的85人于正月初二被带到承德，押进监狱。

在承德监狱，有5人被砍头，69人在狱里被折磨而死，有11人判刑后被送到丹东、抚顺、阜新充当劳工，1944年才回到家乡。

敌人在村里把人抓走之后，又把全村的房子一烧而光，粮食衣物烧成灰烬，牲畜全被烧死。在这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人们走投无路，无家可归，吃饭无粮，过上了流浪乞讨生活。很多人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而倒下了，南双庙成了废墟。400多口勤劳善良的人民经过这场劫难，仅剩下了200多口人。这50多户中就有10余家成了绝户。这是日本侵略者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摘自《河北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日军在凌源达摩洞、香洼、南台子的三次大逮捕

张裳熙　杨明宇

位于凌源县南部山区河坎子乡的达摩洞、香洼西沟、后槽岭南台子3个村，与河北省青龙县毗邻，是山青水秀的好地方。东北三省沦陷时期，日伪军警在这里横行霸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血腥镇压抗日军民。他们以河坎子乡为中心修建警防所，在其北面的佛爷洞驻扎警察讨伐队；在其南面的青龙驻扎日本宪兵队；在其西面的刀尔登驻扎伪宪兵特高队。四面设防，驻扎重兵，妄图扑灭凌源人民的抗日烽火。在此期间，日

本侵略者在凌源县河坎子乡达摩洞、香洼、南台子制造了3次大逮捕的血腥惨案。

一、达摩洞大逮捕

1942年11月下旬，冀东军分区第七区队住在达摩洞的南台子。经过两天准备，晚饭后按照预先计划，军民一道出发了。南台子有杨玉平、杨占一、杨占宽、杨有保、杨永国、杨玉明、杨玉清、杨玉春、杨芝9人，带着锯、斧子、钳子等工具，跟随部队锯倒沿途电柱，并切断电话线。半夜时分，部队包围了建昌县老达杖子警察分驻所。四面夹攻，警察们呼救电话不通，抵抗无力，只好俯首就擒，交出全部武器和弹药。尔后，部队烧毁了警察分驻所。天亮前部队撤离，被俘虏的警察就地释放。

同年腊月初七日清晨，日本宪兵队和伪满警察讨伐队，对抗日部队和无辜百姓疯狂反扑。二三百名荷枪实弹的日伪军，从前槽岭直奔达摩洞的西庄和南台子。先包围了村子，然后把全村的男女老少200多人都赶到河边，强迫跪在沙石上。残忍的日伪军轮番毒打无辜百姓，拷问八路军的去向和私通八路军的人是谁。他们先从牌长马占先下手，棉袄领被扯开，门牙被打掉，脸被打得血肉模糊。但马占先一字不露。其他老百姓也无一说出真情。日伪军认为就地拷问无效，就穷凶极恶地抓走一百多名男人，当天押解到香洼西沟，不给饭吃，并连夜严刑拷问。这些老百姓意志坚强，宁死不屈。无奈日伪军又施毒计："杀鸡给猴看"。首先抓出程相，用棍棒打、皮鞭抽、装麻袋里摔，并动用各种刑法，但程相一声不吭，宁死不供。在程相身上没得到一句话，两个日本宪兵和一个翻译，又像狼一样扑向小学教师吴秉志，他们以为吴秉志是个文弱书生，不会有程相的挺劲。于是，先是甜言诱供，吴秉志不招供，便用木棍毒打，又绑在板

凳上灌凉水，用刺刀扎破下巴、耳朵，他还说“不知道”。就这样轮番折腾一夜，日本侵略者还是一无所获。次日，日伪军又从被捕的人群中挑出8人，有牛瑞、吴秉文、马占川、程相、臧文、陈广田、高文奎，由日本宪兵押解到青龙，关进宪兵队监狱，又残酷折磨两个多月，敌人仍是枉费心机。其余的人被押送到佛爷洞警察讨伐队，因遭受重刑行走不了的，日本侵略军官下令，就地杀害。在梯子岭枪杀了臧秉会，在杨杖子杀死了陈奇。经佛爷洞警察讨伐队审讯后，把其中的28人用汽车押送凌源街监狱，严刑逼供。这28人中，后来被送进阜新煤矿的23人，有达摩洞西庄的陈海、高文祥、高文胜、高文荣、高文富、高文奎、米德胜、米德风、米德坤、米广田、米老四，有达摩洞东庄的马文胜、陈世昌、段继祥、朱义、魏成生、臧秉志、陈余、陈廷、朱尚荣、马羽等。另有达摩洞东沟的马瑞馥，被关进了本溪监狱。马瑞馥明为东庄伪甲长，但暗地参与抗日工作。虽然刑讯不招，又查无实证，最后也惨遭杀害。

二、香洼西沟大逮捕

这次大逮捕，发生在1943年11月。以暗捕香洼西沟程兴为信号。程兴明为香洼伪甲长，实为抗日活动骨干分子。日本侵略军了解到程兴的情况：他利用甲长身份，为八路军办事。于是，刀尔登伪警察署特务以通知他去开会的名义，把程兴押送建昌县监狱，后又转送承德伪热河省监狱。不久，被杀害在那里。时隔不久，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讨伐队，联合围扑香洼西沟，逮捕了裴真等14人。其中程相被押送到本溪杀害了；程秀被杀害在建昌县监狱；裴真被押到刀尔登伪警察署，进行严刑拷打，王振、王庆、王世恒押到佛爷洞警察讨伐队毒打后，关进建昌县监狱；王山、王秀、王荣、王俊、岳海山被押送到本

溪煤矿；程君被押送到凌源街监狱；张辅臣被关押在山嘴子警察署。香洼西沟是个小小的山村，这一次竟被日伪军先后逮捕15人之多，其中3人惨遭杀害。

三、后槽岭南台子大逮捕

1943年农历正月十三日，冀东十六军分区第七区队住在后槽岭南台子。唐沟的秧歌会来这里演出，部队领导就着看会人多之机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当天夜里扭秧歌和看会的人都留宿在这里。次日黎明，部队去后槽宣杖子，刚进村时间不长，伪警察讨伐队就偷偷地从四面包围上来。不料，却被七区队打了个大败而逃。

讨伐队惨败消息传到了刀尔登警察署，日本侵略军气急败坏地再次带领讨伐队扑向南台子。日军和伪警察逐户抓人。幸亏群众有防备，年轻力壮的男人多在外边躲着。这次大逮捕被日伪军警抓到的有韩元、韩耀、韩常、张树林等几十人，押到北杖子河套边。日本军官声嘶力竭地嚎叫后，李荣成翻译道："跪下，把你们这些私通八路军的统统枪毙！"正在这时，伪警察把甲长纪老占揪来了。日军官让翻译问："你家来八路为什么不向我们报告?"纪甲长急中生智答道："我已派人去报告了。"李荣成追问："你派谁去报告?"纪老占答道："我派白永富媳妇去报告的。"实际这是纪甲长的一"计"。日伪警官气势汹汹训斥群众一顿之后，又把南献申、南献五、韩义、韩福山带到刀尔登警察署，用绳子抽、木棍打。还把南献申捺在板凳上，灌凉水，4个警察轮流施刑，硬要他们招供八路军情况。但他们仍是一无所获。后来又把南献申送到凌源监狱，直到这一年的农历三月末才被放回。

（摘自《朝阳文史资料》）

长城外围“集家并屯”后的抗日斗争

张士奇　郝本春　供稿　曹玄庆　整理

1945年夏历六月初四，最大的灾难降临在张家坊全村人民的头上。

那是全国人民起来抗战的第八个年头，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到了穷途末路、面临全面崩溃的时候。日寇和伪满汉奸为了挽救其濒于灭亡的命运，企图垂死挣扎，因而频频向我绥中县西部八路军开辟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讨伐”。张家坊就是他们视为眼中钉、早就想要毁掉的一个村子。

张家坊在绥中城西100余里的山区，南有大石河，水流湍急，塔子沟河横贯全村，海拔800余米的龙门山就在背后，是万山丛中一个河谷，虎踞龙盘，十分险要。由于敌人实行集家并屯，塔子沟和边沿子的村民都集中在这里。敌人在这里设有警防所（1945年正月撤了），要劳工、征“出荷”，在敌人残酷的统治和掠夺下，人民生活十分苦。我八路军从1944年起，由青龙到这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临青绥办事处主任信修、绥中县县长华裕民、四区助理高云霞等，常到龙滩、塔子沟这一带工作，宣传抗日，组织群众，收集情报，采办物资等。1945年六月初，我十一团六大队经张家坊塔子沟西去，留下两个连协助地方工作；张家坊的伪甲长张永平和小山口伪甲长刘长林把情况报告到永安国境警察署，警察署特务系主任孙凤润用电话报告县警务科，并建议给八路军一个下马威。警务科当即下令向

张家坊“讨伐”，并火烧村子。孙凤润向警察署署长吕世友传达警务科命令时，为了保密，没用口说，只是在纸上写了“火”字。

讨伐队的兵力，主要的是长驻山海关东大营的日本关东军守备队一个中队；其次是永安国境警察署署长吕世友兼大队长的讨伐大队，属下除警察外，还有常备自卫团200余人；他们武器精良，装备齐全，带有小炮、机枪、无线电台等。

六月初四，敌人兵分四路，向我老根据地塔子沟、张家坊进发。讨伐大队中队长于会川部由西面进攻，日本守备队由小山口的杨田北沟进攻。警察和自卫团等则从康家坊进犯，还有一股日寇从白枣林子调来，经小杨树沟、蟠龙沟方面兜剿，到张家坊会合。向导是永安村自卫团长刘长玉（小山口人，曾在张作霖手下做过营长）。

在这以前，我六大队得到了日伪要来窜扰的情报，由于考虑到地方武装枪支弹药不足，敌我兵力悬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半夜主动转移到霍家沟。同时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张家坊的青壮年妇女携儿带女躲上山，壮年男子拉牲口搬东西，成群结队逃出村子，只有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看守家门。

敌军进村了，日本军官令士兵到各家各户搜索八路军，却一无所获。恰巧有该屯张国如的母亲捡了一枚手榴弹，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把它交给了伪自卫团长刘长玉，刘长玉一见此物，如获至宝。他为了在日本主子面前请功受奖，立即转交给日本军官。日酋由于讨伐扑了个空，围剿八路军的计划破产了。正没好气，看到了手榴弹，断定是八路军到这里时遗落下的，立时迁怒于老百姓，便向张家坊的人们发火说：“你们说八路的没有，这是什么的干活？”说完下命令，叫士兵们把全屯所有房屋，连同东西物件一齐放火点着，鸡犬不留。警察署长吕世友曾表示不应烧光全村，当即被日酋打了两个耳光。

需要说明的是，1944年伪满在永安建立国境警察署时，曾从各村屯征集民工，我抗日根据地武装派侦察员白玉珍伪装民工去做工作，伪警察署长吕世友经白玉珍教育开导，认清了形势，看出日寇大势已去，危在旦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必将获得最后胜利。为了向人民靠拢，减轻罪责，他平时约束部下较严，伪警有鱼肉乡民的，常挨他打，他还有一次打过日本警察官小崛，因此有“吕大巴掌”的称号。

伪军们从四面八方点起火来转眼间烟云弥漫，火光冲天，全体村民的房屋家财，顷刻化为灰烬，甚至獐狼冲的伪甲长王锡均从他住在张家坊的姐姐家抬出来的箱柜，放在南河滩上，被日寇发现，也烧掉了。偌大一个村落，成为火海一片，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直烧得老树咸焚，磨盘两半，村民面对敌寇暴行，心中愤恨已极，却因手无寸铁，无力反抗，只好忍气吞声。这次惨无人道的兽行，烧毁了张家坊，包括塔子沟、边沿子集中来的居民，共百余户、房屋四百多间。

那股从蟠龙沟方向来的日寇，拂晓时，从窟窿山后迂回过来，企图包围我八路军。他们在险峻悬崖峭壁间，灌木杂草丛中爬上又爬下，却一个八路军也没搜索到。当时为十一团带路的周永田、周文元和李长春3人回来，到边沿子立即向塔子沟南窟窿山冲去，恰好两个鬼子搜索到了窟窿山，直到跟前，周永田才开枪阻击，两枪打死两个日本鬼子。等到日军大批上来时，周永田最后一颗子弹臭了，只好用衣帽挂在荆树上做伪装，越岭撤退。从小杨树来的敌人搜山、放枪，我工作人员刘福余中弹牺牲了。原来在另一处藏身的刘福余的胞弟刘福良，，见到哥哥身亡，就和刘庆安二人抬着他的尸体撤退，他们不幸也被敌人打死了。

日伪继续分头搜山。在窑沟山，敌人抓住了张永清，用刀

枪威逼他，用钞票利诱他，叫他说出八路军在哪里。张永清立场坚定，一个字也不说，翻译要打他，他痛骂汉奸走狗，帮助敌人打同胞，早晚要受到人民的惩罚。日本鬼子打他嘴巴，他赤手空拳捡起石头为武器，向鬼子奋力砸过去，打伤鬼子的脚，于是，张永清光荣牺牲在敌人屠刀下。

在里沟，张家坊的村民张永顺被打死了，事后人们只见他的毛驴在里沟门拴着，却没找到他的尸体，经过几年以后，人们才发现他的尸骨还在山上。

这次因宁死不投敌，在山上被搜索出来遇害的还有：刘庆来的父亲刘元柏（边沿子人，被枪杀后又被砍了头）；张国先的父亲以及张国顺、张永恒等人。另外，张国均的三儿子张文汉，因不甘心被敌人残害，自己上吊死了。

逃进山里的妇女们提心吊胆，唯恐落到敌人手中。她们把自己怀抱的婴儿用棉花堵上嘴，以免发出哭声，有的人把驴嘴巴也绑上了，并且在尾巴上绑上石头，以免叫唤跳蹬，暴露目标。人们探明，日寇在搜山后一无所获，又不敢继续向塔子沟、龙滩方向进犯，当晚回永安堡了，这才扶老携幼下山回家。但是，哪有家啊！只有一片瓦砾场。人们悼念被害的亲人，面对赖以生存的房屋家产所化成的灰烬，痛定思痛，不由得嚎啕大哭起来。真是悲声震地，怒气冲天。但是，当时我们正处在日寇铁蹄下，几家几户，无法报仇，只好有亲的投亲，迁往小山口、永安堡和獐狼冲，或者临时搭个小马架，借来粮米家具，克服重重困难，艰苦地度着劫后余生的日子。

（摘自《绥中文史资料》）

三

日伪在东北各地的暴行

辽宁省

日军炸毁三宝营

雷音动

1932年7月，盘踞在锦州、义县的日本军欲西进热河，派间谍石本权四郎曾两次到北票进行间谍活动。他第三次来北票时，被李海峰抗日义勇军所部杨廷录得知，向李海峰作了报告。李海峰经过周密部署，派杨廷录带几十名勇士，于7月17日在火车上抓住了石本权四郎。日本大特务落网，震惊了日本朝野。驻锦州日军气急败坏，立即组织武装抢夺，曾数次沿锦承线进军均被我抗日义勇军击退。

当李海峰的义勇军驻在北票三宝营子时，日军派人到三宝营子，妄图利用金钱引诱李海峰放回石本权四郎。结果，遭到李海峰严辞拒绝。

日军在差人同李海峰周旋之际，于同年10月9日，从义县发兵五百多人，向三宝营子进攻。兵分三路：一路由稍户营子向三宝营子推进；一路由尖山子围攻三宝营子；一路由水泉奔房申沟。三宝营子被日本三面包围起来。日军上有飞机扫射、轰炸，下有大炮机枪排射。由于敌人进攻突然而猛烈，义勇军难以抵抗，李海峰率部队押解着石本权四郎，顺南梁撤向巴图营子，义勇军全部离开了三宝营子。

日军500多人向三宝营子进击，蜂拥着冲进村，扑了个空，便报复性地向老百姓开刀，一个个日军冲到各家各户，抢掠贵重的财物，放火焚烧房屋，向手无寸铁的群众疯狂开枪。顿时，三宝营子火烧连村，熊熊烈火，尘烟滚滚；村街口上倒着惨死于日军枪下的男女老少，地上淌着殷红的血。日军嗥叫着，把村里所有的柴草垛、粮食和财物都放火焚烧，化为灰烬。一刹时，三宝营子村墙倒屋塌，变成了废墟。

三宝营子被日军炸毁后，时值民国21年，朝阳县政府（辖三宝营子），县长李振钧，县公安局长姜振国，分别于10月14日、10月15日向热河省警务处呈报了“三宝营子被日人炸毁情形”，其中写道：“日炸毙居民男女百数上下，炸毁房屋100余间”。

三宝营子惨案，是日本侵略者侵华的又一罪证。

本文资料来源：

①1988年7月查阅辽宁省档案馆有关热河省卷，民国21年10月30日来文、1187号“朝阳县政府呈文”。

②《喋血抗暴》一书“捉石本青史留名”一文。

（摘自《朝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东赤里赤人民不能忘记的历史

于万江　王恩琛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强占了

我东北三省。从此，喀左县的各族人民，便遭受了14年的血腥统治。血染东赤里赤村，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喀喇沁左旗实行“三光”政策的一起骇人听闻的罪行。

正是骄阳似火的季节，东赤里赤村前屋后、河道两旁，杨柳成荫，大地上一片碧绿的禾苗在茁壮成长。农民群众正在村头路旁、树荫下、炕头上预言丰收有望，整个村庄沉浸在平静和安逸的气氛中时，一场预想不到的大祸临头了：

那是1933年农历六月六日上午，从羊角沟方向窜来了日本警备队和伪地方保安队约300多人，先头部队已进入小河沿村南，沿途抢牲畜。小河沿南村韩老五扛活的韩国山，拿枪跑到赤里赤村河东焦仕明家，气喘吁吁地说：“小河沿那边来土匪了，正在村南抢牲畜呢！”。这时，在焦仕明家有联庄护秋头目邹立田、董怀，还有白万会、董万学、邹本三、夏永启等，正在结义拜把子，设宴吃饭。听说来了土匪，除董怀外，其余6人拿枪跑上了东赤里赤村南王八盖子山上，准备抵御土匪进村抢劫。放了10来枪后再抬头一看，有戴钢盔的，有穿黄军衣的大队人马，这才判明不是土匪，分明是日伪军。他们正在摆开阵式，用机枪对准村庄进行扫射，已打得王八盖子山头碎石乱飞，硝烟滚滚。这6人见寡不敌众，便持枪从山头上退下来。可是日伪军还在节节逼近，肆意地用炮轰击村庄，顿时炮声、枪声交织在一起，响彻山谷，撼人心扉。

接着，日本强盗像下了山的野兽一样，冲进了赤里赤村子里，对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不分男女老幼，逢人就砍，见人便杀，甚至连鸡犬的性命也不能幸免。

村南第一家，张玉德听见枪声乱响，刚跑出大门，正碰上一个日本军官和几个士兵在门口，就被这个军官一战刀迎头砍去，张玉德在惨叫声中死去。怀孕8个月的张郭氏，眼见自己的

丈夫惨遭杀害，急忙从屋里往外跑，被另一个日本兵刺倒在屋门前，复又一刀，8个月的胎儿血淋淋地从母体内流出来，还在微微蠕动。坐在炕上的3个孩子吓得浑身颤抖，不敢动弹。一个日本兵一把抓住一个孩子的胳膊，从窗口扯到院子里，凶狠狠的一脚把她踢出大门外。那个日本兵又回身操起锄杠，朝着两个男孩子打了几锄杠，孩子疼痛难忍，连哭带叫的满院乱跑，日本兵狞笑着又举枪把他们打死。接着，便纵火把两间房子烧着了，房木塌下来把横在屋门前的张郭氏尸体烧得血肉模糊，全家5口人死了4口，只是被踢出大门外的那个女孩，越墙跑进庄稼地里，幸免一死。

又有几个日本兵持枪闯入村南头关帝庙内，一进庙门，就见一人在庙台上，随着就是一枪把他打死。又有两个日军端着刺刀窜入庙门，一刀刺死躲在周仓（佛像）身后的一个人，一枪击中关平（佛像）身后一个人的头部，鲜血飞溅在墙壁上（直到日本投降后这片血迹还在），还有一个躲在正殿关公身后，没被发现，幸免一死。这4人是外乡来村中讨饭的，寄宿庙内，就有3人惨死于日本军屠刀之下。死在周仓像后那个人，死后还咬牙切齿，敞怀露胸，右手紧按前胸刀口，血迹顺肋而下，身边一个荆条筐，内有空碗一个，墙边立着一根打狗棍子。这3人分明都是无辜的劳动人民，就这样含冤死去了。

李海臣，是个29岁的年轻人，被一个带有短枪的日本兵追打，连喊带叫地跑进年过花甲的邹积谦院内。邹老汉手扶拐杖站在院内，看日军要行凶杀人，老人用手比划不要开枪，可这个日军用手抓着老人胡子，比划着他是抓土匪的，老人连伸大拇指，表示李是好人。再三阻拦无效，日军终于兽性大发，用手枪将李打死在院内粪坑边。

在阵阵枪声中，又有两个日军窜入年仅24岁的王恩琛院

中。全家老少都躲在正房西屋内，日军一进院就拿柴禾放在东间，用火点着，顿时浓烟滚滚，腾空而起。两名日军又去抢柴禾烧东厢房时，王恩琛的妻、嫂乘机把两个孩子扔出墙外，手拉婆母从墙豁口逃出，幸未被杀害。王恩琛和他父亲、弟弟跳出西墙，向西山坡跑去。刚到半山坡时，被日军发现，连击数枪，其父和弟弟中弹倒下。王恩琛跑丢了鞋，光着脚跳过梁去。事后归来，父亲和弟弟的尸体被乡亲抬回家中，停在院内，已经血肉模糊，难于辨认了。11 间房子被烧成灰烬，满院悲惨凄凉。

韩二粉匠的妻子，由于怀孕不便行走，抱着两岁的小凤，领着 4 岁的女孩，急躲在麻地里。可是狗也随着主人窜进麻地乱跑，日军举枪打狗，认为里边有人，端枪窜进麻地里，一刀扎死韩妻，4 岁女儿扑在母亲身上哭叫着："妈妈！妈妈！"日军随即对女孩就是一枪，枪声响后再也听不到孩子的哭声了。当人们来收尸时，两岁的小凤还偎在妈妈的身上，含着乳头已滚成一个血孩了。

王文学的嫂子，住在村东边，她听村里的枪声稀落了，又看孩子少一个，就登梯上房，喊孩子。站在墙外的一个日本兵，举枪扣动扳机，王文学的嫂子应着枪声仰倒在房顶前檐，鲜血顺着瓦檐子流了下来。

在阵阵的枪声和口哨声中，日军们蜂拥到村头东河沿边，把从羊角沟抓来给他们领道的 3 个老百姓，也用刀劈死在河边草地上。

日本侵略者在东赤里赤村，仅用 1 个多小时就枪杀和刀砍死男女老少 32 人，伤 5 人。街巷院内，死尸东躺西卧，血迹斑斑。烧毁房屋 59 间，滚滚浓烟遮天蔽日。这一惊心动魄的惨状，使人见之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实甚目不忍睹。

当那些冒险逃脱生命的人们回来的时候，在东赤里赤的村子里不管是街上还是院内，都有血淋淋的尸体，房屋家产顿时变成灰烬，看不到一点生气，到处是一片凄凉悲惨的景象。幸存者中有的人变成了孤儿、寡母，有的人失去了丈夫或妻子，真是家破人亡，生活无着。但是他们终于擦干了眼泪，埋好了乡亲们倒下的尸体，把血海深仇深深地埋在心底，强压怒火，挣扎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过着啼饥号寒的生活，一直盼到了“八·一五”祖国光复，中国人民才重见天日！

（董宝整理，摘自喀左县《文史资料》第一辑）

二车户沟的男人全被杀光

牟清平　韩国祥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1932年6月20日，日本侵略者一支武装部队，从朝阳南部侵入哈拉黄沟一带进行骚扰。接着向东进至羊山，21日又从羊山继续向南进犯。当这部分日军行至二车户沟与龙潭沟交界处时，被驻守当地的义勇军察觉，义勇军团长王震协同联庄会长赵清泉，率领百余人的队伍迎头截击。在激烈的战斗中，歼灭了以伊藤（日军司令）为首的日军23人，剩下的8名残匪狼狈逃窜。逃出不远到曹杖子后山，又被“王老凿”派人截住，击毙2人，其余6人惶惶逃回本部。

1932年6月23日，日本侵略者又从锦州派出一支武装队伍，到达羊山后往二车户沟进发，企图报复。当时，义勇军已离开这里去执行任务，只有当地武装群众和敌人坚持了一天的

战斗。虽然敌人上有飞机侦察、轰炸，下有轻重机枪扫射，然而由于我中国同胞斗志甚坚，抗拒甚烈，敌人屠杀二车户沟人民的计划未能得逞，遂退回锦州。

1933年"二·二五"朝阳失陷后，日伪统治机构相继建立。一些汉奸走狗协同日本侵略者，把侵略的魔爪向朝阳各地伸展，进行着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从此朝阳方圆几百里的地方，村村哀鸿遍野，户户母哭子啼，昼不安食，夜不能寝，背井离乡，以避抢掠屠杀之苦。

在"日本人要血洗三南区"的紧张气氛中，1933年秋前的一天，一股日本匪军从北部侵入二车户沟。这次来的敌人较多，步兵乘坐着汽车，停在下窝铺屯，开始点火烧了场院上的庄稼和下窝铺的房屋，约60户200多间房子全被烧毁。这时村内的人大部分跑到村外躲起来，未被杀害。

1933年11月9日，日本侵略者又派一股匪军侵入二车户沟。当人们听到汽车响声，就四处逃奔，有的往东沟跑去，有的往上沟跑去。杨玉锋和田凤岐正往地里送粪，未能躲开，日军就把这2名无辜群众开枪打死。接着，日军把逃跑的群众从山上圈回来，给大家开会，说："好人的别跑，跑的都是红胡子，如果你们再跑，就统统的打死……"。敌人就用这种狡猾的手段，欺骗了善良的中国民众，稳住了民心。敌人说完后，真的没杀人、没开枪就离开了村子，到了11月的14日，一股日军坐汽车从东梁开过来。因上次敌人欺骗说跑的不是好人，人们并没识破那个阴谋而信以为真，所以这次敌人来了，群众真的没跑。敌人进村后抓住王勇和周延荣二人给带路，到龙潭沟去看碑（陈美营子村有人为讨好敌人，给前次被打死的伊藤等人立的纪念碑）。敌人看了石碑，兽性更加发作。第二天（15日）鸡叫后天刚放亮，敌人就开来了3辆汽车，载着60多名官兵，手扣枪机，

子弹上膛，刺刀闪光。趁民众大部尚未起床之机，包围了二车户沟，挨门逐户进行搜查。凡是搜出年在15岁以上的男子，见一个杀一个。枪杀、刀砍、刺刀挑。一刹时，屋里屋外、院里院外、街头河边躺满中国的男性成年人的尸体。也有少数孩子含着其母的乳头和妈妈一齐被害在炕上。有的人被割下头来，也有的一个人被打了10枪。就这样，一清早不到3个小时的功夫，二车户沟全村仅有的60几名男人，除3名外出者和郝文章、王世云钻到柴草堆中幸免遇难外，其余57名村民全部被杀害。在这次惨案中，王勇一家4个全部被杀，王彬一家爷仨全部遇害。

敌人走后好几天，外逃的人们都不敢回到村里来，被残害的遗体无人掩埋，有的尸体被狗撕坏；有的被砍得面目皆非，认不出是谁；有的身首分离，景象之惨，目不忍睹。后来，周围群众到二车户沟帮助掩埋了尸体。一时无法弄到棺木，就用板柜装敛尸体，柜用光了，就用席子卷埋了。

惨案过后，村里遗孤剩寡，有许多妇女精神错乱，见神闹鬼。有的人不敢进屋睡觉，只好几家集居在一起住马架棚子。有一名大胆的周宽老人，每夜手拿一个木梆子边敲边喊："没事了，快睡觉吧！"

人们在哀痛之余，怀念一位好心的中国同胞，一名姓邹的翻译。他随日军第一天到二车户沟时，他假借喝水之机，让下沟赵兴林给上沟传个信："明天早晨有大事，叫人们躲一躲。"赵兴林又找到杨永孝，向上下村人传了这个信。可惜人们听了这番话不相信，并说："日本人要杀人还告诉你？"（因信了敌人的"好人不跑"的话，所以没有躲避）并责怨传言人："自己就害怕。还来吓唬人"。如果当时听信这位好心人邹翻译的话，或许会少死许多人的。

（摘自《朝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王砬沟的惨状

滕 韶

建昌县谷杖子乡吉杖子村王砬沟屯，座落在谷杖子乡西北15公里的一个5公里长的山沟里。该屯三面靠山，只有沟口是人们出入的唯一小道。在50多年以前，就有20多户人家、100多口人住在这里，由于山多、柴草密、交通不便，外人很少到这里往来。

1933年（伪大同2年），日本侵略者侵占建昌后，一些抗日队伍——民众救国军、义勇军、仁义军等经常到这里来，和群众一起侍机打击日本侵略者。侵略者也多次组织军警到这里来搜捕，但每次都遭到抗日队伍的回击。侵略者对此怀恨在心，并诬称该屯为“土匪”老窝。

1934年（伪康德元年）农历四月初七，日伪军300多人，由大队长林木率领，持有机枪、大炮，还有六七台卡车（汽车）在飞机侦察掩护下，从四面包围了王砬沟。日军进村后，按户搜查。当时，抗日队伍早已转移，他们就把全村的男女老少强迫集中在屯中间一个大井旁边的小空场上，男女各站一边，在群众周围架起机枪。这时，林木手拎刺刀，威逼群众说出“土匪”（抗日队伍）的去处。群众坚决不说，他就要命令开枪。这时，翻译给出了个“高招”（意思是把这里的居民都杀掉，“土匪”就不会再来了。再想抓“土匪”就抓不到了），当场群众才幸免一死。

日军走后，人们才发觉自己的亲人被杀害了。原来，这屯的居民吃过早饭去地里干活，日军刚一进村时，见人就开枪，有的被枪杀，有的被刺刀挑死，全屯有13人被杀害：

居民季学诚，被炮弹炸死，几天后死去。

居民季清芳，胸部中弹，也几天后死去。

外屯居民孙老头（居民李景新的外祖父），接女儿住家去，被日军用刺刀挑死在半路上。

外屯居民李振发，来岳父家串亲被炸死。

居民季学用去地里干活，其子立东（12岁）跟去玩，日军将其父子同时挑死在地里。

居民季洪才被打死后，又将头皮剥下。

放羊娃李根带被挖去双眼，然后被挑死。

居民吉奎被杀，头上身上被机枪扫射弹眼多处。

居民李殿举同敌人搏斗，两手被刺伤多处，最后被剖腹。

齐永学（62岁），被挑死。

此次惨案之后，这里的群众又多次接待抗日队伍，不断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第二天春天，日本军又派分驻所白所长，带警察到此把居民的房子烧着。警察走后，除两栋房子得救外，其余100多间房子和衣服、粮食等全被烧光。群众没吃的靠挖野菜维持生活；没住处，就在旧房壳子里搭起棚子住，有的住进山洞里。日本侵略者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个地方的残害，这里群众的对敌斗争，一直坚持到祖国光复。

（建昌县政协供稿）

狂轰滥炸南营子村

牟清平　韩国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下，大好的东北河山，不到三个月就大部分落入日本侵略者手里。到了1933年2月，朝阳地区也相继沦陷。面临这国破家亡的民族危急关头，全国人民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纷纷组织起抗日武装，自发地起来打击日本侵略者。朝阳人民也和全国人民一样，组织起抗日武装——联庄会和义勇军，主动出击日本侵略者，阻止日军的西进。1931至1934年，这些抗日武装力量先后十数次和日军作战，共消灭包括伊藤司令在内的300多名日本侵略军，大大地鼓舞了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

1934年5月，一支日本骑兵队约30多人，从羊山附近的南营子东胡同直奔村南而去。这支日军在羊山以西，遇到了抗日武装的截击，经过一场战斗，有7名日军溃退到南营子。当时，村中有人主张将这7名残敌干掉，但是有人却说：“这乱子惹不得，不叫他们进村就是了。”终于没让这7名日军进村，他们只好从村外向东北方向逃去。这为日本屠杀南营子人民埋下了导火线。

到了5月中旬，又从南边开过来一支日本队伍，行至黑牛营子附近，被义勇军的团长和联庄会的会首王震、赵清泉等人察觉，他们立即率队迎击。经过战斗后，敌人败退突围，沿山路向朝阳方向撤退。撤至大四家子的东南沟一带，前边又遭到另

一支抗日队伍截击，经过1个多小时的战斗，被我方打死数十名敌人，其余敌人突围继续向朝阳方向撤退。撤至北营子时，敌人想凭北营子垣墙房顶，负隅顽抗。王虩、赵清泉已追至南营子，以猛烈的炮火把敌人赶出北营子。敌人误认为这次攻击是南营子群众发起的，又加之月初没让那7名残兵进村，两事合一，敌人恼羞成怒，决心屠杀南营子村人民。

1934年5月19日将要晌午时，从朝阳方向开来一股日伪军。他们乘坐一辆汽车，车开到南营子村北，就用大炮轰击南营子。群众发觉后，都纷纷跑向西山和东河套。这时又来一架敌机，在空中盘旋侦察，发现外逃的群众就立即进行扫射。就在这种狂轰滥炸的配合下，大批日军进入村中，挨门逐户搜捕抓人，并在飞机侦察指引下，向西山追捕群众。凡是在离村较近处隐蔽的群众，不管是青纱帐里或在山坡上、沟内的，一被敌人发现，就用刺刀挑死或砍死。这次屠杀将要完结时，村里敌人开始抢东西、点火烧房子。

这次大屠杀共残害我无辜同胞27人。其中有年过七旬的老人，有五六岁的儿童，有孕期的妇女。真是血溅沟壑，尸横田野。谢云奎一家9口，有7口被害，只逃出兄弟二人。当他全家逃出村外后，一直朝西边跑去，他的儿子谢硬生是一个身强力壮的棒小伙子，年青腿快已跑上山顶。回头一看，敌人正在杀害他的父母和亲人，他立即从山顶抓起两块石头，直向敌人冲过来，敌人看见慌了手脚，就丢开别人，向他开枪射击，这位善良而勇敢的青年应声倒在血泊里。

这时，村里已浓烟滚滚大火熊熊了。日军的嚎叫声和火光照耀下遇害者的纵横尸体，构成一幅人间地狱图。

经过二三个小时的血洗，全村房屋被烧毁了400多间，整个一条后街只剩下一户人家。这一户是王三爷子家，因他年过八

旬，耳聋眼花，敌人把刺刀放在他的脖子上威胁他，他也不出屋，点起火来他就拼死扑灭。不知什么原因，敌人竟未烧他的房子，也未杀死他。事过几天了，从远处山岗上看到村内烟火熄灭，外逃的人们才陆续回到家中。

（摘自《朝阳文史资料》第三辑）

柳杖子惨案

杨得胜　梅兰亭

柳杖子村地处建昌东北部，与喀左、朝阳两县交界，是谷杖子公社的一个山环溪绕、风景秀丽的山庄。这里原来住有34户百十多口人，分为上下两屯。上柳杖子14户50多口人，下柳杖子20多户80多口人。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广大地区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这里的群众为了民族大义和全国人民一样，不甘心当亡国奴，奋起抗击日寇。他们有的参加民众救国军，有的积极支援抗日武装，有的抗捐抗税，给鬼子汉奸以有力的打击。凶恶的敌人哪能容忍人民的反抗？他们要拔掉柳杖子这个“土匪窝”，杀绝“暴民”。

柳杖子村的灾难终于降临了。1934年旧历十一月十二日这天大早，天还没亮，一群鬼子兵闯进上柳杖子，下令把全村男女老少，一齐赶到村东头庙前集合，挨个查手验肩，看有没有用过枪的，结果一无所得。最后一个鬼子军官通过伪军翻译官说：“土匪八路军来了你们要报告，不报告都统统的枪毙的有。”

敌人折腾2个多小时，打死了不少鸡禽和猪狗，才滚出沟去。

与此同时，下柳杖子则发生了灭绝人寰的惨痛事件。30多个鬼子兵来到村头，逼着贫苦农民柳宪生为他们带路。柳宪生宁死不肯，结果活活被鬼子挑死。这群畜牲更加气急败坏地向村里开枪开炮，狂轰乱射，一时间把这个小小山村炸得房倒屋塌，畜死人伤。鬼子兵闯进村后，指使恶狗咬人，很多人被军犬咬伤。这次事件，群众被打死1人，重伤2人，房屋被毁坏多间，其它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1935年旧历五月二十七日，日本强盗对这里又进行第二次烧杀。这天，人们刚吃过午饭，三十多个鬼子兵在一个叫岗本的头子带领下，又重重包围了这个山村。鬼子首先向村中开枪开炮，把这个僻静的村庄立即炸得天昏地暗，家家户户都淹没在硝烟火海之中，炮火停止以后，闯进村子的鬼子兵逐户搜查，惨杀我无辜群众6人，重伤2人。其中张国良（48岁）为了躲避鬼子向后山逃跑时，被鬼子打中，他当时没有死，被鬼子发现后，用刺刀活活挑死。一小女孩张小者13岁，小男孩张福长11岁，姐弟二人全被鬼子枪杀。58岁的张有也是穷苦人，因病直不起腰来，鬼子进村后他赶紧往后山墙爬去，也被鬼子发现一枪打中，当即死去，悲惨情景，目不忍睹。此外，重伤二人中杨刘氏60岁，听说鬼子来了，往后山坡爬，被鬼子打中腹部，鲜血流了满地。张高民25岁，见鬼子来了，也跑到后山被鬼子打穿脚心。

日本帝国主义在柳杖子的两次扫荡清剿，任意杀害我同胞7人，重伤4人，计死伤11人，占下柳杖子总人口的15%。

柳杖子村的群众并没有被日本的屠刀所吓倒。当1945年我八路军小分队又来到柳杖子村时，人们欢欣鼓舞支援小分队。八路军小分队出发时，梁为斗、张振志等主动给带路送到朝阳石

明信沟（王老凿处）。一次有一个八路军战士小宋负伤，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把小宋留下养伤。

曹振东老人今年八十多岁了，他是身受其害的历史见证人。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是杀人的魔鬼，屠杀我们柳杖子群众时，我是亲眼所见，到啥时候我们也要记住这笔血债，还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懂得国败民苦、国盛民安的道理，治家要爱国呀！"

（建昌县政协供稿）

日军制造的油房沟惨案纪实

李贵春口述

李学志　刘守军整理

1935年秋末冬初的一天早晨，我正在院子里倒粪，忽然听到我们三家窝铺村的东树林子里响起了一阵枪声。我立刻停止干活，随着村民们向东树林子奔去。当人们到了村口时，看到一队日伪军从东树林子出来，向东台吉营子方向走去了。待他们走远之后，我们来到东树林子里。一看，有4具尸体卧在树坑里，被枪打烂的胸膛，还在淌着鲜血。我们认出了死者，他们是离我们村十多里路远的油房沟村教书先生王希贤和王希兰哥俩，另两个是贫苦农民董福生和米存志。日本侵略者在我们这一带如此镇压群众、杀害无辜的事件已有多起，人们在心里牢牢记下了这笔笔血债。

在日伪统治时期，我们三家窝铺、大四家子、油房沟等村落均归朝阳五区所辖，是二龙台川的下哨。自1933年来，以兰

天林为首的抗日救国军经常在这一带活动，他的爱国行动，对我们大黑山区的苦难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在人们当中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朝阳五区第一军，
军长大人兰天林。
顺天而做保真主，
杀了富豪济贫民。
群雄并起把国救，
义勇消灭日本军。
天从人愿成正果，
满斗焚香奉上神。

这首歌谣虽然带了一点迷信色彩，却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兰天林抗日救国军的拥戴。

兰天林抗日救国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采取了巧妙的游击战术，打得日伪军闻风丧胆。日本侵略军对兰天林的队伍和五区的人民恨之入骨，采取了"血洗五区"的凶恶手段，疯狂地镇压抗日救国军，残害五区的群众。自1935年8月开始，日军就集中了大量兵力围剿大黑山。在大黑山的九道川口都有日伪军驻防，尤其是地处五区的二龙台川大四家子村，就是日伪军的一个据点，大约有一个连以上的兵力驻防此地。他们在二龙台川无恶不做，肆意屠杀当地群众，据我所知，被他们无辜杀害的群众就有40多人（整理者注：据调查，被无辜杀害的人中已知道姓名的38人中，年龄最大的74岁，最小的12岁）。

油房沟惨案，纯属日寇一手制造的。日军在杀害王希贤等4人的头一天上午，有两个日本兵从四家子驻地出来闲逛，看到一个姓孙的农民正在用犁杖坌地，这两个日本兵非要用犁地的马骑着玩不可。这个姓孙的农民在他们的逼迫下，只好把马解

下来交给了这两个日本兵。有一个日本兵骑上马就在漫地里跑起来，另一个日本兵在后面哈哈大笑。可是，马见到生人是不老实的，一蹶子就把骑在背上的日本兵摔出去老远。当时，就被摔得头破血流不省人事了。日军送他去北票治疗，途中就断气了。日军长官在询问死者原因时，那个和死者一同去玩的日本兵，却用手一指，说油房沟那里有土匪，打了冷枪，把马吓毛了，才把那个人摔死的。

于是，就是当天晚上，在四家子驻防的全部兵力一齐出动，把油房沟村团团围住，把全村男女老幼集中起来，连推带打地押解到离油房沟村不远的冷家店村李家大车店里。夜里，日军对村民们逐个地拷打和审讯。经过一夜的审讯，也没査出打冷枪的人，于是他们就遵照上司命令：在天亮前，采取看手掌和摸心口的方法，把王希贤等4人抓了出来。他们说王希贤和王希兰手上没有茧子，肯定是打冷枪的人。又说董福生和米存志心跳厉害，是打冷枪的嫌疑犯，不容申辨，就五花大绑把4个人捆绑起来。这时，在冷家店村有一个妇女，说她是道德会的会员，并以会员的身份为这4个人说情作保，却被日伪军用木棒打得头破血流。至此，再也没有人敢出面求情了，眼睁睁地看着日伪军押着这4人出了冷家店，向我们村的东树林方向走去，他们就这样被无辜地杀害了。这就是日本侵略军制造的“四命顶一命”的又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

（摘自《朝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日本侵略者在二龙台川制造无人区

王瑞林　刘香圃

二龙台川在北票西北部的大黑山脚下，川流由西向东，羊肠小道沟通着几十个自然村千余户人家，这里是劳动人民安居乐业的好地方。然而，“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对这里抗日民众进行残酷镇压，并在这里实行“三光”政策，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无人区。

1933年11月，兰天林在大甲营子又树起抗日灭满救国军的大旗，几个月的时间，抗日队伍就发展到千余人。他们奔袭各地经常打击日伪军的进犯，消灭伪军的骚扰。大黑山区人民也自动组织起武装保卫家乡，由于人心所向，不到1个月的时间，仅在北四家子乡以北的大水泉、王增店、陶家沟、榆树底等二十多个村庄就组织起4个联庄会。大家推选出会长，号召有枪的出枪，有马的出马，没枪没马的出人。从此，这一带的人民同大黑山区其它地方一样，庄庄联防，户户参战，白天设岗，夜间出哨，一方有敌情，各方去支援。联庄会组织起来后，各路匪贼和伪军再也不敢轻易进山骚扰。

此时蒙奸沁布多尔济（小王子）依仗日本人的势力，强令大黑山区解散联庄会，交出枪马，否则要血洗5区（当时属朝阳县辖），荡平二龙台川。抗日灭满救国军兰天林司令闻讯后，便派人给二龙台川联庄会送来书信，表示愿意协同各联庄会，以武力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进犯。山区里的人民一致同意让义军进

山。

1934年1月7日午时，南方山顶上响起三声礼炮，这是救国军进山的联络信号，紧接着两面1丈多高、6尺多宽的红地白字写着“抗日灭满救国军”的三角狼牙大旗出现在山顶上。同时，在进山峡峪西要道两面的山坡上，也扬起四面联庄会的大旗，4名联庄会长骑马并列在石门道口。他们对空鸣放一枪，表示欢迎义军进山。兰天林率领大部分马队和部分步兵共千余人，威风凛凛地走下山来，十分有秩序地开往各个村庄。义军所到之处，不打不骂，不挑吃喝，不动百姓分毫，彼此情同自家人。在春节期间，兰天林与当地群众协商，将二龙台川4个联庄会编为抗日灭满救国军的4个排，继续留在山寨，护村、抵匪、阻击日伪军进山扫荡。从此，兰天林将二龙台川作为抗日的一个根据地。

2月6日，救国军离开驻地奔袭大黑山其他各地，在联庄会的支持下，4个月与匪贼打20多仗，消灭了“林字”、“大周”、“小周”等匪军，为民除了害，并在1年多的抗日斗争中，联合了周荣久、苑九占、老梯子等抗日力量，转战在北票、阜新境内，打击日寇，消灭伪军，不断取得胜利。

1935年3月初，救国军第一支队在联庄会“上排”的协助下，缴下到三道梁收缴民枪的一伙警察的枪马。5月8日，联庄会“下排”又配合救国军的第十支队，在鸡冠山伏击了日军4辆军车，打死日军多人，缴获大量物资和枪支弹药。6月1日在克洛弯阻击了日军两辆军车，相继又在汤沟和东官一带多次与日伪军交战。7月13日，兰天林调动全军人马，攻克了贝子府，消灭日伪军和警察20多人，又击毙了王府里10余名炮手，缴获机枪两挺、步枪10余支、子弹若干。同时，又砸了3个大商行，获得了大量的军需给养。8月7日，兰天林指挥各路义军围攻北

票，威震百里方圆，惊动了奉天警察厅的汉奸和日本侵略者，他们调动朝阳、赤峰和通辽、阜新附近的所有日军和伪军1万多人，出动2架战斗机，20多辆铁甲汽车，于10月13日将大黑山围得水泄不通。救国军在兰司令的指挥下，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由于武器装备相差悬殊，救国军被迫于午夜，从大黑山的东部松树山尖处突出重围。

追击兰天林义军的日本侵略军离开后，紧接着大批警察开进各村。在二龙台川上游，警察们端着枪，驱赶着各村的老百姓，全部集中到王增店南面大河套训话。伪村长周凤在警察的护卫下，站在土台上嚎叫着说："兰天林几千人马，都搁不住皇军打，你们联庄会几十条枪，还能搁几下打啊！这回你们惹下了大祸，皇军要血洗二龙台川，大人小孩杀个根芽不留。是我在皇军那里为民请罪，皇军才饶恕大家伙。但也有条件：一是各村要按户敛钱赎罪；二是联庄会的成员交出枪马；三是惩办勾结兰天林的祸首。这是皇军的命令。"这个汉奸对群众训完话之后，警察们分别到各村，把有枪有马户的家产掠夺一空，并且在临走时还把这些户的房屋放火烧毁。

1936年初，日伪军曾多次进山烧杀。以长条沟为例，先后两次火烧，两次推墙，共遭受四次洗劫。其中一次是张宝山率义军从东边返回大黑山进入长条沟，随之有120余名日军乘4辆铁甲汽车包围了这个村子，敌人使用机枪和炮，把这个村庄打成火海，16名义军和村中没有逃脱的百姓全被杀害，最后从村中搜出个60多岁的李母，也被凶恶的敌人用刺刀捅死。死者的衣服全被剥光带走，尸体裸露在野地里。除张宝山尸体被偷走掩埋外，其他人的尸体任野狗吞噬叼走。

5月24日，有一帮日军和警察闯进三道梁子，据说一个日军挨了一枪，他们便气急败坏地冲进油房沟，将大人小孩全部

赶到三道梁村，圈进一个大猪圈里。在猪圈的四周架起机枪，准备屠杀，后经抻头人向伪军再三肯求才幸免。但日军仍不肯善罢甘休，指使伪军将王希贤、王希兰、董福生、米存志拖出人群，硬让这4名无辜者为日军抵命。这4个人怒视着敌人，最后倒在血泊里。翌日，日军将小四家程永和及其3个儿子抓来，硬说他们爷四个同兰天林有联系，将他们枪杀。东荒的徐仁，不忍日军暴虐。利用叶子会给群众治病的机会宣传抗日，后叛徒告发，也被日军砍头示众。

5月26日，日伪军又闯进王增店，抓住王景阳，硬说他私通老兰，有枪有马，将他绑在板凳上，往鼻子里灌掺着火油和辣椒面子的凉水，王景阳被日军灌得顺头发根往外冒血，最后悲惨地死去。没过几天，王海、王录、苏九、解贵、李士宽等都被抓住。带到黑城子王府灌凉水、压滚扛，这些人相继被摧残致死。

7月末，日军在大黑山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勒令居住在二龙台川上游的20多个自然村居民，限期10天内扒掉全部房屋，否则以通匪论处。8月3日，日军讨伐大队长、刽子手佐藤，他突然带领近百名日伪军，驱驶两辆铁甲汽车开进山区，先是机枪扫射，而后放火烧房子。屋内的衣物、粮食及牛、羊、猪、鸡一扫而光，全变为灰烬。

在大火过后，村民们又从深山密林里偷偷地回到村子里，重建家园。这年冬季日本人署官大平，又带领7个日军和伪队，从山外白搭子等地强制赶来500名老百姓，带着镐头、铁锹、木扛子进山到各村扒房子。敌人先是放火烧，而后推倒残墙断壁，仅用两天时间，20多个村庄的几千间住房和牲畜棚荡然一平。

日军逼得人们无家可归，大人孩子嚎哭恸天，有些老年人佝偻气喘，步履蹒跚，倒在雪地里；有的孕妇在婴儿落地之后，

滴水不进惨死在路旁的山坳里；有的妇女被日本强盗剥光衣服裸体照相，轮流奸污，最后被他们在狰狞面目的笑声中用刺刀挑死，或含羞自寻了短路。在郭家湾附近村子200余户人家千余口人中，含恨死去百余口，其余的人都被赶到郭家湾。日军又怕郭家湾同救国军有联系，又从山外抓来几百民工，在郭家湾村四周挖200丈长、9尺宽、1丈深的沟壕，并在村口修上木板吊桥，早晨放下，晚上吊起来，由伪军看守。村民出入要手持木牌，外来亲友要详细盘查，如有不周就被当成义军探子抓起来。这一年瘟疫又流行，许多人被染上伤寒霍乱。警察"狗子"不准人们外出求医，十几天死亡20多人。有的户逃到外地给人家做零工糊口，趁夜间回到山里莳弄地。1937年秋，石头梁子村的人们，分别从内蒙回来收秋，结果被汉奸报告给日军，日军和警察把群众场院的庄稼垛都点着火，火光四起，黑烟滚滚，燃烧两天两宿。这就是日本侵略者在大黑山制造的无人区，这就是二龙台川无人区的悲惨景象！

（摘自《朝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血洗南岗头

姜开田　张春发

1931年日军入侵中国后，在各地犯下了滔天罪行。血洗安东县的南岗头（现辽宁省东沟县内）就是其中的罪证之一。我们俩就是那次事件的幸存者。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义勇军邓铁海、阎生堂的队伍经

常化装成各种人物出现在安东、凤城一带，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南岗头是一个小堡子，共有三十六七户人家。义勇军阎生堂部队的王队长、那队长、宁副官经常到这个堡子活动，有时就住在王忠学和姜春田的家里。

当时，南岗头有1个人，叫宋政祥，在安东县日本人开设的迁山粳米所做职员。1936年农历八月，宋政祥在探家中听说阎生堂的队伍常住在南岗头，回到县里就报告了警察局，警察局又报告了日军守备队。

1936年12月14日，日军守备队在南岗头附近的小姜堡子场院窝棚里，搜捕了义勇军战士于德新、齐小惠二人。晚上日军守备队和安东县伪警察局张局长带领100多名日伪军，把南岗头附近的150多个男人绑起来，押到离南岗头七八里的红土山姜云枫院里。第二天上午，又把红土山和附近的宋家坨子、马家堡子的男人都绑到红土山，前后被抓去约300多人。我俩也被抓去。伪警察局张局长挥着战刀，威胁说："马胡子（指抗日部队）来了，你们要马上报告，不许给他们饭吃。不报告，就杀你们的头，烧你们的房子。"大家只是怒目而视，都不吱声。在张逼问能不能做到时，也有人应付一声："能！"张又向被抓的人说："有没有王队长、那队长？说出来可以保命，不说实话保不住命。"大家说："没有！如果有，我们就说啦。"张就把宋大粉匠从人群里拉出来问："你就是王队长！"宋不承认，被打了一顿，又灌了凉水。张又问大家："他是不是王队长？"大家说："他不是，是宋粉匠。"这才把他放了。这时，听见王忠学在后屋被人打得直叫喊。张最后又说："把马胡子带来，逐个地认，看谁'通匪'。"接着把于德新、齐小惠押出来，叫我们摘下帽子，一个个地从他俩面前走过去。日军和汉奸在前后监视着，结

果敌人一无所获。下午伪牌长吕长久被留下押送到龙潭，就把大家放回家了。

第二天，天刚放亮，下着小雨，日军守备队友枝、牧野和安东县伪警察局张局长带领守备队十多人和“自卫队”100多人，把南岗头团团围住。然后到各家搜查，不分男女老少，被赶到姜德春院里。这时有个自卫队的人喊：“谁是那队长、王队长？赶快出来。”可是，没有应声的。自卫队又再三威吓，群众中有些人说：“没有”。这时日军翻译又问群众：“谁是马胡子，马胡子来没来？”群众不吱声，他们又把牌长吕长久叫出去审问、灌凉水。最后，伪警察局张局长又说：“姓宋的都出来，谁是串门的出来。”姓宋的，就是指宋国本和他的本家共20多人，都出去了。有个叫雷景春的，外号叫“雷大虎子”说：“我是串门的。”他也出去了，还有两户朝鲜人也被叫了出去。

余下的人，男的每8个人绑在一起，带到姜德春的后院的东头。自卫队把一间屋子的窗户打开，窗台前放一条凳子，叫被绑的群众一起踏着凳子从窗外往屋里进，走到炕沿时，日军就开枪把这些人打死。再逼赶另8个人往里进，又开枪打死，就这样一批一批地进行屠杀。

当时，姜德春的年纪很大。他和于天发、许恒志等人在后，一看进去是死，不进去也是死，干脆就切断了绳子和日伪军撕打起来，姜德春被日伪军用铁锹砍昏了过去，于天发后背挨了一刺刀，许恒志左腿被子弹打穿，他们都倒了下去，被“自卫队”拖到屋里。过了一会儿，他们苏醒了，挣扎着爬起来，摸到后门口，跑了出去。许志恒因流血过多，不到半月就死了。有个外号叫“杜疤拉眼”的，还有一个姓徐的，看情况不妙，往外逃跑，被日军骑马追上，开枪打死了。有个叫姜吉盛的，躲在场院窝棚里，被日军发现，用刺刀刺死。郭连盛和郭莲茂弟

兄2人，乘隙逃了出去。从仁山第四个儿子躲在鸡窝里，趁烟雾大时，抱着8个月的小侄儿溜出来，躲在大楼房亲友家。有个叫王忠实的，从耳屋顶上逃了出去。其余的男人都被杀害了。

把男人杀完后，日军守备队就把妇女和小孩驱赶到姜德春前院东厢房里，日寇便向屋里开枪，妇女和孩子在一片惨叫声中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然后，日寇和"自卫队"把姜德春前后院的房子都放上草，点上火，没有被打死的人都活活被烧死。有的妇女和孩子从火堆中爬出来，日军就开枪打死或用刺刀挑死。火越烧越大，整个堡子都着起来了，一直烧到上午10点多钟，日军和"自卫队"才离开。我（张春发）从苞米仓子里钻出来和躲在小厦子棚上的张庆德侄叔2人，到火堆中找自己的哥哥和妻子。张庆德从火堆中看见妻子的腿被打伤了，和我把她抬到场院窝棚里，因失血过多，当天下午就死了。有个经常要饭的老宋太太，满身是血，一步一步地从余火堆里爬出来。

我家（姜德春）的大门口，有个30多岁的妇女躺在门槛上，满身血污，她见到张春发说："我是老郭家的，你给咱们家里的人一个信，来归弄我的尸首吧。"张春发见很多人都死去，有些尸首都烧枸挛了，认不出是谁，他哥哥的尸首也没找出来。第二天，附近的群众把被害者尸首按男女分葬在村头路旁的两个大坟墓中。在那些日子里，死难者的亲友常去墓前放声痛哭，七八天内哭声不断。路过的行人见此情景，也不禁悲伤、落泪。

在南岗头事件中，只有宋国本全家25口人和两户朝鲜族十一二口人（其中有一个叫安振洁的）没被杀害。这次事件前后被杀死275人，烧毁房屋156间，个别活着的人只好四处逃荒，一个好端端的村庄变成了一片废墟。

（摘自《辽宁省文史资料》第七辑，东沟县政协供稿）

窟窿榆树村农民季福仁等九人被日本侵略者残杀的经过

张德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后，实行了残暴的烧光、抢光、杀光政策。日本侵略者为了捕灭我爱国同胞抗日烈火，捕杀了大批抗联的地方工作人员和抗日群众。新宾满族自治县大四平乡的季福仁、张喜鸿等八人就是在那时惨遭杀害的。

大四平，那时叫窿窟榆树，是桓仁县第六区区公所所在地，是新宾、桓仁、本溪三县的交界地带，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活动的中心区。当时，许多青壮年农民参加了杨靖宇将军领导的抗日联军，有些为抗联做地下工作，买粮食、储存粮食、做衣帽鞋、买药、盐、棉花、靰鞡、修理枪械，特别是传递情报等等，做了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工作，担惊避险，不少人被日伪当局抓去坐牢杀头，不声不响地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青年农民季福仁（29岁）、张喜鸿（27岁）、从振岐（25岁）、国学海（44岁）、姜振川、顾殿义、王殿阳、程义发（皆不到30岁）等8人，就是在那时为国捐躯的。

1936年农历十月初，抗联正处于极端艰苦的斗争中。杨靖宇率队转移到桓仁老秃子后，为抗联收编了的山林队“于乐好”来到了窟窿榆树东南八里、老草帽顶山脚下的四平街，找到抗联的地下工作人员从振岐、顾殿义、张喜鸿等人要粮食。顾殿义家住在四平街的狍子圈沟里，为抗联藏粮较多。顾殿义等

人说："我们是给红军（指抗联）存了一些粮，若给了你们，杨司令来了，吃什么呀？""于乐好"没弄到粮食，很不高兴地带人走了。

后来，"于乐好"投靠了日本。抗联的地下工作人员和抗日群众，听说"于乐好"同其崽子（胡子帮头领的警卫、通讯人员）投靠日本做了汉奸，都不安起来，担心他们递出抗联人员，轻者一人杀头，重者诛灭全家，谁不担惊受怕。没办法，能躲的躲了，能走的走了。窟窿榆树地方抗联主席、党支部书记张喜祯躲在山上一年多，家里人以为他已饿死在山上。有的全家人出走奔了北省（黑龙江）。但仍有一些人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离开家。这些人为了不受"于乐好"陷害，就凑钱、弄大烟土（鸦片）给"于乐好"送礼。

窟窿榆树有个远近有名气的说客，名叫王子荣，绰号叫王老总。他的侄子王殿阳参加过抗联，后来做地方工作人员，王殿阳其父亲王清禄正为凑不出钱而忧愁焦虑。恰巧，王子荣在一朋友家见了窟窿榆树警察署长敖瑞芝，对他说："胡子（俗称）降了日本，还熊人。"

敖瑞芝问："怎么个事？"

王子荣便将"于乐好"投降日本收礼受贿的事和盘端了出来。

敖芝瑞回桓仁县向上司把"于乐好"被抗联收编，进行过反满抗日斗争，现在又投靠日本的一些事做了报告。警察署立即抓到了"于乐好"，并将其枪崩了。日本翻译官看"于乐好"的崽子年纪青青，聪明伶俐，就收留了他。

"于乐好"的崽子便将窟窿榆树一带参加过抗日联军，和为抗联工作的地下工作人员及抗日群众，全部供了出来。日本当局命令伪警察立即连夜出动，翻过草帽顶山的老岭，来到窟窿

榆树和四平街。

1936年农历腊月，日本指导官伟奇率领队伍于窿窟榆树逮捕了抗日联军连长马长山、情报员从振岐，地工员季福仁、张喜鸿、国学海、程义发、顾殿义、王殿阳和铁匠姜振川，还有一个不是抗联人叫董金龙的，共10人。

这被捕的10人连夜被押送到桓仁县。在过了草帽顶山老岭后，在桓仁县八里甸子区（今八里甸子乡）的门转子地方，日本人指使伪警察将顾殿义、姜振川、王殿阳、程义发、张喜鸿、国学海六人绑在树上、割了六棵榆树腰子，象捆柴禾一样，从嗓葫芦往脖后边的树上一勒，在树后绕两个半劲，就把人活活勒死，人们管这样的死刑法叫"两半劲"。就这样，6个人被勒死了。

走在半途中，那名叫董金龙以他巧辩之舌又向日本人使了钱，被放跑了。后来此人投靠了日本。

日本指导官伟奇及伪警察，不熟悉草帽顶山南坡各沟岔山路的路径，留下季福仁、从振岐两人给他们"拉道"（做向导），将他们带到桓仁县的八里甸子（那里八里甸子设区）警察署，在这里"居留"了六七天。

这些人被抓走后，窟窿榆树村村长张立义，字敬乙，决定用联环保的办法救出这些人来。张立义为村内能言善辩、通文熟墨之人，早在杨靖宇抗日联军进入新宾、桓仁之初，就参加了抗联地下工作，后受杨靖宇及其政治部部长胡国臣的委派任了村长，明为日本干事，实为抗日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大村屯设"大会"，小村屯设"小会"。"大会"由几个"小会"联合组成，"大会"、"小会"皆由村民为保卫家乡安宁而自动组织起来的，"大会"有几支土枪。

村长张立义召集大村小屯各家各户签名划押，联环下保，证

明被抓的9人（除董金龙外）皆是安分守已的良民。联环保签押完毕以后，立即委派青年农民（也是抗联地下人员）张立忠连夜赶往八里甸子。当张立忠奔到桓仁县四道阳时，见到一个当地的熟人，问："你干什么来了？"

张立忠说："送保。"

那人说："晚了，季老大和从三子（指季福仁、从振歧）头天在八里甸子挑了，顾老大他们早就在门转子勒死了。"

季福仁、从振歧和马长山被押在八里甸子时，日本指导官伟奇又带人到外三堡讨伐。在归来的时候，伟奇不慎将心爱的战刀（腰刀）失落在雪地上丢了。回到八里甸子心情也不顺当，就向季福仁、从振歧开刀了。马长山后来被押到了桓仁县监狱，也病死在狱中。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第九辑）

杀人如麻

——日本侵略者在新宾县响水河子、红庙子、旺清门等地大肆烧杀情况调查

张德玉

1935年（康德2年），日帝在新宾的响水河子一带以"抓梁司令（梁世峰）消灭'匪徒'安定秩序"为借口，在响水河子抓了"十家长"朴成植、宝林、富贵、尹斗七等130余人。朴成植喊："别打！他们没有罪，什么事都是我搞的，不要打他们。"

日本侵略者当场枪杀了十家长朴成植，随后又枪杀了70余

名汉族、朝鲜族青壮年同胞。那50多名没死的人，手脖上被日本兵用刀割上“×”型刀痕，用黑炭摸上记号，说以后不老老实实当“良民”，再抓到就杀。现在，尹斗七、严凤熙、韩植道等人的手脖上仍留有黑色“×”型残痕。

为了缩小围剿圈，使抗日武装力量没有活动范围，日本侵略者烧毁了响水河子、双砬子、大荒沟、夹河北、房平沟等村屯的全部房屋棚舍，约有2 200百多间，血洗了响水河子、红庙子，残杀我同胞3 000多人。剩下几个没有被杀死的人，只好搭窝棚住。

1933年(大同2年)，农历二月十三日清晨，日本侵略者在旺清门镇的东山和后山架上机枪，向江东、西山堡和旺清门街里扫射了半个钟点，当即打死了正在做饭的2名妇女，1名汉族妇女，1名朝鲜族妇女，还打死1个老头。

扫射后，日本讨伐队凶神恶煞般地窜进堡子里，不由分说地枪杀了40余名无辜百姓。

朝鲜族妇女金在元的母亲、丈夫、叔叔、弟弟等7口人被抓去杀害。杀了人不算，还在房上浇汽油，点火烧房子。旺清门镇、江东、西小堡等村屯1 000多间房屋被烧光。金在元的父亲冒着烈火，冲进屋里，抢出两个孩子，不顾日本讨伐队兵士的打骂，抱着孩子逃出去，留下了3条性命。

当天晚上，各家上山找亲人的尸体，只找到了14具，其余的全部活埋了。当夜大雪过后，尸体的热气将雪化净，许多人家才找到死去的亲人尸骨。

1937年(康德4年)，日本领事馆利用鲜侨败类金亨德等人为巡查，专门搜捕反满抗日人士。在旺清门一次抓走80余人，几乎全部被杀害。金亨德还把两个正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当场杀死。旺清门后山、响水河子、红庙子的高丽山城等地，到处都有

"万人坑"和"百血坑"。城关区警察署警佐金相玉（朝鲜族人，日帝走狗），外号叫"金大刀"。金相玉中上等个头，地包天的嘴，长相凶恶，眼神发贼，他父亲外号叫"金半斤"（一次喝半斤酒）。一天，"金大刀"进了前进三门市部西的永新商会的杂货铺，铺里的人见了"金大刀"都恭迎敬立。有个跟"金大刀"同过学的人，叫洪洛元，他抚摸着"金大刀"的刀说："你这个刀怎么这么快（锋利的意思）呢！杀人一刀一个。"

"金大刀"说："我做这个事，练的，刀片也快。"

说着，扬起刀往明柱上斜砍一刀，一刀就砍进一豁豁深。"金大刀"说："象你吧，洪洛元，我怎么认识你（意谓人很熟，关系较好），嘴里跟你说着话，眼睛就端量你的脖子，怎么下刀才能一下砍下头来。"被"金大刀"金相玉砍死的人，据说在千人以上。

日本侵略者随心所欲地枪杀无辜百姓群众，无论是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在家里操持家务的妇女，在路上赶路的商人，在院子里玩耍的儿童，都不能幸免。他们拿杀人取乐，更有甚者，有时竟把被杀的人头割下来挂在路旁村头的柳树上，一棵树有的竟挂十多颗人头。尽管人头被割下，但颗颗人头都是怒目圆睁，显示着被欺凌的人民的反抗精神和斗争意志。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第九辑）

两个村庄民房被付之一炬

张守臣　杨旭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一个用封建迷信方式聚众的、集而为兵、散而为民的民间武装组织——红枪会在建平县的黑水、小塘、三家、深井等地，纷纷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其矛头直指日伪政权。

1933年春，日本侵略者侵占建平后，对老百姓实行残酷的统治，要大烟干，抓劳工，名目繁多的捐税，逼得民众痛不欲生。特别是由日本人严尚、木田等控制的黑水伪警察署，对黑水一带百姓的压榨更是残酷。许多无辜的群众被投进监狱，逼得家破人亡。西南关村的孙月、陈福山等农民，因交不上大烟干，被抓进警察署，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被敌人放回后，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

百姓们对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早已恨之入骨，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关东军，宪兵队，警察狗子协和会，如狼似虎没人味”！

面对日本侵略者、伪警察署的所做所为，当地农民李子成愤然而起，在黑水的大营子、四分地一带秘密发动民众，成立起红枪会组织，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有200多人加入红枪会。

红枪会规定了严明的纪律：“不准调戏妇女；不准拿百姓的东西；不动荤等。”同时编成歌人人会唱。以连、排为组织形式，还设置了会旗。

1937年8月14日。李子成率领红枪会百余人，身背大刀，手持牛耳朵扎枪，胸戴红兜子，高举大旗，口喊：“ ！ ！ ！杀！杀！杀！”涌向黑水街。在李子成的指挥下，摆开了阵势，得快地将城门攻下。城门一开，会徒们鱼贯而入，冲向伪警察署。警察疯狂阻击，双方展开了激战。战斗中张世玉、刘振才、任天元战地身亡。因急攻不下，李子成就下令在拂晓前撤退。

8月15日，日本侵略者严尚、木田调集日军和伪警察进行反扑。日伪军全副武装，分乘3辆卡车，架起机关枪，驶向四分地和陈家沟村。村民和会徒们携家眷四处躲逃。日伪军抓不到人，就将钱物抢劫一空。最后，就是放火烧房。把各家的炕席竖起，倒上汽油点燃，顿时火光四起，浓烟滚滚，两个村庄的全部房屋被毁之一炬，荡然无存。尔后，日军和伪警察又在附近大小山头搜捕，会徒丁清和不幸在山沟被捕，装在麻袋里被害死。日军和伪警察又发现了李子成的踪迹，追到黑水乾坤山下，李不幸中弹身亡。日军将其首级砍下，悬在黑水街东门外。

一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却在广大人民心中埋下更加仇恨的种子。日本侵略者惨绝人寰的罪行，更加激起了人们的反抗精神。

（摘自建平县《政协简报》总第54期）

头挂村边树

孙　庭

我今年已是83岁的老人了，记得50年前发生在我们村的一件惨案：自打朝阳县落在日本侵略者手里，庄稼人整天提心

吊胆地过日子。总是听说南三区的这里被日本军烧光、那里被日本军杀光了。有风声说日本讨伐队要来东五家一带讨伐。

到了这年（1938 年）4 月，来讨伐队的风声越来越紧。还传言讨伐的重点是我们塔营子。为啥？谁也说不清。有的说日本军得到情报，说塔营子窝藏八路军，日本人来抓八路；也有的说因为东五家有日本人开的金矿，为了保护金矿来讨伐一下，吓唬吓唬老百姓。我们塔营子祖祖辈辈都是劳而苦的穷百姓，赶过召都巴集的人就算见过大世面的。听说日本军要来，进了 4 月人们夜里就不敢在家住了。总是拖儿带女的住到村外的大山里，那个罪受的没法说。有些年轻力壮胆子又大点儿的，白天回村看看。

我忘记是那一天了，下边（指东五家）有人捎上口信，说日本讨伐队到了东五家。有四五十号人，领头的日本官叫佐藤。也不知道佐藤是多大的官、啥军衔、部队是什么番号，就听说这个佐藤杀人不眨眼，拿着杀人取乐儿。捎信的人叫沟里人赶快藏好，否则叫日本军抓住就没命。

塔营子一共10多户人家，听到这个信可吓坏了。大人带着孩子、带点干粮，到山里躲起来。孩子一哭，当妈的赶紧用奶头把孩子的嘴堵住。哪里有点动静，吓得浑身起鸡皮疙瘩。

第二天上午，我们从躲藏的地方看到村子起火了。我们村的张广林心疼他的几间破房子，去村边张望，被日本军看见抓住了。说他是“红胡子”，用木棍打他，把胳臂粗的木棍打断好几根，最后把他按在小河沟里，又给他灌凉水，直灌到晕死。

村民程万财，人们都叫他小老程，带着九岁的孩子藏在山中，带点干粮吃光了，孩子饿得直哭。他怕孩子哭声引来日本兵，又惦记着家里的破烂东西，便偷偷跑回家。正巧被日本人发现了，他也看见了日本兵了，就不顾一切地往山上跑。日本

兵这下可有目标了，象恶狼见了猪崽一样，把程万财抓住，绑在树上，十几个日本兵轮着打，打得皮开肉裂，昏过去又用凉水喷过来再打，昏了再喷醒，硬逼他承认是“红胡子”，并向他要枪。折腾了大半天，天快黑了，日本兵才把塔营子房子全部点着，而后带上程万财返回东五家子村公所。

回到东五家子，把程万财关在小学校的一间空教室里。日本兵将老程天天打昏几次，有时抓住程万财的头发打，头往墙上撞。程万财痛得惨叫，吓得许多学生不敢上学。

塔营子聚集20多名乡邻，豁出死去村公所保程万财，说老程祖祖辈辈都是老实厚道的庄稼人，甭说自己有枪，怕连枪是啥样他都没见过。日本军官不许老百姓保老程，架起机枪驱散了保人们。抓去的第4天头上，日军用战刀把程万财的头砍下来，并把人头挂在村南的一棵榆树上。经过说情，日本军才准许把老程的无头尸体抬回埋了。

程万财那颗血肉模糊的头颅，在树上挂了十多天，直到讨伐队撤走了，程家才把人头取下带回去埋了。

日本侵略者真是罪恶滔天，他侵占东北十多年，掠走中国多少物资，掠走我们多少黄金、白银，残杀中国多少像老程一样的无辜百姓，这笔血海深仇我们应永远记在心里啊！

补　白

1938年4月，日本军官佐藤带领讨伐队对塔营子进行了讨伐，烧光了全村房屋，并捉走了地地道道农民程万财，诬其为“红胡子”，施严刑后老程不招认，便被砍头悬于东五家子村前榆树上示众。在东五家子小学教书的先生王东升，对此情此景，亲闻目睹，对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气愤已极，并感慨尤深。于是，他便提笔写诗，哀悼平民之不幸，怜叹华夏之沦亡，斥

汉奸之为虎作伥，咒日军之残暴凶狂。该诗作已被收入朝阳县政协、县志办合编的《朝阳历代诗词歌赋》一书中。

（韩明福整理，摘自《朝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佐藤刀铡爱国志士

王瑞林　陈　瑛

1937年（伪康德4年）日本侵略者在北票朝阳沟、长条沟、关地沟等地对我抗日志士制造了枪杀、活埋、挖心、火烧等数起骇人听闻的惨案之后，于翌年11月24日，又在娄家沟用铡刀杀害我同胞11人，制造了娄家沟惨案。

娄家沟位于北票县城北约25公里处，是北票通往黑城子公路沿线的一个村。该村附近的兰家窑是抗日英雄兰天林的家乡。兰天林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医巫闾山以东举起"东北农民抗日拥张铁血军"的大旗，1933年又转战到家乡，号称"抗日灭满救国军"。兰天林同刘振东、老梯子、周荣久等抗日队伍联合，向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一次又一次规模较大的围攻和突袭。如1934年奇袭奈曼、二打黑城子王府，1935年围攻北票等地，都给日伪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兰天林这支队伍成了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打得敌人焦头烂额。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侵略者派来以"活阎王"佐藤为队长的日本讨伐队，四处追剿兰天林的抗日队伍，并在娄家沟村设置伪村公所和警察分驻所，以强化治安。他们还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兰天林，千方百计地企图扑灭这抗日火种。

娄家沟遇难的11名同胞，多是兰天林队伍的成员（其中一人因其哥是兰天林的部下，也被抓来了）。他们被俘以后，受尽严刑酷打，但始终宁死不屈。于是，敌人穷凶极恶地把他们用刀铡了。

这一天早晨，天空布满乌云，北风刺骨，雪花纷飞。佐藤的百余名日伪军，乘军用卡车冲进娄家沟。接着，娄家沟等3个村的居民，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能走路的孩子，均被伪村长和伪警察驱赶到到杀人场上。杀人场设在村南靠树林的一片开阔地中间。东面是佐藤的指挥台，西、南、北三面挤满被日伪军荷枪实弹包围起来的群众，场上并架起四挺机枪。上午10点多，11名爱国同胞被日伪军用枪托触打着，推拥着，押到一口铡刀前。站在最前面的是爱国志士齐孝祥，他被日寇捕后两个多月，经受各种酷刑，腿骨被打断，头部血肉模糊，但他对敌人，仍怒目而视。临刑前他向家乡拜三拜，而后抬起受伤的手掖袄领，便毅然躺在铡刀上。此时，佐藤从太师椅上跳下来，手握战刀"哇啦"一阵，翻译官译成中国话说："皇军说，谁要再反满抗日杀头是问！"随后便开始动刑。刀下头落，血花四溅，洁白的雪地顿时一片殷红，其惨状目不忍睹。

事后，佐藤命令将11个血淋淋的人头，连同从外地携来的10个人头，一起挂在路边的大杨树上示众。

（摘自《朝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处决警尉补　群众遭祸殃

李大昌　赵武军

1943年1月13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凌源刀尔登的尖山子，制造了一起逮捕群众43人的惨痛事件。

伪满时以尖山子为中心点的柏杖子、柏家台、西沟、下仓与虎头石等10余个村庄为一个甲（伪甲事物所设在尖山子）。这个甲地处凌源县刀尔登西南20华里，山高路险，树木柴草繁茂，很适于开展抗日游击活动。1942年秋季始，我冀东十二团一营以两个连的兵力，奉命向青龙都山东北地区积极活动，破坏平泉铁路和电线，袭击平泉、汤道河、朝阳山等处敌人据点，消灭敌伪组织。尖山子甲和四邻的毛家店、马杖子、胡杖子甲等地方，我军经常出没在这里，每当我军走后，敌刀尔登警察署的特务也时常赶到此地，会同尖山子甲长张余，以“私通八路”罪欺压百姓，鱼肉人民，对此当地群众恨之入骨。此情况被迁（安）青（龙）平（泉）联合县第八区（设在青龙汤道河）民政助理于建华和通讯员张荣轩得知，下决心要教训这个效忠日本侵略者的伪甲长张余。经区领导同意，于建华同志带领5名区干部，于1942年冬一天午后来到尖山子甲西沟庄，调查得知张余在家，正与刀尔登警察署的警尉补房继武在西厢房抽大烟，于建华和通讯员张荣轩化妆后，巧妙地将房继武绑起来，带到西沟庄进行审讯。甲长张余趁于建华、张荣轩捆绑房继武之机，溜出西厢房奔正房跳窗逃跑。房继武平素罪恶累累，民愤很大，当即将其处决在西沟庄外。

伪警尉补房继武被处决后，敌人疯狂地寻机进行报复。1943年1月13日（即1942年农历腊月初八）清早，伪刀尔登警察署讨伐队和日本宪兵队40余人，在日本宪兵队长赤津精男的率领下包围了尖山子、柏家台、西沟三个村庄。将三个村的男女老少200左右人赶到尖山子庄外河滩上，开会进行训斥而后抓走成年男性群众43人，到刀尔登装入汽车押送到凌源严刑审讯。判刑后，分别送到承德、阜新、鞍山、四平、本溪湖等地服刑。被绞死1人、死在狱中9人、送矿山当劳工的23人。其中：张国云，判刑后押送承德绞死；王墉死在承德监狱；王勇、王林、申宝余死在鞍山监狱；王宗廷、申维军死在四平监狱；王云、王维死在本溪湖监狱；王发入本溪湖监狱后重病回家；胡海青押送承德监狱；裴云押送到抚顺充当劳工死在抚顺。申宽、王甫、王任德、王金凤、田凤芨、刘瑞廷、王宗富、申宝和、王良、刘奎、刘瑞芝、王凡、刘义、刘印、王宗海、阎荣、卢占玉、裴云、张振树、柏文化、张恩、田凤余、卢友、裴玉、柏恩、柏存、卢占春、裴友、柏文海、张振雨、王普寺39人押送到阜新充当劳工。

上述43人，除死在监狱里的以外，余者直到1945年的"八·一五"祖国光复，才回归家乡与亲人团聚。

（摘自《朝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吉林省

日本侵略军屠杀怀德镇人民

刘金贵

1931年12月日本侵略军侵占了怀德镇。他们进城后打着"剿匪"的旗号，肆杀无辜。12月5日，日本指导官大塚带爪牙在城内外逮捕了18个怀德老百姓，并把他们圈在怀德街公所院子里，强令这些绑缚着的百姓一字排开。不从者，督责以马鞭。一鞭，一道子血。之后，大塚抽出战刀，狼獥地叫着，对他们的脖子挥刀就砍。有的，竟一刀削掉两颗人头，凶残极了！有的，虽人头落地，但躯体还挺立着，颈上的血直蹿，大塚如狗夺食，哼哼着，踹倒尸体。没一会，18个冤屈的中国人都惨死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屠刀下了！随之，大塚指令警察沿街摆一大溜板凳，将人头置其上示众。血直染了半条街，其状目不忍睹。

1934年，怀德镇又来个小野田指导官。他杀人较其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10月20日，小野田指挥警察一次就抓了19名所谓不轨群众，押在警察署后院。一天中午，小野田把警察署

院的后门打开，放出押着的人，松了绑，令他们逃跑。这些人一逃，警察的枪一齐扫射。小野田管这叫练枪法、“打跑”，19名无辜群众无一幸免。被打死的人，有的摔断了牙，有的撞露了头颅，令人发指！

（摘自《公主岭文史资料》第二辑）

黄柏惨案目击记

高富昌口述　高其昌整理

伪满初期，大汉奸李寿山的叔叔李翰臣，住在辑安县（今集安市）黄柏甸子村经商。当时一支抗日武装要换装，给他送了个信（当时叫“黑帖”），勒令他按期将200双太阳牌胶皮鞋，送到指定地点。李翰臣本无爱国心和民族感，但迫于这支队伍的威力，不照办怕饶不了他，于是迫不得已按数给送去了。

不料此事泄露，被伪宪兵第五团知道了，把李翰臣逮捕入狱，押在辑安宪兵队。李翰臣的家属，急忙给他的侄子李寿山送了个信，向他求救。这时李寿山正在临江讨伐抗联，闻讯赶到集安。第五宪兵团司令姓王，是个回族。他听说李寿山来了，急忙赶到东门外迎接。我当时在县城兴安学校任首席教师，也奉命随同校长组织全校师生到东门外列队迎接。

李寿山来后，住在福盛裕商号，与宪兵第五团王司令交涉。王司令碍于李寿山的势力，不得不让步，于是与李寿山密谋了一个办法。责令黄柏甸子警察分署和村公所，逼迫当地的老百姓到县里来保释李翰臣。老百姓被逼不过，只得赶到县城保释。有个地主没工夫来，让他家雇的小猪倌拿着他的手戳，跟随大

家进城保释。据说还有个游乡的匠人，正好到这个村干活，为了凑人数，也一块被顶了人数送进城里。共计来了几十人，被宪兵团安排在县城“公和顺”杂货店的货屋子住下。

伪宪兵团王司令开庭审判李翰臣。李翰臣按着事先教他的供词说了一遍，表白他没通抗联。伪宪兵王司令问他能否找到保，李翰臣说能找到。伪宪兵王司令便说：“给你两天期限，找保释放。”

两天后伪宪兵王司令又过堂。李寿山把事先逼来的百姓弄到大堂上作保。当证人画了押，将李翰臣释放后，却把全部保人扣押起来。诬陷这些保人通“匪”，要治罪。于是将这些保人的上衣扒了光着膀子，用皮鞋踢、棍棒昼夜拷打。并用老虎凳、灌凉水等刑罚上刑逼供。在“公和顺”附近，惨叫声昼夜不断。使路过的行人，无不感到毛骨悚然。伪县长汪毓昌与警卫队长佟某某从旁路过，那些被害的百姓齐声喊道：“汪县长！我们冤呐！”汪毓昌明知他们冤枉，却佯装没听见，匆匆过去了，根本不予理会。

一天夜里，在南门外屠宰场挖了8个坑。伪宪兵进到“公和顺”商号的货屋子里，伪善地对那些保人说：“快过年了，你们都想家了吧？马上就要放你们了，今晚放8个，谁先出来就放谁。”他的话刚说完，呼啦一下挤出来9个，那个小猪倌也挤出来了。伪宪兵数了数多了一个，叫谁回去谁不回去，他只好把这9人都带去了。带到南门外屠宰场那儿，把这9个无辜百姓砍了头，（按：还有一种说法，是日本人用笔乱点了8个人的名单，拉出去后，杀了7个）。为了暴尸示众，伪宪兵把这9颗头拣回来，放在“公和顺”的下屋库房子里。“公和顺”掌柜的姓于，大儿子叫于洪开，是管帐的；二儿子叫于喜开，和我是同学。这天于喜开夜里到下屋库房找东西，被什么绊了跟头，他找亮来

仔细一看，竟是9颗人头，吓得他几至昏厥。十几天后，便因惊吓而死了。

剩余的保人即将再次被杀时，我父高德隆听说了，托人给辑安商务会长李良斋送了个信，让他把我家与他家以及张世荣、宁卫清四家开的买卖“义丰厚”，兑出我家的股份，作价两千元大洋，让他拿这钱去买通伪宪兵第五团的翻译官，求他说情把幸存的保人释放。李良斋按我父亲的办法做了，翻译官收了两千大洋，不久把剩余的保人放了。

但我次兄高华昌回忆说，翻译得到钱后，又杀了一批，才把剩余的无辜者释放了。

（摘自《集安文史资料》第四辑）

血洗小西沟

祝玉清　刘占文　赵希桥　李树森整理

1932年8月7日，日军在我们海龙县四合堡村陈家街屯小西沟（现为四八石乡刘大村），制造了一起大惨案。在这次惨案中，有128名无辜群众被驻海龙县山城镇的日本守备队杀害。

1932年8月，住在海龙县小西沟的张振魁要娶小老婆。张是这一带出名的地主。为了炫耀自己的势力和威风，他在院外场院上搭了两个大席棚，雇了两伙吹鼓手，吹吹打打，晚间还有说大鼓书的、唱“蹦蹦”（二人转）的，全屯都热闹起来了。

8月7日是娶亲的正日子，天刚放亮，送礼的人就陆陆续续地到张家来了。伪区分队的村兵也背着枪前来助威。开“早席”的时候，一个姓刘的小伙子，端着方盘，给“席棚”里的

宾客上菜。他从厨房出来走到院当心，突然一声枪响，他应声栽倒在地。接着，枪声便像爆豆似地响了。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惊呆了，这时又飞来一颗炮弹落在院子里，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又有几个人倒在地上。“不好，鬼子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这时，被吓傻了的人们才清醒过来，于是，人们惊慌失措地四处奔跑。有的顺山沟朝北跑，有的往东岗逃，有的朝西坡跑，我也在慌乱中跑出了张家大院。这时，日本兵站在岗顶上看得清清楚楚，人们往哪里跑，他们就往哪里开枪射击。只听人群里一声接一声地惨叫，只见跑着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中弹身亡。顺山沟跑的群众由于目标明显，有数十人被打死在小河边。日本兵射出的子弹很密集，无法逃跑的群众，只好藏在小桥下，或藏在柳树毛子里。日本兵用掷弹筒向张家大院猛轰，老孟家12岁的姑娘被炮弹炸得尸体都找不全了；有一个姓胡的赶车老板，他媳妇抱着孩子没跑出大院，被炸死在磨盘旁边了。枪声停了之后，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进了张家大院……后来，侥幸活命的傅万和说：他们没跑出来的人，有的藏在柴禾堆里，有的趴在炕沿底下，有的跑到仓房里，可是都没有躲过杀身之祸。他在柴禾堆后，亲眼看见日本兵把张文学从屋里拽出来，一刺刀挑死了；杨小年趴在炕沿底下，也被日本兵用刺刀扎死了。最后，日本兵又把院里剩下一些人赶到了院外的场院上，让把上衣都脱下来，跪在地上，然后一个一个地拷问谁是“胡子”。张纸坊的掌柜张庆山，在村上管点事，日本兵把他拉到前面，问他这些人谁是“胡子”，他说：“谁也不是。”又问他知不知道“胡子”在哪？他说：“不知道。”日本兵就用枪把子打他，把他打个死去活来。这时，日本兵发现了藏在路旁小桥底下的人，就对着他们扫了一阵机关枪，藏在小桥底下的十多人全给“突突”死了。

这场惨案是怎么发生的呢？原来8月6日那天，特务跑到山城镇，向日本守备队报告："海蛟"带领人马驻扎在小西沟，还说明天张振魁娶亲，"海蛟"去参加婚礼。日本守备队立即派了五十多个日本兵连夜出发去"剿匪"。他们在距离小西沟15里地左右的中腰堡宿了营。第二天太阳刚露头，他们就来到小西沟的西岗上。架上机枪和掷弹筒。这时，屯里唢呐高奏，人声喧闹，一片喜庆新婚的景象，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杀身大祸，竟然从天而降。

在这次惨案中，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屠杀给小西沟留下了128具血肉模糊的尸体，造成一百多户家庭的悲剧。日本守备队走后，小西沟一片血海，儿哭娘、子喊父、妻哭夫、撕心裂肺……其悲惨之状，实在难于形容。整整3天，人们才把被日寇无辜杀害的亲人安葬完毕。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这起惨案，海龙县人民特别是小西沟的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梅河口市政协供稿）

辉南县油锤沟惨案

刘桂芳口述 范世强整理

我叫刘桂芳，今年56岁，小时候，家住在油锤沟。油锤沟在现在的辉南县楼街东南几里远的一个沟岔。我8岁那年（1933年）日本鬼子血洗了油锤沟，全屯老老少少差点都给杀绝。

那时，我们屯只有3户人家。我家之外，还有一个姓贾的，一个姓李的。我家9口人，我奶奶刘孙氏，70多岁；我爹刘宝，

40 来岁；还有一个15 岁的哥哥，叫刘魁武；一个17 岁的嫂子；一个姑舅哥哥，十八九岁，叫史魁武；一个姑舅姐姐，小名叫小丑子；我的姨父爷也在俺家住；我还有个6 岁的小弟弟。姓贾的家4 口人，老两口领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姓李的家3 口人，小两口领个小舅子。全屯一共16 口人。俺家从我爷爷那辈就住在这儿。

俺屯子旁边有条沟，俺们这3 户人家都在沟这头，沟那头有个空房子，是一个姓王的搬走了，扔在那儿的。

那年9 月26 日，傍晚上的时候，来了20 多个抗联红军战士，住在俺们儿家里。我家三间房，住不下，奶奶就让嫂子、表姐、我和小弟弟到沟那沿的空房子里去住。第二天天还没亮，奶奶把嫂子和表姐找回去给抗联做饭，我和弟弟还在那儿睡觉。天快亮的时候，猛丁传来一阵枪声，把我和小弟吓醒了。我们忙躲在炕沿根底下，我抱着小弟弟，使劲往炕墙那儿挤，一动也不敢动。枪声越来越紧，炒豆似地响成一片，有时枪子就像从我们头上飞过去，吓得我们透不过气来，不知出了啥事儿。枪声里还夹杂着日本鬼子的叫唤，才知是鬼子来了。后来枪打得稀了，往东边下去了，我和小弟还是不敢动，等着大人来接我们。可是不知咋事儿，过了挺大一阵功夫，大人还没来。后来才知道，楼街警察署的翻译官吴小个子（吴崇秀）领着鬼子寻着抗联的行踪，围了油锤沟，打枪那阵子，是抗联领着老百姓往外冲，一直往东去了，日本鬼子也追了上去。我和小弟等到快偏晌了，趴在那儿真难熬，又不敢动一动。正不知咋的是好，听到屯里又响了枪，还听到有人哭叫，听到叽哩哇啦的日本话。我们不知又出了什么事，吓得不得了。忽然，日本鬼子往俺这儿打起枪来。我搂住小弟，死死往墙角那儿躲，一动也不敢动。鬼子打了好大一阵子枪，才停下。我生怕来抓俺姐俩。大概鬼

子寻思这边没人，没过来。

不知又过了多大工夫，听到有人喊，乍着胆扒着窗户一看，妈呀，屯子里着了火，三幢房都烧落架了。丁家街、柳毛沟的老百姓，有的在救火，有的在旁边看，我知道鬼子走了，才敢出去。

回到家，我吓傻了。门前的树上挂着半个人脑袋，是让日本鬼子的战刀劈下来的，辫子和脸还都在那上面。这是我表姐小丑子啊！大家救灭了火，我在门后找到了奶奶和爹。奶奶的肚子被豁开了，爹也是让刺刀挑死的。嫂子死在屋里，她的胳膊被砍断了。表哥、姨父爷也都被杀死了。这时，我哥浑身是水，也回来了。我抱着他哭，哥也哭了。他是跟抗联跑出去以后，躲在水塌底下，没回来，才免了一死。我们一家9口人，就剩下俺们哥仨是跟抗联跑出来的。帮抗联运东西的两个外地老百姓，也被鬼子杀死在俺们家。

有人在老李家的后园子里看到了老李家媳妇，她一身血，脸都吓白了。她的胳膊叫子弹打个窟窿。大伙问她咋回事，她才说：“跟抗联跑出去，听到屯里没动静，寻思没啥事儿，大伙就回来了，谁知鬼子二返脚又回来了，这伙野兽，见人就杀，把我弟弟和掌柜的（爱人的俗称）都杀死了，还打我一枪。我躺下装死，才躲过来。鬼子杀完人，又放火，我在屋里，又是烤又是呛，强挺着不敢出去。直到约摸鬼子走了，才乍着胆从起火的后窗户跳出来，藏到园子里。”

老贾家男的领着儿子出去办事，媳妇和女儿在家，也让鬼子杀死了。

那一天功夫，全屯16口人，加上帮抗联运东西的两个老百姓，总共18个人，让鬼子杀死11个人。真是惨啊，放火烧完了，地上的血还看得见，到处是又腥又臭的死人味。

打那以后，我们活着的人都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了多年的油锤沟。

（辉南县政协供稿）

血洗四道河子村

姜永学

四道河子是汪清县罗子沟以西15华里的一个偏僻的山村，只有28户朝、汉族居民。离四道河子不到10里处，有个名叫四间房的地方，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团的密营警戒哨。再往上三十多里路，就是秃老婆顶子，整个山顶都是郁郁苍苍的密林覆盖着，山脚下长满了荆刺和藤萝，是野兽也都难以穿过的地方。在山顶上象簸箕状的山坳里，有几栋小草房，这就是三团的秘密营地。

四道河子是革命军管辖的抗日游击区域，村中有个较大的三间空瓦房。革命军一到四道河子，常在这里开会，教唱革命歌曲，进行抗日宣传。群众也冒着生命的危险，常往四间房三团密营警戒哨里送情报和粮食，东北人民革命军五军军长周保中等也常到这里，所以人们称它为“共产党司令部”。

1934年秋，四道河子反日会负责人王树彬，把亲日分子徐日南扭送西沟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并严重警告他“你不要为日本鬼子卖力，不许给鬼子当狗腿子。”当时徐的表现较好，有悔改自新的决心，开了群众大会，释放了拘押两个月的徐日南。

同年腊月下旬日寇癞子团长带领日伪军讨伐队从东宁来到

五甲屯准备过年。贼心不改的徐日南偷偷跑到红袖头[1]讨伐队去告了密。他说："四道河子是共产党的老巢，都是共产党，没有一个好人。"癞子团长当晚召开只有日本人参加的秘谋会议，筹划了血洗四道河子的罪恶勾当。

1935年一月十五日（旧历），正值元宵之夜，四道河子的群众还在甜睡的时候，癞子团长率领的一百多名红袖头伪军，把屯子包围了。到拂晓时分，一阵枪炮声过后，喊杀声、惨叫声响成一片。村东头的几家房子已被敌人点燃着起了火，敌人在屯子里横冲直撞，遇房就烧，见人就杀，仅1个小时全村的无辜群众一个一个倒在血泊里，一栋一栋的房子都化作灰烬。

大屠杀是从村东头开始的，吴禹俊、金群三等几家首当其冲。双目失明的丛树山母亲，腹部被敌人的刺刀挑得肠子都淌了出来，可是她的生命的最后一息也紧紧抓住已死的两个孙女的手，挣扎在血泊中，他的三儿子丛树人和赶车的老邹头儿，双双捆绑在一条绳上惨死在屯中央的水井边。他俩的头部各中了三发子弹，鲜血淋漓，脑浆并流。单身汉老殷头正在煮饺子时突然被敌人刺倒在锅台旁边死去。残暴的敌人还把受惊的群众统统赶到麦秸垛旁，用机枪射扫，进行骇人听闻的集体大屠杀。受难者当中还有外来的群众。三道河子的吴明学老人上山下夹子抓野鸡，正巧碰上讨伐队被打死。珲春县的地下工作者李英实和他的女儿来到金群三家，也惨遭杀害。

这场大屠杀，共杀害了57名无辜群众，其中16名是用刺刀挑死的。

在这场大屠杀中侥幸保住性命的，只有屯北头的三家人。当晚被枪声惊醒了的栾用德老人，他急忙从家里跑出来一看，四

---

① 红袖头：伪满靖安军，因军服袖子上镶有一道红布条而得名。

周看不见一个革命军，便知道事态不好，立即大喊“乡亲们！赶紧往河套后边逃啊！”薛德有、老丁、栾用德三家的男女老少听到喊声顾不得穿鞋光着脚急忙跑到河边毛林子中藏身，一直等到敌人撤走。这样只有三家的12口人幸免杀戮。

天快亮时，村子里面再也找不到人的影了。穷凶极恶的敌人，这才集合队伍撤走。临撤时，还将老邹头精心饲养的两匹大青马也抢走了。

天亮之后，三道河子的百户长金龙云和邻近屯的乡亲们赶到四道河子，从麦秸垛旁的尸体中共救出了8名幸存的朝鲜族婴儿。他们当中有负伤的，也有在被杀害的母亲背上呻吟着的幸存的孩子，他们已成为都没有爹娘的孤儿了。金龙云自己留下一个女孩子，其余孩子都分给愿意抚养的汉族人家。

虽然讨伐队已撤去，可是怕他们再来血洗，等到第二天上午才收拾尸体。有亲戚的遇难者，由亲戚钉简易棺材盛殓掩埋；全家被害的、没有亲戚的，就埋在菜窖里。

汉族青年丛树山和朝鲜族青年李××是二个幸存的孤苦青年。他们怀着满腔的悲愤，当天就找三团的密营警戒哨四间房去了。三团金政委当时接见了他俩，他们流着热泪诉说了四道河子大屠杀的惨状，并恳切请求道：“请革命军收下我们吧！我们要报仇雪恨！”

三团政委立即派一个班赶到四道河子察看了屠杀实况，第二天便批准他们入伍了。

（摘自《吉林党史资料》1987年第四辑）

血洗张酒局子屯

尹永安

1935年4月中旬种地前，农民刨茬子的时候，驻吉林四平的日本守备队，由一中尉率领在野外行军。到梨树八区智球村的张酒局子屯（仅有几家的小屯）时，正值一支抗日队伍在这个屯的田家大院里吃饭，放哨的人暗伏在炮台上，看见来了日本兵，一枪就把领队的日本中尉击毙落马，接着又击伤1名翻译。

日本守备队深恐己方人少，还击不久，即行溃走。这支抗日武装缴获了枪支武器和一匹战马，随后开走。

第二天，从四平开来日本守备队和保安队共150多人，开着汽车（由我驾驶），带着小炮，气势汹汹，直奔张酒局子屯。

日本守备队用武装逼着全屯男女老幼，全都到屯南大坑开会。连吃奶的婴儿也得抱着，有一个串亲戚的外屯人也在其中。

敌人在南大坑四外早布置了岗哨，谁也不许动。群众集中之后，日本守备队马上用机枪扫射起来，可怜全屯48人，全被屠杀在大坑里，房子也被倒上煤油，放火烧了。

事前，田家有个小孩到树趟子里去玩，这时正往家走，先听到枪响，又看见房子着火了，再看有日本兵，就扭头跑了。日军发现了他，对他开枪，子弹在小孩左右打得直冒烟，幸未打中，总算逃出虎口。全屯只剩下这个孩子。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日寇血洗东北岔

王维宇

1935年10月20日，日本侵略军为彻底摧毁那尔轰抗日根据地，组织了大批日伪警察和部队，进剿血洗了东北岔，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东北岔惨案。

东北岔即那尔轰。地处靖宇县（原闲江县）至桦甸县公路腰间地段，昔日的东北岔祟山峻岭，林海茫茫，俗称老山里。

1932年以后，杨靖宇将军就指挥抗日部队在这里活动。先后组织了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性组织。群众发动起来了，参军参战、送衣送粮、传递情报，掀起了抗日热潮。这里成了抗日联军的根据地，日伪当局的心腹之患。敌人曾多次发动袭击，均被我抗日军民击退。

1935年10月，日本侵略者得知抗联一、二军在那尔轰会师，先后两次召开了抗日大会，便恼羞成怒。经密谋策划，决定采取大兵进剿血洗的办法，摧毁那尔轰抗日根据地。

10月20日，侵略军调动了大批日伪警察部队，分兵三路向东北岔一带包抄而来。一路由闲江县桑文海为首的警察大队带路，日伪军百余人，向东北岔扑来；一路由驻辉南县日伪警察组成的100余人，由辉南出发直奔西北岔；一路日满军50余人，由特务“付罗圈”当向导，从桦甸出发，经王家店，向东北岔扑来。

这天早上，人们吃过早饭，开始了一天紧张劳动。有的收割、打场，有的做家务，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大祸从天而降。

这次屠杀是从二岔开始的。四道沟沟门老宋家，只有七旬老汉一人在家，这伙鬼子进沟后，一脚踢开大门，提着刺刀直奔老人。宋老汉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就被他们刺死。随着老汉的一声惨叫，老人的心脏已被刺刀挖出胸膛。紧接着便是火光冲天，几代人生活居住的房屋被化为灰烬。

在地里干活的人们看到火光，听到枪声，马上明白是日本鬼子来偷袭村庄。人们慌忙扔下手中的活，跑回家中，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向山里奔逃。手无寸铁的人们，还没有逃离，枪声已经大作，霎时间，路上的奔跑声、枪声，夹杂着女人、孩子的哭声和村民的喊叫声，昔日宁静的小山村，顿时一片混乱。

小西头村王永富家，一家7口全部丧生。六号桥吴德福双目失明的老父亲惨遭杀害。老罗子沟一家姓刘的，有老头、老太太、儿媳及两个孙女5人在家。鬼子进院后，发现在院里喂鸡的罗家媳妇长得标致，便将其逮住，调戏侮辱，媳妇拼命挣扎叫喊。公婆闻听后，跑上前去阻拦，婆婆跪在地上求饶，可是灭绝人性的鬼子哪里肯放过，他们杀红了眼，端起刺刀，将他们一一杀害了，全家5口都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东北岔河南，有个哑巴正在娶亲。婚礼刚刚进行了一半，鬼子进沟了，人们纷纷躲藏，哑巴新郎因要藏东西，晚走了一步，竟被敌人刺死在新房里。有一位妇女，听说鬼子来了，抱起唯一不满周岁的儿子就拼命往外跑，刚跑到院中，就被迎面闯进的鬼子刺死在院子里。不满周岁的儿子吓得哇哇大哭，鬼子伸手抓起小孩的两只小脚，一劈两半，摔在石头上，母子二人就这样惨死在院子里。

就这样，他们一路杀人，一路放火。下午2点多钟，他们杀到大东沟冯明臣家，见到人去房空，气得鬼子将冯家所有的东西全部点了火，冯家兄弟在山林中，看到自己家中几代人省吃

俭用积攒的家产，一时间成了灰烬，气得要跟敌人拼命，被老父拦住，老父气愤地说，这笔帐总有一天要算的！

长发沟王永德家里住着一位养伤的抗联战士。他听到消息后，拖着带伤的身体，奔跑于东北岔一带的沟沟岔岔。他见人就喊，见房就叫，“日本鬼子来杀人，快逃吧！我就是从长发沟跑出来的！”他带伤跑遍了老鹰沟、付家沟、老罗子沟、高丽沟、老畜沟，使村民们都得以安全转移。当他跑到东大沟准备进山时，发现张树启家还有人没有走，就又返回去通知人们赶紧撤离。就在这时，鬼子进村了，这帮杀人的魔鬼，二话不说，罪恶的刺刀就穿透了他的胸膛，其他二人也被刺成重伤。这位英勇的抗联战士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就这样牺牲了。

还有的乡亲被杀死在苞米地里，有的人手里还拿着镰刀。还有的乡亲被杀害在行走的路上。有一家在逃往桦甸的路上，不巧碰上了鬼子，躲藏不及，一家3口竟被鬼子刺死在大路上，又将尸体挂在大树上，五脏六腑都流在外面，真是惨不忍睹。

最后，强盗们杀到了于海庭家。这时东西两路侵略军相继汇合，他们发现杀错了地方，本来要杀西北岔，却杀到了东北岔。这就样，一场血洗的风暴才告停止。

这次血洗惨案持续了六七个小时，被害群众35人，伤多人，被烧房屋上百间，烧杀村屯14个，40多户群众的畜、禽、粮、物被毁之殆尽，无家可归，其惨状是在本县历史上少有的。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的又一次罪行，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靖宇县政协文史办供稿）

白家堡子惨案亲历记

李忠昌

我是白家堡子惨案中侥幸活下来的人，对白家堡子惨案，我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

1936年农历五月十二日上午，我抗日联军在王志明小坎伏击日本守备队，击毙11个日本侵略者。

时隔不久，日本守备队以“通匪”为名，把白家堡子四周的德胜岗、窖鹿沟、黑瞎子沟以及大荒沟南门外的大杨树，方圆20余公里划为“禁区”。对这个地区的百姓实行了严密的封锁。

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日本守备队又以送给养为名，把白家堡子30多个身强力壮的老百姓，骗到大荒沟警察署，毒刑逼供。

第二天，天还没亮，鬼子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从南沟北岔赶着成群的老百姓往外走。不一会儿，鬼子就冲到我们家，一个鬼子抓住我的胳膊，另一个鬼子朝我的胸坎上就是一枪把，然后就把我绑起来了，接着又把我姐姐和小外甥等十多个人也绑在这一条绳子上。

村里的人能走的都被赶出来了，就连从外地到这探亲的沈贵山和从东丰往临江搬家的老陈家（一家老小7口）路过这里也没放过，一起被抓走了。不能走的当场被刺死。鬼子端着刺刀赶着乡亲们往大荒沟走，一路上乡亲们走慢点就是拳打脚踢，斥骂不绝。三十多岁的刁大嫂领着2个孩子，大的5岁，小的刚刚2岁，大孩子走得慢，鬼子兵就用刺刀捅孩子脊背，孩子吓得往

前跑，被石头绊倒了，鬼子上去就是一刺刀，孩子哇地一声倒下去了。刁大嫂一手抱着2岁孩子，一手抓住鬼子的枪放声痛哭，这时鬼子一手拽枪，一手夺下大嫂怀里的孩子，摔在地下。刁大嫂不顾一切地跟鬼子撕搏，又一个鬼子上来对着刁大嫂的肚子连刺几刀，刁大嫂的肠子淌出来了，两个鬼子将她抬起来就扔到河里。回头又把5岁的孩子扔到河里，接着把那个摔在地上的孩子，也扔进河里了。

当我们走到小蚊子沟门老杨家时，杨家能走的都被绑走了，只剩下一个"坐月子"的产妇躺在炕上。鬼子端着刺刀，没容她起来，就恶狠狠地朝肚子上刺了几刀，当场刺死，鲜血溅了婴儿一脸，鬼子看到了哭叫的婴儿，又将婴儿一刀刺死。

天亮时，我们被赶到沟门我岳父陶玉春家。岳母常年有病，一个鬼子闯进屋里，用枪比划着叫她快起来。我岳母的病不用说往外走，就是爬起身子都难。鬼子端起刺刀劈头盖脑地乱刺一顿，她叫了几声就咽气了。鬼子兵出门就把房子点着了。一路上，日本鬼子像野兽一样，连杀带烧。

鬼子把我们白家堡子上下沟岔住的400多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都赶到守备队院里。房顶上鬼子架着机枪，院里的鬼子端着刺刀，严密地把我们围困在当中，整个院子象一座阴森森的杀人场。

审讯开始了。鬼子从上屋右门，硬架进去十几个身强力壮的硬汉子，用尽毒刑，逼问口供。可是白家堡子的老百姓，没供出一点抗日联军的情况。不一会儿，从左门拖出十多个遍体血淋淋的尸体。当审问到王万山、大老徐和老胡的时候，狗翻译李大个子替他的主子守备队中队长中山问道："抗联在哪？你说不说？"王万山愤恨地说："抗联在哪？！抗联到处都是，你们是抓不尽杀不绝的！"李大个子把这些话翻译给中山后，中山气

得像野狼嚎叫："你的通匪，死了死了的有！"接着他发疯似地嘶喊："给我杀了！统统地杀了！"一群豺狼冲上来，堵嘴的堵嘴，绑架的绑架，硬把3个人吊到拴马桩上，凳子一撤，3个人就活活地被勒死了。

接着，翻译李大个子伸着细长的脖子，替他主子中山喊道："百姓们，皇军问抗日联军在哪？说出来大大有赏，不说，（指着吊死的王万山等3人）像他们一样，统统处死！"院子里有400多人，一声不吭，鬼子无计可施，闯进人群就拽出结婚不到一个月的老黄家媳妇，威胁她说："你的红胡子媳妇，抗联情况不说，杀！"这个年轻媳妇说："不知道！"中山嚎叫着，一脚把她踢倒，朝心窝就是一刀，听她一声惨叫，接着就见中山把一颗血淋淋的人心挖出来挑在空中，恶狠狠地说："中国人的心大大坏了！"

这时，院子里孩子哭、女人叫，人就乱了。鬼子中山一看形势不妙，便和翻译李大个子凑到一起，经过一阵嘀咕之后，不一会儿，南门打开了。鬼子逼着我们从角门出来，往东山根赶。跟在我身后的赵文华，贴我耳边说："不好了，咱们不能等死，想法逃吧。"他说完，挣脱了绳子就向树林里跑，跑出20多步，就被鬼子开枪打死了。

我们慢慢地挪动着脚步。陈德华老婆是个孕妇，挣开绳子和鬼子撕拼起来，她用牙咬住了鬼子的手指不放，只见另一个鬼子的刺刀猛地刺出，孕妇倒下了，又一刺刀挑破了孕妇的肚子，把没出世的胎儿，挑在刺刀尖上。这种种惨状，真叫人目不忍睹。

当我们被赶到东山脚下，一些端着刺刀的鬼子紧紧地围住了我们，在山头上还架着机关枪。

大屠杀开始了。这边鬼子端着刺刀嚎叫着，先刺倒了前边

一排被绑的群众，接着，机关枪一响，后边的百姓也倒下去了。那时，我在中间，鬼子照我背后捅一刺刀，我只觉得一阵剧痛，浑身直颤，身子向前一斜，接着又连挨两刺刀，我就昏过去了。当我苏醒过来，就觉得背后木胀胀的。我睁开眼一望，天已经黑了。我刚挣扎着坐起来，只觉得背后火辣辣地一阵剧疼，就昏过去了。过了一些时候，我又苏醒过来，好歹把绳子弄断，就从死人堆里往外爬。前后左右都是尸体，遍地是血，手一摸粘糊糊的。我爬呀，爬呀，爬了多半宿，总算爬出来了。我拄着树棍子，忍着剧痛，晃晃悠悠地往沟里走……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白家堡子400多口人，除了我和郭汉臣、惠连芳3个人死里逃生外，都被杀害了。

（通化县政协整理）

白家堡子惨案

木村正二揭发材料

（1955.4.19）

一、时间：1936年（农历）五月

二、地点：通化省金川县（柳河县）白家堡子。

三、加害主谋者：通化省辉南县朝阳镇独立守备兵第五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大尉中山八郎。

四、被害者：居住在白家堡子的中国和平居民300余名。

五、事件经过：1936年五月，东边道南部地区，即通化、柳河、金川、辉江等各县展开了抗日游击战。盘踞在辉南县朝阳镇的独立守备兵第五大队第一中队长中山八郎，为镇压抗日联

军第一军长杨靖宇部队的抗日活动，命令其部下八岛曹长带一个小队侵入白家堡子附近部落（地名不详）。驻该村庄的八岛部队根据抗日军行动的情报，立即从驻地出发进行讨伐，结果在白家堡子附近某高地的山间狭隘被左右两侧高地的抗日军急袭，遭到毁灭性打击，损失轻机枪两挺和其他许多步枪和弹药。

接获上述战斗情报的朝阳镇中队本部，在中队长中山八郎大尉指挥下立即采取侵略行动，试图对抗日军复仇，但未发现抗日军，未遂所愿，于是向附近村庄白家堡子七八十户300余名中国和平农民转嫁仇恨，以未向日军报告抗日军的活动为理由，放火烧毁全村。300余名男女老幼村民悉遭惨杀（烧杀、砍杀、刺杀）。

六、上述情报来源：我因于1936年3月2日离开该部队，故未参加该事件，离队后任伪满警察官在伪奉天省警务厅司法科司法股工作。1936年7月，独立守备兵第五大队本部（驻海龙县山城镇）书记米村秋吉曹长（我在队时的内务班长，1940年任鞍山守备队长，中尉）到奉天公出时，从他闻知此事。

［下略］

赵玮检举书

（1951年9月25日）

揭露伪满时期驻柳河县日本守备队长中山大尉对白家堡子村实行集体大屠杀的血案。

一、大屠杀主谋与实施者：日本关东军驻柳河县守备队长——中山大尉（名不详）。

二、屠杀年月：伪满康德3年旧历五月二十七日。

三、屠杀地点：柳河县大荒沟村东南山根底下。

四、手段：用机关枪扫射和刺刀刺杀。

五、被杀害人数：计男女老幼368名。

六、目击与传述其事者：大荒沟警察白署长。

七、全部经过情形：伪满康德3年，约在四五月的时候，驻柳河县日本守备队派出一个小队的兵力约30人，配属伪警察约20名，组成一个“讨伐队”进山搜剿。在大荒沟里白家堡子村附近，吃了抗日联军青年队的埋伏，日本鬼子被打死11名。因此，激起恶鬼中山大尉的恼恨，而迁怒于当地老百姓的身上。他要屠杀无辜的人民来补偿他无可挽回的损失。他决定了报复的毒计，在败仗后二日，亲率大队将白家堡村围得水泄不通，把全村居民不论男女老幼，连吃奶孩子都在内，一个不漏地，像赶羊群似的赶到大荒沟警察署院内（与白家堡村相距约10里），不问青红皂白，每十数人分为一组，用铁丝和绳子绑在一起。此时正是早晨，天空还下着闲闲细雨，被绑上的男女老幼一串一串地被赶到大荒沟警察署东南山根底下，密集在一处，然后，用机关枪扫射，展开残忍无比的集体大屠杀。枪声一起，人们东挣西撞，挤成一团，弹丸比雨点还密打到人们的身上，就是铁铸的也会被穿得稀烂。一时，孩子哭老婆叫的哀号之声震动山谷。瞬息之间，活生生的368条生命就声息全无地倒卧在血泊里，堆成了尸山，作了恶鬼中山的牺牲品。当时的悲惨情景，非目击者实难描述。一群无罪而善良的中国人，无辜地被日本强盗给绑上了手脚，用杀人的利器——机关枪扫射，要跑不得，求活不得，只有瞑目待毙。试问人间还有比这再悲惨的事情吗？日本鬼子屠杀中国人和杀鸡犬一样，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残忍的人吗？他们在中国犯下无数的罪行，这只是千百件大屠杀惨案中的一件。更甚于此的，有名的“平项山”事件和冀东“潘家峪”事件，比这更残酷了多少倍！

屠杀之后，鬼子叫警察抓民伕挖了9个大坑，将尸体给埋掉

了。埋后，警察署白署长和民伕在警察署说，他们在埋尸体时，经过清点，共杀了368名。白家堡村被鬼子放了一把无情大火，烧得片瓦无存。屈死的同胞和这场惨案被压埋了十余年，没有人敢公开宣扬，直到“八·一五”东北人民获得了解放之后，才有人把这件血案暴露出来。

编者注：赵玮系伪满第八军管区少将参谋长，事件发生时，在长春任伪满军政部军需司兵器课军马股长。

郭汉臣控诉书

（1966年1月7日）

我叫郭汉臣，今年65岁，现在大荒沟村朝阳屯。我是在康德3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被伪满日本守备队在大荒沟南山坡张慧儒的地里刺了5刀后逃出来的。如今我身上还留着日本鬼子刺下的刀痕，看见这刀痕，当时的悲惨情景就呈现在我的眼前。

伪满康德3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日本守备队去八道江“讨伐”回来时，在我们白家堡绑走了30多名男人。第二天早晨，守备队又来我们堡子，把男女老幼一齐赶到大荒沟日本守备队院里。我家8口人就是这天早晨被抓去的。日本鬼子在抓人时，将有病不能走的就地刺死。其被抓去470多人。被抓去的人，家有当自卫团和认识伪警察的，都被要出来了。剩下的三百六七十人，在当天下午，分批地押送到大荒沟张慧儒的地里，用机枪射杀和刺刀挑死。我是第一批被赶去用刺刀挑的，我身上被鬼子刺了5刀，因当时没被刺死，晚上偷偷跑回来了。我老婆、孩子都被鬼子用机枪打死了。鬼子不但把人给杀了，第二天连我村五六十户房子都给烧光了。从此，我就成了残疾人，到现在还不能干活。

张德喜控诉书

（1956年1月7日）

我叫张德喜，今年29岁，现在大荒沟村庆升屯，控诉日寇在伪满康德3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杀害我祖母张王氏和我父亲张学荣的罪行。

伪满康德3年五月二十七日，那时我家住在白家堡子，日本鬼子以“通匪”名义到我们家，叫我们全家人到外面去。当时，我祖母有病，不能出去，鬼子就拿出了刺刀，把我祖母吓得带着病就出来啦。这时，我们全村人都被鬼子赶了出来。男人都用绳子绑着，一起赶到大荒沟日本守备队院里。在把我们赶出来的半道上，我妈把我藏到道边草里，因当时我还小，又害怕，又想我妈，我就跑出来跟我妈去了。被赶来的人都关在守备队院里。在杀害我们前，我妈看见了我姑舅赵文才（当时自卫团成员），他把我妈和我当成他们家的人要了出来。我妈就把我送到张学礼家，这时，我站在张学礼家窗台上看见鬼子拉出二三十个人在大荒沟村南山坡用刺刀杀害。我害怕，又想妈，就从张学礼家往我们家跑。跑到半路上，又听到机枪响。正好遇到了我妈，就把我领到白家堡子附近的大蚊子沟王振海家住下啦。当天晚上，林××（我记不清他名字了）身上围了一件破棉袄，身上被刺了八九刀，也跑到王振海家住下了。他说，今天赶出去的人都杀了。这时我妈知道了我祖母和我父亲也被杀了。第二天，我妈带我就投到东丰县去了，直到1955年12月我们才搬回来的。日本鬼子杀害我祖母和我父亲的罪行，我永远也忘记不了的。

惠树生控诉书

（1956 年 1 月 7 日）

我叫惠树生，男，今年38岁，现在大荒沟村大平地。我控诉日本鬼子在大荒沟村枪杀我母亲、嫂子的罪行。在康德3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早晨，天下着毛毛雨，日本鬼子守备队到我们大荒沟白家堡子，将我母亲惠唐氏、嫂子惠张氏、妹妹惠兰芳3人用一根绳子绑到大荒沟村日本鬼子守备队的大院里。当天下午，弄到大荒沟南门外东山根张慧儒的地里进行集体屠杀。我母亲、嫂子当时被打死，我妹妹惠兰芳在左肋骨处中一枪，当时晕过去了。我母亲和我嫂子当时死在我妹妹身上，把我妹妹盖住了。在日头要落的时候，我妹妹苏醒过来，一看人死的成片成堆，看见我母亲被枪弹将头部打坏，我嫂子的肋骨揭去了。不久，天已看不见了，我妹妹爬起来，连爬带滚地跑回家里。这时正遇上我哥哥惠树云也回家去，我哥哥就把我妹妹送到警察分所李所长家给换衣服、上药。以后，在大荒沟街治伤未治好，又去通化才治好的。现在我妹妹还住在王文川村。在那时，我们家是6口人，我和我父亲到柳河修铁道去了，我哥哥惠树云当时跑啦，被打三枪未打中，我妹妹是死里逃出来的。日本鬼子就是这样穷凶极恶，惨无人道。

查问控诉人张慧儒笔录

（1956 年 1 月 8 日）

为了查明日寇守备队在伪满康德3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洗杀白家堡子的罪行，吉林省柳河县人民委员会派王清珍于1956年1月8日讯问了控诉人张慧儒。张慧儒自称今年63岁，职业中医。

问：你知道日寇守备队洗杀白家堡子事件吗？

答：知道。当天我看见守备队抓来一院子人，不一会儿机关枪就响了。第二天抓我当民伕埋尸首，我看见都被杀死在我的地里了。日本鬼子就叫在我的地里挖坑，我也不敢吱声，共挖了9个大坑把死尸埋了。

问：有多少具尸体？

答：我没细看，大概有三百多。

问：现在还有尸骨吗？

答：以后狗、狼扒开了，弄我满地，我亲自往乱坟岗上拉了一些，现在还有两大堆。

问：为什么洗杀白家堡子呢？

答：日寇说白家堡子的人通匪。

问：你还知道其它情况吗？

答：日本鬼子中山大尉，不但指挥洗杀白家堡子，并且指挥部下在白家堡子周围方圆五十多里的地方遇到人就杀，见到房子就烧。我大舅子孙德林领老婆去串门，走到簪鹿子沟门，被日本守备队遇见抓回来啦，说是“通匪”就给杀了。

问：白家堡子有多少户？房子还有吗？

答：有五六十户。房子都被守备队放火给烧光了，现在还是一片荒地。

问：你说的都是事实吗？

答：全是事实。如有误，我负完全责任。

杨永清等控诉书

（1956年1月9日）

我们都是吉林省柳河县孤山区大荒沟村人，从小就以种地维持生活。自从日本鬼子来到大荒沟村以后，我们受尽了折磨，

但有冤无处诉，直到日本垮台了，我们才得到了解放。日本鬼子在我们村子里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永世难忘。

在伪满康德3年五月间，驻大荒沟的日本守备队中山大尉，指挥部下到白家堡子及横虎头进行“讨伐”时，在半道上被抗日军打死了11名。中山大尉听到后，亲自指挥部下把白家堡子周围东至德胜岗，西至窖鹿子沟，南至黑瞎子沟，北至大荒沟南门外大杨树，方圆共约50里划为“通匪”区，在这个地区内遇到人就杀，见房子就烧，更残酷的是于五月二十六日，在白家堡子一带绑来30多名男子押到警察署；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还下着毛毛雨，日本鬼子又把白家堡子男女老少一齐绑到大荒沟的日本守备队院里。当天下午3点多钟，把所绑来的人分成十几批，押至大荒沟南门外东山根张慧儒的地里，用机枪和刺刀进行集体屠杀，有的小孩就活活给劈开了，很多人家如朱作田家4口人，宋树玉家5口人等都杀绝了。当时未被杀死的，鬼子就用刺刀挑，郭汉臣就是被鬼子刺了五六刀后跑出来的。现在他身上还有当时被刺的伤疤，他因被刺成残废，不能劳动。鬼子不但杀了人，第二天又将白家堡子五六十户的房子及粮食等全部财产放火烧光，使这个堡子到现在还是一片荒地。五月二十八日，鬼子又把我们村张慧儒、张庆荣等抓到现场挖埋尸体，我们看见被杀害的人有三百六七十名，就在张慧儒的地里挖了9个大坑埋掉了。

杨永清、梁国珍、朱振兴、张成作、张维新、
刘凤英、赵文财、綦长荣、王家顺、耿福田、
王永和、尹明君、赵福德、刘扶麟、张凤鸣、
陈万银、兴万禄、关石成、张庆荣。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东北历次大惨案》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

回忆白家堡惨案

惠连芳等口述　辛恩圣整理

1936年7月15日，日本侵略军杀害了白家堡无辜百姓400多名，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白家堡惨案。1984年重访了这次惨案的幸存者和目击者。下面是他（她）们的回忆口述笔录。

丛树才口述

血洗白家堡子的时候，我们家住在大荒沟上面道北的头一条沟——丛家沟。我们丛家老一辈子是这个沟的占山户。

那时，我们家里住着7口人。我父亲丛德玉当牌长，我姐姐那年19岁，出嫁了。因母亲去世了，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姐夫王德发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哥12岁，我妹妹8岁，我9岁。还有一个老李头，是我父亲的磕头弟兄，常年在我们家呆着。头一天，我舅来串门，也住在我们家。

那天（阴历五月二十七日）早晨，天刚朦朦亮，我大姐起来生火做饭，就听狗在院子里叫，我父亲到屋外一看，是村子里姓胡的一个小伙子，他说："村长让我告诉你，昨天你们牌摊的民工一个也没去，今天一定要去，日本人不让了。"我父亲答应去催一催。说完，父亲就往沟里走，去催人。姓胡的小伙子就往沟外走，没走多远，狗又咬起来了。这时候，我们都起来了。往沟门一看：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奔沟里来了。姓胡的一看不好，就往山上跑了，我们还听见日本兵喊骂他的声音。

我姐夫年青力壮，怕叫日本人抓去背给养，从后窗跳出去跑了。我父亲本来想上沟里去派民工，一看日本兵来了，他也跑了，一边跑一边召唤年青人："快跑，日本兵来抓人了！"

家里剩姐姐、哥哥、妹妹和我，还有舅舅和老李头。我们很害怕，老李头说："怕什么？咱们老的老、小的小。他们（指守备队）不能抓咱们去背给养。"我们都在屋里呆着，日本兵一进院，我舅舅急忙把放在炕上的一个大吃饭桌子立在了炕角上，他藏在了桌子后面，日本人没看见。

日本兵进屋就把老李头拽下了炕，满屋翻绳子，找了些晒烟绳子。就把老李头、姐姐、哥哥用绳子捆起来了，看我和妹妹小，没捆。留一个日本兵赶着我们往沟外走，其余的日本兵又上沟里赶人去了。

在从家沟门的平地上，有一个姓陈的开了个大车店，把我们都赶到大车店的院里，日本兵在院里架着机枪。我看见老梁家俩口子扒开障拌子跑了。

一直等到快东南晌了，日本兵从白家堡子那边赶下来一大帮老百姓。把我们这些人又从陈家店赶来，入了大帮，往大荒沟赶。一路上孩子哭、老婆叫，有病的、上岁数的走不动，日本兵就用枪把子打，用脚踢。

我们早晨没吃饭，饿了。我和小妹扯着姐姐的手，直喊饿。我姑住在大荒沟南门外的道边上，快走到我姑家的时候，我姐小声对我和妹妹说："快上咱姑家要干粮吃去，别叫日本人看见。"我领着妹妹，躲着日本兵，溜出了大帮，向姑家跑去。姑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经过一五一十地向我姑说了。她拿了些干粮，把我们兄妹俩领到仓房里，叫我俩蹲在两个装粮食的大木头筒子里。她又想去把我姐和我哥救出来，日本兵不让她靠前，姐姐和哥哥都用绳绑着，大帮人过去，我姑哭着回来了。

到了过半晌，就听着东山根一阵一阵地枪响。我姑不敢叫我们出去，怕我们害怕，她到仓房里陪着我们唠嗑。她说："日本鬼子杀人了，这帮不是好死的，你哥才12岁，你姐19岁，他们犯了什么罪？"我和小妹听了都大哭起来……

一直到天大黑了，我父亲才偷偷地到我姑家，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告诉我们：今天被抓来的老百姓都被日本守备队杀了，我哥、我姐和老李头，也被杀了。我姑搂着我小妹，边哭边叫着我哥和我姐的小名，哭得死去活来，在场的人都哭了。

父亲怕我们兄妹俩在姑家发生意外，趁着天黑，把我们领走了。在路上，父亲又告诉我们：沟里的孙大娘，因为得了伤寒病起不了炕，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了。

我姐夫王德发为了报仇，就投奔了抗联。

丛清林口述

那时候，我住在丛家沟南边的背阴汀子。全家4口人，我和我媳妇，领一个2岁闺女。我哥那年34岁，没成家，和我一起过。

那年出事之前，抗联在沟里打死了11个日本兵，我去抬过"死倒"。

阴历五月二十六那天，我们牌的杨牌长到大荒沟去开了半天会，回来告诉各户，明天都到大荒沟开会，日本人说去开会的人，每人放半月的口粮，回来好盖房子归大屯。谁知道日本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事，谁也没往心里去。

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第二天一早，我媳妇起来做饭，我去挑水。到了井湾子一看，井湾子叫雨水冲淤上了，我就用手把井湾子扒了扒。一时水混，没法挑，我就到旁边我的一块菜地里去看看。辣椒缺苗，我就趁着潮乎土补辣椒苗。正补着苗，

就听院里有“哇啦哇啦”的说话声。我抬头一看，好几个日本兵端着枪冲进了我的房里，我寻思又是来抓背给养的，就钻进草棵子里躲起来了。我不放心，从草棵子里往外看，看见日本兵从屋里把我哥和我媳妇赶到院子里，我媳妇抱着2岁的闺女。另一个日本兵到朱作田家，把朱作田也赶出来了。朱作田那几天正闹病，出了屋，走了三四步就倒下了，日本兵看他不能走了，从背后捅了好几刺刀，朱作田当时就死了，血淌了满地。

我们上屋的陶玉春跑出去了，我看见一个日本兵进了他的屋，听见他媳妇在屋里“妈、妈”地叫唤了两声。日本兵出来时，刺刀上还有血呢。下屋住的老宋家全家人也都被赶出来了，他媳妇正怀孕，怀里还抱着小姑娘。日本兵把抓的人都往大道那边赶。

等日本兵走了，我先到老陶家，到他屋一看，一炕血。陶玉春回来看他媳妇还有一口气，怕日本人再回来，把他媳妇从后窗背到树棵子里，过了一会，他媳妇就死了。

到了晚上，听说我哥、我媳妇和2岁的闺女都叫日本兵给杀了。

为了报仇，我想去投奔抗联，走到半道，又叫日本兵抓去背给养，到了孤山子就病倒了。

邹绍先口述

那年阴历五月二十七那天一早，就听说日本守备队要抓人，我就跑到西山躲起来了。太阳到了东南晌，就看见守备队从横虎头沟里往下赶人。有男的、女的，不管老的、小的，都赶到守备队住的大院（现供销社院内）。把门关上了，门外放了岗。

我下了山，就往背阴汀子跑，我父亲头一天上我岳父家串门去了，不知叫守备队抓着没有。那时我刚订婚，我岳父叫宋

德玉，他们家5口人，住在背阴汀子。

我跑到半道，遇见了王永胜，他问我干什么，我说去看看我父亲抓没抓走。他说："你不用去了，你父亲也被抓了。"我说："你认识我父亲？"他说："我怎么不认识？你父亲耳朵上长个肉瘤子，叫日本守备队打破了，淌了一脸血。"我一听，眼泪"涮"一下流下来了。我不死心，我还想去看看没过门的媳妇和岳父怎么样了，我一口气跑到背阴汀子。进了岳父家院里，只有满院的鸡、鸭、鹅、狗在叫唤。进到屋里一看，屋里一个人也没有了。我心里一酸，趴在岳父家的炕上好一顿哭……

第二天早晨，天一亮，我就和叔叔跑到东山根，想认认父亲和岳父一家人的尸体，归拢归拢。

到了东山根，简直不敢看，有用机枪扫的，有用刺刀挑的，有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有怀抱吃奶孩子，有砍掉头的，有捅破肚子的……真叫人心里难受。我们爷俩含着眼泪挨个扒拉。还没找着一个亲人的尸体，就叫守备队看见了，他们把机枪架在守备队大院门口，朝我们开了枪。我叔叔赶忙拉着我钻了树棵子，奔了东山。

韩相久口述

我今年81岁了。日本鬼子在我们屯杀人那年，我才30多岁。

那天(阴历五月二十日)，听说抗联在沟里打了日本守备队，心里挺解恨。下半晌的时候，村里派人找我，叫我去给被打死的日本兵做棺材。我说："日本人的棺材我没做过，不会做。"看我不去，那人就回去了。过了一会，那人领着李翻译来了。李翻译吹胡子瞪眼，说话骂骂咧咧的，他说："不做不行，小心你的脑袋！"逼我拿着工具，跟他上了守备队院里。又找了几个半

拉木匠，我掌尺，一共做了33口棺材。先做了11口大的，5尺半长，装上尸体，浇上汽油烧了。又做了11口中号的，半米长，他们用这个中号的装上骨灰，埋在守备队大院东头。最后做了11个小号的，每个30公分长，听说是用它装骨灰送往日本。

过了几天，警察署的署长（他叫赵德清）叫我上白家堡子下头去盖分所，他说：盖好了分所，好在那归大屯。阴历五月二十六，屋里的（爱人）给我收拾了行李，准备好吃的，打算第二天天放亮就走。那天晚上下雨，天快亮了还打雷，屋里的说："天下雨，去也不能干，别去了。"我就没去。

第二天一早，就看见守备队往沟里走，全副武装，不知是干什么，有人说是去抓人背给养，有人说是去赶人开会。年青的都跑了，我没跑，仗着我会木匠活，我想：你抓我背给养，我就不能去盖房子。

吃完饭我就去老丈人（岳父）家，想探听探听是怎么回事。我老丈人住在大荒沟街里，他叫王明信，当个小牌长（管十几户人家）。听他说，日本人头一天晚上就收绳子，猜摸着是上沟里去抓人，抓人干什么就不知道了。正和我老丈人唠嗑，村里来人叫他派人去遛马。年轻人都跑了，没跑的也上山干活去了，找谁遛？我说我去遛。

这马，是守备队的，我牵了3匹。特意往横虎头沟里走，想看看守备队究竟干什么。越过山头，刚过丛家沟，就看见守备队赶着老百姓往下走。一条绳子绑几个人，大人大部分都上了绑，小孩子没绑，跟着大人走。

大帮人过来了，我牵着马站在道当央。我看见张文财经过我身边，他没绑，我顺手把一匹马的缰绳递给了他，给他使了个眼色，他就明白了。他假装是和我一起遛马的，等大帮人过去了，他顺着山道跑了，临走时直谢我。

我牵着马往回走，看日本守备队把这帮老百姓赶进守备队大院，我也牵着马进了大院。他们知道我是木匠，不叫我走，叫我和一个姓郑的木匠钉厕所。

我们在钉厕所的时候，就听见上屋里打人的声音。守备队的官叫山口，他哇啦哇啦直喊，李翻译直逼问："抗联在哪?""谁通匪?"没听见被审问的人回答声。后来，从屋里推出来8个人，叫守备队打的满身是血，这8个人就是头一天被抓来的。这8个人中我就认识一个姓郭的，外号叫郭老道。当着老百姓的面，李翻译说这几个人"通匪"，眼看着日本守备队用刺刀把这8个人挑死了。把小孩吓得嗷嗷直叫唤，妇女们都哭了，老百姓恨得直咬牙。李翻译叫警察把这8个人的尸体拽到后院。看到日本守备队这样杀害中国老百姓，我心如刀绞，赶紧钉完厕所，就离开了这个大院。

张秀梅口述

那年我21岁，日本杀人的事，我是亲眼看见的。

抓人那天早晨下了一阵雨，雨停了，日本守备队就往沟里走。

我和爷爷赶着猪上了东山。东山顶上，有个我们家的老房场。我爷爷看着猪，我就收拾那个房场，准备种秋菜。

到了傍晌的时候，我在山上就看见日本守备队从沟里赶着一大帮人，往大荒沟村子里走。这时候，大荒沟村里年轻力壮的人都往西跑，趟过河，奔了西山。快晌午时候，我也饿了，想回家。爷爷说："守备队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咱们别回家了。你年轻，腿脚好，你先跑吧。"我说："我不能扔下你跑了，咱们在山顶上，看见日本人来了，再跑也赶趟。"我们俩挨着饿在山上躲着。

过晌的时候，看见日本兵从守备队院里出来，在东山根放了岗，在半山腰还架了机枪。不一会，就看见从守备队院里赶出来一帮老百姓，押到了东山根。那地方原来是乱坟岗子。我在山顶上看见老百姓在日本兵跟前一个一个地倒下了，也没听见枪响。我问爷爷："枪没响，人怎么一个个都倒下了？"爷爷说："那准是让日本人用刺刀捅死了。"刺了一帮，又赶出来一帮，一帮能有四五十人。我和我爷爷气得直跺脚。

到了日头偏西的时候，从守备队院里又赶出来一大帮，有一百多人。在山顶上就听见小孩的哭声和日本兵喊："快走！快走！"的声音。乱坟岗子站不下，有的站在苞米地里。这回听到了枪声，是用机枪扫的，老百姓一面子一面子倒下了。我爷爷咬牙切齿地直骂日本兵。爷爷说："回家赶紧把猪卖了做盘缠，你回山东老家吧，这不是人呆的地方。"

后来又听见日本兵给没死的人补枪的声音，直到日头卡山了，守备队才收兵回去。

我们一直等到天黑黑的才赶着猪下山，走到杀人的地方，猪都不往前走了，我们爷俩绕道回到了家里。

第二天，警察按户派人去埋被杀的老百姓。先挖了七八个大坑，每个坑都有一个警察记数，埋完了后，他们核的总数是374人。

到了秋天，树叶落了，在树棵子里经常看见一堆一堆的尸骨，这些都是受了重伤当时没死的人，爬出去一段后又死了。加上这些没算数的，被杀害的老百姓总共有400多人。

惠连芳口述

我是白家堡子惨案幸存者，那年我11岁。那时候，我们家正住在白家堡子。全家6口人，有父亲、母亲、两个哥哥，一个

嫂子和我。

我的两个哥哥，前些日子就叫警察署抓到柳河孤山子修铁路去了。

就在惨案发生的头天晚上，我大哥从孤山子跑回来。我妈对我大哥说："今晚你别在家睡了，这几天风声挺紧，听说今天早晨还抓了二三十人押在警察署院里，你先到山上躲一躲吧。"吃了晚饭，我大哥就去山上的人家躲着去了。

我们家离大道近，我妈叫我去上屋老王大娘家躲着。那天晚上下雨，一直等到很晚了，约摸不会出什么事了，我哥和我又都回家了。

第二天早晨，我妈下地做饭，就看见日本兵往横虎头沟里走。我妈赶紧招呼我爹和我哥："你们爷俩还不快跑，日本守备队来了！"我爹和我哥钻了树棵子奔山上跑了。我妈又对我说："快上你老王大娘家躲躲吧。"我脸也没洗就往老王家跑。到了老王家还没等藏好，日本兵就跟进来了。日本兵比划着叫老王大娘往外走，老王大娘说："抓我这么个老太太干什么？"她不走。日本兵就用脚使劲蹦她，把她推到院里，把我也赶出来了。

我往我们家的院里一看，妈和嫂子也叫日本兵赶出来了，日本兵用枪把子打我妈，我一边哭一边跑，奔我妈去了，嫂子跟在我妈身后哭，就我妈没哭。我们娘仨个被赶进了大帮。白家堡子在家的人全都抓来了，押着往大荒沟走。路上遇见人就抓，不管是串门的，还是走道的。

到了守备队院里，就把大门关上了。院里的日本兵端着枪，上着刺刀，明晃晃地怪吓人。旁边还架着机枪，对着院里的老百姓。院里挤得满满的，有的绑着，有的没绑。天下了一阵雨，衣裳淋湿了。我又饿又冷，我嫂子冻得直打哆嗦，我妈脱下来一件衣裳给我嫂子披在身上。

不一会，从上屋推出来一些人，身上打得血淋淋的。我害怕，躲在我妈的身后，从我妈的胳膊缝里偷偷地往外看，看见这些人中有我们邻居王大爷。日本官（后来知道他姓山口）对着大伙哇啦了一阵，李翻译又说了一遍，意思是他们“通匪”，把他们处死。大院的东南角上有拴马桩，拴马桩底下放着板凳子。日本守备队把他们架上了凳子，把绳子一头套在他们的脖子上，另一头绑在拴马桩上，然后，把凳踢倒，他们就活活地被勒死了。王大爷的舌头伸出挺长，把我吓得使劲搂着我妈，院里的小孩都吓哭了。

下午的时候，守备队把抓来的一批一批地押出大院，没听见枪响。后来听说，那几批都叫守备队用刺刀给挑死了。到了日头快卡山的时候，日本守备队把院里剩下的老百姓都往外赶，有些人不走，日本兵就用刺刀捅。80多岁的老张太太，坐在地上不起来，日本守备队当时就用刺刀给捅死了。

到了东山根，看见了先前那几帮老百姓都死在乱坟岗子上。我们这帮人多，乱坟岗子站不下，就站在旁边的苞米地里，苞米苗挺高了，都给踩倒了。旁边的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山腰上还架着机枪。我妈一手拉着我嫂子，一手拽着我，脸朝山站着。有的人想跑出去，一跑，就叫日本兵开枪打倒了。还没等对我们开枪，我妈把我拉到她的前面，等机枪一响，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就觉得肋巴火辣辣地痛，我用手一摸，是肋巴受了伤，直淌血。我爬起来，看见我妈的脑袋炸碎了，我嫂子炸开了半拉肚子，日本兵多狠，用的是“炸子”。我跪在地上，抱着我妈的尸体痛哭，一边哭一边说：“妈呀，你不管我啦？我可怎么活呀？……”

正在我哭的时候，听到那边一个小孩叫我：“姐姐呀，你也

没死啊？咱俩一块跑吧！”我听声音是老关家的小子。他走到我身边，拉着我的手说：“别哭了，姐姐，快跑吧！”我们俩顺着苞米地往东跑，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我掉到大沟塘子里，不省人事了。等我又苏醒过来的时候，喊姓关的小孩，怎么喊也听不到他的回声。那沟很深，爬了好半天才爬上来，等我上来的时候，姓关的那个小孩已经走了，我再也没见着他。

爬过了岭就是小蚊子沟，我遇到一位老大爷，我问他上白家堡子怎么走，他说：“孩子，你才从死人堆里逃出来，你可别回去，叫日本人再抓住，可就没命了。”他要留我先住下，我不听，一心想回家看看。

我顺着沟往下走，一直走到河套，在河边上洗了洗脸，歇了一会儿，又顺着小河往上走，遇到了小桥，知道快到家了，爬过了桥，伤口痛得我直不起腰来，我一步一步地往家爬。也不爬了多长时间才到家。进门一看，屋子里空荡的，没有一个人影，只有小猫还趴在炕上“咪、咪”地朝着我叫唤。我想起了死去的妈妈，想了死去的嫂子，心里就像堵上块石头，我爬上了炕，打着滚放声在大哭起来……

（通化县政协供稿）

日军血洗白家堡子目击记

胡乃千

1936年，我在通化县大荒沟学校当校长，耳闻目睹日本守备队血洗白家堡子的血腥罪行。

这一年的农历五月初，我抗日联军在雷家沟一带伏击击毙

日守备队11名。日本守备队气急败坏，调兵遣将，在白家堡子方圆50余里实行“治安肃正”、“归屯并户”。

日本守备队首先严令柳河县孤山镇警察署长、村公所的村长、当地驻军的连长等，限三日内修成三通河桥，否则“拿头来见”。伪官们立即召集孤山子所有的木、瓦、石、铁匠，外加民工数百人，在鞭、棍的威逼下3天3夜抢修完三通河桥。接着从三源浦、山城镇、朝阳镇等处调集日本守备队100余人，由中山大尉率领，外带一个营的伪满军队，前往大荒沟“剿匪”复仇。

那一天，大荒沟飞土扬尘，天昏地暗，18辆汽车载着百余名日本守备队，气势汹汹，一直开到大荒沟街。他们把警察署大院强行占用。警察署署长赵德清只得领着部下住在街上的商店家。一个营的伪军，也分散住在商店和老百姓家。街上除了兵还是兵，闹得人心惶惶，气氛十分紧张。

金川县政府的日本参事官和指挥官，也都先后来到，他们带来一些粮食和日用品，表面上是来安慰老百姓，实际上是稳住民心，怕老百姓外逃。

在这期间，中山大尉通令警察署长赵德清派密探侦察抗日联军去向。但一连几日，也没探出一点抗联的音信。中山大尉气得要死，自己派守备队到处搜索，前后共绑来30多个所谓“嫌疑犯”，用毒刑逼供，也没逼出消息。

最后，把这些绑来的所谓红军，有的被脱去上衣绑在警察署大院门前的大树上，然后，守备队士兵一个接着一个把他们当刺枪术演习的靶子，用刺刀乱刺。被刺的人要是叫骂，他们就往嘴上刺，直到刺得血水淋漓，肉如烂酱，方才罢手；有的被绑在树上，守备队士兵牵出狼狗，叫狗扑上去噬咬，直到咬死为止。类似这样的残暴行径，那几天几乎每天都发生一两次。

日本守备队中有一个小翻译，姓金，复县人，19 岁。那时我是22 岁，刚刚教学。我俩都没脱掉学生气，他和我很投缘，因此，他时常到我学校来玩。他告诉我：中山大尉探不出红军的消息，无法泄愤，因此，他下了决心，抓不着红军报仇，就杀老百姓出气。

中山大尉开始行动之前，小金翻译又来到我学校，见他一进门就坐在椅子上，紧皱双眉，默然不语。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也不吭声，只是两眼紧紧地看着我。隔一阵，他长出了一口气说："不好啊！"就又不往下说了。经我一再追问，他才讲："今晚守备队只留十几个人留守，其余全部出发，不带满军。"说到这，他就不说了，我这时也领会了他言外之意。他临走时，还回头叮嘱我千万别往外说。他去后，我心中更觉得烦躁不安，晚饭也没吃，在办公室内就合衣而卧。刚要朦胧入睡，小翻译全副武装，慌慌张张跑来，他进门就说："今夜，老百姓要遭殃了，你晚上千万别出门，不要对别人说。我就得走，那边都站排啦！"

这一夜我也没有入睡。天将亮时，就听到有许多人的脚步声，由远而近，那声音越来越大。我走出房门，从院中往南边大道上细看，只见一些穿黄色衣服的守备队士兵，押着身穿各色衣服的老百姓，黑压压的，约有数百人，正往回走。走近时，看得更真切，这些被押解的人，男的女的都有，有白发苍苍的拄杖老人，有怀抱婴儿的妇女。他们都被赶进守备队住的大院中。我这时联想到小金翻译的话，心绪实在无法宁静下来。

据以后小翻译对我讲：他们出发一直走到南岔沟里，回过头来，就开始各沟各岔逐户搜人，能走的带走，不能走的老人和病人，就一刀刺死。因天将拂晓，老百姓有的起早上山干活，看不见的就算"便宜"啦。有的家早饭都做好了，没等吃就全

被抓来。

下午，我在学校突然听到守备队大院内传出“救命啊，救命啊！”的惨叫声。以后，据小翻译说，那天活开膛8个人，拿出心来祭灵。

那时，大荒沟街人心惶惶，因为抓来的这些人中，有的是亲属，有的是朋友，都急欲想法救出来。于是就请警察署长赵德清恳求日本参事官和指导官到守备队去说情，理由是，有些人是警察家属，有的是自卫团家属等等。

日本参事官和指导官答应了。当参事官、指导官走到守备队大院门前时，中山大尉竟不许入内。这可能是他们预先定下的圈套。

日本参事官、指导官碰壁后，百姓又苦苦哀求伪满军队的营、连长们前去说情，营、连长们也怕遭拒绝，但出于民族意识，他们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硬着头皮，来到了守备队。

这回中山大尉给了好大个面子，允许伪军营、连长们入内，寒暄数语，说明来意。中山大尉很阴险狡猾。他怕不答应营连长们的要求，激起众怒，发生兵变。再说，大荒沟街地形对于守备队也不利，因为东面山上有五个炮台，全是伪警察驻守，居高临下，打守备队这个大院象往井里打枪一样，这100来个守备队，还不得全部“报销”。想到这里，他主意一定，便狞笑了一声说道：“好的，好的，营长来了，要的一定是好人，都要哪个？都叫什么名字？快快说出来，叫翻译按名找出来，你们就领回去好了。”

小翻译找来找去，共找出20几个人。营长又要求中山大尉把一些小孩也放出来，中山大尉没有答应，营长没法，只好同三个连长领着被救出来的20余人，心情沉重地走出大院。

这些被救出来的人对这几位营、连长千恩万谢。可这几位

营、连长只是两眼看着他们，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从屠杀的那一天，阴雨绵绵，我站在闲闲雨雾中，不时向守备队的大院门口望着。只见先由20多名守备队士兵，有的手持上刺刀的步枪，有的提着战刀，从大院中绑出18名小伙子，顺着围墙往东走到东山脚下。日寇都拔出战刀，意思是要砍死这些人。这18个小伙子一看要杀他们，便不约而同地一股急劲挣断绑绳，分头就跑各自逃命。守备队士兵也慌了神，端枪就打，最后一个也没打中。

第一批这样跑掉，紧接着是第二批。第二批被杀的人就多了，男女老幼都有。其中有8个人各背一个“死尸”（可能就是被活开膛取心的人的尸体）。

这回守备队士兵不用战刀砍了，他们叫被抓的人都跪下，架起了4挺机枪，一阵扫射，这些无辜的同胞们就一排排地倒下去了。

在第三批被屠杀的人群中有一大个子的中年人，上身穿一件蓝布上衣，还补了几块“补丁”，下身穿青色便裤，站在那里。日本鬼子叫他跪下，他就骂起来（听声音是个山东人），痛骂守备队的祖宗亲娘。这时，从后面过来一个鬼子兵，照他后腿腕踹了一脚，嘴里骂着叫跪下，但没踹倒，他骂得更起劲了。从前面又过来一个日本兵，用刺刀照他嘴就刺，他一扭头，刺在面颊上，血立刻就淌下来。这个山东汉子，突然猛地一脚把鬼子兵踢倒。这时另一个日本兵举起战刀，从后面向这个山东大个子的头部砍来，头立刻被砍掉“半拉”，一股鲜血冲出半尺来高，他倒下去了。我看到这里，禁不住自己哭起来。

还有一个青年妇女，穿着很褴褛，披头散发，怀里抱着一个孩子，约三四岁，吓得直哭。来了一鬼子兵，一把就把孩子夺过去，扯起小腿，往一棵大树上摔去。只听“呀”的一声，脑

浆迸裂，小胳膊小腿小手还在抽动。他妈哭闹抢夺也来不及了，被鬼子一脚踢倒，扑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哭叫……。今日追忆当时情景，我心犹自悸恸难已。

在守备队对村民进行大屠杀时，在大道上有两个小孩儿，一男一女一前一后，顺道往南门外家里跑，也被守备队抓住混在人群中给枪杀了。

那天夜里，在被屠杀的人群堆里，有的没打着，有的受了伤，都趁夜爬起来跑了。有一个李忠昌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第二天，警察才领着民工掩埋了这些尸体。夜间，北岔和大荒沟街的老百姓，多数都舍了家产或只留一个人看门，其余的都悄悄地扶老携幼，连夜往柳河县孤山子和通化县光华等地四散逃命。我也放弃校长职务，移居到通化县城。

（通化县政协供稿）

日寇血洗大獾洞

郭闻奇

这件惨案迄今已过去整整50年了。我虽未亲历此事，但在1966年我曾去獾子洞采访找到当时健在幸存者林希恩老人和受害者崔占江的爱人及一些其他知情者，故记忆犹新。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但抗日烽火在全东北频频燃起，抗日义勇军和抗联经常出没在松花江两岸。处于扶余县东北部的大獾子洞屯，恰与松花江北岸义勇军和抗联活动的“三肇”一带，隔江相望。同时，这里也

经常有些土匪来此骚扰，因而日寇对这一带十分注意。

1936年旧历九月二十四日（阳历11月7日）这天傍晚，从哈尔滨出来追剿抗日队伍的日寇，抓到一名“土匪”，供认他常在大獾子洞屯地主邵焕章的网房子吃住。于是，日寇便断定，那网房子一定是抗日队伍的集散地点，便决定前去“剿匪”。

日寇先派一个少尉带领三十多名鬼子兵，渡江前往邵焕章网房子搜查。正巧，那天网房子里，“天助”绺子匪首任义军等几个胡匪在吃夜饭，抽大烟。鬼子侦察兵走进网房子时，屋里的胡匪惊慌失措，匪首任义军急忙撂下烟枪，拔出手枪隐在门后，另几个胡匪则藏进网垛下面。还没等鬼子进屋，任义军便来个先下手为强，开枪击毙了他们。他万没料到，还有许多鬼子隐藏在后边。这边枪一响，外围的鬼子立刻集中火力向网房子猛烈扫射，并且又向网房子附近一个居民院崔善江家频扔手榴弹，炸死3匹马，将在屯里抓来当向导的老宋头也给打死了。

激烈的枪声过后，匪首任义军被打死，另外几个跳墙逃跑了。

日寇找到2具日本侦察兵尸体，又在屯里抓人派车把尸体拉到伊家店警察分驻所，将尸体往办公桌上一放，吹胡瞪眼，大发雷霆，迫令伪警察低头向尸体默哀。

这天夜里，一个血洗大獾子洞的阴谋便策划好了……

第二天鸡刚叫，日寇就联合当地自卫队黄十老三的排子兵，向大獾子洞开拔了。

这大獾子洞共有40来户人家，除地主邵焕章外，还有3户富农，其余全是本地和外地来给他们扛活的长工。他们昨夜受了一场惊吓之后，人心慌恐。有的知道鬼子非来报复不可，早跑了，有的自以为是一清二白的穷庄稼人，鬼子不能那么没人性，便留了下来，地主邵焕章明知道这事与自己有点牵连，但

匪首任义军被打死，其余的也逃之夭夭，没人会揭发他。他怕伙计一旦都走掉，场院里堆放的粮食可就没人经营了。又依仗他与警察平日有交情，于是，他便指天发誓，向伙计们担保没事。

话没说完，日寇进了屯，大肆搜捕抓人。他们让黄十老三的排子兵把全屯男人都骗出来，到屯东头听皇军训话，来一个绑一个，一边绑一边咒骂："统统的是红胡子！"

一共绑来了49人，又用缰绳把脚也捆上连成一长串，押到了屯后一条3尺多深的壕沟旁边。

这时，地主邵焕章穿上了貉绒皮袄，自以为能以绅士的身份替乡亲们说情，到日寇面前鞠躬作揖。谁料日寇根本不听他这一套，把他打了一顿棒子后，也和大家捆绑到一块儿。

秋末冬初，沟里积着白雪。日寇用枪刺把每人的帽子都挑了下来，刀尖把人的脑袋划破，血流满面，然后用枪托毒打，人们互相挤着，横躺竖卧倒在沟里。

这时，日寇在屯里又把妇女、儿童全都从屋里赶出来，随后把房子点着，刹时火焰熊熊，哭喊声震天动地。有的回屋抢东西，被大火烧焦了头发、烧伤了脸，有的被烧断的房木砸伤……一幅凄惨景象，不忍目睹。

日寇将妇女、儿童赶到屯西头一个大粪堆上，让他们亲眼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大火毁灭，在一旁疯狂地大笑不止。然后，又把他们赶进西房里，周围堆上谷草，用大车把门堵上，准备烧死。

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伪扶余二十九团驻长春岭骑兵三连，闻讯飞马赶来，见全屯一片火海，关在屋里的老人、孩子、妇女拥挤在窗前拼命哭喊，持枪看守的鬼子正待焚烧。目睹这残忍的景象，立刻激起他们的民族义愤。连长鄂德升当即通过翻

译向日寇少尉排长申明：老幼妇女是无辜的，不应该对他们下毒手。这时，伪军也都端起枪来，向日寇怒目而视。在这种情况下，日寇自己人少，恐一时鲁莽于己不利，便答应释放妇女和儿童。骑兵连一些人，急忙上前推开了堵门的大车，抱走了谷草，妇女和儿童一见获救，慌忙跑出屯外。

狡猾的日寇恐伪军再来干预他们去屠杀屯后沟里的49人，便假造敌情，说东部家有土匪，让他们去堵击。

这支伪军迫于日寇的淫威，不得不垂手俯命，乖乖去了东部家了。

日寇支走了骑兵连，便来到屯后的壕沟旁。

这时，倒在沟里的男人们，从早到晚，挨了一天饿和冻，又见屯里火起，阵阵哭声传来，知道房屋被烧，家人被赶出去，心里更加难过和愤怒。有的人轻轻解着绳子，准备逃跑，被警戒的日寇发现，踩着身子，劈头盖脑地一顿乱打，当场打死一个80多岁的老赵头，鲜血染红了雪地。

日寇来到沟旁，首先要把“网户达”（网房子的东家）拉出来砍头祭灵，当鬼子问谁是“网户达”时。一个叫傅有才的地主以为鬼子要对“网户达”开恩，便笑嘻嘻地承认自己是。鬼子不问真假，把傅有才和另外两个人拉出来，迫令他们跪在用白布包裹着的两具日本鬼子尸体面前，拔出战刀，砍下了他们的头，刹时鲜血四溅，尸体倒在血泊中……

日本鬼子把这3颗人头放在鬼子尸体旁边，又叨咕些什么。祭完灵，他们架起了机枪，对准倒在沟里的中国村民，一阵疯狂地扫射，哭叫声惨不忍闻。

血，象道道泉水喷溅，刹时沟底变成殷红的小河，那邵焕章也未逃出魔掌。

日寇唯恐还有活着的，又跳到沟里，踩着血淋淋的尸体，逐

个查看，发现有没断气的，就用刺刀再扎，扎完后，又让排子兵从屯里抱来豆秸堆在尸体上，点火焚烧……

日寇望着熊熊大火，闻着烧焦的腥味，狞笑着，发出野兽般的嚎叫。

当时，有人躲过了枪杀和刀刺，却没躲过火焰的烧灼，白连海的哥哥被烧得实在难以忍受，气愤至极地跳了起来，对日本鬼子破口大骂，被一枪击倒。董老八也没躲过焚烧，刚要翻身，被鬼子发现，刺了几刀，当即把肚子挑开，内脏都淌了出来，惨叫着死去。

浓烟卷着火舌，一直烧了两天。空气中飘散着窒人的血腥味，许多尸体被烧得皮肉模糊，辨认不出原样，那沟里的青烟，仿佛缕缕中华民族的不泯灵魂……

就这样，一个曾有40多户的小屯落，在日寇的铁蹄下成了一片焦土。

日寇在这里发泄完了兽性，便带着自己那两具尸体过江回哈尔滨去了。

28年后的盛夏，笔者曾有幸访到了獾子洞惨案中的幸存者73岁的林恩老人。他当我沉痛地讲：当时，他身中七弹，左肩胛骨被打碎、腿被烧伤，他就用手抠泥往腿上抹，一直挨到日本鬼子撤离。可是，大火越烧越旺，他便不顾一切地抱着断了的左臂用右臂拐着，艰难地爬到沟沿上，拼命往北边的苞米地里爬，与他一起爬出来的还有崔善江。两个人刚跑不远，就被鬼子发现，幸亏天黑，没打中。林希恩急忙钻进了苞米地里，崔善江钻进身边的尸体堆里，射来的子弹全打在尸体上，才算侥幸逃出。但是，到1943年他又被抓了劳工，不到20天便死在了劳工工地上。

这就是日寇血洗大獾子洞的一段血腥历史，国恨家仇是不

可忘记的。

（松原市扶余区政协供稿）

钱家惨案的真相

王富春* 口述　王喜荣整理

日寇侵占东北时期，为了镇压东北人民的爱国抗日斗争，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血腥惨案，屠杀了千千万万的爱国同胞和无辜群众。“钱家惨案”就是他们残酷镇压的一个历史见证。那时我在伊通县伪警务科特务系任职（警长衔，当时昌图县北半部、沙河子以北属伊通县管辖）参与了钱家惨案的“侦破”活动。虽然事情过去了整整50年，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于7月21日后半夜，我在家被伊通警察署西门派驻所来人叫醒，要我立即到县警务科报到。在伪满时期，夜间外出抓人那是常事，我以为又要去捕人，便匆匆地来到警务科。到那一看有些诧异，门口停着一辆汽车，司机高锦已经将汽车引擎发动起来，有十多个人正慌慌张张地往车上爬。我仔细一瞧，有伊通县警务科日本首席指导官兼检察官村上义一（警佐衔）、警务科翻译刘春田、伊通警察署特务系警士李奎锋、王守信，还有警务科卫队10人，共15人乘坐汽车离开了县城，向西驶去。

---

* 本文作者王富春，伪满时1934年至1945年，在伊通县警务科任职，曾参加此案调查。解放后被判刑，刑满释放后，现居住长春市南关区。

车刚一出西门我就问身旁的刘春田，去执行什么任务？村上不叫打听。我们这些人都闷坐在车上，思索着，猜测着。车速很快，1个小时就到达公主岭车站。此时，在铁轨上停着一辆烧清油的小火车，我们立即下车改乘这辆小火车。刚上车，车轮就启动了，往西开去。车过郭家店、十家堡、四平等站都开绿灯放行。大家在车上暗暗嘀咕着，车早就过了伊通界，怎么还不停呢？车到牤牛哨天已放亮，到泉头站才缓缓停下来。

泉头警察署长张致远、署副日本警尉猪骨左右卫门早就在车站等候，我们一下车他们就把我们领到满井警察分所。我们会同分所长张肇让等人来到沙河子。沙河子是一条界河，东西走向，河的北岸归吉林省伊通县所辖，河的南岸是归辽宁省昌图县所辖。沙河子距满井分所有二里多地。我们到达河岸瞧，大吃一惊，一列客车被颠覆在沙河子里。沙河子上面有座铁桥，距水面有十多米高。列车是从桥上翻到水里的，机车头砸入河底有一米多深，连同五节车厢都泡在水里。在铁轨上还停着三节幸存的车厢。肇事现场早已被封锁，在铁路的两侧，头一层是铁道警护队，二层是宪兵，三层是警察。他们都是从南满线的警护队和四平、昌图、开原、铁岭等地宪兵队和警察署调去的，有好几百人维护现场。

我们到达后，带去的十名卫队也布置在铁路的两侧。我和刘奎峰、王守信身着便衣在附近看守。村上义一和刘春田同首都新京宪兵司令部派来的日本军官联系。宪兵司令部派来一名特高课长（少佐衔），是个小个子日本人，长相很凶，由他指挥这个案件的“侦破”活动。

这时，我向别人详细地询问一下事情的经过。原来这是21日从新京（长春）开往大连的“鸠号”急行客车，载有数百人，凌晨12点零3分到达沙河子铁桥时，突然列车脱轨，从十多米

高的桥上翻到沙河子里，旅客多数是日本人，内有一名日本少将，还有少数日军。车厢里的人死伤累累，即使没有摔死，也被河水淹死了。机车上的司机和员工都被烫死了。那个日本侵略军的少将也被摔死，日本兵几乎没有生还的。在我们到达前，从四平开来的不少救护车，把伤亡的旅客一批批拉走了。我们到达时，见铁路员工正用嘎斯火分割车的衔接处，到中午才把机车和车厢分割开。这时从四平开来一辆重型机车，带一个重型车厢，上边拉着一台长臂吊车，把机车叨放在车厢上，就往四平开去。

午后，我们开始了"侦破"活动。我到现场一看，原来在距桥北不远的两根铁轨接头处，铁夹板的螺丝被拧了下来，道钉也被拔掉了，道轨完全失去了控制，导致列车颠覆脱轨。

我们向泉头警察署长张致远和满井警察分所长张肇让了解情况，他俩没提出任何线索。我们三便分头搜集情报，两天毫无收获。村上义一把我们三人找去，他瞪着血红眼睛吼着："你们这些废物，都两天了还没有查到线索。让宪兵司令部特高课长把我好顿训。他说案件发生在伊通管辖范围内，命令伊通警务科限期破案。你们三人要通力合作早期破案。"过了一天，乐山警察署长陈久香突然来了。他是泉头人，中等个，大眼睛，穿着灰串绸衬衫，戴着从香港进口的狼草草帽，拿把小伞，冷眼一瞧像个阔商人，我们一问方知，是村上给他去电话，要他来参与破案工作的。陈久香原是营城子警察署长，1936 年末，他曾把小杂木沟分所搜捕出来的两名地下党员，送交给日本宪兵队，使敌人破坏了伊通地下党团组织，使不少人遇难。他的行径深受日本人的赏识，并通令嘉奖，颁发奖金。这次村上叫他登台，定然没有好戏唱。

果然，陈久香来后根本不同我们在一起进行"侦察"，独来

独往，经常同村上嘀嘀咕咕。又过了一天，村上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叫汇报情况，我和李奎峰、王守信都没有提出新情况，可陈久香却后来居上，他说据掌握的“情报”，这个案件是钱丰泰、钱富泰两家唆使铁路员工干的。钱家是张学良的亲戚，他说在铁路员工家搜出了扳子，是做案工具。

村上义一向宪兵司令部特高课长汇报后，7月24日，宪兵司令派了不少宪兵和伪警察，把西沙河子村团团围住，水泄不通。他们把两家老钱家从12岁以上到72岁以下的男人都逮捕了。有个5岁的男孩，因去姥姥家串门才得幸免。在此之前，敌人就把满井车站的铁路员工全部逮捕。他们说是先从内部破案。其中有一位铁路员工叫王山东被捕后，泉头警察署的警察王志民和1名日本宪兵，去他家搜查，要他妻子交出道钉，并威吓她交不出道钉就带走，同她丈夫一路去。王山东的妻子不用说找出道钉，连一个铁钉都没找出来。

王志民和宪兵走后，王山东的妻子抱起她那3岁的娇儿痛断肝肠呼天喊地大哭一场。她左思右想没有活路了，走到摇车杆子眼前，先将孩子吊在摇车绳一端，自己吊在另一端，这位年仅20岁的妇女和她那只有3岁的婴儿，被敌人逼得双双自尽。我们闻讯到达时，他们母子早已绝气身亡。她被勒得双目突出，眼角流血，脸色发紫，舌头伸出多长，嘴角上血水滴滴。那个婴儿更是惨不忍睹，张着小嘴，嘴里边含着被勒出来的黄瓜和小米饭。围观的人们看到如此惨状都唏唏嘘嘘，抽泣声一片。我虽然是伪警察，但还有中国人的良知，见到他们母子惨相，不由自主地鼻孔发酸，眼睛发湿，泪水几乎都流下来。

敌人在老钱家、满井车站和西沙河子村共抓去28人，送到四平宪兵队和伪警署关押。他们对每一个人都进行了严厉审讯，施以各种酷刑，要他们承认这起案件是张学良将军派人策划的。

人们心里都明白，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在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是由十年内战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而“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形成了全面抗战的局面。因此，敌人对张学良将军恨之入骨，妄图通过这一事件打击张学良将军在东北的原有势力，进一步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敌人从被捕人的口里，是根本找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供词。于是血腥的屠杀开始了，8月24日敌人把被捕的人，用汽车拉到四平气象站墙外，推下汽车，驱赶到早已挖好的深坑里，加以杀害。

敌人在处死那些被捕者以后，对西沙河子村，仍然进行封锁，老钱家的牲畜全部饿死，有的亲属也受牵连。老钱家在北平有个大学生，时值回家度暑假，听到他们家遭到惨杀，就逃往佳木斯。敌人获知后，就派泉头警察署的警察王席珍和一名宪兵，去佳木斯搜捕。把这名大学生抓回来后也送到四平，后被处死。这场惨案先后被敌杀害的有23名，有2人自缢，共有25人被他们夺去了生命。

案件结束后，我才回伊通。在这20多天里，一幕幕惨剧，令人发指，日本军国主义者残暴罪行，罄竹难书。

（摘自《伊通文史资料》第一辑）

钱家惨案

庄光烈　尹永安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发动事变，进而占领了整个东北。从此东北人民在日寇铁蹄践踏下，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东北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的

爱国运动，反满抗日事件此起彼伏，层出不穷。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它在东北的反动统治，采取了法西斯血腥镇压，惨无人道，罪行累累。钱家惨案就是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历史见证。惨案是1937年发生在离我市不远的泉头车站附近，而杀人刑场就设在我市铁西区气象台和原第八师范学校的西侧的一片荒草地上。当时在第八师范读书、现已离休的庄光烈、张霖、张汶田老师就是这起惨案刑场的目击者。

事情发生在1937年旧历六月上旬，阴历7月21日零时30分，由北往南行第16次急行列车，驶到泉头车站南边2公里，沙河子大桥地方，路轨破坏，火车脱轨；车头同3辆客车车厢一齐掉在桥下沙泥中，其余车厢也东倒西歪，车里旅客多是日本人，死伤无数，狼藉不堪。这就是满铁京连线火车颠覆事件。

日本侵略者气急败坏，对中国人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当时，日寇调动四平街日本宪兵队、四平街警察署、开原、铁岭宪兵队和警察署等倾巢出动，大肆搜查，以逮捕"破坏分子"为名，到处抓人。7月24日，日寇突然包围了沙河桥东的西沙河子村，迳到钱国泰等两家，翻箱倒柜，大肆搜捕，将男子全部捆上，大打特打，向妇女们逼问破坏铁桥铁轨的口供。硬说："这一定是张学良派人来指使你们干的，还是承认的好"。原来钱家是张学良先生夫人于凤至的姥娘家，家中有在东北军当旅长的，村子距大桥又近，所以就使日寇怀疑，招来抄家大祸。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日寇终将钱姓逮捕9人，村里、钱家亲友、满井铁路职工逮捕13人，共22人。当即把他们带到四平日本宪兵队和警察署关押。在看押中，每日严刑拷打逼供，什么灌汽油、灌辣椒水、坐电椅子……施尽各种残暴手段。最后，折磨得全身四肢不能动弹，不能吃东西。7月24日午后，天空阴云密布，日寇用大卡

车将22人载到气象台西侧，第八师范西墙外网球场旁，这里早已挖好一个大坑。日寇把用铁索连在一起的22人，从车上拉下来，跪在土坑前，其中有老头、老太太、中年男人、有穿着制服的青年学生、还有抱着小孩的妇女，全都用布蒙着眼睛堵着嘴，一字排开跪在坑边。日寇刽子手和伪满警察拔出战刀，先在草地上挥舞试刃，喊着杀声，然后就像发疯的野兽，用战刀把受害者一个个地砍倒在地坑里，血花四溅，然后用脚踢入坑里，随即掩埋了事。这种惨状，令人目不忍睹。

西沙河子村在捕走人以后，仍被封锁月余，禁止出入。凡本村外村与钱姓有往来关系的亲友，无不受到牵连，家里牲畜全部饿死。钱家只剩一个小孩，因住姥娘家幸免于难，隐姓埋名，以后逃往朝鲜。直到解放后，才返回故乡，向人民政府诉苦，终将当年的汉奸翻译陈顺五逮捕枪决。

钱家惨案距今已50年了，这些受害者仍含冤长眠在地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日本法西斯分子曾惨无人道地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

于凤至亲属谈“钱家惨案”

钱金宝　钱金仲口述　姚野整理

1937年7月21日凌晨，伪满连京线一列日本军用快车，由北向南急行在昌图县沙河子铁桥处突然颠覆。这次军列被颠覆，使侵略者遭到重大伤亡，三昼夜未通车，事件震惊中外。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报复，将沙河子村钱家及有关人员23人杀害。现

将钱家惨案追记于后。

我家祖居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现属辽宁省昌图县）满井乡沙河村。旧社会家有土地百垧，60多口人团聚一堂。祖父钱丰泰是东北军张学良将军第一夫人于凤至的舅父。家父钱辅廷（字东升）过去是张大帅的马弁，后为张学良将军的侍从副官，讲武堂第一期毕业。家族中在张学良统帅的东北军内就职的就有7人之多。最高职的钱忠山是东北军1名旅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国民党腐败无能，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实行不抵抗主义，奉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往关内围剿陕北根据地，竟把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拱手相让给日本。张学良东北军的上下官兵，面对国破家亡和国共两党的不同主张，思想不断变化，由疏共变亲共；由亲蒋变恨蒋，因而导致接受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

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将军亲自召见于凤至夫人的表兄钱辅廷。让家父待机破坏东北铁路运输线，切断日军向关内增添兵力和弹药给养的供应；并做好东北军重建家园的内应工作。为了给钱辅廷创造方便条件，不致暴露行踪，便下令钱辅廷接任石家庄东北军的营长职务，既避开了钱张之嫌，又好来去自由，行动方便。当蒋介石在南京扣押张学良不久，家父收到表姑母于凤至的一封密信：告知“西安事变”真相，并说蒋还要逮捕学良一派及其至亲密友，为免遭暗害，应换个地方躲避一下。不多日，我家就由石家庄迁往天津市。在此期间，家父积极筹划，后直接派人传递了张学良将军的密令。正如敌伪报刊上所说：“本年逃亡关内之钱家某官，行反日之行动，由此人向钱家来信，传达日支风云之险恶，如果事变时，在开战之同时，满洲内之铁道使其破坏，力谋后方之扰乱”。这里提的

某官，正是钱辅廷。家父就是张学良将军的代言人，遥控反满抗日救国的主要组织者。1936年冬，家父密派王氏弟兄（外号王山东）去东北昌图老家传递张学良将军这一密令。为使王氏弟兄能在老家落户，又不引起他人怀疑，经过细致研究，慎重考虑，周密计划，才让王氏弟兄领妻子和孩子一起4人以逃荒为名，前往昌图老家与钱富德（五叔）接头。通过密信接通了关系，被收留为我家短工，安排在我家下屋居住。后因钱富德秘密串联族兄族弟——钱富恩（当时是满井站铁路警察）、钱富祯、钱富厚等弟兄，钱富德便成了这次事件的直接组织者。于是秘密决定，扒铁道破坏运输线。一是自家西南方不远的满井河铁桥；二是桓沟子车站。事后积极筹备，扩大队伍。钱富恩和满井站铁路3人郭孝田、蒙希山、蒙希武是拜把兄弟，患难朋友。不久挂钩成功，队伍已扩大到9人，若从事扒铁道，破坏运输线，必备工具，又要有熟悉技术。工具由郭孝田、蒙氏弟兄包下了，撬扛、铁镐、搬手等，应有尽有，准备停当，只等时机一到，即可行动。

偏巧，7月18日从满井站获得内部消息："20日夜间将有日军特快军用列车，由北向南通过满井站，要做好线路安全检查工作。"他们便秘密商磋，研究破坏大计。钱富德召集众人，共同讨论研究，周密考虑策划。得知20日夜间10点以后南北方向均无车。当即决定于20日晚10点携带好工具到现场，由钱富德指挥。钱富德、钱富厚南北站岗放哨，钱富恩、郭孝田、蒙氏弟兄和王氏弟兄人人做扒轨工作。他们正是准时到达满井河铁桥的北端，动手将铁轨接头处撬开，使接头处不相衔接。完毕后，郭、蒙、王各回各家，钱氏弟兄沿铁道向泉头方向走去。

21日零时30分，由哈尔滨开往大连的日军用特快十几节车厢满载日军官兵，火车驶到铁桥北端突然脱轨倾斜，车头向

河底冲去，后面车厢由于惯力，冲撞着也跌入河底，火车头扎入河底泥里，仅尾部一节车厢脱轨后停在桥上，其它车厢，全部车毁人伤，敌人死伤惨重。敌伪报刊上说："死去日本机关士（司机）2 人，满人 2 名，日本旅客 1 人，负伤 64 人。"这是避重就轻、怕暴露真相，掩人耳目之说。事后听说日军将官以上的高级将领就有 4 名当场死亡。

事件发生后，经过现场检查，敌人认为："此事件非自然发生之事件，乃大胆之徒，行其计划，故意破坏之所致也。"因而调集警宪特务汉奸，封锁各个要道，严查可疑之人。敌人考虑到，破坏时间之准确，工具准备之恰当，扒轨工作之熟练，必定是车站内部人员干的。首先抓走了蒙氏弟兄，后又抓走了郭孝田、钱富德、钱富生。而钱富生是刚从奉天（沈阳）放假回家的大学生，事件发生时还在学校，根本与他无关，虽然日系校长当面申诉和具保，但敌人妒嫉该人是大学生，恐出后患，也未能幸免于难。钱富德、钱富生弟兄 2 人是我二祖父的儿子，哪里肯舍，二祖父便不顾一切地由小路赶到泉头警察署打听消息，未曾想也被扣留，一去未归。随后又抓走了祖父钱丰泰、五爷钱景泰和叔叔钱富安、钱富厚等人。三叔钱富祯跑到此路乡女儿家时，谁知早有特务等待，也被抓走。伯父钱富清逃到昌图城姑丈人曹义家里，也被告发让警察抓走了。不仅钱家满门遭劫，还祸及亲友，表叔徐氏弟兄 3 人，王氏弟兄和许某等人，也一同送往四平市日本宪兵队。后全部定为"反满抗日国事犯"，于当年 8 月 24 日集体砍头埋在四平市南公园墙外。主要组织者钱铺廷曾几次迁家，后由天津迁到北平市北新桥香饵胡同三十六号居住。1939 年夏一天晚上，身着便衣、手持武器的特务 5 人，由房顶下来闯入屋内，将父亲和我姐弟，一共 4 人抓走，因母亲重病卧床不能行动，没有抓走。因我姐弟 3 人年幼，于第二

天凌晨用马车送回。而家父钱铺廷这个事件的主要组织者，由此杳无音信，后来才知被抓到北平市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惨遭杀害的。钱富恩老叔在火车脱轨完成任务回家后，马上偷偷带妻子从后院走出，投奔哈尔滨香坊区妻兄王世禄家。可是到后的4个钟头，全屯就被当地警察看管起来。后把一个姓冼的山东老头抓了起来。等昌图日本特务拿照片一对照，才知抓错了，因此钱富恩借此时机逃了出来，又逃往佳木斯，最后在哈尔滨满洲七八二部队当了装卸工，给日本侵略者在夜间往火车上装药箱。日本特务没有抓到钱富恩，临走时说："谁抓到老钱家人有赏，抓到钱富恩，一斤肉给一斤金子，谁要知道不报，同样论罪。"钱富恩此时已改名徐荣久，因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在干活中经常把运往前方的药，全部倒地壕沟内，将空箱装上火车运走。后被日本侵略者查觉，于1940年6月被抓走杀害。到此，我钱氏一族祖辈3人，父辈8人在此事件中惨遭日本杀害。而八叔钱富春当时没在家，立即改名李志清，背井离乡8年，到处讨饭生活；大叔钱富云，吓得脱离红尘，留发蓄髯，出家于东丰县一个庙里，人称"刘老道"。二人在祖国光复后才敢回家，后正常死亡。

我钱家这一爱国行动所造成的惨案，记下了中华民族的深仇大恨和中华民族不可侮的铁的事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辈也能记取这一光荣的历史，为振兴中华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奋起腾飞。

（摘自《昌图文史资料》第二辑）

龙泉惨案

杜宝贵口述　宫玉梅整理

我叫杜宝贵，今年75岁，现住龙泉镇龙山村。每当回想起日寇践踏中国领土，对中国人民实行残暴统治，在龙泉残害无辜，害得我家破人亡的情景，我沉重的心情就无法平静。

记得那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大好河山。掠我财源，占我土地，杀我人民，欠下了中国人民笔笔滴着血和泪的帐。

龙泉处在朝抚公路咽喉要道。1931年就有红军在此活动，群众的反满抗日情绪很高，曾协助红军两次攻打龙泉镇。并成立了大刀会等群众性组织，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经常给红军传递信息，送衣送药，日伪统治当局视红军为眼中钉、肉中刺。为割断军民的鱼水之情，他们采取了“集家归屯”、“保甲连坐”等政策，企图切断红军与人民的联系，并采取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

记得在1939年9月12日晚8点来钟，由李金当向导，50名小鬼子和10多名背给养的老百姓，过老岭向龙泉方向而来。沿路烧杀。当他们来到龙泉西南2公里的木精株式会社(现龙泉酒厂，当时俗称“化学矿”)时，看到附近一茅草屋正冒着炊烟。杀人的欲望，使他们加快了脚步。

他们来到茅草屋前，翻译问屋里是否有人？我爹杜天才从屋里走了出来，翻译上下打量着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到屯子里住？‘挂条’了吗？”(“挂条”就是“集家归屯”后，

如有特殊情况，经当地警察署或警察所批准，查无“通匪”问题的人。警察署给以证明的条子，时称“挂条”)。我爹是个胆小怕事、忠厚、老实的庄稼人。连忙说：“我是到这里看地的。”并急忙进屋将“挂条”拿出来递给翻译。翻译拿过“挂条”反复看了看，显出非常不耐烦的样子，将“挂条”扯得粉碎，扔在地上。然后，向日本官翻译了几句。只见日本官脸上横肉抽了几下，猛地抽出了战刀。其他日本兵蜂涌而上，七手八脚、不容分说地用绳子将我爹的左脚绑在右手上。然后，吊在了房梁上，下面堆起了我爹给别人割的柴草，一把火点着了，很快绑我爹的绳子就被烧断了，我爹挣扎在火堆之中，残暴的刽子手，用几个人抬的木头将其压着，活活将他烧死。

我和大哥杜宝金看到西山着起熊熊大火，立即跑到警察署，说西山起火了，不知什么原因，要求去看一看。经批准后，又到排长那取灯笼。灯笼，也是“保甲连坐”的产物，灯笼上写着你是几排的，排长叫什么名字。没有这种灯笼，把门的警察是不充许乱出乱进的。拿着灯笼后，我们就拼命地向西山跑。当跑到去“化学矿”的岔路口时，迎面跑来一个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们可千万别往那边去了，日本鬼子正在那里杀人、放火呢，你们现在去，不但救不了你爹，连你们自己的小命也得搭上。我是给日本人背给养的，其他人都被他们杀死了，我是趁他们不注意才跑出来的。”说完，就又没命地向前跑去。

我们哥俩没有办法，只得又回到屯子里。第二天，听说小鬼子走了。我大哥和邻居等8个人，前往出事地点，准备将爹的尸体收殓。我和其他人在家安排丧事，买菜、弄米、拢棺材。大约9点多钟，跟我大哥一起去的曲广恩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说其他人都被小鬼子给杀了。我一听，当时就昏倒在地。醒来时，我不顾一切地往西山跑，当跑到山上一看，小鬼子还没有

走，正在“化学矿”附近的松树林里坐着休息呢，并有说、有笑，根本没注意这边。我悄悄走到他们杀人的地方一看，就惊呆了。只见七八个人横七竖八、血肉模糊地躺在地上。我认出来有个叫贾七的老汉，脸朝外、眼睛还能“卡巴”。我一看，他身上有七处刀伤，而且，都在腹部和肋部，肠子都看得很清楚，一喘气，血就顺着刀口向外流。我吓得直哭，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一想，光哭有什么用，如果小鬼子再回来，就连我也没命了。想到这，我就拣了些草和破衣服片子，把贾七的伤口一一给堵上。然后，把他拖到草甸子里，用草、树枝盖好，藏起来。

还有李喜竣大爷，被小鬼子用枪托将半个脑袋打塌，一只眼睛都掉出来了，搭拉在脸上。我见他还有气，就用件破衣服把他的头给包上，也把他拉到甸子里藏起来。

老罗头光能出气，不能进气。我大哥，刺刀从前心进去，从后心出来。手用绳子绑着，伤口还流着血，脸朝下。当我将他翻过来一看，鼻子没了，嘴唇子翻翻到了脸蛋子上。见此情景，我眼前一黑，就不省人事了。醒来后，又到烧我爹的地方一看，我爹被烧得只剩一条胳膊和一条腿了。

我偷偷回到村子里，找到东庙的陈老道，要了点刀伤药，弄了三只鸡，把他俩的伤口用干净水洗了洗，上了点药，把鸡毛拔掉，鸡皮剥下来，糊在伤口上，这时，伤口才勉强止住了血。由于老李头年龄较大，失血又多，伤的又是头部，刚给他糊上鸡皮，不一会儿，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敌人边走、边杀、边烧，来到了公路上，又见迎面走来了两位出家道人，魏老道和他的徒弟冯德林。这两位吃斋念经的道人也没免于一死。他俩全身被刺，被打得血肉模糊，脑浆溅了一地。

这帮强盗一路烧、杀，来到富国村附近的一家，主人赖老

六正在院子里干活。敌人进院后，二话没说，对准他胸部就是一刺刀。鲜血如注地从刀口喷了出来。他的儿子吓得哇哇直哭，残暴的敌人，一把抓过他不满6岁的孩子，活活摔死在一块大石头上。他怀孕待产的妻子，见此情景，不顾一切地拼命去保护儿子。一个鬼子端着血淋淋的刺刀，向其腹部猛力一刺，使劲一挑，肚皮划开一尺多长的大口子，随着一声惨叫，妻子当即死去。肠子和待产的婴儿掉在地上，接着鬼子又将微微抽动的婴儿挑在枪尖上，狠狠在摔在地上。然后，扬长而去，这种惨状真叫人目不忍睹。

后来听说，敌人从9月12日到13日，仅两天时间，就沿途杀害无辜百姓120余人，重、轻伤无数，这笔血海深仇，我终生难忘。

（靖宇县政协文史办供稿）

关于日本守备队杀害陈八爷等一事

马文昌

亨通山子黑崴子屯陈八爷，系大刀会徐旅军法处处长陈德禄（字惠圃）的父亲，是当时本地知名人士。他为人慷慨、乐于助人，在百姓中有一定威信。他因李洪玉一事牵连，被日本守备队杀害于柳树河子。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日本守备队听说黑崴子沟里有土匪，于是去讨伐。在马大望和土匪“双全队”相遇。双方接火后，日本守备队被打死两人，“双全队”撤退了。日本守备队马上追击，正遇上从山上下来的李洪玉，李洪玉是仙人沟自卫团连长。日本人就说他是土

匪，把他抓到了县里。审讯时，他说亨通的陈八爷、张五爷、康二先生、周三爷等人都可以给他做保，证明他是“良民”。于是，守备队派人把陈、张、康等人传到柳河。

这些人证实李洪玉确实是仙人沟村良民，日本人仍然不信，仍对李洪玉动刑。李洪玉招架不住，供认自己“通匪”。

李洪玉这一供认，他的保人也就遭了殃。日本守备队对他们也严刑拷问。日本人用竹板子夹陈八爷的睾丸，夹一次，他就昏一次；昏一次就用凉水浇一次。陈八爷一看没个好，日本人不把他折腾死不会算完，不如认了吧，落个痛快。于是，陈八爷供认自己是“土匪”，日本人说，你是土匪，得报个字号。陈八爷报了个“老来好”，就这样定了案。其他人也都供认了“土匪”或“通匪”。从此不再审问了。

在一天夜里，日本守备队用汽车把他们拉到了柳树河子，在事先挖好的坑边，用洋刀砍了他们的头。

过后，他们的家属到柳树河子偷尸。因为是夜晚，也摸不清谁是谁，有的弄个身子，有的弄个脑袋，回家埋了。据说陈八爷埋葬时没有脑袋。因此事被牵连的26人，全部被害。

以上情况是我在黑崴子教书时，听吴玉峰讲的。

（柳河县政协文史办供稿）

侵华血史岂容篡改

——日本侵略者在公主岭市犯下的罪行

刘金贵

我市前身原怀德县，在日伪时期，经受了14年侵略屠杀之苦，我们对日本文部省的倒行逆施行为更加义愤填膺！

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关东军”的“铁道守备队”、“一部骑兵”、“通讯部队”就攫取了我公主岭、范家屯等铁道两侧的大片耕地，称铁道“附属地”。

日本“关东军”就盘踞在公主岭城东和城西北的铁道“附属地”内。日本的兵营不许中国老百姓靠近，附近的人行道也分日本道和中国道，中国人一旦误入日本道，日本兵就开枪射击。在日本军国主义统治的十几年里，这样死难的中国无辜老百姓不计其数。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我市人民的镇压更加残酷。日本军国主义在公主岭增驻了大批“关东军”。城东面的原来日本兵营向东扩展到八里桥子，南面到6.5公里外的伊通县边界，还建筑了楼房仓库，驻扎了几万日本“关东军”和伪军；城西北增驻了高射部队；城西南修了许多营房和仓库，驻了战车部队；城北直到高家岗扩建成了飞机场，并附设了飞机零件制造厂。

当时的公主岭成了日本“关东军”盘据的重要巢穴。这时的“关东军”气焰嚣张，在我市横冲直撞，草菅人命。如果有中国人走近日本兵营和飞机场不是被逮捕摧残，就是被放出的军犬咬死、撕碎、吃掉，其惨景令人目不忍睹。这样的事情每年都要发生几起，甚至十几起。

至于“关东军”司令官指挥下的公主岭宪兵分队，迫害中国人民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备有各种刑具和狗圈，专门对付中国人民的所谓不轨行为。最残酷的刑具是一种称做“小飞机”的东西。这种刑具是内外两个长方形木槽，内槽65厘米左右宽，150～200厘米长；外槽130厘米宽左右，180～210厘米长；内槽两侧钻有许许多多直径30～40厘米的孔，外槽两侧的内壁正对着内槽的孔装上铁锥或小钢刀；内槽固定不动，外槽

可以左右横向活动。日本宪兵队就把抓来的所谓不法中国人仰面放在内槽里，用绳索固定住，使其不能动弹，然后用脚不停地踏“小飞机”的机关。于是，“小飞机”的外槽就左右地移动起来，它带着的锥子、刀子就不断地通过内槽的孔向里面躺着的人的身上刺去。“坐飞机”的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后，宪兵队就把他们往狗圈里一扔，让狗吃掉。

1943年3月1日，日本特务把持的伪怀德县警务科特务股成立了特侦班，分别在公主岭、范家屯、怀德城侦察反满抗日活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动态，对所谓嫌疑分子盯梢监督。日本宪兵、特务、警察依据自己的意愿和判断，对处于任何行为的人都可以逮捕，包括外出上街或旅行的人。1943年5月27日，警务厅特务科日本警佐金泽指挥特侦班的特务在怀德城一次就抓捕了20多名老百姓，加上“反满抗日”的罪名，送到伪吉林省警务厅刑押。他们这套法西斯手段，弄得群众人心惶惶。

日本军国主义就想以这种屠杀来实现他们长期霸占中国，形成“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

是侵略，还是“进入”？血写的事实不是最好的见证吗？

（摘自《公主岭文史资料》第二辑）

黑龙江省

高家屯惨案[①]

高　英

1932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上午10点钟左右，有几个骑马躲避日本兵的人从我们高家屯中跑过，不大一会儿，只见一队骑兵约50多人，从东南方的公路上飞奔过来，等我们看清是日本兵后，叫大家赶快躲避。

这些日本兵到高家屯后，就在屯东头架起两挺机关枪向屯子里扫射，并听到他们哇啦哇啦地喊“马胡子……统统地马胡子……。”接着他们就包围了我们高家大院。那时我们家有24口人。当时除八叔、八婶、六婶、七婶出外串亲戚外，在家的有奶奶、父亲、母亲、二叔、二婶、三叔、三婶、四叔、四婶、五叔、五婶、七叔和我们几个孩子，另外还有两个“伙计”，共22口人。日本兵包围了我们家后，就在大门口架起机枪往院子里扫射，他们一看人都躲到屋里去了，就抱来了柴草，先点着了上屋，接着又点着了东西两个下屋。奶奶、母亲、三婶带着我们几个小孩都躲在上房东屋的炕沿下；二叔、三婶和四婶抱着两个孩子藏到上房西屋去了；三叔、四叔和两个“伙计”藏在西厢房；父亲、五叔和七叔藏在东厢房。日本兵一面点火，一面让翻译叫喊“掌柜的出来！”那时我们家掌柜的是我二叔，他

---

① 高家屯是现在的黑龙江省拜泉县时中乡众志村。

以为日本兵是打“马胡子”的，所以就出去了，边走边喊：“我们都是好人，不是马胡子，不要打了……”。他的话音没落，我们在屋里听到枪响，又听到二叔“妈呀！”地惨叫一声，就知道二叔被打死了。这时二叔的大儿子（他比我大两岁）听到他父亲的惨叫声，就要出去，奶奶死死地抱住不让他出去，不一会儿他从奶奶怀里挣脱出去，冲出房门跑到东房山墙下也被日本兵开枪打死。70多岁的老奶奶见孙子被打死，她疯了一般地和日本兵拼命，冲到门口又被打死了。这时上房的火已经全着起来了，二婶和四婶每人抱着一个孩子，她们想在屋里也是被烧死，不如冲出去拼了，她们就从正门出去了，二婶和她抱的孩子（当时还不满两岁）都被打死在上屋窗户下，四婶被打死在东下屋外边，她抱的孩子被打伤压在她身下。我们看日本兵见人就开枪，又听到他们喊：“统统的，大人小孩统统地打死！……一个的不剩！”在正门谁也不敢出去了，房里的火越烧越大，母亲上了炕，对着窗户往外喊：“我们是好人！”日本兵发现屋里还有人，便对着窗户开枪，母亲的胳膊被打断了，跳到地下，火烧烟呛屋里已经呆不住了，三婶扶着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一共7人从后窗户爬出来后，就趴在后窗户下边了，我是最后爬出来的，出来后我一滚就趴到最后一个小墙头下边。三婶的一个女孩吓得哭起来了，这时正在点火烧东北角炮台的8个日本兵跑了过来，在离我们30多米的地方向我们开了枪，打了一阵后，看看我们都不动弹了，才走开，三婶和4个孩子都被打死了，我和母亲也都挨了好几枪，幸亏小墙头掩护，没有丧命。这时整个上房都已经烧落架了。

西厢房南头是装马草的，北头是磨坊，日本兵进屯子时，四叔正和伙计在南屋铡马草，三叔在屋套马拉磨。三叔听到日本兵来了并开枪杀人，他急中生智从后窗户出去，跳过大墙藏到

院外老李家园子里。四叔他们3人躲进了马草堆里，日本兵点火烧房子，马草着了火他们都被烧伤了，四叔豁出去了，要和日本侵略军拼命。他从后窗户跳出去，到西下屋后草垛里摸出一支快枪一支匣枪，然后跑到西北角炮台里去，他准备当日本兵到西北炮台时就开枪。

东厢房里藏着我父亲、五叔和七叔，日本兵点着房草后，往屋里扔火把子，父亲他们就用猪食锅里的泔水把火烧灭，所以他们屋里的火一直没有烧起来。

日本骑兵除了用20多人围我家大院，进行放火烧杀外，其余的日本兵就往西去围我们屯另外几户人家去了，除了最西头的老王家3口都跑到北地里藏起来外，老李家的老大被砍伤在北边地里；老周家住的3个山东人都被用刀砍死在北边地头上，另一户姓周的男人被打死在院子里，老太太和媳妇被活活烧死在屋里。在这次大屠杀中，我们屯子40多口人，除当时没在家的人外，共被日本侵略军杀死18人，杀伤4人。全屯大火冲天。

这伙强盗把好端端的高家屯烧杀一阵以后，朝北而去。路上遇见东屯"跑日本兵"的一辆大车，车上坐着两口子领4个孩子，日本骑兵赶上通过翻译问："你跑什么！"那个庄稼人叫住马车，愤怒地回答说："跑日本子！"这些日本兵像一群野兽，叽哩哇啦地乱喊乱叫，一个个拔出战刀围上来就砍，大人、孩子都惨死在日本兵的屠刀下。

这就是日本侵略者血洗高家屯惨案的全部情况，我是这次惨案的幸存者。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拜泉县政协文史办供稿）

血洗张景芳屯

时　焕

伪满时，在黑龙江省拜泉县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洗张景芳屯惨案。

我是在敌人的屠刀下死里逃生的幸存者。虽然是50多年前的事情，但是回忆当年的惨景，却历历在目。那是1933年旧历十月十六日（阳历12月3日）上午，人们正忙着打场，突然村外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大伙往村头一看，顿时都惊呆了。有5辆大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如临大敌般摆开阵势，几门小炮的炮口对准我们村里。日本兵都端着枪，上着明晃晃的刺刀，一帮对全村进行包围，一帮闯进村里，无论打场的、刨粪的，见到男人就抓，就连过路的、做小买卖的、串亲戚的男人也无一漏掉。他们把抓到的人都反绑双臂，押到张景芳家的大院里。在院内的门口、东厢房南头都设岗警戒，在院心，对着人群架着两挺机枪。为首的日本军官叫黑田，他拄着皮鞘大战刀，站在队伍的前面。那个白翻译，紧贴他的主子身边。黑田叽哩哇啦地说了几句，姓白的赶紧弯腰"哈伊"了一声，手拎木棒来点人数，他每点到一个人数时，就往人们头上狠打一棒子。点完数，他转过身去，向黑田嘀咕了一小会儿，又来到人群前，大声问道："谁是当家的？"当天，张景芳外出不在，他的堂弟张老七给他管事，便应声回答说："我是当家的。"白翻译厉声问："谁是'凤好'？谁是'六合'？"（指的是土匪绰号）张老七辩解说："这些都是好人，没有一个'马胡子'！"白翻译

瞪了他一下，然后又向黑田说了几句日本话。黑田一挥手，便从他身边走出两个日本兵，拎起木棒狠打张老七。接着又把韩打头的、丁老疙瘩都拉出来，逼着承认是“马胡子”，并问都带多少人。他俩说没带过人，黑田就怒吼起来。两个日本兵抡起木棒，向韩、张二人劈头盖脑打起来。打得他俩在地上翻滚，死去活来。不一会儿，张老七、韩打头的、丁老疙瘩3人的脑袋被打碎，脑浆迸流，当即丧命。汉奸白翻译说：“给你们砍两个看看！”于是就把张景芳的老弟和高老二，从人群里拉出来，黑田抽出战刀，对准张、高二人的脖颈手起刀落，身首异处，鲜血染红了一大片雪地。接着，大屠杀就开始了。十几个日本兵，端着锃亮的刺刀，向人群猛刺起来。在一片凄惨哭叫声中，尸横遍地，血水横流。黑田又下令，叫日本兵抱豆秸、麻秸往尸体上覆盖，随后就从东北角上点起火来。火借风势，越烧越旺，烈焰飞腾，浓烟滚滚。

当时，我在人群中间，没等敌人刺刀捅上我就倒在地上，被捅死的人压在我的身上。可是也没能幸免于难，背后被敌人捅了好几刀。立即鲜血如注，疼痛难忍，我咬紧牙关没敢吭出一声。火烧到我的身边，烟熏火烤，又疼又呛。紧挨着我身边的任打头的也没被捅死，他悄悄地对我说：“跑吧！”还没等我吱声，他抬起身来就向东北方向跑去。刚到东厢房北头，就被放哨的日本兵发现，一枪把他打死了。随后，日本兵用机枪向这群已死的和半死的人们扫射起来。有的有口气，想要挣扎站起来，又中弹倒下。我在浓烟掩护下，一轱辘身起来往东北跑。被日本兵发现，一枪把我撂倒了，右胳臂打了个透眼。接着，打我的那个日本兵端枪跑到我身边，一连气戳了4刀，伤了我两根肋条。就在生命危急的时候，大门外汽车响起了喇叭声，接着就是催促集合的号声。我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晕了过去。

等我苏醒过来，日本兵已经走了。我觉得两眼发黑，天旋地转。幸亏没死的鲁大爷走过来，见我还活着，帮我解开了绑绳，扶我慢慢地站起来。在他的搀扶下，我强支撑着身子，一步一步地挪着往家走。走到半路回头一看，张景芳的大院已是一片火海。村里哭声、喊声连成一片。

在这场灾难中，从我家里被抓走的有我伯父和两个叔叔，还有表大爷、哥哥和两个串门的、两个借宿的，都遭杀害了。我祖母、伯母因想念亲人，天天以泪洗面，饮食不进，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忧伤过度相继死去。嫂子嫁到外地了，一家只剩下我孤身一人了。后来我们活着的人计算了一下，全村死在敌人屠刀下的足有百口人。当时，天寒地冻，张家大院里血水结成了红色冰河。尸体被烧成焦炭，横倒竖卧。人们围在这里，嗓子哭哑了，眼泪哭干了，但是谁也认不出哪一个是自己的亲人。这么多的尸体，叫这些老幼寡妇怎么去收敛掩埋呀！多亏西屯的乡亲们来了，帮助在村南头挖个大深坑，把一具具尸体全埋在一起了。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北安市政协供稿）

日军在湖南营、孟家岗等地的罪行

桦南县政协

编者按：为了征集日军在湖南营、孟家岗等地进行烧杀的史料，黑龙江省桦南县政协文史办公室开了专题的征稿会议。在会上，根据当事者的回忆整理出以下资料：

孟家岗张学颜回忆，1933年7月的一天，日本兵到孟家岗

前宋家屯，把24名无辜群众赶到我家，在一个屋里用刺刀挑死后，放火烧了房子。由于当时风大，火借风势，前宋家屯顿时全部化为灰烬。

五道岗乡兴中村张洪江（68岁）、齐庆有（67岁）、陈绍富（67岁）、张积营（68岁）几位老人的控诉：日本关东军在他们的开拓团入殖中国的同时，要征农民手里的地照，收农民手里的枪，引起了各地农民的愤恨，有的捐钱，有的捐粮，纷纷组织大排队，保护家园，日军为了扑灭反日火焰，到处抓人。就在1933年这年的旧历腊月三十晚上，人们要辞旧迎新的时候，在老张家屯（现五道岗兴中村）西沟子，驻守土龙山的日本人吉田，领着日本兵开来一辆汽车，当即把胡老汉、张明义的父亲、吕洪延、朱大帅、程海波，西李家屯的李当家拉出来枪杀了。第二天大年初一，人们去看，6人都死在血泊之中。

1942年夏天，日军经常以查夜为名，在深夜十一二点出来抓人。一天夜里，日本兵在湖南营区一个旅店里抓"浮浪"，一次就抓走了二三十人，第二天装进闷罐车送到矿山，在那里吃橡子面、披麻袋片，给日本人背煤，当体力耗尽、血汗被榨干，不久相继死去。我国同胞死在日本屠刀下的真不知有多少？

顾奎文老人的控诉：现在的达连泡，当年是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子，在日军进行"讨伐"中，这里遇难者虽9人，但已足见日军暴行之一斑。

日军讨伐队围剿住在达连泡顾小辫沟顾文全、王大化、顾德友家的抗日军时，我已19岁。那是1937年10月的一天上午，日军开着5辆大汽车，直奔我们村而来，每辆车上有20多个日军，架着机关枪。车一到村边，就和抗日军接上火，仗打得十分激烈，双方都有伤亡。后因寡不敌众，抗日军撤走了。敌人一进村就直奔顾文全、王大化、顾德友家，敌人凶相毕露，见

房就烧，见物就抢，见人就杀。当时没来得及走的顾文全家3口、王大化家4口、顾德友家2口都被日军用刺刀给活活挑死了。这三家的房子都被点着烧光了。

黄贵福老人的控诉：我是目睹日本兵刀挑18名无辜群众罪行的见证人之一。

1937年7月的一天，10名日军和1个翻译，从湖南营来罗泉村"讨伐"抗日军。住在罗泉村西部太平沟的抗日军刘风山部十几人，得知日军讨伐消息后，当即埋伏在碱草沟东岗罗泉石场西侧，准备伏击敌人。大约上午9时许，日军讨伐队来到罗泉石场，埋伏在两侧的抗日战士，突然向敌人进行了猛烈袭击，日军当场死亡9人，2人逃回湖南营。下午100多名日军乘坐13辆汽车，气势汹汹地直奔抗日军驻地太平沟而来。一进村，就到处搜查、抢掠，抓不到抗日军，就把18名抗日军家属抓了去。两天后，他们在罗泉石场进行了大屠杀。

屠杀前，日军把九里六屯群众都赶到屠杀现场。当时我看到四周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架着机枪，18名日军端着上好刺刀的枪，对准18名群众。先是日本大官训话说：你们打死9名大日本皇军，今天要用你们18名抗日家属给死者祭灵。接着日本和尚念经，最后下了屠杀命令，就这样他们用刺刀把18名群众活活挑死了。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四·一五”大逮捕

肖炳龙　王习文

“4·15”大逮捕

1937年4月15日前后，日伪势力对中共哈尔滨特委和哈东特委进行大逮捕，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500余人。这次大逮捕是由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本部利用伪哈尔滨警务统制委员会，统一指挥日伪宪兵和警察犯下的又一重大罪行。

1936年初，张德、韩守魁、杜礼到达哈尔滨。根据上级指示，撤销中共满洲省委，成立4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指定张德任哈尔滨特委书记，但张德在哈尔滨几遇特务盯梢，不得不离开哈尔滨去抗联三军。此后，由韩守魁任哈尔滨特委书记、张志恒（张瑞麟）任组织部长，哈尔滨特委下辖哈尔滨市委、海伦县委、宾县特支、巴彦特支、呼兰特支、陶赖昭特支，奉天（沈阳）市委和大连市委。

同年3月12日，中共驻东北代表指示珠河党团县委及抗联三军负责同志，以珠河、延寿、宾县、五常、苇河五县的工作为基础，并联合阿城、双城、及榆树、呼兰等县，成立哈东特委，道南（滨绥线，即哈尔滨至绥芬河铁路）及道北部队的党的工作，受哈东特委领导，由冯仲云任特委书记，并接受中共松江省委的领导。松江省委主要负责哈东游击区的工作；哈尔滨特委则侧重负责以东北九个大城市为中心的党的工作。

1937年2月上旬，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课根据叛徒

的供词，命令将伪苇河县警务科和伪满国军中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逮捕。伪滨江省警务厅司法股长筑谷章造带领部下去苇河县逮捕了由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提名的3名伪警察，经严刑审问，认为其中1名有共产党嫌疑，遂将其送交给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课，另有伪满宪兵将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提名的伪满军人逮捕审讯后，送交哈尔滨日本宪兵队。

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课，接受由伪满宪兵和伪滨江省警务厅送交的被捕者后，经酷刑审讯，判明了中共哈东特委的组织机构及有关人员情况。

设在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本部，由哈尔滨日本宪兵队长充任委员长的伪哈尔滨警务统制委员会和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制定了逮捕计划。通过伪哈尔滨警务统制委员会，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得以统一指挥哈尔滨地区的伪警察，使警察成为日本侵略军的驯服工具，镇压抗日爱国力量的罪恶帮凶。伪滨江省的逮捕总指挥，由一面坡日本宪兵队分队长中头上尉担任，伪滨江省警务厅司法股长和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课小田村曹长为辅佐官。

1937年3月初，在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课，召开有关逮捕行动的警宪特各方协商会议。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课课长、特高课宪兵3名、一面坡日本宪兵分队长中头上尉、伪满宪兵军官1名及伪滨江省警务厅司法股长筑谷章造等人参加会议。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课长介绍了哈东特委的组织机构情况，及在伪滨江省范围的人员姓名、职业、住址。决定逮捕行动由伪满宪兵和伪满警察执行，在同一时间实行大逮捕，逮捕日期定于1937年4月15日；逮捕行动计划实施前，各方绝对保守秘密，不得走漏一点消息；逮捕计划实施后，所有被逮捕的人，一律送交伪哈尔滨警察厅，对于未捕到的，要迅

速通知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课。

在这次大逮捕行动中，伪滨江省警务厅负责逮捕伪滨江省范围内的所谓非军人嫌疑分子。为此，伪滨江省警务厅召集伪哈尔滨警察厅、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别搜查班及有关伪县、旗警务科特别搜查班主任会议，传达了哈尔滨日本宪兵队的命令，并宣读了要逮捕人员的姓名、职业、住址等情况，决定于4月15日早晨，按名单统一实施逮捕。

1937年4月15日早晨，日伪军警宪特在哈尔滨和滨绥、滨北各铁路沿线进行大逮捕。逮捕总人数为207名，全部羁押在伪哈尔滨警察厅及市内各伪警察署拘留所。对被捕者的审讯由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司法科及部分伪县警务科特科系主任和特别搜查班承担。

在大逮捕中，日伪警宪依据所获的机密文件和审讯口供，又继续逮捕了许多人，逮捕范围扩大到大连、柳河、磐石、奉天等地，共逮捕300余人，判处死刑者约百余人。中共哈东特委、哈尔滨特委、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哈尔滨市委、大连市委、磐石中心县委、海伦、柳河县委、抚顺特支等中共地下党组织均遭到严重破坏。

“法政大学事件”

“4·15”大逮捕，也使中共哈尔滨市委遭到严重破坏。伪哈尔滨警察厅破坏了中共哈尔滨市委。伪哈尔滨警察厅在破坏中共哈尔滨市委的同时，接连制造血案，发生了震惊哈尔滨的“法政大学事件”。

早在1934年1月12日，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密侦郎树勋从他妻侄于治文的口中得到情报，说他认识一个共产党，原来是于治文在双城时，认识的一个名叫艾凤林的女人。据于治

文讲，艾凤林问他是否愿意参加共产党，若想参加可为其介绍，郎树勋立即报告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特高股搜查主任林宽重，林宽重命令郎树勋，让于治文进一步接近目标，弄清还有哪些组织成员等。

据当时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并负责筹建新市委的张瑞麟回忆：为了掩护党的地下活动，市委决定让冯策安和艾凤林临时建立家庭，组织决定由冯策安担任市委宣传部长。

在林宽重的策划下，郎树勋供给于治文特务活动经费100元伪满币，让于治文将艾凤林诱到道外景阳街新滨旅馆内，借机从艾凤林口中套取情报。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的日伪警察在林宽重的指挥下，一路暗中跟随于治文，在于治文把艾凤林诱到新滨旅馆后，包租隔壁房间，由伪警察李绍棠、吴树桂负责窃听他们交谈的内容；一路由伪警察田宝恩、郎树勋对艾凤林尾随跟踪；另一路跟踪侦察冯策安的日常活动，于治文由艾凤林介绍，同冯策安见面，了解了冯策安与艾凤林之间的关系，以及冯策安的秘密活动情况，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从于治文的口中得知冯策安是中共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艾凤林为其交通员。

“4・15”大逮捕时，在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长兼外事科长川手与九郎的指挥下，由林宽重率领日伪警察泉屋利吉、李绍棠、吴树桂、滑宝珊等人将冯策安和艾凤林逮捕，在冯策安的住所搜出中共秘密文件、宣传小册子和反日传单。冯策安和艾凤林被押往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拘留所，由日本人伪警察泉屋利吉、伪警察吴树桂、滑宝珊等人审讯，以后送往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本部。1937年4月15日，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张瑞麟发现敌人的大逮捕行动已开始，曾去找过冯策安，据张瑞麟回忆：冯策安住偏脸子，是俄国人的房子，对其他人一直保密，

我认为他那里可能安全些。到那里后，发现屋门锁着，我认为他们到小饭店吃饭去了，就又到外边转了一圈，回来门还是关着，这时碰上俄国房东老头，他用手比划着告诉我，冯策安和艾凤林两人已经逮捕了，于是我也赶忙离开了那里。

冯策安被捕后，在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的严刑逼供下，出卖了他在道里大陆补习学校时的同事，原哈尔滨法政大学毕业生、中共党员于维范和法大毕业生、哈尔滨《大北新报》记者、中共党员刘芳声两人。使于维范和刘芳声遭到特务科逮捕。在逮捕时，从他们的家中搜出了哈尔滨法政大学同学名录和结义金兰谱，即拜把子兄弟的名单。林宽重和泉屋利吉认为这两本名录一定是中共地下组织党员名册，按名单又逮捕了法政大学毕业生、哈尔滨（国际协报）编辑、中共党员赵魁，法大毕业生、《哈尔滨公报》社主任兼孔氏医院法律顾问关文明，法大毕业生牟子爵，南岗事务所工作人员吴树堂，法政大学俄人教授李文错夫、法大毕业生任国恩、孙宝惠、董小川，以及与牟子爵有关系的道里同生泰油漆商店经理王伦堂等人。随后又有宋树藩被捕，在审讯宋树藩时，供出了法大毕业生、南岗山街代书事务所的肇玉兴和庙台子车站伪警察巡官王英周。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翻译周质彬在场，听到宋树藩供出肇玉兴。肇玉兴与周质彬的父亲私交甚好，周质彬就设法通知肇玉兴速速逃离哈尔滨，而肇玉兴又送信给王英周，两人一齐逃走。

特务科为了镇压中共地下抗日活动，一网打尽他们想象中的中共在哈尔滨法政大学毕业生中的地下组织，宁可错捕错杀，决不使一个漏网。特务科搜查主任林宽重和泉屋利吉都认为曾经担任法政大学学生会主席的赵魁是中共法大支部的负责人，并将开油漆商店的王伦堂逮捕，因王伦堂与牟子爵有商务上的往来，认为王伦堂是为中共地下组织筹集、提供活动经费的人。

另外，宋树藩供出的肇玉兴和王英周又逃离哈尔滨，未能捕获，使得线索中断。特务科据此认为问题复杂而又重大，更加紧了刑讯逼供，夜以继日，昼夜不停。

特务科的严刑逼供收效甚微，因为被捕者中，多数中共党员意志坚定，宁死不招，不吐露真情；而普通群众的被捕者不知道实际情况，无从谈起，实在被逼无奈就信口胡说，使口供无法一致。在特务科10余日的残酷肉刑之下，刑讯致死的达7人，审讯赵魁时，残忍地往生殖器上踢，竟将赵魁活活地踢死；关文明也被日伪警察猛踢小腹而死。死刑后，特务科向哈尔滨红万字会要了几口薄皮棺材，偷偷一埋了事。在法政大学事件中被刑讯致死的有于维范、刘芳声、赵魁、任国安、宋树藩、关文明、牟子爵。

法政大学事件是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一手制造的血案，日伪警察使用了卑鄙无耻的法西斯手段，残酷的刑罚，充分表现了日本法西斯的反动本质。

“口琴社事件”

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在跟踪冯策安时，发现冯策安每天出入道里新安埠（偏脸子）安丰街路西一家院内。尾随的伪警察郎树勋、李绍堂即到该管区伪警察派出所调查户口。户籍卡上仅记载该院内一户住家，户主为唐嘉伟，职业是哈尔滨口琴社职员，有俄籍妻子。郎树勋、李绍堂两人认为唐嘉伟是冯策安的化名，唐嘉伟所在的口琴社被他们怀疑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郎、李二人立即将此情况报告林宽重，林宽重又派遣特务科伪警察暗中调查哈尔滨口琴社成员的姓名、住址、行踪，准备到时候一齐加以逮捕。

哈尔滨口琴社成立于1935年4月1日，是由伪哈尔滨邮政

管理局的职员袁亚成和他妻子一齐创立的，社址在道里。最初是袁亚成受一家进口口琴商店的委托，创建口琴社为商店推销口琴。口琴社成立后，招收了许多口琴爱好者，收费教授口琴吹奏方法，参加口琴社活动的，大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有爱国思想的热血男女青年，中共地下党员姜椿芳、金剑啸等都参加过口琴社的活动，以联络、团结更多的文化界人士，开展抗日斗争，使口琴社成为文化人进行爱国活动场所。曾经参加过哈尔滨口琴社的沈玉贤同志回忆："1935年我在业余时间参加了哈尔滨口琴社的活动。我喜欢口琴社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我愿意跟这些朋友在一起。这里，没有油头粉面的纨绔子弟，也没有花枝招展的风流小姐。人们衣着朴素，举止端庄。这些人爱好音乐，但没有人哼唱《毛毛雨》与《桃花江》；这些人喜欢文学，却没有人欣赏鸳鸯蝴蝶派的文章。在这里经常聚会的青年有侯小古、任震英（解放后曾任兰州市副市长）、金剑啸、张金人等等。当时，我虽然不能肯定他们是地下共产党员，却可以从举止言谈中看出他们思想进步，热爱祖国、有灵魂、有理想，与那些醉生梦死的行尸走肉者迥然不同。

那时，伪满建国3年，三千万东北人民挣扎在苦难深渊，过着被压迫被奴役的殖民地生活。但是人民是不甘心屈服的，满腔怒火，凝铸利剑，时刻准备投向敌人。……一到口琴社，我们就仿佛到了另一个天地。空气是那样清新，言谈是那样自由，思想又是那样奔放。"

唐嘉伟原在中东铁路供职，精通俄文。1935年中东铁路被日本收买后，唐嘉伟被裁减，赋闲在家中。他和袁亚成是同乡关系，便帮助袁亚成组织口琴社，处理日常事务。他同冯策安是住前后院的邻居，伪警察跟踪冯策安时，看冯策安进出家宅必走唐嘉伟的院子，误认为唐嘉伟的住宅即是冯策安的住宅。其

实，唐嘉伟与冯策安并不认识，两人之间也无往来。冯策安每日从唐家院子进出，是因为怕有人盯梢，侦察他的住址。所以每天外出或回家，都特意绕弯，从唐家院子进出。

冯策安被捕前，林宽重派伪警察李绍棠、滑宝珊，在实施逮捕的头天晚上9点多钟，在唐嘉伟住宅窗外临街处监视一夜，以防冯策安逃脱。次日早晨，林宽重带领郎树勋、田宝恩、林富新等伪警察赶到，命令滑宝珊和李绍棠进院将唐嘉伟逮捕。随后，郎树勋进屋，见唐嘉伟并非尾随多日的冯策安，连说不对，遂引导林宽重、田宝恩等人到西院逮捕了冯策安。

林宽重见捕到冯策安，又疑心冯、唐两人必有秘密关系，便命令伪警察滑宝珊和李绍棠将唐嘉伟逮捕，押回特务科审讯。唐嘉伟在伪警察的严刑拷打下，乱供他参加了俄国人领导的暴动组织并咬上参加口琴社的人。

哈尔滨口琴社自成立后，多次举办音乐会，演奏了如《沈阳月》(描写“9·18”事变的夜里日本侵略军进攻东北军北大营时，中国爱国官兵奋起抵抗)、《乘风破浪》(义勇军进行曲)和《伏尔加船夫曲》等进步曲目。社会上早已风传，伪警察特务要抓口琴社的人。1936年10月间，口琴社社长袁亚成借送妻子陈娟回上海生孩子的机会，将全家搬走。袁亚成走后，口琴社没有负责人了，侯小古就以队长的名义，召开善后处理会议，大家同意口琴社解散。到唐嘉伟被捕，口琴社已不复存在。从1937年4月18日开始，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将侯小古、王家文、柳桥、沈玉贤、陆怀章、黄士担、谢宋文、金淑贞、陈笑岩、李哲范、于佩贞等人逮捕入狱。伪哈尔滨警察厅把口琴社当成共产党案件，呈报给伪中央警务司。经过一段审讯，发现唐嘉伟是乱供，于是将口琴社的人大部分释放。但对侯小古等人施以酷刑，硬要他们承认是共产党。侯小古受刑最重，受刑

时不喊不叫，咬牙挺着，有时还痛斥敌人，被打得混身是伤。最后特务科为向上请功，假造口供，把侯小古说成是第三国际的共产党员，送交伪第四军管区军法会审，判处死刑。1937年9月23日，侯小古被敌人枪杀于太平桥圈河，时年仅24岁。唐嘉伟、王家文被伪哈尔滨警察厅以中共地下工作员的名义，送伪哈尔滨高等检察厅侦察起诉，由伪哈尔滨高等法院判处5年徒刑。其他释放的人被伪警察特务定为“要视察人”，经常被伪警察明讯、暗察、跟踪、盯梢，丝毫谈不到生命保障和行动自由。

（摘自《哈尔滨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在“四·一五”事件中被害的“口琴社”主要成员侯小古烈士

林　工整理

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统治哈尔滨时期，曾经发生过镇压文化界爱国活动的“口琴社事件”，这是敌人制造的“四·一五”全满大逮捕事件中的一部分。哈尔滨口琴社社员先后被逮捕十几人，均遭受许多酷刑折磨，有的被判徒刑，而口琴社主要成员、口琴队副队长侯小古则惨遭敌人杀害。

侯小古，本名侯君实，1913年5月生于辽宁省海城县牛庄东园子屯。1924年，侯小古入吉林市北极门外小学读书。1928年入吉林省永吉县立中学，后又转入吉林一中学习。1930年毕业后，经同学资助，曾去北京弘达学院补习功课，准备在北京升学，但因经济困难，只得又回到吉林。1931年春考入吉林大学，“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吉林，吉林大学停办，侯小古失学在家。这时他父亲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冯占海部，进

行抗战活动，不久病死在宾县，扔下小古的祖母、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家庭生活更加困难。年轻的小古只得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1932年10月，他与两个朋友一起，在吉林市新开门里女子师范学校对面，开了个“三友文具店”，以微薄的收入，维持家庭最低生活。

由于和女师近邻，他与女师史地教员、中共地下党员李世超相识，并经常来往。在李世超的影响帮助下，侯小古有很大进步，秘密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据原吉林特支书记李维民回忆，侯小古经李世超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否确实，至今未查清楚。

1933年5月，吉林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李世超转移到哈尔滨工作。侯小古接受李世超的委托，帮助女师进步学生秦涉云往哈尔滨转移。他的这些活动也引起敌人注意，1934年春侯小古被迫离开吉林到哈尔滨。侯小古的父亲侯文阁与进步作家萧军熟悉，他会拉胡琴，萧军则喜唱京戏，二人有来往。1931年夏天，侯小古随其父到吉林省舒兰县一个东北军营长家里作客，在那里认识了萧军。他到哈尔滨后，找不到熟人，就去找萧军。萧军把他介绍给我党地下文艺工作者金剑啸，他们一起在道里中国十五道街（现西十五道街三十三号院内三层楼上）办了个“天马广告社”，承揽各种绘画、广告业务，以此掩护革命活动和帮助一些进步的爱好文艺的青年维持生活。侯小古和女作家萧红等都在这里帮助金剑啸画过广告。后经人介绍，他在道里税务监督署当上了一名小职员。

这时他与转移到哈尔滨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的李世超和满洲省委宣传部干事姜椿芳等同志经常接触，对党的活动给予资助。他还用小古（或小谷）的笔名写些诗文，在刘莉（即白朗）主编的《国际协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当时党组织曾想发

展侯小古入党，后因故放下了。

侯小古多才多艺，美术、诗文、音乐都不错。1935 年4 月1 日，哈尔滨口琴社成立，这个进步群众文艺团体，总人数有一二百人，经常参加活动的有五十多人。我们的地下党员姜椿芳、金剑啸等都参加了口琴社活动，以联络、团结更多的文化界人士，开展抗日斗争。侯小古和王家文（即王湘）等作为第一批学员参加了口琴社。吹奏口琴学成后，就参加了口琴队的一切活动，曾到各处去演奏。他们演奏过一些进步歌曲，如《沈阳月》(描写“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沈阳)、《乘风破浪》(义勇军进行曲）和《伏尔加船夫曲》等。由于侯小古参加活动积极，演奏水平高，王湘和他被选为口琴队的正副队长。他们计划在1935 年年末举行一次公开的口琴音乐会，侯小古积极印制宣传广告。在音乐会前，即传出特务要抓口琴社的人，说里边有共产党。有些社员害怕退了出去，侯小古等骨干成员还在坚持，终于在12 月29 日、30 日、31 日这三天，举办了口琴音乐会，给群众很大的影响。

1936 年初，因怕敌人来抓人，口琴社一度解散，这样抓人的风声暂时灭息下去。又过了几个月，侯小古、王湘等几个积极分子，再次串联起来，在四五月间，又将口琴社恢复起来，继续开展活动。6 月13 日，金剑啸、姜椿芳等同志突然被捕，口琴社的形势又紧张起来。但侯小古、王湘等仍坚持活动，并于8 月间举办了第二次口琴音乐会。此后形势更加紧张，人心惶惶。10 月间，口琴社社长袁亚成借送他的妻子陈娟回上海生孩子的机会，将全家搬走。袁亚成走后，口琴社没有负责人了，王湘和侯小古就以队长名义，召开善后处理会议，大家同意口琴社解散。

1936 年冬天，风声日紧，社员们都纷纷隐匿。朋友们劝侯

小古也离开哈尔滨躲一躲，但他念及家中有年老的祖母和弱妹无法生活，而不肯离去。

1937年4月15日，日本侵略者开始对我地下党组织进行有计划的大破坏，对爱国群众进行全面大检举、大逮捕。敌人在逮捕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冯策安时，误将住在同院的口琴社会计捕去。他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乱供他参加了俄国人领导的暴动组织并咬上参加口琴社的人。这样从4月18日开始，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将侯小古、王湘等口琴社社员12人一起逮捕。敌人把口琴社当成共产党案件，呈报给伪中央警务司。经过一段审讯，发现口琴社会计是乱供，于是将口琴社的人大部分释放。但对侯小古、王湘这两个口琴队队长却不放过，认为他们是主要人物，对他们施以酷刑，硬要他们承认是共产党。侯小古受刑时不喊不叫，咬牙挺着，有时还痛斥敌人，所以受刑最重，浑身是伤。最后敌人为了向上级请功，假造口供，把侯小古说成是第三国际的共产党员，送交伪第四军管区军法会审，判处死刑，王湘被判处5年徒刑。1937年9月23日，侯小古被敌人枪杀于太平桥圈河，时年仅24岁。

侯小古是一位坚强的爱国青年，他的死是日本侵略者欠下的又一笔血债。所谓的哈尔滨"口琴社事件"也是日伪统治者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而犯下的又一桩罪行，我们要记住这个血写的历史，决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摘自《哈尔滨文史资料》第七辑）

陶家湾惨案

黄国生整理

陶家湾（今黑龙江省汤原县香兰镇陶家村）位于小兴安岭南麓，汤旺河北岸，是个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地方。1937年，日本侵略者在这里进行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迄今，这里的人民还记忆犹新。

1937年10月，刚下过一场小雪，打入伪自卫军内部的我抗联联络员李德明就开始走村串户，为抗联六军留守团耿殿君部筹集棉衣、胶鞋和粮食等物资。10月24日，由于坏人告密，李德明被日军发现，汤原县吉兴沟的日本宪兵队出动了50多名宪兵，全副武装，兵分两路，穿山越岭，连夜奔袭陶家湾，追捕李德明。

第二天早晨，天刚朦朦亮，日本宪兵队分别开到了陶家湾的东北山口和正北山口。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疯狂地冲进村子，首先闯进屯边的郭广福家。郭广福正在和母亲一起围着火盆烤火。一个宪兵上炕一脚把火盆踢到地下，顿时烟灰满屋。日军逼着郭广福母子出去，随后就把房子点着了。接着日本兵挨家赶人出屋，放火烧房。

日本兵闯进陈凤武家，举起战刀就向陈凤武老人的脑袋砍去，鲜血从头上流下来，老人当即昏倒在地。日本宪兵把给陈凤武家打短工的72岁的郝炳文拽出来，厉声喝问："马胡子的有？"郝炳文念过几天私塾，在地上写了"马胡子没有，种地、打场"几个字，宪兵看后气得哇啦哇啦直叫，照他脸上就是一

刀，郝炳文的脸被砍了一道大口子，鲜血直流，接着又是恶狠狠地一拳，郝炳文被打出很远，摔倒在地。然后，日本兵上了炕，把炕席卷起来，里边塞上麦秸，往墙角一立，用火点着了。屋里的人还没等走出屋门，火已上了房。

日本宪兵在鞠洪洲家更是凶残到了极点。他们把鞠老汉捆绑起来，用刺刀把双手扎透，然后用铁丝串上拧在一起，鲜血从手掌心往外流。鞠老汉疼得几次昏死过去，日本宪兵仍不罢休，硬逼着老汉向鞠德平场院走去。

在鞠德平场院里，被日本宪兵用刺刀逼去的老百姓中，男的有40多人，全部跪着，双手被绑着。周围是哭泣着的妇女儿童。一个留着小黑胡子的日本宪兵头目，站在跪着的群众面前，挥舞着战刀，声嘶力竭地咆哮着："李德明的藏在哪里？马胡子地统统出来！不说，统统死啦死啦的！"接着拽出一个15岁的孩子——李万柱。"嚓"的一声，一个宪兵狞笑着把木杈子卡在小万柱的脖子上，然后使劲一拧，便将万柱拧倒在地上，日本兵抡起皮鞭，抽得万柱在地上滚来滚去。但是，李万柱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宪兵打了一阵又问，小万柱还是不吱声。这下可气坏了宪兵头目，他一挥手，上来一帮日本兵，把万柱大头朝下吊在苞米架子上。万柱的父亲李老汉眼看日本兵残害自己亲生骨肉，气得浑身颤抖。老人家心疼儿子，更担心孩子挺不住说出什么，他不顾一切地喊道："柱子，你是爹的好儿子，千万不能胡说呀？"坚强的小万柱直到被吊昏过去，牙缝也没有欠。日本宪兵从李万柱身上没捞到什么，不肯罢休，继续在小孩子身上打主意。于是又从人群里把13岁的单海拽出来，拉到跪着的老百姓面前，一个一个地问，让单海说出谁是"马胡子"。单海只是摇头，不肯说话，气得日本宪兵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嘴巴，踢了回去。接着日本兵把农民姜万富拉出来，这时他9岁的儿子姜

海山冲出人群，抱着父亲不放，“爹呀！爹呀”地哭喊着。一个宪兵上前一脚，踢得小海山半天才喘过气来。宪兵指着姜万富问小海山：“他的马胡子？”小海山哭着说：“我爹是好人，我爹是种地的。”他见日本兵听不懂，就在地上用手指写“好人”两个字。日本宪兵无奈，只好让姜海山的父亲回到人群里。

这伙日本宪兵在场院对老百姓大施淫威，另一伙日本宪兵在屯南的田里搜查。他们见到人影就开枪。农民王宽跟二儿子和大儿媳妇在苞米地捆苞米秸，猛抬头看见日本宪兵来了，刚要跑，“哨哨”两声枪响，只见王宽父子倒在地上。王宽的大儿媳妇正怀孕，也没有逃出敌人之手。日本兵不仅杀害了她，还惨无人道地用刺刀剐开她的肚子，把胎儿挑出来摔在地上。

我抗联地方联络员李德明，从西向阳屯奔向陶家湾后，就藏在农民鞠洪洲家。早晨，李德明正在吃饭，鞠老汉出门给马添草料，忽然发现日本兵进屯了。立即返回告诉李德明，李撂下饭碗从后窗跳出去跑到王宽苞米地附近藏在柴禾码子里。

王宽父子被杀害后，日本兵继续搜索，距离李德明的隐避点越来越近了，李德明头顶着一捆柴禾慢慢地向远处移动，不幸被日本兵发现了。日本兵向他开枪，李德明中弹牺牲。

场院里的日本宪兵头目得知李德明在屯外被打死，更加猖狂，挥舞着战刀喊着：“你们统统是马胡子！”接着用战刀威逼一部分群众：“起来！”“走！”鞠洪洲、郭恒才、郭广发、肖永春等十几个人被迫向屯外的大路走去。鞠洪洲老汉坚决不走。日本兵发疯地嚎叫着：“你的八嘎呀路！”一刺刀将老人捅死在道上。其余的人走到井边，宪兵让老百姓围井跪一圈，小黑胡子头目一声号令，二十几把刺刀同时刺向跪在地上的老百姓，并将尸体一个个扔到井里。然后又把几百斤重的大石磙子投下去，压在死难者身上。日本兵临走时又将全屯的房屋烧光。这次被

日本宪兵杀害的无辜群众共14人。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日本宪兵离开了陶家湾。留下的是一片断壁残垣、火光浓烟和老百姓的阵阵哭声……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汤原县政协文史办供稿）

西二堡惨案

郑长山整理

西二堡（伪行政区划）位于黑龙江省汤原县城东北七十多华里处，北靠庙岭山，西至格节河，东起乌龙河，南到大脑山。这一地区包括西二堡屯（刘侉子屯）、于家沟、卯家街、毛家街、套子里、尚家街、高殿元屯等村屯。这里依山临水，地理情况复杂，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战场，不仅抗日联军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广大群众也白天为农，夜间开展抗日斗争，使敌人兵民难辨。因此，日伪统治者对这里防范甚严，设有日本守备队、警察署、自卫团、特工班和村政府，是日伪统治的中心。

这一地区人民的抗日活动，使驻在西二堡的日军守备队、警察署越来越感到不安。为了消除抗日军民的威胁，日军决心毁掉于家沟、毛家街、尚家街、套子里、高殿元屯等村落，把这些地方的百姓聚集驱赶到西二堡屯和卯家街居住。在这两个村四周建立了9个日本移民团，形成包围形式。这样，一方面可以监视当地军民的活动，另一方面可以切断抗联六军与抗日民众的联系，企图把抗联六军扼杀在深山老林里。

1937年旧历十二月十四日午夜，盘踞在鹤立的日军会同西

二堡日本守备队300余人，在铃木和左田大尉指挥下，由特务、叛徒带路，分东西两路向西二堡一带扑来，一场残酷的大屠杀开始了。

火烧尚家街

西路日本兵从西二堡屯一出来就把正在场院打场的农民李德山抓住，西二堡日本守备队秘书李教一对李德山说："老李，你给日本军带路吧。"全副武装的日本军队，在宪兵队长、翻译、特务头子李鼎轩、特务李广镐、汉奸裴生、宋广全的带领下，向南直扑高殿元屯，回头向北，经过套子里和尚家街，一路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日本兵进屯了，尚家街的百姓从睡梦中惊醒，男女老少的呼喊声，日本兵的吼叫声使宁静的尚家街变得一片混乱。日军闯入尚家街东头的于振海家，用刺刀挑开门帘，妇女和孩子都吓得躲在墙角。于振海、于振东、杨广太3人站在炕沿跟前惊呆了。"统统的出来，搜查的有！"日本兵怒吼着。日军用刺刀把妇女逼到一边，把孩子逼到另一边，把他们3人押到了乔三矮子那儿，圈进房子里。

在被抓的人中，有的被日军用布蒙上眼睛，绑住了双手；有的被打得鲜血直流。他们中70多人分别集中到乔三矮子、白桐林、老丁家的房子里。房门用木杠顶住，院内只留下妇女、孩子和从各处抓来的十几个男人。日本兵在这3座房子的周围，对着门窗架上机枪。特务裴生、宋广全穿日本军装，戴着大口罩，在院内人群中窜来窜去。妇女和孩子们哭叫着，向押着他们亲人的房子冲去。日本兵团团围住她们，用刺刀把她们逼回院中。日本兵用枪逼着李德山和高真把柴堆在房子四周。

日本军守备队秘书李教一嚎叫着："交出马胡子！"但是没有人理睬，过了一会儿，一个日本军官怒吼起来，端着大枪，对

着院中人群。特务裴大嘴煽动群众说："太君叫你们交出'马胡子'，屋里那些人就都放了，不然的话，就放火统统地烧死！"这时，在院中被绑着的救国会长王宝坤大吼一声："姓裴的，我就是马胡子，他们都不是！"突然，不知是谁高喊："我们不能这样等死呀！"人们被提醒了，屋内外大乱。封锁3座房子的机枪响了，房子点着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走狗！"的口号声，人被焚烧的惨叫声，妇女孩子们的哭喊声，噼啪的烈火声混成一片。被围在屋子里的孟广义抠开炕墙和烟筒桥子，从里面钻出来，没有被发现，剩下的70多人全部殉难。

日本兵驱散了悲痛欲绝的妇女和儿童，牵着牛马，押着王宝坤等10人，逼李德山套上马车，拉着四麻袋小鸡回了西二堡守备队。

尚家街的火熄灭了，被烧死的人有的在炕洞上，有的在锅腔子里，有的把头插在水缸里，有的抱在一起，横躺竖卧，都看不出什么模样了。一群狗跑到这里，撕扯着这些尸体，真是惨不忍睹。

惨遭洗劫的这天夜里，妇女、儿童和老人顶着风雪，相互照顾着向鹤立走去，妇女的头发冻成了冰块，人们的脸上鼻涕和泪水结成了霜冰，赶到鹤立西卢四屯天已放亮。卢老四全家的人在院中点燃了好几堆火，让逃难的人烤火。还给煮了小米粥。火堆旁，失去了父亲的孩子扑在妈妈的怀里哭个不停。妇女们也都在不住地抽泣。孩子要爸爸，妻子喊丈夫，老人坐在地上呼唤着儿子。仅卢家一个院子里就有12个妻子的丈夫被烧死。

杀人填井

1937年旧历十二月十四日黎明前，火烧尚家街的同一时

间，东路的日本兵在叛徒特务唐殿祥的带领下，从大脑山、于家沟直扑卯家街。

日本兵进屯子后，鸡飞狗叫，皮靴的杂踏声，子弹的尖叫声，把人们从睡梦里惊醒。有的还没穿好衣服就被赶到李宗哲家的院子里。日本兵把院子围住，架着机枪，纷乱的人群被日本兵用刺刀逼着站成两排。特务唐殿祥穿一身日本军装，戴着大口罩，在人群中寻视着。一会儿，在他示意下，赵景春等8人被拖出了人群，毒打一顿之后，又用铁丝连成一串，押到于家沟老梁家。连同从于家沟、大脑山抓的14人一起押到西二堡守备队。

东西两路抓来的人都关进这里的日军守备队司令部大院里，都在架设铁丝网的大木桩子上，站不起来也坐不下去。半蹲半跪着，有的只穿一件单衣，有的光着头、光着脚。

守备队大院四周，铁丝网密布，戒备非常严密。中心岗楼上架着机枪，几十名牵着狼狗的日本兵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不时地用枪托打，用皮鞋踢这些被绑的人。村子里设了许多游动哨，大院四角的炮台上架着机枪。第二天，天没亮，警察特务、自卫团全部出动，押着32名用铁丝拧连在一起的群众，朝离西二堡二里远的车喜云家多年不用的18丈深的大井走去。

车家废井周围布满了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路口上架着机枪，井口边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站在那儿。32名群众被押到以后，他们怒骂、撞击走近的日本兵。日本兵扑过去，用枪托击打他们。把这些捆绑着的人推向井边。然后打开铁丝，日本兵恶狠狠地从一个个遇难者的背后，用刺刀扎进后心，顺势挑进井里。根据这里老百姓回忆，大井周围的地面上积有二指多厚的鲜血。遇难者的鲜血烫弯了日本兵的刺刀，在第31个人被挑的时候，他紧紧拽住日本兵的枪，想同他同归于尽，吓

得那个日本兵松开了手，枪被带进了井里。这时井上只剩下一个十二三岁的刘小五子，他是洼子屯的人，日本人抓人那天，因他妈有病，想吃野鸡，他到草甸子药野鸡而被抓来的。李教一假惺惺地对刘小五子说："用绳子把你送下井里，把枪拿上来就放你回家。"可是，当他把枪拿上来后没等站稳脚跟就被一刺刀挑进了井里，就这样32个无辜的群众没有一个幸免。

车家大井惨案后，又有8名群众的尸体被日本兵扔到这个井里，其中有救国会长杨德山、边跃堂、交通员庞军海。杨德山是被日本兵用战刀砍裂了脑袋，死在西二堡屯西北炮台上。事后被日本兵用马拖到车家大井扔进井里的。1968年当地群众掏井时，这个破裂的颅骨被捞上来，同时还发现了庞军海的手镯。现在，在车家大井里一共有40名同胞的尸骨。

妇救会长一家惨遭杀害

在西二堡南边的大脑山脚下，住着一家姓陈的，弟兄6个，都娶了媳妇。老二陈国兴的媳妇叫刘翠花，是妇救会会长。她经常走村串户，组织妇女开展抗日活动。因此刘翠花就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

旧历十二月十四日拂晓，一阵狗叫声把刘翠花从梦中惊醒。她猛地坐起来，推了一下丈夫陈国兴，"快起来，要出事儿!"正说着，特务唐殿祥穿着日本军装，戴着口罩，领着几个日本兵闯进屋里，刺刀逼在他们的胸前，不容分说，把他俩绑上。然后又抓了5个人。日本兵把这7个人每两人的两只手用铁丝拧在一起，顶着风雪，和在于家沟、卯家街抓的人一起，押送到西二堡日本守备队。在这里折磨了一白天。晚上，妇救会长刘翠花及其丈夫陈国兴、肃反队李大才、救国会长王宝坤和隆德明、老曲、小豆子等12名同志被押到鹤立宪兵队。

从鹤立西十字街往南走，南北路路西拐角处有个三合院，四周围着矮土墙，上面布满铁丝网，比房子还高。中心岗楼上架着机枪和探照灯，日本兵领着狼狗出出进进。这就是日本宪兵队的监狱。

监狱里除新关进的12人，还有原来关在里面的抗联连长王宪荣和战士王宪明等4人。一间小牢房里挤了16个人。王宪荣同大家一起研究了越狱计划。第二天，日本兵给刘翠花施了酷刑，想要从她嘴里得到重要情报。刘翠花嘴角被打出了血，头发被一绺绺地揪掉，灌辣椒水，几次昏死过去，可是她始终没有屈服。一天，刘翠花发现牢门外不远的地方有一颗二寸多长的钉子。同志们把几根筷子接在一起伸出铁栏处，轻轻地往回拨这根钉子。有了钉子这个挖洞的工具，越狱的信心就更足了。

1937年旧历腊月二十八日半夜，能够钻过一个人的洞挖好了。看守睡着了，查监的已经回去。王宪荣、王宝坤、刘翠花、李大才先后按计划的顺序爬出去。先爬出去的用手铐把看守砸死，摘下钥匙，打开脚镣子，从后门出去。这些人都光脚、攀着缠着“刺鬼”的大柱子往上爬。可是人还没跑多远，后面机枪吼叫起来。日本兵发现了！紧接着城内各处也响起了枪声和警笛叫声。警察、宪兵、日本兵全部出动，开始到处抓人。

妇救会长刘翠花为了同志们的安全越狱，她最后一个离开。她拖着沉重的身子，冲过了数道封锁线，脚被扎烂了、冻肿了，钻胡同、串小巷，躲避着搜捕的日本兵。她跑到西城边中心路南刘万路家讨了一双棉鞋穿上，因怕连累刘家，便迅速离开。这时一群日本兵已从后面追上来，只有几十步远了，她一闪身躲进了厕所里，想借夜色甩掉敌人，可是已被发现了。一群日本兵一边鸣枪、一边嚎叫着包围过去，她又被捕了。日本兵直接把她带到宪兵队，绑在东院墙外南北路西侧的电杆上。外衣全

部扒去，只穿着裤头。一个日本兵横叼着牛角尖刀，满脸杀气，不停地往她身上泼凉水。她一边挣扎一边破口大骂。日本兵恼羞成怒，对她下了毒手。天灵盖的肉皮被剥下来，血流满面。她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乳房被割掉了，嘴角被豁开了，舌头被割掉了。虽然发不出声音了，她还是在吼骂，直到牺牲。

就在越狱这天晚上，刘翠花的丈夫陈国兴光着脚从狱中跑出来，一口气跑了三十多里冰雪如刀的路程，到家时天还没亮。六弟看二哥托着肿得象馒头似的双脚回来，又惊又喜。陈国兴对他们说：“天快亮了，我不能再走了。鬼子一会儿就要追上来，你们快躲躲。”说完转身跑向麦杆垛。大伙帮他掏洞，送到里边一盆冷水、一把斧子和一双鞋，然后掩好洞口。天亮后，日本兵没有找到人，就向前追去了。在翠花就义的那天晚上，陈国兴领着两个孩子逃到松花江南南山密林里。还没过一个月，陈国兴病死在南山马架房子里。12岁的大孩子不分白天黑夜，在茫茫林海中艰难地穿行，越高山，渡河谷，躲避着野兽的袭击，到家找他六叔想办法安葬死去的爸爸。不满十岁的小儿子在这深山老林里守护在死去的爸爸身旁。就这样，大脑山老陈家，在这次大屠杀中相继死去4人，其中陈国发、陈国文惨死在车家大井。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被日本帝国主义毁灭了。

宋永贵屯五同胞被枪杀

日本兵火烧了尚家街以后，于家沟的人都被逼搬迁了。王振生一家搬到宋永贵屯，住在老孔家一座房子里。1938年旧历正月初二这天，天刚一放亮，由于特务许瞎子告密，日本兵在赵花的带领下，突然闯进屯子。把王振生、王思才、孟宪臣、孔老头子、孔二秧子、孔大磕巴、刘老五7个人绑上。孔老疙瘩是

抗日的联络员，日本兵没有抓住他。被抓住的7个人都被送到王傻子屯，让许瞎子辨认。当天下午把王思才父子和孟宪臣放了。孔家父子3人和刘老五被送到五保（今永发乡）过堂。第二天，许瞎子领着日本兵，带着五花大绑的孔家父子和刘老五又返回宋永贵屯王国栋家，把王国栋又抓走了。当走到宋永贵屯东边一里多路的上岗处。日本兵把他们5人的绑绳都松开了，还假惺惺地让他们跑，在他们还没有搞清是怎么回事时，机枪响了，5人都倒在血泊中。

日本帝国主义在西二堡这块土地上，于1937年旧历十一月三十日（1938年1月1日）、十二月十四日和十五日（1938年1月15日和16日）、旧历十二月二十八日（1938年1月29日）和1938年正月初二（1938年2月1日），先后仅5天时间分别在5个地方残暴地杀害了120名同胞，仅老尚家一家就有8口人被烧死在尚家街。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所说的新满洲的“王道乐土”。这里的村庄被烧掉了，这里的人民被杀害了。这火与血的历史，西二堡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汤原县政协文史办供稿）

“三·一五”惨案

邹景祥整理

一、“三·一五”惨案的背景

日本帝国主义在1937年4月15日，对以哈尔滨为中心的

伪滨江省地区的地下共产党组织、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及其成员进行了大逮捕、大破坏之后，把镇压的重点转到以佳木斯、汤原为中心的伪三江省地区。因为自1936年抗日联军和下江特委成立后，东北地区的东北角，成了抗联三军至十一军的活动地区。在下江特委的组织领导下，各地先后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抗日救国会组织有了迅速发展。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抗日联军、地下共产党和抗日救国会更加活跃，给侵略者以沉痛打击。于是，日本关东军便特派关东军第四师团、并纠集伪军混成第十六旅、二十三旅、二十七旅、靖安军四个团、伪兴安支队，共2.5万余人。此外还有日伪宪兵和特务部队、田中工作队等参加，进一步加剧了对三江地区的大“讨伐”和所谓“三江治安肃正”的行动。

日军一方面用重兵对我抗日联军实行围剿，另一方面对我地下党和抗日救国会组织进行疯狂破坏。派遣大批特务搜集情报，并在大围剿、大逮捕中扩大线索，妄图扑灭这一地区的抗日火焰。

1937年9月，敌人在汤原“九·一八”暴动前夕，逮捕了汤原县委宣传部长尹洪明，经过刑讯，敌人惊异地发现，从小兴安岭的密林地带到松花江两岸的广大地区，已建立了地下共产党和抗日救国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种组织。不久，敌人又诱降了汤原县委组织部长周兴武，相继逮捕了汤原县委到下江特委的重要交通员高贵林、勃利县委书记毅安波、汤原县委书记高雨春、依兰县特派员黄跃臣等人。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得到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所属的汤原、依兰、桦川、勃利、富锦、佳木斯五县一市的全部组织与活动情况。

1938年3月3日，在佳木斯宪兵队本部召开了关东军宪兵队本部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有关人员和各宪兵分队代表及满警

方面的代表会议，策划对地下共产党和抗日救国会人员实施大逮捕的具体计划。决定从北满临时省委、吉东省委的领导机关开始，对其所属党员和救国会的干部进行大逮捕。并对大逮捕的拘捕场所、审讯官及翻译的配备都作了研究准备。决定抢在3月20日江河解冰之前，于3月15日凌晨为统一行动时间，各按既定计划进行逮捕。

二、“三·一五”惨案的恶果

日本侵略者以佳木斯宪兵队所统辖各市、县宪兵分队为主力，纠集日军、伪警、自卫团、工作班以及特务1 000余人，于1938年3月15日拂晓倾巢出动，采用各种手段，实施大逮捕。在汤原，首先是按特务提供的情报，对重点村、屯用日、满军包围起来，按名单逐个逮捕或用叛徒高贵林、周兴武当面辨认进行逮捕。对我地下干部逃离者加以追捕；对打入日伪机关的地下工作者，上班后进行密捕；对分散在村落里的个别人，敌人放了望哨，伺机逮捕。

在“三·一五”大逮捕惨案中，日本侵略者共逮捕了党员、干部、群众387人，其中有我地下党组织及抗日救国会成员330多人、抗日联军暂住地方的指战员50人。敌人经数日审讯后，把他们认为不太重要的人员交给了各所在县的伪县公署处理或释放监视。对其余116人，如：高雨春、邢恩、冯占福、杨青等10人以反满抗日的罪名判处死刑，有2名在刑讯中被折磨致死，其余104名被分别判处5至20年或无期徒刑。

三、“三·一五”惨案在汤原

1937年10月下旬，日本驻汤原、竹帘、鹤立的熊谷旅团、仓石联队所属部队，到汤原城东北的福隆屯等地进行大逮捕。9

月13日敌人在汤原东30里的格节河口逮捕了汤原县委宣传部长尹洪明，把他交给了驻汤原日本宪兵分队。宪兵分队长、汤原地区警务统治委员会委员长藤原广之进，直接指挥宪兵和警察对尹洪明进行刑讯。尹洪明在敌人软硬兼施的刑讯之下屈膝投降，他不仅向敌人供认自己是汤原县委宣传部长，还供出他所了解的地下党和救国会等一切情况。

日本侵略者为了更多地了解地下党和救国会情况，推行了怀柔政策。敌人了解到汤原县委组织部长周兴武，因生活作风问题受到县委书记高雨春批评而不满、擅自离职不归的情况后，通过周的父亲劝诱周兴武投降。周兴武在其父亲劝诱之下，投降了敌人，承认他是县委组织部长，而且向敌人提供了所知的地下党和救国会的一切情况。

日军侵略者为了解更多的情况，训练了一批十六七岁青少年小特务，装扮成要饭的“花子”，潜到汤原县的各个村屯，密探暗察，进一步了解到部分区委和救国会、妇救会干部详细活动情况。于是日本侵略军先后逮捕汤原县委书记高雨春和县委同下江特委联系的交通员高贵林等人。经过诱供和严刑拷打，敌人又从个别贪生怕死的民族败类口中，得到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所属的佳木斯、汤原、依兰、勃利、桦川、富锦等地的地下党和救国会组织情况，以及党员干部名单线索。在汤原的日本宪兵分队长藤原广之进如获至宝，迅速把得到的所有情况，向佳木斯宪兵队本部的主子作了报告。佳木斯宪兵队根据汤原县宪兵分队的报告，立即通知了所属三江各地宪兵分队和分遣队，要求继续进行侦察，以便全面进行大逮捕，摧毁共产党和救国会的组织。

1938年3月3日，日本佳木斯宪兵队本部召开了所属宪兵分队长和分遣队长联席会议。汤原宪兵分队长藤原广之进出席

了这个会议。共同策划了破坏共产党和救国会组织的行动，并决定于1938年3月15日这天凌晨起，在汤原、依兰、桦川、富锦、勃利和佳木斯市进行统一大逮捕。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主任北川三郎大尉到汤原，与在汤原的日、伪军、警、宪、特的头目，共同策谋了“三·一五”大逮捕行动。盘踞在汤原的日伪军、警、宪、特也倾巢出动，偷偷地分别到各区、村、屯进行大逮捕，造成汤原“三·一五”大惨案。据藤原广之进在抚顺狱中供认：1938年3月15日，由他指挥在汤原逮捕了共产党员和抗日救国会人员共是68名。他还指挥依兰宪兵分遣队，在依兰县逮捕了县委书记刘洪泰等党员和救国人员共186名。“三·一五”在汤原县继68人之后又捕2名共计70名。其中有县委书记高雨春、县委文书侯国柱、特务队长翟凤、交通员于志新等11人；六军2人；汤区区委书记杨福亭、宣传部长张海臣和救国会长陈芳林等15人；鹤区区委宣传部长阎会福等9人；格区区委书记阎会发和青年部长等21人；龙区区委组织部长高俊峰等人；洼区救国分会长刘德仁等4人；莲江口2人。日本侵略者“三·一五”在汤原县大逮捕的70名共产党和救国会人员，除个别民族败类变节投降外，都在敌人监狱中，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伪哈尔滨高等法院，对逮捕的70人，于1938年8月21日，进行了所谓判处。高雨春等4人被判死刑，有36人被分别判了无期或20年、15年、10年、6年以上的徒刑。其他人交地方处理了。

四、“三·一五”惨案汤原被捕人员及审理情况

“三·一五”日军在汤原县逮捕了70名人员名单中，除13名所谓“嫌疑犯”被释放和1名叛徒外，有4名被判处死刑，其余的人都在敌人残酷折磨之下死于日伪监狱或苦役中。到了1945年“八·一五”光复时，活着返回家园的仅有十几人。

“三·一五”汤原县被逮捕人员名单及审理情况

姓名	别名	性别	当时年龄	原籍	历任职务	被捕前抗日职务	政治面貌	被捕前住址	日伪审理结果	备注
高雨春	长腿、大周、老王、李永财	男	27	辽宁省辽阳县上达连河	教员、税捐收款员、税捐分局长、自卫团文书、桦川县委宣传部长、特委巡视员	汤原县委书记	党员	桦川县四区大马库屯	死刑	
周兴武	小周	男	22		县委秘书、青年部长	县委组织部长	党员	汤原	叛变	
尹洪明	尹文明、大老蔡、赵振芳	男	47	安东县西明稿村	民间艺人	县委宣传部长	党员	汤原一区福隆屯	无期徒刑	
侯国柱		男	25	辽宁兴城县苏时岭	伪自卫团文书、教师	县委文书	党员	汤原一区田家屯	徒刑10年	现在齐市物资局离休

姓名	别名	性别	当时年龄	原籍	历任职务	被捕前抗日职务	政治面貌	被捕前住址	日伪审理结果	备注
翟凤		男	33	长春市	马车夫、农民四区游击连长	县委特务队长	党员	汤原四区凤阳屯	徒刑15年	
连云洲		男	33	河南武安县顺义庄	药材商人	矿山镇士兵工作员	党员	鹤岗故本街	徒刑6年	
关雅生	关根波宋凤	男	21	辽宁辽阳县东北低泥铺	教师、地工警察	莲江口士兵工作员	党员	汤原四区莲江口镇	徒刑10年	佳木斯市食品厂离休
于志新		男	32	辽宁铁岭蔡家堡子	农民、县委交通员	县委站交通员	党员	四区凤阳屯	审理中死亡	
何文海		男	30	依兰县一区东岗子	农民(1934年洼区县委书记)在大小洼丹阿木达杨树组织救国会	群众工作员	党员	汤原二区竹帘永泉村	徒刑10年	

姓名	别名	性别	当时年龄	原籍	历任职务	被捕前抗日职务	政治面貌	被捕前住址	日伪审理结果	备注
杨福亭	老平	男	45	辽阳孙家寨	农民、汤区救国分会长、区委宣传部长、区委书记	汤原汤区委书记	党员	汤原一区秦家屯（福隆屯）	徒刑13年	
张海臣	老侯老鲁张洪金	男	46	辽宁凌源县包尔登	农民、织布工人、甜水河子反日会交通员、交通部长、会长	汤区宣传部长	党员	桦川县四区火龙沟	徒刑12年	
叶紫臣		男	42	辽宁昌图县	缝纫工	汤原县注区永全村党小组长	党员	汤原二区竹帘镇	徒刑10年	
阎会福	王发王大	男	23	桦川县三区城子甲	农民、桦川一区救国会委员、汤原鹤区委宣传部长	汤原县鹤区委宣传部长	党员		徒刑15年	文革前在东宁县已故

姓名	别名	性别	当时年龄	原籍	历任职务	被捕前抗日职务	政治面貌	被捕前住址	日伪审理结果	备注
阎会发		男	26	桦川县三区城子甲	农民、救国会员、特委—汤原县委交通员、区委书记	汤原县格区委书记	党员		徒刑8年	
高俊峰		男	36	本溪县南桥头	农民、救国会长	汤原县龙区委组织部长	党员		徒刑12年	
刘忠信	扈裕国	男				汤原县莲江口特区交通员	群众	莲江口	释放	文革前后在太平川已故
赵振文	赵老七	男	42				群众	汤原二区洼丹岗	未判刑	以洼丹岗区办事处支处长嫌疑被捕

姓名	别名	性别	当时年龄	原籍	历任职务	被捕前抗日职务	政治面貌	被捕前住址	日伪审理结果	备注
祁振芳	祁木匠	男	54	吉林扶余县	木匠、伪村长(两面政权)龙区救国会长	汤原县龙区救国会长	群众		徒刑10年	
崔希成		男	54	辽宁本溪县石桥子	农民	汤原县龙区救国会宣传部长	群众	汤原四区西二保第一甲	徒刑8年	
赵国泰		男	39	辽宁海城李四房		汤原县龙区救国会交通部长	群众	汤原四区西二保第二甲	徒刑10年	
武葆亭		男	26	宾江县蒙盛沟		汤原县龙区救国会户籍部长	群众	汤原四区西二保第二甲	徒刑7年	

姓名	别名	性别	当时年龄	原籍	历任职务	被捕前抗日职务	政治面貌	被捕前住址	日伪审理结果	备注
贾维歧	张福连	男	26	辽宁义县	曾任格区青年抗日救国会长	汤原县格区青年部长	群众	汤原莲江口四合村	徒刑10年	
龚德山		男	28	辽宁省辽阳县	农民、救国会交通员游击连战士	地方游击连战士	群众	汤原四区莲江口镇	徒刑15年	
刘德仁		男	37	辽宁省辽阳	农民、汤区救国会交通员分长	汤原县鹤区抗日救国会分会长	群众	汤原一区田家屯	徒刑8年	
陈万林	陈二美	男	46	黑龙江宾县	农民	汤原县第四区抗日救国会长	群众	汤原三区柳家屯	徒刑10年	

姓名	别名	性别	当时年龄	原籍	历任职务	被捕前抗日职务	政治面貌	被捕前住址	日伪审理结果	备注
何项文	何友山、何六、老井	男	39	锦县第一区何家屯	农民、汤区救国会分会宣传部长、分会长	汤区救国会分会长	群众	汤原县第一区田家屯	徒刑8年	
韩廷堂	张国成	男	24	辽宁海城县秃子沟	汤原大来岗区第一救国会长、自卫队长	阿木达青年救国会长	群众	大来岗	徒刑7年	
龙春生		男	25	辽宁本溪	莲江口农民、六军四师四团战士、四合村救国会组织部长	四合村抗日救国会组织部长	群众	四合村	徒刑15年	
冯建福		男	36	辽中县	农民、六军战士、地方游击连战士	龙区游击连战士	群众	四合村	无期徒刑	

姓名	别名	性别	当时年龄	原籍	历任职务	被捕前抗日职务	政治面貌	被捕前住址	日伪审理结果	备注
蔡青和		男	65		农民		群众	汤原四区宝宝山	未判刑	县委交通员嫌疑被捕
田海山		男	38	宾县	四合屯抗日救国会交通员、抗日游击连对日作过战		群众		无期徒刑	
尚明山		男	48	安东县龙台村		汤原四合村第一甲救国会长	群众	汤原县四合村一甲	徒刑7年	
杨青		男	45	辽中县	肃反队、救国会长	汤原四合村九甲救国会长	群众		死刑	

姓名	别名	性别	当时年龄	原籍	历任职务	被捕前抗日职务	政治面貌	被捕前住址	日伪审理结果	备注
许少录		男	20	西丰县城		四合屯九甲救国会交通员	群众		徒刑20年	文革前后在绥化车站工人已故
白福才		男	36	延寿县夹信子	伪自卫团员、抗日山林队、裕德救国会长	裕德村救国会长	群众	汤原县第四区裕德村九甲	徒刑12年	
王海臣	大烟王	男	33	吉林怀德县公主岭	太平川抗日救国会长、永祥屯救国会长		群众	汤原县四区莲江口镇	徒刑12年	
赵君		男	33	吉林磐石县葫芦市	汤原二区竹帘镇、永泉村种地	汤原县永泉村救国会户籍部长	群众	汤原竹帘乡永泉村	徒刑7年	

姓名	别名	性别	当时年龄	原籍	历任职务	被捕前抗日职务	政治面貌	被捕前住址	日伪审理结果	备注
李友		男	36				群众	汤原第四区四合村	未判刑	四合救国会长嫌疑
信宝银		男	28				群众	汤原四合村一甲	未判刑	四合救国会户籍部长嫌疑
杨成明		男	44		汤原县四区一甲农民		群众		4月14日释放	四合救国会交通部长嫌疑
武金凤		女	31				群众		释放	四合救国会妇女部长嫌疑

姓名	别名	性别	当时年龄	原籍	历任职务	被捕前抗日职务	政治面貌	被捕前住址	日伪审理结果	备注
王殿双		男	30				群众	汤原四区赵家窝棚五甲	未判刑	救国会长嫌疑
田凤山		男	49				群众	四区赵家窝棚五甲	未判刑	救国会长嫌疑
刘景山		男	45		农民		群众	汤原五区鹤立赵家窝棚	4 月11日释放	救国会侦察部长嫌疑
张仲阳		男	65		农民		群众	汤原县五区鹤立赵家窝棚	4 月12日释放	救国会长嫌疑

姓名	别名	性别	当时年龄	原籍	历任职务	被捕前抗日职务	政治面貌	被捕前住址	日伪审理结果	备注
王祥		男	25		农民		群众	汤原县五区鹤立赵家窝棚	未判刑	救国会交通部长嫌疑
温良荣		男	42		农民		群众	汤原县五区鹤立赵家窝棚	4月11日释放	鹤区救国会交通站嫌疑
赵喜麟		男	39		农民		群众	汤原县一区于家油坊	4月11日释放	汤原太平川救国会员嫌疑
李凤林		男	62		农民		群众	汤原县一区田家屯	4月11日释放	太平川救国会员嫌疑

姓名	别名	性别	当时年龄	原籍	历任职务	被捕前抗日职务	政治面貌	被捕前住址	日伪审理结果	备注
文昌贵		男	41		农民		群众	汤原县一区黄有屯	4月11日释放	太平川救国会员嫌疑
倪全男		男	57		农民		群众	汤原一区田家屯	4月11日释放	县委交通员嫌疑
时作洲		男	24		农民		群众	汤原一区福隆屯	4月11日释放	福隆救国会员嫌疑
邱景林		男	31		农民		群众	依兰三区宏克利	未判刑	汤原县洼区抗日青年队嫌疑
滕汉书		男	36		商人		群众	汤原县六区苏乐镇	未判刑	苏乐镇救国会长嫌疑

姓名	别名	性别	当时年龄	原籍	历任职务	被捕前抗日职务	政治面貌	被捕前住址	日伪审理结果	备注
李凤山		男	24		农民		群众	汤原县四区刘家窝棚	未判刑	格区四合村救国会员嫌疑
范景阳		男	25		农民		群众	汤原县四区刘家窝棚	未判刑	格区四合村救国会员嫌疑
李祥		男	28		农民		群众	汤原县四区刘家窝棚	未判刑	格区四区救国会员嫌疑
姜有		男	20		农民		群众	汤原县四区刘家窝棚	未判刑	格区四合村救国会员嫌疑

姓名	别名	性别	当时年龄	原籍	历任职务	被捕前抗日职务	政治面貌	被捕前住址	日伪审理结果	备注
刘钧		男	28		农民		群众	汤原县四区四合屯	未判刑	格区四合村救国会员嫌疑
杨秀峰		男	24				群众	汤原县一区田家屯	4月11日释放	汤区太平川救国会长嫌疑
初成祥		男	27	辽宁本溪县	农民、汤原游击连战士同日军作战四次		群众	汤原县四区四合屯九甲	无期徒刑	
赵福生	徐德福	男	27	辽宁本溪县	农民、游击连战士同日军作战四次		群众	汤原县四区四合屯九甲	徒刑20年	

姓名	别名	性别	当时年龄	原籍	历任职务	被捕前抗日职务	政治面貌	被捕前住址	日伪审理结果	备注
车仁路		男	42	双城县五金屯	农民、汤原地方游击队长		群众	汤原县四区莲江口镇	无期徒刑	
殷玉田		男	40	济南市	工人、给日本人福井当工头组织反日红枪会法师大队长		群众	鹤岗西一面街	徒刑5年	
葛全恒	葛子久	男	40	呼兰	东北军骑兵、鹤岗矿山矿警队长	鹤岗矿警队副队长	群众	鹤岗	徒刑10年	
李子良		男	26	汤原县太平川	太平川交通员、支书、区委书记	六军二师五团二连指导员	党员	桦川县四区永安保姜永权甲二排	徒刑13年	

姓名	别名	性别	当时年龄	原籍	历任职务	被捕前抗日职务	政治面貌	被捕前住址	日伪审理结果	备注
李桂兰	李凤兰	女	25	辽宁海城县	太平川反日会长、依兰利区委妇女部长	六军被服厂	党员		徒刑10年	
邢恩		男	26			汤原警察队警士	群众		死刑	新津日报新闻1939年6月26日第二版
王顺		男	24		农民		群众	汤原一区予家油房	4月11日释放	太平川救国会员嫌疑
陈广发		男	61		农民			鹤立镇	未判刑	鹤立五保救国会交通部长嫌疑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汤原县政协文史办供稿）

“三·一五”大逮捕惨案佳木斯侧记

袁　丁整理

一、乌云压城

1938年3月的佳木斯，显得肮脏而又阴沉。大街小巷都有荷枪实弹的宪警往来巡逻，衣着奇特的特务到处乱窜，各城门都增添了哨兵，对出入城的人进行严厉盘查和搜索。还没等太阳落山，商店就关上棚板，连衣不遮体的乞丐也匆忙躲了起来。入夜除了不时响起几下枪声、摩托车的轰叫声、日本洋马铁蹄踏在冻地上的得得声，则是一片死寂，全市人民提心吊胆，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城。饱经忧患的市民，从这种如临大敌的阵势中又一次看出：日本侵略者又要行凶！

事情果然如此！

1938年3月3日的清晨，佳木斯日本宪兵队本部正在召开一次罪恶会议。这个魔窟，座落在佳木斯南岗大街北段路西，在一围红砖墙里有一幢二层小楼。宪兵队本部中佐队长儿岛正范正在二楼他的会议室里听取佳木斯日本宪兵队所属各分队长、分遣队长的汇报。

应召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佳木斯日本宪兵分队长松田大尉；佳木斯宪兵分队鹤立镇宪兵分遣队长铃木准尉；勃利宪兵分队长稻见少尉；富锦宪兵分队长毛利大尉；汤原宪兵分队长藤原广之进中尉；藤原宪兵分队依兰分遣队队长斋藤准尉等人。这群宪兵头头们，此刻正在研究如何在3月15日对我中共地下党

员“一齐逮捕”的行动方案。藤原广之进首先接触到中共地下党活动线索，又是他以汤原宪兵分队长兼汤原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调动军警宪特对我地下组织进行大规模的侦察活动。在今天，这些线索已集中在儿岛中佐的案头，下一步就是如何把行动方案付诸实施了。

小城内警备森严，为的是防备我方人员暴动或外逃。

二、组织应变

到1937年，中共佳木斯地下党组织已经发展到60余名党员，原来由中共河北省委通过特派员李向之领导的中共西门外党小组，发展成为中共佳木斯市委，此时受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下江特委领导。市委下设组织、宣传、妇女、士兵各部，并有6个支部。市委书记为董海云（即董仙桥）。主要党员有张耕野、金淑英、张宗兰、李恩举、董海山、陈芳钧、白长岭、郑志民（冷云）、李淑云、李树昌、姜士元等。市委机关设在佳木斯西门外董仙桥家。

1938年入春以来，佳木斯市的局势显得特别紧张。

汤原县日本宪兵分队，在接受由仓石联队转来的被俘人员之后，又于1937年11月诱捕了中共汤原县委书记高雨春以外2人；在依兰、富锦等县又相继发生逮捕我地下工作人员的事件。中共下江特委又指出：缩小目标，停止活动，转移隐蔽，避免损失。种种迹象表明：侵略者正在霍霍磨刀。针对上述情况，市委做了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首先派出张耕野去抗联部队联系，以便在危急时刻把党员转移到部队；其次进行转移疏散，缩小目标，张宗兰、金淑英等潜出城去投亲奔友；再次销毁文件，不给敌人以任何把柄，以保护党组织的安全，同时对所有党员进行时局教育，指出危险情况，要求要有应付不测的思想

准备。但敌人究竟掌握哪些情况？当时还没有摸到底数，因此也有某种程度的麻痹轻敌思想存在。

三、敌人动手

李恩举当时是中共敖其支部的书记，掩护职业是敖其小学校长。敖其村当时是红白接触地带——敖其以西，如东西火龙沟、大来岗、宏克力等地是“抗联”六军、三军所属部队经常出没的地方，其中有几个警察分驻所是内红外白，群众基础也好；敖其以东直到佳木斯城已被敌伪势力所控制。为了加强地下党同“抗联”的联系，便于及时为部队输送物资和人员，于1936年秋，市委决定把负责市委组织的李恩举调到敖其，担任中共敖其支部书记。

1938年3月12日，李恩举给六军某部送去油印机一台及蜡纸等印刷用品，然后准备回城向市委汇报工作。他到三合屯自己家时已经天黑。半夜里一阵猛烈粗暴的敲门声，把李恩举全家惊醒，人们还没来得及穿上衣服，破旧的板门已被踹碎，一群暴徒破门而入。为首的是两名日本宪兵，后边跟着几个警察和几个便衣。先给李恩举戴上手铐，然后便翻箱倒柜、挖炕拆墙进行搜查。他们一无所获，临行拿去一些书籍，把李恩举带走。

1938年3月13日凌晨，李恩举的儿子来到董仙桥家中，向董报告了李恩举被捕经过。

董仙桥立即令其兄董海山（董仙桥的哥哥，中共党员，内红外白的百家长），利用其西门外百家长的合法身份，到西门警察派出所摸底。西门警察派出所的警察声称：不知此事。

董仙桥一方面到市内马车公会会长李继先家中暂避；一方面通过一名朝鲜族女学生程淑云的公公去找佳木斯日本宪兵队

本部的郑翻译。打听李恩举的下落及被捕的原因。回答的结果是：佳木斯日本宪兵队未捕此人。董仙桥为了了解敌人的动向，组织党员应付险恶局面，在李继先家住到3月14日。晚间李继先回来向他介绍了近两天敌人活动的种种迹象。宪兵、警察、特务到处都是；很多"要视察人"的家都有专人驻守；昨晚（指13日）开始在桦中捕人。

为了不连累他人，14日夜董仙桥从李继先家中走出，来到伪《三江日报》社的李社长的家，李告诉董现在情况十分危急，因此，董仙桥又到马车公会的办公地点，当晚将要鸡叫的时候，他又从这里走出，准备投奔抗联。当他在大昌当胡同从北向南走到路口时，在暗处闪出几个人拦住他的去路。在这几个人中有一名日本宪兵、一名日籍警察，还有桦中日籍体育教员白泽、桦川县公署视学官日本人中谷。白泽、中谷二人早就认识董仙桥，在这里"相遇"双方都没什么好说的了。日本宪兵给董仙桥戴上手铐，然后把董仙桥带到桦川县教育局。这时正是1938年3月15日的拂晓。

当日上午董仙桥又被送到佳木斯日本宪兵队本部。

审讯董仙桥的是日本宪兵高桥，由朝鲜人洪翻译担任翻译，因为他们知道董仙桥是中学教师，在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所以审讯形式首先是"怀柔"、"奉承和软化"。但当他们经过几个照面之后，发现董仙桥矢口不谈中共地下党活动情况，就凶相毕露。高桥用柔道摔打董仙桥，然后又用练劈刺的竹剑打头，最后把董仙桥绑上"老虎凳"，直打得董仙桥遍体鳞伤，两腿僵直不能行动；敌人运用"疲倦轰炸"的方法，不给水喝，不让睡眠，不分昼夜连续审讯3天，使董仙桥几次昏厥，又用冷水喷面使其复苏，然后又连续审讯，这样一次审讯下来，董仙桥的嘴唇迸裂，鲜血顺口流出，染透衣服，惨状令人不忍目睹。

在佳木斯3月15日同一天被捕进日本宪兵队的有桦中学生李树昌、桦中教员王维度（以上2人是中共党员）、牙科医生韩松岩和他的儿子韩文光。以后又陆续送来郑师谷、马长寿、刘文汉、刘玉文；此外还有直接受国际情报局领导的刘宏猷。在其他关押地点也关押着一批人。

来到这里的人除了个别之外，都有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因此尽管敌人软硬兼施折腾了几天仍然毫无结果。敌人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想找一个软骨头或者易受骗的人打开缺口。最后他们选中了年仅18岁的桦中学生李树昌。他貌似孩子、满脸稚气，身体又很文弱。日本宪兵用了几个钟头向李树昌宣传“日满一德一心”，希望他“改邪归正”。李树昌则质问敌人：“我好好念书，你们为什么抓我到这儿来？”他只字不谈党的机密。“软”的不灵，硬的就来了。他们妄图用血和火敲开李树昌的嘴。灌辣椒水、上大挂、坐电椅……然而他们失败了，最后敌人用烧红的烙铁烫李树昌的脊背，一股股焦臭气味从刑讯室溧出，充斥着整个阴冷的地下室，在押人员无不为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威武不屈的坚贞气节所感动。敌人万没料到，他们丧失人性的暴行，从另一方面激励抗日爱国志士更加坚定。在佳木斯共捕37人，但直到1938年11月，周围几个县份的被捕人员均已结案判刑，而佳木斯的“案犯”仍未“招供”，尚在“审理”中。敌人在无计可施的窘境下，最后只得稀里糊涂以“宣传抗日，北兴会秘书”① 罪名判处董仙桥有期徒刑20年。

---

① “北兴会”是由当时的伪桦川县副县长兼桦川县中学校长滨尾卓次（日本人）发起，并以他本人为头目的民间组织，意在通过这个组织联络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为他们推行怀柔政策、宣传“日满一德一心”服务，因“三·一五”事件暴露出，这个组织中一些中国人成员借该组织讲坛宣传抗日，于是滨尾不承认自己是发起人，也不承认是该组织的头目。

在敌人发动的“三·一五”大逮捕中，在佳木斯地方共逮捕37人，6名立案送伪哈尔滨高等检查厅起诉。李恩举在狱中被折磨致死。

“三·一五”事件佳木斯被捕人员名单

姓　名	别　名	当时职业	现在何处
马长寿	马希尧	伪市公署股长	
刘钟秀		伪桦川县行政科科员	
郑师谷	郑仰山	桦中校长	
董海云	董仙桥	桦中教员	吉林省政协
刘文翰	刘哲夫	桦中教员	
王维度	王式民	桦中教员	
陈兴周	陈寓文	桦中教员	
孟昭国		伪桦川县总务科长	
刚仁治		桦中学生	佳市民革
金宗威		伪官吏	
孟昭国		伪官吏	
王世俊		伪官吏	
王殿轲		第一小学校长	
刘继堂		伪官吏	
王德良		伪官吏	
陈显忱		教员	
刘绪宗		小学校长	
秦凤岐		教员	
张今拭		教员	
韩同起		师范学生	
张铁骑		师范学生	

李文辉		桦中学生	
安东山	安秉山	桦中学生	
张明杰		桦中学生	
洪殿胜		桦中学生	
刚义治		桦中学生	哈尔滨制药五分厂
杨在春		桦中学生	友谊农场十一分场
胡兴海		桦中学生	
李树昌		桦中学生	
陈永安		桦中学生	
孟庆华		桦中学生	
冬景升		桦中学生	
马 焕		师范学生	佳市文物站
李恩举	李晋三	敖其小学校长。	

根据中央档案馆照片总号10009记载：在这个事件中在佳木斯逮捕37人，被判刑6人。从我们现有的资料中只查到上述34人。被判徒刑的6人是：董仙桥20年，李恩举15年（死于狱中），王殿轲不详，马长寿不详，王维度不详，郑师谷不详。除董仙桥、李恩举外，其余4人的去向，结果均不详。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佳木斯市政协文史办供稿）

“三·一五”惨案在依兰①

孙继武

一、“三·一五”惨案经过

1937年末，依兰宪兵分遣队掌握了属于吉东省委的依兰城县委及所属的二道河子，刁翎区委组织和一部分外围组织与抗联第二路军的部分关系人，并掌握了北满临时省委领导下的依兰农村县委及所属各区组织及关系人，一共165人。

依兰三区太平镇守备队特务刘德和金大巴掌是西湖景山区的人。刘德的表兄田凤阁住在农村县委和西湖景区委活动的中心屯下甸子。小特务田凤阁把他所知道的地下党和群众的抗日活动情况都告诉了刘德。1937年11月12日，刘德、金大巴掌和密探长杜宝昌等带领太平镇守备队300多人，来到西湖景山区进行搜查，从南起松木河沿北至刘家屯，约有十五六里长和东西有8里的地区“拉上大网”，把所有的男人约有200多人都圈到下甸子孙俊家的院子里。由刘德和金大巴掌逐个辨认，他俩说是“良民”的站在一边，他俩不认识或不说是“良民”的，就用铁丝把双手拧上，站到另一边。这样，混在群众中的地下县委组织部长赵玉洲和他的叔父、弟弟，县委青年书记李奎兴（小陈）、交通部长邵国栋（小苏）、保管宫云廷，力区书记王志（小项），金区书记王发（小白），景区第二支部书记孙贵、秘书

① 依兰县今属黑龙江省。

梁宏志、交通站站长吕连贵，还有抗联战士、地下工作人员、群众中的抗日积极分子整整20人遭到逮捕，被押送到依兰。

县委书记刘洪泰闻讯后，通过各种关系营救被捕的人员。终于由地下县委和被捕者家属共同凑上3 500元钱，经陈家烧锅掌柜的陈振铎出头，通过依兰城双合成大车店经理乔级三，通融了宪兵队的宋翻译，结果除抗联战士阎小子被折磨死在狱里外，其余被捕的人都被放了出来。但是县委青年书记李奎兴，在这次被捕刑讯时，向敌人投降，泄露了组织秘密，农村地下党组织更加暴露了。

1938年2月，日本侵略军对依兰境内二区山嘴子、阿木达及五区兴隆镇进行“讨伐”，搜缴到一些抗日联军与地下党的宣传品、文件、信件。敌人利用从信件中发现的线索，逮捕了依兰城市县委个别成员。被捕者由依兰宪兵分遣队久富曹长直接审讯，通过威逼利诱，从中获取了依兰城市县委组织系统的一些具体情况。

驻佳木斯的日本关东军汤原宪兵分队长藤原广之进，对这次事件非常重视，亲自来依兰坐阵，并调来宪兵大久保田、佐佐木曹长、宪补郑基隆（武下）、一等宪兵李毅。

这次大逮捕，由依兰宪兵分遣队长斋藤统一指挥，以依兰宪兵分遣队为主力，依兰警务科、警察署配合行动。

3月15日凌晨，依兰的宪兵、警察、自卫团、大小特务爪牙倾巢出动，四处捕人，制造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惨案。

当天，依兰城里的郎德颐、杨继茂、陈策、李延等二十几人被捕，土龙山、双河、刁翎、道台桥等地郭庆江、张炳震、姜振声等24人被捕，东部山区有一百六七十人被捕。

现从敌伪档案中查到，在这次大逮捕中，有85名中共地下党员被捕，他们中有中共地下党县委书记、县委委员、区委书

记、区委委员等党的重要干部，还有在依兰做地下工作的北满临时省委特派员和北满临时省委下江特委交通员2人。被捕的地下党员中23人被送哈尔滨高级检察厅、哈尔滨高等法院判处徒刑，其中1人判死刑，4人惨死在狱中。这次大逮捕，还有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救国会和反日会的会长、交通部长、肃反部长和救国会员224人被捕。其中被捕当时即遭杀害的和被刑讯惨死在狱中的就有几十人，被送哈尔滨高等检察厅、高等法院判处徒刑者17人，判死刑者2人。在这次事件中，属于北满临时省委领导的农村县委及其领导的7个区委所属的地下党组织和依兰城市县委、依兰街特别支部与其领导的支部、党小组都被破坏。属于吉东省委领导的依兰城市县委，及它所领导的区委、支部、小组等地下党组织也均遭破坏。两个县委领导下的救国分会、救国会组织也全部遭到破坏。

这次大逮捕事件，从1938年3月15日开始，延续到这年秋天，直到1941年余波未息。

血腥的“三·一五”事件，不仅许多地下党员、救国会员、抗联战士被捕入狱，也使无数普通群众遇难。

据伪依兰警察署×署长供认，在“三·一五”事件中，依兰仅在兴隆镇、宏克利、太平镇、双河镇就有王祥、李振犁等256人被捕。宪兵队和“搜查班”在西湖景、山嘴子、湖南营、杏树、大八浪、小八浪、头道河子、黑背、三道岗等地共逮捕500余人。太平镇×成兴经理栾喜纯回忆说：“太平镇救国会长马景全叛变，很多人被捕，成汽车往依兰送‘犯人’。”日伪当局从四乡抓的人送到城里，有的押在宪兵队和警察署，多数押在依兰监狱。依兰监狱每个监号（牢房）定员押8个人，可是“三·一五”事件时每间牢房押16人。后来依兰监狱实在无法收容，就送往牡丹江。依兰监狱设备不好，又冷又脏，一次流行

传染病，就死了几十个在押人。

3 月中旬，后寡拉守备队和暖泉子守备队一同去大砬子屯搜查。这伙敌人到屯子后，就把张君的大哥张老大绑上了。张老大是救国会的交通员。又把一个叫王老九、一个外号叫一马黑的给绑上，就地枪杀，陈尸在村头上。只把张老大押走。

也是这一年3 月15 日前后，特务陆大爪子领着暖泉子守备队来搜查。逮捕了西湖景区第一支部书记张金等7 人，其中有救国会的交通员、青年救国会长和普通群众。被捕的人在暖泉子守备队关几天以后，除了张金，其余6 个人与同牢的难友共13人用汽车拉着上了去太平镇的路。当汽车走到顾家岗子时，遇见了一个给跳大神送鼓的人在路上走。疯狂的敌人，把这个送鼓的人也扔上汽车。汽车没有到太平镇，14 人都被杀害在半路上。小小的西湖景山区，在“三·一五”事件中就有181 人被捕，其中50 余人被杀害。暖泉子屯一次被杀害了8 名青年，这个小屯家家有被抓、被杀的。当地的老年人声泪俱下地说：“他们把青年人给杀净了。”

二、残酷刑讯

日伪统治者在“三·一五”事件中，对手无寸铁的被捕者使用了空前残酷的刑法，进行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摧残。有关这个事件被逮捕的人，在依兰期间，由依兰宪兵分遣队长斋藤、警务科长中野、宪兵汤浅、李毅进行审讯，还有崔翻译、金翻译和汉奸郑培麟等人帮凶。他们对被捕的人威逼利诱、严刑逼供。审讯中，残暴的敌人使用的刑法五花八门，用木棒打、皮鞭抽、上大挂、坐老虎凳。用粗木棒或铁棍拧被捕人的脚镣，直到把人的脚脖“筋”拧断为止。把被捕人的手用粗锥子扎上，用力往桌子上按，或者用钢笔等东西把被害人的手指夹上用力揉

搓。他们给人灌凉水、灌辣椒水、灌混合煤油的水，把被害人的肚子灌大，再用脚把水踩出来，弄得被害者从鼻子、嘴往外冒血水。把人折磨到昏死过去后，放在一边，往头上泼凉水，等人苏醒后再继续折磨。更厉害的是把烙铁烧红，在前胸、后背烙。甚至把女人的裤子扒下来，用烙铁烙阴毛，往阴户里倒煤油。地下党员、抗日群众被捕后，很多人牺牲在敌人的酷刑之下。依兰街里的地下党员刘振中，去双河区工作时，被捕送到依兰监狱。因为他是依兰地下党城市县委的组织部长，敌人想从他身上得到重要线索，对其反复审讯、严刑拷打。刘振中坚贞不屈，被打得遍体鳞伤。刘振中因受刑过重，终于死在狱中。

1938年3月，西湖景区松木河沿的农民张万昌，因为是农村县委书记丁世贤的堡垒户，被太平镇的特务工作部逮捕。敌人说他窝藏了丁世贤，严刑逼他交出丁世贤。并且把和张万昌一起因避难搬到土龙山住的亲家吴魁生也抓去一起审讯。因为丁世贤1937年就调到北满临时省委下江特委去工作，张万昌和吴魁生也真不知道丁世贤的下落。张万昌和吴魁生二人说“不知道丁世贤在哪里”，敌人就轮番毒打，用成扎的香火烧烤他俩人的小腹，终于把他俩人的小腹拷“崩”，而惨死在刑讯室中。

三、所谓的“要事视察人”

给农村县委当保管和跑外交的孙俊，是西湖景区下甸子屯的农民。他哥八个都为抗日做过工作。弟弟孙贵是景区第二支部书记。“三·一五”事件发生后，孙家除留下老二孙禄夫妇看家外，其余哥几个都带着妻子、儿女出外隐避。直到1939年，哥几个以为没事了，就陆续地搬回西湖景刘家屯。但是，当日本侵略者在西湖景山区，为了推行“治安肃正”，给新归并到部落的农民发放户口时，发现孙家因为是“三·一五”事件中已经

查出的跟地下党有联系、给抗日联军办过事的人家，在新发的户口簿上用红笔注上“要事视察人”的字样。这样，孙俊兄弟就被敌伪严密的控制起来。1941年2月，孙俊被桦川县警务科的特务逮捕。罪名是“窝藏过地下党县委组织负责人”。过堂时严刑拷打逼供，孙俊只承认自己的公开身份是“杨树林子甲长”。他在桦川县警务科被刑讯一个多月，最后被打昏，敌人以为已被打死，就把他扔到荒郊野外，孙俊苏醒后，爬到亲属刘殿吉家，人已经不行了，头上、身上的烫伤已经化脓，右侧肋骨折断，不能吃饭，不能说话，躺不住、坐不住，整天双手扶炕沿站着呻吟。弟弟和儿子把他接回家中，不到4天就死了。

“三·一五”事件中，敌人以各种借口捕人，对被捕的人，通过“过明炉”（因某种嫌疑被捕，宪兵队注册后释放）、交“保证书”、户口上注“要事视察人”等名堂实行控制。属于“要事视察”的人，整日提心吊胆，受尽了日本人及其爪牙的气。“要事视察”的人，没有“良民证”，不能自由行动。地下党城市县委宣传委员郎德颐刑满释放后，户口注明“要事视察”。因没有“良民证”，不能在城里居住，只得全家都搬到了乡下。

“三·一五”惨案中被判刑人员名单

黄跃臣（黄吟秋）	北满临时省委巡视员	判死刑
刘庆福	北满临时省委下江特委交通员	判7年
刘洪泰（姜魁武）	县委书记	判15年
林景昌	景区书记	判15年
张　福	景区书记	判10年
王文秀（老　马）	景区第一支部宣传委员	判12年
王　发（小　白）	金区青年部长	判8年
王景全（王金山）	金区宣传委员	判10年

唐凤云（小　蔡）	力区宣传委员	判8年
陈　策	地下党员	判5年
李　延	地下党员	判6年
葛志祥	悬公救国会	判10年
仲连山	西湖景救国会长	判10年
郑长秀	西湖景救国会交通部长	判10年
鲁喜荣	兴巨号救国会交通员	判6年
张国山	悬公救国会交通部长	判7年
陆　平	榆木桥子救国会副会长	判7年
王景祥	四合屯救国会长	判7年
孙　财	四合屯救国会交通部长	判6年
马福超	四合屯救国会副会长	判10年
田风山	三区太平屯交通负责人	判6年
张汉臣	聚宝屯救国会副会长	判7年
邸凤舞	长青屯救国会会长	判10年
卢尚云	阿木达救国会长	判10年
于　昌	杨树林救国会长	判7年
孟宪金	小砬子救国会肃反队长	判死刑
张宝玉	奎子里反日会员	判死刑
韩延堂	阿木达青年救国会长	判7年
何文海	小洼丹救国会长	判10年
郎德颐	依兰城市县委宣传委员	判7年
杨继茂	依兰城市县委反日青年小组长	判10年
郭庆江	兴隆镇宣传委员	判7年
姜振声	兴隆小组书记	判11年
王　庆（王兆民）	兴隆镇小组宣传委员	判13年
回景财	兴隆镇小组组织委员	判10年

张秉震（张达烈）	城市县委反日青年小组组织委员	判15年
何庆财	二道河子区委书记	判6年
崔永发	二道河子支部书记	判6年
姜明烈	二道河子交通站负责人	判8年
曹进智	二道河子交通员	判5年
傅学纯	湖南营区委书记	判10年
张俊有	水曲柳沟青年救国会长	判5年
刘振中	城市县委组织委员	判12年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依兰县政协文史办供稿）

西北沟“火烧围子”

栾海林整理

汤原县正阳乡南向阳村西四里处一片荒草甸子，当中有一座长520米，宽340米的村落遗址，至今依稀可辨。这就是46年前的刘长永屯，又称西向阳屯，后称“火烧围子”的旧址。

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围剿我抗日联军，切断抗联和地方人民群众的联系，在西北沟一带进行“清乡”、“归屯并户”，把附近各户都并到刘长永那里，成为一个有60多户的屯子，迫使老百姓在屯四周修建了高8尺、宽3尺的围墙，设有东西大门，派老百姓轮流把守。

这年深秋，寒气袭人，战斗在北山里的抗联六军留守团战士还穿着单薄的衣服，西北沟地下党组织决定发动群众给抗联战士做60套棉衣。为了确保战士在入冬前穿上锦衣，南靠山屯分配做40套，西向阳屯分配做20套。做棉衣的钱和棉花、布匹

都是群众秘密凑集的。

正当设法向西山里输送棉衣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警察派出所任警尉带着几个警察要老百姓净身出户，撵出屯外，然后挨家挨户翻箱倒柜，最后把20套棉衣都翻了出来。任警尉当时向县城的日本守备队报告了。日本守备队迅速派遣几名日本兵乘坐一辆汽车赶来包围了这个屯子。屯前路口架上了机枪，封锁了所有要道，然后放火烧屯子。顿时，浓烟四起，火光冲天，鸡鸣犬吠，老百姓哭喊连天，好端端的一座村变成了一片火海；两个小时的时间，西向阳屯变成了废墟。老百姓流离失所。

日军把屯子烧了并没死心，当天抓走了赵缝纫匠，因他给抗联做了15套棉衣。敌人把他带到南岗沟子用刺刀扎死了；又把经常与抗联有联系的抗日救国会会员高福全、綦××、刘××绑上用汽车拉到竹帘前的松花江上活活地给塞进了冰窟窿。后来日本侵略军怕在屯子围墙下隐藏抗日联军，他们就抓劳工扒大墙。由于土墙倒塌把屯民大黑李和王××砸死在墙下。崔老干、吕振财腿砸断了，至于砸伤的就更多了。

西向阳屯子被毁灭了，后来人们就把这一旧址称为“火烧围子”。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

日军对肇源人民的屠杀

初本德整理

1932年日本军政爪牙进入肇源后，实行的法西斯专政，其手段之毒辣，令人发指；所施之暴虐，罄竹难书。

挖活人心配药

1938年2月，由奉天（沈阳）来肇源县一名自称“千叶医学博士”的日本人山田立本，他将抓捕的11名无辜百姓绑到西门外，活剜人心后，置于水桶放在旗公署院内（当时叫郭尔罗斯后旗），看护人一时不慎，竟被日本人自己养的狼狗吃掉了一颗。为此，山田立本大发雷霆。次日，旗参事官林田数马乘汽车从二站回来，路经东门外时，见一老太太犯有精神病，儿子在看护，林田数马见景生情，歹心生起，假作慈悲，车子忽然停下，要老太太上车送往旗立医院医治，思想单纯的儿子感激万分。不料几天之后，其母以自死之名，实为挖心凑数了。

同年，警务科日本人佐藤老婆患病，从哈尔滨请来一个日本名医。诊断后，方子上写了“需三颗活人心”。佐藤便向司法股长要了3名在押的中国人，用汽车送到肇源码头，再用汽船载运到松花江南岸的柳林丛中，由警务科的大日方、吉野，哈尔滨来的日本医生山田立本及旗立病院的日本大夫，将这3名只因割马尾巴抓起来的中国人剜了心，送与佐藤老婆配药治病。这3人被挖心后，把尸体抛入江中。

活人塞入冰窟窿中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决定设立“治安工作指挥部”，将肇源、肇州、肇东划为“匪区”。伪滨江省警察厅派出“三班特务”，由特务警佐叶永年带队到肇源进行大搜捕。旗公署也由警察特务和伪职人员组成“特搜班”，在叶永年统一指挥下，穿上便衣到全县各地进行秘密侦探活动，仅一个多月时间，抓进监狱100多人。

经过一段时间搜捕和审讯之后，日本人采取不同方法进行

杀害。1941年1月9日下午6点多钟，他们密将王化青等19名所谓“顽固者”，用铁丝从左胳膊绕绑一圈，然后从脖子上缠一圈，再从右胳膊绕绑一圈，再接下一个人，采用连环套的办法一串三五人，一个人动其他人都得动，越动越紧，动大了脖子缠的铁丝就紧，喘气都很困难。这19个人分别押上两辆汽车，运往三站江边。车到三站李家围子南面江沿，已是夜晚10点多钟了。这里江边有一个日本人办的“日清粮栈”，秋天从这里装船往哈尔滨运出荷粮，到了冬天房子就空着了。李家围子屯陈显、杨聋子夫妇因为没房住，就搬到这里来过冬。每天晚上，本屯的王喜业常来这里闲唠嗑，一般九十点钟后才回家睡觉。为什么他经常来这里呢？因为王喜业当过兵，开小差拐了一棵枪回来的，怕晚上来抓他，所以他经常到江边躲一躲，等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回屯子。那天晚上又来到了江边，刚进屋没说几句话，就隐隐约约听到汽车声，他赶紧跑了出去，往北一看两个灯柱通亮，直奔江边来了，于是他急忙跑到几十米远的柳条通里隐藏起来听动静。不一会儿这辆大卡车开到“日清粮栈”门口停住了，几个日本兵跳下车把屋里的人叫出来了，一起来到江上，一看只有直径一尺多长的吃水冰眼。几个日本鬼子交头接耳一会儿，命令陈显、杨聋子夫妇找来冰镩凿大冰眼，十几分钟后日本人看冰眼够大了，又互相咬咬耳朵，然后一齐动手把3位凿冰眼的无辜百姓先塞进冰窟窿里，接着把押送的19个中国人也相继塞进去了。据王喜业事后讲，他听到车上的人破口大骂，有的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你们兔子尾巴长不了！”“血债要用血来还！”第二天有人到江边，看到冰窟窿四周变成一片血色，用刺刀、冰镩扎破的棉衣服套子和血一起冻在江面上，十几只破棉鞋散落在冰眼四周。开江后，在下游不远处，曾有尸体浮上来，但家属和亲友谁也不敢认尸捞尸，以免

大祸临头。

枪杀四十二名无辜百姓

抗日联军夜袭肇源城胜利之后，弄得日本人惊恐万状，立即派三班特务来肇源，他们还觉得力量不够，又派了伪滨江省警察厅警务科长山崎（日本人）亲自上阵督战。他听说抗日联军攻进肇源城后，打开三泰粮栈救济饥民，并了解到一部分人高兴地当场把放粮证烧了。对此，山崎想出一个主意，也放粮，而且必须家家都得拿粮证去领，谁没粮证谁“通匪”，谁不去领粮谁“通匪”，统统抓进监狱。

山崎还了解到，在抗日联军打进肇源城后，一些老百姓到日本人住的宿舍拿东西，于是派便衣特务到处搜查，有的搜出一件衣服，有的搜出一双皮鞋，也视为“通匪”坐牢房。强逼着他们承认“通匪”，不承认就施用酷刑，灌凉水、辣椒水、煤油，压杠子、剥肋骨、上电刑等，招数之多，难以累计。使他们不得不招供，之后，于1941年旧历三月二十四日，把其中的42名所谓“通匪”的居民，先后两批押往县城西门外大坑内，往身上倒完汽油焚烧而死。有一人负伤没死，晕头转向地跑出坑，被他们开枪打死之后拖入坑内。遇害者不许家属收殓，附近的家狗争尸体红了眼，有阵子见了活人也猛扑狠咬，半年多无人敢于接近。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肇源县政协文史办供稿）

东北抗联夜袭肇源城前后
——回忆我在1940年的经历与见闻

赵 衷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1940年我是肇源城西门外农民训练所的学生。8月末的一天，日本教师永石康夫把一、二年级学生都召集到一个教室里，每人发给两张油印八开纸的"各种农作物产量调查表"，然后严肃地对我们说："旗公署要大家下乡去调查，这两张表是作样子的，主要是了解'胡子'在什么地方，得到信马上回来报告。"讲后便分工，两人一伙，指定到县城周围30里地以内的各屯去；我与赵成玉同学去张珍屯。

两三天以后，下乡的同学陆续回校，"表"填得很认真，谁也没调查出"胡子"在什么地方。可是没过几天，又在我们同学中选一些年岁较大的到旗公署去开会，我们年岁小的留下护校了。这次选出的学生，是与旗公署的职员配合，组成了"搜查班"，分赴县城附近各屯去搜查有无红军（即东北抗日联军）。此时，街上的饭店、旅馆内虽都张贴着"莫谈国政"、"守口如瓶"的醒目标语，但人们在暗地却议论纷纷，诸如："东山里下来了抗日的军队"，"红军在肇州有地下室"、"丰乐镇警察的枪都让红军给缴械了"等等，城内的日本人也象热锅里的蚂蚁，惶惶不安，均不照常上班，成天开会，直到敖木台战役之后，伪旗公署才从乡下撤回搜查班。

二、令人啼笑皆非的军事演习

旗公署里的日本人虽然认为抗日联军在敖木台一战已被"全部消灭"，但心中并不托底。于11月初竟由日本副参事官东荣作组织了一次固守县城保卫战的军事演习。由我校全体学生扮作攻城的抗联队伍，东荣任攻城指挥官。城内的警察、自卫团担任守城，他们都是全副武装，还架起两挺机枪，分布在城墙的垛口上。

演习开始，我们每人拿一根长秫秸便冲上城墙，警察们用枪挡着，学生们嬉皮笑脸和他们厮扯着，相继从西南城墙的垛口跳入城内，只见那铁青脸五短身材的东荣参事官，手中一播动他的白衬衫，我们便一窝蜂冲进旗公署大院，算是"红军"胜利"占领"了县城。

演习结束，警察、自卫团、学生各列一队，由东荣作总结讲话，他表扬了我们："学生精神大大的好"。然后大骂警察、自卫团"巴嘎""库辣"，并且责问："为什么'胡子'进西门不打电话报告警务科？为什么眼见'胡子'跳进城里不坚决抵抗？"警察们明知是学生"攻城"，既不能真打，又像闹着玩似的挡不住，只好挨骂，自认晦气。

三、夜半枪声和火光

11月上旬，先雨后雪下了两天，蒿草、树枝上都冻成了冰溜子。

8日零点左右，家住大西门外农民训练所官舍的日本教师永石廉夫，被城内的激烈枪声震醒，他按照日本在乡军人会的要求，有情况立即到旗公署去集合，但又感到胆怯，便唤起两个年岁大的学生护送他，刚走进西门不远，便见伪旗公署大楼

火光冲天，并且枪声不断。他深知情况不妙，回身返奔西门外，要学生护送他到黑岗子学校避难。

此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十二支队的战士已攻克肇源城，进入了伪旗公署。已调往大赉县尚未赴任的副参事官东荣作，这天以极为兴奋的心情参加了有警方上峰"光临"的敖木台战役胜利庆祝宴会，酒后睡得正香甜时，被枪声驱散了美梦，他穿着睡衣，怒冲冲地提着一把日本战刀，奔出屋外，刚到前院，只听一声喝问："谁？"

"我是副参事官！"他在盛气凌人的报号中，一颗充满中华民族对侵略者切齿仇恨的子弹，将他击毙在地。

旗公署后院日本家属官舍中，有四名警务科的凶神恶煞，他们平日与中国人为敌，残害百姓。这时有的整装持枪跑出，企图顽抗被击毙；有的知恶贯满盈、末日来临，想同妻子同归于尽，被拖出处决。在抗联战士按官舍查抄敌寇中，日本人的家属妇女儿童无一伤亡，并非由于躲藏巧妙，未被发现，而是战士们听到室内厕所、浴室的婴儿啼声也不理睬，因为他（她）们是无辜的，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拂晓时，种马场的马夫谭万兴骑着场内名叫"久时"的最好大洋马奔往西门，守门的关战士问他："干什么的？"他说："给你们送大洋马要不要？"听说"要"，他滚鞍下马，将良马献给了英雄。

抗联战士看到我们这一堆人穿着黄乎乎像大兵一样的校服，便问群众："那些是什么人？"听说是学生，连校院的门也没进，更没有到种马场去。

此时，住在种马场的伪旗公署畜产系主任松原今朝太郎换上了一身农民服装，哭丧着脸跑到我们面前急切地问："我的哪边跑跑？"这个状似黑熊的日本人平日对我们总是恶眉瞪眼，开

口便斥骂，同学们很恨他，便指着有抗联岗哨的西门说：“你的那边跑跑吧”，意思是要他去挨杀，不料这个已被吓破胆的鬼子，竟真的跑过西门，直奔大街，混入了十字街听取抗联政治主任张瑞麟讲话的人群。

这一夜间，旗公署大楼被炸毁，敌伪监狱被砸开，放出了上百名“犯人”，粮栈被打开，饥民们闻讯纷纷去扛粮，警察署的警察、自卫团统统被缴械，日本人住宅都像走了人家，肇源城俨然又回到中国人民手中。

天光大亮时，抗联带着陡然壮大的队伍、缴获的枪支、弹药、车辆、马匹，打着红旗浩浩荡荡地开出北门，直奔头台村。不料在途中竟遇上了旗立医院曾剜过中国人心的日本大夫前原一勇，这个刽子手在被看出罪恶嘴脸后，便被讨还了血债。

我在青年时最为好事，听说抗联撤走了，便扯着同学上街看情景。一进旗公署大门，便看到门内西侧警卫室地下，仰卧着举双手作投降状的副参事官东荣作的尸体。又往里走，直奔官舍前，又看到四具穿警服、和服的日本人尸体。出了旗公署大门往东走出不远便看见了兴农合作社日本人西山的尸体，路北灰砖房前，仰卧着伪征收股长佐藤，他是被击毙在自家门口的。我们走到西油坊门前，看见了一张贴在墙壁上的醒目布告，落款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十二支队，队长徐泽民，政治委员许亨植。

我从头到尾读完了布告，内心对抗日联军肃然起敬，并且深深地受到了一次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教育。

听说南街国道局还有打死的日本人，我们也去看了，共是两具尸体，回校途中同学们窃窃私语：“日本鬼子快完蛋了！”

四、鬼哭狼嚎的日日夜夜

农民训练所的日本教师永石原名桥本康夫，因娶国民学校女教师永石为妻，他便更名为永石康夫；因他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学生暗地都叫他“桥秃子”。他从黑岗子避难回来，见老婆躲在王翻译家安全无恙，头件事就是到伪旗公署参加活着的日本人聚会。

永石康夫从旗公署回来，又为我们学生带回了新的任务。因为旗公署的日本人都认为农民训练所的学生“可靠”，所以永石夫妇和种马场的松原才都保住活命，于是要求永石分派学生，轮流到警务科、日本家属官舍和打死的日本人停尸房去烧炉子或烧炕。每屋两名学生为一班，两小时一轮换。

11 月10 日，我们开始到伪旗公署大院里轮班烧炉子。当时，我轮到夜班时，和另一名同学到停放着被抗联击毙的日本人尸体的旗公署礼堂（即今县政府礼堂），只见堂内屋由西向东并排着的办公桌上，放着10个并列的红漆木棺，室内灯光暗淡，阴森森的。礼堂的东西两端有门，门里各安着一个日本式的高桩铁炉子，值班同学一头一个看着添煤，中间隔着棺材不得见面，害怕时互相咳嗽一声，是打招呼。屋中南北两侧几个大卷柜中，装满了饼干、鱼、肉罐头。日夜常有些从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地来的男女日本人，在棺木前有的哭哭啼啼，有的念念有词或默祷，嚎叫一通之后，有的互相搀扶着走了，有的开卷柜吃那饼干、罐头。

这期间，听说旗公署的职员和警察们，又组成“特搜班”，深入肇源城附近村屯侦察抗联活动情况去了。

五、恐怖的江城

过了几天的一个夜晚，我和另一名同学到警务科特务股去接班烧炉子，只见炉旁坐着一人，30多岁，面如油粉，满脸横肉，头戴水獭皮土耳其帽，上身穿草绿色毛料协和服。下着马裤马靴，神气十足地闭着一双狼眼，令人望而生畏。接着，又陆续进屋许多人，有穿龙袍大褂状若绅商的，有戴红帽头、短袄便裤系布腰带宛如农民的，也有披麻袋系草绳衣着褴褛颇似乞丐者，还有摊贩、脚夫、工匠、术士等各种打扮的人，都是青壮年。使我感到不解地是，到屋这三四十人，服饰各异，竟看出一个共同点来。我惊异地悄声问那同学"这么多人为什么脚上都穿的黑胶皮靰鞡呢?"那同学向我使个眼色，又偷着拨弄我一下，不让我问话。

"小孩，你们走吧，今晚的炉子不用烧了。"坐在炉旁那人向我和那同学下逐客令了，我二人只得悄悄退出。

第二天上午8点，我又和另一名同学到警务科警务股烧炉子，见屋中的办公桌都撤到一边，腾出地当央很大空场，正位的桌子摆出"三堂会审"的架式，坐着3个身穿警服面目凶恶的日本人，旁边站着几个俯首听命的伪警察。

不多时，两个端枪的警察，从外面押进20多个系着麻袋、麻绳，穿破袄裤、靰鞡头，面黄肌瘦的农民。只听正座那个日本人"嗷"的一声怒吼，警察们便用刺刀逼着农民们跪在冰冷的砖地上。我们不知这些穷苦农民犯了什么罪?想看个究竟，只见正座那个日本人向警察对我们呶了呶嘴，警察便火速走过来："小孩，炉子先不用烧，你们走吧。"我和那同学只得立即出屋。

这天傍晚，我们两个同学分别给两栋日本官舍烧炕。我给烧炕这栋房灶坑在外屋，在续柴中，听到屋里传出："妈呀，哎

呀”的惨叫声，吓得我心惊肉跳、毛骨悚然，小心从门缝里窥看，只见一个跪在老虎凳上，看不到受的什么刑。

夜间回到学校，同学们按各自的所见所闻议论开了：

“哈尔滨来了‘三班特务’，带队的是叶警佐，在街里街外抓不少人啦，有扛过粮的、家里去过红军的，也有被从屋中搜出日本东西的，还有被诬陷的。”

“哈尔滨最出名的四大特务警佐是‘白菜（寨）叶花（滑）’，叶，就是叶永年，日本人的亲信，他心毒手黑，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回不知有多少人倒霉，要死在他手中！”

在同学议论中，我想起在特务股烧炉子时，召集那么多化装特务开会，头戴土耳其帽穿大马靴的定是来的叶警佐了。

又过十来天，滨江省来了个大头目，下乡的“特搜班”职员、警察都回到旗公署听他训话。此人确有生杀大权，他是伪警务厅理事官名叫渡边政雄。在职员、警察集会上，渡边声色俱厉、杀气腾腾地说：“三肇地区是匪区，郭后旗人的心统统地坏啦，我的下乡回来，马贼的大大死啦死啦的有！”看架式这个恶魔下决心要血洗肇源城了，消息一传开，人们无不日夜惶恐。

六、恶魔的下场

渡边政雄得到汉奸特务的准确情报，在花尔村（今薄荷台乡）一带地下的抗日救国会与东北抗日联军配合密切、活动频繁，并从叛徒手中得到了这个村的抗日救国会员名单。

这个踏着中国人尸骨爬上警官高位嗜血成性的杀人魔王，骄横不可一世。他派一辆卡车载着特务去前台按名单搜捕抗日救国会员，自带两辆卡车，满载日本警察讨伐大队，去大门赫家屯（今哈拉海村）去围剿抗日联军。

花尔村公所头一天就接到旗公署警务科电话通知，要全村

青壮年明天一早到村公所开会。家住后台的救国会员胡凤林，因夜间参加抗联在外屯召开的秘密会议，天亮才回家，听说村上召集开会，不敢不去。到村公所时，见没去几人，便到院外最近一小户人家去，因一夜未睡，躺倒在里间小炕便入梦乡。一觉醒来已是过午，他走出这家，见到熟悉人都大吃一惊，问明情况才知城里来汽车抓人，以开会为名，按名单逮捕，点到胡凤林时，几人都见他已到场，可是前台、后台搜遍，也没见他影子，谁也没想到他就在村公所旁的人家睡觉。胡凤林当日连夜外逃，直到光复后才回家。

12月26日，渡边政雄率两大卡车日警，抱着斩尽杀绝的决心来到大门赫家屯，停车气势汹汹地询问居民，红军在何处？答说："红军马队才过南坝外走了"。

渡边登上屯前地主家的高大粪堆，端起胸前的望远镜向坝外眺望，突然，"砰"地一声枪响，这个磨好屠刀没来得及行凶的鬼头应声倒在粪堆上，脑袋开了花。

后来，据目击者说，击毙渡边的是抗联中父子二人。因父亲要解手，爷俩落在抗联队伍后面，儿子给牵着马，听到坝里汽车响，急忙告诉："爸，敌人来了！"父亲急忙整衣起身，趴大坝一看，见粪堆上站着个身穿黄乎乎金道子警服的日本大官，他便瞄准望远镜就是一枪，见那鬼子官栽倒，敌人围上前去，乱作一团，爷儿俩上了马，不慌不忙地走了。

12月27日伪旗公署礼堂中停的棺材又多了一个，凑成了11具。对于渡边的死，人们当做喜讯传开，我们也很开心。

近50天中，从东北各地及日本国来肇源吊丧的日本人连接不断，有裘皮獭帽的绅士、高髻和服的妇女，也有老态龙钟的家属和宽袍大袖的和尚，他们哭号、祈祷、念经、默哀，也有给死者洗完澡往尸体上缠白布的。

七、粉面妖态的李华英

大特务头子叶永年率三班特务来到肇源只几天，就被地主奸商刘发和他的小老婆李华英勾引到他们那德昌发商场楼去（地址在现新华书店），真是三餐珍肴敬奉，朝夕鸦片供足。李华英虽已31周岁，但她风韵犹存，丰容盛鬋，宛如二十刚过的少妇。叶永年本是条丧失人性的色狼，见了她便已勾起邪念，怎禁得起她先是眉目传情、甜言蜜语，继而投怀送抱，百般撩拨。这双狗男女勾搭成奸以后，李华英便通过告枕边状的形式，开始玩弄他夫妻策划已久的罪恶阴谋。

原来刘发建起一面青土楼商场以后，野心勃勃地想在竞争中欺行霸市，成为暴发户。怎奈他夫妇做生意都是门外汉，店铺远不如左近的义和永、天发盛、万兴龙、裕昌源、同顺东这些布幌商店兴隆盈利。他也曾出于迷信思想怪罪到天发盛、万兴龙的幌架是用铁皮制的两条巨大金龙，其状张牙舞爪，抓去了他铺子的财源；便在自家楼壁上镶了许多块碗口大的水银镜，称之为“照妖镜”，意在照住那巨龙，夺回利润，这当然无济于事。因此，狗急跳墙，便不择手段地要利用叶永年这张王牌消除对手了。

叶永年对李华英百依百顺，她说谁和红军有勾结，叶就抓谁。刘发夫妇对义和永商号掌柜胡秀民任商务会长心怀宿怨，常想取而代之，于是这位抗日救国会员在李华英的告发下，最先被叶永年逮捕了；相继几个大商号的掌柜、股东、买卖间平日竞争的对手，一个个都以“勾结红军”罪名被捕了。聪明的看出罪恶用心，不惜花钱买命，通过刘发夫妇给叶永年使出一大笔可观的钱，便被释放了；有的认为“凭他查吧，反正我与红军毫无瓜葛”，结果竟断送了性命。

刘发商场德昌发的帐桌劳金刘鹏义，对李华英这种出卖灵魂、损人利己行为十分憎恨，曾在酒后发泄过心中的愤懑，传入李华英耳中，她立即唆使叶永年逮捕了这个心怀正义的无辜小商人，后来竟成为日寇塞入冰窟窿的19人中的一个。

1951年夏，我做为教育界代表，参与了县公安部门对刘发、李华英反革命一案的审议和量刑，从供词中看，他夫妇对上述罪行均已供认不讳，确实是死有余辜的。

八、一个日本人的见证

当东北抗联攻入肇源城时，伪郭尔罗斯后旗旗长额尔和谟毕勒格（鲍靖芳）在家，参事官江口贞雄去哈市开会，事后，他二人被很快撤换了。旗长物色到东义顺枯德的恶霸地主达瓦（人称“大霸”）为继任。据说他于民国时期曾带兵去老爷屯攻打辅国公府，想夺取扎萨克大印，结果战败而回。他家的狗和驴若被村民打了，或是挑水的往他院里瞅，他都可以把人抓去活活打死。日本人听说他能杀善打，就特聘了这个头大肚圆、壮如泥胎的蒙奸当上一旗之长。参事官派来一个叫三浦直弥的，他不似前任的江口那么黑壮。但黄白色薄皮饼子脸上一双小眼睛含着阴险，是个万年不乐。

这两个全旗最大的头头上任以后，一方面接待着外来的一支支山林警察讨伐大队，一方面招募了120名蒙族青壮年组建了萨音骑马队（因队长是茂兴警察署特务系主任萨音朝克涛，故名），目的就是要清剿旗境内的抗日联军。

当年腊月，传出了被叶永年抓去的人，有19个被扔进了三站李家围子东的大江冰窟窿里了，连抓去凿冰眼的一对渔民夫妇最后也被用刺刀塞进冰洞里。

当时，有一个叫丰松的日本人是工头，因他的妻子是中国

人，家就住在大东门里天主堂附近，所以他接触的群众也比较多。抗联走后，他为伪旗公署维修房舍，据他讲："1 月 9 日晚，日本军把19个中国人从监狱提出来往汽车上装，协和会姓张的用日本话骂他们，张的牙叫日本军大皮靴踢掉了！"

这次装上汽车的人，便是被日本法西斯塞入大江冰窟窿的19名志士。丰松见到骂日本人的"张"叫张有德，是协和会的部员，代行事务长职员。小个子长得很精神，是齐齐哈尔中学毕业。他的同期同学，多数因反满抗日被杀害，他幸免后学一口流利的日语；传说他因抄录了抗联贴出的布告，就招致杀身之祸。

在遇难的19人中，我们最熟悉的是王化清烈士，他是抗日救国会的主要成员，公开身份是在伪旗公署看发电机。他平易近人，常到学校去同我们说说笑笑。我们也更爱看他每年春节扭大秧歌，踩高跷扮演的"小老妈"。在抗联十二支队夜袭肇源城之役，他与"大同报社"的王秉章做内应，起了决定性作用。

被害人中还有个郭希谟，是警务科的警尉，他的妻子林家文是肇源国民优级学校教师，她文静秀丽、善音乐。1938年旗参事官林田数马认她做干女儿，并把她介绍给他干儿子郭希谟。当时，她对其貌不扬、认贼作父的郭希谟十分反感，但有林田参事官作主，只得勉强应下婚事。婚后夫妇交换意见，才知郭和自己是同样不甘当亡国奴，并有抗日救国之志，对认林田为义父一事，都出于"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念头。林田数马于1939年调离肇源，郭希谟遭疑遇害，林家文当时只有二十刚过，又无孩子牵扯，本可另觅新欢，但她感到知音难得，竟于郭希谟遇难周年之际，服安眠药殉夫而死。

九、着军装的野兽

日本侵略者为了清剿肇源境内的东北抗日联军和救国会组织，从吉林、哈尔滨、呼兰、宾县等地调来了刘懋、池田、小林、相马、田中五支警察讨伐大队，加上本旗组建的萨音骑马队，敌伪武装已超千人。这些讨伐队，名为警察，实为地痞、流氓、歹徒、无赖汉的着装群体。多数人是文盲，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啥叫警察法？一条是骂，二条是打，三条是找娘儿们拉拉呱。"因为连个抗日联军的影子也没见到，无仗可打，闲着没事，成天不是打骂群众、鱼肉乡里，就是敲诈勒索，调戏妇女，城乡居民见了讨伐队象避瘟疫一样躲得老远。

这年寒假，我和几名同学回到了家乡茂兴，当时正有山林警察田中讨伐大队驻防。街面上路断人稀，多数妇女不敢出屋。茂兴警察署警长张效亮的新婚妻子，依仗丈夫的地位敢到商店买东西，当她走到公兴源烧锅门前时，竟被两个讨伐队的兵在大街当众抱住亲嘴。这些兽兵见到姑娘媳妇，随后便追，追到家里不管有人无人，就动手动脚。春节讨伐队扮秧歌，用刺刀到各家逼着妇女去看，结果出门就跑光了。

一天，我和两位同学到北街一个学友家去，只见前面一个青年妇女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栽了跟头爬起还跑。我们想追上问问她出了什么事？可到底没追上。到了那学友家以后，听他家的人从外面回来说："后院的媳妇让三个讨伐队的兵好顿撵，都吓病了！"我们三人才明白，那妇女把我们当成讨伐队了。因为校服和讨伐队军装都是黄棉布的又都是兔皮帽，才引起这场误会，可见讨伐队是多少可恶可怕。

十、血债要用血来还

1941年3月24日，由宾县来肇源的相马警察讨伐大队，用刺刀押着几辆大车，缓缓地走在大街上，由南向北招引来无数面带泪容夹有抽泣声的群众。车上分别拉着五花大绑、蓬头垢面、破裤烂袄的青壮年共是42人。有个老太太哭天号地扑到车前喊叫："我的孩子啊！"车上一个俊壮青年流泪对她说："妈呀，我两三顿没吃啥了，饿呀！"

老太太急忙到饭馆买来几根麻花，跌跌撞撞地追上了大车，哭着递给她儿子，那青年接过麻花吃了两口，泪流满面竟吃不下了……

42名无辜群众被集体枪杀在西门外去往代路胡同半道的大坑里，有的没被枪打死，就被浇上汽油用火烧，其状惨不忍睹。邻近的野狗，天天到坑中吃人肉，吃红了眼，见到过路活人也往身上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敢走那股道。

好人遭难，坏人自然得宠。在那昏天黑地、腥风血雨的日子里，竟然传出地主奸商刘发要任伪旗公署行政科长的消息。后来，虽因他文化过低，不胜任未能就职。但1943年后，因日寇经济统制加剧，商品实行配给制，商店纷纷倒闭，刘发开的德昌发商场自不例外，可是主子毕竟还给他的走狗找了一条出路。伪郭后旗公署竟支持刘发在哈尔滨道外大水晶街开设了一座"肇源会馆"（相当于招待所），并规定凡旗内各机关人员去哈尔滨出差，必须到该会馆住宿，否则宿费不予报销。那是一座三层灰楼，楼内设备极差，大板铺，行李既脏又薄，还无食堂。"八·一五"前夕，伪旗长达瓦正在哈市，就住在会馆的三楼上，日夜喷云吐雾吸鸦片，直到苏联飞机轰炸滨江站，他才吓得乘江轮逃回肇源。

1951年，在镇压反革命的高潮中，潜逃在外的大汉奸刘发、李华英夫妇被逮捕归案，先后受到了人民的严厉制裁。两次宣判大会上都是群情激愤，控诉者泣不成声，要求严惩汉奸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执行枪决后，锣鼓喧天，载歌载舞，人人拍手称快。

当大特务叶永年被哈尔滨公安部门捕获，召开公审大会时，要我县派出受害家属代表参加。东门外曹某被指定为代表时，他为给枪杀在西门外大坑的亲人报仇雪恨，在家特制一根木棒，上面安了许多尖朝外的钉子，在参加公审会时藏于袖筒，准备控诉后痛打叶匪。不料与会的控诉者，人人袖中都藏有同样的木棒。叶永年这个汉奸、特务、日本侵略者的忠实爪牙、灭绝人性屠杀同胞的刽子手，在地动山摇的愤怒吼声中，受到应有惩处，落得可耻下场。

当时，我县城群众，通过有线广播收听到了公审大会实况，听到土匪被依法处以极刑的宣判，立即欢声雷动，真是大快人心。

前事不忘后事师，　抗联业绩古今稀。
白山黑水红旗艳，　碧血丹心赤胆奇。
夜袭江城功在党，　春回龙塞史存兹。
作奸男女千秋罪，　三肇辉篇永志之。

附录（一）：伪郭后旗公署于1942年为东北抗联攻入肇源城时击毙的11个日本人立碑镌刻的碑文

碑阴记

呜呼忠哉勇哉本省事务官东荣作君日本福井县人事务官伊藤泰一郎君神奈川县人警正田中武夫君福冈县人本旗警佐梨木靖司君新泻县人警佐高野敏三君静冈县人本省警尉补高冈清君京都市人本旗属官佐藤政胜君熊本县人技士前原一勇君福冈县人兴农合作社司事西山行人君熊本县人铁道警护队护监工藤佑藏君山形县人之同死于康德七年十一月八日本省理事官渡边政雄君福岛县人之死于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也先是匪首徐则民煽伏莽之余烬敢窥省境遂侵肇州县数邑将犯我境而为日满军警所溃仅以身免窜匿月余复聚同恶潜入境内突袭旗垣十有一士皆以忠为介胄以义为干橹力战杀身拯旗民于凶锋而全职责于靖献大节之凛凛如生奉公之耿耿有光兹树纪念碑勤其忠勇永其义烈使后人长仰流芳之弥久弥馨云

康德九年十一月八日

附录（二）：伪滨江省警务厅于1940年“三肇事件”后，派往郭后旗的三班特务名单及特务机构

三班特务：

第一班，班长：叶永年

成员：柳德清、何春元、刘殿元、宫文中

安天锡、王喜彬、关俊武、朱级三

第二班，班长：白寿天

成员：柳丙衡、杨万林、吴国权、赵天德

李万林、李永华

第三班，班长：肖士光

成员：张凤海、卢凤舞、黄庆儒、骆中培

李秀岩、张天成

特务分室：

日伪郭后旗特务分室设在肇源城内西油坊。

日寇为强化郭后旗特务组织，根除我抗日联军及救国会组织，消灭抗日爱国分子，特由安达县调日本人小西五次和心毒手狠残暴成性的汉奸高子中来肇源。小西五次任警务科首席科附兼特务股长；高子中任特务分室负责人。形式上是在警务科特务股的领导下，实际上是在小西五次的领导下，进行便衣特务活动，可以不通过警务科秘密抓人，私设公堂逼供、刑讯。

特务据点：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其《日本人服务须知》的秘密手册中称“汉民族善于理财、善于行贿、善于以声色货利诱他人”便根据这些特点，在我县物色民族败类加以利用，以开设商店、饭店、烟馆、赌场等作为特务活动据点。他们先后支持汉奸特务李振东在茂兴西街经营饭店、浴池，在肇源德昌发商店、大烟馆等地建特务据点，在所管辖警察署特务系的领导下协助特务警察进行罪恶活动。

林谦水产株式会社

1943年10月，伪治安部警务司派日本人范胜堂则到前郭旗沿江一带建起“范胜水产株式会社”以经营渔业为名，进行特务活动。同年12月为便于搜集江北一带抗联、救国会动向，在我县茂兴马克图建范胜水产栋式会社马克图收鱼点。1945年1月这个收鱼点撤回，哈尔滨于4月份又派日本人小林来县建起林谦水产会社马克图支部。由11人组成，下设关家亮子、白银中华、大庙亮子、老乐营子、马克图亮子、三岔河亮子、吐什

吐亮子等7个收鱼点，仍是以“收鱼”为名，行特务活动之实。

（摘自《肇源文史资料》第一辑，县志办公室供稿）

我所知道的穆棱县“黑帽子”事件

许在田

1938年，正当中共领导的穆棱县抗日游击战争不断推向高潮的时刻，原中共吉东地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宋祥（又名宋一夫）变节投敌，向日寇侵略者提供了吉东地区共产党员、爱国人士的名单，促使敌人在这一地区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黑帽子”事件，使许多县的地下党组织相继遭到了严重破坏，很多共产党员、“反帝大同盟”的成员及爱国人士被逮捕，受刑讯，有的同志牺牲在日寇的监狱里。在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日子里，缅怀先烈，控诉法西斯暴行，牢记历史的惨痛教训，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我记得，那是1938年11月中旬，伪穆棱县警务科突然召集全县各警察署的日本警察举行秘密会议。会议的“秘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严密封锁会场，既不许汉奸们参加会议，也不许汉奸们在会场周围走动。事后得知，这是遵照牡丹江伪警务厅密令，策划于本月25日前进行大逮捕的一次秘密会议。

11月23日午夜2点多钟，吉东地区大逮捕开始了。伪穆棱县警务科为确保此次罪恶行动进行得迅速，出动了当时全县独一无二的一辆大卡车，四出活动。一时间，全县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穆棱县首先遭捕的是兴源镇曾在日伪时期任伪警务局司法

股长、后被以“为政治犯开脱责任、不忠于皇帝陛下”等罪名而解职的王子书。随后，24 日夜晚 9 时许，住在八面通街里的吴树勋、闫禄祯我们3 人及河西乡福来屯、百草沟两地80 多名农民也相继被捕。

日寇为了严密封锁消息，煞费苦心地策划了一系列办法。他们首先给被捕到的人头上套上一个黑布缝制的刑具，称之谓“黑帽子”，这就是“黑帽子”事件的由来。据伪警方人士内部透露，这些黑帽子是日寇动员其家属夜以继日抢制的；其次，每捕到一个人，就在其被捕者的背上用粉笔划上一个数字，并告诉被捕者，你是几号，借以做到提审时呼番号而不呼姓名。

25 日早 8 日许，日寇对被捕的人采取突击审讯，严刑逼供的手段，企图通过得到的口供，扩大大逮捕范围。

他们首先提审那些被确认为是“首要分子”的人。被捕者一直被带到刑讯室，才摘掉套在头上的黑帽子，然后就劈头盖脑地轮番发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平常都和谁有过联系？”“你搞过哪些反满抗日活动？”……当得不到他们需要的口供后，就开始动用刑具。这一天，他们主要是给受刑者压杠子，就是用一根大约五尺多长、二寸多粗的木棍，压在受刑人的两腿膝弯后面，一端站一个人，有节奏地往下压。经过大约一天的折腾，日寇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口供。

26 日，从清晨开始他们继续提审。这天，他们使用了多种刑具摧残我们这些被捕的同志。每提审一个人，他们都先用新的野球（棒球）棒，没命地打被提审的同志的两肩，有时一根新木棒打到20 几下就打折了；接着用点着的香烟头烧胳膊，如果还得不到口供，就把三楞小木棍夹在受提审同志的食指和中指之间，由汉奸紧握手指，一边用力旋转小木棍，直到鲜血从指缝里流出来。经常是汉奸和鬼子们累得浑身是汗，可我们的

同志仍然守口如瓶，不得已，他们只好再次把被捕的同志送回监狱。经过这两天的审讯，一无所获，除“首要分子”外，不得不将被捕的农民释放。

27日，由牡丹江伪警务厅特派专员坐镇指挥，伪穆棱县警务科长日本人小村亲自审讯。小村这个恶魔素来以残暴名闻全县，他决心动用最残酷的刑具审讯被捕的同志。一开始，小村就对被提审的同志拳打脚踢，在他没有得到满意的口供之后，就指使汉奸和鬼子给被审同志灌凉水，一壶、两壶，……直到被提审的同志昏过去他才罢休。但王子书等同志在敌人的严刑审讯下，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没有向鬼子提供一句“有价值”的口供。小村等日寇失望了，他们再也不搞提审了。

11月30日凌晨，日寇用大卡车把王子书、吴树勋、闫禄祯，我们4人五花大绑，戴着手铐、脚镣送到火车站；由3个伪警把我们4人押送到牡丹江伪警务厅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监狱里。这里除穆棱县4名同志外，还有宁安同一案件的10余人。

伪牡丹江警务厅指令一个叫佐藤的鬼子负责审讯。他一改过去刑讯的办法，通过翻译像唠家常一样套供，企图通过安抚的手段迫使被捕同志就范，供出他们所需要的情况。通过几次审讯，被捕的同志终于明白了，这次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宋祥已变节投敌，成了伪满帝国的一个“警佐”；正是由于他的出卖，才使我们这么多爱国人士惨遭敌人毒手。

这以后，鬼子再也没有兴致提审被捕同志，只是对这些人的看管更严了，每天给开两顿饭，顿顿是小米稀粥，干不干，稀不稀，再加上一撮盐，让人饿得死不死活不活；严禁被捕同志到牢房外面活动。王子书同志就在这非人的生活中，于1939年5月的一天夜里，被折磨得与世长辞，在同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次“黑帽子”大逮捕，不仅发生得突然，而且涉及面很广，不只是被宋祥出卖的共产党员遭到了逮捕，就连秘密的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的成员也未能幸免。原任伪穆棱县八面通街街长的许润田，曾于1938年7月被日本侵略者送到哈尔滨伪省公署主办的街村长训练班深造，按说，他的特殊身份该能躲过这场灾难，谁知“黑帽子”事件发生不久，他也在哈市被逮捕，并被押送到牡丹江集中审讯。

直到1939年9月末，这些被捕同志才在各方面力量的营救之下被释放。但伪警察署仍在他们身上大作文章。日寇把这些同志定为“有害分子”，立有专门档案，又把他们置于警察、特务的严格控制之下。日寇投降前夕，这些同志又一次险遭毒手，虽未遭杀戮，但实属岌岌可危矣。

李殿芳屯大逮捕事件

范　文整理

编者按：此稿系根据北安市志办有关材料及调查核实整理而成的。

李殿芳屯现为北安市胜利乡革命屯村。1940年农历十月一日，日本侵略军在这里杀害了抗联战士宋国发、宋显，并逮捕了当地抗日群众33人。1952年黑龙江省民政厅慰问团到李殿芳屯慰问抗日烈属时，为了缅怀抗日烈士，将此屯改名为革命屯。

1939年夏天，抗联六军政治委员张寿篯（李兆麟）同志，率六军十团来北安境内的南北河一带开辟工作。派周云峰、王永

昌到李殿芳屯建立抗日救国会组织，发展了于长珍、张国清、张广英（尚大嫂）、于长清等15名会员。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很高，抗日救国会组织很快扩大到四平街（现胜利乡新安村）、宝元兴（现胜利乡新发村）、八村（现胜利乡新利村），活动非常活跃。曾往山里为抗联送粮食十多石，靰鞡（用牛皮缝制的一种鞋），一百六七十双，棉衣一百四十多套和其它生活用品。会员张广英还掩护了一名抗联战士。

在李殿芳屯抗日救国会积极支援抗联活动极其活跃的时候，1940年农历九月二十三日抗联队伍中的叛徒尚连生带一支手枪，到徐占国屯（现胜利乡新和村）警察分驻所将抗联的活动密报北安日本宪兵队的特务郝喜山（1950年逮捕归案处决）。郝喜山立即到李殿芳屯调查抗联组织情况，于是报告给日寇。

同年农历十月一日的清晨，郝喜山和吕庆文、范东阁（吕、范在镇反时被处决）、杨宝珠（至今无下落），配合警务科白警尉、日本人岗野南洋松、李翻译等带领日本兵和伪警察，分坐十多辆卡车，先到徐占国屯警察分驻所，然后分赴各屯逮捕抗日救国会人员及与抗联有关系的群众。此时，正值抗联战士宋国发与其长子宋显在李殿芳屯活动，躲避不及，被逮捕。日寇残忍地将宋国发父子的脑袋挂在屯东、西两头的木杆上，恫吓群众。据1950年调查，当时被捕的群众共33名。敌人对他们惨无人道地施以各种酷刑，如往头上浇开水、跪木棒子、压杠子、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过电、手指刺针挠簸箕……。不管敌人怎样严刑拷打，被捕的群众只字未吐露抗联情况。敌人施尽伎俩，实在无计可施，便将这些被捕的爱国群众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其中15人死在狱中。

（摘自《北安文史资料》第一辑）

庆安县马家桥惨案

于洪乔

1941年冬底，抗联三路军第十二支队第三十四大队，在同敌人的一次遭遇战中，部分战士同主力部队失掉了联系。他们不顾天寒地冻，不怕饥饿疲劳，在林海雪原中跋涉行军，寻找主力部队。一天，大队长王殿阁带领3名战士，途经马家桥屯，作暂短休息时，被反动地主杀害。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有名的马家桥惨案。在那暗无天日的敌伪统治年代里，不知有多少革命志士，竟这样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人们痛恨这些甘为敌人鹰犬的民族败类，更怀念这些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革命志士，他们的英雄业绩将永远鼓舞着人们奋勇前进。

马家桥屯在庆安县城南大罗镇乡，距县城约50华里，地处半山区较为荒僻，抗联经常在这一带活动。日寇为消灭抗联，除以大量军警追捕围剿外，还强化保甲制并利用当地的反动分子，探听抗联动向，为他们通风报信，以便随时出动军警，捕杀抗联战士。大地主马福宽（排行老七）是安庆南乡大罗镇一带有名的恶霸地主。家中有钱有势，曾担任过大罗镇保的保长。他积极效忠日寇，深得日寇信任。

1942年1月（腊月初四晚上）大队长王殿阁率3名抗联战士，坐着李福（现庆安新胜大队社员）的马爬犁来到马家桥屯，经李福介绍便住在马家佃户刘生家。刘生母亲看到战士们虽饥饿劳累、疲惫不堪，但态度和蔼，遵守纪律，不欺侮百姓，心里很受感动。便热情地把家里留着待客的白面拿来，招待他们。

战士们由于连日来的饥饿困倦，吃完饭费力地脱下鞋袜（有的战士脚冻得脱不下毡袜），头朝里合衣而卧沉沉入睡。刘老太太见此情景，非常受感动。主动地为他们烘烤鞋袜，并警觉地和值班的岗哨说："地主马老七为人奸诈心狠手黑。如果叫他知道你们住在这儿，是要出事的。我给你们烤干鞋袜，休息一会儿就赶快走吧！"刘老太太说着抬头一看，这个战士也已昏睡过去，没有听见。这时住在刘生家下屋的马家狗腿子张连生，伙同马家更夫张玉堂，早把抗联住刘生家的消息，报告给马福宽了。马得知情况后，心里盘算："抗联在马家桥过夜，如被日本人知道，我马家也得落个知情不举的罪名，究竟是向日伪报告，还是怎么办？"犹豫不定。就同其子马洪贵（在哈医大读书休寒假）、其弟马福顺等人商量。马洪贵对其老子说："如向上报告，时间来不及，恐抗联跑掉，莫不如将这4名抗联杀掉。这样，既可躲过日本人追究窝藏抗联之罪，又可得到日本皇军的嘉奖和信任。这是两全其美的上策。"马认为其子言之有理，当即决定，杀掉这4名抗联战士。

马福宽为了一举消灭4名抗联战士，唯恐人手不够，找来本家的马福江、马福臣、马洪义、马福河及至亲陈万选、刘金生等人。并吩咐更夫张玉堂严密监视抗联战士，随时报告情况。又布置马福顺、马福江、马福恩、刘金生、马洪斌、蔡老四等人，手持凶器，在刘生家周围把守。一切布置停当，只等张玉堂前来报信。在这紧急时刻，刘生父亲见战士全部熟睡，又见狗腿子张玉堂频繁出入，不怀好意，预感到要出事。他想喊醒战士放走他们，又怕吃罪不起，不喊醒战士，又怕战士遭殃。怎么办？他急中生智，故意将水缸上的水桶碰掉。水桶落地声响惊醒一名熟睡战士。他朦胧中问："什么响？"狗腿子张玉堂随即回答："没什么，你们睡吧！"那惊醒的战士误认为是自己的岗

哨答话，也没在意，就又进入了梦乡。

晚11时许，夜深人静，万籁无声，战士已全部熟睡。狗腿子张玉堂见时机已到，急忙把情况报告给等得焦急的马福宽。马得信后立即带领马洪贵、马福顺手持斧头、菜刀、铁锤、木棒等凶器蹑手蹑脚来到刘生家房后，相继由后窗户，鱼贯地跳进屋里，迅速跨进里屋门槛。马洪贵抢先抡起斧头劈倒抱枪入睡的岗哨，随手一斧子砍在炕梢1名战士的前额上，接着手起斧落砍到第三个战士的太阳穴上。这时睡在炕头上的战士被突如其来的砍斧声惊醒，忽地坐起欲掏枪反击，可惜迟了一步，被马福宽抢上前去用力抱住，对其子大喊："快！他要掏枪"。杀红眼的马洪贵，提着带血的斧头忙叫："快闪闪身！"马福宽一歪头，咔嚓一斧子，砍到那战士的头上，那战士就无声倒下了。

4战士被砍后，马福宽命人将被砍的战士拖出屋外。功夫不大1名重伤战士苏醒过来，乘凶手进屋之时，爬到刘生家东北柳条栅栏前，欲想逃脱，被凶手们发现。马福顺等先用扎枪将重伤战士刺倒，继之又一顿乱棒打死。当时刘生家炕上炕下，屋里屋外，血肉模糊，一片血腥气味。被害尸体横陈刘家院中，惨不忍睹。

这场亲者痛、仇者快的消息一传出，凡具有民族良心的中国人，莫不悲痛惋惜。惋惜志士年轻有为，壮志未酬，没牺牲在抗日战场，却不幸遭这伙民族败类毒手；痛恨马氏父子为富不仁心肠歹毒，认贼作父惨杀爱国志士。人们断言：马氏父子这样倒行逆施，凶狠残暴，终有一天将自食恶果，不得善报。

惨案发生后，日寇闻讯，欢呼雀跃，开会庆祝。对砍杀抗联有功的马氏父子及其帮凶大加赞赏，称他们是满洲帝国大大的"良民"。伪县公署将马氏父子及其帮凶的"功绩"，呈报给伪北安省请赏。省奖给马家一个银盾，并照相留念。对有功人

员各奖给奖状和伪币500元，其余人员均按功行赏。日寇为保护他这条忠实走狗，给他家安上了直通日本守备队的电话，以便联系沟通情况，随时捕杀抗联。同时发给马家30支步枪，4 500发子弹。从此，马家父子更加横行霸道，洋洋得意不可一世。

解放以后，马氏父子深知自己犯了十恶不赦之罪，双双亡命南逃。而其他主要帮凶也都隐匿他乡。民主政府成立，群众纷纷要求惩办凶手，为死难烈士报仇。罪魁马福宽逃出庆安后，在哈市隐居，生怕露了马脚，又到吉林省榆树县其亲属家躲避。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后，他预感自己末日来临，走投无路，逃到拉林镇，用腰带自缢于井台之上，落得暴尸他乡的可耻下场。其子马洪贵，逃到长春，更名马正夫，在国民党军队当了上尉军医。长春解放时被俘，他隐瞒了历史罪恶混入革命队伍，充当了医生。1958年6月8日，被庆安县公安局在沈阳市东盛钢铁件厂卫生所逮捕。于1959年5月20日在庆安处决。主要帮凶马福顺被判处20年徒刑。其余帮凶也分别受到了应得的惩处。

马家桥惨案已过去40余年，烈士们驱逐日寇，光复祖国的愿望早已实现。烈士们的英雄业绩，将永载史册，万古流芳。

“巴木东事件”始末

梁宗仁

1943年春季，伪滨江省警务厅经过半年多的侦察和阴谋策划后，调动五百多名警察、特务和警备队，在巴彦、木兰、东兴等三县城乡连续进行两次大逮捕，残害我国志士千余名，人称这次骇人听闻的血腥事件为“巴木东大检举”。

1941年11月25日，中共北满省委针对苏德战争爆发后的新国际形势，召开一次常委会议，决定加强党的群众工作，发展地下组织，以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此，特派遣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六支队和第十二支队打进巴木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巴彦的东北部、木兰的北部和东兴的全境，均为山区，是小兴安岭的余脉，很适合游击队的活动。抗联第六支队和第十二支队60余人在队长朴吉松和指导员张瑞麟、于天放的率领下，奉命由三肇和铁力地区活动到巴彦、木兰、东兴山区，迅猛地展开了抗日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他们先后袭击了庆城（今庆安）的大罗镇、木兰的石头河子、大贵和巴彦的四间庙等地的伪警察署、村公所、自卫团和日本开拓团，使日伪汉奸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同时，在三县的沿山村屯建立14处抗日救国会、13支青年义勇队和农民自卫队，发展抗日救国会员千余人、农民武装队600余人。这些地下抗日组织建立起来以后，便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各地抗日救国会发动群众抗捐、抗粮，支援抗联打击日本侵略者，闹得敌人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終日。日本侵略者称这是“该地区治安的癌病”。[①]滨江省高等检察厅日本检察官鼻中在一次特务会议上说：“救国会对抗日军提供金钱、物资、粮食等，并当向导，侦察军警设备及行动，对抗日军加以掩护。这些武装队一旦待事变到来时，会配合抗日军，拿起武器来，对我们的军警开始作战，特别是一些青年人参加，仅滨江省巴、木、东三县就不下千余人。这真是令人战栗的！”[②]

---

① 巴彦公安局档案：《巴木东事件》。

② 同上。

一、组织特务侦察

抗日烈火在巴木东地区燃烧起来以后，日本侵略者惊恐万状，他们曾采取“拉大网”和“篦梳森林”的办法，到处搜捕抗联。然而这些无济于事，枉费心机。于是，他们又拉长战线，采取组织特务侦察的办法，这就是“巴木东大检举”的开始。

1942年春季，滨江省警务厅成立一个治安肃正工作委员会。同年9月，以省警务厅日系特务科长小园井（警正）、特务股长泉屋立吉（警佐）、大场弥作（警佐）、野泽光三助（警佐）和平井二郎（警佐，朝鲜人），以及翻译王蕴瑛、刘显振为首，抽调省警务厅刑事科外勤警尉黄希南、南岗警察署特务系警尉刘殿铭、道外警察署经济系外勤警尉王玉环等一帮汉奸走狗，组成了滨江省警务厅特别搜查班。然后，他们分赴巴彦、木兰、东兴等三县的县公署警务科组织各县的特搜班。这三个县的特搜班成立以后，各警察分所又成立了分班，以下又分若干小组，并在三县村屯利用汉奸建立起了谍报网。据敌伪档案记载：参加侦察的有省警务厅特务12人（其中日本人10人、朝鲜人1人、中国翻译1人）、巴木东特务144人（其中日本人5人、朝鲜人3人）、密侦29人、嘱托8人，共有193人。

巴彦警务科特搜班由省警务厅日特泉屋立吉、平井二郎亲自指挥，县警务科特务股股长久保谷正雨（日本人）和副股长陆维先任正副班长，高升远为翻译。据点设在仁和商场后院会客厅，对外称三十号。

木兰警务科特搜班由省警务厅日特野泽光三助亲自指挥，县警务科特务股股长小川广一（日本人）和副股长孙福江任正副班长，王殿吉为翻译。据点设在大兴公司。

东兴警务科特搜班由省警务厅日特大场弥作亲自指挥，县

警务科特务股股长南村（加入日本籍的朝鲜人）和副股长尹国良任正副班长。据点设在南烧锅。

特搜班的主要侦察手段有：

一、“包户”侦察。他们把抗联经常活动的山村列入了重点侦察对象。巴彦双山村的王公屯就是他们“包户”侦察的地方。这里的骆驼砬子玉皇庙是抗联三军十二支队的交通站，交通员是道士赵春霖，群众称他为“赵老修”。到王公屯包户侦察的特务是从吉林农安警务科调来的警长赵英武。他化名赵洪升，潜伏在自卫团长冷振江家，假称是冷家的雇工，群众称他“赵半拉子”。赵洪升来了以后，经常指使本屯农民苑德上山去侦察赵老修的活动。赵老修和姜家窑的塾师姜镇藩、本屯的小学校长王吉云、陈维新和农民王魁经常联系，他们都是抗日救国会会员。敌人称“王魁家是抗联的粮仓”，“学校是红军的情报处”[①]。果真如此，敌人没有说错。他们经常给抗联提供情报和运送粮食、子弹等物资。为此，赵半拉子都把他们列入了黑名单。

二、设立据点。敌人在抗联经常过往的地方开设“旅店”，其实均为特务据点。巴彦兴隆镇的“兴滨旅店”和东兴的“大车店”，掌柜的都是特务。巴彦黑山里的杨立平屯也是一个特务据点。蹲点的特务叫刘柏勋，他化装成猎人，经常出没于附近山村。该屯参加抗日救国会、青年义勇队和农民自卫队的人很多，他们经常给抗联捐款、送粮，所以，引起敌人的注意。

三、利用“腿子”。敌伪档案时记载的“密侦”和“嘱托”，其实都是特务腿子。这些特务腿子生活在群众之中，了解抗日活动情况，然而又不容易防备。巴彦警务科特务股副股长陆维先的腿子叫老石头，真名石玉田，是一个抽贴算卦的打板先生，

---

① 巴彦公安局档案：《巴木东事件》。

曾为土匪“掌线”（即推八门，占卜行动方向），又被日特利用。他到处流窜，以抽贴算卦为名，侦察抗联的活动情况。再如东兴的密侦李文祥（外号“大半夜”）、李文生（外号“小半夜”）和经常出入内蒙山打皮子的猎人张海楼，以及在山里烧炭的老么头，他们都是特务腿子，干了许多坏事。

四、化装跟踪。这些特务非常狡猾，各种侦察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时还化装进山追踪抗联。1942年8月，省警务厅特搜班的日特大场弥作带领翻译王蕴璞和东兴警务科的特务尹国良、乔文等人，化装成土匪，到六合屯至凤山县山中，追踪抗联十余日，又在凤山县茶馆蹲了好几天。结果，枉费心机。

二、叛徒告密

“巴木东事件”中抗日战士被捕的另一原因是叛徒的告密。

抗联的宋一夫（即宋效贤，吉东省委书记）、倪景祥（即倪福祥，原北方局派来的工作人员）、杨玉祥（即杨德山，抗联第三十六大队队长）等人叛变投敌以后，出卖了抗联的许多情况。接着，周云峰（即常云峰，十二支队政治部主任）和李全（六支队通讯排长）也被捕叛变，又使特务掌握不少抗联的情报。

1943年2月12日，周云峰在巴彦被捕，在哈尔滨叛变投敌。他在日特泉屋立吉的指使下，去侦察阎继哲（抗联十二支队派到地方的工作人员）的活动情况。阎继哲化名姜有贵，潜伏在滨北线泥河站附近的李碗铺屯甲长李彦荣家。周云峰通过阎继哲的弟弟阎继贤找到了阎继哲。这时，李全和李景荫（抗联十一军独立师参谋长）也在李彦荣家。他们谁也不知道周云峰已经被捕叛变投敌了。只听他撒谎说，他在哈尔滨太平桥开豆腐坊，没有资金，很困难，让他们也去。阎继哲没有去，只是从他们的活动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他解决豆腐坊的资金问题，

周云峰把侦察到的情况，报告了在兴隆镇（泥河站南三十里）等候联络的省警务厅特搜班工作主任重见寿一。2月25日下午2时许，重见寿一带领翻译王蕴璞、警尉吴树桂、李云峰和叛徒金丽珠（朝鲜人，日本名叫安田方雄）、杨永祥、宋一夫等大小走狗。在周云峰的指引下，分乘两辆马车，从屯两头进入李碗铺屯。他们诈称要“出荷粮”[1]，闯进了李彦荣家院内。此时，李全正在炉子上烧开水，被杨永祥发现，立即逮捕。阎继哲见势不妙，想溜出去，走到院中，被宋一夫拦住，带到磨房里，扣上了手铐。李景荫因去西屯，闻讯未归。王蕴璞等几个特务，白蹲一夜，没有抓着。阎继哲、李全，以及李彦荣被捕后，次日押送哈尔滨，分别关押在地方保安局特务分室的地下监狱和“松花塾”（道里监狱）。王蕴璞说：“李全在哈尔滨道里中央大街北头松花塾监房中，经过宋效贤、金丽珠、周云峰、倪福祥和我等人的启示，思想动摇，接受叛变投敌。”[2]

李全叛变后，化名李洪全，泉屋立吉迫令“女犯”王桂兰与他结婚。王桂兰是哈市道外北市场的鼓书艺人，1942年与其妹妹在三肇地区流动演出时，金丽珠说她俩与“三肇事件”有关，与抗联徐泽民有联系，便被捕关押在哈尔滨“松花塾”。其妹病死在狱中。日本人从王桂兰口中没问出什么，定不了罪，又不想轻易放掉，便留在狱中当杂役，让她干些扫地、打水等杂活。她和李全结婚后，住在南岗西市场白俄院里。以后，李全被派到巴彦县兴隆镇，以开“兴滨旅店”（特务据点）为名，从事特务活动。

这些叛徒除向敌人告密外，还千方百计地钻入抗日组织内

---

① 《阎继哲回忆录》，《巴彦党史资料》，第2辑。

② 巴彦公安局档案：《巴木东事件》。

部侦察。1942年5月，倪景阳佯称中央代表，冒名李玉廷（曾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学号37号），通过抗联地下关系巴彦中医刘子祥和兴隆六合一木工场经理冯殿文与抗联组织接上了头。有一天，李全出山把他接到了五顶山密营。许亨植（李熙山，北满省委委员、三路军总参谋长）和张瑞麟接见他时，觉得此人可疑，便令电报员乔树贵给苏联的李兆麟发报，查问这位“中央代表”的情况。李兆麟接到电报后，断定他是冒牌货，便回电让支部派两名交通员将此人押送苏联。倪景阳作贼心虚，偷看了电文，知道露了马脚，便趁夜逃跑了。

三、地下组织名单落入敌手

1942年8月2日，抗联六支队和十二支队在庆城青峰岭活动时，晚间军总参谋长许亨植秘书阎继哲与六支队指导员张瑞麟等3人在篝火堆旁清理文件，把不重要的都烧了，只留下各队掌握的地方联络人员名单，并抄在一起交给了许亨植，决定由陈祥、王兆庆护送，去寻找失掉联系的党组织和部队。他们下山的第二天早晨，在宿营地升火做饭时，被山林分队长庞风向发现了。他向大队长国长有报告了这一情况。国长有率军分兵包围了冒烟处。凌晨3时交战，许亨植负伤，但仍用“大鱼眼子”还击。激战两小时，许亨植和陈祥不幸中弹牺牲。国长有命部下把许亨植和陈祥的头颅割下来，装到篓里背到庆城，在十字街头的电柱上悬挂两天，后送至北安省警务厅。王兆庆突围出来，跑回队里，把他们遇敌开火的情况报告张瑞麟。张瑞麟立即派人到出事地点检查。被派人员到现场一看，许亨植和陈祥的头颅没有了，身上空无一物。敌伪档案记载，他们搜去的东西有“王新林、李兆麟给许亨植的信。东兴、巴彦、木兰、哈尔滨等地的地下组织名单。”王新林是苏军少将，原东方大学

教务主任西里前。“青峰岭事件”发生后，于9月15日，北满省委委员、抗联三军政委金策在庆城安邦河上游召开一次会议（后来称此次会议为“龙南会议”），决定转移巴木东地区的党组织，重新划分了战斗地区，积极开展党和抗日救国会及武装队的组织工作。朴吉松率队转移到庆城后，秋天在大罗镇活动时被捕。当时，他将随身携带的材料扔入群众的灶坑内，但因无火没烧了，被特务搜查去，又使抗联失掉了许多秘密，他在狱里被刑讯致死。

四、逮捕与杀害

敌伪档案记载：“救国会、青年义勇队、农民自卫队等，这些在北满省委领导下，积极配合匪团，一有事即企图蜂起，扰乱治安，成为该地区治安的癌症病。因而，3月15日，才实行一齐检举。”

在敌人“一齐检举”之前，也就是1943年2月末，滨江省警务厅经过半年的侦察活动后，成立了一个“治安肃正工作队”，行动总指挥是哈尔滨警察局特高课科长林宽重（日本人，外号“林大头”），副指挥是特高课警佐周质彬。他们率领一百四十多名日伪军警（其中哈市警备队50人，宾县警备队40人，双城警备队50人），携带手铐、脚镣，分乘6辆汽车，进驻巴彦县城，在营地挂上一块“治安肃正工作队本部”的牌子。他们来时，每队都在警务厅领一个档案袋和一口袋黑帽子。档案袋里装有被捕人员的登记表，上写姓名、年龄、职业、特征，以及照片、住址方位和线路图，他们是当场拆封，按名单抓人。

巴、木、东等三县警务科，也相应成立了行动组织。每县都成立五个班，即检举班、取调班、警备班、看守班、庶务班。取调班即审讯班，下设十个取调室，专管审讯工作。巴彦警察、

特务共有366人，有257人参加了大检举。木兰除全县140多警特人员参加逮捕外，还有由省警务厅抽调来的市、县、旗的日伪警特169人。东兴的警特人员也都倾巢出动。

日本侵略者经过阴谋策划和准备后，于1943年3月7日和5月25日，连续进行两次大逮捕。敌伪档案记载：这两次大检举，在巴、木、东等三县共破坏我抗日救国会14处、青年义勇队和农民武装队13支，逮捕爱国志士662名。加上平时零星抓的共有千余人。受害最严重的巴彦杨立平屯，共捕26人，其中杨立平家就占6人；減草沟屯15户，被捕14人，老佟家就占7人，而且还把全屯房子都给烧了，害得全屯男女老幼无家可归。

这些如狼似虎的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非常残忍，他们给被逮捕的人都戴上黑帽子，扣上手铐、脚镣。手铐、脚镣用没了，就用铁丝反拧双手。

这些爱国志士被捕后分别关押在巴彦、木兰监狱、兵营里，押不下就关在警察署屋里，日夜不给松绑。在关押期间，他们受尽了残酷的虐待，日夜不让睡觉，且又隔几分钟用木棒敲一次脑袋。吃饭也不给松绑，用人喂；还有的监房把高粱米粥倒在一个槽子里，像喂猪一样，让“犯人”用嘴拱着吃。整天不给摘黑帽子，很多人被捂瞎了眼睛。

审讯时，毒打、过电、火烧、灌辣椒水、上大挂、用皮口袋摔等等，施以各种酷刑。巴彦的王魁被打断了胳膊；木兰的杨景新被打碎了脑袋。敌伪档案记载：巴彦、木兰、东兴等三县刑讯致死者60人，拘留中死亡者21人。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者占三分之一以上。这足以说明日本侵略者的凶狠残暴。在哈尔滨“松花塾”等几处监狱被关押的爱国者倍受折磨。日本侵略者每天只给他们两顿饭吃，每顿只给一碗高粱米粥和一块咸菜条子。人人骨瘦如柴，天天在死亡线上挣扎。院内就是刑场，

他们把人秘密绞死后，都偷偷地埋到荒郊野外，两具尸体一个坑，害得我无数爱国志士尸骨无存。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回忆“巴木东”大逮捕

赵清林

1943年农历二月初十，我于东兴县满天星前甸子屯被捕。这个震惊三县的大逮捕、大屠杀的血腥事件，就是当时所简称的巴木东大“检举”。时间已过去了40余年，我在这次大“检举”中是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之一。

1942年8月，抗联第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在青峰岭不幸牺牲的消息传来。张瑞麟让我母亲到庆安县探听一下风声，我母亲到庆安通过了解证实了许参谋长牺牲的消息是准确的，但没有发现敌人有什么新的动向。不久，张瑞麟派人通知我们家，让暂时转移，以免遭日军迫害。我父亲和母亲还存有侥幸心，决定等等看，和我们说，也许日本人发现不了我们。可是，几个月后，就发生了“巴木东大检举”。

1943年3月15日，日本侵略者从哈尔滨市各区和双城、呼兰、宾县等地调集了伪警察、特务约五百多人，于同一个时间在巴彦、木兰、东兴三县进行了大逮捕。

我被捕的那天，是3月15日的早上。天刚蒙蒙亮，屯子里的狗突然叫起来。还没等我们出屋，日本兵和特务们就闯进了我的家，一个特务手里拿着手册，首先把我父亲和我母亲捆了起来，拉出门外。屋里给翻得乱七八糟，这时从门外进来一个

日本警官，用不流利的中国语对我说："你的，怎么样地和共匪的联系？统统地都捆起来！"当时，我家只剩下我爱人孙秀清和不满一岁的孩子。我们都反绑着手，扔到早已停在村口的大汽车上。凡是被抓的人，每人都给套上一顶用黑布缝成的长筒帽子，并用布带子缠上了好几道。凡是在册的抗日救国会会员都被抓起来了，我舅舅刘庆田以及和我一起参加抗日的王兴，也是在同一天被捕的。我们关在东兴临时监狱（即刘志堂监狱）。这次大逮捕，在东兴县共抓了爱国人士、无辜群众162人；破坏了抗日救国会组织9个，农民武装五支，东兴地下抗日救国会组织和农民抗日武装遭到了全部破坏。

被捕的多数爱国人士，任凭日本人刑讯逼供，严刑拷打，仍是坚贞不屈，我父亲和我母亲被警察署审讯了11次，每过一次堂，都上一次大刑。审讯时刑法多种多样，有坐老虎凳、上大挂、压杠子、过电、灌辣椒水，往手指缝里夹木棍等等。

在东兴监狱里和我关在一起的有郭富（后被释放，现在木兰粮库工作），满天五顶二的张玉喜（此人下落不祥）、刘风、毕文祥。我在狱中被审讯了5次，第一次，过堂用的刑是"压杠子"，让我跪在地上，把比较粗的杠子放在腿上，两个人在两头同时使劲往下压，疼得我死去活来，边压边审问。这次审讯我的是一个日本人，他问我，你和共产党的什么联系的有？你与抗联什么的干活？谁是救国会的会长？我当时装作傻子，问什么我也不知道（在狱中放风时，我父亲告诉我，过堂时要装呆作傻，问什么都不知道)。敌人看我虽然个子大，但是年龄小，又有些呆傻，好像缺心眼，没给我再上大刑，就把我押回监狱。当天晚上，同我一个牢房的毕文祥被拉出去过堂，在审讯室里给他上了大挂。将他的两个手脖子用绳子绑在一起，吊起来用人推着来回悠荡。还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把他打得遍体鳞

伤，整个身子几乎没有一块好地方。由于多次审讯施以酷刑，他活活地被打死在狱中。

后来，又第二次审讯我，这次是因为提审我父亲时，他只承认自己是抗日救国会的会员，说与老伴刘玉珍、儿子赵清林都没关系，他说："我儿子从小呆傻，关于救国会的事不敢告诉他。"敌人审问他给抗联都做了哪些工作？又发展了谁当会员？我父亲的回答是：还没等给抗联做工作，就被你们给抓来了。一个日本警官审问我父亲，你把张瑞麟给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父亲的回答：没见过，不知道。因我父亲是他们的"要犯"，他们未能从我父亲口中得到什么，所以又开始提审我。这次把我带到了审讯室，没容分说，就给我过了电，把电线两头接到我的两个大拇手指上，特务们用手摇电动机给我过电，虽然我没被电死，但我被电打得疼痛难忍。特务们一边给我过电一边审问：看你这小傻子，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你说赵福恩是不是抗日救国会会长，你父亲把张瑞麟转移到哪里去了？我回答还是不知道。这时站在一旁的一个日本警官对我说："你的情况的，我的统统地知道，不说的，死了死了的有。"我说：我在家就知道干活，别的什么都不知道。这时，审讯我的翻译官孟庆华对日本警官说：他年龄小，又有些呆傻，审问不出什么。他们研究了一下，又把我拖回牢房。就这样接连审讯了我5次，最后那一次受审时，特务们为了考察我是否真的呆傻，还让我学猪叫、学狗叫，为了躲过这一关，我也只好学狗叫、学猪叫。

我在东兴监狱被关了一个月，于1942年4月被转押到巴彦县监狱。转押巴彦时我们坐的是敞篷大汽车，车顶上用炕席盖着，不准我们往外看，更不让外边人看着我们，押到巴彦日本大营。在巴彦又受到日伪特务机关的复审，因我不是"要犯"，所以没怎么动刑。在巴彦监狱里和我住在一个号的孙树孟，他

受刑较重。给他上大挂时把衣服全扒光了，把他的四肢吊起来，来回悠晃，他的四肢肿得挺高，手不能拿饭碗，吃饭时我们几个难友喂他。监狱的看守怕我们跑了，每天早晚各点一次名，按犯人的号点名，我编入犯人五号。点名时如果你没有听清，不答话，日本警官就用棍子狠狠地揍你一顿。我在狱中也受够了罪，不判刑还不让到外边干活，整天在牢房里坐着，还不让靠墙，把屁股都坐烂了。后来我实在是支持不住了，就把我身边仅有的一顶狗皮帽子垫在屁股底下坐着，有一天被日本人发现了，把我毒打了一顿。在巴彦监狱关押了20多天以后，就用8辆大汽车把我们这些"犯人"转押到了哈尔滨市模范监狱。这座监狱是二层楼房，高围墙，拉上了电网，想跑是不可能的。这个监狱的狱规是很森严的，共分三种囚室，即死刑监房、未判决犯监房和普通监房。我被关在普通监房里，那里是又暗又肮脏，臭气扑鼻。在普通监狱里和我关在一起的有李树文（家是满天前甸子屯的），在哈市监狱里审讯时给他上的刑法比东兴更重，不但把四肢吊起来来回悠荡，还把点着的烟头放在肚子上烧，后来把他双臂悠脱臼了，最后终于死在狱中，我的好友王兴也被折磨死在狱中。在哈市监狱，每天放风两次，我带的铁脚镣子足足有六斤重，放风时偶尔能和父亲、母亲见上一面。我父亲被关在死监房里，1943年5月11日那天，我父亲和我舅舅受审回来，路过我母亲的铁窗前，告诉我母亲说：他俩都被判了死刑，并对我母亲说："不要难过，要坚强一些，日本鬼子必定要灭亡，我们的事业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当天晚上，我父亲赵福恩和我舅父刘庆田被处了绞刑，在敌人的刑场上英勇地就义了。同年的阴历七月初五，我母亲被滨江省高等法院判处徒刑8年，腊月初十被押解到安东市去服苦役。

1943年阴历九月二十日上午，看守打开我住的牢门，大声

喊叫："赵清林你出来！"我当时心想，这回坏了，八成要绞死我。当我走到传达室后，看守给我打开脚镣子，一个穿警官服的警察说："赵清林你被释放了。"由于八个多月的监狱生活，把我身体折磨得已经垮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哈市道外我舅舅家，在我舅舅家养了半个多月的伤。同年十月份，由我舅舅亲自把我送回老家。

1945年"八·一五"光复，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我母亲同其他5名政治犯也被释放了。由于光复初期，交通不便，我母亲流浪于辽宁的大石桥、海城，吉林的长春等地，靠讨饭和给人家做短工来维持生存。东北解放后，于1949年春天，我母亲才回到了家乡，与我们团聚了。

（尹忠文整理，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木兰县政协文史办供稿）

"巴木东"大逮捕木兰、东兴调查记

尹忠文　方　杰整理

大逮捕前的敌人动态

1942年9月间，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特搜班"，根据伪木兰县警务科特务股两次提出的情报材料，按省保安局"特搜班"班长、伪滨江省警察厅特务科长泉屋立吉的指示，木兰县特务股成立"特搜班"，本部设在特务股，由班长孙福江（特务股长）、主任王殿吉、班员李殿文、王治平、车福海、刘玉秀、邢景玉7人组成。并在利东警察署特务系成立"特搜班"分班，

由班长孙兴业、主任黄振洲、班员戴子瞻、王甲森、王永江、胡国清、高忠歧、崔云亭、王顺、康广学10人组成。并根据地区情况划分了特务分担区（按署管辖区）。木兰署和石头河子署地区，由“特搜”班员邢景玉和刘玉秀2人负责。利东署管地区由特务李殿文、车福海2人负责。大贵署管区的新兴屯及张副官屯一带的情报由利东“特搜分班”班长孙兴业、班员王甲森2人负责搜集。特务主任黄振洲分担大贵的王泉屯一带。李殿文和胡国清搜集利东段家粉坊屯和程刚屯、袁家店、四合屯一带情报。王顺分担大贵四马架、项家岗、文家屯一带。康广学分担大贵的苇塘沟和杨木档子一带。崔云亭分担搜集大贵的孙恒屯及大贵南张小铺屯的一带情报。审讯犯人由王福平负责，内务报告、报表等由王殿吉负责。除此之外，还利用31名“密侦”配合特务进行侦察活动。

除了特务进行活动外，还配备了大批“讨伐”队到这一带山区进行“讨伐”搜山。在搜山中，将李文生、李文祥、刘长发、白玉露、赵海山、班继太等人捕到特务股。在孙福海亲自审讯下，这些人供出抗联的军事活动情报和地下救国会人员及组织情况。他们叛变投敌后，特务股又将这些人派回山区，搜集抗联地下人员活动情报。

在同月，伪滨江省保安局“特搜班”在木兰街大兴公司设据点一处，进行统一指挥。看点人是省派来的野则光之助、叛徒倪福祥、金丽珠。参加此据点活动的还有特务黄希南、孙福江、王仙斌、李殿文、刘玉秀等人，并利用密探李文生、李文祥到此交递情报。

利东“特搜班”在大贵栗文沛家设据点一处，参加此据点的特务除了利东“特搜班”孙兴业等10人外，还用了2名“密侦”经常出入于“特搜班”，其中刘祥主要搜集蒙古山一带的抗

联情报，另外一名李玉坤负责搜集大板子、杨木档子一带情报。

特务人员在木兰县、东兴县经过一个时期的侦察，搜集到大量有关抗日救国会、农民武装队等组织的情报。1943年2月，省“特搜”班长回哈尔滨汇报了这些情况，伪滨江省警务厅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重见寿一、高野喜一、大场弥作、望月真义等人员。会议研究了巴木东三县情报，根据新掌握的情报材料，制定了“巴木东肃正工作计划”，并将拟好的计划印成图表，即被捕人名单，参加逮捕人员名簿和编班情况以及有关逮捕前的准备计划。

在逮捕前编成五个班，即：检举班（逮捕班）、取调班（审讯班）、警备班、看守班、庶务班，由省抽调市、县、旗警特人员169人到木兰县，其中事件总指挥1名，省“特搜班”2名，庶务班2名，审讯班36名，看守班24名，检举（逮捕）班73名，使用当地密探联络员31名。就这样把一个预谋已久的大逮捕计划准备完毕了。

残酷镇压，血腥屠杀

伪滨江省警务厅派来的警特人员到木兰后，木兰县警务科又在全县抽调到140名警特人员参加大逮捕。将抽调的大批警特人员以班划分逮捕分担区，第一逮捕班在木兰县五站逮捕4名；第二、三班在石头河子和柳河地区逮捕24名；第六、七班在大贵、大板子两地逮捕25名，这是第一次第一期大检举（逮捕）。

5月25日，针对第一期逮捕漏掉的又实施了第二期大逮捕。两期在木兰县共逮捕爱国人士和群众251名。

东兴县两县共逮捕162名，其中姜家岗12名，新民地区13名，赵家店地区22名，满天地区78名，大贵地区7名，东兴北

二屯地区30名。

这些被逮捕人员都被送到木兰北大营进行关押、审讯。在木兰北大营设立十个“取调组”（审讯组）进行审讯，并由伪滨江省高级检察厅、高级法院进行起诉判刑。木兰的251名中，经过审讯在木兰和哈尔滨先后释放42名，在刑讯中死亡和判处死刑125名，判处有期徒刑84名。东兴县162名中放回12名，判处死刑44名，审讯中死亡5名，判处有期徒刑51名。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木兰县政协文史办供稿）

“三·一二”事件

齐述师　齐春才

1943年3月12日，伪三江省警务厅驻防在桦川县四合屯的山林警察队队长姜永茂，不甘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打死日本人副队长伊色，率队起义，准备投奔抗日联军。但由于没有党的领导，缺乏周密计划和妥善准备，在日伪军、警、宪、特的围追堵截下，姜永茂英勇牺牲，起义惨遭失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三·一二”事件。

一、姜永茂简介

姜永茂，人称“姜炮”，辽宁省西丰县人，1930年搬到黑龙江省林口县五道河子屯。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后，姜永茂的父亲与当地群众自发地组织起一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保安队。由于这个保安

队与当地土匪组织的大刀会有矛盾，所以在一次姜父去依兰开会时，大刀会乘机包围了五道河子屯，将姜永茂和部分队员抓去，并放火烧毁了姜家的房子。姜永茂的父亲开会回来后，虽然非常气愤，但为被抓去的队员们的安全着想，只好筹备一些大烟土，亲自送到大刀会。结果，大刀会将抓去的队员放了，却把姜永茂父子扣下。不久，大刀会又将其父杀害，把姜永茂打得昏死过去，扔到野外。姜永茂苏醒过来，爬到一个姓李的群众家中。因伤势过重，他又昏死过去。李家以为姜已死去，钉个棺材把他装好抬到山上，第二天，姜又苏醒过来，用力叩打棺材板，被放羊的小孩发现，李家又到山上把姜永茂背回来。

姜永茂在李家养伤半年，痊愈后无家可归，又急于为父老乡亲报仇，便参加了谢文东的队伍。姜在对日作战中英勇顽强，被提升为营长。日本驻军为了收降谢文东，将谢文东和姜永茂的家属抓去，押到依兰，然后给他们捎信劝降。威胁谢文东，如果不投降，就把其家属全部杀害。谢文东接到日方来到信后，为保全家人性命，派人到依兰探听情况。经了解，日本侵略者意在劝降，对其家属尚未决定杀害。谢文东便于1939年（康德6年）率姜永茂等人投降了日本。谢文东被日本侵略者安排到勃利县协和会当会长，姜永茂被委任为伪三江省警务厅山林警察队警尉衔队长。

姜永茂上任后不久，过去被日军打散的抗联人员尹国志、腾云珍、腾云起、聂永清、张江、张海等人，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捕，找到了姜永茂。姜永茂原是被迫投降，从中另有打算，正需要身边有些可靠的亲信，便将这些人全部安排在山林警察队。

二、率领起义

姜永茂被迫投降后，对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罪行

恨之入骨。他向队员们讲，必须组织起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才能有幸福。特别是山林警察队副队长伊色，对山林警察生活上克扣，精神上摧残，稍有不驯就拳打脚踢。山林警察对他恨之入骨，那些曾在抗联干过的人想找个机会把他干掉，姜永茂更是忍无可忍。

姜永茂和原抗联的尹国志、腾云珍、腾云起、张江、齐志海等人商量，决定率队起义，去苏联边境投奔抗联部队。起义时间决定在1943年3月，但因气候突然变化，又决定推迟起义时间。

就在这期间，参与起义密谋的齐志海指望升官发财，于3月12日（星期日）早晨，到长发屯警察署去告密。他走时被张江发现，张江马上报告了姜永茂。姜永茂分析形势紧迫，必须马上起义，否则将会全部被捕。于是，姜永茂告诉张江马上集合队伍，自己来到办公室处理副队长伊色。他看到伊色正在接电话，感到不容迟疑，立即开枪打死了伊色。伊色的老婆听到枪声赶来，也被姜永茂打死。然后，他又来到伊色的宿舍，把伊色的孩子摔在地上。

姜永茂打死伊色之后，下令打开枪库、子弹库，让队员们换上新枪，带足子弹，才正式宣布起义。他对大家说：愿意抗日的，就跟着队伍走，不愿意去的可以留下。然后，他率领29人，兵分两路奔赴七星砬子。

他们一路由四合屯出发，经杨家岗，到达子营；另一路，经高永禄屯到达子营，中午在达子营会合。为防止日军追击，他们会合后，一路上没有休息，直到晚7点钟到达了七星砬子。

三、七星砬子战斗

姜永茂率队起义后，留下的山林警察队员用电话报告了伪

三江省警务厅。警务厅当即调兵遣将，调动日伪军、警、宪、特600余人，对姜永茂进行围追堵截。

当晚10点钟，日军的追击部队便发现了这支起义队伍的驻地。因为天黑，一时没有进攻。

13日清晨，姜永茂发现被日伪军包围，通知队员作好战斗准备，组织突围。这时日伪军开始进攻，伪山林警察队在前面，日军在后边，并叫叛徒齐志海（警尉）向山上喊话，叫姜永茂放下武器投降。

姜永茂说："齐警尉，你是不是中国人？如果还有民族气节，你应当抗日！"

齐志海不喊了，继续往山上爬。

姜永茂又说："齐警尉，你再往上爬我就打死你！"齐志海又爬几步，被姜永茂一枪打死。

这天，日伪军接连发动几次进攻，都被起义队伍打退，每进攻一次，死伤都很严重。这一天共打死打伤日军和警察六十多人。

下午4点钟，日军调来了炮兵，开始炮轰。在炮轰中，姜永茂壮烈牺牲了，队员牺牲3人，姜永茂的妻子姜张氏也负了重伤。起义人员一天多没吃饭了，子弹也快打光了。

到晚上10点钟，日军停止了进攻。起义人员集合起来，开始突围。可是，冲了几次也没有冲出去。姜张氏说："我不能连累你们，你们给我补一枪赶快走，不然的话，我们都会死在这里。"姜张氏的弟弟张江，出于万般无奈，忍痛下手，在自己的亲姐姐姜张氏的头部补了一枪。

姜张氏死后，起义人员感到人多突围目标大，容易被敌人发现，还是分散为好，出去一个是一个。队员有的单走，也有的三四个人在一起，分散撤离七星砬子。

四、起义失败

张江领着姜永茂的儿子姜殿文、姜殿武，逃出了敌人的封锁线，在一个地窝棚里休息，又被敌人发现。他们打了几枪，敌人不知他们有多少人，没敢往里冲，便回去调兵。他们乘机跑出小棚子，走到天亮，在草地藏了一天。晚上张江说：你们两人是小孩，敌人不注意，你们先走，到申家店车站坐火车，再到勃利县姥姥家隐藏起来，以后我再找你们。结果，姜殿文兄弟二人在申家店车站被警察抓住送到佳木斯，关押在伪三江省警务厅。张江和他们分手后，在万宝屯南遇到了另一名起义人员胡发昌，于3月15日半夜一同到刘凤楼屯伪屯长王发家。王发把他们藏在屯东南墙外草垛里，然后跑到屯北酱油厂，打电话报告四合屯伪山林警察队。日本警官石元带领16名警察，由王发引路，来到隐藏地点。警察队架好机枪后喊话，没有回答，便打了两梭子弹，然后又抓来了十几个老百姓扒草垛。最后发现张江和胡发昌已在草垛里牺牲，手里还紧紧地攥着匣子枪。王发效忠日军“有功”，得了一张奖状。

其余起义人员突围后，有的走到半路上被警察、特务抓住，有的隐藏各地。伪三江省警务厅派出大批警察、特务、汉奸，在各个村屯、要道、车站、码头设卡堵截，先后抓捕17人。1943年6月，伪牡丹江高等法院派人来佳木斯审判，将17人全部判了死刑。伪三江省警务厅派50余名警察将17人押到四合屯东山上，枪杀后埋在一个坑内。姜殿文因年龄小，被判处有期徒刑，1945年“八·一五”解放后出狱，加入了我人民军队。

（摘自《佳木斯文史资料》第五辑）

抚远日伪时期大逮捕事件

韦稽通

1934年2月，日本侵略军侵入我国东北边陲抚远县全境。侵略者为了建立和巩固所谓“王道乐土”和“大东亚共荣圈”进而为建设进攻苏联的军事基地打基础。多年来，一方面派遣间谍，打入苏联境内，刺探军事情报，以便伺机采取军事入侵；另一方面又极力搜捕和消除苏联派来的和为苏联服务的特工人员。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以封锁军事秘密，避免阴谋败露。对我黑、乌两江下游的无辜人民，进行了残酷的统治和迫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抚远大逮捕事件。

一、发展特务网点，蓄谋已久

1938年（康德5年）5月7日，隶属三江省（佳木斯）宪兵队本部的同江宪兵分遣队，派来了一名日本忠实走狗薛昌荣。这是一个在伪满洲国新京（长春）关东军宪兵教习所专门受过三个月特务训练的日本特务。他被分配在同江县宪兵分遣队防谍班任下士宪补，负责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下游地区调查群众思想动态、组织发展特务、搜捕苏联地下情报人员和反满抗日爱国志士、审讯被捕群众，并给宪兵队里的日本人当翻译（1956年被人民政府处决）。在他任职的几年里，出卖民族，效忠日寇，为虎作伥，成为日寇残害中国人民的忠实骨干，充当破坏反满抗日运动的马前卒。在他活动的抚远、同江等地区，协助日本侵略者发展了仲维远、梁德进、刘兆福等38名特务（日本人称

特务为谍者)。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军在抚远县城设立的伪警察队特务股，下设特务分室。加上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派出人员（驻抚远特务机关长是日本人伏见青少佐)形成了多层次的特务网络，共同执行反苏防苏扼杀反满抗日力量的任务。他们采取威胁利诱手段，训练和利用中国人充当他们的“谍者”(情报员、工作员、密探)。1942年（康德9年)，特务薛昌荣受日本人的指使，于抚远镇建立了特务联络站，安排了特务工作员仲维远、刘兆福、汪秉志在抚远一带活动。同年6月9日，薛昌荣两次陪同日本特务佳木斯宪兵队本部特高课长佐藤和特务方岛到海青镇活动，随行的特务工作员有梁德进、于万伶、汪秉志、付××。并在海青先后建立了两处特务据点，一处是以特高课长佐藤的名字命名的“佐藤洋行”并挂上牌匾，其实它既不经商，更无洋商往来，是一所地道的特务办事处。另一处是海青的“福泰祥”，是当时被发展入伙的日本特务王吉廷的商号，明面经商，暗地里是日本特务在海青地区的第二个活动据点。大逮捕时，被派往东安镇、国富镇一带活动的日本特务，多在这里集散。

多系统的特务组织，分管抚远县境内城镇和乡村的特务组织，通过特务腿子在群众中搜集情报。1942年(康德9年)9月，在东安镇活动的密探姜世昌、张继仲就是根据日本宪兵加藤的指示，以在居民当中经常个月二十天不在家，或行踪不准确的人，视为通苏嫌疑。或被审查，或被逮捕。在海青马圈，当时特务设下了密探，监视江面上的一切活动。密探还经常混在渔民、农民群众中，从中发现苏谍线索。日特的大小头目，随身都带有大烟份（鸦片)，当时在东安镇地区活动的特务张国公，在受人民法庭审讯时自供说：在东安活动的特务，每人身上都各带5个大烟份，作为临时性奖励为他们效力的人用。特务们经

过密探暗查，各地都分别编造了“苏谍名簿”，三江省（佳木斯）日本宪兵队本部综合情况。于是黑乌两江下游的“肃正工作计划”炮制出笼，为抚远大逮捕事件作了充分准备。

二、大逮捕的经过

1943年（康德10年）第一次大逮捕开始。按照“肃正工作计划”，三江省日本宪兵队本部对我抚远境内划分三片，包片进行。佳木斯宪兵队本部负责东安镇地区；富锦宪兵分队担负国富镇地区；同江宪兵分遣队负责海青镇一带。各组都由日本宪兵特务统领。

8月份，由三江省宪兵队本部特高课长佐藤带领富锦宪兵分队汇同同江县宪兵分遣队共有日本宪兵特务十多人，中国宪补和朝鲜宪兵补十多人，一行乘船到海青镇，分住在“佐藤洋行”和“福泰祥”两处。被分派到东安镇的，由日本人加藤曹长率领，随行的有池部曹长，北奥队长，××伍长，松村宪兵补（朝鲜人），弘村翻译。中国籍特务由张国公宪补负责，随行有朱英宪补，密探姜士昌、张继仲。分到国富镇的有日本人平良、白宪补、梁德进、徐××、李××，还有一个女的。这些人乘坐客轮“三江”号来到国富镇，住在姜振山家。去外小山抓人的是宪兵队姓李的，文登岗抓人是白宪补和徐××，国富镇是日本人平良代理抓的。

留在海青的是在日本人石川军曹的带领下，有日本特务，还有朝鲜人宪兵补神农，有密探陈德山、王×，松村宪兵补、朱英宪补。薛昌荣宪补是协助石川负责在海青镇一片执行“肃正工作计划”的。当时在海青当地当了特务为这次逮捕效力的有王吉廷、李松有、王小脚（女）等。这第一次逮捕计划一个月完成。原来东安镇地区是由薛昌荣负责，这次分给佳木斯宪兵

队本部负担后，薛把逮捕名单交给了新分工负责的伪三江省宪兵本部一等宪补、下士伍长张国公（辽宁金县人，在日寇兵队担任防谍、思对、审讯、翻译、便衣侦察、搜捕、培养特务、建立特务网点工作，是抚远大逮捕事件重要罪犯之一，1960年被人民政府处决）。

当年9月底，大马哈渔期结束，薛昌荣跟“三江”客轮去东安镇联系。船从东安返回来的头一天，白宪补就把国富镇的人逮捕了，第二天，押到船上送到海青镇集中，船上已有东安镇地区被捕的人。到了海青，石川军曹带领特务押送被捕的人也都上了大船，日本特务将这些被捕的群众一律押送到佳木斯宪兵队和伪警务处监禁。

这第一次大逮捕，东安镇一带被捕10名，另有一名因拒捕被当场击毙。国富镇被捕的有邹殿章、阿根尼、赵太松、刘子美等10余名，海青共被捕了十二三人。

第二次大逮捕是1944年（康德11年），在这次大逮捕中，国富镇被捕的有毛楼氏（女）、王连喜、姜兴伦、姜兴坤、孙宪义等，里小山外小山等各一名，海青地区被捕的有霍振广、王义。小河子被捕的有刘汉臣、唐明轩、陈延富、尹长庚、张凤山等5人。

三、枉杀无辜、含恨九泉

在被捕的人中，有的是苏联情报员，大多数是农民。这些无辜群众，是被诬告陷害而身陷囹圄以致丧失生命的。海青镇的老人王富回忆说：霍振广被捕完全是被坏人陷害的。霍原来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是跟人当佣工的。他被捕的原因，是叫李林的老婆——小花陷害的。小花两口子都抽大烟，没有钱曾多次向霍振广借，霍的钱被借空了没有钱借了，小花说：“你

不借，我到警察队告你，说你通苏，让你蹲巴篱子”（即蹲监狱）。果然，隔了两天，便衣特务真的到地里把霍振广抓起来。霍说：“我又没干过啥事，为啥抓我？”不由分说，警察从霍的上衣口袋里翻出了苏联人吃的“咖啡”，弄得霍懵头转向。他哪知道，这是小花事先设下的圈套，倒是真的把霍振广抓走了。从此这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音信渺然。当时他只有三十五六岁。

被害者张魁武之妻控诉说：“我男人本是打鱼为生，康德10年8月份，他在别拉洪江边下网，有人对我丈夫说，让我丈夫躲一躲，我夫说没干过坏事不用躲。结果被抓进了‘佐藤洋行’，后来被押上船，和王喜伶戴一付手铐，送走了。过后，听说他只是因为和‘毛楼氏’（华籍苏联妇女）学过苏联话，被赵永海听到后报告宪兵队的。”

被捕的群众，都被押送到三江省（佳木斯）宪兵队和伪市警务厅。被多次审讯，酷刑拷打，被绑吊、跪锁链、竹签扎、灌凉水、烧大腿、烧阴茎头等惨无人道的刑法。被抓去的海青农民陈文清，因熬刑不过而撞死狱中，以示抗议。张魁武、姜兴坤、王文会、张辉、尤开礼等由于受刑伤重，生命垂危，释放后死于途中。东安镇的付铁蛋释放后被日寇利用。被释放后的幸存者吴化宝回忆（1958年）说：伪康德11年秋后，“白露”那天，我住在大岗地营（归蒿通管），说是县里来电话传我到县里。由国富镇警察高藤、李战鳌押送，把我和姜兴坤、王汉臣、孙宪义、张文会、王寿浩等送经海青到抚远，后来转到同江宪兵队，薛昌荣把我的衣服扒光，绑了三道、蒙上脸，用凉水灌，皮鞭抽，竹板打，还要填大江，行凶的还有一个日本人。薛昌荣、梁德进用柳木棒子打了几顿，我昏过去几次。打完后，有个于麻子（于万伶）的特务，让我给他们干事。桌上摆的“福膏”（大烟）和手枪，说干了以后，能穿呢子、穿好布，不穿更生布

了，你不干就枪毙了你，我到底也没干。

日本侵略者在统治抚远的十几年时间里，共计逮捕了一百零几人，在1943年和1944年（康德10年——康德11年）大逮捕的高潮时期，这两年被捕的有据可查66人（其中1943年捕的52人，1944年捕的14人），下落不明的（没有下落，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有的是死在监内或是扔狗圈喂狼狗，有的送哈尔滨平房细菌杀人试验工厂）38人。被严刑拷打后释放死于途中5名，释放生还的24名（其中1名被日寇利用当了特务）。

由于日寇垂死挣扎，丧心病狂，不惜枉杀无辜，大捕出手，造成大量边境居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人去室空。剩下的边民人心惶惶，提心吊胆，尤如大祸临头，不少人搬离边境另谋生路。据原来国富镇老户刘宝玉、邹成礼老人回忆说：大逮捕前国富镇的居民有二十八九户，经过三四年时间，抓的抓，死的死，搬的搬，到光复前仅剩下四五户人家了。

笔者附注：本文是根据亲自参加此案的日本特务张国公、薛昌荣罪犯的卷宗择抄整理的并得到老同志玄大享、郑士和、郝兴春夫妇以及文中所提到的受害人证言，以及知情老人提供的材料整理而成。

抚远县被捕群众登记表

姓　名	被捕日期	地　点	结　果
邹殿章	1943年9月初	国富镇	处　死
李学美	1943年9月	国富镇	处　死
赵太松	1943年9月	国富镇	处　死
王培刚	1943年9月	国富镇	处　死
何根宁	1943年9月	国富镇	处　死
刘永吉	1943年9月	国富镇	处　死
刘子美	1943年9月	国富镇	处　死
陈全志	1943年9月	国富镇	处　死
李全奎	1943年9月	国富镇	处　死
王德林	1943年9月	国富镇	处　死
关喜才	1943年9月	国富镇	释后死
关振太	1943年9月	国富镇	处　死
邢全山	1943年9月	文登岗	处　死
邹化庆	1943年9月	文登岗	处　死
王　勇	1943年9月	文登岗	处　死
徐殿喜	1943年9月	文登岗	处　死
王洪玉	1943年9月	文登岗	处　死

姓　名	被捕日期	地　点	结　果
吕化秀	1943年9月初	文登岗	释　放
姜兴伦	1944年9月	国富镇　大岗	释　放
孙宪义	1944年9月	国富镇　大岗	释　放
王汉臣	1944年9月	国富镇　大岗	处　死
吴化宝	1944年9月	国富镇　大岗	释　放
张文惠	1944年9月	外小山	释　放
王寿浩	1944年9月	里小山	释　放
王连喜	1944年5月	国富镇	释　放
毛楼氏（女）	1944年5月	国富镇	释　放
姜兴坤	1944年7月	国富镇　大岗	处　死
王　义	1944年4月	亮子里	释　放
石永成	1943年9月	海青镇	释　放
孙登俊	1943年9月	海青镇	释　放
金太龙	1943年9月	海青镇	释　放
陈文青	1943年9月	马小山	死　亡
霍振广	1943年9月	亮子里	死　亡
张魁武	1943年9月	海青镇	释放归途死亡

姓　名	被捕日期	地　点	结　果
吕炳仁	1943年9月	海青镇	处　死
杨振山	1943年9月	海青镇	处　死
杨炳仁	1943年9月	海青镇	释　放
孙子明	1943年9月	海青镇	释　放
李　林	1943年9月	海青镇	释　放
刘喜林	1943年9月	海青镇	释　放
赵文财	1943年9月	里小山　杨木林	释　放
孙同章	1943年9月	里小山	处　死
王明斋	1943年9月	东安镇	释　放
曲皮匠	1943年9月	东安镇	处　死
吴道新	1943年9月	东安镇	释　放
彭凤×	1943年9月	东安镇	处　死
李凤才	1943年9月	东安镇	释　放
毕万有	1943年9月	东安镇	处　死
宋作仁	1943年9月	东安镇	处　死
赵希和	1943年9月	东安镇	处　死
付铁蛋	1943年9月	东安镇	放后被宪兵队利用

姓　名	被捕日期	地　点	结　果
于老俩	1943年9月	东安镇	处　死
曲传山	1943年9月	东安镇	被保释放
姜庆玉	1943年8月	勤得利	处　死
尤开礼	1943年8月	下八岔	释放后死于途中
程彦福	1944年	小河子	释　放
刘汉臣	1944年	小河子	死　亡
唐明轩	1944年	小河子	死　亡
尹长庚	1944年	小河子	死　亡
张凤山	1944年	小河子	死　亡
于今堂	1943年	小河子	死　亡
丁祥子	1943年	小河子	死　亡
潘玉福	1943年	小河子	死　亡
卜宪龙	1943年	小河子	死　亡
罗　斌	1943年	小河子	释　放

凌云山警防所援抗人员被诱捕惨遭杀害的事件

阎绍才口述　张殿安　赵文清整理

伪满康德9年（1942年），恰是大东亚战争爆发的第二年，我东北抗日联军正处于浴血奋战艰苦卓绝的境地，日本侵略者大施魔威，频繁地向我抗联部队疯狂讨伐围剿阶段，铁骊县（今铁力县）凌云山警防所，发生一起支援抗联朴吉松部队人员被诱捕入狱，判处绞刑及无期徒刑骇人听闻的事件。

援　抗

我（阎绍长）原来是种地农民，伪满康德7年，铁骊县自卫团派我到何凤楼警察署，参加训练不几天，便把我分配到凌云山警防所（以后改为森林警察队）当警士，每天的任务就是站岗放哨。那时警防所所长刘纯金和我抗联朴吉松暗中有联系，对抗联有支援，曾送给连珠、湖北造、德枪等和1000多发子弹。还有洋磁碗120个，胶皮鞋40多双，高粱米等援抗物资。有一次是用两匹马驮着，由刘纯金找木把头魏忠2人，利用夜间偷偷给抗联送物资。他们整整走了一宿，送到凌云山的南边石头场子地方，有朴主任的队伍接应。

原来刘纯金和抗联早有联系，以后和我在一块当警察的徐惠民又和抗联朴主任接上头，朴主任交给徐惠民任务，是找几个可靠的人给抗联做点工作，不久徐找曹振清、吴春荣、陈洪福、刘凤歧等人，徐交给我的任务是挂旗。暗自规定，一旦有警察或讨伐队上山，巡察搜索，我就把伪满洲国国旗高高地挂

在我们站岗的望水楼上（了望塔）。表面上是“欢迎”他们的到来，实际是暗示抗联，让他们从远处就知道有警察或讨伐队的到来，以便做防御准备。我一直是做这个暗中通报工作。那时，在处于敌强我弱的局面，朴主任带领的抗联队伍仅剩四五十人，从人力和武器装备上都抵不过讨伐队。讨伐队上山常常扑空，疑惑不解，但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对警防所起了疑心。我们这7个人，平时不发生横的关系，从被诱捕以后，方知他们几个也和我一样，各自都有具体的援抗任务。

诱　捕

我们被诱捕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伪满康德9年旧历四月的一天中午12点多钟，在凌云山警防所门前，突然出现一辆大车，从车上跳下一帮荷枪实弹的县警务科警察，带队的是日本警官和县警察游击队长吕洪福。日本警官挥手示意，众警察如临大敌，立刻拉开了迎战的架式，迅速地架起了轻机枪，堵住了警防所门口，四下里布满了警察，形成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包围圈。日本警官和吕洪福队长，大步流星地闯进警防所的屋内，便下令紧急集合，当场宣布“战斗令”。吕队长说：你们这20多人全部整装，穿好棉衣，不用带枪，先到县警务科，给你们发枪，去北河讨伐土匪（指抗联）。说完了就迫不及待地催促我们上了汽车，到县以后，就把我们几个拨离出来，押到警察署留置场（看守所），和抗联无关的警察，全部送回警防所。

刑　审

第一次过堂审讯，一个面目狰狞的日本警官，用不流利的中国话审问我：“你的，怎么样的，和共匪朴的联络的？”我没承认他提出的质问，我说：我没和他们联系。日本警官一气之

下说："你的，情况的，我们的统统的知道，不说的，死了死了的有！"我说：从来就不认识姓朴的，也没见过，这怎能有联系呢？日本警官气急败坏地命令翻译官，"他的说了没有，刑的大大的给"。开始给我灌洋（煤）油、辣椒水，我还是不说，接着就往我身上浇热水，还用木棒子打脑袋，把我的脑袋打了一个坑，无情的刑法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我的头部至今还有伤痕。最后一次过堂审讯，是在一个夜间进行的，一宿突击性地审了7次，我死不承认和抗联有联系。日本翻译官帮腔说："你用挂旗的方法，和抗联联络，难道没有这类事情吗？"我一听他们知道了，我就更不能说了，我想，要吐露真情，是非死不可，要是死不招供，也许还能有一条活路，尽管我不承认，他们还是不肯放过我。

判　　刑

在我们被捕的前一个月，凌云山警防所所长刘纯金，以调动工作为名，也被捕押到警务科。为了控制警防所与抗联联系的凌云山据点，县里把捕我们的吕洪福任命为凌云山警防所所长。

我们被捕的7个人，在警务科押了半个多月，经过多次审讯，也排除不了"通匪"罪。后来给我们7个人都带上了手铐和重刑脚镣子，押解到哈尔滨高等法院，囚禁在香坊监狱。过了几天，把我们从监狱里提出来，用汽车拉到法院受审，按人分别对照了案情，然后又把我们送回监狱。日隔不久，又把我们从监狱里提出来，这次没有车送，走着去的，由于脚镣子太重，把我们脚脖子都磨坏了。这一次是正式开庭宣判，法官穿着法衣严肃地坐在上边，逐一宣布了"罪状"。判处刘纯金、徐惠民、吴春荣3人反满抗日"通匪叛徒罪"，处以绞刑；给我定了一个

反满抗日挂旗“叛徒罪”，判处无期徒刑；曹振清、陈洪福、刘凤岐亦和我同类罪，判处无期徒刑。

释　放

我自从被捕入狱到释放，共过了3年4个月非人的监狱生活。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灾难的祖国得到光复，我们被判处无期徒刑的4人中，我和曹振清被释放出狱，又回到了铁骊县。陈洪福和刘凤岐死在狱中。思想起来，若不是日本鬼子倒台，共产党的到来，我这条老命早已不在人间了。

（摘自《伊春文史资料》第一辑，铁力县政协供稿）

四

残害、屠杀工人的惨案

对“特殊工人”的残害

抚顺煤矿“特殊工人”中我被俘人员的斗争

尉常荣

“特殊工人”系指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以战争手段从关内抓到东北服苦役的“工人”。“特殊工人”的成份比较复杂，其中有我军被俘人员和解放区政权组织、群众组织的工作人员。此外，还包括被俘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和平民百姓等。在抚顺的我被俘人员，一部分直接来自关内敌俘虏收容所，大部分来自黑龙江省。这部分人先在日军的军事工程和日伪指定的为战争服务的重要产业做苦工，后又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做“特殊工人”，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

“特殊工人”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扩大侵华战争中出现的，是日本侵略者在我国犯下的严重罪行。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进攻苏联，在东北大肆推行大规模掠夺的“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军事工程建设的“北边振兴计划”，急需数以万计的工人。然而东北地区劳动力严重不足，为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关东军于1941年4月5日，同驻华北日军达成了关于紧急动员工人入“满”的协议，明文规定把战俘和其他关内被捕人员押送到东北，当“特殊工人”。

抚顺炭矿从1940年12月龙凤采炭所接受168名“特殊工人”始，至1941年12月底，来抚“特殊工人”总数达6 312人。1942年6月30日后，又按伪满洲国民生部审议的所谓《辅导工人处理要领》，将“特殊工人”中的战俘称“辅导工人”，先后分四批被押送到抚顺炭矿，其中前三批的4 327人中，有我八路军干部48人，战士1 511人。

“特殊工人”到抚顺炭矿后，日伪当局首先进行身份调查，取指纹、照相、登记注册，一律被集中在指定的区域内居住，其宿舍周围有铁丝网，由日本人看管。“特殊工人”没有人身自由，上下班都有武装人员押送，也没有通信自由，来往书信包裹都要经过严格检查。1941年1月，老虎台采炭所250余名“特殊工人”集体逃跑，日警务处特务科长警佐今泉丰太郎接到通报后，立即率领20名日本警备队员和一批警察跟踪追击。追到抚顺西部制铁工厂附近时，看到逃跑的“特殊工人”正在强渡浑河，刽子手们立即架起机枪扫射，连打死带淹死，当场就牺牲60余名。后来追到李石寨又开枪打死两名，并把其余逃跑者都抓了回来。

为便于管理，日伪按军队的组织形式，把“特殊工人”编成中队（200人以上）和小队（50人以上）。队长由“特殊工人”中原来是军官或有影响的人物担任，并由日伪任命。日伪对他们既严密监视，又给以较“优厚”的待遇，以此收买、拉拢这些人，利用他们的威信去拢络其他“特殊工人”。

“特殊工人”集中在西露开矿事务所、大山、老虎台、龙凤等采炭所，从事最艰苦的采炭掘进、支柱、线路等作业，在日伪军、警、宪、特的监视下，每天要从事10至12小时的繁重体力劳动，劳动强度之大达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特殊工人”的工资很低，一般采炭工平均每日一元八角左右，其他工人一元六角左右。但“特殊工人”每日只能拿到五角的饭票，这种饭

票只能在满铁经营的工人食堂和卖店里使用。当时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特殊工人”定量很低，伙食极其恶劣，毫无营养可言，他们吃不饱，也穿不暖，经常光着膀子，赤着脚在矿井下劳动。他们居住的条件也很差，传染病经常流行，死人的事经常发生。1943年4、5月间，老虎台采炭所万达屋工人宿舍发生霍乱病，因得不到治疗，有几十名工人病死。日伪当局怕霍乱蔓延，影响煤炭生产，竟将这一地区封锁起来，命令万达屋诊疗所日本医师注射毒药将10名霍乱病患者毒死。

1941年6月9日，日伪当局搞了一份《特殊工人对策备忘录》，提出在有“特殊工人”配属单位设置侦谍工作网，对“特殊工人”进行谍报、阴谋和宣传三方面的秘密战。同年8月15日，为加强战时的防卫工作，抚顺炭矿成立了特务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对“特殊工人”的“宣传”和监视。同年8月27日，抚顺炭矿又制定了《抚顺炭矿工人动向取缔计划》，建立炭矿警备队，组织预备队，并将警护团的一部分武装起来，用以对付“特殊工人”，镇压工人运动。1942年7月以后，抚顺炭矿又设置了工人辅导班、警备员、防卫班等反动机构，以加强对“特殊工人”的管理和监视。1944年，日伪在奉吉铁路沿线的章党站、前甸子站、抚顺城站，及奉抚沿线的抚顺站、大官屯站、瓢儿屯站、李石寨站和奉抚路各汽车站，派遣移动防卫员，在铁道警护队的协助下，负责防止“特殊工人”逃跑。

1943年11月，日本侵略者将400余名有投苏嫌疑的“特殊工人”，从与苏联接壤的黑龙江省东宁县，押送到抚顺老虎台采炭所万达屋井服苦役。这400余人中有八路军军政人员（多半是决死一纵队的干部和战士），还有国民党被俘的官兵等。他们被编为一个大队，大队长陈多，下设三个小队，第一小队队长鲁

福祥，第二小队队长孟昭林，第三小队队长张相哉（我决死一纵队连长）。

这400余名“特殊工人”在矿井下从事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但其劳动所得全被炭矿占有，日本人不给他们开工资，不给他们发衣服、靴子等劳动保护品。在把头盘剥下，他们得到的米、油、酒等生活必需品寥寥无几，难以维持生活。为此，“特殊工人”向劳务系提出强烈要求：“给东西不经过劳务系把头手，同洋工待遇一样”。日伪当局长期不予答复。于是“特殊工人”便三五人合在一起，拿炭矿的一些东西，想方设法到街上卖，弄些钱买生活必需品。日本人和把头发现后，对他们非打即骂，严加惩处，致使“特殊工人”与日伪的矛盾日益激化。

1944年2、3月间，三小队在五区采煤，掌子里到处都是水，工人没穿靴子，衣服单薄，无法进行生产，加之炭矿一直没给他们开工资、发衣服，所以“特殊工人”们的反抗情绪十分高涨，纷纷提出：“不发工资，不给衣服就休工”。为了发动工人开展斗争，张相哉召集鲁福祥、孟昭林开会，决定向劳务系提出工人的要求，如不答应，就领导工人罢工。会后，他们到劳务系交涉，明确表示：“劳务系不给开资，不发衣服，就不上班”。劳务系不予理睬。当夜，张相哉等三位队长把罢工的决定告诉了全体工人。第二天早晨，在张相哉同志的领导下，罢工开始了，400余名“特殊工人”都聚集在大房子里，没有一个人下矿井干活。把头看到这一情况，立即到劳务系向鬼子冈村报告。冈村一听也慌了神，来到大房子，强作笑脸，点头哈腰地讲了一些好话，哄骗工人上班，说上了班就给开资、发衣服。工人们谁也不听他的鬼话，都说要叫我们上班必须把工资、衣服拿来，不开资，不发衣服，我们就不上班。冈村气得火冒三丈，他凶相毕露，“刷”地抽出洋刀，跳到桌子上，口出狂言，命令

大家立即上班。工人们被激怒了，他们高举拳头，一齐上前，把他包围起来，怒目而视，声言和他拼命。冈村害怕了，脸色蜡黄，举起的洋刀不由自主地放了下来，但还是威胁说："我死了不要紧，你们中国人不知要死多少！"工人们毫不畏惧，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怕死！"冈村一看不好，慌慌张张地跳下桌，从人群中钻出去逃跑了。工人们见了，无不拍手称快。最后鬼子屈服了，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补发了工资，发给了衣服。"特殊工人"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特殊工人"的斗争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惧，他们暗地里逮捕了罢工领导人张相哉同志，并把他关进新屯矫正辅导院。尽管如此，"特殊工人"没有屈服，仍然继续坚持斗争。

1943年冬，天气十分寒冷，为了解决取暖问题，刘兴起同志让白同仁、杨长海从矿坑捎些煤回来生炉子、烧炕。这两名工人背煤往回走时，被日本人渡边发现了，他把这两名工人领到劳务系，说他俩偷煤，把他俩打得死去活来。刘兴起同志立即组织六七十名工人赶到劳务系，痛打了渡边，砸了劳务系，救出了白同仁和杨长海。事情发生后，一位老工人十分关切地给刘兴起同志弄了一张通行证，让他贴上照片，拿着赶快逃跑，但刘兴起同志没有走。第二年春，日本人突然把打渡边砸劳务系的几十名工人都抓了起来，带到警务处，对他们严刑审讯，最后把刘兴起、白同仁和崔秀奎三人投入抚顺监狱。

1944年2、3月间，夏俊卿同志在龙凤戏院子看戏，当坐在他身边的那个人了解到他是我被俘人员后，便小声地和他攀谈起来。他对夏俊卿同志说，他叫李状太，是冀南军区政治部的，这次奉上级的命令来抚顺，是为了动员和组织被俘的同志逃走，先到阜新南山，然后回部队。他比较详细地说明了逃走的路线，注意事项和到南山后接头的方法。夏俊卿同志听了以后，好象

遇到救星，非常高兴，跑回大房子后，就把这件事和宋庆昌、高成章、严迟峰等人讲了。同志们听了以后欣喜若狂，谁也不愿再给日本人干活了，恨不得一下逃离抚顺，返回部队。宋庆昌、马振江等同志立即进行秘密串联，要大家准备食品，准备随身携带的武器，争取尽快行动。由于警惕性不高，这件事被四小队的李文俊知道了。李文俊是个伪宪兵，因贪污被送到龙凤矿，和“特殊工人”一起干活，由于他和严迟峰闹过纠纷，有仇，就把严迟峰告了。严迟峰被捕后，受刑招供。接着，日本人把小队长以上的“特殊工人”全抓了起来。经过一个月的严刑审讯，最后以政治犯的罪名，判处宋庆昌、夏俊卿等人有期徒刑，并把他们送交新屯矫正辅导院关押起来。

宋庆昌等人被关押起来以后，我被俘人员不畏强暴，仍然继续坚持同敌人作斗争。马振江同志经常秘密召开会议，找人个别谈话，给大家讲形势，讲毛主席的著作《论持久战》坚定大家信心，与敌人斗争到底。在他的发动和组织下，我被俘人员经常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秘密地进行革命宣传。一次，十小队队长戴玉文，带领5名工人与敌人展开搏斗，打死1名日本人和2名警察，后逃离抚顺。敌人发狂了，竟以所谓“抚顺龙凤地区鼠疫检查”为名，挨门挨户地翻箱倒柜，进行大搜查，结果有34人先后被捕，并遭到了严刑拷打，然后被关进了矫正辅导院。

为了防止“特殊工人”闹事，日伪在工人宿舍周围增设了一道电网，并派出武装人员巡逻、监视，严禁“特殊工人”随意行动。在这异常困难的情况下，马振江同志及时召开秘密会议，鼓励大家坚持斗争，“拿出在关内抗战打日本时的精神来，坚决同日本侵略者斗到底”。1944年冬的一天深夜，小队长崔云桂带领40余名工人，冲破层层封锁，砸了一家日本商店，把店

里的东西拿出来，分给了当地群众，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给了日伪当局以有力打击。

我被俘人员被关进监狱和矫正辅导院后，仍然继续坚持同敌人作斗争。宋庆昌同志在矫正辅导院又很快团结了一些人，并以怠工的形式进行斗争。原冀东八分区的张继武同志是个副营长，他趁敌人不备，夺下了看守的枪，然后带领几个同志暴动逃走。可惜枪内无子弹，结果暴动失败，被抓了回来，遭到残酷迫害。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日军节节败退，这时，日本人也不让他们干活了，把他们全锁在牢房里。不久，日本人也看不见了，只有伪监警在看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想离开辅导院，到外面去参加斗争，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但辅导院是铁窗、铁门，周围有电网、深沟，还有岗哨、流动哨。经过研究，大家一致同意集体暴动，并想出了冲出去的办法。最后在宋庆昌同志的率领下，人们冒着生命危险，砸碎铁锁，打开牢门，终于逃出了虎口，获得了自由。

1941年11月至12月这两月中，我晋绥军几百名被俘人员，被日本侵略者由山西省太原集中营分批押送到抚顺炭矿老虎台采炭所万达屋井当"特殊工人"。当时在万达屋工人宿舍一一八栋及其附近居住的"特殊工人"中，有晋绥军二一二旅本部作战参谋南品同志（原名王敬堂）①，二一二旅政治部秘书马苏义同志（在抚顺化名杨三春）②，二一二旅五十六团副团长熊吉顺同志。这3位同志于11月12日到抚顺后，就急切地想找地下党

① 南品，1934年入党，曾任我军二一二旅侦察科长、作战参谋等职。1945年返回部队后，其党籍被恢复。党龄从1934年4月入党之日算起。1961年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学院训练部部长，大校军衔。

② 马苏义，1940年7月入党，曾任我军二一二旅政治部秘书等职。1942年11月返回部队后，其党籍被恢复，党龄从1940年7月入党之日算起。1961年他任武汉军区文化学校政治部副主任。

组织接关系，以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斗争。当时，日本人对我被擒人员监视得很严，尽管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但终未能找到地下党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南品等同志一致认为，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持斗争，而要斗争就必须组织起来。于是他们同有关党员商量，秘密地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党支部的工作方针是“团结被俘人员，继续与敌人斗争，继续为党工作”。

我被俘同志每天要在矿井下从事10余小时的繁重劳动，睡眠不足，吃不饱，穿不暖，加之居住条件极其恶劣，生病的人日益增多，大家都眼睁睁地看着生病的同志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日本人不仅不把牺牲的同志安葬好，反而把他们的遗体弄到外面，一层一层地垛起来，堆放在我被俘人员面前。大家见了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提出“宁可砸死，也不愿等死”、“争取英勇的死，反对屈辱的生”！都想尽快地逃离虎口，返回部队，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党支部根据同志们的要求，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逃走问题。最后决定在18日领工资后，尽快地组织工人暴动逃走。

为了争取胜利，在一切准备就序的基础上，党支部又秘密地召开了会议，制定了暴动的行动计划：1. 向热河方面靠近（因热河有我部队），争取尽快地和我们的部队取得联系。行动的路线是“从抚顺出发后，先向西北方前进，经过石贯屯、乱石山、大屯、卧牛石、大洽进入兴安南省的仓皇庙、前赖三台、东哈拉勿素，进入白杏吐，由该处前往兴安西省或热河省”①。2. 由于情况不熟悉，应先进山再摸底，不行也便于和敌周旋。3. 开始不作大的惊动敌人的活动，以便能迅速摆脱敌人，隐蔽入

① 见抚总庶文01第6号11/54《特殊工人不稳定集团逃走并检举の（第二报）》。

山，有利活动”①。为适应新的情况，支部又作了分工。熊言顺同志负责全面工作（后他未参加暴动，不久牺牲于万达屋），南品同志负责军事指挥，高光鉴同志负责宣传工作。马苏义和李新民二同志的工作未变动。这次会议前后，在高光鉴同志的组织下，写了大批传单，准备在沿途散发。传单上写了下列口号："工友们团结起来吧，向抽吸我们血膏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开战吧！""配给制就是最压迫剥削我们的最高表现！""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吧，为求自己的自由和解放向奴役统治我们的敌人进行斗争！"

1941年12月21日晚9时，暴动开始了。在夜幕的掩护下，暴动工人手持扎枪铁棒等武器，三三五五秘密地经过万达屋菜市场北侧，向龚家旬汇集。队伍集齐后，在南品等同志的带领下，首先破坏了电网，然后非常有秩序地向北挺进。深夜11时到达浑河岸边。这时浑河已结冰，尚未冻实，一踩上去就落入水中，弄得满身是冰水。为了迅速逃离虎口，加快进军速度，他们不怕天寒地冻，纷纷跳入齐腰深的冰水中，用铁棒探路，涉水而过。过河后，北风怒吼，每个人的衣裤都结了冰，异常寒冷，行动十分不便。但他们的血是沸腾的，情绪十分饱满，没有一个人叫苦，都精神抖擞地向前进。暴动大军于22日1时许，到达前甸子村东二道房屯，在那里找了1名叫邵袭麟的农民作向导。后经鲍家屯，于2时许到靠山屯，又找了1名叫王子荣的农民作向导。在此以后，南品同志拿着指南针在前面带路，于清晨6时许到达三家子村。这时晨曦初起，虹云焕彩，已经天明了。为了防止暴露目标，队伍开进一个大院进行休整。

22日早5时20分，王子荣的家属到抚顺城警察署前甸子分

① 见南品同志的《第二次回忆1941年特殊工人活动情况》（未刊稿）。

驻所报告，说八路军夜里从靠山屯路过，并将王子荣带走。前甸子分驻所马上向上级报告这一情况，反动当局闻讯后，惊恐万状，立即通报周围各地宣布戒严，封锁一切交通要道，并中断了山海关——东北的铁路交通。群众听到我被俘人员暴动的消息，奔走相告，无不拍手称快，一致赞扬说："八路军真行，敢暴动，有骨气！"抚顺城警察署接到急报告，紧急召集20余名警察，组成讨伐队，乘汽车向三家子扑去。8点30分，暴动工人正在大院里吃早饭，忽听见远处传来了汽车马达声，知道敌人来了。南品同志立即指挥队伍从大院撤出，向北转移，并迅速地占领了北山，准备与敌战斗。敌人看到暴动工人后，立即从汽车上跳下来，齐向北山涌去，很快地把北山包围起来，并在山脚下架起机枪，疯狂地向山上扫射，一时间，三家子村硝烟弥漫，枪声大作。暴动工人手中没有枪炮，所占的又是一座秃山，难于隐蔽接近敌人，只能在沟膛里跑动，与敌周旋，伺机行动。敌人逐渐缩小包围圈，最后，暴动工人有3人牺牲，40人被捕，其余逃跑。接着，敌人于附近地区继续搜查，第二天上午又捕获9名暴动者，都送进抚顺监狱。

24日，反动当局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工人暴动一案。会后，抚顺县警务科、抚顺城警务署、抚顺市警务处特务科和抚顺宪兵分遣队的49名警察、特务和宪兵，分别深入各地，对工人暴动一案进行追查，找证人，取证据，查与暴动工人有牵连的人和单位。

被捕工人在审讯中遭到了严刑拷打，敌人逼他们说出暴动的领导人，但这些同志宁死不屈。南品等支部领导同志暗中商量，决定把暴动的领导人定为死者王振（临时编造的名），将责任都往他一个人身上推。他们设法把支部的这一决定告诉同志们，并鼓励他们要严守机密，坚持同敌人斗争到底。就这样，在

审问时，大家一个调，都说："想回家，到关内去，跟着别人跑出来的，领头的是王振"。敌人听了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给他们加刑，什么皮鞭抽、镐把打、灌凉水、上大挂、冷冻、过电等酷刑都用上了。这更激怒了被捕的同志，他们抱着同生共死的决心准备就义，因此都挺上了，就是不交代，都认为"横竖就是一条命"，任你随意用刑。有的同志被打得晕倒在地，几十分钟不省人事，但被水泼醒后，仍然坚持说暴动的领导人是王振。于是暴戾的刽子手更加凶狠地摧残我被捕同志，把他们打得死来活去。后来由于个别群众受不了酷刑，讲了一些真情，加之敌人从三家子村弄来6个人到被捕工人中辨认，指明了南品等同志是暴动的领导人。南品等同志暗中商量，认为再隐瞒下去，会使同志们反复受刑，付出更大的代价，"不如以自己的死，换取多数同志的活"。于是由南品同志用铅笔写了一封信："诸位：对不起，为了我们祖国的解放和自己自由，而要挣扎到最后一分钟。因此不得不和最亲爱的伙伴们告别了，希望你们在不久的将来也能一样地走在为祖国胜利的光明的道路上，做一个万古流芳的民族英雄。胜利就在我们眼前，要记住，牺牲自己才能换取光荣和幸福。别了，在胜利的大道上再会吧！"这封信交给同志们以后，南品、高光鉴和李新民3同志指着其他被捕同志，傲然地向敌人宣布道："他们参加暴动完全是我们命令的，我们是指挥者，与他们无关！"于是，两个来月的严刑审讯结束了，南品等3同志以暴动主谋的罪名被关押起来，其他46名暴动工人"经严厉说谕、训戒"后，于2月10日被"释放"，回万达屋。

我被俘人员回万达屋以后，敌人把他们一律打发到井下，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不准他们请假、外出，连一天休息的时间也不给。把头和管帐先生天天到大房子里查看，驱赶他们下

井劳动。对病号，不是打就是骂，百般刁难，残酷折磨。敌人还派一名原国民党军队的少校营长住在大房子里，当房长，日夜监视他们。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营养的严重缺乏，使得多人生病，以致病死。党员梁义江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折磨死的。

在这种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为了把广大党员和群众组织起来，继续坚持斗争，经马苏义、吕希超、贾奎来等几名党员同志商量，又秘密地建立了临时党支部，由马苏义同志任书记。

临时党支部建立后，通过个别谈话，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暴动失败的教训，使大家深刻地认识到，这次暴动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对东北的情况了解得不够充分，没有看到敌人过于强大，统治极其严密，交通十分方便等因素，错把东北和关内一样看待，以为只要进山行动就可以自如了。这种想法过于天真，不符合实际。加之支部领导，党员和群众存在有严重的急躁情绪，准备不充分，结果导致失败。暴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它是惊天动地的英雄行为，给了敌人以有力的打击，扩大了党的影响，充分反映了我广大被俘同志不屈不挠，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1942年开春后，由于“特殊工人”挣的钱有限，不能换季，大家仍穿着破烂不堪、不能遮体的棉衣，弄得人不象人，鬼不象鬼，十分难看，群众对此不满，怨气冲天。为了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斗争，临时党支部提出了“反对打骂争人权，反对饥饿争生存”的斗争口号，要求反动当局给工人增加工资，医治疾病，保障工人的生命安全，改变童工的号头。临时党支部提出的口号和要求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日本人怕事情闹大了，影响煤炭生产，被迫答应给工人提高工资，改变几个童工的号头，同意给工人治病，送李关生进抚顺医院住院治病。“特殊工人”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为了和抚顺的地下党组织接关系，更加深入地开展革命斗争，临时党支部多次派人到外面去寻找线索，进行联系，但始终没有找到地下党组织的同志。鉴于这种情况，党支部决定仍组织大家逃跑，回部队去干革命，方法是把人员分散开来行动，两三个人结合在一起，各自想办法，找关系，准备好了就走。

临时党支部的决定宣布后，党员和群众分头作准备，他们一方面继续下井劳动，积攒路费，并麻痹敌人，一方面了解情况，寻找关系。一次，贾奎来和田玉中二同志去火车站探路被敌人抓住了，坐了两天牢，被把头领回来以后，又挨了一顿打。尽管这样，他们俩还是不顾个人安危，仍然到处找关系。经过努力，最后终于找到了老虎台的一个老工人，这个人姓鲁，是个山东人，他胆大心细，有一套送人的办法，但送一个人要20元酬金。除酬金外还需要路费，这两项加在一起，需要很多钱，这些钱对我被俘同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个人是承担不了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支部进行了研究，最后决定把同志们挣的钱集中上来，按计划统一使用，把同志们一个一个地送走。支部的这个决定深受大家的欢迎和支持，每个同志都节衣缩食，舍不得多花一分钱，把钱毫无保留地交给支部。

为了取得上级领导的了解和支持，使逃走的同志有着落，马苏义同志以行商的名义，给关内三分区首长孙定国同志写一封信，告诉他在抚顺生意做得很好，望来信联系。不久，孙定国同志以暗语回了信，指出部队仍在原地活动，一切很好。1942年冬，马苏义同志首先离开抚顺，为大家探路。他到达天津杨村后，就给大家来了一封信，指出可以按原计划进行。接着，我被俘同志有的化装成学生，有的化装成商人，陆续逃出抚顺。贾奎来同志是和雍梁栋同志一起走的，到沈阳后，干了一月的小工，后遇见了李育才同志，他们3个人又结伴而行。因为搭车钱

不够，他们就步行，沿途由贾奎来同志要饭供大家吃，白天他们藏在青纱帐里休息，夜晚朝西南方向前进。他们越过层层阻拦，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到达冀西山区，胜利地返回了部队。贾奎来一个党小组的，除梁义江同志外，其余同志都返回了部队。这些同志受到首长和同志们的热烈欢迎。经过审查，绝大多数同志很快地恢复了组织关系。马苏义同志恢复组织关系后，担任了司令部的支部书记。

南品、高光鉴、李新民三同志在承认了暴动领导人的身份后，敌人按《暂行惩治叛徒法》的规定，于1942年2、3月间把他们3个人押送到沈阳检察厅审理。这时，他们3个同志又秘密地建立了党小组，继续坚持斗争。经研究，决定翻供，不承认是暴动的主谋，还把主要责任往死者王振身上推，把原供改成“暴动是因为我们受苦受不了，才领导工人逃跑的”。在法庭上，他们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把煤矿的恶劣条件以及“特殊工人”的悲惨遭遇揭得淋漓尽致。法官让从三家子村弄来的几个人作证。他们还是不承认，并辩驳说：我们在三家子村是出头露面过，但那是在王振的命令下行事的，王振是总头，他怎么能轻易出来作那些跑跑达达的事情呢。他们在法庭上说得滴水不漏，弄得法官们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在此以后，又先后开了5次庭，南品等3同志不畏强暴，一直坚持暴动的领导人是王振。敌人无法，最后于同年6月，以有反满抗日思想和组织暴动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判处南品同志有期徒刑7年，刑满后，转入劳动辅导营无期服苦役。判处高光鉴、李新民2同志有期徒刑各5年，刑满后，进劳动辅导营各服10年苦役。

1945年8月，苏军进入沈阳后，首先释放政治犯，南品、高光鉴2同志出狱(李新民同志于1945年2月18日于狱中牺牲)。

9月，我军到达沈阳后，刘兴起、宋庆昌、许彪先后到沈阳，

和我冀热辽十六军分区联系。不久，这支队伍奉命开赴沈阳，被编为二十一旅六十一团，宋庆昌任团长，许彪任参谋长，刘兴起任组织股长、总支书，马振江任一营教导员。经过近两年的斗争，宋庆昌等同志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们胜利地返回了部队。

1945年9月，我冀热辽十六军分区司令曾克林、政委唐凯二同志率部到达沈阳，高光鉴同志闻讯后，立即到东站联系。曾、唐二位首长见了他，把他和南品等同志组织的队伍编为特务一团，并任命他为团政委，南品同志为团长。在此以后南品、高光鉴等同志便在鲜艳军旗的指引下，踏上了新的征途[①]。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抚矿“特殊工人”反日斗争片断

李联谊

（一）龙凤搭连“特殊工人”大罢工[②]

1942年，我被俘的抗日官兵1 000余人，被押送到抚顺炭矿龙凤搭连做矿工，称“特殊工人”，大队长是马同喜。不久，大队便秘密建立了党的支部（马同喜任书记）并组织工人开展反日斗争。

1943年11月间，马同喜、宋庆昌、吴持平等15名党团员积

① 本文参阅徐更伍、颜赤峰、夏俊卿、刘兴起、宋庆昌、许彪、南品、高光鉴、马苏义等同志回忆资料。
② 根据李录增回忆资料整理。

极分子秘密开会，研究打把头、砸戏院。第二天晚上，吴持平带领秘密组织的敢死队、支援队砸了戏院，并痛打了大把头牟景华。马同喜带领一部分工人，也趁混乱之机，散发了标语传单。传单上写着“戏给工人看”、“水给工人喝”、“打倒把头吃饱饭”。

砸戏院不久，又组织了千人参加的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吃饱饭”、“不准打骂工人”。矿工们砸了严把头的家。在声势浩大的罢工压力下，日本人被迫答应给每个工人增加20元工资。第二天，工人又找到洋工头杜勇，提出：吃饱、穿暖；撤销“特殊工人”住处岗楼；取消押送工人上下班等三项要求。迫使日方逐渐让步，到年末基本答应了要求。

1944年春，马同喜给同志们介绍了关内中国军民抗日斗争的形势，并用毛泽东的文章《论持久战》、《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启发教育大家。从此，特殊工人的抗日宣传活动更为活跃。他们在各坑内外到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2月里的一天夜里，青年敢死队50余人还到搭连各坑口和东窑地大架子底下散发张贴“把日本赶回东京去”，“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标语。戴玉文等6人还打死了两名伪警察，随后撤离抚顺。

事后，日本当局进行了大搜捕，并以所谓“抚顺龙凤鼠疫检查”为名闯进居民住宅翻箱倒柜，抓去34人。为了扼制特殊工人的斗争，日伪当局实行了更加严酷的统治。他们在特殊工人住的大房周围增设了电网，不许人随便出入。这时，党支部号召大家拿出当年关内打日本的劲头，坚持斗争到底。

1944年冬，宋庆昌指示崔云柱带领40人砸了日本卖店，把东西全部分给当地居民。

1945年8月，抚顺光复，搭连“特殊工人”大队改编为人民自卫大队，有1 300人。9月开往沈阳，与冀热辽军区十六军

分区接头，后编为特务三团，宋庆昌任团长。从此，搭连“特殊工人”大队又踏上了解放全中国的征途。

（二）“王中队”包围警察所①

1943年，抚顺西露天矿有个“特殊工人”组成的“王中队”。他们不屈于日伪的压迫与凌辱，决心冲出樊笼，重返抗日部队。然而，日伪统治异常严酷，到处都有宪兵队的明卡暗哨，没有通行证，简直寸步难行。强行冲出去那是盲目冒险，只有一个办法可行，就是找关系买通行证。可是眼下人们食不饱腹，衣不遮体，没有行动自由，上哪弄钱呢？大家再三研究，决定从坑下背煤。如果每天背100斤，就可到市里卖1元钱，背上两个月就可搞到60元。于是，大家分成小组开始行动。这是1943年12月8日晚，当一个小组的6个同志从坑下背着煤爬上盘道，走在路上时，被一个伪警察发现，他上前就打。他哪里想到这些特殊工人可不是好惹的。大家抽出背煤的棍子，一顿胖揍，把他打倒在地，尔后扬长而去。不久响起了警笛。这时，如果大家丢煤就可以脱身逃走。可他们舍不得丢下，就这样，跑不多远，就被闻风而来伪警们追上抓走了。只有1人跑回了“大房子”。这时，“王中队”的人正在吃饭，一听报告，个个怒火中烧，几十个人分头找来了“家伙”集合起来。他们一来到南花园就把警察所包围起来。警察所里，5名同志正被吊打。一部分同志立即进去向警察要人。可是警察们不但不放，有的还拔出手枪威逼大家回去。一个同志手急眼快下了那个家伙的手枪，其余的警察一见不妙，只好说小话，还答应当即放人。一个伪警点头哈腰地说：“小弟不知是你们，以后你们再背煤时，只要

① 根据刁志诚回忆资料整理。

报个话是‘王中队’的人，我们决不碰你们。”

伪警察威风扫地，“王中队”凯旋而归。可是过了不久，矿上劳务系的日本 人便带着特务来了。他们挨个辨认，最后又把背煤的人抓走了。两个月来，“王中队”不断设法营救被抓走的人。一天，大家一起去劳务系警告日本人说：“是你们带人把人抓走，你们要把人要回来，人不回来，我们说死也不干了。”日本人担心事态扩大，只好答应大家。没过几天，被抓去的5个人终于回来了。打这以后，“王中队”的人先后陆陆续续逃离了虎口，返回了抗日队伍。

（三）组织“复兴中国友爱会”①

1941年11、12月间，我原晋绥军几百名被俘人员被押送到老虎台采炭所万达屋井。我们一到抚顺，就暗中寻找地下党，准备参加斗争。由于种种原因，始终也没有同党接上关系，于是南品（原二一二旅侦察科长）、马苏义（原二一二旅56政治部秘书）、熊言顺（原旅团副团长）3位共产党员便秘密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党支部成立后，为了能团结更多工人一起斗争，他们还联系了原国民党部队抗日被俘的九十八军官兵，组织了“复兴中国友爱会”。党支部3位同志以友爱会成员身份出现，成为该会公开的领导人。支部通过这个组织联络了许多非党同志，并以这个组织名义，组织了十几个班组，共有百余人，形成了一支新的斗争队伍。复兴中国友爱会提出了“宁可英勇的死，反对屈辱的生！”“为了祖国的解放和自己的自由，必须挺身而起，战斗到最后一分钟！”“工人们团结起来，向榨取我们血膏的日本

① 根据贾坤南回忆资料整理。

帝国而战!”的斗争口号。我被俘人员从悲观情绪中振奋起来，终于在1941年12月21日举行了暴动逃跑。

这次逃跑斗争虽然是失败了，但对日伪当局的震动和打击却是很大的，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在当地群众中的影响。敌人进一步实行高压政策，用软硬兼施的卑鄙伎俩加紧了对“特殊工人”的摧残。经马苏义、张士俊、贾坤南研究，又重新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同时也恢复了“复兴中国友爱会”，并改称为“复兴中国乡友会”。这个组织由主要几个领导人联系活动。马苏义总负责，贾坤南负责组织工作，丁鳌负责日常联络及宣传工作，任学泰（原五十九团供给处长）负责后勤工作。龙凤坑由雍梁栋（五十九团卫生处政治指导员）负责；老虎台由张炳林（冀中军区的）负责；从冀中军区来的人，由玉中（冀中军区译电员）负责；晋西北来的人，由李育才（原决死纵队八团二营副营长）负责。

组织定型后，同日伪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首先展开宣传教育，接着对敌进行政治、经济上的斗争，再就是有计划地继续组织逃跑。从1942年7月至10月，有一部分“特殊工人”先后逃离了虎口。

（四）砸日本卖店、仓库①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形势，极大地唤起了受奴役的抚顺矿工的斗争觉悟。1945年7、8月间，抚顺露天矿第二劳务系的近300名矿工自发地进行了一次砸抢日本卖店和仓库的斗争。

这天的上午，正在干活的露天矿第二劳务系的矿工费广生、

① 根据徐振生回忆资料整理。

杜立得知日本人要用汽车把仓库的工人劳保用品全部拉走，于是他俩找到班长徐振生（以上3个均是特殊工人）研究怎么办。其时，日伪当局只顾奴役矿工加紧掠夺煤炭，就连起码的劳保用品也积压不发，很多矿工只好披着麻袋片、洋灰纸遮体。如今日本人却要将大批衣食物品外运，实在令人气愤。他们3人研究决定，立即堵住汽车，抢回物品。随后，他们又联络了7名特殊工人，手持镐棒铁棍赶到西露天东大院大庙后的仓库。这时，日本拉物品的汽车刚刚开出库门，10名矿工一齐冲上去截住了汽车。押车的日本人高桥一头钻进卖店，企图从东门夺路逃出报信。费广生、杜立发现便暗示徐振生去东门口拦截。当高桥刚刚探出头时，徐振生一镐把他打倒。许多矿工闻讯纷纷赶来声援，到上午11点多钟，已有近300名工人和群众。人们怒吼着：不能把东西拉走！这是咱们的血汗！把东西分了！日本人见势不妙，仓惶逃走。愤怒的人们一涌而上，砸开仓库、卖店，分抢了面粉、衣物。

事后不久，日本宪兵便赶来搜捕，1名特殊工人牺牲，8名被抓走，收回部分物品。这次斗争又一次显示了抚顺矿工的斗争精神，并取得了一定胜利。此后，日本人再没敢拉库里的东西，看守仓库的日本人也躲到劳务系藏起来不敢露面。汉奸把头见主人没了威风，也乖乖地将工人应得的劳保衣物发给工人。又过了不久，矿工们迎来了抚顺光复，被抓的人也回来了。

抚顺煤矿特殊工人和广大工人群众反奴役反压迫的斗争精神，将永载抚顺工人运动的史册。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柳塘特殊工人的抗日斗争

肖 彦

1943年，本溪柳塘煤矿特殊工人中的八路军被俘人员秘密组织起来，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统治争取自由解放的地下斗争活动，1944年4月这一组织遭到破坏。有的同志被折磨死了，有的同志壮烈牺牲了，有的同志在紧要关头在群众的掩护帮助下转移到外地因而脱离险境。这就是当时由日伪奉天省警务厅掌握并称为"桃源案件"的重要部分。我是当时家住柳塘的一个青年，因参与了活动亦遭逮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抗日战争胜利才获释放。事情已经过去40年了，每当想起牺牲同志的时候，总是悲痛不已。现在根据我的记忆予以追录，以示对牺牲者的缅怀之意。

一、特殊工人及其秘密组织

伪满的煤矿工人，身受日本帝国主义和把头的残酷统治和剥削，生活很苦，劳动强度很大，坑内经常发生事故，再加上恶劣的环境，死人的事是经常的。在本溪柳塘的南天门，埋葬着矿工尸体的坟丘，比比皆是。1942年4月29日发生瓦斯爆炸，死亡矿工1 494人。为了防止工人逃跑，柳塘煤矿的周围都用电网围起来，出入矿的大门由矿警把守着。

1941年秋季开始，陆续来了特殊工人，又称为辅导工人，他们都是抗日战争中在关内打仗的被俘被捕人员。第一批先从济南来四十多人，住在矿里东部的大房子（工房）里。以后越来

越多，到1942年春就增加到1 000多人，他们来自太原、天津、保定、石门（石家庄）、青岛和济南等地，有八路军、新四军、中央军，还有游击队和老百姓。为了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统治，便把特殊工人集中居住的区域——从柳塘通往红土岭的电车道南面这一块地方，单独用刺线圈起来，与普通工人分开，他们都编成了小队、中队，上下班是集体的，平时不准到其它地方去，与外界完全隔绝，行动毫无自由，处境非常困难。

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统治争取自由解放，特殊工人中的八路军干部，秘密组织起来，进行地下斗争活动。

伪满时，我和金玉文都在柳塘矿里居住。我在兴农合作社工作，金玉文的父亲在煤铁公司工作，由于坑内发生冒顶事故死亡，当时金玉文年龄还小，公司为了照顾家属生活，采用他在炭业部管劳课（在南山）工作。他家住在柳塘电车道旁，离特殊工人住的地方只有30多米远。当时有个特殊工人田喜文，原来是八路军医务人员，因会看病在矿里诊疗所工作。他们开始接触，往来密切，逐渐成为知心朋友，并且金玉文首先参与了特殊工人的秘密活动。当时很多青年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压迫中国人民极为不满，不甘心当亡国奴。金玉文受田喜文的思想影响，由爱国而发展为倾向于共产党。我和金玉文的关系很好。1943年的第二季度，他对我说，现在特殊工人里边的八路军人员有个秘密组织，我们应该参与他们的活动。我当时虚岁22岁，金玉文18岁，我们都有着强烈的反满抗日之心，都愿意干这些事情。我们都认为，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他们在关内同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打仗，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我们对他们都很敬佩。由于我和金玉文思想倾向一致，通过金玉文，我也经常接触田喜文，并且也参与了特殊工人的秘密活动。

因为田喜文在矿内诊疗所工作，借看病之机可经常到特殊

工人的圈子里活动，出入很方便。

据金玉文和田喜文对我说：特殊工人的地下组织负责人为张顺和张永。

田喜文对我和金玉文说：张顺原名刘亚龙，是八路军的政治教员，曾在抗大学习过，理论水平很高，经常给干部讲课，这个人很有活动能力；张永是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干部，这个人很稳重，沉着多谋，毛笔字写的很漂亮，柳塘工人系（后改为管劳系）的大牌子就是他写的。他还说：张顺是共产党员；张永是共产党员；他自己也是共产党员。

二、向当地青年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大约在春节之前，一天晚上在金玉文家开会，参加的人有当地青年张廷芝、李继韬、徐殿林、徐国魁、马照钧、金玉文和我。特殊工人田喜文和张伯英也参加了。这次会主要研究组织起来反满抗日，当时有人提出左右倾问题，应该分开，但大多数人认为，现在关内都国共合作了，共同抗日，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反满抗日。田喜文同志在这次会上讲了很多。他讲了关内抗战的情况；讲了西安事变的情况；讲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都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我党统一战线的主张；并且还讲了应该怎样发展组织和要注意的事情，如要进行单线联系，不要取得横的联系，以免遭到破坏时造成更大的损失；在发展组织时应该注意质量，不要强调数量，等等。特殊工人张伯英没讲话。以后才知道，田喜文同志参加这次会，是事前同张顺和张永共同研究了，经他们同意派田喜文同志去的，而且去时在会上讲些什么，都是事前做了研究的。这是对我们这些当地青年进行的一次很好的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进行地下斗争方法和策略的宣传教育。张顺同志也去了，但未参加

会，是在外屋呆着的。在这次会上我认识了马照钧，在个别谈话时，他表示是左倾思想，还说他认识石岱宗、邓崇仁，马宗骏是他侄。这几个人都是我的同班和下班同学先后去关里了。从此，因为思想倾向一致，有共同言语，我便经常到他家去，他还借给我书看，我也转借给金玉文。

我们当地这几个青年第二次在后石沟开会成立读书会选举李继韬为负责人时，李继韬在会上讲的那些话，很大一部分是田喜文那次讲话的内容。

三、寻求外面的配合帮助

特殊工人从关内来到柳塘煤矿，在电网圈里又单独用刺线被围困起来，与外界隔绝，人地生疏，处境艰难，秘密组织起来后，很需要外面的配合帮助。

金玉文和田喜文对我说："张顺给张廷芝写了一封信，张廷芝没回答，张顺很着急，怎么办呢?"我们3个人研究，认为马照钧这个人是左倾思想，办法多，有社会经验，想找找他。田喜文与张顺研究同意了，我找马照钧谈，马同意后，告田喜文约好时间，在一天晚上，我领马照钧去金玉文家，马照钧与田喜文接谈。田喜文告诉了马照钧特殊工人中八路军人员已经组织起来，马照钧表示愿意给以帮助。此次接谈后，马照钧给张顺写了一封信，询问特殊工人情况和组织起来的情况，并表示如果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可告他，将尽力给以帮助。这封信马照钧交我，我交金玉文，金玉文交田喜文，田喜文交张顺。不久张顺就给马照钧回了信。这封信张顺交田喜文，田喜文交金玉文，金玉文交我，我交马照钧。此信的大致内容是：

刘杰同志：

来信收到了，关于你询问特殊工人情况和组织情况，现在把情况告诉你。

我们这些特殊工人都是在关内打仗时被俘被捕的人员，有八路军、新四军、中央军，还有游击队和老百姓。我们被俘的时候，有很多人被杀了，我们这些剩下来的，被送到矿山来做苦工。他们来时对我们说，干半年就把我们放回去，到了半年又说一年，到了一年又说二年，到了二年又无限期了，实际上这是欺骗。

这里的生活很苦，工作很累，上下班都是集体的，行动毫无自由，坑内经常发生事故，还有很多人得病死了。大家感到，在这里呆下去早晚也是死，所以大家迫切要求自由，要想得到自由解放，只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现在被俘的八路军人员已经组织起来了，由中心小组来领导。但是我们对外面的地理情况和时局情况均不了解，我们迫切需要外面给以支援。

此致

敬礼

亚龙

不久，马照钧给张顺写信说，你来的那封信，我已经求可靠人捎到奉天去了。张顺见此信后，很敏锐地察觉到这样做很容易出问题，便立即写信并捎口信说，这样做很危险，应该立即设法把信追回来（确实由此出了问题，后面将谈此事）。过了几天马照钧写信告诉张顺说：你写的那封信已经要回来了，请放心。这些往来信件，都是经我、金玉文、田喜文之手传递的。

李继韬是我在初中念书时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我和金玉文研究，认为这个人爱出风头，怕由他行动不慎出了事，所以读书会解散吧，咱们和特殊工人干。我便和马照钧谈了对李继

韬的看法和这个想法。马照钧对李继韬也有同样看法。过了几天张廷芝告诉我，读书会解散了。交的两个月活动经费也给退回来了。

张廷芝在初中念三年级时，我是一年级，他家也住在柳塘社宅，和我家只离二三十米远。晚上我和金玉文常到他家去，由于思想倾向不同，谈一谈就争论起来了，谁也说服不了谁，有时我们气得打他的嘴巴子。我们和特殊工人之间的活动情况，他是不知道的。我和金玉文从他家出来就谈我们的事，张廷芝的家却成了我和金玉文会合的地方了。

虽然我们同张廷芝之间的思想倾向不一致，当时是从反满抗日的角度出发，经常在一起，以后也共同坐过牢。光复后，我从他口中也了解到许多有关本溪县国民党部的情况，但最后终于因思想倾向各异，只好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了。

四、等待时机准备暴动

田喜文同志对我和金玉文说：张顺总想出来和大家见见面。当然我们也总想去看看他。

有一天我和金玉文去诊疗所找田喜文同志，想让他领我们去找张顺。田喜文未在诊疗所，在他们住处找到了他，并见到了张伯英，与张伯英打打招呼，点点头，示示意，没谈什么。田喜文见我们去了就出来和我们进特殊工人的圈子里去，但那天张顺未在。

后来田喜文告诉金玉文和我，张顺将出来看看你们，约好时间，我便告诉马照钧，在一天晚上，张顺和田喜文来到金玉文家，等了好长时间马照钧才来，因为到了特殊工人晚上点名的时间，不能再呆下去，张顺和田喜文只好走了。又过了几天，约好时间，我带领马照钧去金玉文家。田喜文、张顺、张永都

来了。在这次会面时，着重研究了时局情况和等待时机准备暴动问题。马照钧首先谈了时局情况，他说日本军队在关内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打仗，战线太长，力量分散，兵源不足，供应困难，现在战争失利，节节败退，东北是日军物资供应的主要基地。最后就是全部放弃关内和太平洋，也不能放弃东北。张顺说：现在要积极准备，等待时机，适当的时候，进行暴动。特殊工人里边已经组织起来，首先要把八路军当小队长的掌握住，因为他们掌握一批人，行动的时候这些小队的八路军人员没问题，是骨干力量，这些小队的中央军绝大部分人也能跟着走，其他小队的八路军人员也能跟着走。暴动的时候用锹镐等作武器夺取日本守备队的枪支。从柳塘过岭经彩家屯去东山沟打游击，为取得群众的支持，由张顺起草告本溪人民书，如果打游击坚持不下去，就去热河投奔八路军。行动的时候组成几个队，由张顺和张永指挥，并亲自带领一队，田喜文、马照钧、金玉文和我，每两人带一队。马照钧负责印传单。

为了将来的暴动，在外面的同志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我和金玉文、田喜文同志接触时，谈论了需要了解本溪一带日本部队的驻地兵种及其装备情况。

柳塘水源地，驻有日本守备队一个小分队，10余人，有步枪10余支，这个情况大家都知道，金玉文说茨沟也有一个小分队。

我对金玉文和田喜文说，明山沟四花园附近有一个守备队兵营，驻有步兵一个中队约100来人，有步枪、轻机枪和重机枪。我在中学念书时游行进去过，在兴农合作社工作时，时局紧张，防空训练，去学过高射机枪，所以这个情况是准确的。当时没有详细研究，是将来暴动时避开这个部队或者去袭击。

为了给将来暴动做准备，需要设法筹划弄到一批枪支。金

玉文说，他有亲戚住在乡下，原是抗联的，因为坚持不下去，停止活动，把枪支插（藏）起来了，有五六十支，这批枪支需要时他能弄来。金玉文曾亲自对张永同志讲过这个情况，如果需要现在就可以去取。他是很有把握的。张永同志说，先不要去取，待以后需要时再去取。

我向金玉文和田喜文说过，柳塘警察派出所有3支步枪还有短枪，只3名警察，很容易弄来，需要时找几个特殊工人来就行。还有警察局的2名便衣警察均住在柳塘社宅，经济股警长赵彤勤有1支匣子枪。特务股警长罗玉灿有1支撸子枪。他们平日都把枪别在屁股后，这也很容易弄到手，需要时我找几个特殊工人，在他们上下班时就能下来。

我们还研究过，将来"行动"时，要切断通往警察派出所、警备系和守备队等处的电话线以及通往柳塘矿内的电源线，我们还察看了这些线路。

金玉文还说，特殊工人能制造武器。我说，如果制造手榴弹、地雷，需要炸药和雷管等，南山（即茨沟）东面山坡中间有一个"炮房子"储存这些东西，原来李德喜就是看"炮房子"的，可以想法弄一些。因为1932年至1935年我在南山居住，1936年搬到柳塘的，我知道此地。

将来"行动"时，还需要本溪县地图。我知道本溪县公署地政科有，通过关系能弄来。将来印刷传单时，除马照钧负责印刷外，需要油印机、钢板、蜡纸以及纸张等这些东西时，我从县公署和兴农合作社都能弄出来。

金玉文还对我说，特殊工人要派人去热河与八路军取得联系。据以后了解，张永、张顺和田喜文等曾研究过，为了取得组织上的领导和支持，张永同志准备要亲自去，因为没弄到证件，未来得及走。

当时正在积极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但因不久遭到敌人破坏，未能来得及行动。

五、敌人开始逮捕

1944年4月21日本溪湖市警察局开始逮捕了。

4月22日的上午，我在从菜市往北山去的小胡同里碰见了马照钧的母亲。她对我说："坏了，出事了！昨晚照钧被捉走了，现在还有人在家看着呢！"又问我："有什么事？"我只好安慰老人家说："不要紧，没事，别着急。"如果我不看见马照钧的母亲，我还准备到他家去呢。

我回家去，得知特务又去捉张廷芝，张廷芝已经闻讯躲开，去捉时未捉到，把他妹妹和妻子捉去。

我找到金玉文，把马照钧被捕的情况告诉了他，后来他告诉我，张顺和田喜文也被捕了。不久，金玉文告我，张永和张伯英已跑了。我们两人核计一下，咱们也先躲一躲吧。于是，我们就都离开了柳塘，我到泉水村赛梨寨外祖母家去了。

六、张廷芝自首

时间过去一个月了，再没听到什么动静。张廷芝的妹妹和妻子在警察局遭严刑拷打，也没放出来。本来捉张廷芝妹妹和妻子的目的，就是想追问张廷芝的去处，她们两个人虽然吃了不少苦头，并没有说。日本人再蛮横不讲理，最后也不能把家属当做政治犯来定罪。可是5月下旬突然听说张廷芝投案自首了，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6月5日我的姨父薛世田率领特务早川正和马贵禄到赛梨寨我外祖母家将我逮捕。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来，我双手顺着耷拉下来用绳子绑在腰上并用上衣盖上，脑袋用包皮包起来。当

天从泉水乘火车押送到本溪湖市警察局拘留所里。以后我才知道，特务把我逮捕后，曾去我家搜查，但我母亲已将我的一些书籍以及石岱宗去关里临走之时与我一起照的相片等都烧了。以后审讯时还问过我石岱宗上哪去了。我说，他因家事辞职到哪去了不知道。

拘留所就在警察局北部的一间大屋子里，有9个小屋，南面4个北面5个，中间是过道。每个小屋有两米宽两米长，前面和后面竖立着约10公分宽的木方，像个动物园的笼子，左右间壁墙是在木方上的两面订的胶合板。在押犯人绝大部分都是刑事犯。我被关押在北面的第二个小屋里。我一进来，徐国魁（在第一个小屋里）和张顺（在第三个小屋里）就看见我了。但我还没看见他。当看守不在屋时，张顺就敲间壁墙，小声喊"肖承善。"当时称为"打电话"。我走近间壁墙也敲两下，便说："我是肖承善。"他就说："我是张顺呀！""你也进来啦！"我说："是啊！"

张顺对我说："我给马照钧写的那封信，捎到奉天被特务骗去了，往回要时把信照了相给拿回来。审讯时问信的事，便说不知道，后来，实在追得紧了，因为我知道张永已经跑了，便说，可能是张永干的吧。把敌人已经骗过去了，一个多月不审讯了，案子快结束了。张廷芝一自首把真实情况讲出来，审讯时把相片拿出来让我看了，不承认也不行了。把以前的审讯完全推翻了，所以才把你和金玉文捉进来，张廷芝不自首，你和金玉文就没事了。"张顺还告诉我：审讯时尽量把情况说的简单点，个别接触的事敌人没掌握不要说。

我听到张顺同志对我讲的这些情况以及告诉我在审讯时应该注意遵循的原则，使我心里有了底，明确了应该怎样来应付敌人的审讯，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个

别接触的那些活动，敌人没有得到一点情况。

马照钧还告诉我："张顺给我写的那封信，由张万昌捎到奉天被特务厉广孝骗去了。他在奉天小南门里（以后了解为大南门里，即东华门外，劝业商场附近）开个育美屋，卖体育用品，做为特务活动的据点。特务审讯时问信的事，我知道张廷芝已经跑了，便说信是从张廷芝手中拿的，详细情况不知道。你和金玉文都没事了。张廷芝一自首，把真实情况讲出来，所以才把你和金玉文捉起来。"

张顺还说：特务股长井上亲自对他审讯，警尉（后改为监督警尉，是"满洲人"中级别最高的）乔世芬给当翻译。日本人开始时，也曾用了软招子，摆上酒菜，还说什么你把事情讲出来就放你出去。这当然是骗人的鬼话。这也说明敌人对张顺是何等的重视！但最初时，他们并没有得到什么东西，都被张顺给骗过去了。

特务审讯时，严刑拷打是经常的，方法也是多样的。拳打脚踢，用木棒、竹剑（练武士道用的）打，手指间夹钢笔杆，上大挂（就是双手背到后面用绳子绑上，吊起来），等等。但这些法西斯残暴行为都改变不了革命志士之心。

本来我和金玉文是有充分时机躲开的，既然要躲就要远走，更不能到亲属家去，那时由于我们幼稚缺乏经验，政治上不成熟，最后我们两个人还是没躲了。

我被捕之前，对我们这个事情怎样被敌人发觉的是不了解的，我被捕后知道了。可是张顺的那封信，只能暴露出柳塘特殊工人中有个秘密组织，但具体人是谁又是怎样被敌人发现的还不知道，而且被捕的特殊工人基本上没露。后来，才知道在柳塘社宅居住的朝鲜人（当时称为日本人鲜系）特务罗玉灿插了手，布置了任务。特务厉广孝的父亲厉勉原是我地下党成员，

被日本人逮捕后投敌叛变给日本特务机关充当特务了。厉广孝是哈尔滨工大的学生，当他和他的同学要去关里时，临行前告诉了他父亲。走后厉勉怕日本人知道后追究他的责任，便向特务机关报告，在山海关把这些人全捉住了。又通过厉勉的关系，这些人便当了特务。厉广孝当了特务以后确实给日本人干了许多事，在北满破坏了许多，又到南满来了。厉勉是厉男的哥哥，厉广孝冒充“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为了使人对他“信任”，也曾以八路军的干部厉男作为金字招牌进行政治上的撞骗。

七、盼望胜利和准备继续战斗

在拘留所，环境非常恶劣，一天两顿饭，一顿是一盒用木制小饭盒装的高粱米饭，只能有现在铝制饭盒的一半大小，装有3两饭，放三四条白萝卜咸菜。没有筷子犯人就从间壁墙上劈下一小条胶合板的木片当勺子用，这个犯人走了留下，其他犯人来也再用。有时一天给喝一次水，有时还不给，喝水时就是用小水桶接一下子自来水，让大家轮流喝。十天半个月给打一桶水让大家洗洗脸。4平方米的地方经常押着十几个人，多时到二十多个人，晚上睡觉时一颠一倒还得“睡小面”(就是侧面躺着)。如果起来撒尿，回来，就没地方了，只好躺下来用身子硬挤。昼夜不脱衣服，衣服上、地板缝里虱子多得很。经过一段时间，就不审讯了。家在当地的，允许家人给送饭。当时我家总是给送小米干饭，炒完做成饭团，用报纸包上送来。可是特殊工人在本溪没有家，谁能给他们送饭啊！徐国魁家在草河掌离草河口车站还有几十里路程，也不能给送饭。在这样情况下，革命情谊非常可贵，宁肯自己少吃或不吃，也要让共患难的战友来吃。可是当我把家里给送来的饭分送给他们时，他们都是百般不要，他们都知道我患肺病咯过血，让我多吃一些。张

顺、杨照耀原来是干体力活饭量大，他们比我早进来一个半月，更需要啊！开始时分着吃，第二天，第三天，……总是这样让来让去也不好办。后来就这样吧，我吃家送来的饭，把拘留所给我的饭给他们吃吧。包饭的报纸，就成了我们在这里的唯一读物，互相传着看。一张报纸，几乎全都看到，但关内战争、太平洋战争既是报纸的重要新闻，也是我们最关心的消息，尽管敌人竭力吹嘘其赫赫战果，但也流露出节节败退的景象。大家看到这些消息，就互相议论，认为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为期不远了。大家都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张顺同志曾经说过：只要不处以死刑就不要紧。

由于长期在这里关押，营养奇缺，不见阳光，体力极弱，田喜文同志病死在这里。其他同志为了迎接胜利日子的到来、为了准备将来的继续战斗，每天在这里原地跑步，锻炼身体。

据一些经常打官司几次进来的犯人说，监狱比这里强的多，在那里虽然干点活，但能到外面活动见见阳光，给的饭也比在这里的多。当然这个"强的多"也只是相对而言。春节以后，奉天高等检察署的检察官来本溪进行复审，看来，将根据《治安维持法》（专门惩治政治犯的法律）给判罪，但估计还不致判处死刑。我们也希望能够早点把我们送到监狱去。

八、分别及就义

1945年4月1日我们本溪的这几个当地青年，从本溪湖市警察局被押往奉天第一监狱，特殊工人张顺等同志仍押在警察局的拘留所里。这天上午，临行前，与张顺同志只能无言相望，相互示意保重，但是未想到，这竟成为最后的永别。我们从警察局出来到本溪湖车站的时候，家属均在车站候车室前等候看望我们，但不能上前说话，只能看看而已。到监狱里，就都给

带上脚镣子。在这里，只是政治犯和杀人犯等重大罪犯才给带上脚镣子。这几个人被分散开，均押在一舍，这是未判决的犯人关押的地方。一个大屋子约有三十多平方米，住二十几个人。马照钧由奉天北陵的拘留所送到第一监狱押在二舍。在监狱里虽然一天两顿饭，但每顿一个人一个高粱米饭坨，约有4两，还能有一些炖茄子干或萝卜干、云豆干之类的菜。监狱里还有一套“规矩”和“行话”，每屋有一个“炕头”，多是关押时间长案情重的犯囚（当时对犯人的称呼），来协助管理犯人。看守警对犯人敲诈勒索是常事。每天上班的时候带一些“煎饼包”（一张煎饼包些炒干豆腐、豆芽粉之类的素菜）卖给犯人4个一份就是10元钱，真是一本万利。如果新进来个犯人有件新衣服、新毯子之类的东西，看守警看中了，就可通过“炕头”设法给弄下来。不然“老爷”（犯人对看守警的称呼）就要找茬给点苦头吃。最后“炕头”给说情，使你“明白”了（就是给老爷“进贡”）才算了事。当然对政治犯还不这样。未判决的犯人不出去劳动，只是在屋子里给拆日本陆军传染病院的被套，不少犯人得了高热病，5月初我也得了上，发烧超过40度，被送往五舍（病监），发高烧最好是发汗，囚犯对此也有“经验”，就是大量喝凉水，然后用被子捂上发汗，当然不吃药硬要发一身透汗也是很遭罪的，并且体温降下去也总反复。

5月25日奉天高等法院治安庭（专门审理和判处政治犯的司法审判机关，审判官、书记官、翻译官都是日本人），开庭宣判，对我们这几个人分别判处5至20年有期徒刑。张廷芝、李继韬、马照钧20年，徐展林15年，徐国魁、金玉文和我10年，张万昌5年。

金玉文和马照钧也先后到五舍来了。金玉文对我说：“不行了。”我便鼓励他说：“不要紧，再坚持一下，日本鬼子快要完

蛋了，我们很快就能出去了。”但以后听说金玉文同志病死了。

在五舍和我住同屋有个政治犯秦学明，是小学教员，家住奉天小南关，自称是国民党员，他还炫耀他认识东北地下国民党负责人罗大禹，又名魏忠诚，吹捧此人如何能干；他还认识张宝慈（此人光复后是国民党沈阳市党部书记长）。因为那时候都不隐瞒自己的思想倾向，谈一谈就争论起来。他说：“有的人看几本《门槛》、《夜未央》（均为苏联书籍）就盲目左倾。”当然这是旁敲侧击，也包含着对我的讽刺。我出去“放风”见到花喜露（笔名田贲）时，对他讲了这个情况，花说：“他何曾不是盲目右倾呢！”

我在一舍时，听到同屋政治犯于家麟（笔名驼子）讲了许多关于花喜露的情况，花喜露是左倾思想，被捕后表现很好，虽然遭到严刑拷打，但从他口里没有露出其他人的情况。最后只承认左倾思想不承认组织，但一个人的左倾思想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呀，当追问他的左倾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时候，他说是从书上看的。就连日本“法官”都认为花喜露的文学修养很好。当我看到他时，因患心脏病很严重，脸和腿都肿了，头发也脱落了，后来听说光复后出狱1946年病死在沈阳小河沿盛京施医院。此人是我地下党的成员，已追认为革命烈士。他在辽宁一带青年中的影响是很大的。本溪一些青年人的左倾思想，都是通过他直接或间接来传播的。

当时在奉天第一监狱里关押的政治犯有不少是青年学生，还有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委员侯天民、王玉文。

1945年8月1日奉天第一监狱一批犯人被转送到外地监狱。我被押往海龙，马照钧被押往营口。在海龙监狱里听到“八·一五”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在押的犯人都兴高采烈，欣喜若狂，要求监狱当局释放犯人，当时监狱管理人

员还不敢做主，拖了几天才把所有犯人都放出去。因我身体很不好，腹泻严重，出狱后在客栈休息几天，买点药吃，便乘火车经抚顺到沈阳又换车到本溪。回到本溪就打听特殊工人张顺等人的消息。不幸，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夕的一个夜间，于本溪平顶山把他们杀害了。

（摘自《本溪文史资料》）

北票煤矿“特殊工人”暴动逃跑

张九英

1940年夏秋之间，日寇从山东、河北、河南以及黑龙江等抗日前线押来北票的“特殊工人”约一千三四百人，分别集中在冠山“协和寮”和台吉“报国寮”内。所谓“寮”是独身宿舍的意思，但在北票煤矿的“寮”实际是集中营和监狱，到处都有警察、宪兵、特务、汉奸、狗腿子们轮流看守监视，高墙电网，森严恐怖。这些“特殊工人”既没有自由，劳动生活条件又极坏，许多人由于吃不饱，生病得不到治疗或被打而死。甚至有的带气就被活埋。由于这种劳动和生活条件，再加上这些人都是抗日军民，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屈辱，因此暴动逃跑事件时有发生。据有关材料不完全统计，自1940年5月至1943年春，逃跑事件十来起。在这些起事件中少者逃出四五人，多者逃出二三百人，共计逃出七八百人。著名的夜砸报国寮暴动事件就是在这期间发生的。“特殊工人”暴动逃跑使日寇不得安宁，不得不于1943年将一部分押送北满，一部分放出做劳工。

与“特殊工人”暴动逃跑的同时，还出现了多起被骗劳工

逃跑事件。1943年3月间，日寇为了补充劳动力不足，就派人到兴城、绥中招骗劳工。他们以移民的名义，由当地乡、保长将1 600多户渔民卖给了矿上日本鬼子。这些渔民到北票煤矿后，因生产条件极差，吃不饱穿不暖，受气挨打又是常事，因而死了不少人。因此，这些渔民在特殊工人暴动逃跑的影响下，也纷纷逃跑了。到1945年祖国光复，仅剩下200多户。

（摘自《北票文史资料》第一辑）

电网工人的回忆

笑 秋整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资本家宗相金吾来到鸡西，把手伸进了由哈尔滨资本家徐鹏志经营的黄泥河子的裕边煤矿（现恒山煤矿老一井）。1938年宗相金吾吞并了裕边煤矿，于1939年4月正式命名为鸡西炭矿。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奴役矿工，镇压工人的反抗和赚取无偿劳力，在恒山、城子河、滴道等各大煤矿建立了“特殊工人训练所”，把从各地抓来的抗日战士、无辜百姓和逃跑未遂的矿工，扣上“政治犯”、“思想犯”等罪名，关进电网里，进行残酷迫害和无偿劳动。据伪满鸡宁（现鸡西）宪兵中佐队长堀口正雄供认，从1942年到1943年，共逮捕我地下工作者的所谓“有政治问题”的矿工460多人。其中有20名无辜矿工经宪兵司令部批准，送哈尔滨日军七三一部队（石井细菌部队）作了细菌试验的牺牲品；1945年春，恒山煤矿工人宫化敏、伍元同和徐守

密等因为得罪了把头，被说成“八路”抓到鸡西宪兵队，坐水牢、上老虎凳、灌辣椒水，被活活折腾死了。

凡是抓进特殊工人训练所的所谓“犯人”眉毛被剃光，衣服被扒光，换上囚衣，编上号头，不准互称姓名，不准与外界来往。他们被关进四周筑有炮楼的电网里，所以当时都叫“电网工人”。

训练所名义上“训练有期”，实际上劳动无日。每天由武装矿警押送下坑刨煤。矿工把下坑比做“下地狱”，什么时候折磨死了，就算“升天堂”了。据恒山矿老工人张明远回忆说：“伪满我在山南电网的号头是7502号；原恒山矿工会主席李明同志是九千多号。这说明伪满恒山煤矿山南电网最少关押过9 000多人。这上万名矿工，除逃跑300多人，到1945年‘八·一五’光复，电网里活着的只有百多人，其他的人全被活活折磨死了。”

伪满恒山特殊工人训练所设在恒山煤矿南沟里，所以又叫“山南电网”。山南电网于1942年建成，有十几名日本人和3 000多名武装矿警看管，警戒极为森严。

张明远是伪满沈阳铁岭区的一个模型工，1942年农历九月初六被日本兵抓进恒山矿山南电网的。跟他一块抓进电网的一共有124人，分到城子河煤矿电网64人，分到恒山煤矿山南电网60人。关进电网之后，把头就把抓来的人的衣服全部扒光，换上一套黑色的更生布囚服，背上用红油漆写上一个号码。张明远的号码是7502号，从此，张明远的名字也就由“7502”所代替，没有人再叫他的真实姓名了。

电网工人住的是大房子对面炕。吃的是每顿一个糠菜团子和一两碗稀汤粥。由于吃不饱，工人只得拣些烂菜根和菜帮子，塞到洋铁盒子里煮熟了充饥。因为吃不饱，而且一天还要下矿井干12小时的活，加上日本人和把头的无情折磨，电网工人成

批死亡。跟张明远关在一起的60名工人不到一年时间就死了48人。

据鸡西矿务局东海煤矿董仁贵回忆说："1943年农历八月十四日我因逃跑被抓进了恒山煤矿山南电网，从此我成了'犯人'。每天排队上工，4个人一横排，两边有拿手枪的矿警押着，后面一挺机关枪跟着，坑门口还有日本人把着。每天每个人要刨两矿车煤，干不完不准出坑。不少电网工人活活累死或被把头活活打死在坑下。由于日本人把电网叫'训练所'，每抓来一批劳工，就叫'训练'一期。我们电网工人心里有数，什么时候死了，就算在训练所'毕业'了。我在'电网'里干了18个月，这18个月中，共押来23期电网工人：从奉天（沈阳）押来9期、从青岛押来2期、从哈尔滨押来5期、从牡丹江押来7期，每期都在三五百人左右。到我逃跑的时候，工人只剩下127个了，其余近万人全死在电网里。"

从沈阳抓来的60个电网工人，进电网的第一天就往外抬尸体。张明远说："我们这60个人分成15组抬。一次一颠一倒抬2具尸体。我们从早上6点一直抬到下午2点才抬完。可是不几天，死人仓库又摆满了尸体，因为电网里一天至少要死五六个人。从哈尔滨一次抓来128人，除24个有来头的让日本人放走了之外，其余的全死在电网里。"

恒山煤矿老工人刘庆祥说："山南电网工人的尸体都扔在山南万人坑。有一次，日本人到万人坑视察后，为了销尸灭迹，让把尸体烧了。当时万人坑扔了800多具尸体，码了17垛，浇了汽油烧了14天才烧完。从这以后，万人坑经常烧尸，所以人们又叫它'烧人场。'"

不少工人因不堪日伪反动派的凌辱而自杀。恒山煤矿老工人刘庆祥亲眼看到在山南电网发生的一起悲惨事件：一个妇女

领着3个小孩到山南电网来探望她的丈夫。她在电网外边等3天3宿也没有见到丈夫的影儿。原来她的丈夫因病重不能下坑。第四天早上，不知谁告诉他有个妇女领着3个孩子在电网外边转游了3天；他支撑着身子跑到院子里一看，正是他的妻子和孩子。他眼泪汪汪地叫了一声“孩子他妈——”就昏倒在地，让姓熊的警备班长看见了，当着他妻子和孩子的面将这个电网工人一顿毒打。他的妻子没有跟丈夫说上一句话，反而招来了一场灾祸，伤心地领着3个孩子哭着走了；等这个电网工人醒过来不见妻子和孩子，一阵心酸，就拿着一把炉钩子搭在电网上自尽了。

电网工人因忍受不了日本法西斯的残酷压迫和折磨，经常发生逃跑事件。1943年冬天，有3名从沈阳抓来的工人在下班回来的路上，趁天黑警备不注意的机会逃跑后，警备队紧追不放，当场砍死1名，另1个脑瓜砍掉一半，抬到电网里还“呼噜，呼噜”直喘粗气，很快就咽气了。只有一个叫陆义良的跑到山里躲藏起来，没有被警备队抓住。后来听说这个电网工人因在山里躲藏时间过长，10个脚趾全冻掉，逃到梨树镇不久也死了。就在这年冬天，还有个姓徐的电网工人逃跑被抓回后，扒光衣服，绑在电线杆上“冻冰棍”。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下，整整冻了2个多钟头，抬回电网后，手指脚趾都冻烂了，被活活折磨死了。

伪满城子河煤矿的特殊工人训练所建于1942年，训练所有个杜把头和一个叫松田的日本人凶残狠毒。据老工人王宪文、张学文回忆说：“松田为了区别工人的不同来源，把各地抓来的电网工人剃成不同形式的‘鬼头’；从沈阳抓来的头发中间剃道沟；从牡丹江抓来的剃掉半拉头；从密山抓来的剃去眉毛。”王宪文是城子河煤矿第一期训练所工人，号头是3284。他说：“电网工

人每天由武装警察押送到二坑刨煤，当时正是初春季节，二坑下边的顶水很大，我们整天泡在凉得刺骨的水里干活，不少工人得了关节炎和水肿病。有一天，我们38名电网工人正在坑下装车，忽然顶石'哗哗'往下掉，眼看就要冒顶。我们急忙跑到大巷躲避，不料碰上松田和杜把头来了，硬说我们是偷懒，是破坏'大出炭'，抡起榔头棍一顿乱打，逼着工人下去干活；我们刚刚跑到工作面，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顶板冒落了，38名电网工人除我的矿灯被日本人打坏，趁黑躲藏起来侥幸逃脱外，其他37名工人全部葬身井下。"

日本法西斯为了镇压电网工人，制定十多种罪恶的刑罚。据现城子河煤矿前总工程师李玉洪同志作证说："当时城子河特殊工人训练所常用的刑罚有：灌凉水、上大挂、活埋人、蚊子叮、冻冰棍、烤烘炉、烙铁烙、过电网、大劈头和狼狗掏心等10种。"李玉洪曾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日本人、把头给电网工人施用各种刑罚，真是骇人听闻，惨不忍睹。

灌凉水：1943年冬天，王宪文在下班回来的路上拣到一只小死狗，想偷偷地带回电网煮着吃，不料被警备发现，骂他是条馋虫，狠狠地给了王宪文一枪托，并逼着他生啃小死狗，然后把他绑在有3根皮带的板凳上，一面往他嘴里灌凉水，一面踹他的肚皮；灌进去的凉水又连血带水从嘴里、鼻孔里冒了出来。他被折腾得死去活来。

活埋人：1942年，城子河煤矿训练班几个工人用木板搭在电网上逃跑了，其中有个姓黄的是近视眼，偷越电网时碰在电网上，被松田抓住。松田把电网工人都赶到一个土坑跟前，然后让警备把姓黄的推到坑里，再往里填土。当土填到他的胸部时，只见他豆粒大的汗珠往下淌，脸和眼睛都憋得紫红……这个姓黄的工人就这样被活埋了。

蚊子叮：1943年7月，从丰田抓进城子河电网的一个叫汪品清的工人，在上班的路上，忽然举起帽子一挥说："工友们，快跑呀……。"60多名工人在他的指挥下四散奔逃；松田马上夺过警备的机枪，向逃跑的工人扫射，当场打死50多人，跑了3个人，抓回5个人。这天晚上，松田把电网里的工人召集到城子河水源地西南沟的一棵电杆跟前后，命令警备把一丝不挂的汪品清绑在电线杆上；电杆上安着一个很亮的灯泡，蚊子看到灯光从四面八方飞来，不一会儿，汪品清赤条条的身子落满了黑黝黝的一层蚊子。汪品清被蚊子叮得浑身青紫，悲惨死去。

冻冰棍：1942年，正是隆冬三九天，电网工人下班回来正在外边清点头号，从鸡宁（今鸡西）街里抓来一个姓陈的老头，松田命令警备把老头的衣服扒光，绑在电线杆上，然后往身上浇凉水。没有多长时间，陈老头的身上由红变紫，由紫变白，冻成了冰棍，松田指着冻死的老陈头对电网工人说："谁再逃跑的，统统这样的干活！"

大劈头、过电网和狼狗掏心：1943年，城子河煤矿特种工人训练所30多名工人逃跑，被抓回10人，其中8人当众用大砍刀将脑袋劈成两半；2人过电身亡；1名活埋；有个姓刘的工人被扔进狼狗圈，几只凶猛的狼狗扑上去将他活活地咬死了。松田在施行暴刑的时候，还强迫所有的电网工人围观，叫"杀一儆百"！

江成恩回忆：1945年春，恒山煤矿电网工人暴动逃跑，抓回30多人，日本人指示警备把这30多人用铁丝穿起来，绑在铁溜子上，下面架上炭火烧，烤得这30多人嗷嗷直叫，哭声震天。江成恩和另外几个工人曾亲眼看到这30多个工人被活活烤死。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烤烘炉"。

伪满恒山煤矿和城子河煤矿电网里幸存的董仁贵、张明远、

王宪文和高兴文等一些老同志回忆电网工人的悲惨遭遇时，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不是共产党把我们从水深火热的地狱里拯救出来，我们就是逃出电网也活不到今天，我们决不能让军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重演！"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黑龙江省鸡西市政协文史办供稿）

对修筑军事工程劳工的虐待与残杀

修筑海拉尔北山要塞劳工的悲惨生活

张玉普口述　张福祥整理

伪满康德2年(1935年)，日本侵略者在我家乡河北滦县北小寨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致使生活无法维持。无奈，我被迫离开家乡，来到郑家屯。当年2月的一天，我在街上碰见一伙招工的人，他们声称："去东山里开荒，每天工钱壹元伍，吃三顿馒头。"我信以为真，就报名应招，没想到却掉进虎口。

我们这些应"招"的人，被集中在郑家屯一个大四合院的旅馆里，一共有400多人。第二天，我们这些人就被装进五六个大闷罐车厢里，车门上锁，只留一个窄缝，车开后，有一个去过东山里对当地地形比较熟悉的人对我们说："这不是去东山

里，这是往北开，到满洲里下煤窑。”我们大家这才知道受骗了，但也没办法，因为想跑也跑不掉了。

火车开了三四天后，一个夜晚，日本兵把车门打开，叫我们下车。我下车一看，四周军警密布，个个荷枪实弹，当即把我们50人为一汽车拉到敖包山上。第二天天一亮，日本就逼着我们去干活。到山一看，山下劳工住的席棚子一眼望不到头，在山上干活的劳工少说也有二三千人。山四周戒备森严，铁丝网密密层层，相隔不远就有一个岗哨。在山顶最高处有一个了望塔，昼夜都有两个日本兵向四周了望。日本鬼子还对劳工严加监视，不许劳工们互相交谈。我们私下互相询问，方知来的劳工不是被骗来的，就是被抓来的，家乡大都是辽宁南部、河北北部一带的。

日本侵略军逼着我们给他们修炮台、山洞等工事。我们干的是挑沙子、拌水泥、灌水泥等繁重劳动，住的是四面透风的席棚子。海拉尔二三月的天气十分寒冷，日本人也不给我们被褥，睡在硬木板上，每天吃的是两顿带不少壳子的高粱米粥，每天得从天亮干到天黑，夏天天长，一干就是十八九个小时。干活时稍微慢了点，监工的棍 棒、枪托劈头盖脸地打来。我在郑家屯认识的一个老乡，干了一个多月就被折磨死了。还有一个劳工受不了这比牲畜还不如的待遇，逃跑中被抓回来，当天晚上，日本鬼子把我们劳工集合起来，当着我们的面活活地把他打死了。后来，有人悄悄地说，这个人已在这里干了3年了，家里还有母亲、妻子、儿女。我这才知道，这里的山洞至少已修了3年。

繁重的劳动，非人的待遇，很多身体很棒的小伙子很快就累垮了，生病了。但只要你还能动，就强迫你去干活，实在动不了的就送到病号棚。日本侵略者欺骗劳工说，送去隔离，以

免传染。实际上送进病号棚，就等于送进停尸棚。据我所知，当时没一个人能病好后回到工地去的。我在这年9月，因两眼烂了，看不见东西，被日本人送进病号棚，目睹了这里面的惨状：奄奄待毙的劳工们躺在那里没人管，连水也没有，天气冷了，身上还穿着破烂的和纱布差不多的更生布衣服。

我们那个棚子里躺着六七十个劳工，每天都有一些人死去，每天都有病号拉进来，隔几天就拉出一汽车尸体扔到坑里（我因为被逼着往坑里扔过两次尸体，所以记住了这个坑的位置，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万人坑）。后来，我的身体稍微硬实些，心想不能等死，在9月里的一个黑夜我趁看守的日本兵睡觉之机，逃出病号棚。当时，我逃到现在海拉尔市西山飞机场一带，遇到几个打草的中国人，他们同情我，给我饭吃，给我剃了头发（这时头发有半尺多长）。这样，我侥幸逃出虎口，虽然瞎了一只眼，但却成为日本侵略军在海拉尔敖包山残害中国人民的唯一见证人。

敖包山山洞前后修了10来年，到底有多少中国劳工被害死？迄今为止还不清楚。当时，我在山上认识的有三四百人，其中有不少老乡。解放后，我曾到处打听这些人的下落，但杳无音信。据说，日本鬼子为了怕放出劳工泄密，在山洞修完之后，将全部活着的劳工都害死了。

解放前，我一直不敢说自己是从敖包山上跑出来的劳工。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使人民不忘旧社会的苦难，搞新旧对比教育，让我讲述这一段血泪史，我才领路找到这个万人坑。这里埋葬的白骨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的铁证。

（摘自《呼伦贝尔文史资料》第二辑）

孙吴平顶树血案

何尔华

笔者走访了平顶树血案的幸存者，孙吴县被服厂退休老工人李志云，并查阅了有关史料。

日本关东军第四军第一百二十三师团进驻孙吴后，已先在曾家堡修建了一个军用飞机场，但以后不够用，于1937年初又在平顶树修建第二个军用飞机场。平顶树——靠近孙吴县城和日军司令部，距中苏边境仅50余公里，交通方便，附近丘陵起伏，灌木丛生，是日军理想的修建军用机场的地方。

日军为了加紧准备进攻苏联，从各地强征2 000多名劳工来修建平顶树机场。劳工们风餐露宿，无衣少食，在刺刀、棍棒的监督下被迫服苦役，过着非人的生活。日本侵略者却草菅人命，肆意残害劳工。

平顶树机场的2 000多名劳工，在日军的淫威之下，表面似乎平静地在忍辱负重的干活，但满腔的反抗怒火却如活火山一样随时可能爆发。劳工们大磨洋工，搞小罢工，藉以发泄对统治者的愤恨。

过了不久，机场工地来了一位自称老王的劳工，找到把头说："为了混个饭碗，要找点活干"。把头求之不得，满口答应，并编入平顶树山下的工棚里干活。这位老王30多岁，中上等个头，一副和善坚毅的面孔。他白天和别的劳工一样干活，并不时和一起干活的劳工唠嗑，晚上有时找个借口到邻近的工棚去串门。很快，老王就交了一些劳工朋友，劳工们也愿意和老王

在一起，有事也喜欢找老王商量，并私下里给老王取了个外号叫“三挂车”。由于劳工的伙食很差，终日只吃发霉的高粱米、盐水汤，吃不饱、病号多。老王就在劳工中鼓动向日本人提出要求改善伙食。他领着劳工找到把头，经过说理斗争，终于迫使把头答应让劳工吃饱。后来老王又打听到原来日本人是给劳工发点微薄的工资，但被各级把头层层克扣了。老王又领着劳工找到日本人和把头要求发工资，各不相让，双方争吵起来。老王乘机鼓动并领头打了日本人和把头。正在日本人要找闹事的带头人时，日本人却没发现他，老王跑到平顶树山上混到劳工中干活去了，接着，他又领着工人闹了几次小罢工。

1937年（伪康德4年）阴历八月，日本人接连两次无故杀掉没有给日本哨兵行礼的赶车老板和一个正在干活的劳工。劳工们在老王的带领下，利用这两名劳工的无故被杀害，带领全场2 000多名劳工，发动了一场大罢工以示反抗。

就在日本侵略者无故打死两名中国劳工后大约第五天早晨，晶莹的露珠含泪欲滴，微风吹着秋天的凉意袭得劳工抱着膀子发抖，整个场地象死一般的沉寂。就在这时，日本人按惯例，拉响了上工的凄厉怪啸的警报。但是，老王所在的工棚几十名劳工都躺在工棚里不上工，这时只有少数几个工棚的劳工，拖拖拉拉没精打彩地向工地走去。日本人见状，又拉了好几次警报，最后一次足足拉了十来分钟。尽管日本人急如星火连拉几次上工警报，可全工地2 000多名劳工，大部分都不去上工。已经走向工地的劳工，一看这种情形，也坐在那里不干了。整个机场工地象条冻僵的蛇一样，躺在那里不动了。直到这时，日本人才警觉劳工们是在罢工了。于是调来大批军警，把机场包围起来，强令所有劳工集合，以枪毙活埋手段，威胁劳工说出谁是这次大罢工的带头人。从早晨八九点钟一直折腾到下午三

四点钟，才从2 000多名劳工中抓出6名所谓罢工的煽动犯。为了镇压吓唬劳工不再闹罢工，将其中的4名劳工，当场用刺刀杀死。日本人恨犹未消，兽性发作，又牵来两匹枣红色大洋马，将另两名劳工用绳子绑好拴在马鞍上，两名日本骑兵纵身上马，缰绳一拉，两腿一夹，大洋马长嘶一声，飞奔而跑，两名劳工在乱石满地的机场上，被拖得血肉模糊，活活拖死。到晚上，日本人将最先罢工的几十名劳工，调往其它工地，从此不见下落。

日本侵略者以为经过这次血腥残暴镇压，可以威慑住劳工不再反抗了。可是中国人民是杀不尽、吓不倒的。就在这场大罢工遭到血腥镇压后没过几天，五六百名劳工利用收工吃午饭休息的机会，带着行李集体逃跑了。当逃到腰岭河边时，将全部行李扔在河的右岸，过河向西北方向 逃去。日军看到劳工大举集体逃跑，更是惊慌失措，急忙调兵遣将，前堵后追，一方面命令驻黑（河）、嫩（江）线上的日军沿线堵截，一方面派出日军步骑跟踪追捕，这时五六百名劳工已过腰岭河，四散逃命，各奔他乡。弄得日军疲于奔命，一直到黑嫩线上的二站和大岭之间，才截获了二三百人。其余的劳工，连同老王在内，都远走高飞了。

修建平顶树机场的日军被劳工的大举集体逃跑事件震惊了，法西斯的兽性发作了，对抓回来的二三百名劳工实行了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杀。就在当天晚上，二三百名劳工，在平顶树山下、逊别拉河畔，含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了。日本侵略军急于修建的平顶树机场，也因劳工的集体逃跑被迫暂时停工。这就是当时震惊国境线的“平顶树血案”。

（摘自《孙吴文史资料》）

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伪黑河省杀害中国劳工罪行

王登明

敌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伪黑河省实行法西斯统治，残酷地杀害中国劳工，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现根据1954年黑河地区部分群众的控诉，整理如下：

原黑河城区七街居民叶福环口述

伪康德4年（1937年）我给日本鬼子（和田组）驾驶一台汽车，在西岗子村火车站往南山里拉砂子、水泥等，工人约有2000余名。是从天津、山东、沈阳、哈尔滨等地抓的，据工人讲，修完一个山洞子，鬼子为了保守秘密，把这批工人半夜里全部用机枪打死，然后，再到各省各县重新抓劳工，修别的山洞。有一天夜里跑了两个工友，天亮被抓回来，鬼子把工人们集合起来，把两个工友扒去衣服，吊在架子上，用铁丝鞭子抽打，打得浑身皮开肉绽，鲜血淋淋，当昏过去之后，鬼子叼着烟卷得意洋洋，还叫工人鼓掌。

原黑河城区七街七组居民李子厚口述

伪康德4年春，我从长春被招到孙吴来当劳工，工人有3万来人。那时我病倒在孙吴街里，当年7月，病好后来到西岗子做工。这时正赶上日本鬼子在西岗子南山修阵地，每天约来3000工人，听工人们说由哈尔滨抓来的。干完活根本不让工人们往

家捎信，用机枪全部打死。有一个姓乐的说，用机枪或木棒打死四五百人。

康德6年修山神府、双峡一带的汽车道，修完后工人往黑河来，有的穿洋灰袋子，有的披麻袋片，冻死饿死300来人。

康德10年修山神府飞机场，由关内招来一千六七百人，春季来的，七八两个月就死了半数，都是被打死或饿死的。工人们吃不饱，干活少了点，日本鬼子就打。还有的没死还有气，鬼子就往山沟里扔，在这飞机场死了足有八九百人。

刘俊芬口述

伪康德10年春，我在山神府作防疫工作，听劳工们说：由山神府至西岗子修了一条山洞，劳工是由山东省曹州府招来的，计200余名（山神府日军部队番号是八二）。修完山洞得以活命的40多人，这些人和日伪翻译不错，偷放跑的。其余的人完工那天，日本人说："为了你们劳动中肯出力气，最后赏你们一顿大米饭吃吧。"结果吃了3个多钟头，都毒死在里边了。

李桂书口述

伪康德8年，我偷看了一封军事机密电报，是日本人八二部队给副县长（日本人）的电报，电文大致是：现工事完峻，但因贵保安局（特务组织系统之一）分配的苦力，皆患传染性的疾病不可医治，请派负责人来检查，以便论涉。根据电文来看，是以患病为借口，对工人完工后施以屠杀。事实上那些年来已被日本人屠杀许多，尤其是特务系统送去的劳工，因为一般劳工不能用特务系统分配。

光复后，据瑷珲县朝鲜屯刘大爷说：他到四不漏子去换过东西，发现在军事严禁区有很多的大坟墓，据刘说都是被抓去

的劳工修完工事，用毒药药死的。

解放时，日本退却前，驻奇克的日本特务机关，将押在狱里的“地下室”中的人连房舍一同烧了。证明书就烧了一麻袋多。

殷继川口述

伪康德9年10月间，由张耀东（把头）从北安招来200多名劳工，给日本鬼子修山神府大营，每天劳动13个小时。有的劳工跑了，被抓回来，冬天把人绑在电线杆子上用凉水浇……。不到一年半就剩下不足70人。仅我知道被日本鬼子杀害的有20多人，跑的、冻死的有100多人。

康德11年旧历二月我逃跑到鹏浦和开库康。

原黑河电业局推煤工李福口述

1936年我们一齐来东北做劳工的有60多人，半路逃走了10多人，剩40来人，每天干活从早上3点到晚9点（当时劳工中间流传一句三、六、九头传说），日本监工拿着镐把打，吃不饱，穿不暖，钱都让把头拿走了，40多人死了一半。当时在孙吴干活的劳工有2万人，在我们临走时，就冻死五六千人。

刘振章口述

我生在安徽省全椒县潘家村。1938年日本鬼子侵占我们家乡时，将500户的村庄烧杀6次。我被招劳工来到东北，一共来600人，在××沟沙金，日本鬼子杀害我们劳工70余人。后来修瑷珲县桦皮窑公路，劳工被折磨死了一大半，有病的就被抬出去烧了，600多人只逃走三五人。

王吉盛口述

伪岩崎部队在瑷珲县西岗子修军用设施，从伪康德4年（1937年）开始，至康德7年结束（1940年）。4年中约有100多次火车送来劳工，每次车约500人，就有五六万人。

伪康德5、6年时，我经过华家屯、华家老坟，见有许多大坑，里面都是尸首，死的也有上万人。

董福明口述

康德5年，日军把华集屯、宋集屯的百姓强迫搬家，房屋被拆毁。

张跃明口述

1932年，日本松木组从牡丹江招来不少工人，到瑷珲县西岗子山里做工，死了有800多人，逃走1 300多，出来700多。

1940年，山神府日本宪兵分队把工人弄去280多人，结果都没有出来。

周国彬口述

康德5、6年间，在长发屯的劳工死亡有200余人。

原黑河推销部杨凤沼口述

伪康德3年2月，天津日本租界大东公司用欺骗方法，在天津招劳工1100多人，在奉天（沈阳）招600多人，计1 700余人。这些劳工被骗到瑷珲县西岗子给日本岩崎部队修山洞，住的都是席棚子。有一个叫张贵芳的想逃跑，给抓回来当众枪毙了。我亲眼见到被日本鬼子打死的有：宋长科、张希云、张德兴、卢

青山，袁玉奎等人。我因受不了罪就偷着跑掉了，那1 700多人始终没见回来。

原孙吴县曾家堡陈玉岐口述

伪康德2年，我在大连被日本福昌公司招劳工，来到孙吴给日本子修道和修大营，我们一共来了3 000多人。每天干19个小时的活，冬天住着席棚子，穿着洋灰袋子衣服，不给吃饱饭，就这样不到一年工夫，我亲眼见到就死了六七百人，以后我偷跑出来，那些人以后我也没见着。

原孙吴县腰屯张崇树口述

伪康德5年，我在天津被日本大东公司招到孙吴龙门山里做工，我们一共来了有700多人，由于冻死、饿死、被打死的，到后来只剩下40多人，我亲眼见到一个姓王的被活埋了，还有跑的被抓回来割去了耳朵等等，类似这样死的也不在少数。

原孙吴县腰屯周广连口述

伪康德9年，在山东朝城被日本昭和公务所招工到瑷珲县纳金口子给日本鬼子修道的劳工由于冻饿、挨打，不到一年时间就死了1 000多人，只剩600来人，以后这些人不知死活。

赵玉章口述

伪康德5年，来额尼河修道300多名劳工，最后只剩30多人。这是我们亲眼见到的。

康德9年2 000多名劳工，只剩四五百人，死了1 000多人。

原孙吴镇十八组居民王锡庭口述

康德3年，由哈尔滨招到孙吴的劳工，到康德10年死了1 000多人。光成垛的就有4垛，每垛100多人。

康德11年3月有60多劳工在黑河挖排卧子，后来被送到桦皮窑修山洞，都被害死了。

康德11年4月煤窑沟有1 500多工人，死了200多人。

原孙吴被服生产合作社李志云口述

1937年1月，我们被孙吴的肖把头招来修平顶树飞机场的劳工有200多人，最后达到2 000人。因工人罢工，枪杀4名，用马拖死2名，扔到大河里了。有1名赶车的，因没给日本人行礼，被活活打死，扔到河里。在河边死尸就垛着300多。我也被日本子用刺刀刺伤，后好了。曾见到2个工人被抓去，跪在外边喂蚊子，后来也死了。有1个姓徐的腿被打断了。

原孙吴镇第三组席国梁口述

康德9年，修南北孙吴中间的大桥有劳3 000多人，叫日本鬼子治死千余人。我看见从席棚子中弄出七八名。

张纪忠口述

康德7年，招到孙吴53名劳工，挖孙吴南边的河。以后挖大壕，劳工170多人，冻死70多人，烧死30多。有1名17岁的常玉青逃跑被抓回来，活活打死。修孙吴北大桥的劳工被治死有700多，这是康德9—10年间的事。

侯宪义口述

康德7年，由关里招来3 000多工人，到孙吴北三架山修洞子，死了1 000多人。

郭兆杰口述

1939年招来300多名男女劳工，1940年饿死40多名，1941年死30多名，1942年到1945年光复死了120多名。

徐德顺口述

1939年旧历五月初四，×岛组从山东招来60多名劳工，死了60多名。

1940年我到“国际工人宾集”去干活，以后又到二六四五部队（即孙吴东仓库）干活，死了三四百名劳工。

原孙吴三区王文斌口述

康德2年，我被拉来东北虎林给日本子打石头，康德3年来到孙吴给日本六九四部队修大营、水道。

康德4年9月，由六九四部队装十辆汽车劳工，约五六百人，拉到山里集体屠杀了。

康德6年6、7月，孙吴有个叫老赵头的，给日本人放牛，他一天早晨到南山放牛，看见六九四部队，在头道卡子桥西面把100多劳工集体屠杀了。

听李景顺说：在1939年冬，孙吴南山阵地西南沟子里，日军杀害劳工500多名。

原孙吴西地营子滕吉发口述

康德4年，从北安抓到西岗子修南山洞子的劳工1 300名，完工时，剩下700名，其余的都死了。以后我到别处干活，剩下700劳工，也被日寇集体屠杀了。

翟吉祥口述

康德3年，我被日本五九组（龟田）招工到孙吴小河西南山作木工。完工后，只有王锡发逃出来，其他62名劳工，被日本宪兵用机枪屠杀了。

日本×岛组负责修孙吴飞机场，杀害了60名劳工。

原逊克二区乾岔子村杨恒荣：

康德6年，由哈尔滨被日寇104部队招工到孙吴的劳工有1 500多人，饿死、冻死有700多。

赵俊唐口述

听在山里作工的王年久讲，死了2 200名工人。

康德7年，在佳木斯抓来1 700多工人，死200多人。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因饿的乱蹦，叫鬼子把胳膊打断，过几天就死了。

吴良和口述

在西岗子给日本修山洞的劳工1500人，我亲眼见到死了100来人。洞子塌了砸死三四十人。总计死了有700多人。

（摘自《黑河文史资料》第二辑）

虎林伪满劳工初记

刘翰章

一

在日、伪统治者的"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北边振兴计划"和战时经济统治反动政策下，虎林从1936年至1945年间，有数以万计的中国同胞，在中苏边境、关东军驻地，修筑地上和地下军事设施、飞机场、军用道路、挖河开渠、建筑兵营。当时，对中国同胞，通称为"劳工"。

这些劳工是从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式强迫来虎林的。

（一）被骗来的。这是虎林劳工的主要部分。每项工程都是先由驻虎林关东军经理部，与日本在东北经营的各包工大柜订立劳工合同。当时驻在虎林县的日本包工大柜有清水组、高冈组、大野组、大仓组、神谷组、verdant组、荒川组、长谷川组、安藤窑业、满洲生木株式会社等十来处，分驻在虎林、西岗、宝东、虎头。每处都有一二十办事人员。一个包工大柜的劳工最少几百人，最多几千人。各包工柜下有若干中国把头，通常称为"二柜"。各包工大柜承揽包工，他们承包后，就派人到各处去招骗劳工。当时在虎林的大把头有高凤坡、李国斗、马德良、谢水春、夏明久等。这些大把头，每年都派出若干亲信，到华北、辽宁、吉林一带，用花言巧语诓骗贫苦同胞。说什么到虎林去干活，一天能挣三四元国币，月月开工资，吃的好、穿的好，住的也不错，春天去了，秋天送回来。为了取得被招人的一时信任，还先给每人预发一二十元钱，作零花钱。很多同胞

上当，领到预支款，就身不由己了，被赶进戒备森严的大房子里，天官赐福的话，再也听不到了。招工的象个瘟神，手提大棒，严密看管，到了出发的日子，全被赶进瓦罐车（即密封的货车厢），车门有工头把着，日夜兼行，不到目的地不开门。吃、喝、拉、撒、睡，都在车厢里，刺鼻的气味令人作呕。被招骗来的劳工究竟有多少？无法精确统计，这里仅是根据一些知情人提供的材料，粗略地说：

1936年起，安藤窑业从外地招骗1 200余名劳工，先后在泰和、宝东、东风、西岗建了4处大型砖窑。胡德亮等就在宝东烧窑。

1938年12月，宋令昌、董占有等从长春市南岭被招骗来虎林高岗组当劳工，修小火车道，把头李国盛。

1938年春，关东军建兵营，西岗清水组、高岗组的劳工和宝东大仓组的劳工，就有3 000名。

1939年，张庆祥等100来名木瓦工，被招骗到虎林清水组建筑房屋。

1940年4月，王敏桂等从大连市被招骗到大野组，先在密山关东军仓库当搬运工，1942年3月又在虎林县宝东站关东军仓库做工。

1940年9月，侯作秀等从牡丹江被高岗组招骗至虎头修关东军兵营。

1942年3月，王庆增等400人，在安东被把头夏玉义，招骗至虎林县高岗组，在西岗为关东军盖营房。

1942年4月，陈文林、栾贵堂等100人被大野组招骗到虎林，在迎门顶子修通往宝清、八千米、团山子三条军用道路。到迎门顶子后，发现当时在那修路的有1 000多名劳工，全是大野组招的。

1943年，杨传平被安藤窑业招骗至虎林县宝东车站烧砖。当时，安藤窑业在宝东烧砖的劳工有300多人。

（二）被日、伪政府强征来的。伪政府规定：在各县派劳工，名曰“勤劳奉仕队”，一期六个月。按时发往指定地点服苦役。逃避者，按国事犯论处。

1940年6月，辽宁省东沟县征派李玉成等500名农民，组成“勤劳奉仕队”，发配到虎林水克站（今半站），由劳工大队长于文龙监管，给荒川组包工大柜，修通往虎头的军用道路。在他们来之前，已有500名劳工，在那挖山洞。

辽宁省黑山县，以“勤劳奉仕队”名义发配来的劳工，都在虎头修军用道路。

在光复的时候，东仓库有吉林省怀德县“勤劳奉仕”劳工500多名。

（三）在华北与日军作战中，被俘的我抗日将士和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日本关东军把这部分人称为“特殊工人”，管理特别严，都是在武装监视下服苦役。

冈崎哲夫在《北满永久要塞》一书中记载：“修筑虎头地下要塞的主要劳工是从关内作战抓的中国军队俘虏，均称其为特殊工人。从1939年到1941年，华北有大量的中国军队俘虏，被送到虎头、完达山方面修地下要塞。其数字是不知道，仅止运来十辆有盖货车。”原虎头地下要塞工程部队作业队长石原勇在《工程进行过程，病死者不断发生》一文记载：“该工程由春到秋进行，使用从华北抓来的中国人和满洲国劳工约2 000人。”

1940年1月14日，我党领导的抗日部队，被日本军队在太行山区俘虏的常永年等约三四千人，在太原关押了1个多月后，用火车运到虎林县忠诚东南约四五十公里处修军用道路。

八路军三五八旅武廷山在去抗大分校学习的途中被俘，关

押3个月后，于1940年11月被送到虎林，与常永年一起修军用道路。

我一二〇师三八支队的连指导员武玉贵、连长范明忠以及胡玉贵、崔振山等人，被俘后，送到虎林县城内为关东军仓库做苦工。

1944年深秋，新四军被俘人员500多名，在我县忠信屯附近挖掘新开河（这条新开河从1939年开始挖，把大、小穆棱河連结起来，通乌苏里江）。

（四）以各种名义抓来的。大连市造船工人于丕喜、张为敬，1939年正在戏院子里看戏，就被抓了"浮浪"，送到我县水克站（半站）。下车后，用布蒙着眼带到工棚子。以后天天在火石山挖砂子，为修军事地下要塞备料。挖砂子的劳工，有好几百人。

王福荣是河北省玉田县人，因生活所迫到沈阳谋生。1943年，在街上走，就被抓了"浮浪"，发到密山日本关东军仓库当装卸工，不久，又发至虎林县城关东军东仓库当装卸工。

所谓"浮浪"，大部分是出身农民，由于失去土地，无力偿还高利贷，倾家荡产，辗转流离沦为游民；还有一些是因工厂或店铺倒闭而失业的工人或职员；再就是一些出入赌局、妓院输尽当光成为乞丐的流氓无产者。日伪统治时期，称这三类人为"浮浪"，见着就抓。还常常以抓"浮浪"为借口，把有居住证明的市民和有正当职业的工人，也给抓去，而且不容申辩。抓住便押送到矿山、边境一带去服劳役。

王锡先原是哈尔滨市皮鞋组合的制鞋工人。1942年2月的一天，正在独身宿舍睡觉，突然进来一些日本兵，将他抓到火车站。当时，还有修鞋工人40名、被服工人40名，都是突然抓来的，一起赶进车厢，发至密山关东军东仓库做鞋、做被服。同年4月又发至虎林关东军仓库。在虎林东仓库有500多名劳工。

二

在虎林，沦为劳工的中国同胞，数以万计。他们是20世纪的奴隶，在日寇的刺刀下服苦役，过着连囚徒还不如的生活。

一年到头住在席棚子里，长筒形的席棚子，两头留门，两边搭通铺，离地一尺来高，下边是一汪汪的水，中间有条过道，夏天阴暗潮湿，闷热得喘不上气来。冬天，冻得打哆嗦，睡觉得蒙着头。虱子满铺爬，跳蚤到处蹦。

吃的就更糟了，开始还能吃上发霉的小米和玉米面，后来就吃橡子面了，苦涩难咽，喝的是馏锅水，就咸盐豆子，开饭时，把饭桶向工棚子门口一放，劳工们得到自己的那一份，有的蹲着吃，有的站着吃，不管饱不饱，就那些，不少人饿着肚子上工。

穿的，先是黑粗布，后是更生布。在每个劳工后背都缝上一块四寸方的白布，上面黑圈内印有"劳工"两字，同胞们厌恶地说："我们天天背着王八干活！"冬季衣服，棉花又次又薄，都是破布制的更生棉花，根本不保温。一年只发一单一棉。为了不赤身露体，劳工们把水泥袋子抠三个窟窿套在身上挡风，腿上也用水泥袋子裹上。多数是披草袋子。一年只发一双胶皮水袜子，一双棉胶鞋。但很快就磨破了。劳工们看着自已的脚，嘲讽地说："前面露蒜瓣，后面出鸭蛋"。不少人光着脚上工干活。行李更不用提了，就是被招骗时，自已带的那点，捆起来一掐来粗。

暴力下骇人的劳动强度。一般是每天早5点上工，上工时排成队，两边由把头手拿镐把监视着，不准交头接耳。出发时，在工棚前由把头点名，收工时，再点一次名。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在劳动中，发现谁干的慢，即认为是怠工，工头们抡起镐

把就打。有个把头一天打死七八个人，却满不在乎地说："打死几个人算不了什么。"

大仓组，又名义和祥，早3点上工，晚9点收工，一天干18个小时，不是挑土篮，就是推轱辘马（小铁道上的推车），修石青山东的弹药库和炮兵阵地，被累死的、打死的就有80人。石青山埋葬了100多具劳工尸体。当时有"吃了义和祥的饭，就得拿命换"的说法。

新四军的被俘人员被发到忠信一带，掘新开河，每天上下工，都有十多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押着。到工地按人分段，必须完成。收工时，要把锹、镐的头卸下来，与把分别存放，防止暴动。每天都有被累死打死的。

被抓来的、强征来的劳工根本谈不上什么工资。被招骗来的，有时虽然见到一点儿钱，也是少得可怜，也无处可花。因为每天都被严密监视着，工棚外围拦几道铁蒺藜网，门口有人把守，出入不得自由。工钱绝大部分被把头诓去了。1941年农历四月，高岗组下的把头马厚民，以每天工资三四元为诱饵，从安东招骗了200名劳工，到10月1日，才给工人开了3次工钱，每人总共才得15元钱。其中有3名工人死于工地，4名工人得重病送回家后，不久也死了。陈文林等人从1942年4月被大野组招骗来修路，回去时，每人只发30元钱。孙同修1942年被大野组招骗来，修了一年路，只发了5元钱。高岗组大把头马德良，长期克扣劳工的工资，有一青年当众向他要，他恼羞成怒，抄起带钉的板子，当众把这个青年活活打死了。从此，谁也不敢提工资的事了。

由于劳动强度过高，饮食等条件太差，病倒的很多。劳工有了病，不但不给治，还逼着去上工，说什么："只要你脑瓜子硬，就得给我去干活！"如果告病，不容分说，先吃一顿镐把，

许多病号被逼着上工去。劳工死了，就用苇席一卷，扔到荒山野沟。后来，因为死的太多，连苇席也舍不得用了，一扔了之。有些还没咽气，就抬出去，扔进了狼狗圈被活活咬死。

除被折磨死的以外，还有集体被日本军枪杀的。冈崎哲夫著的《北满永久要塞》一书，有两处记载了枪杀劳工事件："1940年，虎头要塞工程完成后，将抓来的中国军队俘虏，摆酒宴引至山谷间，正在吃喝之际，山顶上的机关枪一齐向这些人射击，全部被杀死。""1943年某日，虎头地下要塞工程十分之九挖通，将中国军队俘虏诱至猛虎山麓（猛虎谷）的洼地设酒宴进行'慰劳'。其中一俘虏看势头不对，当即逃离，其余的见他离开，也都跟着向洼地逃跑。就在这时，埋伏在四周高处的重机枪响了，全部倒在血泊中。"

也有因被逼在恶劣条件下施工致死的，大野组修富荣军用道路一段，是哈塘甸子，日本军逼劳工下水修，淹死了不少人。在虎林究竟有多少劳工死于非命，只能举出以下几例：据王庆增谈："我们1941年来高岗组工棚子是400多人，到1944年向回送时，死去二分之一，剩200多人了。"

孙同修曾在虎头修地下要塞，据他谈："1941年在虎头小南山工地共有3 500来名劳工，到秋天向回送时，和北山工地的劳工加一起，才有2 000多人。"

王攸桂的一位乡亲告诉他："我1938年在虎头红线台盖兵营，挖水沟，看见一个山崴子里有一大堆死人骨头。"

1943年，在虎林街长友部队北边小山，有三四百名劳工，都是中国军队被俘人员，每天，身上围着水泥袋子，从桦树往北山运料，没见走的，只见桦树小南山，天天扔死人，群众把这地方叫"万人坑"。

虎头从西大沟至飞机场的军用公路旁，地下要塞周围的荒

野里、石青山根、迎门顶子山沟里、忠诚新开河两侧，每处都埋着大量的劳工尸体。

三

为防范劳工逃跑，工地住处戒备森严。工棚子周围置几道铁蒺藜网，大小公路均设日军岗哨。边境的住户，凡16岁以上，都发“居住证明书”，有不少人试图逃跑出去，又被抓回来，被活活打死了。

1939年8月，在西岗修弹药库的2名清水组劳工，冒着生命危险，逃到北山里，已经奄奄一息了。幸好被抗联第七军三师补充团战士发现得救。为了拯救苦难的同胞，在土顶子密营补充团团长李一平、五军政治部主任季青、五军三师九团团长和政委等领导同志反复研究决定：从两个团挑选30名精悍的战士组成抢救小部队，由九团团长和政委率领，于8月4日晚潜伏到西岗工地的庄稼地里。由李一平率两个连于子夜前到工地接应。8月5日零点40分，袭击了西岗工地，迅速消灭了敌守卫队，救出清水组劳工180多名。同时，打开仓库，让他们每人扛一袋面粉，撤离后，由于路上遭到日本守备队、警察的追击，在战斗中，失散60多人，其余110余名，随部队回到山里，参加了抗联。

这次抢救成功，震动了敌人，他们对劳工的看管更严了。但更重要的是鼓励了劳工，增长了求生图存的勇气。在西岗施工的清水组，1 000多名劳工，有很多逃出虎口。1940年6月，在水克工地，李玉成用铁锹劈死劳工大队长、日本荒川组的头目及翻译，逃回了家乡——安东。

大约在1940年至1942年间，有2名修洞子的劳工，卸完砂子藏在汽车大厢板下，逃出工地。跳车后，跑到仁爱村。在他

们之后，又有七八个劳工逃到仁爱村。

1942年12月30日晚12点，常永年、伍廷山、郭来顺等5人（皆关内我军被俘人员）逃出后，经忠诚跑到乌苏里江边，越境去苏联，在伊曼边防站当上了侦察员。在他们之后，还有一些被俘人员逃出后，去了苏联。

对虎头的要塞工程，日寇是非常重视的，看管最严，防守也最严，但也没有防止住劳工逃跑。

1941年，1名劳工，拉荒跑到山里，吃野菜，喝沟水，辗转了一个月，历经艰辛，终于逃回了沈阳。

1943年7月，一天午后，1名劳工，从工地拉荒翻山逃到虎头火车站，碰到了唯一的中国人连接手。这位连接手，给他一锅刚烙好的高粱面饼子，一大瓶水，把他藏到装原木的货车厢里，使他安全逃到了哈尔滨。在虎头有很多劳工，借装木头货车逃了出去。

1944年，1名劳工听传说：修完洞子，劳工全给打“防疫针”害死。他想，在这等是死，不如豁出命来逃跑兴许有一条活路。他白天将绑草的柳条插在地上作标记，夜间顺标记逃出了工棚。到清河吃了一顿饭，奔兴隆、平原，到杨岗合民村落了脚。

连年来有不少人冒险逃出去了，但从整体上看还是少数的，大多数是不得不留下来，忍受苦役煎熬。但是，他们的反抗意识增强了。

被大野组招骗来的劳工，到1942年冬，大部分送走了，还留200来名不放。他们几次要求送回沈阳都被拒绝了，于是联合起来，在刘大个子和周小把头的带领下，闹到大野组包工大柜。砸了大柜的桌椅，并且把日本人金井痛打一顿。附近的日本兵荷枪实弹气势汹汹地赶到包工大柜。将劳工们围住，嚎叫着责

问："谁叫你们砸的？"刘大个子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说："是我领着砸的！"大把头高凤坡，刚才还吓得直打颤，这会儿在日本兵面前，他又施威风了，抄起大斧向刘大个子猛劈下去。刘的手脚灵活，连劈十几次，没有砍着。日本兵在那看了一会竟没管，不知为什么，撤回去了。不久日本大柜经理答应，年底一定向回送，大家听后，以为斗争胜利了。可是到了年底，日本人把刘大个子、周小把头叫到包工大柜，说是向回送，但他们一去就没回来，可能被害死了。留下这200来劳工，一直挣扎到1945年日本鬼子垮台，才结束了苦役。

光复后，广大劳工重见天日。8月9日、10日两天，有一千多中国劳工，经过虎林街。他们穿着破烂衣服，背着小破行李卷，互相关照着，向西走去，一个个笑逐颜开，解放、归家的喜悦一时代替了多年的凄惨。

（摘自《虎林文史资料》）

白骨累累五顶山

刘学让整理

五顶山原名卧尔古力山（赫哲语：孤山之意），位于黑龙江省富锦县城东南20公里处，当地人习惯叫它东山。它是小兴安岭余脉渡江（松花江）南下而成。东西长，南北短，其走向是西北——东南。最高峰为538.7公尺，总面积为120万平方公里。山北临滚滚的松花江，东南山脚下的公路是同江、抚远、饶河等县通往富锦、佳木斯的咽喉要道。敌伪统治时，这里是加强"北边震护"、封锁松花江面、控制富锦重镇、防御苏军进攻

的重要军事基地。因此，这座世世代代不为人知的荒山野岭被当时驻扎富锦的日本关东军一眼看中，从1942年春天始，在五顶山修筑秘密军事工程、挖掘山洞、设置明碉暗堡……。

神秘的"勘测队"

1942年，犁杖刚下地，五顶山下突然开来数十辆日本军用十轮大卡车，车上的日本人一律身着土黄色的"勘测队"工作服。奇怪的是这伙"勘测队"不要当地伪保甲长陪同，而是自带翻译（日本人），在山脚下召开了村长会议。翻译用流利的中国话讲："日本关东军要派'扶桑社'勘测队到五顶山进行数年之久的测量，皇军命令：三日内撤出，拆除山里所有的窝棚、马架子，三日后人畜均不得入山，违者开枪打死勿论。"从此，附近村屯无一人一马再敢进山了。大约十数天后，蒙着军用苫布的日本军用卡车便越来越多的在山里进进出出。同年秋天，日本人又从富锦县城西原"江上军"司令部的口岸到五顶山修建了一条轻便小铁道，小铁道一竣工，日本关东军便下达了命令：晚6点到第二天早6点沿小铁道两侧的村屯一律戒严，住户熄灯，车马卸套入圈，违者开枪打死勿论。从1942年起，小铁道上每天夜里车不断，大批物资源源不断运进五顶山。就在这条小铁道彻夜不停地向山里运送物资的同时，夜间，富锦县城至五顶山的公路上也出现了大批蒙着苫布的日本军用卡车，满载着从关里、辽宁、吉林等地抓来的劳工。从此，东山出煤出铁的谎言被人们看穿，人们再也不相信"勘测"的鬼话了。

三个穿水泥袋的"纸人"

1942年秋天，西五顶村西北岗上种了一片高粱，长势十分喜人。一天早晨，有位50岁左右的老人到地里看高粱成色。他

正走着，突然，不远处响起了高粱杆的哗哗声。老人以为是有人偷庄稼，便紧走几步大喊一声："站住！"随着喊声，他猛然发现几步外跪着3个人。说是人也只有三分象人罢了。这是3个穿水泥袋的"纸人"，满面污垢，头发胡子连成片，除两只眼睛外，全身几乎都是黑色，一个个骨瘦如柴。这3个人跪着一动也不敢动，浑身颤抖，瞪着红肿的眼睛望着老人，任老人怎么询问也无人回答。经老人再三解释后，一个操唐山口音的人（已无法辨别年龄）才战战兢兢地问：这是什么地方？是中国还是外国？当他们知道这里是"满洲国"也就是东北三省的地方时，一个个才如梦初醒，面部露出一点喜色。当老人询问他们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从山里逃出来的劳工时。3个人则面面相觑，吓得一言不发。接着就叩头不止，要求给换件衣服，给点吃的，再给指条生路。说罢每个人从怀里大把大把地掏大烟土，做更衣求食的酬金。当他们知道这位老人是地主家的长工时，才承认了是从五顶山逃出来的劳工。老长工再三叮嘱他们：白天行走不便，就躲在这片高粱地里，饿了就啃大半浆的高粱穗，天黑时我再送你们上路逃生。

天黑以后，那位老长工才领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悄悄地出了村。老长工夹的破褂衣里包着几件破旧衣服；小男孩拎个破"喂大罗"（小铁桶），在碎草下边藏着几块两合面的饼子和几块咸菜疙瘩。这一老一少进高粱地后，悄悄地寻找"纸人"。怪了，那三个人都不见了，但他们也不敢大声喊叫，两个人只好挨个垅沟里寻找。足有半袋烟工夫，这三个"纸人"才从三个不同方向悄悄地出现在一老一少面前。原来这三个人对老长工不大放心，唯恐他回去报告什么人。他们躲在暗处，发现确实没有尾随老长工的人后才慢慢走出来。当他们看见两合面饼子、咸菜时，真比见到御宴还馋，但老长工只准许每人吃半个

饼子、一块咸菜，怕他们吃多了胃肠受不了，剩下的叫他们留着路上吃。在他们三个人狼吞虎咽地吞食饼子时，老长工从兜里掏出一把打马鬃的剪子，为们们"理"了发。这时虽说天已黑了，但上路还早，老长工让他们再等一会儿，叫小男孩到地头去"放风"。这时操唐山口音的那位才较详细地叙述了日本法西斯在五顶山秘密修筑军事工程，残暴屠杀劳工的悲惨情况。

五顶山之谜

1942年春天，日本关东军占据了五顶山之后，从日本国内派遣专家，运来大批军用物资，抓来数万中国劳工，修筑五顶山军事工程。工程的总指挥是一个日本少将（姓名不详）。看押劳工的全部是日军，驻山下的靖安军不准进山一步，就是伪军军官也不许踏入禁区。

五顶山的工程大致分三部分：一是修盘山道；第二是修山洞；第三项工程是修各种明暗碉堡。

五顶山上的劳工

五顶山的劳工2万余人，全是外地人。大部分是来自热河、锦州、河北、唐山等地，多是当时抓的"浮浪"，其中也有华北、山东地方抗日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和所谓"政嫌"人员。抓来的劳工一旦被决定送往富锦五顶山，便被集中到指定的地点，给每个人戴一顶"黑帽子"，将头部套严，无论乘火车还是轮船，不到地方不准摘掉。

日本关东军对全山劳工的管理是区、棚、队、班管辖。全山分若干区，山内由日本关东军统辖，山外由伪靖安军骑兵团设防。山内分东西南北四个区，每区下设若干棚（劳工住处），每棚住100到120人，每棚两个队，每队4个班，每班10到15

人（缺额不增补）。穿水泥口袋的3个“纸人”就是西四区205棚的劳工。

每棚劳工有一个日军小队看押（10到12人），并配备3到5只日本狼狗。日军看押劳工的小队分两班，每7天一换班。狼狗白天由日本兵牵着，夜间全部放开。若想出逃，不用说那些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就是这些大狼狗也无法对付。另外每区设一中心大狗圈（有三十多条大狼狗）和一个医务所（实际是屠杀劳工的机构）。

劳工们开始进山时，还能吃上几顿玉米面饼子，后来就是黄豆粕子掺橡子面的混合稀粥。一年四季喝的是山水、雨水和雪水。最困难是穿的，劳工入棚分班编号后，每人只发一套作业服（灰更生布），上衣的前后心有劳工本身的号码。就是这样的衣服穿坏了也不再发，为此，不少劳工大都穿水泥口袋制的“纸衣”来遮体、御寒。这种奇异的“服装”，不论盛夏酷暑还是三九严寒，一年四季不离身。

每天早上出工前，各班劳工集合在大棚前“点呼”（点出勤人数及个人号码），然后，戴上“黑帽子”，在日本兵的监押下出发，劳工每人左手扯一条长绳子，右手持工具。每班一条绳子，时间长了，日本人也就把每班称为“条”或“串”。到现场时摘下黑帽子，按监工员的命令干活。中午不准出坑，发给每人两个黑饼子、一块咸菜。为此，劳工都不知道具体作业地点，更无法知道去现场的往返路线。收工后仍然“点呼”然后按“条”戴黑帽子回棚宿营。对劳工监视、看管最严是夜间，睡前“点呼”一次，一律头朝里睡，把每人的左肢用一条大绳拴住，五个人拴在一起叫“一串儿”。夜间不许大、小便，有特殊情况时，则一串人起来，同去同归。

日本侵略者是绝不会让中国劳工活着出五顶山的。在山内

的劳工大致分两部分：一种是可以转移工地的，如修盘山道、盖席棚、修筑蓄水池、化雪池、伙房以及干零活的勤杂、开山打石头、打砂子的劳工均可以干完一项工程，转移到另一区去。但另一种挖山洞、挖秘密军用仓库、修碉堡、地下道以及攻防重要军事绝密工程的劳工，工程结束之日便是全部劳工“归天”之时。但无论哪种劳工都别想活着出五顶山，只是稍有时间上的先后罢了。

日本侵略者屠杀劳工方法之多、手段之残酷，真可谓古今罕见。

劳工的“医疗所”和“狗圈”：劳工们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低劣的狗食不如的伙食，一年四季穿“纸衣”，住席棚，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怎能不得病？但是劳工最怕生病，有了病也挺着出工，劳工们也帮助瞒哄着，一旦被发觉（多半已是卧床不起者），日本兵便拉着去送“医疗所”，多半是有去无回。劳工们把医疗所和狼狗圈看成一码事，生病的劳工被加上传染病之名后便是狗圈的“上宾”。日本人为防止活人被狼狗吞噬时发出惨叫声，事先给病人打一麻醉针，而后便投入大狗圈。日本人对山里所有的狼狗很少喂其它食物，大都以中国劳工骨瘦如柴的身躯为食，个个吃得膘满肉肥，皮毛发亮，整日瞪着一双血红的大眼。

贻害劳工的大烟土：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劳工如果说有点“优待”，那就是从入棚编号起，每人每日发一个烟份，半年后发两个，超过一年的，每日发三个大烟份（约一钱半）。因此，劳工们全染上了鸦片烟瘾，就是离开五顶山劳工区，也无法生存。说是“优待”、“治病”，实际是慢性杀人。一项绝密工程竣工，不用一枪一弹，只要三日停发大烟，全棚劳工便就地长眠。这大量的烟土，是日本开拓团专为五顶山军事工程种植加工的。

屠刀下的劳工：同一区的劳工，棚与棚是严禁接触的。每棚四周全是电网，日军岗哨居高临下地日夜监视。日本人对劳工的要求异常严格，无论现场干活、往返路上、或在住地食宿，发现劳工稍有违纪、反抗、逃跑的迹象，便当着众劳工的面用战刀砍头示众。在干活时对"磨洋工"的、不慎损坏工具的，轻者一顿毒打，重者也照样砍头。有时也不知因为什么，日本人酒后就随便把哪个人拉出砍头。

惨死于毒药：一项工程结束，日本人也要开个"庆祝会"，会后要给劳工一顿平日吃不到的好饭食：两合面的馒头，一大碗带油腥的菜汤、两块日本咸菜。劳工们常年不见米面，当然个个狼吞虎咽。可谁知，日本人在饭菜里下了毒药。时间不长，全棚劳工便一排排、一条条地头朝里，规规矩矩地死去了。第二天，日本人便讲："某区、某棚劳工得了传染病全部死亡。"为防止"传染"，倒上汽油，一火焚掉。

送劳工"回家"：对入山较久的劳工们（幸存者），当某项工程结束时，日本人便大讲特讲："劳工们辛苦大大的，送劳工回家种地，多多'出荷'。"让劳工们到指定地点集中，点名上车。劳工们要照样戴上黑帽子，坐在蒙得严严实实的卡车里满山转游，最后送到"万人坑"一车一车地杀掉。

对临时从山下村屯抓去的车伕、干杂活的人也从不放过，先用铁条捆绑双手，逐个地砍头杀死。住富锦县大榆树乡宝林村的马运荣（外号马铁脖子），便是1945年8月9日被日军抓进山的车伕，被日军在撤退前用战刀砍倒在南山区。这次共砍了13人，因马的主动脉没被砍着，夜半苏醒后爬出五顶山才死里逃生的。

日本侵略者就是这样灭绝人性地用极狠毒、残忍的手段屠杀无辜的中国劳工。从1942年到1945年8月，在这座山上共杀

害中国劳工2万余人。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黑龙江省富锦县政协文史办供稿）

马 铁 脖 子

孙恒久整理

1910年，马运荣出生在黑龙江省富锦县大榆树乡宝林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当时依靠父亲给地主扛活勉强维持生活。他从小就给地主放牛、放马，当半拉子，受尽了地主的打骂。1945年，35岁的马运荣才结婚成了家。为了生活他离家到县城给赵豆腐坊赶车、喂马、种地当长工，维持全家生活。这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圣战”处于日暮穷途、节节败退的困境。日军为了挽救败局，急于抢修富锦东卧尔古力山的军事工程。卧尔古力山位于富锦县城东南20华里，是个重要军事阵地。1932年日军入侵富锦以来，在东北三省和关里等地抓来成千上万的劳工，在山上修筑明碉暗堡、军火库等军事工程。这些劳工先后都被日军杀害在山上。1945年8月初，日军为加快未完工程进度，便疯狂地到农村抓劳工、要官车。一天，日军闯进了距东山二十多里福德屯，屯里的劳力、老板知道一去劳工是凶多吉少，都跑光了。马运荣是给赵豆腐坊在这屯种地、喂马的长工，因他晚上喂马，白天正睡觉，不知日军进村而被抓住。从此，他们整天在日军的屠刀监视下日夜抢修工事和运送日军准备撤退隐藏军需物资。这时，苏日两军已经接火，苏军飞机不时在卧尔古力山上空盘旋轰炸和扫射。日军垮台的日子就要到

了，劳工们盼望着早一天回村和家人团聚。可杀人成性的日本法西斯怕泄漏军事机密和掩藏的物资，竟对13个赶车“老板”下了毒手。一天下午，突然闯进工棚子一队手端刺刀的日本兵，逼着他们集合到工棚子屋内的西南角，然后把他们双手倒背过来用铁丝拧上，穿成两串，用刺刀逼着他们出工棚，东西一字型排开，站在山坡上。一个日本兵手提战刀从西往东砍，正在砍的时候，苏军飞机飞到上空盘旋轰炸，日本兵在慌乱中钻进山洞躲起来了。当时有一个穿在另一串上的小伙子，破开铁丝的捆绑，突然窜出往山南坡跑去，日本兵开了一枪，打伤了那人胳膊，但那个小伙子终于逃出了虎口。后来知道那个人是太平川仁安屯的。飞机过后日本兵出了山洞，把剩下的老板一个一个地杀了。砍到马运荣时，他看到一刀影向他头上砍下来，在他一缩头的工夫，刀已砍在脖子上，他就昏倒在死人堆里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苏醒过来了。原来日本兵的屠刀砍到他头上的一霎那，他见到刀影下来就一缩头，头上的毡帽给搪了一下，只砍断了他的“大脖筋”，颈动脉却没伤着。他苏醒过来以后也没敢动弹，等候着日本兵的撤离。他在死人堆里躺了3个多小时，蚊子、瞎蠓咬得实在厉害，他在不知不觉中动了一下，被守护在尸体旁的日本哨兵发现了，那日本兵一边喊叫着，一边用刺刀在他肋部刺了两刀，他又昏了过去。在半夜时他又苏醒过来，看到满天星斗，还听见了日军哨兵巡逻来回走动，咔、咔、咔的脚步声。他知道自己还活着。就是抬不起头来。生存的欲望促使他想，只要有口气就得想办法逃出去。他开始一点一点的交错挣脱着拧在双手上的铁丝，不知用了多少时间，费了多大的劲，终于把铁丝拧断。他用一只手托着脑袋，用一只胳膊着地匍伏着从死人堆里往南坡的山下爬去。爬出一段路，因为夜深人静，他爬行时哗啦的响声，被日军哨兵听见了，随着

哨兵的喊叫声，向他爬动方向开了枪。他静静地趴在草棵里一动不动，听到哨兵走远了，他又继续往山外爬，爬进草丛，爬过树林。爬着、爬着，遇到了日军设置的铁丝网。他就一只手托下巴，一只手拄地从低处贴着地爬了过去。后来，又遇到了一个3米多深、3米多宽的深沟，他用双手抱着脑袋滚进大沟，他又昏迷在沟里。再苏醒过来后，他歇了一会儿，用尽全身力气用手拽着大蒿子一点一点地爬出了深沟。他一边爬一边不时地回头看看，怕日军追来。这时他发现身后不远地方，有两只闪烁着绿光的眼睛，他知道这是在附近吃惯了劳工尸体的野狼，闻到他身上的血腥味跟上来的。狼看他还能爬动，没敢扑上去吃他，但始终跟在他后边。他想，狼不扑上来咬我，我就得争取时间往山下爬，到山边遇到人就有救了。就这样他提心吊胆地用大半宿时间，从丛家大沟爬出了山。到天蒙蒙亮时，他爬到离山十多里路的新发屯。他因流血过多已精疲力尽，到刘三虎子家大门口处又昏迷过去了。当刘三虎子家早起开门时，发现一个血人躺在大门口，刘家把他抬到屋里。他慢慢醒过来后觉着口渴厉害，就喝了一瓢凉水。刘三虎听到他用沙哑的声音讲述了他的遭遇后，立即到街里给赵豆腐坊送信，赵家用车把他拉到街里治疗，治一段时间后，两肋处刺得透腔的刀伤见好，脑后砍断的“大脖筋”又因刀口太深治也不见好，已溃烂化脓生蛆了。看他的亲友说：“这回够老马熬的，怕治不好了。”

这时，苏联红军已在我抗日军民配合下出兵东北，并已进驻富锦。有的亲友给他出主意，让他托托翻译，恳请苏联红军司令部医院为他治疗。经过工作，苏军司令部知道是被日军砍头没死的劳工，欣然同意为他治疗，这样马运荣就住进了苏军设在富锦的医院（地址在富锦镇原天主堂院内）。在红军医院里他得到了抢救治疗，在苏军医护人员亲切关怀、精心护理下，经

过20多天治疗，他很快就痊愈出院了，但因刺刀刺进了胸腔，虽然治愈了伤口，由于气胸，他说话费力，声音嘶哑了，颈部留下一扁指大的一个疤痕。体力也很衰弱。

在日军屠刀下的幸存者马运荣，出院后高兴万分，不知用什么语言能表达出自己的激动和感激的心情，于是他逢人就讲："日本鬼子砍了我的脑袋，是苏联红军又给我安上了个脑袋，不然哪有我马运荣的今天啊！"从那以后村里人都说他是"铁脖子"，"马铁脖子"的外号就这样传遍全县。

马运荣身经旧社会的磨难，又惨遭日军的屠刀，身体过早衰老。50多岁就丧失了劳动能力，长年弯腰驼背，说话很费力，后因肺气肿，于1972年在宝林村去世，终年62岁。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黑龙江省富锦县政协文史办供稿）

东宁县庙沟惨案

宋宪章

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南部的东宁县，是一个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边陲县城。它东邻苏联，南近朝鲜，北靠国境口岸绥芬河市。边境线长175公里。

由于东宁地理位置的重要，自古以来就成为我省东南部的边陲要塞。

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侵略者逐步向北蚕食，占领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后，进而又集中兵力向牡丹江以东地区逼进，1933年1月东宁县也被日军占领。

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宁县后，采取软硬兼施的残酷手段：一杀、二拉，即是以捕杀抗日联军为名，大肆屠杀爱国军民和无辜群众，仅是三岔口县城，一次就杀害200余人。与此同时，还收买了以项团（原救国军）和当地的土豪、劣绅为骨干的汉奸队伍，协助敌人镇压抗日军民。

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其长期侵占中国领土和反苏的需要，在东宁县驻扎了数万名日本关东军和伪治安军（开始叫“红袖头”或靖安军），他们强迫被俘的抗日战士、被抓来的劳工和挑选的“勤劳奉仕队”到处抢修公路、建造兵营、飞机场、战勤医院、仓库、碉堡、挖坑道、设工区，一时间公路成网，兵营成片，碉堡林立。

特别是从1937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在突击上述工程的同时，又增加了地下工程（在山峦隐蔽处利用有利地形修建能守善攻的永久性防护工事），在数以百计的“地下工程”中，绥芬河左岸，紧接苏联边境线上的庙沟“地下工程”要算最大的工程了。这里山高林密、地形险要，庙沟岭象一面屏障环东宁县北部。把东宁县划为日本关东军前线防卫司令官本部，派一名中将驻马家大营（今万鹿沟），统辖东宁县的所有部队。在国境线上配备重兵把守，仅少将军衔的指挥官就有3人。以庙沟岭为例，在庙沟驻扎的七七七部队，是一个步兵联队，负责重要山头的哨所、关卡和阵地防卫工作，在庙沟里边则驻有七七〇三骑兵和炮兵混合旅团。

日本侵略者为了把庙沟这个重要前沿阵地建造成坚固耐久的反苏基地，他们绞尽脑汁，费尽心机，除了用当地硬性招雇来的一批铁、木、石匠外，还用大批民工给他们修造兵营。并把从关内抓来的抗日战士和诱骗招雇来的穷苦工农群众，大约3 000余人，组成了10余个工区，开山凿石，掘土挖洞，每天都

要干12小时以上的苦活。为了安定当地群众，收买人心，在刚开始修造兵营时，对民工还能照顾些，活计还能干得来，可是没过多久，活计越来越重，伙食越来越差，到后来连工钱也不给了。不少民工忍受不了这种欺压，凭着熟悉地理环境的有利条件，趁着黑夜逃走了。

日本侵略者为了防止劳工逃跑，除了到处搜捕之外，还采取了更加狠毒的管理办法：在原有固定岗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巡逻队，并在工区的四周架起了铁丝网和电网；对劳工（包括民工）实行了集体出工和“连环保”制度（即是互相监督，互相担保）。随着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各地的势力范围的扩大和日伪政权的日益巩固，对被俘的抗日战士和劳工的血腥统治更加残酷，使他们不仅吃不饱，穿不暖，而且还经常给以肉刑，冻死、饿死、病死的很多。稍有反抗就活活打死，有的还被扔进狗圈里咬死。在山沟里到处可见成堆的尸骨。

据逃出来的当地民工张喜福讲：他在伪满康德4年（1937年）春天，被日本侵略者硬性招工到庙沟里打石头和修“地下工程”，一干4年多。在伪满康德8年（1941年）夏天的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里，他和另一名伙伴，假借腹泻外出之机，乘敌人巡逻未到跟前之际，从铁丝网与电网下面的被山水冲出的小沟里慢慢爬了出来，然后趁着黑夜，冒雨逃回了北河沿村，藏在亲友家里躲过搜捕之后，才活了下来。

1945年8月中旬日本投降了，东北解放了。一天下午，有30多个身穿破衣、瘦骨嶙嶙的人来到东宁县地方治安维持会（解放当时临时成立的维持地方治安的组织）门前。他们悲愤地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在庙沟犯下的罪行。原来他们都是从山东、河北一带被抓来的劳工和个别的被俘抗日战士。已经被抓来三四年之久。他们说，仅是几年的时间就先后抓来了3 000多人，可

是到后来活着出来的只剩下他们这30多个人了。他们之所以能活着出来，也是经历了一番痛苦的博斗才脱险的。

1945年8月8日的夜晚，苏联的探照灯突然由国境线射向了日伪统治森严的东宁县城，同时出动了数十架飞机在国境线上空盘旋，在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下，苏军向日本关东军的前沿阵地发起了攻击，双方展开了激战。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对劳工大队也开始了血腥的屠杀。为了无声地消灭人证，他们假惺惺地说：为了保证劳工的人身安全，防止被炮弹炸伤，所有劳工都要按工区迅速进入“地下工程”的巷道里去，并要在入口处堆集3—5米厚的砂石、泥土，以防毒气进入。就这样，在武装看押下，几千名劳工被迫进入了“地下工程”，然后又一段一段地用砂石、泥土隔绝开来，从此他们就永远地被埋葬在里边了。由“地下工程”里逃出来的这30名劳工，因为他们是最后进入“地下工程”的一部分人，靠入口处最近，又加上他们齐心合力地扒开了堆集在巷道里的砂石、泥土，才侥幸逃了出来。

据逃出来的人讲，实际看到的部分“地下工程”是一处工程浩大的设备比较先进的永久性防卫工事，工程的设计是按照山脉走向，分上、中、下三层建造的，长约10余公里。入口有多处，正门入口处设有转盘式大口径炮。在主要巷道口的转弯处，并设有高达数十米、粗三米左右的通气孔（又称天窗）。在巷道里铺设着运载弹药和物品的钢轨，每隔数十米便在两侧设有射击口或库房、宿舍、抢救室等。“地下工程”分“弓”字形和阶梯形等构造，整个工程都是用钢筋、水泥建造的，十分坚固。

日本侵略者苦心经营的庙沟“地下工程”，在1945年8月随着日伪的彻底垮台而告终。在解放初期，当地居民有些群众都

曾进入过被破坏的部分巷道里拣东西或砸铁筋，看到了很多被迫害而死的劳工尸骨和遗物。

（摘自《牡丹江文史资料》第三辑）

万 人 坑

血肉模糊万人坑 屠杀史实数不清

方 觉 姚云鹏

从1905年算起，到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日本国昭和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抚顺煤田被日本帝国主义强行霸占长达40年之久。在这40年的漫长岁月中，日伪抚顺军警宪特机关，其中也包括满铁抚顺炭矿劳务课和“劳务兴国会”，对煤城人民残酷统治，血腥镇压，先后不知有多少爱国抗日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惨死在日本法西斯的皮鞭和屠刀之下，又有多少采煤矿工被日本工头摧残致死。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只顾疯狂掠夺，狂开乱采，不顾生产安全，置矿工的生死于不顾，又有多少矿工惨死在地层深处的矿井之中。

仅据胜利矿一位年逾八旬的退休工人刘永财回忆说：“日本侵略者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不管工人死活，人死了往‘万人坑’一扔了事。”而用日本法西斯分子惯用的话说：“支那人的大大的有，死了死了的没关系！”煤城劳动人民被日本帝国

主义，整整统治了40个年头。日本强盗把中国人当成任意宰割的羔羊，进行过难以数计的血腥屠杀。之后又把上万具尸体赤裸裸地扔进了“万人坑”内。据一位当年居住在抚顺日本宪兵队（西十条通西三番町）附近的齐春良老人回忆说：“日本宪兵队院里院外，戒备森严。每日不分白天黑夜，从院里传出来的喊叫声，惨绝人寰，不绝于耳。那种悲惨情景，实叫人难以目睹。真是活着进去，躺着出来。日本宪兵把人从前门活着抓进去，百般折磨，惨死之后，再从后门拽出去。一个一个的，都象是扔东西一样，扔到‘万人坑’里边去。差不多都是血肉模糊的具具尸体，真叫人目不忍睹。”

当年的抚顺究竟有多少个“万人坑”？这些“万人坑”现在又都在哪里？这个问题，在今天的抚顺市区地图上早已无法找到了。根据笔者的现地查访，以及对抚顺“万人坑”曾进行过长期调查的赵立静同志（现于抚顺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告诉我们：“抚顺最大的‘万人坑’即当年千金寨市区东郊刘山乱坟岗子以南，曾被称为丘楼子的地方。现在的详细地址为露天区西刘山，刘山第一小学校的空旷田野处。这个地方，原来共有两个万人大深坑。这两个深坑，相距并不太远。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两处‘万人坑’虽然早已经被填平，可是每到雨季，在这一带的地面上，还常有地下水往上返。此时，仍有当年死难者腐烂尸骨油脂的油花往上溢。人们不时仍可呼吸到尸骨的腥臭气味。”

另外，当年的龙凤坎（今龙凤矿）、老鼓台（今老虎台矿），亦均有“万人坑”。龙凤矿俱乐部正南方向也有一处。这些地方，如今都已经建造起来了职工住宅。由于高楼大厦，栉比鳞次，“沧海变桑田”，再也无法寻觅到当年“万人坑”的踪迹了。

老虎台矿办公大楼对面的正南方向，有一个被称为青草沟

的地方，也有一处“万人坑”。当年日本法西斯为了欺世盗名，粉饰自己，曾在“万人坑”处，树墓碑一座，以所谓的纪念，来歌颂日本帝国主义刽子手们，在此处所表现的“丰功伟绩”。

另据赵立静、关文艳、赵秀芝、邹凤荣等同志，于70年代在抚顺市博物馆工作期间，曾对抚顺全市究竟有多少处“万人坑”的问题，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调查了解。曾在整个抚顺地区，从东到西几十里地的范围内，共査出“万人坑”七十多处。实际上是，每个矿区（当年称为采炭所)、每幢工人大房子的附近，都有一座“万人坑”。而且有的地方还在工人住的大房子房山头不远处，设有一间“死人库房”。工人死了之后，死一个时在库房里单摆，死两个时，摞起来。等死人积攒多了，再一起扔进“万人坑”里。

日本帝国主义者统治煤城抚顺40年期间里，最猖狂的时期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14年。这14年间，日本帝国主义屠杀抚顺人民的血腥罪恶史，实属罄竹难书。今后如能下大气力搞些重点发掘，那么，用几十万人鲜血写成的史实来教育子孙万代，永远不忘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列强蹂躏宰割的历史，倍加珍惜幸福美好的今天，奋发图强，建设光辉灿烂的明天，将是大有益处的。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第九辑）

日本侵略者在新宾县
苇子峪等地制造的“万人坑”

张德玉

在新宾的苇子峪镇所在地的后山根下，有个大坑，现在虽

已渐渐被雨土填平，但仍显现出50年前“万人坑”的轮廓。这里，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新宾所犯下的累累罪行。

1936年（康德3年）的春天，抗日联军一师和几股抗日自卫山林队，活动在苇子峪、草盆一带。抗联到这一带收编山林队，扩充抗联队伍，补充军需，同敌人周旋，这一带便成为抗联活动的根据地。因此，也就成了日伪“扫荡讨伐”的重点地区。

这年三月初六，抗联一师的一百多人在苇子峪的杨家堡子住了下来。因为抗联战士左臂上戴有红袖标，百姓都称抗联为“红军”或“红日军”。抗联一师当时有个收编委员，25岁，中等身材，略微发胖，鼻下有一小撮胡子，叫金学武（或金小五），是朝鲜族人。抗联一师住在杨家堡子，收编委员金学武在青年农民中宣传抗日爱国、参军抗日的道理，说通了许多青年人，报名参加了抗联队伍。农民于洪元送三个孩子于守德、于景湖、于殿双参加抗联。于殿双当了“红军”后，身挎双枪，做了金学武的警卫员，一直跟到朝鲜。于洪元是山沟里出名的兽医，既会养牲口，又会给牲口治病。他的三个孩子参加了抗日联军后，红军的骡马有了病就找于洪元给医治，有时还治疗伤员。后来，抗联委派于洪元做了情报员和地下工作员，给红军传递情报，筹备粮草，购买衣鞋、大盐等物资。农历八月，庄稼已经上场。这时，日本守备队开进了苇子峪地区。他们每天都进山沟村屯里抓人、烧房屋、抢东西。无论谁只要被抓就在这个“万人坑”里砍死。每次抓人，不够一打（12人）不砍，为了凑够一打，甚至将附近庙宇中的道士也抓来充数。

十月初，日本守备队抓到了于洪元、于洪福等十几人。日本军官讯问于洪福：

“你家那些人口都哪去了”

于洪福掷地有声地说：

“户口报出了（指人口都当胡子去了，户口销了）。”

后来，日伪当局了解到于洪元的真正身份后，就对他下了毒手，严刑拷打，施尽了种种酷刑。于洪元一个人没递，一件事没说。日本人发狠地用棉花蘸“洋油”（一种煤油）烧于洪元的小便，小便被烧焦了，烧没了。于洪元一字不说，牙口缝没露，最后，献出了自己的壮年生命。

同于洪元一起被抓的抗联地工员、村长车明文，南山村长李海山，抗联战士崔化民，抗联队长王义选及两个孩子，村长万天耕，农民张永录、张洪发、纪庆林、顾仁安、黄巡官、姜振刚、王老五、张老黑子、陆文德、陆文普、王庆春、杨长山、孔长顺、孟兆福、孟兆云、王定国的叔叔、张吉福、张吉发、华九傻子、孟吉发的儿子、陆恩德、李辉洲等，还有苇子峪西山庙的道士某，及半拉岭庙宇的道士共31人，分两次全部被杀害。

在平顶山镇的“万人坑”里，日本侵略者一次就屠杀我无辜同胞60人。

北票台吉万人坑

高尔丰

北票煤田早在1775年就被发现，到1892年（光绪十八年）当地农民开始用土法开采，不久即被地主、窑主霸占。解放前，北票煤矿经历了商办、官商合办、日伪掠夺和国民党“接收”四个时期，其中以日伪统治的14年为最黑暗的时期。

1933年2月22日，日寇占领北票。不久，即接管煤矿，把

它作为进行侵略战争的物资供应基地之一。他们不断地扩大生产、充实机构，以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七·七”事变以后，日寇对煤炭的需求量急据增加，他们即着手开凿三宝一坑和台吉一坑，这两个坑口于1938年和1939年相继投产。以后又有南山坑、台吉二坑、台吉三坑先后投产。这样，1940年年产量达100万吨，到1944年就增加了128万多吨。

在不断扩大生产的同时，日寇和汉奸把头还通过以下几种方法获得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

一、通过汉奸、把头采取招、骗的办法，从北票四郊、东北三省以至关内各省骗来大批农村中的破产农民和城市失业者。这些人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背井离乡，到矿山来谋生。

二、把在河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抓捕来的青壮年和抗日军政人员押进闷罐车送到北票（日寇称这些人为“特殊工人”）。还把在绥中、兴城、热河一带集家并村时胁迫来的大量农民、渔民及其家属们也送到北票当劳工。

三、与当地封建势力相勾结，使掠夺劳动力合法化。日寇授意伪吐默特中旗旗长泌布多尔济（小王爷）炮制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地盘育成方案”，规定凡18至55岁的男性公民都必须到矿山当义务工4—6个月。北票煤矿因推行“地盘育成方案”有功，曾受到伪满洲国的通令嘉奖，并将此“方案”在东北满煤炭系统普遍推广。

四、强征“勤劳奉公队”（国兵漏）到煤矿“服劳役”。

这些人来矿山之后，就好象进了人间地狱，从此开始了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

日寇除了直接进行残酷统治以外，更主要采取“以华治华”的办法。他们豢养了一大批汉奸、把头和流氓打手为自己效劳；设立了34家封建把头“大柜”，有大小把头58人；成立

了半武装的“防止班”、“劳务系”和全武装的宪 兵队、矿警队等10课、8所、39个系，对矿工进行严密的统治。矿工走路时两人不准说话，三五人不准成群，更不准谈论国事，否则便以“思想犯”、“政治犯”、“国事犯”、“嫌疑犯”等罪名论罪。矿工干活时有手持镢头的鬼子、把头监工，稍作休息便会遭到打骂。矿工上下班出入厂矿大门时都要经过搜身。

在生活上，矿工们的境况更是悲惨，带家眷的矿工被赶进四周有高墙、墙上有电网的工村居住，出入工村大门时有矿警检查，不能随意行动。矿工每天劳动十二三个小时，只发给6角（独身）或8角（家族）饭票（实物引证卷）和一二角工资。这种饭票只能在日寇或把头开设的店铺内使用，从而又被榨取一部分。月末发薪时（每天一二角工资按月发），把头们还要克扣所谓“手续费”、“溜须费”等，往往到了工人手上只剩下几分之一。除此之外，把头们还开当铺、放高利贷、设赌局，挖空心思地剥削工人。至于那些单身劳工和从解放区抓来的青壮年及抗日军政人员，生活更是不堪忍受了。刚到矿上，鬼子、把头就对他们进行照相、按指纹、编号、登记，登记卡上把每个劳工的身体特征、皮肤颜色等几十个项目都填写齐全，然后押入四面是高墙、电网，门口有武装警察日夜把守的“协和寮”或“报国寮”（即集中营）里，不许随便出入。上工时由警察押送到井口，下工时再由警察押回。他们根本领不到工钱，吃的是发了霉的高粱米粥、烂土豆、橡子面和豆饼等。饭不够吃的时候，管劳工的就往粥桶里倒凉水。就这样的饭食还只有上班的人才能凭饭牌去吃，不上班的没有饭牌，只好挨饿。他们白天在条件极其恶劣的掌子面上作业，晚上30多人挤在一条又脏又凉又潮的大炕上睡觉。没有被褥，他们铺的是炕席头，枕头是砖头、木块；冬天冷极了无法入睡，只好几个人背靠背互相取

暖。夏天，这里蚊蝇成群、瘟疫流行。患病的劳工不但得不到医治，把头还手持大棒强逼上工，说什么“脑袋硬不硬？硬，就得上工！”

在这样恶劣的工作、生活环境中，工人的死亡率极高，特别是随着日寇的战争升级，煤炭的需求量迅速增加，日寇采取“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方针，实行“以人换煤，要煤不要人”的“人肉开采”政策。他们不顾矿工的生命安全，强迫他们冒险作业，这样，井下几乎天天死人，透水、片帮、冒顶、跑车、瓦斯爆炸等重大事故经常发生。例如，1941年，原台吉一坑西马路八片瓦斯爆炸，三名电工和七八名工人全部烧死；1942年，原台吉一坑的一斜坑六片采煤工作面瓦斯很大，但日本人佐佐木强逼工人采煤，结果瓦斯爆炸，30多名矿工无一幸免；1943年台吉报国寮每月都得死一二百人，一天最多死28人。这一年从山东武定府抓来500多名劳工，不到一年只剩下十几个人，死亡率竟达97%！

从1938年“大采炭”算起，日寇每掠夺1 000吨煤，便有4名工人死亡。据不完全统计，日寇在北票煤矿残害死的工人数在3.12万多人以上。

为了处理死难矿工的尸体，日寇和把头在台吉成立了收尸所，每天死难矿工的尸体用大车拉出去埋葬。台吉南山万人坑便是埋葬死难矿工的地点之一。在这大约1.7万平方米的土地上，从1940年到日寇投降仅5年时间，就埋葬了6 500具以上。

最初，矿工死亡以后，还能有一个五分板的薄木棺材盛殓或一领炕席裹尸，然后送到南山成排地埋葬。在一块约70平方米的狭长土地上就埋了40多具尸体。宽的地方埋12排，窄的地方埋七八排，每排仅距1米左右，有的则是紧紧相连。每到秋天，把头就派人预先挖好三四百个坑，但不到第二年春天就埋满了，

无坑可埋的尸体便被随意抛弃在山野，任凭狗啃狼餐。

后来，矿工的死亡人数大增，日寇和把头为了省钱省事，就在这挖下菜窖形的大坑，号称“人窖”。他们把死难者扒光衣报，每4至6人一颠一倒装进一个用板皮钉的木笼，埋进大坑。坑深1.8米左右，埋2层至5层不等。在一个不到60平方米的大“人窖”里埋了240多具尸体。象这样的“人窖”在台吉南山万人坑共有3处。

当“人窖”已经不能满足埋葬矿工尸体的需要时，日寇和把头便利用山上天然的大沟，这里既不占地，又不挖坑。他们在沟中间用木板做一道板墙，截断大沟的出口，这样就形成了巨大的深坑。当时，台吉收尸所从宋杖子一个姓修的地主家雇了两辆大车专拉死尸。每天，大车装满尸体之后，用绳一攏，拉到南山，倒进坑里就算完事。据老工人回忆，仅1944年冬天就往这大沟扔了700多具尸体；而1943年除夕这一天，台吉收尸所就拉出尸体4车，共48具。现在残留的和挖出的白骨，有的被铁丝捆绑，可以想见这位矿工生前一定曾进行反抗，被残害致死；有的头骨上有窟窿，估计这位矿工是被把头用锹头打破头颅而死；有的下肢骨断成几截，推测这位矿工很可能是逃跑后被抓住，被鬼子、把头打断下肢，受尽折磨而死。还有一具遗骨呈挣扎之状，可以肯定这位工人还没有死就被埋入万人坑。真令人不忍目睹！

当时，台吉南山这个距离工村不足2 000米的地方，白天野狗成群，乌鸦成阵，夜间恶狼出没，它们任意撕咬着死难矿工的尸骨。每适春暖解冻，尸体腐烂，血水顺着大沟流出很远。到解放时，沟里堆积的白骨达3米多厚！

（摘自《北票文史资料》第一辑）

日伪统治下苦难的丰满劳工

刘桂琴

丰满水电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东北期间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力发电工程。在这一巨大工程的建筑过程中，日本侵略者和少数中华民族的叛逆，残酷奴役、迫害8万余名中国劳工，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数以万计的中国劳工在这工程中折磨致死，遗留在丰满江东的"万人坑"，就是日本侵略者铁蹄下丰满劳工苦难遭遇的历史见证。本文主要记述日伪统治时期丰满劳工的苦难生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东北变为它侵占全中国的战略基地，急需开发动力资源。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为此于1936年1月17日及8月28日，先后两次指示伪满政府，要提前修建第二松花江丰满水力电气发电所。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在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的炮声中，丰满水力电气发电所的工程，这年9月正式破土动工，1942年9月完成；1943年春开始发电，主要工程建筑历经了5年多的时间。丰满水力电气发电所的修筑工程是非常巨大的。要建成一座高91米、长1 100米，堤体210万立方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重力型大坝，最高水位标高266米，最低水位标高248.5米，总储水量125亿立方米；堤下建厂房，安装7万千瓦的巨型水轮发电机10台（第一期完成8台，第二期2台），总发电量为120万千瓦。这样庞大的工程，在当时机械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需要的劳动力当然是相当多的。据有关人员供认，当时丰满使用的劳动力达2250万人次，平均每天得1万至1.2万人。日本侵

略者及其走狗，采取用欺骗办法到关内招募劳工、收降保安补充队士兵、使用勤劳奉仕队、摊派劳工、用犯人当劳工和就地抓劳工等种种手段，把8万多中国劳工骗、逼，抓到丰满，投入这苦难的深渊，供他们驱使、奴役，流尽了血汗，直至被夺去宝贵的生命。

一、非人的生活

丰满原本是个偏僻荒凉的小山沟，上万名劳工一下子涌到这里，不仅是进入到了一个庞大的施工现场，而且是被抛到了一座可怕的人间地狱。

被鬼子骗逼抓来丰满的劳工们，统统住在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工棚里。从江东岸大坝的坝址一直排到五晌地，有五六里长，一百多座。工棚的结构没有砖瓦，也没有玻璃，非常简陋粗糙。一种是：就地起"炕"。土分两边铺上席子就是炕。有的炕长12米，还有更长的。多数住200人。没有窗户，两头开门，上边搭马架子，盖上油纸或者秫秸就算了事。这种工棚既没有火炕也没有火炉。到了冬季，四面透风，炕上冰凉，根本不能睡觉，只好弄些柴禾生火取暖。极度疲劳的身子一沾上暖气就都睡着了。有时余火未烬，往往发生烧死劳工的事件。1938年除夕，劳工工棚失火，当场烧死67人。另一种是：钉一圈桩子，四周围上席子，棚内中间挖二尺宽的沟，沟里下几根管子作为烟道。刚搭炕时通两天，过几天就不通了，不进一点烟火，棚内阴暗潮湿，到处是蚊子、跳蚤，人只要一进工棚，腿上就会叮一层，其痒无比。6月天下大雨，棚内下小雨，地上汪着一尺多深的水，被子、鞋是湿的，劳工的身上全是湿的。多数劳工生了疥疮，鬼子根本不给治，很多劳工被疥疮折磨死了。

当时，丰满的冬天是非常冷的，每天都在零下四十一二度

左右。寒风刺骨、冰天雪地，把人的肉都冻木了。有的实在困极了睡着了，脚冻得失去了知觉，脚后跟让大耗子咬掉都不知道。有的就两个人一颠一倒睡，你搂我脚，我搂你脚。早晨起来破被上白花花一层冰霜，破棉鞋冻得怎么使劲也穿不上。

从上海来的劳工是夏天来的，多数穿短裤单衣，又没什么铺盖，在工棚睡觉时冻死不少。吴洪贵、万恒生等一起从上海来的126人，一冬过后死去66人，一年以后，只剩下十几个人。

工棚既不暖和又不结实，多是用树干和小木杆搭起来的，一天晚上刮大风，工棚被刮倒好几座，有一座工棚倒塌竟压死劳工40多个。

被招骗的劳工，早期来的先还给一顿疙瘩汤喝，第二天早上就开始吃高粱米；可后期来的连那唯一的一顿疙瘩汤也吃不着了。高粱米红的象血，一半壳一半米，硬的象石头子。苞米面是焐的，蒸出来的窝窝头是红的，吃到嘴里恶苦。1939年以后，又吃上了橡子面。鬼子给劳工的粮食本来就不够数，大柜克扣一层，二柜克扣一层，领班的鬼子再从中捞 油水，到了劳工的口里只剩下几两米，粮食不足就给劳工吃橡子面。由于吃不饱，饿得直不起腰，浑身直打哆嗦。鬼子规定：早、晚饭在工棚吃，中午饭无冬无夏都要在工地吃。数九寒天在工地吃饭，饭送到工地已冻得冰凉棒硬，尤其是苞米面窝头用麻袋装着送到工地，由于路程远，窝头冻成一团，得用木棒往下敲。劳工们只得用冻僵的双手，捧着带冰碴的窝头，连同止不住的辛酸泪一齐往下咽。

初期，劳工穿的是更生布衣服。这种衣服头几天还可以，可是穿不几天就磨飞了，雨天一浇衣服就散花了，原来是用浆子糊的。后来，劳工越来越多，就连更生布衣也没有了。天气一冷，劳工们要衣没衣，要布没布，真是叫苦连天。实在冻得不

行，就把被子披在身上，被子破了就披麻袋，有的把麻袋抠三个窟窿，伸出脑袋和两个胳膊这样当衣服穿。后来就穿草袋子，有的劳工把草绳子缠在腿上。1939年以后，麻袋片没有了，草袋子也没有了，劳工们就到处找水泥袋子纸，把纸揉软了硬往身上套，象贴膏药似的，破纸包破纸，破布包破布，弄得个个奇形怪状。脚下穿的是“礼拜鞋”，更生布的面，更生布的底，穿不上一个礼拜就破了，底也折了，泥雪渗进鞋膛里，晚上脱不下来，鞋和脚冻在一块了。劳工冯福林来丰满第一年冬天就是脚穿这样的礼拜鞋，身披麻袋片里边塞上些水泥袋子纸过的冬。

劳工们受着这样非人生活的折磨，他们得到的一点工钱，还要受大柜、二柜、领班等的层层盘剥，这些大小工头用种种手段对劳工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当时在劳工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苦力工，真受苦；
吃的不如牛马饭，
身上披的麻袋片，
土炕好比卧冰块，
你说心酸不心酸。

二、死亡的劳役

鬼子的工程是风雨不误，昼夜不停，两班倒，12小时对开。整个施工现场尤如一张血盆大口，每日每时每刻在吞噬着劳工的生命。

每天早5点监工、拉杆、棒子队就到各工棚吆喝，催人上工。把劳工集合后，进行严格的点名。大柜点完了二柜点，二柜点

完再由领班的拿着棍 棒象赶牛马一样把劳工赶上工地。劳工们便开始了一天沉重的劳役。劳工生病、受了伤，不但不给医治，还得继续上工。拉杆的用木棒敲敲劳工的脑袋说："看你脑袋硬不硬，硬就得上工。"或者说："看你眼珠动不动，动就得上工。"

大坝动工就开始截流打围堰，紧接着就是挖掘坝基。坝基要挖30多米深，鬼子的机械化程度低得可怜，几乎全用人工开挖，全靠劳工们一镐一镐地刨。数九严寒，在零下四十几度的天气里，晴天下青雪，阴天飞雪片，太阳就象蒙上一层纱，只有影子没有热量。这么冷的天，身穿皮袄在露天12小时也抗不住冻，可怜那些身披破被、麻袋片、洋灰袋子纸的劳工，在现场正在干活，手拄着镐，一转身就倒地冻死了，每天在现场都要冻死几个。就是这样，劳工也逃不脱监工棍棒的毒打。他们没有一点休息的机会，只要直直腰，喘口气就会飞来一顿棍棒，得哪打哪，打死了就把尸首拖走，打伤了还得继续干。

苦役中的劳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工程也没有任何安全设施，可鬼子为了加快速度，拼命抢时间，逼迫劳工们掏洞取土。这是非常危险的作业。洞子越掏越大，却不许用木头支起来，结果冻土崩塌，把劳工砸在里面。金孝发亲眼见一个洞子进去38个人，塌方后只跑出6个。金孝发和同伴们赶去要救，监工的不但不让救，还把前来呼救的劳工用镐砍死。鬼子们说什么："中国人大大的有，死了死了的没关系"。当时，劳工们把这九死一生的洞叫做死亡洞。

在大坝浇捣混凝土时，劳工浇捣得下到平仓去，可人的双腿一陷入混凝土里就一时拔不出来，而开起重机的鬼子不管下面平仓有没有人，就把大缸混凝土倒下来，竟把人活活浇在大坝里。

石匠的大部分工作是钻眼。用手钻钻出半米深的圆眼，塞

进炸药，每天早、午、晚、半夜放四回炮，可每次放炮都有不响的哑炮。监工强迫工匠接着在原地钻眼，由于热力传导，引起哑炮爆炸。凿眼的人被炸得飞上了天，附近打眼的也受了重伤或轻伤，被炸石匠的头、胳膊、腿和肠子从天上掉下来，有的挂在树上，有的落在山坡，把石头都染红了。王永昌亲眼看见一次就崩死3个石匠，真是惨不忍睹。

到1941年，大坝越修越高，鬼子为了减少上坝走路的时间，让劳工快点到坝上干活，不修人行道，却让劳工坐在3平方米的吊缸周围，用吊机把人吊到六七十米的高处。吊机开的速度快，又没有牢固的地方抓，劳工们个个心惊胆颤，经常把劳工从半空中闪下来摔死。可开吊机的鬼子却不以为然，反而以这取乐。

1942年，到坝上干活的人越来越多了，多数是坐闷罐上去，一次吊钢轨，却让很多劳工坐在钢轨上一齐往上吊，刚起吊不一会，吊机冷丁往外一拧，结果连人带钢轨全掉下去了，所有的人全摔死了，有的竟摔成几截。

这年大坝塞流合拢。施工在冒险中进行，结果合拢被激流冲垮，正在堵塞棉被和麻袋的100多名劳工被奔腾的江水冲走。

劳工们对自己从事的苦难劳役，编出了一首悲壮的歌：

钢筋是我们劳工的骨头，
水泥是我们劳工的肉，
水就是我们劳工的血呀，
大坝是用我们劳工的血肉筑成。

三、残酷的迫害

为了严密监视手无寸铁的劳工，防止他们逃跑、暴动，日本鬼子在丰满这个小小的村镇布下了秘密特务网，设置了名目

繁多的统治机构。

丰满劳务股：专门管理劳工，劳工的一切事务全由它来掌握。

监视股：有大大小小的监工、工头、拉杆负责现场监督和夜里放哨巡逻。当时丰满有几万名劳工，可这些监工、拉干、工头就有几千人。

宪兵队：在江西桥头设有日本宪兵队。丰满的东、西、北山头又分别驻有日本兵，有三四十人。他们可以对劳工随意进行盘问、搜查、逮捕、拷问，甚至对工棚搞全面围袭。

丰满警察署，负责维持治安，有30至40人，上司是吉林警察局。

同时，丰满还有日本警备队和白俄警备队。在现场大门处还设了个警务班，有十几个人。

数千名监工、拉杆、工头、警备队象毒蛇般盘旋于劳工中间。他们对待劳工凶狠残暴，随便打人，随便抓人，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劳工身上，对劳工施以毒刑，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

上海劳工金孝发来到丰满方知受骗了。他对其他工友说："在这个地方，跑又跑不了；回又回不去，还不得活活冻死呀！"此话被拉杆听见，把他抓去用镐头棍打得死去活来。过了一个月，特务课又来人不分青红皂白将他抓走。到特务课用皮鞭抽、灌辣椒水，硬说他是红军，一边灌一边问他招不招，直到灌得鼻子淌血，昏死过去，才把他拉回去。

秋末的一天晚上，6个山东劳工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工棚。工棚里冷风飕飕，土炕凉得冰手，不由勾起了思乡之情。6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议论起家乡来。正说话间，只听得破门被打得梆梆响，一个拉杆扯着破锣式的嗓子嚎叫着："都给我滚出来，快，

快。”6个人不知情由便起身出门，谁知刚一钻出工棚，就被拉杆拽住，反绑了双手。两个拉杆和巡夜的看守拿着木棒劈头就打，嘴里还叫着：“看你们哪个还敢想家，想家我就让你们回老家。”这6个劳工被活活打死了。

李开邦刚来丰满惦记家中，只因给河北老家写了一封信，便被日本人当作共产党嫌疑而关进监狱。1945年6月，因四号变压器突然爆炸起火，鬼子进行大逮捕，李开邦又二次被捕入狱，直到光复，才被放出来。

1945年5月初，发电所电焊车间的瓦斯罐突然爆炸起火，鬼子认为有意破坏，对工人进行逮捕刑讯，把范文才父子等抓去。据前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原日伪永吉县警务科附野琦茂作供认：“我命部下警长付国祥等3名，于该日下午1时逮捕了在爆炸现场附近从事劳动的中国和平居民男子30名，在特务室审讯后，当天全部释放。翌日下午4时许，我指挥部下警长付国祥等3名，在丰满车站后山中国和平居民集体宿舍（工棚），说河北省人范文才（约50岁）、其子（约13岁）及范某（约50岁男子）共3名是抗日有关人员，将其逮捕，在桌子与桌子中间置一木杆，穿过范文才的两臂上大挂而进行了刑讯，历时30分钟，向小孩威吓说：‘若不说实话就揍你。’并打了范文才5个嘴巴，审讯了三人后，送往伪吉林县警务科。”

劳工逃跑是鬼子的大忌，所以对逃跑的劳工的刑法也就更重更惨。劳工刘瑞祥亲眼目睹：有两个劳工逃跑被鬼子抓回来，当时被打死一人，剩下的一人被吊在一棵大树上，衣服扒得净光，用皮鞭沾水抽，肉都打飞了，直到打死为止。还威逼劳工们来看，劳工们偷偷地掉泪不忍心看，可鬼子吆喝着：“统统地看，不许哭，谁要再跑，这就是样子。”鬼子还把没有打死的劳工，用铁丝拧上双手双脚，把伤口撒上盐，扔到江里去了。最

多一天拉出去138人，5天就死了300多人。

鬼子的刑法很多，还有：

冻冰棍：冬天，把人的衣服扒光，绑在木杆上，往人身上泼凉水，边泼凉水边上冻，将人活活冻死。

鬼推磨：用大筐装土，反扣于地下，让受刑的劳工扒在筐上，身上横一条肩担，用两个人在肩担两头压，把肩担都压折了。

胶皮管子打：用胶皮管子打，虽然皮肤表面没有什么伤痕，可骨头已碎了。

装麻袋里打：把人装进麻袋吊在树上用木棒毒打，把人打得浑身是伤、血肉模糊。

真是：

进了小丰满，
如进鬼门关，
汉奸把头似虎狼，
十个难有九个活。

四、血腥的万人坑

当时，在劳工中流传着这样一首催人泪下的歌谣：

日本鬼子狠又凶，
拿咱工人不当人，
冻饿摔死上千万，
丰满东山有个万人坑。

万人坑，位于松长输电线第十号铁塔脚下，距大坝6公里的

一座东山上。鬼子叫它“中国人的墓地”。丰满工地上死亡的劳工日益增多，从1938年开始就集中往万人坑送死人了。

建坝初期，劳工死了还给一口薄木棺材，可慢慢地就用席子取代了，到了后来，连席子也没有了，就囫囵个地往万人坑送。冬天，把死人攒在一块垛成垛，用爬犁、马车往万人坑拉，一次可运几十具。开始时有坟，后来坟挨坟，埋不下了，就坟摞坟。这样也埋不下了，干脆，把坟都起出来，扔进万人坑的3条100米长、4米宽、2米深的大沟里。他们把劳工的尸体象卸柴禾一样的往沟里扔。据统计，埋进万人坑的死难劳工有1.5万多人。

当年的万人坑是血腥闻名的，其景象非常恐怖凄惨。满山遍野都是尸骨，白天狗成群，夜里狼成帮，乌鸦也飞来啄吃人肉。它们撕扯着劳工的尸体、脑浆和心脏，血淋淋地拖得满坡都是。狗都吃红了眼，附近根本没人敢过路。

丰满水电站就是这样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统治下，用中国工人的血肉建筑起来的。丰满劳工的苦难遭遇，是旧社会中国工人阶级生活的缩影，回顾这一惨痛的历史，生长在新中国的年青一代的工人，应该从中得到教育，更加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为加速祖国的四化建设大业奋发向上，开拓前进！

丰满万人坑

王维军

丰满万人坑现名丰满陵园，座落在丰满和孟家村之间的一个小山丘上，离丰满街约两公里。它的主体部分是1964年建成

的。整个陵园由正门、纪念碑、丰满劳工纪念馆三部分构成，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

丰满大坝是1937年4月动工的，每天都有劳工死亡，到1938年，死的劳工更多了，日本鬼子就让人把劳工死尸往万人坑里扔。没几个月的时间，大坑被填满了，就在大坑周围挖了不少小坑，小坑被填满了，就把死尸乱扔在坑的周围，一堆堆，一片片，不知有多少，这种人间惨状是罕见的。起初劳工死了还给一个薄板棺材，后来死的人多了，就用席子卷，两头用绳子一捆，扔进坑里了事。后来死的人越来越多，可以说无日不死人，席子也不给了，就用两个草袋子把死尸套起来，往坑里扔，再往后连草袋子也不给了，把死尸堆在一起，用车或马爬犁拉到万人坑去，有的劳工得了重病还没死也被扔进了万人坑。有一个重病号劳工被装上爬犁的时候，嘴里还说道："我还没死呀，我还活着哪……"但谁听他的呢，还没断气就被扔进了万人坑，活活被野狗吃掉了。

万人坑里尸体纵横，狼撕狗咬，无头断臂，腥臭熏人。幸存劳工刁岐山说，一次回家，发现柴禾垛旁有半只人胳膊，是狗从万人坑里叼来的。家狗都变成野狗了，白天三五成群把死尸从坑里拖出来，边吃死尸，边龇牙狂吠，互相撕咬。夜间，野狼也成群来吃死尸。万人坑附近的穷苦居民一到日暮就紧闭门户，听到野狼吃死人的嚎叫声，时常从梦中惊醒，头发根直竖。万人坑成了野狗、野狼、乌鸦抒食的地方。

住在万人坑附近王庆的父亲曾亲历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从关里来了一位妇女，是来找丈夫的，到丰满一打听，她丈夫已死了，她就到万人坑去哭，哭得死去活来，这凄厉的哭声引来一些人陪着落泪。王庆的父亲就把她劝到家去，给她做些好吃的饭食，可她哪里吃得下去呢。她在王家住一宿，第二天又

到万人坑去哭。到晚间不见人回来，王老汉就到万人坑去找，可是连个人影都没找着，后来发现一只鞋，正是那妇女穿的，人却不知道哪去了……丰满万人坑大约埋葬了我们的同胞四到五千名，这是日寇汉奸犯下的滔天罪行。

日伪罪行的历史见证
——方家坟

张家珠

东北各地和关内部份省区以及日本、越南、柬埔寨等中外友人，先后已有282万多人次到吉林省辽源市凭吊辽源煤矿的矿工墓——“方家坟”，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时期死难的矿工表示深切的悼念。

“方家坟”是1941年到1945年，辽源煤矿“方家柜”死难矿工的墓地。位于辽源煤矿泰信东二井的西南方，是日伪统治时期在辽源煤矿遗留的许多墓地之一，是原西安煤矿（现辽源煤矿）最大的柜头——“方家柜”的万人坑。虽然名为“方家坟”，其实里面埋的没有一个方家的人，全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把头残害致死的矿工。

矿工墓占地不到两公顷，竟埋葬了数以万计的矿工尸骨，到处荒冢累累，白骨粼粼。1963年9月，辽源矿务局泰信煤矿1300多名职工，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这里凭吊和祭扫。祭扫的人们清除表土，看到一排排尸骨密密麻麻，一个挨着一个，一层压着一层。人们屏住呼吸，含着眼泪，默默地掉念这些死难的阶级弟兄。

在墓地的东南坡，人们发现仅仅296平方米的地方，竟埋着3行尸骨，共有179具！这些尸骨肩靠着肩，腿挨着腿，尸骨之

间只有拳头大的距离。

在这里埋葬的矿工，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忠实走狗、日特华工大把头方明、方成两兄弟及其“方家柜”的总经理蔡九龄，从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地招募、拐骗、活捉来的劳工。他们被抓骗到“方家柜”以后，受尽了日本侵略者、封建把头的残酷迫害，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大批、大批的矿工死于饥饿、疾病、事故和残害之中。从尸骨上完好洁白的牙齿可以看出，死者大都是青壮年。据老工人回忆说，因为井下发生瓦斯爆炸等重大伤亡事故，工人成批死亡，成批埋葬。从尸骨的形状可以推断，工人死亡时有的歪着头，有的蜷着腿，有的双手和双腿被一道道铁丝捆绑着。还有的头骨、臂骨、腿骨上残留着很深的刀砍斧伤痕迹。其中有的颅骨被打塌，有的腿骨被砍断。也有的盆骨变黑，表明死者生前曾受过电刑。

在荒丘的西坡，有一块方形草地，这是当年“炼人炉”的旧址。在土皮下可以看到一层层的骨灰和焦土。据老工人回忆说，“方家坟”从1941年开始埋人，一年零八个月坟地就埋满了。从那以后，他们为焚尸灭迹，掩人耳目，就在这里修了一座“炼人炉”，成千上万的矿工尸体，甚至还有没咽气的活人，都被拖到这里烧成灰烬。

辽源煤矿职工祭扫矿工墓——“方家坟”时，还从一具尸体的右胸部发现一张七寸见方的“工票”，外边包一层黑蜡纸。这张工票虽然在土里埋了20多年，但字迹仍很清楚。工票上有牛世清的名字，印有“方家柜”的印记。工票上记载，牛世清在伪康德9年(1942年)11月上了30个班，应得工资32.34元，可是扣去各种莫须有项目的扣款后，不但分文没得，还倒欠柜上4.24元。有人根据这张工票和其他有关资料计算出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把头，从工人身上榨取了比工人工资高8倍到14倍

的剩余价值。

“方家坟”已经成为东北地区、吉林省和辽源市人民进行阶级教育的活教材。“方家坟”向全世界控诉着日伪统治者残害矿工的滔天罪行。一位哲学工作者在凭吊矿工墓以后说：“这是日本强盗侵略罪行的历史见证，是对旧社会的无言控诉，是一部活生生的简明《资本论》。”一些没有经历过旧社会苦难的青年学生说，看了“方家坟”，才真正知道旧社会是个地地道道的吃人社会。来自吉林、辽宁、黑龙江以及关内各地的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干部和解放军战士，向死难矿工献了1 000多个花圈，还有挽联和墓碑。辽源人民为悼念死难矿工，在原“方家坟”的墓地前敬立了一座高大的墓碑。墓碑的正面刻着：“日伪统治时期辽源煤矿死难矿工墓”，背面刻着：“永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十个醒目大字。辽源煤矿的矿工和当地中、小学生，在墓地的四周栽植了1万多棵松、柏常青树。1983年，吉林省人民政府正式确定辽源矿工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摘自《辽源文史资料》）

鹤岗“东山万人坑”

黑龙江省鹤岗市政协

黑龙江省鹤岗市有个“东山万人坑”，坑内累累白骨，是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掠夺我资源、蹂躏我同胞的如山铁证。1981年1月，“东山万人坑”被列为黑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山万人坑”是鹤岗两个最大的万人坑之一。1968年10

月，为了使子孙后代了解过去，不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前辈的苦难，掘开了“东山万人坑”的一角，在这长10米、宽8米、深2米多的小小坑内，就堆积着死难矿工的尸骨千余具。

据多次调查，这些尸骨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一）在日本人残酷统治压迫下劳累致死的矿工、外包工。

据老工人廉成山回忆：“1941年，我大哥在兴山二坑干活时得了病，劳务系的把头到家来催班，看到他躺在炕上，便抡起皮鞭没头没脑地打了一顿，硬是逼着他上了班。我大哥有病又遭毒打、劳累再挨水淋（当时在水场子干活），没过三天就离开了人世。1942年，兴山二坑从关内招来1 000多名18至30岁的工人，因干活时间太长（早3点到晚9点），又缺乏营养——尽吃橡子面和发霉的苞米面，喝臭水沟里的水，到后来，这些人只剩下90多人，其余的人都被活活累死、饿死。这些死者，大多被扔在了乱尸岗上。”南山矿退休老工人许延岭回忆说：“康德6年（1939年），为了修南——东线（现洋灰厂子东侧的那条）铁路，从天津招来了外包工600多人。日本人为加速对我煤炭的掠夺，不顾工人的死活，强迫加快施工进度。工人们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披星戴月干着繁重的体力活。铁路尚未修完，人已累死500多，全都扔到了东面的荒山坡上。”

（二）日本侵略者无视工人的生命安全，施行野蛮的掠夺式开采，导致井下事故不断发生，矿工大量伤亡。

据老工人高广红回忆：1940年3月，他妹夫吴长才、妹夫之兄吴长松和外甥龚长生等一起，由老家山东平阴县被把头王金才招来鹤岗当工人，在南岗“天”井口（后来的南山二坑）干活。5月初，妹夫在井下头被砸碎，当即身死。不到十天，妹夫的哥哥也被砸死。老工人姜长旺说：“那时我在兴山二坑干活，有一段时间我们送下山（下坡的坑道），连续送了40多米。日本

人为了加快进度，不让棚棚子。当时我们7个人在那里干活，我到下边去取钎子，等我从下边回到场子时，才知道出了事故，40米无棚区全部塌方，那6人全被埋里了。待我爬出来后，日本人硬说我偷懒没在井下干活，不容分辩就毒打我一顿。”新一矿退休工人齐华民回忆：1943年1月6日下午1点，由于日本人只顾要煤，强令工人在瓦斯积聚区干活，导致南山三坑发生了瓦斯爆炸事件。爆炸后日本人为了保住井口，竟在工人没出来的情况下硬将井口门给堵死，一直堵到晚上9时左右才扒开，扒开一看，好些工人都死在井口门附近。这次事故共死亡矿工94人。据老工人芦本忠说：在1945年6月西山槽作业场，一次就冒顶18架棚子，除了在场子面上干活的5人外，其他30多人全被砸死。类似情况，不胜枚举。开始时凡工伤死亡的工人都给口简易棺材，埋起来。后来，死者太多，不但不给棺材，而且不埋了，就将尸体往荒山坡一扔，日久腐烂，累累尸骨漫山遍野。

（三）因食物发霉糜烂、水源污染严重和医疗、卫生条件极差，以致瘟疫盛行，工人、家属们频 频因病死亡。

据老工人李春秋回忆：那时吃水很困难，工人只得吃水沟里的水。水沟里经常漂着绿苔和马粪，有时还漂着死尸，这样的水喝了，哪能不得病呢！1939年“霍乱”病流行，日本人怕传染，哪一趟房有人得病，就用铁丝网将房子全围上，不许里面的人出来，等人死了，再抬出来扔到荒山坡上。我们的工棚就在现在“万人坑”的边上，工棚死了人，就扔进大坑里。我曾见到过4个“浮浪”抬着两个用铁丝捆着、还在喊叫的人往坑里扔。据1938年就随父亲来到鹤岗的王守珍老人在1985年1月7日回忆说：“1940年大约夏末，我家和许多邻居一起由老街基搬到新街基，住了三四个月，就出现了一场大瘟疫，当时称为‘黄病’。症状是浑身发黄，连眼睛都黄。由于无钱医治，人

们就采取吃活泥鳅、用黄纸卷黄蜡点燃后熏等土法来治，根本不见效。得病者至多能活一个月。当时我家也染上了病，弟弟得病三四天就死去了，姐姐被传染，也在一个月后离开了人世。这次瘟疫流行很广。给日本建南大营的外包工，有50多人是我的老乡，1940年春天被招工来鹤岗，这时也染上了病。多时一天就死好几个，最后只剩下8个人，一看瘟疫太厉害就都跑了。当时这些老乡常来我家串门，情况是他们亲口说的。”据老工人张东方回忆：1942年一天上午10点多钟，有一个工人因得了伤寒病，被日伪把头用牛车拉到东山一坑马机头眼前火化了。当时这个工人还叫着：“我没死，我还能活！”老工人孙家山说：“康德10年（1943年）伤寒病流行，我们工棚里的工人李连义得了病。夜里，把头来抬他，他还能说话就被扔到工棚后边野狼出没的荒山坡上。第二天早上我去找他，看到的只是一只带血的鞋了。”据老工人魏文元1984年12月24日回忆：1942年从黄河边招来400多人，来后天天吃橡子面，吃了就拉稀、生病，病倒就往外拽。那些人就在现在发电厂那地方，围着炉灰焦炭取暖，以垃圾堆里的烂菜叶充饥，又病又饿又冻，每天都有死的，最后四百多人只剩下30多人。

尤其是在“矫正辅导院”里，连日本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当时卫生、医疗条件十分低劣。据《伪满洲国史》“伪满第12次司法官会议录”载：“因卫生设备不完全及防疫措施不足，以致罹恶疫而引起之死亡不幸事件甚多。”

鹤岗煤矿成立于1917年。日本帝国主义自1932年到1945年侵占鹤岗矿山整整14年。这14年的法西斯统治，其残酷、罪恶都是历史上罕见的，“万人坑”里中国受难者的累累白骨就是铁证！“东山万人坑”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有力控诉，是对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黑龙江省鹤岗市政协《东山万人坑》调查组供稿）

鸡西滴道矿“河北万人坑”

纪海峰　景翔九整理

黑龙江省鸡西矿区的滴道煤矿，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由日伪政权开采的矿区。滴道河北万人坑，是鸡西矿区保留完整的万人坑之一，也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实行经济掠夺的罪证。

这座万人坑在海拔315米的无名山沟中，它东枕山头，西向蛇牛河谷。

经过对万人坑的发掘，东西方向排列的尸坑已见十二排，每排长约40至70米，宽3米，整个占地面积3 840平方米。现在仅揭露出3排死难矿工的尸骨就有350余具。

日本军国主义血腥统治滴道煤矿期间犯下了“以人换煤”的种种野蛮罪行。从1943年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伪反动政权采取骗招、抓捕和摊派手段，获得了大量无偿劳力和廉价劳力，对储量丰富的滴道煤田进行疯狂掠夺。先后开出26个坑口，其中有24个坑口日产煤2 000吨左右。11年间，抢走我煤炭几百万吨。日本法西斯在滴道矿设立各种统治机构，利用警、宪、特和汉奸把头，对矿工进行层层盘剥和血腥 统治。由于日伪反动政权采取“以人换煤”的野蛮手段，井下事故频出，瘟疫流行，矿工及家属大批死亡。死难矿工被丢弃于荒山野岭之中，任凭鸟兽啄食。由于尸骨遍野，矿工见而生畏，纷纷逃跑。日本人

采取了销尸灭迹、掩人耳目的手段，开始把乱葬的河北北山沟做为集中掩埋尸骨的地点。这就是万人坑的由来。

1937年老二井第一次瓦斯爆炸，死亡180多人。1943年，在老二坑的又一次瓦斯大爆炸之前，副坑长徐成山曾向日本坑长颜川报告说："我到下边去了，坑内瓦斯量大，煤尘很多，要停产处理，否则就要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颜川听了摇头说："工人死了关系的没有，大出炭的要紧，你的停产说话不要。"徐成山惹不起日本人，只好自己逃命去了。没过三天的中午12点半左右瓦斯爆炸了，死亡矿工146人。其中浮浪110多人。矿工吕敬邦和吕敬伦哥俩以及吕敬邦的儿子吕顺和等，都一起惨死在这场事故之中。

平时矿上没有大型恶性事故发生，一天也要伤亡二三十人。

政治上受奴役欺压，经济上受敲榨盘剥的矿工，每班都干十五六个小时以上的活，再加上矿区流行瘟疫（伤寒病），工人大批死亡。1938年至1940年3月间，滴道矿闹过两次"窝子病"，最多一天死去40多人。

那时，日伪统治者在现在河北小市场附近，现河北浴池旧址，以及各工人大房子，都设了病号房，名曰"杂役班"。凡得病的工人都被赶到病号房去，得不到医治，人死得很快。杂役班长就叫人把他们的衣服扒掉，然后扔到外面，病号房每天都死人，工人得了病凡能强打精神上班的，谁也不敢到病号房等死。滴道矿工人姜维和的父亲，就是来矿上不久得病被赶到病号房的。他们就是这样，企图把"传染病号"隔离起来，枉想保住更多劳力"大出炭"。

病号房死人的事连续发生，日伪统治者在现在河北的小市场下边的地方，设了一所死人仓库。人死了先扔进那里。据矿工王凤贤目睹，1934年3月份，死人仓库里就有500多具尸体，

都待集中掩埋处理了。

"无底棺"是一种反复运输尸体的工具，当运尸体的时候，用它掩盖活着矿工的耳目，到了被集中埋葬的河北北山沟，一拉抽底，把尸体打进坑里，接着再抬回无底棺。

随着日本侵略者"大出炭支援大东亚圣战"的叫嚷，不断加强对工人的奴化宣传教育和统治，死亡矿工与日俱增，再也顾不得用装门面的棺材，以至不用无底棺了。而是把成马车的尸体运走，实行集中焚烧和修建炼人炉。弄得矿区臭气熏天，瘟疫流行。

首先是在"万人坑"附近把大批尸体码成马蓮垛，浇上汽油焚烧——这便是万人坑旁的"烧尸场"。

炼人炉建成后，炼不过来尸体，又同时恢复了万人坑的薄土掩埋办法。也就是日伪政权在滴道矿采取的沟埋、坑埋、浅埋及乱葬大批矿工尸体的措施。

日本人见河北山棺材太多，用汽油烧了棺材，又叫兴把头派人在烧出的空场地挖了个宽2.5米、深1米的坑，凡以后死的人，就把尸体并排埋在坑里。就是这样也还是埋不过来，于是，日伪当局又采取把死人集中起来，扔进偏僻的河北北山沟的乱葬办法，这就形成了河北万人坑。据不完全统计，这个万人坑，先后埋掉死难矿工的尸骨1万余具。

在对万人坑的发掘中，通过对坑里有棺、无棺等埋葬方式，和万人坑里骨骸各种形态残迹的考证，以及深入老矿工中调查，我们了解到万人坑的由来，也看到了矿工的死难情景。即：一是井下事故频繁致死，二是瘟疫流行致死，三是随时被残害而死。初期的一棺一尸和第二阶段的一棺两具掩埋，大多是井下伤亡事故发生后的集中掩埋。如，骨骸中的小腿部位骨折等现象，可证明死者是因当时伤残过重致死。

无底棺的分排掩埋，以及烧尸场的情形，可证明井下大型恶性事故中的大批死亡和瘟疫流行期间的大批死亡。

第三种因素的残害致死，可见：骨折、太阳穴被利器击空，软骨上遗留着刺刀类明显击穿的缝隙；还有：头骨被击穿的痕迹、颅骨中钉着铁钉、躯体被铁丝捆绑、戴镣铐或脖套等等。

日伪统治者，用十大刑法残害矿工，即：镐把打、皮鞭抽、坐老虎凳、上大挂、摔凳子、烙铁烙、冻冰棍、灌凉水、送狼狗圈（滴道矿三处）、过电。许多矿工受过跪铁道、灌辣椒水、装麻袋摔、吊打等刑法。汉奸把头还常用镩头打人。王凤贤口述说，一个小伙子在井下歇着，脑袋被镩头刨七八个眼，当场死亡。就这样被残害致死的矿工不计其数。

日伪时期，不仅矿工随时会被残害致死，就是得了病或是积劳成疾，还有一口气的，也常常被轻易扔进万人坑。滴道矿工人姜维和父亲，就是被赶进病号房当天，又被活活扔进万人坑的。

鸡西矿区何止滴道矿的河北北山一处万人坑，从地面到井下，还有吞食我苦难矿工的万人坑。至今人们仍然称呼的八坑“死人沟”，也曾经扔了死人不埋，垛成马莲垛浇上汽油烧掉。

现暖泉豆腐坊附近，1935年，当时日本人大资本家沈谷组已在滴道开矿，老二坑着火，惨死92名矿工，全部埋在那里。

通往大通沟的山坡口，也是日伪时期的“万人坑”。1943年，老二坑瓦斯爆炸死亡的人，就是在那里埋掉的。

1943年至1944年间，老二坑爆炸死亡200多人，一车拉6具尸体，都是扔进老四坑西山底下，1丈多深、5尺多宽的大沟里销尸灭迹的。

1941年前，矿工吃污水中毒，死亡的人都被扔进大甸子里，有二三千人。与李金榜（原三井工人）一同被姜把头骗招来矿

的26人，第二年春只剩下8人。

日本军国主义掠夺成性，劳力增加，死亡率也剧增。集中掩埋人数及乱葬地点，无法统计。

除地面的万人坑外，日本人还曾将发生事故的坑口门堵死，使死难矿工的尸骨，全部葬于矿井下之事也屡见不鲜。1945年老五坑瓦斯爆炸后，日本人把坑口门崩塌，堵死了活人的通路，90名矿工惨死在井下。

1943年5月，老一坑后东道跑车，把五路的电缸撞爆炸起火，烧着了顶子。日本人为灭火保住井口，也是采取惨无人道的“关门”战术，把十多个矿工闷死在井里。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黑龙江省鸡西市政协文史办供稿）

五

使用细菌武器
及“活体解剖”等罪行

[illegible]

[illegible]

背荫河畔设魔窟

李茂森

背荫河村地处五常县城以北，省会哈尔滨之南，是拉滨铁路北段的一个小站，哈五（哈尔滨至五常）公路从村内穿过。交通方便。南靠硕大户山麓，东部丘陵起伏，西部则是一望无垠的平原。镇东有东南转向西南的一条小河，名背荫河，故村名亦称背荫河。

日军进驻背荫河之后，便召集日盛祥等商号东家和周围居民开会，会上松田宣布“三天内全部倒房子，皇军要占用”，然后布告全屯。背荫河火车站东立里之内万余米宅地及建筑物全部被日军占用，然后在南部又强占20余垧良田作为军用。随之大批的日本人——诸如宪兵队、守备队、警备队等便陆续开入。

正值日盛祥等搬迁之时，伪背荫河警察分驻所所长李阴明、警士关托祥便被紧急召去伪警察第八署（拉林警察署）开会，会上命李阴明和村长逄文会从105甲中每甲轮派劳工20名，为皇军修建所谓“中马壕”。“中马城”是以日军中马大尉的名字命名。

到冬天这里已经建成一座阴森巨大的城堡，南北450米，东西230米，共约10 350平方米。内外三层套院，三道围墙，一道护城壕。墙各高5米，上安刺线电网，外墙四角相望，各修碉堡型炮台一座，上置探照灯，壕深5米，宽10米。城周只留西和西南两个大门，西门直通火车站，西南门直通机场，铁路专用线也从此进入。

1936年(伪满康德3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夜10时许,“中马城”内突然气笛长鸣,探照灯四射,枪声、哇喇哇喇的喊声混作一团,日军、伪警察倾巢出动,打着灯笼火把分四路搜查,挨家敲门查夜,惊醒了熟睡的人们,日军、伪警察追问“红胡子的有没有?”“外人有没有?”

就在日军、伪警察四处搜查之时,杨家桥屯农民杨伯去地里看庄稼,发现两个带脚镣子的“犯人”,近前一问,他们说:“是从背荫河监狱里跑出来的,快帮忙把脚镣子给砸开。”又说:“跑出30多人。”杨便去阎家洼子屯借一把大斧,将两个人的脚镣子给砸开,二人往东跑去了。

抗联战士杨克俭从“中马城”跑到八家子时,让伪自卫团的尤宪斋抓住,押送到自卫团部,被团总吴连元枪杀,并把头砍下挂在树上。

同年8月,“中马城”因两次被我破坏,加之抗联的两次袭击,感到秘密已经泄露,不得不秘密搬迁。

(摘自《五常县文史资料》)

从背荫河畔到平房

榊原秀夫　田村良雄
秦正氏　　荻原英夫
溥杰译

1931年9月18日,日本法西斯军队开始侵略中国东北,转眼之间,东北沦陷。石井窃幸良机已到,便利用宪兵警察逮捕中国的爱国人士,并把他们当作实验的“材料”,以研究细菌战

的方法，这是吃人魔王石井最得意的一手。

他要求庞大的经费，在东北设立大规模的秘密研究所，制造细菌武器，以供肆行侵略之用。这是日本军部法西斯分子寤寐以求的事情，石井的要求，立即得到允许。因此，在曾经洋溢着春耕秋收愉快歌声的背荫河畔（五常县三岔口）的肥沃的土地上，农民被逐出了家门，流离失所。就在这里，出现了实现细菌战阴谋的秘密部队。这是七三一部队的前身，所谓“加茂部队”（1933年建）。

在背荫河充作实验的人员中，有几位抗日救国勇士，利用1934年夏季某日的暴雨，打倒看守，逃出了虎口，平安地回到杨靖宇将军那里。

自从这事发生以后，石井因害怕泄露秘密和遭到中国人民的攻击，立即准备迁移。诈称背荫河部队失火，其实是自己放的火。在哈尔滨市郊南岗庙，哈尔滨陆军医院以南，修建数栋房屋，作为医院的一部分，继续进行罪恶活动。这个所谓的“医院南栋”，实质上就是在平房镇大兴土木，正式迁移的一个开端。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入中国的关内。这时，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分子越发感到侵略中苏两国必须以细菌武器为有力武器的必要。于是，石井就强占以平房车站以北约4公里正黄旗屯为中心的2平方公里的耕地为建造兵营的工地，把正黄旗村的180户、800人撵到西面去住。在关东军军需部的指导下，奴役几千名中国劳动人民，大规模地修建了“细菌制造厂”。

外围工程在1937年完成，1938年进入内部工程的阶段。石井为防止部队秘密外泄，特使他的同乡亲戚土木建筑业者铃木茂包办一切，所用的500多名服务人员，也是从故乡千叶县招募

而来的。以活人作实验的"第七栋"、"第八栋"包括有大约120间独身监房，还有特殊试验室（冻伤研究室和供研究航空卫生用的减压试验室）、实验室、尸体解剖室、标本室以及种种杀人设备，"第三栋"、"第五栋"是培育细菌室，"第四栋"、"第六栋"是细菌孵化室。以上工程及设备陆续建成。

1938年6月到1939年3月，全部迁到平房来，在所谓"南栋"（哈尔滨南岗）那里，只留下部队的"第三部"和"诊疗部"的基干，即检查病源、测验毒性、检查水质的各班和细菌制造班、滤过管制造班以及诊疗传染病的部分。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二辑）

组建七三一细菌部队

韩　晓　辛培林

日本帝国主义细菌战活动之始

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和细菌武器的研究，真正大规模地搞起来了。其"功劳"应归于石井四郎。

石井四郎，1892年生于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的一个富有的家庭。他在京都帝国大学（战后改为京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以军官候补生的身份参加了陆军。1924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研究生，专门研究病理学和细菌学。1927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28年，充当东京陆军医院军医。1930年，他受陆军省第一课课长永田铁山的派遣，以日本驻外武官的身份两次周游欧洲各地，名义上是出国考察，实质是进行"特务旅

行”。在欧洲他看到了纳粹德国进行细菌武器研究的情报，深深感到日本没有细菌武器是“国防”上的一大空白。特别是他了解到14世纪中叶的鼠疫大流行造成的灾害使欧洲各国的统治者至今还心有余悸，并把鼠疫菌排除在研究之外时，更增加了对鼠疫菌研究的兴趣。他认为，被各国排除的鼠疫菌，恰恰是日本应该单独研究并仅有的一种武器。回国后，他晋升为三等军医正（少佐），继续在陆军军医学校任“军阵防疫”教官。同时，他利用出国考察时得到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使用毒瓦斯和当时最新的关于细菌战、化学战的资料，极力鼓吹准备细菌战的必要性，叫嚷“战争专靠实力，这已过去了。科学上发明了大批杀人而不损坏物质的有力武器，帝国应立即在‘无住宅区’（指无人居住地带）建立起实验中心。”还说：制造生物武器既省钱、省料，又具有不可估量的杀伤力，这对经济危机、钢铁缺乏的日本帝国来说，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了中国东北。这时，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侵略野心恶性膨胀，战争狂热到了极点。他们野蛮凶残、丧心病狂，置国际公法、人道主义于不顾，阴谋策划细菌武器的研究和试验。于是，石井四郎研究细菌武器的主张得到了日本反动当局的赞赏和日本陆军省军务局课长永田铁山大佐（后晋升为少将）的推荐，以及日军参谋本部战略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大佐和梶塚隆二等人的支持。

于是军部立即晋升石井四郎为军医少佐，并于1932年8月，在东京若松町的陆军军医学校内成立了由他领导的细菌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当时，它设在防疫部的一处地下室里，规模较小，石井四郎也仅有5名助手，然而，石井四郎在防疫名义的掩护下，进行以细菌战为目的细菌研究和培养的罪恶

活动却从此开始了。

为了加紧细菌战活动，1932年底，日本军部一再下令，要"以物质和名望来满足石井四郎的需要"，并晋升他为军医中佐。

1933年，为了扩大细菌研究活动，经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批准，耗资20万日元，对细菌研究室进行了扩建，不仅增设了研究室、办公室、机械室、变电室和仓库，而且还修建了小型木结构的动物饲养室。扩建之后，改称为"防疫研究所"。在石井四郎的主持下，这里实际上成了日军准备细菌战的研究中心。大批的研究人员按照他的"军事医学不仅仅是治疗和预防，真正的军事医学其目的在于进攻"的反动理论，从事霍乱菌、伤寒菌、鼻疽菌、瓦斯坏疽菌等细菌的培养、使用和预防方法的研究；研制装有这些细菌的地雷、榴弹、枪弹和在水面上使用的玻璃弹等爆炸装置。因此，在这个研究所的地下室里，设有培殖细菌和研制细菌武器的秘密工厂。

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反复地作着动物血液注入人体、人关闭在染有炭疽菌的屋子里、从活人身上抽取淋巴腺等各种实验；还把中国士兵的尸体肢解，将头颅及身体各部分作为标本进行陈列；把囚犯饿死，将其躯体完整地保存起来，以备研究之用。他们还把被俘的苏联军人如何被残酷地致死，分别注入鼻疽菌的马如何发病而死，以及检验马尸的全过程等拍摄成纪录影片，给研究人员观看。除传授技术，宣传细菌战，让他们相信自己研制的细菌武器威力外，还以此培养他们杀人不眨眼的野兽的"武士道"精神和法西斯性格。

石井四郎为了防止泄露机密和避免世界人民和舆论的谴责、唾骂，对这些研究资料严格控制。他把200份实验致死的人员登记表作为绝密材料锁在地下室的一个特别房间里，责成其亲信保管，并且只允许直接参加实验的人员查阅，但也必须签

名具结，保证不将看到的资料告诉任何人。

因为这个研究所在研究和制造细菌杀人武器上有所成效，还培养了不少这方面的“人才”，所以，石井四郎洋洋得意地说，它是日本“制造军火工厂的楷模”。

祸移中国东北

一、险恶的用心

就在石井四郎领导的“防疫研究所”恶性发展的时候，石井四郎的细菌战活动也更加疯狂。他亲自执笔写出一份报告，请陆军省军医总监西汉行藏中将转交陆军大臣荒木贞夫。这个报告中说：“现在，我们感到，对细菌武器的研究，是必须加以实验的时候了，我们要求军部，把我们全体调到满洲，使我们用来维护皇军的细菌武器得以高度的发展。”日本大本营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细菌研究基地，并由石井四郎指挥这支细菌部队。

他们选择在“满洲”建立细菌研究基地，主要考虑到在中国东北容易得到细菌研究的“材料”——活人；它靠近苏联国土，气候也与其相仿佛，一旦与苏军交战，将会直接地实施细菌攻击。但在设置的具体地点上，发生了争议。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主张设在牡丹江，而石井四郎却执意把它建在“北满”的最大城市哈尔滨。结果，石井四郎的主张得到大本营的支持。1933年8月，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和文庙街中间地带，秘密设立了实质是细菌研究所的“石井部队”，其附属细菌实验场设在70多公里以外的背荫河。

“石井部队”建立以后，石井四郎一直没有露面。原来，这是因为他已成为各国情报机关注目的人物，他担心这次来“满洲”组建细菌部队的活动露出马脚。因此，石井四郎为了把石

井部队隐蔽起来，首先给它化名为“加茂部队”、“东乡部队”，并定了另一个队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他还为了不让外界把自己和石井部队联系在一起，在“满洲医大”挂了个教授的虚衔，然后秘密地潜入哈尔滨，自己也改姓为“东乡”。一切安排就绪之后，他就龟缩到长春，遥控指挥这支细菌部队的活动。

二、背荫河的“中马城”

“中马城”是石井部队（即“加茂部队”、“东乡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背荫河细菌实验场的别称。它附属于石井部队，和石井部队本部几乎是同时建立的。

背荫河距拉林镇不远，是一个不足200户居民的山村。自从拉（法）滨（哈尔滨）线铁路建成并在这里建立车站以后，它就逐步地形成了农副产品的小集散地，村东头还办起了一些杂货店、果子铺、饭馆，颇有一派农村小城镇特有的景象。

好景不长。1932年秋，“加茂部队”派黑田大尉带领一批日军选场址。他们来到背荫河，看中了这块宝地，决定在这里设“兵营”。“加茂部队”派来一个名字叫中马的大尉管辖这个“兵营”。于是，人们称它为“中马城”。

“中马城”占去了背荫河的半个屯子，堵塞了这里唯一的一条公路。它变成了与世隔绝极端秘密的军事城堡。它周围有3米多高的围墙，墙顶上架设着两道铁丝网，中间还有一道高压电网，围墙四角各修筑一座坚固的炮楼，安设两盏活动式探照灯；墙外挖有两米半宽的护城壕。它的正门朝北，一座吊桥横跨在护城壕下；吊桥里侧是两扇黑漆城门，由两名日本兵持枪把守。这里不仅中国人一律不许靠近它，而且还将其附近的交通全部切断，过往行人必须绕道而行。火车经过背荫河站，也要将车窗帘布放下，严禁旅客向车外看望。这里的日军人员禁止一切外出，禁止使用日本真名，即使用化名同国内家属通信也得经

过关东军司令部审查。

被监押在“中马城”里的人脑海里的问号，过不长的时间，即死亡临头的时候，才找到了答案。他们被秘密地押进地下室，分别绑在墙壁的铁钩子上，穿着白大褂的日本军医用粗大针管强行在他们的动脉血管上抽血。有的人由于抽血过多，身体衰弱，没有使用价值，就被骗出去，用斧头砍死；或以治病为名，给注射一种剧毒药害死。这些被残害的人，都由专业人员拖去炼油，剩下的尸骨拖进炼人炉里焚烧，骨灰就地埋掉。在监狱西侧墙外，那座经常冒出令人作呕气味的浓烟的高大烟囱，就是“中马城”监狱的焚尸炉。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一个日本雇员回忆说：“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刚男负责这里的工作，当时化名叫细谷。被试验致死的爱国者，由日本人将其尸体秘密运到这里进行焚化，骨灰就地埋掉，不准留下一点痕迹。”

1933 年，关东军副参谋长远藤三郎在背荫河视察时，看到了那里进行活人试验的情况。

三、“中马城”秘密的暴露及其迁移

“中马城”的秘密在它建成后不久就暴露了。1933 年中秋节夜晚，这里发生了暴动，30 多人越狱。其中，王子扬等12 人幸存。他们投奔抗日联军后，把“中马城”的罪行揭露出来了。

这次越狱事件发生后，日寇就预想到秘密会暴露，但他们存有侥幸心理。因此，仍在这里继续进行着细菌试验活动。11 月 16 日，远藤中佐还会同安达大佐、立花中佐，前去视察细菌试验的情况。越狱事件的发生使他们进一步加强了对“中马城”的警戒，并通过日伪当局在外围实行“并屯政策”，对中国人民实行更严密的控制。“中马城”越狱事件发生后，石井四郎感到自己把细菌实验场设在背荫河是选错了地址，把它建在抗日联军第三军的游击区是一大失策。于是，他产生了将其迁走

的想法，但为了减轻或推卸自己的责任，就采取了暂时维持、看看情况再定的办法。此后，虽然坚持细菌试验活动，但由于抗联第三军对它不断的袭扰，甚至发生了攻城未克事件，促使石井四郎 决心对“中马城”前途作出最后的决策。因此，是年年底，即12月27日深夜，石井四郎才用电话向远藤汇报了“细菌实验准备工作受到重大挫折”。他们为了处理“事故”决定第二天去背荫河观察。

12月28日，远藤三郎中佐和化名“东乡”的石井四郎在哈尔滨没有停留，直奔背荫河“中马城”。“中马城”实行了戒严，前来迎接的有中马大尉、伊达（即太田澄）大尉，还有石井四郎 的二哥细谷刚男少尉。在视察监狱的时候，石井四郎 大发雷霆。细谷刚男少尉和中马大尉一个是管监狱的，一个是负责营区警戒的，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因此，他们吓得面如土色，一声不吭。伊达大尉是细菌研究专家，当初是石井四郎点名要来的，石井四郎对他很尊重；这次越狱事件，他又毫无责任。因此，他代替细谷和中马做了检讨，使石井四郎未再大发雷霆。远藤中佐听取了详细的汇报后，就如何吸取教训、加强警戒、尽快恢复研究实验活动以及如何听从处理等问题作了指示。远藤中佐和石井四郎还作出了“必须排除障碍，继续迈进的决定”，而对“中马城”搬迁的具体打算，他们一句也没有透露。

1934年夏，“中马城”的武器弹药库突然爆炸。当时传说不一，有的说日寇不慎引起爆炸，有的说是抗联给炸的。为此，中马大尉还追查过责任，致使警备队的两个班发生了流血冲突。于是，石井四郎以“失火”为由，正式决定将“中马城”转移。其研究人员先行撤走，留下部分守卫人员拆卸机器设备，装上盖着苫布的大汽车，运往哈尔滨。他们将拆下来的房架子、门窗等卖给了村民。至此，“中马城”变成了废墟。

据“中马城”日军留守人员透露，“中马城”的日军撤到“南栋”去了。“南栋”就是加茂部队的本部。它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和文庙街之角，在日本陆军医院的南院，以日本陆军医院作掩护，进行着秘密细菌研究活动。

盘踞平房

一、平房的历史沿革

1933年，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东北的资源，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修筑了拉滨（拉法——哈尔滨）铁路。它在靠近平房屯的地方设置了一个小站，定名为“平房站”。

自1936年日本侵略军將两斐部队设营驻扎，特别是1938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颁布“关于建立平房特别军事区域”的第1539号命令之后，平房地区成为军事要地，逐渐为人们所知。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后，随着其细菌战及七三一部队罪行的揭露，平房更举世闻名了。

平房站附近，除了铁路职工家属和小商小贩外，居住的基本上都是日本人。平房镇街道两旁挂着日本人开办的“古力屋”、“酒保”、“料理店”等招牌，还有日本人、朝鲜人开设的妓院等。

如果把平房站附近的平房镇和2公里之外的日本空军第八三七二部队的营区和4公里之外的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营区等特别军事区域的面积统计在内，平房地区的范围有120平方公里。

二、大规模的营建

迁移和扩大加茂部队的战略计划，早在背荫河“中马城”崩溃的前夕就酝酿成熟了。于是，石井四郎以“意外的火灾”为由，向日军参谋本部提出申请，不久，就得到裕仁天皇的批准。

其迁移地点是距哈尔滨市20公里的平房镇。1936年，日军参谋本部根据裕仁天皇的敕令，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了两支特种部队：一是侵驻哈尔滨市平房的石井部队（即满洲第七三一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一是侵驻长春市孟家屯的若松部队（即满洲第一〇〇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兽类防疫部”。

石井部队的营建，是极为保密的一项重要工程，被称之为“特殊工业”。因此，只能由日本关东军御用的建设株式会社设计和施工。当时兼任关东军司令部军医部部长的石井四郎在长春进行了工程招标，最后确定由4个日本建设株式会社承担。它们分别派出了强有力的大林组、藤田组、松村组、铃木组，按期地开进了平房。尽管如此，对他们的信任也是有限的。为防止他们发现更多的秘密，在分配任务时，只让他们各自担负一个项目。这些施工单位中，最受器重的是铃木组。尽管它全员仅有500人，在日本千叶县是个很小的施工单位，但因为其头目铃木茂是石井四郎的同乡亲戚，所以也被从日本的加茂地方招募来，并承担内部工程，而把外体工程分给大林组、藤田组和松村组。1939年，主体工程基本竣工后，这些施工组被陆续撤走，而铃木组却一手包办了收尾工程。还有一件事更能说明石井四郎对铃木组的信任，这就是：铃木茂的儿子“小铃木”是铃木组的材料员，他把施工用的钢材用汽车拉到哈尔滨市道外区太古街变卖，中饱私囊。石井四郎发现后虽然很气愤，本应军法处置，但却没予追究，反而对铃木茂信任如故。

两年多的时间，石井部队的营建工程就全面完成了。1938年6月，石井部队的人员和设备都移驻到这里。其机构得到迅速扩大，“南栋”改为它的第三部（即防疫给水部）。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就在平房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细菌

战基地。

晋升为关东军副参谋长的远藤三郎少将，于1939年末亲临平房试验现场视察，看了平房石井部队的“惊人规模”，并同1933年背荫河细菌试验场相比后，“大有不胜今昔之感”。

庞大的机构

打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招牌的石井部队，历经3年的时间在平房建成。表面上看，它是背荫河细菌工厂的搬迁，实质上是石井部队的扩大。1938年6月，它的本部正式移驻平房，哈尔滨市内的“南栋”变成它的第三部。这时，对外的“加茂部队”的名称立即改为“东乡部队”，秘密番号为“满洲第六五九部队”。1941年法西斯德国进犯苏联后两个月，启用“满洲第七三一部队”的番号。在1945年5月，当苏联攻克柏林，法西斯德国战败投降，垂死挣扎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又将它改称“满洲二五二〇二部队”。

日本帝国主义的这支准备进行细菌战的特种部队，在其侵略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就它的规模来说，远远超出了德国法西斯建立的所谓“波兹南细菌学研究院”，是世界上最大的细菌杀人工厂。就它在日本侵略军中的地位来说，名义上是编在关东军序列，而实质上是日军参谋本部直接领导的特种部队。因此，它的人员配备非同一般，比其他部队高出一等。它配有1名中将和4名少将级军官、80余名校级军官，判任官和技师达300余名，全员为2 600余人。

七三一部队部队长，1936年至1942年7月为石井四郎少将（后晋升为中将）；1942年8月至1945年2月由北野政次少将接任；1945年3月至8月又由石井四郎中将重任。

七三一部队下设8个部、4个支队、1个所。

8个部是：

第一部为细菌研究部，菊地少将任部长。

第二部为细菌实验部，太田澄大佐兼任部长。

第三部为防疫给水部，江口中佐任部长。这个部设在哈尔滨市内宣化街，是在原“加茂部队”旧址重新组建的。

第四部为细菌生产部，川岛清少将任部长。

总务部，部长初期由中留中佐任，后期由太田澄大佐兼任。

训练教育部，部长初期由园田大佐任，后期由西俊英中佐接任。

器材供应部，由大谷少将任部长。

诊疗部，永山大佐任部长。

此外，还有一个与各部平行的管理监狱的“特别班”。它由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刚男负责。

4个支队是：

林口支队，又称一六二支队，设在林口镇和古城镇之间，拥有日本研究人员226名，榊原秀夫少佐任支队长。

孙吴支队，又称六七三支队，设在孙吴镇的西山，拥有日本研究人员136名，西俊英中佐兼任支队长。

海拉尔支队，又称五四三支队，设在海拉尔市西南3公里之地，拥有日本研究人员226名，加藤恒则少佐任支队长。

牡丹江支队，又称海林支队、六四三支队，设在海林镇东北6公里处的后腰屯（现在的福利屯），拥有日本研究人员200名，尾上正男少佐任支队长。

1个所是：

设在大连市内的“满铁卫生研究所”，拥有日本研究、工作人员92名，由安东洪次少将任所长，它的任务是培殖疫苗。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一辑）

石井魔窟参观记

（日）吉房虎雄①

滹　杰　译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终于作出自掘坟墓的最后挣扎。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原守中将对中国人民日渐高涨的抗日救国运动慌了手脚，一过了年就带着从事防谍和“特移极”②工作的我（吉房虎雄中佐），到齐齐哈尔宪兵队巡视，归途来到石井部队。

人所皆知的石井部队，就是驻在哈尔滨市郊平房挂着“陆军防疫给水部七三一部队”招牌，实际上则是以活人作实验，准备进行细菌战的一个部队。往这个部队里送活人的，就是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它把由全东北各宪兵队逮捕的“间谍”、“不轨人物”中，“不肯招认”和“事无凭证”的人，也就是无法送法院的人，用“特移极”的名义送到石井部队这个活地狱加以残害。仅一年中，在宪兵队长申请、宪兵司令官的认可之下，就“移送”了300多名爱国人士。

到哈尔滨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8时，原守和我便乘汽车离开名古屋饭店，驶过积雪的田野和土路来到石井部队驻地前方辟为机场的广场。石井和副官们都在那里等候着。

---

① 吉房虎雄，当时任关东军新京宪兵队长，后调往日本驻朝鲜军平壤宪兵队队长，升为宪兵大佐。

② 即作为细菌等项实验的活人，一般为日本宪兵队逮捕的“犯人”，为掩盖其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称其为“特移极”，以表示“特别移送处罪”之意，并在文件上盖有“特移极”三字的朱戳。

二人周旋一阵过后，石井便向飞机方向发令："开始轰炸演习。"只见东方三四百米处，一架飞机立即飞升，旋回着增加了高度。

石井望着上升的飞机说："驾驶和轰炸都是由军医来做的。"石井的面庞被防寒外套和帽子所遮，看不清轮廓，但他那八字胡却特别引人注意。他的脸发青而且水肿，说话有些哑嗓子。看他那撅起的下巴和大声说话的神气，决不像个医生的样子。

石井说明道："这是演习用的炸弹，最重要的是对它的炸裂声音进行调整。"原守总是似笑非笑地望着石井，稍稍点了点头。

"轰"的一声，炸弹在约500米附近的地方爆炸了。白色的烟雾在五六十米的地方飘荡着。炸裂声不太大。石井注视着发烟的方向，带着不自然的声音说："啊！过高了。"

又"轰"的一声，第二颗炸弹在离上次稍远的地方，比方才稍低些爆炸了。因为天气寒冷，石井咧着僵硬的嘴唇，呲着使人看着难受的牙说道："这回不错，必须这种程度才行。"

原守仍旧是点着头，显出怕冷的样子，向飞机的方向看着。我对于爆炸声"高"还是"低"怎样才算是"恰好"？又究竟根据什么来判断等问题，都有些莫名其妙，因为没有提问的机会，只好默默地听着。

飞机由七八百米高空转了一大弯，快速地对着我站着的地方冲下来，就像是大铁块一样，毫无音响地从天而降。吉房觉得飞机仿佛就要撞着自己，正在拔腿不及的瞬间，飞机的螺旋桨发出声音来，飞腾而起，向东方消逝。石井的胡须上挂了冰茬，就像魔鬼呲牙似的难看。

"天太冷，请进屋谈吧。"石井一边向原守劝驾，一边迈步就走。很高的烟囱映入眼帘了。更看到一栋两层楼房围在青砖

高墙里面，两旁有纵横七八栋长形的房屋。既不像工场，又不像兵营，也不像监狱或医院，简直是使人莫名其妙的一座建筑。就在其中有40多位爱国人士，为了正义在和日本帝国主义做斗争以致都活生生地被感染上细菌，遭到血腥的屠杀。

原守问："细菌有多少种？"

石井回答说："因作战目的目标的性质不同，细菌的种类也有所不同。例如鼠疫、霍乱、伤寒……等等。"

我一边听一边在想着：不论怎样的大城市，都可能在大量细菌的空投下而归于毁灭。跟着两个人的脚步走着。进了大铁门，又向前走了约20米，就来到叫做办公室兼客厅的房间。石井请原守在屋中央的桌旁上首就坐，他自己在一旁相陪。

"承您帮忙，这种研究才顺利地进行着。"

接着，石井对我俩这仅有的客人，发出大声说："说老实话，关于细菌战，我有这样的想法……"以此作为开场白，就继续地谈了下去："细菌战的第一个特点，是效力极大。因为炮击和轰炸，仅限在落弹、炸裂的周围一定范围内，有对人马杀伤和对物体的破坏力。细菌战则不仅限于直接攻击的一点，可以从一点把效力圈无限扩大。再说炮击和轰炸的杀伤率并不大，即使负伤，还可恢复再参加战斗。细菌则是可以渗透人马的肉体组织，所以它的死亡率很高。即使不死，健康恢复也极慢，很难立即参加战斗。而且，并不限于人马之类的动物，也可使水稻、麦子等农作物枯死，还可以使水和其他食物不能供人使用。第二个特点是需要的经费少。"接着他又说明例如日本这样经济力不足、产铁量小的国家，采用这种战法最为相宜等等。

他说得口角上冒出了白沫，就像螃蟹吐沫子那样，也全不在意。

我犹如受到催眠术一样听入了神，在心中暗想：日本对于

这样的细菌战，大约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毒瓦斯一样，将来日本作战以此进行急袭亦未可知，一定要好好协力去搞。

原守在静听着石井讲话，一边在纸烟上点火，一边问道："细菌战的效果，当用什么方法来确认？我认为同一般战术的结合极为重要。"我对此问题很感兴趣，注视着他们二人的脸。原守和石井的面庞大小、容貌形相虽各不相同，但那青白的颜色和表现内心执拗的额上皱纹、尤其是那无法形容的冷酷无情的神气，却有共同之处。

石井把剩下的茶一口饮干，说道："细菌战效果的鉴定问题，在华北作战时，敌方的记者就作出了有系统的调查……"大意是说从直接攻击的一点，渐渐能把效力扩大的状态充分搞明。再和水流、道路方向以及物资移动状态互相加以判断，也是必要的。

原守又问："是啊，是不是意味着先用细菌攻击敌人，再做一般的攻击？"

石井说："对把敌人赶到适合于细菌攻击的地方再进行一般攻击也是一个方法。一个美国人曾给我捎信说只有这件事，千万不要做！足见对此的恐怖。"

石井像是要抓住原守的心似地盯着他说："给敌人以巨大的精神打击，是细菌战的第三个特点。对敌国内部加以广泛深入的攻击，对破坏作战意志，有政治上的极大效果。"

原守看了石井一眼，连连点着头说："摧毁作战意志是极其重要的。"

石井领着原守走到右边门前说了一声："为了预防危险……"就煞有介事地让他穿上橡胶外衣套、靴子，带上手套、口罩等，在他的前引下走过一段宽1.5米、长约15米的木板走廊。石井在稍右前方的暗室门口，向内窥了一下说："这是跳蚤。是

搬运鼠疫菌的‘袖珍坦克’!”看到无数的跳蚤，结成比手掌大有两倍的黑褐色大块在蠕动着。

石井拿过一个玻璃瓶子，半面斜映着阳光补充说："这是为了赋予这些‘袖珍坦克’以面向黑暗的习性。请看，不是都向那边移动着吗!”看那些跳蚤上上下下滚成一团蠕动着的形象，很像在大草原上缓缓移动着的羊群。

“骑兵说马是‘战友’，是‘活机器’，所以细菌战时才把跳蚤叫作‘袖珍坦克’。这样多的跳蚤，可以搬运几千万的鼠疫菌。石井部队拚命搜集的老鼠，大约每一只就能带几百万细菌，足见细菌战的威力之大……”我正在作种种无用的幻想，一边向里张望着，这时原守和石井已经迈步走了。走到过廊的中间，石井手指右边说："在那里正用人感染鼠疫菌呢!”他一边说着一边加快脚步走着。原守回过头来向在后边紧紧跟随的我说:“喝，走的真快!”同时递个眼色让向右边看。

从过廊的中段又通向右边，两旁有像拘留所那样的成排的小房子。屋中虽然看不清楚，但靠左边的第一间安有铁条，是一个约2米平方的屋子。里面有一个身穿浅蓝色工人服、年约40岁左右的人仰面躺卧。在微弱的光线下紧闭双眼，面色苍白，犹如死人一般。不知是被捆绑不能动弹，还是被灌了安眠药而在昏睡?总之，像是贮尸室内的死尸一样。我的心里想着，这就是准备细菌战的第一步啊!

走廊尽处立向右拐，走不几步在那里有3个农民样的男子，都带着脚镣，坐在地上把两手放到两膝上，都穿着破烂的衣服，年龄好像有三十四五岁的样子。一个脸色青白，另外两个脸晒得黑黑的，全瘦成皮包骨，从眼里发出愤恨的光。

从廊道向左一拐，石井边走边指着左边高板墙小声说:“在那里，放有‘实验材料’。”猛觉得有一种特别的药味扑鼻，旋

即走到右方解剖室的门口。有3个身穿白色工作服带口罩的军医把头聚集在一起，像在做着什么，他们看到石井，马上一齐行礼。里面究竟是怎样情形，固然不很清楚，只见是一间宽约3米的房间，地面是用水泥灌成的。也不知是水还是药湿淋淋的，军医都穿着橡胶靴子，在屋当中台上，放着解剖过的身腔、赤血犹新，清楚露出一根根的肋骨。

石井说，这是解剖室，指着里面靠左的灶口说道："解剖过的尸体，用电热一燔即能完全烧尽，为免使尸臭残留，才特意把烟筒砌高的。"原守对向他敬礼的三个军医道了一声"辛苦"，和石井并肩走出。

"担任解剖的军医，甚至有发狂的，精神一松弛就会受不住。"石井鄙夷地说。

"怯懦还做得了什么事！"原守表示非常同意附和着说。

"这个研究非常重要，一天解剖一个，一年就需要365件材料……"当我正在这样心里盘算时，已从廊道向左一拐，来到像是参考室模样的房间。板架上排列着用酒精泡着的种种人骨和被细菌弄枯的小麦、水稻之类。石井立即走近屋角他新发明的所谓"石井滤水器"那里，泡沫横飞地说明道："只需经过'滤过'的物理作用，任何污水即能彻底消毒，乃是野战中必不可少的东西……"

这个滤水器，就是为掩盖滔天罪行，称作"防疫给水部"的来由。在军、师团的"防疫给水部"的招牌下，被当做实验而牺牲的中国人尸体，接连不断被运往日本。仅在昭和15年（1940年）一年之内，在日本兰浦担任卸船工作的东京宪兵队，就用过四艘大货轮以上的船只。

"想做的事情还多得很，就是'材料'不够，不能满足需要。例如在轰炸碉堡时，应该撤多远才保安全？诸如此类的事，都

非经过实验不可。”这是石井在做暗示：须把“特移极”多多送来！

原守也认为在今后的训练上非常重要，就答应来了。

以活人为“材料”进行的细菌实验活动

韩　晓　辛培林

一、“A”号实验队

据历史档案的记载，七三一部队第四部细菌班于1942年5月中旬成立了代号为“A”的人体实验队，实验内容是渡边和山内使用超声波方法制造的疫苗，中黑大尉和细井雇员使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的方法制造的疫苗，对活人进行两种疫苗的对比性实验。实验地点在“特别班”7号8号牢房内。

在监号里选定了20名被实验者，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首先对他们进行预防接种，给其中的8个人注射用超声波制造的霍乱疫苗，对另外8个人注射了用陆军军医学校的方法制造的霍乱疫苗，还有4人没有进行预防注射。这些活动是小林嘱托和细井技师亲手干的。

山内是第一次进到对日本人来说都是秘密的场所，一无所知，于是好奇地问班附小林准尉：“被试验的都是什么人？”小林恶狠狠地说：“是匪贼！这不是部队随便抓来的，都是经军司令部许可，由外部送来的死刑犯！用不着担心这些，只好好工作就是了”。

免疫处理20天后，进行了人体的感染试验。川名技师和千

叶技师把霍乱生菌（疫苗）混入牛奶里，让被实验者喝下去。感染用的霍乱 菌，对人的致死量为1‰克，而这次用量是2‰克，因此，被实验者根本没有活命的可能。然而，实验结果是，接种超声波疫苗的人中，除1人稍有头痛和腹痛之感，第二天就复原外，其他人无任何反应；被注射军医学校的方法制造的疫苗的人中，多数上吐下泻，3名重症，1名死亡；没有被预防接种的那4个人都先后发病，第三天皆死。后来，又改用鼠疫菌进行了多次这种类似的试验，都证明超声波疫苗具有特效。于是，石井四郎便命令菌苗班大量生产超声疫苗。

9月下旬，伪满首都新京（今长春）发生了鼠疫。与此同时，农安县也发生了鼠疫。对此，石井四郎欣喜若狂，因为这对他们到预谋的鼠疫地区去进行实地研究大有好处。于是，七三一部队紧急组织了所谓的“防疫班”，石井四郎也亲赴疫区督查。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把“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牌子挂在长春街头。

石井要求菌苗班迅速提供大量的鼠疫菌苗。因此，菌苗班全员出动，昼夜不停地赶制。但由于混入的杂菌多，延迟了供菌的进度，渡边在电话里受到石井四郎的叱责。渡边说明设备条件有限，又遭到石井的大骂。为此渡边当夜乘火车去长春。可是，第二天早晨，在长春大和旅馆前发现了渡边的尸体。传说他死于交通事故，但七三一部队的一些人都认为是被石井四郎害死的。这件事引起了菌苗班的人心浮动，不少人想离开七三一部队。为缓和矛盾，石井四郎一反常态，答应了菌苗班去大连卫生研究所的要求。同年12月，山内雇员和石井雇员带着4台超声波设备，先行去了大连。

二、原七三一部队队员的见闻和罪恶活动的自述

川岛队三谷班是鼠疫研究班。它不仅研究鼠疫菌种，而且还亲自做验证毒力的活人试验。上田弥太郎雇员就是曾经多次作过活人实验的助手之一。

1942年4月，作为江田武一曹长助手的上田弥太郎雇员要到7号栋监狱去，对牢房受过细菌试验的中国人进行病变的观测。这是他的本职，天天要这样做。当时，江田提醒他在这里边不准随便说日本话，并带有神秘的语气解释说："里边押有朝鲜人，他们都会日语。"江田又嘱咐他："所拿的器械不能放在窗台上，注意不要把手伸到窗口内。那里的爱国分子很厉害哩！弄不好，他们抓起器械砸你，或者把你的手折断。"

上田在入口处，出示了"特别许可证"，并领了一张"细菌试验观察记录表"。

上田跟着江田到7栋内南侧楼下的一个牢房前。这里边监押着5个人，他们的实际年龄都不太大，大约二三十岁，非人的折磨使他们变得苍老。一天前，他们接受了一次鼠疫菌液注射试验，如今虽然还能走动，但距离死亡为期已经不远了。上田按照号码分别把他们叫到观测窗口前，按观测记录表上的要求逐项检查，并进行填写。第三天，上田照例去这个牢房观察时，发现1名被试验者死了。他立即通知警备队人员，把尸体送进了解剖室，进行了解剖，最后，尸体被推进特别班的焚尸炉里烧掉了。

5月上旬的一天早上，上田又按照小林松藏技师的命令到7号栋内北侧楼下的牢房，对5名被试验者作观察记录。当他在一个被试验者右臂动脉管上抽血时，发现那个人胳膊上有注射针眼，知道对这个人的试验的时间不太久。次日，当1名被试验者

死后，上田跟随推尸小车来到解剖室。这次，他看到的是执刀者采取的乱刀解剖法，即将尸体大卸八块，分别在脏器里取出菌液，然后把这具空壳尸体投进焚尸炉。这天下午，上田又看见两个被试验的人死了。其中一名年纪约30多岁，手指特别细，看样子不像经常劳动的人，是不久前被抓来的。其余两名幸运地活下来了，一周后复原。上田明白，人们的生命也是短暂的，不久就会在另一次或另一种试验中死去。

三、在城乡各地居民区的实验

在海拉尔以南150公里的鄂温克旗的辉索木，日本宪兵逮捕了企图杀死日本特务上牧畅三郎的蒙古青年牧民马萨尔等人。几天后，马萨尔等被杀害，两名青年被放回辉索木。被放回来的青年都发高烧，上吐下泻，两三天即身亡。接着，在辉索木就发生了类似的传染病，瘟疫在迅猛地扩散着。辉索木的牧民要求日本人给予防治，但他们不敢到辉索木去，并别有用心地说，这是一种汉族常发的病症，没有灵丹妙药，就是“天神”也是无能为力的。结果，辉索木在这场瘟疫中死了240多人。后来查明，被放回的那两个青年在监狱里时，五四三细菌部队曾给他们进行了菌液注射，并让他们吃放进了细菌的面包和奶茶。实际上，这是海拉尔支队在少数民族地区秘密进行的一次细菌传染实验。

这样的罪恶活动，不止一次，长春卫生技术厂的工作员关孝证实：“原七三一部队队员松村，在与他的朋友岛崎的谈话中透露，七三一部队在海拉尔一带，把活人绑在大柱子上，把小动物装在很坚固的小铁笼里，然后从空中投下细菌炸弹，这种试验把人和动物都杀死了。岛崎参与了实验效果的调查和采样活动。”

在日本侵略军盘踞中国东北时期，不少地方出现了病原体不明的无名热。因它多发生在虎林、孙吴一带，故称“虎林热”和“孙吴热”。当时在满洲医大任教的北野政次，对此很感兴趣。他企图将这种流行性出血热变为“细菌武器”。当他担任七三一部队长后，立即把它作为主攻对象。在他指挥下，第一部笠原班发现了其病原体是滤过性病毒的一种，是用显微镜几乎都看不见的极小的微生物，寄生于老鼠的“扁虱”体内，并以“扁虱”为媒介传染病毒。

1944 年12 月，北野在由各部长、支队长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得意地说：“将流行性出血热的患者血液给猿注射上，猿便呈现出和人同样的症状。寄生于流行地带鼠身上的壁虱，将其血液也给猿注射，同样可以发病的。”可见，北野政次已经完成了对活人进行的这种传染实验。

四、残酷的毒气试验

毒气试验是七三一部队在以活人为材料的试验中最残酷的一种。石井四郎的司机越贞夫亲眼看到七三一部队的实验人员每天三次将被关押的中国人推进密封的玻璃柜内，分别进行一度、二度、三度的毒气试验，直至将他们毒死为止。

1942 年2 月，由于被试验者的反抗，打乱了技师伊藤的注射试验的计划。于是，他们气急败坏，使用毒气将7 号牢房的人全部毒死。这个日本刽子手竟毫无人性地说：“正好要搞一次毒气试验，那就让他们先享受享受吧！”

同年4 月，又有计划地进行一次对活人的毒气试验。那天，第四部第三班正准备研制鼠疫干燥菌，要到第一班去取生菌。当上田弥太郎路过中心走廊时，突然闻到从7、8 号牢房散发出来的浓厚的瓦斯气味，并被熏得睁不开眼睛，流着泪。

七三一部队在特别监狱里更大规模地使用毒气杀害被关押的人是在1945年。当时，7号牢房二楼的一个房间发生了暴动，发起者是一位苏联人。这些被关押者采取的办法是，有人向特别班谎报说那个苏联人得了病，把看守的日本人骗进牢房时举事。果然，在日本警备人员进入牢房内查看时，那个苏联人突然地跳起，抡起铁镑将其砸昏，随即夺得了手枪和开牢门的钥匙。然后各室也冲出牢房，但因整个监狱的大门锁着，造反的人在走廊里东冲西闯，跑不出来。于是石井四郎当即命使用毒瓦斯，把7号房的人全部毒死。为此，七三一部队还曾受到关东军司令部的责备。

五、冻伤试验

七三一部队第一部专设了一个冻伤研究班，班长叫吉村寿人，因此，对外称"吉村班"。它研究的内容有：人在什么样冰冷的气候下能冻伤，不同程度的冻伤会带来什么后果，怎样治愈冻伤。

七三一部队研究冻伤完全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遍了整个中国东北。同时，它还准备北进苏联。这样，它就面临着一个如何适应严寒地区条件和在严寒地区作战问题，于是，七三一部队承担了预防和治疗冻伤的研究任务。

他们感到，冻伤试验以动物为对象，不能取得直接的效果，因此必须用人进行。

平房位于北纬46度，每年的1月、2月和12月天气最寒冷，有时低于零下35℃。吉村班常常利用这个天然实验场对活人进行冷冻试验，把作为"特别试验材料"的中国人、苏联人，还有女的，从特别监狱押出来，关进桶式的大院里，让其带着手

铐脚镣，在端着上有刺刀步枪的日本兵和手持木棍的特别班队员的监视下，露出手、脚、胳膊和大腿，接受不同时间的冷冻试验。在严寒的室外，他们都陆续失去了知觉，当吉村班的试验者用木棒敲他们的胳膊和腿发出“梆梆”的声音时，才将其一个一个地拖进室内。

吉村班对活人的冻伤试验，还经常改换方式。“抗寒”试验就是其中的一种，1940 年冬天，细菌研究室的山内丰纪雇员无意中透过窗户发现，在吉村的亲自监视下，院子里有 6 名中国人都穿着单衣背着很重的物品，按照指定时间和路段反复吃力地走着，连续进行了十多天。山内丰纪观察发现，开始时他们都很健壮，后来逐渐地消瘦，当体力消耗殆尽的时候，活动也就停止了，不久便产生冻伤，人员也逐渐地减少，最后都无影无踪了。

山内丰纪联想到夏天发生的事情，也是吉村班的人迫使几名中国人作类似这样的活动，累得他们满头大汗，最后晕倒在地。他恍然大悟，那是进行耐热的实验。至于那些被试验者命运如何，山内虽然没有直接看到，但他想到是不会活着出去的。

后来，七三一部队的冻伤试验可以在室内进行了。1943 年 4 月，上田弥太郎奉命到 7、8 栋特设监狱里给被试验者测量体温，突然传来一阵拚命的叫喊声，他看见 2 名警备队队员和 3 名冻伤研究班的人把 1 名中国人往一个玻璃屋里推。这个玻璃小屋就是吉村班的冷冻实验室。只见穿着棉衣的警备队员，强行将这个人的手浸在结冰的水盆中，不一会又给拽出来，旁边电扇开动着，那个人在痛苦中倒下去，造成了冻伤。至此，残忍的室内冻伤试验告一段落。不久，上田弥太郎 在 7 栋监狱里看见了这个被试验者，他的手指已被切去，只剩下光秃的手掌了。

在 1943 年夏季，吉村班在四方楼外东北修筑了一座更大的

冷冻实验室。从此，冷冻试验随时都进行了。

解冻试验是很残酷的。七三一部队队员用凉水往一部分被试验者身上泼去，顿时他们的冻伤部位结一层冰，不一会，冰便融化了，他们在痛苦地呻吟着。另一部分被试验者的手脚被插进温水或热水中，立刻红肿起来，有的还脱了皮。不少被试验者在折磨中死去；幸存者得不到治疗，冻伤部位溃烂，骨头变黑而被截去。

对冻伤进行“治疗”，也是一种残忍的试验。有的轻度冻伤者被涂上治冻伤的药膏后，虽然生命保住了，但留下的手指和脚趾都是残缺不全的；被涂上染菌药膏的人，他们处境更坏，往往死在得不到治疗的人的前面。

这样，七三一部队通过在被试验者身上进行冻伤、解冻和“治疗”试验，得到了资料。

六、惨死在解剖台上的中国少年

1943年，七三一部队想用一个男性少年作为实验材料，进行一次对比性病理研究。但特设监狱里没有这种“实验对象”。于是，他们按照北野部队长决定，去寻找一个身体健康的男性少年。但是，为了避免造成意外的麻烦，他们没有从平房附近捕捉，而是采取了“外部进货”的办法，这个任务交给了七三一部队的宪兵室。在春日中一翻译官的指使下，“协防班”成员奔赴长春，在长春街头寻找。他们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门前，发现了一个长得虎头虎脑的中国流浪儿。于是，便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把他抓了起来，并带回平房，关进了七三一部队的拘留所。当晚，春日中一来到拘留所，把这个小孩领走了。这大约十二三岁的男孩被带进解剖室后，被扒光衣服，推到铁制的手术台旁。几个“白色野兽”扑了过来，将其按在手术台上，用

扣带紧紧地固定住了挣扎的四肢。在小孩身上用酒精棉擦拭消毒后，便注入了麻醉剂，不一会他就失去了知觉。“白衣野兽”们找好部位，一刀将腹部切开，直到变成一具空壳的尸体后被秘密地投入炼人炉。

第二天清早，春日中一有意识地来到拘留所。当“协防班”人员问及那个小孩怎么处理的时候，春日中一假惺惺地说，他是一个要饭的流浪儿，经审查他没有什么问题，怪可怜的，昨天晚上就把他放走了。“协防班”的人都不相信春日中一的话是真的。

战后，原七三一部队的一名队员承认了这一事实：“把抓来的一名年仅12岁的少年进行活体解剖，肠、胰腺、肝、肾、胃等各种内脏，从睡眠状态中的少年体内顺次取出，经一一分理，砰、砰地扔进铁桶里，再立刻把铁桶里的脏器放入装有福尔马林液的大玻璃容器内盖好。取出的内脏，有的还在福尔马林液里不停 地抽动。”

七、阴森可怕的焚尸炉

随着细菌部队的高大建筑物的落成，在四方楼西北20多米处也竖起了一座高耸入云的大烟囱。它几乎昼夜不停地吐着滚滚的浓烟，顺风时可以闻到从浓烟中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腥臭异味。它四周用2米多高的木板墙挡住人们的视线，不许中国劳工靠近它，更不让他们知道它的用途。有一次，中国劳工王志兴指着大烟囱问日本雇员户口：“那里边炼的是啥，怎么有一股腥气味?”户口有意地嗅了嗅，不耐烦地说：“中国苦力的说话没有。这是军事秘密，不许随便打听。”在仓库服役的中国劳工王英富也曾问过一个与之很熟的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却直言不讳地说：“人死啦的，马死啦的，那边火的给。”于是人们才知道这

是一座焚尸炉。

这些待焚化的人尸是从哪里来的呢？1943年6、7月间，中国劳工陈方东看到从铁路专用线旁边开过一辆像冷冻车的汽车，进了焚尸炉大院后，七三一部队队员立即把大门关闭了。中国劳工任广全告诉大家：“这冷冻车是拉人的。那里装的大部分是死人，也有活着的，他们哼哼呀呀的声音都能听到。都运到焚尸炉院里去了。”所以，每当“特别汽车”开进焚尸炉大院之后，焚尸炉的大烟囱就冒烟了。这样的事大部分发生在夜间。这些尸体来源包括安达特别实验场在内的野外实验场。七三一部队把在野外进行细菌实验而致死的人体，都一个不少地用汽车运回部队，投进焚尸炉。还有大量的尸体是七三一部队本部的每个实验室以平均两天实验三个的速度，把“实验材料”从特别监狱押到实验室，再从实验室转运解剖室，最后由解剖室通过地下暗道送至焚尸炉。甚至有的尚未咽气的活人，不经过解剖，径直地送去火化了。这是七三一部队用细菌杀人的全部过程，也是消灭“实验材料”的主要途径。他们的这个秘密，曾被中国劳工杨淮昌发现。炼人炉内像铁柜似的，每个铁抽匣里放一个人，浇上汽油，就开始火化。此外，从大烟囱吐出的烟雾，也露出了他们的破绽，每当气压低的时候，周围的人都能闻到令人作呕的异味。于是他们采取了保密措施，即借助于部队特设的气象班提供的天气预报决定开炉、停炉。这种措施虽然能起到掩人耳目的作用，但不能满足七三一部队的需要，因为它每天实验致死的尸体有20多具，如果不连续地火化，就发生积压，停尸房里装不下。特别是夏季，尸体停放一天就会发臭。如果遇到鼠疫传染致死的尸体，停放时间越久，所带来的威胁就越大。于是，七三一部队决定增设焚尸炉。增设的焚尸炉在北岗上。由于这里地势高，不论什么风向和风力，随时可

以开炉。但是有时还能闻到炼尸的气味，于是，他们又把烟囱接高几米。这座焚尸炉建成后，日本人公开让中国劳工运送死去的动物，这样，给外界的印象它是炼马炉。

七三一部队虽然对焚尸采取了种种保密措施，但仍无法掩盖其致命的漏洞。例如，炼尸体是一种肮脏、危险的活，似乎应该交给中国劳工去干。可是，却全部由日本队员自己干，这就明显地暴露出焚尸炉与它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是连在一起的。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一辑）

细　菌　战

——七三一部队的野蛮行为

田村良雄

（防疫诊疗助手　兵长）

作为松花江流域的大城市，从古就为人所知的哈尔滨市，东端的香坊有一条道路。中国人民叫这条道路是杀人的道路，从心眼里憎恨它。

乘汽车跑30分钟，道路逐渐变狭窄，一直是笔直的道路在这里急剧拐弯，朝向平房车站。

如果注意来看，在这条弯曲的道路附近茂草当中还有一条道路，是通向七三一部队的。

在面临这条道路的一望无际的草丛中，一直延续着割掉麦子痕迹的田垄，而且在草原到处过着和平家庭生活的房屋也被点火烧掉，烧剩下的房柱好像是控诉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为而

矗立着。

过去是和平农民的耕地，可以听到收割时愉快歌声的这块土地，由于1938年日本侵略者在五常县的驻地转移到这里，改用石井部队的名称，不仅用刺刀把中国人民从住惯的土地上赶走，而且把散居的村落集中在五个地点，挂上“保护部落”的牌子。由于保守秘密和进行奴役的需要，把中国人民在这里监禁起来，剥夺中国人民的一切自由，断绝和外部的一切来往，造成了这种荒野草原无人耕耘的地带。从此，这片神圣的土地变成细菌战部队的演习场所，剧毒的细菌污染了肥美的田地，对那些为和平和独立而斗争的中国人进行细菌实验，使这里变成了死刑场所。

以对人类不允许的细菌战为任务的七三一部队，害怕特殊秘密的泄漏，在本部的入口处，垂直挂着“无关东军司令官许可无论何人均禁止入内”的牌子。灰色的三层四角大楼，乍看起来和普通楼房虽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一里见方挖着深深的壕沟，环绕着高压电线，经常传出狙击人生命的恶魔吼声。

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吹嘘说：“这是采用德国式的‘秘密建筑法’。”在楼房中有用于监禁中国人民并用他们进行细菌实验的两栋秘密监狱，管理这里的班叫特别班。在这以外稍微离开的地方有三面包围的房屋。这里有向平房车站方向延伸的两条飞机跑道，是散播细菌的航空班用的。

全世界的人们为把人类由病魔中拯救出来而拼死斗争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却反过来利用这种医学成果，在1939年对苏联和蒙古人民大肆进行细菌战。1940年以来还企图用细菌战的手段消灭中国人民，在中国人民身上散播剧毒的细菌，使中国人民陷于死亡和病痛之中。他们竟敢犯下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罪行。这样还不满足的日本侵略者，于1942年4月又策划更大

的细菌战，致力剧毒细菌的制造和研究。

刚刚过了6点钟，谁也都没来，全部房间像死一样寂静。蒙上尘土的暗淡的长明灯，照射在到处是制造消毒药水坑用手推车轨道的水泥地上，照射在铅灰色高压灭菌器及溶解锅上。从地下时常可以听到调节温度的孵卵室混有呻吟般的声音，也许是从特别班传来的。还可以听到啮啷啮啷拖着脚链的声音，令人恐惧。腐烂的培养基和消毒药水的强烈臭味，从鼻腔渗透到脑髓，使头一跳一跳地疼。

比平时要早一点出去的我，从细菌工厂走廊往左拐，在两旁有堆得高高的培养罐的微暗道上摸索着往前走。咕咚咕咚，自己的脚步专用引起有人在追赶的错觉，好几次回过头来看，当然谁也没有。但是，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特写镜头：三天前，给中国人注射鼠疫菌，使他们感染上鼠疫，他们脸上充满仇恨。"鬼子！鬼子！"注射鼠疫菌时的那种情况，在眼前越来越清楚。"畜牲！"我胡乱挥着手，跳着脚，像要推开什么似的挣扎着，东磕西碰着那到处皆是的培养罐，连滚带爬，好容易才进入那用板隔开的蒸馏室和冷却室之间的佣工室。

漆黑的佣工室里边点着一盏暗淡的电灯，灯下有穿着工作服的四五个人，团团围坐，说着什么似的互相紧靠着脸。或许是错把我当作军官，他们把旁边放着的肉精瓶惊慌地藏在床下。佣工说关于队内"机密"的话和说长官坏话的时候，对于突然进来的人，其蒙蔽手法就是开始大声发笑。我听到同伙的笑声，清醒过来，担心是不是让人看见了我那副因害怕中国人而抖的有失体面的样子，想要装作平静，故意喘了一口粗气，硬以平静的声音说道："怎么？又揩细菌的油了吗？"然后向团团围坐的同伙走近。

"是田村吗？想吓唬人吗？"看见从黑暗里走出来的人是我，

身为柄泽班雇员的四十多岁的长岛次郎，一边拿出刚才藏在床下的肉精，一边恶狠狠地高声申斥着。他接着说："喂，田村！听说一瓶就是15块钱，军官先生也是一批一批明目张胆地拿出去！还可以和老婆絮絮叨叨地互相品尝。这个……"

"军马、军犬、鸽子，还有叫做佣工的这些雇员，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就不能尝到的吧！"田部井班的玉井抢过长岛的话题，胡乱插嘴。

我看到聚集在这里的人面孔，知道这正是老雇员常提过的他们的"信息交流"，也就不想立刻到特别班去了，只要他们不说"滚出去"，就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于是便坐下来。

他们每天都被告诫："泄 漏机密的人处以极刑！"即使处以极刑也没有意见——他们虽然这样的保证着，但为了与上级巧妙周旋，为了讨好上级，仍有必要了解部队现在在做什么。另外，佣工们还有一个共同心理，就是总想把自己所进行的工作说成是多么"绝密"，以此夸耀自己是取得上级信任的人。所以，值班的时候，各班的人常常聚在一起，悄悄地谈些小道消息。

把肉精放在茶碗里，倒进热水，一口喝干，被称为柄泽班十年组的雇员——候补技手①奥寺，一边向上翻着眼珠看我，一边坐着蹭过来说：

"喂，田村！最近偷偷摸摸的干些什么？在这儿把一切都说出来吧！"

奥寺这家伙，他知道我是在课长直接命令下到处活动的。有这样感觉的我，内心得意起来了。

"不能说，因为是绝密！"我吹牛道。

"什么绝密，混蛋！我们干的事都是绝密。小毛孩子的毛病！"

---

① 技手是日本在技师手下工作的技术员，旧称三等技术官。——译者

奥寺越来越焦急，总想叫我说出来，一直在追问着。奥寺越是焦急，我就越是得意。几天来在心底对中国人的恐怖感，变成了更残酷、更残忍地进行生物实验的功名心。

“等等，奥寺。田村只去了特别班，我们更要早听到的是玉井讲远征队的情况。没有时间了！”有人要缓和一下奥寺的气势汹汹，这样说道。今天聚集起来想听的是远征队的新情况——1942年春天，远征队在部队长石井四郎直接指挥下到华中华南地区去散播细菌，最近归来。其他三个人也在催促着。

“嗯，好吧！”奥寺像要显示显示先任职的雇员的威严似的，表示同意。

“玉井，在杭州买女人的这些事就省掉不说吧，好吗？”

我听说要讲远征队情况，咽下了一口唾沫，蹭过来侧耳静听。听说远征队归来后，课长、班长都焦躁不安，每天更加严厉地大声斥责班员，所以，部队全体都感到战战兢兢的。

“出什么事了？”我也很想听听。

“说说吧！可这是秘密中的秘密，要是败露了可要砍脑袋的呀！”苍白的圆胖脸的玉井放低声音开始说了。

“1942年3月组成的远征队，本部设在上海和汉口，以这些地方为据点散播细菌。”

“我们培养的细菌怎么样啦？”奥寺看来对自己做细菌放心不下，插问一句。

“听说柄泽班的细菌——老实说，不能使用，因为杂菌多，在运送途中腐烂了。就是没有腐烂的鼠疫菌，有时也没有毒性！”

“是吗？那最有效果的是哪个班做的？”

“第一是碇班！碇班把炭疽病菌放在金米糖或糖豆里面，从飞机上挂降落伞投下来。这样，孩子吃了身体就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像是死了不少人。”玉井屈指数着说。

“第二是田中班的跳蚤吧？”

“唔，是的！鼠疫跳蚤好是好，可是，我们搞细菌战，把带着跳蚤的老鼠原封不动地扔了好几次，都传出去了。”

“真的吗？那可不得了。”

“真的。《解放日报》都把散播鼠疫跳蚤的方法照直登了出来，而且还附有照片。”

“要是那样，今后细菌的大量生产将会怎样呢？”大家和长岛都在考虑同样的问题。在这种场合，都看着最早任职的奥寺的脸色。

“传出去也好，没传出去也好，细菌生产的事能变更得了吗？如果是传出去了，培养毒性更强的细菌，就会无所畏惧地散播啦。怎么样？玉井，是这样吧？”

“啊，啊，所以最近‘丸太’①被运来了！”

刚才听到大家说话的人事班的岛田，另起一个话题说：

“金井！特别班的色情小册子没有印刷吗？”

“你是想要一本吧？这个色鬼，每次去照相班，都要色情照片！”无论哪个家伙，都有从金井那里拿色情照片和色情小册子的习惯，现在却装出君子的脸色，笑了起来。

部队长石井四郎，一方面是为了二木班的性病实验，另一方面是害怕中国人对细菌战的坚决、英勇的反抗，想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一起推行实验，所以，让人制造了色情照片和色情小册子。

“对中国人怎么也不行。他们好像没有色情观念，给他们色情小册子也好，色情照片也好，看也不看就撕碎了。现在，色

① 丸太，日文意为剥了皮的原木，可以成材。日本侵略者为进行细菌战，将中国人民或其他各国人民作为细菌实验的生体，故叫作原木，也有为掩盖其罪行而用隐语之意。——译者

情照片、小册子都不起作用了。”

“真的。所说‘丸太’真奇怪呀！没有好色心，也不怕枪炮子弹。”

“所以很难处理！有点好色心，哪怕稍微有点，也可以让他们老实点嘛！”

大家各自都进行着残酷的生物实验，都是杀害中国人，所以都说着同样的语言。

“作为一个人，又是那么年轻的男人，没有好色心，能想到吗？真是傻瓜！”人事班的岛田，好像怎么也不相信，环视着每个人的脸。

“那可是真的呀，岛田！我开始也像你那么想。对付田村做实验用的一个家伙，一次是用俄国女人，后来放进中国女人。我从钥匙眼里盯着看：女人进来了，两个人立刻握起手来。我想，这可好了。刚想下结论，那个男人像发疯似的高喊：‘鬼子！你们对什么罪也没有的女人干这种非人道的事情吗？绝不能允许！一定要消灭你们！’放进女人，他们非但不屈服，反而越发激起了反抗心。”

在我的眼里，那些要亲自制止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的中国人，其形象当然不会变化。“只有把这些家伙顺利地用于实验，才能显出我的手段。无论如何，我绝不后退。”我看了一下表，偷偷地溜了出来。这对别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我走上了研究室的楼梯。占有二三层的研究室，全都迷恋于疯狂的杀人实验。研究室里充满了动物的尸臭和血腥气。我进入研究室内巡视了一下，几天前注射的老鼠和土拨鼠，被脏东西污染的毛倒竖着。精疲力尽的动物在蠕动。人死了，动物死了，对于人来说应该是可悲的事情，但作为细菌战爪牙的我，却很高兴。这些现象意味着细菌毒性强烈，这和自己的飞黄腾达联系起来了。我把这

一带的动物一直看完。“毒性都不错嘛!”我一边微笑着，一边把死了的老鼠肚子撕开，取出脾脏、肝脏，开始培养。

7点钟是量取中国人体温的时间。我想，动物到这种程度就会死去，有这样的毒性，“丸太”也一定死了，像昨天那样的反抗也许不会有了。跑进消毒室，取来器械，打开特别班进口的铁大门，递过出入许可证。我来到监禁中国人的两栋楼房中的一栋——7号楼。抬着担架、穿着防菌衣的两个男人跑到面前来了。在担架上放着被切开肚子、敲破头劈掉脚而成为肉块的中国人。他的血在滴落着。我看到这个被惨杀的身体，暗自想道：“得赶快干了。是哪个班的?”我用军官惯用的那种举动，把头低下，往当中凝视。我目送去被惨杀者的尸体之后，快步走近三天前被注射鼠疫菌的中国人住着的12号房间，战战兢兢地偷看里边。中国人由于被我注射了鼠疫菌，难受得浑身乱动，趴倒在床上吐血。

哇……

“见鬼去吧!这可好了。”过不大一会儿，我开锁进入里面。知道我走进来的那个中国人，在口角滴着血当中抬起头，脸上满染血污，目不转眼地盯着我。我知道他没有任何抵抗力。

“畜牲!死去吧!”我用脚上橡胶长靴的尖头突然踢去。咕嘟咕嘟从中国人口中吐出的鲜红的血洒满了床席。

“鬼子!一定报仇!”中国人满身滴答着血，想要站起来，没有力气，突然倒了下去。

“过一会儿分成八半。把这个浇上。”我用带来的消毒药水把中国人的全身浇遍，留下使他憎恨的话后就走了出去。

我走近出口的时候，没想到迎面遇到实验的直接指挥者宇田清技手。宇田不该这么早就来。也许是因为我仔细端详，宇

田机敏地躲避我的视线。这是秘密的要做不能和人说的那种事情通常采取的态度。我没有问，就随在他的后面。

宇田有些心神不定，回头看了一下，把嘴靠近我的耳根说道："要做点有趣的事，你陪着我吗！"他很快抓住我的手臂，向我刚才来的方向快步走去。走到隐蔽之处第一个牢房前面，他说："在这里给我看着那些当官的是不是来了，好吗？"他从口袋里掏出私人钥匙，插进锁孔里。打开牢房的锁本来是需要特别班值班班长许可的。正想着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往里窥看，只见在水泥地上铺着薄薄的被褥，上面坐着一个像是在侧耳倾听外面声音的二十六七岁的妇女，她面容憔悴，剪着短发。

虽然明明知道，人生下来就具有爱恋母亲的心情，可是，对于关心自己孩子、关心自己民族命运而反抗侵略者的伟大母亲，却毫无道理地判处死刑，而且把她作为细菌战的实验对象来加以残杀，现在，侵略者甚至还要对这样的母亲进行野蛮的侮辱。

"干什么？"妇女的脸色更加苍白，眉毛倒竖，嘴唇气得发抖。六尺之躯进入三尺狗窝①，因营养失调和拷问而失去身体自由的这个妇女，自然没有抵抗的力量，被那连现存人类的一点最低道德也没有的侵略者按倒，成了兽欲的牺牲品。

我一看到宇田强奸，就完全变成一条疯狗。我从锁孔中拔出钥匙，插进旁边那间牢房，但是转不动。我焦急地从窥视洞往里看，只见一个二十四五岁的中国妇女，在胸前紧紧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向这边凝视。孩子在也好，不在也好，这都无关紧要，我只想打开锁，但是钥匙不合适，当然打不开。我用足力气将钥匙拔出来，往下一个牢房锁孔里插了进去，听到咔嚓一声便打开了。在里边有一个30岁左右的瘦弱得连站起来

① 原意为"在人屋檐下怎得不低头"，此处为被迫受辱意思。——译者

的力气也没有的妇女，靠着墙壁，眼睛混浊无光，脸面浮肿。

妇女看到我，脸上露出讥讽的笑容："你……什么事?"说完了，突然把头靠在墙上，闭上眼睛。我想，别人来了不合适，快点干吧，便凑近妇女蹲下来，想要搂住她的肩膀，妇女照旧闭着眼，从被里伸出手来，想要把我推开。

在这只手上没有指头，尖端露出黑色的骨头。我看见吉村班冻伤实验的结果，就没有受阻的担心了。这一次用尽力气让女人横倒下来。妇女没有支持身体的力气，砰的一声当场仰面摔倒，没有指头的手抓着，痛得浑身乱动，皱着眉头，无光的眼睛猛然睁大，投出燃烧着憎恨烈火的光芒。

我像饿狼一样瞪着她，要把这滚倒的妇女整个舔掉似的。从变成灰色的"病衣"里露出来的一只脚，已没有脚后跟了。另一只脚全部没有脚趾，黑色的肉露着骨头。"如果是不倒翁，那可正合理想"我这样想着。我在昏迷似的失去一切力气、什么抵抗力也没有的这个仰倒的妇女前面蹲了下来，用力掀开她的下襟。她尽力挣扎着，想要变换身体的位置，闪耀着羞耻和憎恨光芒的眼睛喷射着怒火。这个妇女因冻伤实验而冻掉了手足，现在被放到二木班第四性病的土蠹氲研究上，就要受到残酷的杀害。我扫视妇女下腹部，看到从下腹部到腹股沟紫红色地肿胀着，脓在腰板上流一大片。"呸，畜牲!"我知道不能满足我的兽欲，用足力量在妇女的腰部踢了一脚便走出去了。

"混蛋！在这种东西上伸手……赶快去消毒!"脸上露出轻蔑笑容的宇田，一边把写有"实验中"的牌子插上，一边嘲笑似的责备我。"蠢货！在这样的东西上也能伸什么手吗?"我压制着焦躁而想大骂的心情，到特别班的解剖室去了。

解剖台上好像是解剖刚刚结束，在"血池"上，通红的鲜血正流着，啪嗒啪嗒地落在下面的玻璃瓶里。大的解剖刀，沾

满了中国人的鲜血，还带着鲜红的血浆。

“喂，田村，我打电话去了。你先把器材消一下毒，马上就要开始了！”宇田说完便出去了。

扑哧，扑哧，灭菌器中的器材这样翻滚的时候，课长大木启吾少佐和班副 细岛宏中尉全身包上橡胶防菌衣进来了。

“开始吧！”大木命令道。细岛用眼神暗示：把手术刀递过来。我并不知道用手术刀干什么，就原样递了过去。接着是暗示拿止血钳子。细岛拿着手术刀和止血钳子时，中国人躺在担架上被抬来了。今天早晨被我浇上消毒药水的中国人，不管是死了还是没死，都预定今天解剖。中国人的脸紫胀着沾满了血，从担架上滴滴答答地流了下来。大木提心吊胆地走过来，注视着中国人的脸喊道：

“喂，快煮樟脑液①！这样拖下去就不能实验了。”

“是！”在旁边直立注视的细岛答应道。

“两支樟脑液！”他伸出两指命令我去注射。

抓住中国人穿的发黑的“病衣”脖领，特别班的八坂使足劲儿往下拽。“病衣”撕破，失去意识的临死的中国人咕咚一声被摔在铺瓷砖的三合土地上。

被注射了樟脑液、用脚镣手铐固定的中国人猛然睁开眼睛，好像要弄清这次行凶情况似的转过头来。但是，身体不自由了，眼里充满气愤的泪水，凝视着顶棚。从极干渴的喉咙里，像要发出追究暴行的叫声似的，但是不能出声，仅是嘴动动而已。

转着摸中国人脖颈的细岛，用右手的手术刀咔嚓一声，沿着中国人的颈动脉切下去，血吱地流了出来。中国人因鼠疫病和被宰割的痛苦，把头左右摆动。这一来，颚部的绳索勒了进

① 注射樟脑液是为促进重病人的血液循环，防止其心脏麻痹而死。——译者

去，头部忽然下垂，昏迷过去。我惊慌地擦去血，拿止血钳子等着的宇田，用钳子搅弄伤口，一看见颈动脉，咔咔两下便夹住了血管。细岛用手术刀背敲击着中国人的心脏部分叫道：

“樟脑强心剂两支！”随后便切断了中国人的颈动脉。

中国人心脏里尽管注射了樟脑强心剂，但是已经不能动了，嘴角微弱地痉挛。从项动脉流出的鲜血，朝我拿着的30cc.的软木塞瓶，不一会儿，忽然停止了。

“四支樟脑强心剂！”在稍微离开的地方，指挥这场残暴行为的大木叫道。但是，注射了四支樟脑强心剂，也不能再榨取中国人的鲜血了。

中国人留下了一句满怀仇恨的话：“鬼子！”迅速地变了脸色，咽了气。

“把解剖刀递过来！”细岛倒拿着解剖刀，从上腹到下腹部，再从下腹部向胸部，洋洋得意地切割下去。拉开骨锯，切断肋骨，露出全部内脏。分别拿着培养细菌的银耳和医疗用玻璃器皿，等待露出内脏的这三个人，是抓住肉不放的饿狼。他们为了制造细菌疫苗杀害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在培养基上使劲地涂抹。

20分钟后，中国人的肉体被脔割了。滴着血的肉块散乱地丢在解剖台上。我们四个人看着这个被惨杀的身体，像吃饱了的狼，噗的喘了一口粗气。大木、细岛、宇田和我，就这样按着顺序鱼贯钻进了旁边的休息室。

大木和细岛躲进了军官室，休息室里留下我和宇田两人。宇田脱下用消毒药水浸泡过的防菌衣。

“喂，田村，看过现在那个‘丸太’的肺了吗？肺鼠疫虽然没有错，可是到了第四天还没有完全致死的状态。”

“那是什么原因呢？”

“由于他们的反抗是绝食。这些家伙，恐怕是想不让我们进行细菌战，进行反抗吧。”——这不就是说，如果反抗就要被打死吗？嘴里没有说什么，我看着宇田的睛睛。

“那些八路军家伙，一定能生产比我们优秀的预防注射液——根据石田技师的说法，别看他们没有活菌疫苗。不管怎么说，不培养比这个毒性更强的细菌，是不能打细菌战的。”宇田用酒精大声嗽着口，接着说：“不制造出毒性更强的疫苗，受感染而死去的就是我们和友军士兵，细菌战本来就是不可避免地要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嘛！”

“细菌战会同归于尽。”我嘴里嘟囔着，不顾一切地往全身浇消毒药水，咕嘟咕嘟地往嘴里倒酒精。

“喂，准备！”课长大木一边说着一边走了进来，脸上浮现出平时没有的笑容。

“这一次要做的是须藤良雄，是不许说的绝密！”我差点儿把手里拿着的指头消毒器掉到地下。大木从我的表情好像体察到什么，用锐利的眼光盯着我。这个眼光是允许我进入特别班时的眼光。我感觉到这是对我的考查，便压制住内心的波动，装作平静。

“是吗？”我看着大木的脸。

“好，你也是一个男子汉了。让须藤良雄到这里来，都是为了效忠天皇陛下呀！”大木拍拍我的肩膀——这是很少有的动作，开始穿防菌衣。

须藤良雄是第四部第一课的雇员，因为最近鼠疫菌的大量生产而感染了鼠疫菌。我以为他已被送到医院，谁想到把他也放到了监禁中国人以进行细菌实验的特别班里，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敲着自己的脑袋进入解剖室。

须藤良雄赤身露体地由特别班班员抬到解剖台上。直到四

五天前谈起女人还很活跃的须藤，现在完全变了样了。他只瘦得皮包骨头，全身有无数紫色斑点，由于过分痛苦而搔伤了一大片胸部，血从撕破的伤口那里冒出来，在睁开的发呆的眼里流下泪水，嘴巴松弛无力地张着，痛苦地喘着气，一起一伏地抽动着肚子。

大木很早就看见过须藤和我的交往。遇到大木视线的我，开始用消毒水擦抹须藤的全身。为了装作心情平静，我尽可能干得粗暴些。

“好，科学家是必须冷静的。”课长表扬我啦，感觉到这一点后，我便像对待中国人一样地给他浇上消毒药水。大概是消毒水的冰冷，恢复了他的知觉。他睁开茫然若失的眼睛，动了动脑袋，想要环视一下周围。每动一次，颈上的绳索就勒紧一下。

“班长！课长！胸口……胸口……”由于痛苦，他脸已变形，咕嘟咕嘟从嘴里吐出黑紫色的血。

“班长！班长！”须藤自感染这种病以来，一直这样叫喊，他要求治疗。

在我头脑里显现出1939年开始侵略中国时须藤母亲的脸，她给了我一小筐水果，嘱咐我说：“和良雄要好好相处呀！”从那时以来，我们就共同卷入了罪恶的生活旋涡。

“给他帮点忙吧。”我在把手伸向药物箱想要取“凝血酶原”止血剂的一瞬间，心里这样想。“开始！”把须藤全身检查完毕的大木下了命令。

大木看着我的眼睛，命令从消毒器里取出解剖刀。“为天皇陛下效忠。”我压制了要帮助须藤的心情，把解剖刀递给了细岛。反握着解剖刀走近须藤的细岛，又想起了什么，改变了主意。

“喂，宇田技手，你做吧！”他把解剖刀交给了宇田。

宇田往大木脸上看一眼，接过解剖刀，为了看清切的地方，开始抚摩须藤的肚皮。完全想的是给自己治疗的须藤，正在挣扎之中。

“课长，对不起，请你给我快点做吧。痛苦呀，快点！快点！”须藤不断地叫道。拿着解剖刀的宇田，手稍微有些震颤。

从解剖台退后一步之后注视着的大木，用歇斯底里的声音高喊：

“快干”！

“须藤，成佛去吧！”宇田反握着解剖刀，刺进了须藤的上腹部。

“救命呀！”从须藤的嘴里传出了呻吟声。宇田的手哆嗦起来。“窝囊废！怎么啦？”听到后面这大喝一声，宇田倏地把解剖刀下切去。他用翻手刀撕开胸部的皮肤，血流向解剖台的血池，啪嗒啪嗒地落下去。

“畜牲！”从流着血的须藤嘴里，喊出这样一句。与此同时，在解剖台上，内脏明显地露了出来。他死了。

几个小时后，在第四部第一课的研究室，在暗处的显微镜下，可以看到跑来跑去的鼠疫菌。

“这样不行，要使它通过动物的身体而加强毒性。好吗？细岛。”听到要更加残酷进行生物实验课长大木启吾少佐的命令，迷恋于未来军官地位的我，开始了将用于大量生产细菌的培养疫苗的工作。

我憎恨安然实行非人道罪孽的自己。这种罪孽决不能允许再在这个地球上进行。人类致力于和平劳动，是为求得人类的繁荣。侵略者、挑拨战争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我不顾才疏学浅，一定要在这里暴露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细菌战部队的部分罪行。

简　历

1939年5月，在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731部队)入伍。

1943年3月，退职。

1944年3月，在原关东军59师团32联队作为现役军人入伍。

1945年8月，任原关东军125师团军医部兵长。

1946年9月，混入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3师卫生部。

1952年6月，在河北省永年县被捕。

原籍：千叶县长生郡。

出身阶级：雇农。

年龄：34岁。

笔者的片言只语（1982年7月）

731部队的极恶劣、非人道行为，是天人所不容的犯罪。

为战争出卖科学家良心的"学者"，还有以救人命为使命的"医学家"、"医科学生"，由他们的手或在他们指挥下所进行的残忍活动，作为战争犯罪来看，也是"蹂躏国际法规范和人道主义原则"的恶劣典型。

我尽管愚笨，也是他们的爪牙，犯下了不能偿还的数不清的罪恶，无论如何，追悔莫及。

由战犯拘留到被释放，归国二十多年，生活虽然不算太富裕，但是能过着安稳的日子。这得归功于反省侵略战争、不允许再发生战争、坚持捍卫和平的日本国民的良知。我深深感谢。

我从个人体验出发，坚持反对把侵略战争正当化或美化的风潮。

我认为，不知道战争的家庭多起来，是让人愉快的。因为，

这正说明和平在继续着。这些家庭的人们是用战后民主主义教育培养的，不像我们那样拿着武器侵入他国，随心所欲地杀害当地居民，还以为这是“正义战争”。但我希望战后成长的人们知道战争的实质：战争是邪恶的凝固体。

最后，日本正在紧缩财政，一味大大突出军费，不断削减象征和平的福利。停止备战，把钱使用在社会福利上，用来解救世界饥饿的人们，用在亚洲各国友好上，用在世界的永久和平上，这不正是多数日本国民的愿望吗？

田村良雄

（摘自《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石井四郎秘闻三则

吕 兵

石井四郎（1892——1959年），臭名昭著的日本细菌战犯。1892年6月25日生于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大里街（现芝山街）。1920年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1924年4月再入京都帝大研究生院学习和研究细菌学、血清学、防疫学和病理学。1926年毕业，从军，曾任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主任、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部长、日本侵华第一军军医部长等职。日本投降后，他逃回日本，将有关细菌战资料送予美国，受到美国庇护，未受法律制裁。至今，世人公认他是日本进行细菌战的元凶，但有关他在中国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具体罪行尚未全部披露。为此，笔者依据档案史料，略举秘闻三则，聊以示众。

一、石井四郎与渡边博士

渡边博士原是日本神奈川县立卫生实验所所长。1939 年至 1940 年间，他却成为石井细菌部队菌苗班班长，参与用活人试验超声波疫苗的罪恶活动，由学者变成杀人刽子手，这一变化完全是石井四郎一手导演的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

1937 年左右，渡边博士发明了用超声波发生器制造、改良菌苗的新技术，可以提高菌苗的产量与免疫能力。这引起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主任石井四郎的重视。他几次前往卫生实验所了解渡边博士的研究情况，发现这项新技术能弥补细菌战研究的空白，于是他设计了一个圈套，把渡边博士诱入了魔窟——石井部队。

1937 年，石井四郎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新设置了“超声波研究室”。防疫研究室建于 1932 年 8 月，是石井四郎在日本国内从事细菌战研究的基地。此时他在该室设超声波研究室是企图利用齐全的实验设备、充足的实验经费诱惑渡边，让他进入自己的“权力范围”，进而达到迫使渡边为其细菌战研究计划服务的最终目的。这一阴谋很快就得逞了。1938 年 7 月，渡边博士欣然接受石井四郎的聘请，任军医学校嘱托，迈出走向魔窟的第一步。

渡边受聘后，每天上午还在卫生实验所工作，下午就与山内助手到军医学校进行研究。他们研究的课题是用超声波改良霍乱菌苗。大约经过半年，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他们研制的超声波疫苗经过 80 人接种试验，效果比军医学校原制菌苗要好。于是石井四郎用军部命令强迫渡边博士与助手辞去了卫生实验所的职务，专职军医学校。

1939 年，正当渡边博士准备继续攻克超声波疫苗人体注射

反应过大课题时，石井四郎 又逼近渡边，胁迫他去哈尔滨石井部队完成下一步研究工作。渡边当时听说石井部队十分神秘，易进不易出，心里不愿去。石井则为达到最终目的极力劝说他。最后，石井对渡边说："如果实在说不通你，那以军部命令你去研究如何？"渡边说如果去大连卫生实验所就去。石井又耍一个花招，说："可以，但先去哈尔滨。"渡边与助手山内迫于当时军部的压力，听信了石井的话，抱着将来去大连卫生实验所的希望，于1939年6月离开日本，踏上赴中国哈尔滨的路途。

渡边博士与助手到达哈尔滨时，石井部队正在扩建，实验设备不全，超声波疫苗的研究无法进行。石井把渡边安排在第四部任菌苗班班长。石井部队当时下设八部，第四部是生产部，负责生产细菌。菌苗班则负责供给关东军细菌作战所需之细菌，包括：伤寒、副伤寒、赤痢菌苗、霍乱菌苗以及流行性脑膜炎菌苗等。当时该班成员17人，定期生产60万人份细菌，且3个月后即失效，重新制造。

1939年5月，诺门罕事件爆发，石井部队组成细菌作战队赴前线进行细菌作战。菌苗班被抽出5名班员，剩下人员在渡边率领下生产细菌。由于当时生产任务极重，石井把安东洪次①等派到该班帮助生产细菌武器。但是，石井作战队在战斗中受到苏军沉重打击，石井一生引以为自豪的滤水车亦被击毁，他们撒布的细菌污染了战区附近的河流，结果玩火者自焚，疫病在日军中蔓延。10月初，石井部队成员悻悻而归。10月末，北满孙吴（今黑龙江省孙吴县）等地发生病源不明之热性传染病，石井派渡边组成了调查班，渡边任班长。但经过约3个星期的调查未取得成果。

① 细菌战犯，大连卫生实验所所长，战后回日本。

1940年3月，超声波发生器等实验设备安装调试完毕。石井四郎下令进行人体实验。为此，菌苗班组成人体实验班，班员有川名技手、千叶技手、小林嘱托、渡边博士与山内助手等。渡边博士与山内助手负责生产超声波霍乱疫苗。

5月，人体实验开始。他们把受试验的20名中国人分为三组。一组，8人，注射超声波霍乱疫苗。二组，8人，注射军医学校制霍乱疫苗。三组4人，未采取任何防疫措施。大约二星期后，又让上述20人喝下混有霍乱菌的牛奶，这种毒菌是石井部队培养的剧毒菌，对人致死量是1/千毫克，当时使用的感染量是1/500毫克。结果，“一组8人中仅有1人稍有间痛和腹痛，3天后复原。二组8人中多数患下痢，并有3人病情严重，1名死亡；作为对照的第三组4人，全部死亡。”①

石井四郎得到试验报告后，将结果呈报关东军军医部，建议采用超声波疫苗作为细菌战时保护己方的“武器”，被采纳。于是石井下令大量生产超声波霍乱疫苗。可渡边博士与助手山内还想去大连，就以设备不足为由，提出去大连制造菌苗的要求。石井不同意，要求他们利用现有设备生产。渡边看出石井不愿让他们去大连，原来的允诺成了口头支票。为此渡边几次与石井发生冲突，矛盾开始激化。最后一次，也是危及渡边生命的一次，发生在1940年9月，当时，长春发生了鼠疫，石井部队开始防疫。石井令菌苗班昼夜不停地生产防疫疫苗。但因生产被拖延，石井从长春打电话询问疫苗生产情况时，得知疫苗未制造出来，就叱责了渡边，并令渡边去长春。当夜渡边赶赴长春，住于大和旅馆。据他的助手山内说：“第二天，听说渡边博士在长春大和旅馆前因交通事故而死，但我却总怀疑。”②

---

① 参见山内自述。
② 山内自述。

结果，渡边去大连研究超声波疫苗的愿望成为泡影。

二、石井家族的不义财

荻原英夫是石井四郎的同乡，又是远房亲戚，他的叔父是石井家的女婿。1934年左右，石井四郎在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建筑细菌研究所，他把家乡大约20名青壮年招到满洲帮助建设。荻原的叔父石井正雄、舅父青柳雄等都作为其中一员来到了伪满。他们在伪满大约一年间，获得了大量钱财。然而，其中最突出的是石井的亲戚铃木茂。他开始时是做日工的木匠，后来却逐渐成为承包石井细菌研究所建设工程的组长。

1934年夏，几名关押在细菌研究所的抗日人员逃出虎口，这引起石井四郎不安，他怕自己的罪恶活动暴露于外，立即把该研究所迁到哈尔滨南岗。1936年，日本天皇下令建立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石井四郎任部长。1938年，关东军下令在哈尔滨市郊平房建筑"军事特区"，作为石井部队研究、生产细菌武器的基地。石井四郎又从家乡招募了两批人员，充实铃木组，安装四方楼① 内的各种设施。

荻原英夫是第二批来满洲的人员。他参加了四方楼第七、八两栋内部安装工作。此项工程使他获得了"可观收入"。

1937年8、9月间，荻原同其他20名应募者一起，在东京都牛道区军医学校参加考试，被录取（考试只是形式）。1938年他们一行20人来到伪满。到伪满后，他们在第七、第八栋工作。当时建筑物的内部只有入口处和最里面间隔有房间，中间像个大礼堂，没隔断。第七、八栋被第三、四、五、六栋所包围，从外面完全看不到。入口处有一坚固大铁门。在第三、四、五、六

---

① 即石井部队的实验楼，因形为四方称为四方楼，其第八栋是关押供实验用的活人的。

栋三楼的角上都装有探照灯，直接射向七、八栋。三栋的房顶上还建有更高的了望台。

他们开始干活前，建设班工藤技术员传达了石井部队长的命令："七、八栋的内部工程今年内（1938 年）必须完成。有关业务问题，同部队的任何人都不许议论，如有人议论，必予处罚。"① 随后，他们开始刷第八栋内已间隔好房间的墙，并准备间隔其它房间，这是他们第一项工作。根据石井的指示，凡出入第七、八栋的人必由保密班（为保密而设立的机构）检查证明并搜身。木工和瓦工负责人则每天必须将内部设计图交给保密班保存。荻原的舅父青柳是这 20 人的负责人，他当天要向保密班报告到工地干活的人数、作业种类和地点。

但由于石井部队没按合同规定把荻原等算为部队职工，只给他们临时工的工资（荻原的日工资是二元八角，这是杂工中最低的），因此他们怠工，致使工程没有进展。后因工期迫近，铃木请示石井同意，又从家乡招了 40 名工人，参加七、八栋的内部施工。这 40 人于当年 4 月到达伪满，至此，千叶班人数增至 60 人。青柳仍继续任千叶班长职务。

第二梯队到哈尔滨后，开始承包，工程有了一定进展。荻原说："我们将七、八栋一、二楼的 29 间房的墙壁刷好后，开始隔监狱。在此之前，曾在五常石井部队工作过的人，似乎也不知道七、八栋的用途。我是在二三个月后才听青柳说这是收容试验用活人的监牢。牢房入口有铁门，四周是水泥的，每间牢房都有厕所。1939 年，七、八栋牢房基本完成。"②

第二项工作是搬运、组装各种研究器材。如安装在三栋一层的灭菌器等。

---

① 荻原供词。
② 同上。

通过承包，获原等每天有10至20元收入。有的收入多达三四十元。获原说："我刚来哈尔滨时，扣去每月20元伙食费，再往家里寄五六十元，手中就没多少钱了。后来，我每月寄家100元，还可添置西装等衣物。而且，星期天去哈尔滨时，我也可以出入妓院、咖啡馆。生活富裕了。我前后（1938—1939年）向家里寄了大约100元。"①。

以上只是获原一人的情况。而铃木茂此时更富有，已"拥有家资十万！"②石井四郎 家的钱财更多。这些钱是石井四郎杀害中国人民而获得的不义之财，发散着浓烈的血腥气。

三、石井在山西的罪恶活动

1942年8月，石井四郎因贪污实验费被撤职，降级任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军医部长。任职期间，他为防止细菌战中"自伤"日军，积极从事卫生防疫工作。他与助手曾多次举办训练班，提高军医的防疫水平。据战犯供认，石井四郎与助手渡边于1942年11月在太原举办训练班。由渡边讲授了病院内传染的预防办法，具体包括：病房及伙房的防疫设备、对水井的消毒办法、作战中对用水的检查法以及毒物检查法等内容。1943年4月初，石井四郎亲自到潞安（今长治市）陆军医院检查防疫工作，作了如下指示："（1）令潞安陆军医院正确诊疗，让患者早愈，重返前线；（2）严肃军纪，进行精神教育；（3）军医需要进行医务学习，提高知识水平；（4）研究利用中药补充药源；（5）时刻注意防疫，提高防疫知识。"③ 当时，潞安医院在石井亲自指挥下进行了防疫演习。演习内容是飞机投下鼠疫菌

① 获原供词。
② 同上
③ 种村立三供词。

后的防疫。潞安医院组成了防疫队，采用石灰水进行消毒，以及在军营与仓库间堆放的破席上撒施石灰等等防疫措施。

研究冻伤是石井的另一任务。战犯汤浅谦供称："1942年12月，石井四郎亲到潞安医院进行巡视。当天上午，他召集军医讲授关于冻伤实验的结果。他说，过去冻伤用摩擦法不好。根据冻伤实验，凡冻伤严重到几乎心脏停止跳动时，可用37℃温水浸泡全身，即可复原。……当晚，他又召集下士官以下四百多人在司令部内看了有关诺门罕事件中防疫的电影。石井四郎现场说明了电影要旨。"战后，冈村宁次回日本后撰写的回忆录中也供认："（石井）在完成其本职工作外，从事特别研究的使命，并获得很多成果，特别对于治疗冻伤，他得出了用37℃水浸泡伤处是最好的结论。这些都是根据使用人体进行种种宝贵试验，或让他活，或让他死，或让他再生等等所取得的成果。"可见，石井当时关于冻伤的研究得到了冈村的赞赏与支持。

然而，这位从事细菌战的元凶，时时不忘其老本行，虽贬居山西，却仍利用一切机会从事推广细菌战的理论与方法方面的研究工作。石井到山西上任后（9月上任），首先就以太原防疫给水部作为试验中心，研究细菌战。1943年7月，石井在太原第一军司令部对参加太行山作战的军医们讲："斑疹伤寒怎样传染？从前有人说是从口内传染，实际上是虱子传染，是患者在抓痒时，使细菌进入皮层内致病。"他还说："这在太原防疫给水部用中国人作过斑疹伤寒试验予以证明的。"据当时有关人员讲："太原防疫给水部的业务由石井亲自指挥。其中大桥和野口两人由石井直接指挥，专门从事细菌战研究。"另外，他还上窜下跳四处传播细菌战理论。1943年3月，石井四郎到山西崞县给下士官讲述了"疟疾传染情况"，并放映了日军攻打上海时部队患病情况的电影。4月和9月，石井又两次窜到潞安，讲述

了用发霉的芋叶与小麦里的黑疽病菌混合培养的比尔斯菌的作用，并阴毒地说："如果天皇一旦有令，我们马上就可以将这种细菌撒在美国，来年将寸草不生。"

正是在石井四郎的宣传鼓动下，山西日军在垂死前多次向我人民使用细菌武器，造成严重损失。如战犯×××供称："1943年10月至1945年8月，我在太原市西洋市北支派遣军直属部队防疫给水部工作。在河南作战时，日军在新乡一带以救济为名把伤寒菌掺入白面，杀害了很多中国人民。"又据种村立三供认："1944年4月，在潞安陆军病院任卫生准尉时，我在潞安西南约6公里的某村北边井内投过伤寒菌。经过15天后，听说得伤寒的老百姓有30名，其中3名死亡。"战犯五十岚猛供述："1945年7月上旬，我在山西曲沃县城外驻扎时（第114师团直辖炮兵大本部），……把从临汾县城部队司令部情报室领来的高热和下痢的毒品，扔到东头井里和村中的水井里。"

1944年夏，日本侵略者日薄西山，石井奉命离开山西回日本，筹组细菌战总部，这才结束其在山西的罪恶活动。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

牡丹江细菌支队

程吉思

六四三支队坐落在海林城东北四华里处的福利村，伪满时叫"腰屯"，老百姓俗称为"东大营"。光复后改叫福利村。"东大营"占地面积约60垧左右，四面用铁丝网圈住，营房入口处有门岗，营房前专门设有部队长办公室，部队长尾上正男每天乘坐小汽车来往于该部队与海林日军官邸之间。

距营房以西三华里左右，岗顶有日本飞机场，两地彼此相望，并有汽车道相通。

距营房正北四华里左右的斗银沟，驻有日军四五〇部队；海林火车站至斗银沟有铁路专用线从六四三支队东侧通过，供四五〇部队运输武器弹药之用。

此外，营房南侧还有一日本兵营，番号二六二四部队。二六二四部队和六四三支队同驻在一个大院里，中间仅有一道之隔。这个部队主要房舍建筑一共有三处：一处是〔型的汽车库；一处是四壁镶有瓷砖的地下室；一处是机械加工厂。在这个部队工作的都是穿着不带军衔军装的日本军人。六四三支队里的劳工尽管看到他们的人和汽车来往于六四三支队，但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干什么的。二六二四部队与六四三支队有没有关系目前尚未查清。光复前两天，即1945年8月13日，二六二四部队和六四三支队的房舍一同被他们自行炸毁。

支队内曾繁殖和搜捕过鼠类（豚鼠、白老鼠）和家兔，这些动物都被送到第七三一部队去用以生产细菌和进行病菌实验。在营房后边设有一个很大的动物室，有十几名日本兵在里边进行繁殖工作。该部队供给部部长神尾兼任动物室的领导，雇员岛崎和小林甲以及士兵井上专门负责饲养动物。先后在这里喂养老鼠的中国人有两名，一个是李宝昌，一个是李华民。李宝昌开始是喂鼠，后来各种鼠类动物不断增多，这项工作就由日本人自己管理了。支队内白家鼠和白田鼠很少，因而就从哈尔滨第七三一部队生产部那里领到白家鼠和白田鼠各500只来开始大批繁殖，繁殖的白家鼠和白田鼠都发送到七三一总部去。每月发送的白田鼠有100—150只，白家鼠150—200只，灰色的田鼠和家鼠每月发送200只。专有特备汽车从六四三营舍开往哈尔滨、海拉尔，或从海林站发往平房站。

捕鼠工作在六四三支队是最有成绩的，曾受到七三一部队的表扬或嘉奖。该队共捕鼠达7 000余只。虽然支队的位置在牡丹江城外的海林，但常常派遣士兵到牡丹江城内去捕鼠。为了不使市民知道他们是日本军人，捕鼠的士兵全都换上便装才开始动作，以便保守秘密。

第六四三支队内还繁殖过跳蚤，这种跳蚤也被送到七三一部队中去染上鼠疫菌，使之成为一种细菌武器。

另外，六四三支队还进行过培养伤寒、副伤寒、赤痢结核等细菌工作，以便研究这些细菌的属性及其引起疫病的效能。在培养细菌时，他们研究过细菌所赖以繁殖的营养液，目的是要制造出一种使细菌能赖以迅速繁殖起来并能长久保存其活力的营养液，同时还想找到更快地制造营养液的方法。

1943年，七三一部队长北野政次少将给海林支队制定的任务是：在牡丹江一带加紧防疫勤务，大批繁殖田鼠白鼠及其它鼠类动物；同时还要扩增供大批制造细菌用的设备。

1945年5月，当石井四郎第二次任七三一部队长时，他给海林支队下过大批繁殖跳蚤的命令，支队长尾上正男立即派人到七三一部队去学习，学习时间为半月或一月。当他们学习回来后，就开始进行大批繁殖跳蚤的工作。尾上正男先后派出去的细菌实验干部共达160人，他们在那里经过学习训练后带回必要数量的母本跳蚤，在本支队内进行繁殖。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当天晚上，七三一司令部打电话给尾上正男，要他们把跳蚤送到第七三一部队去，其余的东西则一概消灭。遵照七三一部队长、军医中将石井四郎的命令，尾上正男于1945年8月13日把六四三支队营舍连同存放在仓库内的各种材料、设备和文件全部炸毁和烧掉，只留下密码和容积为20—25公分的跳蚤由尾上正男派人送到第七三

一部队司令部去，然后全体队员便仓皇开往牡丹江以东的爱河站前线去了。

（摘自《牡丹江文史资料》）

林口细菌支队

张清林①

原侵华日军一六二细菌研究所，设在林口与古城镇（曾叫新城公社）中间（也就是现在的火葬场后梁岗上），位于去马鹿沟村的路旁，占地范围约半华里，四周用铁蒺藜网围着，中间有许多栋砖瓦房子。正中有座200米长的砖墙铁瓦盖的大车间，里边跨度5米，装有暖气，我就在这个车间里干活。我们车间前面的地下室就是"药房子"，其实就是细菌研究室，室内有医院用的全套针械器皿装置。再前面是锅炉房，最前面挨着南大门的就是部队长办公室。车间后边还有汽车库和仓库等。

院外西边，距离约300米处，靠近公路的山坡上设有一座日本兵营，驻有百余名日本兵。

院外北边约1 500米处的岗顶上设有一个飞机场，细菌部队与飞机场之间有畅通的汽车道。

1944年1月，从日本东京新调来1名军衔是少佐（即相当于少校级）的日本军官，任日军一六二细菌部队的部队长。我记得他的名字叫申元秀夫。他瘦高个，瓜子脸上缀着一撮小胡子，年纪约三十八九岁。他就是这个细菌工厂的总管。

① 作者张清林，是在林口细菌支队干活的劳工。

我干活的厂房，东头一大间里专门喂养从日本国内运来的白鼠，约有2 000余只，由日本人负责管理。西头一间里则收养当地的各类老鼠，由1名日本兵领着4个中国劳工管理。此外，还饲养白兔四五十只，还有从日本国内运来的“海猫”（荷兰猪）约有七八十只。

每隔一个星期左右，部队长申元秀夫就领着日本兵来到我们车间给老鼠和兔子打一次针。有时还到地下室——“药房子”里，杀死当地鼠，取出血液，用做配制细菌用；有时也用狗血作实验。

每过一个星期，就用马车拉7至10笼（箱）老鼠送到林口火车站，运往哈尔滨平房的七三一总部去。当时有个日本兵，我俩相处得不错。一天，他悄悄地对我说：“药的干活，力量大大的有，哈尔滨的去。”并且手指那成批的鼠笼。就这样，大量的细菌武器源源不断地从这里送上细菌战场。

1945年7月，日本军官命令士兵往锅炉里装填文件和贵重仪器，用火烧掉罪证，准备撤退。8月11日，侵华日军一六二部队在撤离林口地区前，把细菌研究所的全部房舍烧毁。

（徐文方整理，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

孙吴细菌支队

杨柏林

1940年（伪满康德7年）9月，七三一部队孙吴支队细菌试验基地动工修建。调集大量劳工，在皮鞭、刺刀下日夜劳动，工程进度很快，当年12月完成房屋建造。孙吴支队对外番号为

"六七三部队"，位于孙吴县城西南方向约4公里的一个土山丘上。

孙吴支队初建时期的部队长是佐佐木少佐，1942年由西俊英中佐接任，同时兼任七三一本部训练部部长。支队工作人员初期30多人，第二年（1941年）增加到80多人，到日本投降时已达120人。

和七三一部队本部一样，孙吴支队试验基地主要培育与繁殖供散布细菌用的寄生虫。伪满时期，关东军在孙吴多次强迫群众交田鼠，学生停课捕捉老鼠。孙吴支队的15间鼠舍中，每间地下都有一个食物窖，共收养老鼠1 000多只，还有10多只黄色的老鼠，俗名大眼贼，是属于松鼠科鼠类的原宗。还有江豚200只、兔子50多只、羊3只，每周从动物身上抽一次血。

在七三一部队孙吴支队之外，还有一个早于1938年即动工兴建的细菌试验基地，番号为二六四五部队（地址在关东军孙吴驻军东仓库内）。化验室和附设制药厂15间，养鼠室有房屋10间，饲养试验用动物有小白鼠、灰鼠300只、兔子40多只以及麻雀、江豚等。

从试验动物身上抽血，同时也大量抽取人血供做试验和生产菌苗。建于孙吴二六四五部队（东仓库）的细菌试验基地就曾以验血检查身体为名，抽取3 000多名劳工的鲜血。源源送到七三一第四部（即生产部），据这个部的部长川岛少将证实，在一个生产周期内至少能培养出3万万亿微生物，用做各类细菌武器。

8月11日到12日，孙吴支队在支队长监督下焚烧了文件、图书和所有饲养的动物，由大熊带领4名士兵在锅炉里烧毁。另据第七三一部队训练部长兼孙吴支队长西俊英中佐供述，8月14日遵照他的命令孙吴支队发给全体队员（120人）每人一剂

毒药，要他们遇有被苏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俘虏的危险时即服毒自尽。可是他本人，即使在被俘、预审甚至被拉上国家军事法庭的时候，也没有动用那一剂毒药。

（摘自《孙吴文史资料》）

日本关东军细菌战在开原老城的罪行

李师文　杜源佐　朱肇礼　尚国华

一

1946年夏季，瘟疫病在我国东北大肆流行。三四个月时间，开原县人民死亡约3 000余人。这次瘟疫的流行是日本细菌部队罪恶的又一直接后果。日本微生物学家笠原四郎教授，1985年8月13日晚在英国电视屏幕上郑重承认："我感到罪孽深重，我做错了事。"就是这位日本学者，当年在我国东北，曾对盟国战俘和中国无辜平民，进行过骇人听闻的细菌效果试验。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我国东北曾建立了两个进行细菌战的秘密部队：其一，是设在哈尔滨附近的平房镇一带的细菌战司令部，石井四郎为司令。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秘称第七三一部，即七三一部队。占地30多平方公里，拥有3 000多名日本"科学家"和其他人员，在那里专以活人为试验品，研究细菌战的可行性。其二，为"关东军兽医预防部"，秘称"第一〇〇部队"，设在长春距西南10公里之孟家屯①，专司实验和制造细菌武器。这群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

① 孟家屯今属长春市朝阳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散热器厂内。

重的灾难，其罪行罄竹难书。

二

日本侵华战争结束的翌年，即1946年7、8月，由第一〇〇部队，将大量霍乱病菌投放东北各地。致使开原老城镇内瘟疫流行，从镇内西街石塔、扶余，遍及南街，一直蔓延到东关、教军场各村。两个月时间，由于瘟疫肆虐流行，死亡达700余人。清河畔、黄龙岗墓地埋葬中华儿女尸体的坟包暴增。致使一些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悲惨情景令人目不忍睹。一时间，老城镇街头，出殡报丧的人群接踵而过，几家棺材铺的棺材抢购一空，专以轿房抬杠为职业的轿夫，生意兴隆。一些患了瘟疫病而死人的家里没有棺木，不得不用木柜改制棺椁。家境贫困的，用炕席卷尸，用破被、褥单裹尸。苦难的老城镇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历史上的血泪帐。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和官吏对此熟视无睹，根本不加理睬。城内居民家家大门紧锁，轻易不敢出屋，唯恐染上瘟疫，闹个家破人亡。

老城镇首例瘟疫病人发生，在西关外一家姓陈的家里，全家5口人，一对青年夫妇，带着个吃奶的男孩儿，外加两个上了年纪的老人。1946年7月的一天，老太太突然发病，拉肚子、呕吐，不足半天时间便故去。家里毫无准备，措手不及。于是儿子和父亲张罗料理丧事，到镇上去买棺材，不料老头和儿子把棺材弄到家，没两袋烟工夫，老头也与世长辞了。儿子哭得死去活来，无奈儿子还得去买棺材，把棺材拉到家里一个多点的工夫，见到媳妇又病倒了，不一会儿又咽气了。结果仅仅一个上午，这位可怜的男人竟也一命呜呼了。5口人中剩下的吃奶男孩，被亲戚抢先抱走，才幸免一死。就这样，一条不足百米远的西关小巷，仅仅四五天时间，因患瘟疫病竟相继死亡90多人。

几乎家家都摊上了，活着的人所剩无几。当地老百姓说，那些天里，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人，头一天还在一起唠嗑，取乐打趣，第二天竟突然死掉。人死了开始还有人帮助出殡，后来人死多了，也就没人帮助给出殡了。

石塔街当年染上瘟疫病险些丧生的张凤琴老人回忆讲，她老人家当年是14岁的童养媳。一天去市场买菜回来磨米，突然感到头昏，嘴角麻木，吐绿水，拉肚子，便的像淘米泔水，病倒后昏迷，人事不醒。家里人准备了棺材，屋里只剩她一人，房子被人用草绳子圈上，戒严封锁起来。她苏醒后，使出吃奶的劲，挣扎着爬到屋外。后来由亲戚用鸦片，止住了腹泄，才避免一死。

扶余街瘟疫病流行得也很严重。据张鸿超老人讲，当年他家院内5户人家，不到10天死了7口人，人死后，吓得没人敢给往外出殡。可见，当时的情景多么悲惨。

国民党当局对瘟疫病根本不予理睬，设立的所谓“隔离所”，如同人间地狱一样，不分病人轻重，一律对待。凡是进了“隔离所”的瘟疫病人，几乎没有治愈出院的，都死掉了。

由于当时医疗技术限制，特别是卫生防疫工作无人问津，一旦发生瘟疫，实在无法控制，也是当时老城瘟疫病流行高发的一个原因。

三

老城镇东郊教军场村，1946年，全村人口约七八百人，当年秋天，街面上一位从沈阳来的过路人，因病死被扔到村东大坑里。结果，成了教军场瘟疫侵入的传染源，闹得瘟疫流行达一个多月，波及全村2 000多户人家。首先从村东头一些人家开始，逐步往村西方向蔓延，有的一家人死了3口。王富春老人当

年17岁，他老人家回忆说，他父亲、母亲得病后，家里由于贫寒，根本无钱买药治病，老父发病3天病故，接着不大工夫，年迈的老母也咽气死去。第二天，帮忙料理丧事的叔叔也被瘟疫夺去了生命。王富春老人本人当时也染上了瘟疫，病势也比较重。多亏本家的叔叔、婶婶请了医生及时诊治，才幸免。村西头一家姓朱的5口人，竟在一天之中发病死掉了4口人。可见瘟疫病，当年是多么残酷无情啊。

一个150左右户的教军场村，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死于瘟疫病的竟达30多人。

一位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在1981年11月出版的《恶魔的饱食》一书，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日本关东军在侵占东北期间进行的惨绝人寰的细菌实验中，投放了许多致命细菌，杀害了成千上万中国人民。“七三一部队”的首恶分子石井四郎，于1959年因癌症死去。

（开原县政协供稿）

日本侵略者用中国活人作细菌杀人试验

——日本特务张绍恩的自供词

马德润

我叫张绍恩，是日本特务，曾在北票炭矿台吉医院做过化验工作。我个人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实，足以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发动细菌战争，而先用中国活人做细菌试验，残害死无数的中国良民，这的确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一

笔大血债！

1940年7月，我从沈阳医学院毕业。因我在学校就参加了日本的秘密特务组织，所以在毕业分配时，把我作为特殊人员分配到北票炭矿的本部医院工作。这所医院是北票炭矿的中心医院，因医疗设备比较先进，基本是给日本人看病的。我到医院后，日本人把我分配到化验室工作，主要是熟悉和了解日本医学派的化验常规，使之能更好地为日本人服务。

为了与日本特务机关取得联系，接受任务，我暗暗地作好了接头的准备。两周后的一天，我拿着学校发的两封特殊信件，递交给北票警察署。过了一会儿，我随着一个翻译官走进警察署的署长室。一个小个子的日本人见我走进来，打个手势，叫我坐下。那位领我进来的翻译对我介绍说："这位是黑田先生。我姓赵，叫赵德生。以后我们是会熟识的。"这时，黑田站起身来，对我说："张先生，来了很好，现在分配在哪工作？"我说在炭矿本部医院，将来还要分配到台吉医院工作。黑田拍了拍我的肩旁说："好！您年轻有为，先熟悉熟悉情况，在这个地方好好干……"随后，他又向我介绍了北票的治安情况。我要走了，黑田拉着我的手说："张先生，半个月后您到我这再来一次，咱们详细地谈谈吧。"我回到家已经夜幕降临了。

半个月后，一天中午我又去了警察署。一进署长室，就看见黑田正坐在屋里等着我，翻译老赵也在一旁站着。这次黑田再三告诉我："等你到了台吉后，先熟悉一下矿上的情况。当前矿山情况很复杂，您要通过您的业务关系，注意一下八路军和共产党的情况，并要注意在和您接触的人物当中，发现可疑的行动和现象，随时有事向我汇报。"

就这样，我在局本部医院干了两个多月的化验工作，就把我调到台吉分院去了。

台吉医院，实际上是个门诊所。这里没有病床，只有两间观察室样子的房间，有时这里也住几个病人。当时，台吉分院有一名日本人当院长和一名日本事务长，还有日本护士三人。有中国大夫三人，护士四五人。其中有男护士一人，药房和事务人员各两人。日本人院长，只给日本人看病，看病的地点在西边房间。而中国人看病，只能在东边房间。

我到台吉医院两个月后的一天早晨，院长坂本把我叫到他的诊室，对我说："我打算作两次试验，请您帮忙合作。这两次试验：一个是将斑疹伤寒病人的血静注到健康人的身上，观察病情和病人变化，由你帮助我打打针，还做些别的病情观察；另一项试验是把回归热病人的血注入到健康人的臀部肌肉上，然后再观察病情，必要时可作病理的切注。这次试验，由你替我作。必要的病理切注检查，由我自己来作。对这两次试验，将来我要写个论文，请你多加帮忙。"院长坂本说完了话，我当时点头答应了他的要求。1941 年冬季的一天下午，忽然，日本院长坂本领着 1 名日本护士急忙来到我的房间。原来，这个大院是日本人在台吉矿秘密设立的又一个变相集中营——"建国寮"。这里住的都是从外地抓来的人。"建国寮"的四周都围着电网，日本兵把守森严。一进院，就感到阴森森的。住在"建国寮"的人集体上下班，统一行动，上下班都得有人看管着。

我们进了"建国寮"的一间小屋。坂本院长说："快换衣服。"我们立即穿上胶皮靴子，戴上帽子、口罩，消了毒，然后，他们把我领到了另一间屋子里去。一进屋，我突然愣住了，只见 1 个中国矿工被 3 个日本人架着两支胳膊，硬被捺倒在一个墨黑色的铁床上。那人在呻吟地挣脱着，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健康人。日本人把逼做试验的中国工人叫"木头"，这屋里已绑来十几名"木头"，被三四个持枪日本兵看守着。

试验开始时，他们叫“木头”只穿着裤衩，被绑在柱子上、或床上。好几个日本护士先从患伤寒病人身上抽血，每人抽5CC，然后再注射到健康人的血管里。就这样，一次就作了十几个人的试验。在这十几个人中，我作了四五个人，坂本作了二三个人。在回来的路上，坂本院长对我说：“这次试验很危险，在这被作试验的十几个人中，大部分人是要死了死了的。”

一连好多天，我看见坂本院长差不多每天都去“建国察”，每天早晚去两次，是到观察室去观察被作试验者的病情和看化验结果。

几天以后，坂本院长又一次地找我说：“今晚10点钟，你来我那里再帮帮忙吧。”10点钟我准时去了。这时，坂本正在事务室，我进屋后，他拉了我一下说：“走！跟我来！”他把我领到了他的诊室。一进屋，只见窗户遮得严严的，屋正中间放着一张手术床，床上躺着一个尸体，上面盖着一条白单子。我正惊慌呢，坂本对我说：“来帮忙做一下尸体解剖。”说完，我们俩就急忙地换上了衣服，开始了工作。还有个日本护士，在旁边帮忙。在手术中，坂本特别注意这个人的肝脏。只见他取了一片组织，放在了固定的容器中。然后又把尸体包扎好，就洗手换衣服了。我想，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细菌研究吗？作完了手术，坂本对我说：“这个事，谁也不能说。”我哼了一声就赶紧走了。

第二年春天，我帮他又作了一次试验。这次是在门诊室作的。这天大约9点钟，我进了门诊室，只见屋内有五六个病人。在这些病人中，有两个是患有回归热病症的，4个是健康的人。首先，坂本欺骗那几位有外伤的健康人说：“这是一种新的治疗法，是特别有效的。”开始，我从2名回归热病人的身上，各取10CC的血，分别注入2名健康人的肌肉中。然后，再给那2名病人各打一针606，就叫他们走了。那4名健康人就留在观察室

内观察。这次试验，都是我作的一般注射，三四天后，病人才开始发冷、发烧，体温由低变高，可达40℃以上，这时，再作血涂片检查。我发现这次试验未发生症状变化。到第5天，我又从被注射人的局部取一小块肌肉组织，再作化验，这才发现，在4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注射后发现了症状，我就取下了有症状变化的人的组织，交给了坂本院长。

那时，为效忠日本帝国主义，我还干过出卖"朋友"的罪恶勾当。那是1941年春。在和我接触的病人中，有一位姓马的工人。这个人是台吉矿井下的放炮工人。他身体不好，经常来看病，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混熟了。他很热情、直率，有什么事都想和我说说，还有时请我到他家做客、并吃顿饭，渐渐地我俩就成为好朋友。

6月初的一天下午，我下了班，吃完饭，顺便又到他家中串门。他的家就住在离台吉医院不远的西南角上。我走进他家的院子，发现老马的老婆和两个孩子正在外屋吃饭。他老婆看我进来，就赶忙地让坐、问我吃饭没有？我说："吃过了。"然后，我就直截了当地问："老马出去了？"他老婆就提高声音地说道："在里屋不知干啥呢？"我一进屋，猛然发现老马正慌慌张张地往床上推送着什么东西。我看见他神色不对，就追问他说："老马，怎么了，倒腾什么呢？"他说："没啥，一个破广播匣子，修理修理。"我说："那，咱们拿出来听听吧。"他听我这么一说，脸色有些变了，一面挡着我，一面用很低的声对我说："老弟，咱俩交情可不错呀，这回事你可千万不要和别人说呀！"我哼了一声。他又接着说："这事你知、我知，心里明白，我就感恩不尽了。"我们俩又唠了一阵，我就回家了。

回来之后，我一连几天反复思考着这件事。想来想去，我为了给日本帝国主义效劳，还是决定给他告密了。第二天，我

向警察署长黑田作了汇报。后来，我碰到了警察署的赵翻译，他对我说："那事你报告后不到半天，警察署就把那个姓马的抓去了。"又过了两个多月赵翻译又告诉我，那个人已死在警察署了。

我家住在兴城，1942年秋我父就来了一封信，要我回去自己开办一所医院。后来，我把父亲来信叫我回兴城的事告诉了坂本院长，又报告了黑田先生，还真得到了他们的许可。黑田对我说："这也好，在哪里不是都一样的效忠天皇。可是你走之前，要再来警察署一趟啊。"

过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又去了警察署，黑田和翻译赵德生都在，黑田对我说："接关系的信都写好了。你到那里之后要好好的干，听你的消息。"我一看给我两封信：一封是给兴城警察署的；一封是黑田亲自写给兴城宪兵队浜田个人的。我装好了这两封信，就告辞回家了。直到1942年年底，我才把一切关系办理完毕，去了兴城，又在那里干起了为日本侵略者效劳的勾当。我不但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用中国工人作细菌杀人试验，而且我在日本侵略者的豢养和怂恿下，也充当了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帮凶，成为人民的罪人。

（摘自《朝阳文史资料》）

日军细菌杀人罪行的见闻

韩　蔚

川岛芳子——北野——中村

1938年春季，我到北京见到金璧辉（川岛芳子）① 时，金曾对我说："关东军军医部长梶塚隆二（中将）给我介绍一个北野大佐②，今天晚间在我这里吃饭，你来得正好，有机会多认识一个日本朋友，是很有好处的。"接着她又说："北野不但是军事家，还是个科学家。在华北的日军将领们都称赞他是个人物。跟他交往的人，在中国人里，恐怕只有家兄（指金璧东）③，如果跟他拉拢上，要什么地位都不成问题。"

那天晚上8点多钟，北野身穿日本和服，带着两个穿西装的日本人（一个叫中村，另一个名字忘记了）走进了金璧辉的客厅。北野邀我第二天到日本饭店千代田去吃饭。在座的有华北派遣军司令部今井参谋处长、松本大佐，和那个穿西装的中村吉二。北野在桌上介绍情况说："今井处长和松本大佐你们都是熟人，中村医官是医学界的著名人士，也是现代的科学家。"原来中村得过德国医学博士学位，是专门研究细菌的。中村问我认识不认识吉林省卫生厅长望月升（日本人），我因为和望月升很熟，就详细介绍了望月升的近况，我俩唠得更亲热了。之后，

---

① 川岛芳子：清肃亲王善耆之女，为日本浪人川岛流速之养女，改日名。

② 北野大佐：日陆军军医北野政次，后升为少将。1942年8月至1945年2月任731部队长。

③ 金璧东：清肃亲王善耆之子，曾任伪新京特别市市长。

中村对我说，他最近要到满洲（东北）去工作，地理人情很生疏，希望我能多给他介绍几个中国朋友。

宴会之后，我到金璧辉的住处。她问我今天会见的都有谁？我说都是些熟人，只有中村吉二是初次见面。金说："中村这个老小子见人就抓，也不怕棘手，你不要跟他接近，免受他的细菌感染。听说中村要到满洲去成立传染病院，已经辞去军医中佐的职位。他还不到退役年限，到满洲去恐怕是另有使命吧！"金又说："中村是个中国通，新京（长春）他更熟悉，在十多年前他就在新京头道沟开过洋行，卖药贩毒（白面、鸦片），他很有钱，用钱找他行。据说他这次是受石井四郎的命令要到千早传染病院去进行生物试验。"

从金的谈话里得知，中村时常到她家去，很早就想要认识几个从满洲来的中国人。这次抓住我，当然不肯放松，所以就千方百计地想法叫我到他家去串门。

我和中村接谈后的第二天，就到中村家去做客了。中村住的是一座中国式的四合瓦房，室内大部分是中式家具。这天中村全家有计划地接待我这个"满洲朋友"。中村穿了一身中国式袍褂，他老婆也穿的中国式旗袍，连侍女们都换上了中国服装，只是鸭子步没有改掉，冷眼看倒看不出"大和魂"味。全家都说北京话。中村对我说："韩先生请到我这来住吧，我这比金司令[1]那安静得多。有时间我们可以多谈些满洲情况。满洲是我的第二故乡啊！"接着中村诉说了他是1928年从日本陆军医院退役到长春开设药房的，1937年他应召到日本大本营作过化学兵团的工作计划。中村又说："我常听金司令阁下说，韩先生是笠原[2]参谋长阁下相处多年的老朋友，北部（英俊）中佐曾谈

---

① 金司令：即金璧辉，因曾当过"安国军"司令而得此名。
② 笠原：日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

过韩先生为大东亚共荣圈奔走过土耳其的和平，您真是一位忠诚的日满亲善者。我不瞒您说，我要去新京一〇〇部队工作，到新京时，还要请您多作向导。”

我听说过一〇〇部队是设在长春市郊（石虎洞）的一个专门研究生物细菌的特种保密部队，也听说过有些乞丐被弄到里面去不能活着出来。伪满警务总局参事官孙仁轩也向我透露过一些情况。还有千早传染病院和一〇〇部队秘密协作，经常给运传染患者和尸体，数字很大。究竟内情如何还是个谜。有一次，在中村喝醉酒后，我套出了他有关一〇〇部队的下述谈话。

中村说：“大量制造病菌，使之分泌毒素，一不用花费大批金钱，二不用特设制造工厂。论起现代化战术，日本在这方面（指细菌战）可是走在前边了。”“这种方法研究起来很有兴趣，在任何一个研究室里都可以大量制造。甚至在研究医用细菌的招牌下也可以进行。而且很多为工业发酵过程所建立的工厂，也能用来大量生产致病菌及其毒品。”他说：“你不是开过制药厂吗？对化学是很有研究的吗？未来的科学战，细菌战是最便宜的。它可以用最小的本钱，大规模地消灭敌人。”中村还讲，日本早在三十几年前就着手进行细菌战研究，日本大本营里设有军事研究室，专门研究细菌战术。石井四郎就是这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说，鼠疫、霍乱或者伤寒病病菌都比炸弹来得便宜。炸弹扔下来，一切物资都将受到损坏，而细菌战术只是使人害病死掉了，工厂、矿山、房屋、设备等都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

中村还透露：日本陆军军事研究所正在研究海下原子炮，一旦成功威力更是强大。谈话末尾，中村嘱咐我：“我们今天的谈话都是科学家的幻想，日本这种新的科学战现在还保密，可别对外人说。”

见到石井四郎

中村从华北到伪满新京。他在千早传染病医院工作不久，就调到一〇〇部队。这期间他和我相处得很不错，我们经常到“日满料理店”和“军人会馆”去喝酒。中村的老婆是石井四郎的妹妹。石井四郎是日本出名的“细菌学专家”。不久以后，石井来到伪满新京。

我曾在关东军司令部官邸会见过石井四郎。石井中等身材，语音很尖，态度稳重，显出一副伪善的面孔。他说：“战争光靠兵力，对今天来讲已经过时了。科学上发明了大批杀人而不损害物质的有力武器，既简单，又便宜。不久即可在无住宅区（作者按：石井的意思可能指的是无人居住地带）建立起实验中心。”这样的话，中村也曾说过。

石井到新京不久，吉林省白城、前郭旗等地相继发生了百斯笃（即鼠疫），以后又蔓延到农安、德惠。

参观一〇〇部队

1941年6月，中村邀我到一〇〇部队去参观。里边的实验室皆用代号。进一个培养室要经过五道门。我们走到一个实验室，被一个穿白衣服的日本人阻止说：“现在正做试验，非本室人员不准入内。”中村说：“这里是传染病尸体化验室。”中村看出我有几分失望的样子，就领我到地下室的实验室去参观了。地下室设有湿度表、温度计和洗涤器具。洗完手，戴上口罩，换上白衣服，又经过消毒，才准许进去。首先看到的是一排大小不同的电解槽，里面是用药水泡着的“琼脂”，又名洋菜，是用来培养细菌的一种食料。第二排案子上放着大小不同的培养皿，两边有大型烘箱，还有荧光灯、高压灭菌器等。再往里走，两

边是暗室。中村说："这里是培养室。"又说："生物杆菌是一种急性传染病的媒介，生长于普通培养基，需氧气，不运动。如果把它放置在黑暗潮湿的地方，可以生存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久。如果放在完全干燥的空气中，二三日内即可死去。这种菌可生存在米谷、棉花上，加热到80℃即可死亡。但耐寒力很强，冰冻之下几乎可以无限期生存。"

又往里走出50多米，往左拐入地下暗室。这时顿觉空气阴森，一股令人作呕且又强烈刺激眼睛的恶臭逼得人难以自由呼吸。只见走廊两旁约有十几个门，全用红黑布制的门帘挡着。这时正值中间一个门开了，从里面推出一辆手术床，由3个穿白衣服的日本人推着，上面用白布盖着，高高垒起至少三具尸体。当时，我心里感觉像有块石头猛地一沉。这时有个日本人把中村引向一边，背着我不知嘀咕些什么，好象问中村为什么把外人带进来。中村搪塞说："这是楠本（关东军司令部附军事部最高顾问，中将）叫来的。"

再往前走，两边的屋子里陈列着许多大小不同的干燥箱，有个屋子里都是化学药品。再进到另一座楼里，里面特别宽敞，安装着四个能容约1吨左右的形似灭菌器的装置（类似立式反应罐），正面装有冷凝管。另外几处都有人看守，并且有牌子写着"不准入内"。据中村说，里边的工作人员都有指定的工作范围，不准随便乱窜，纪律特别严。

据我所知，日军在"七·七"事变前后，就曾使用过细菌武器和毒气。建立了以千早病院为基础的细菌培养中心，之后又建立了一〇〇部队和七三一部队。他们以中国人（多半是所谓"政治犯"、"思想犯"，也有妇婴）作为细菌实验品。据说被实验者不下3 000多人。中村就对我说过"日本宪兵队，每星期都往一〇〇部队送活人作实验"。

“荣”字部队的细菌实验

1942年我在徐州时，曾接受“平林”师团的命令搜捕鼠类。因没完成任务，该师团参谋长把我召去开了一次会。因这个任务特别迫切，我曾问过板田（日军中佐，元泉参谋长的亲信，也是一个“中国通”）。他当时交给我一个小册子，我看到板田用红笔在“荣”字部队上划出标记。我当时想乘机了解一下“荣”字部队是否跟满洲的七三一部队相同。有一次，我和板田在他家喝酒，板田说要老鼠是用来研究细菌武器。他说：“南京的‘荣’字部队设有石井式培养器200多具，能造出廉价的杀伤力强大的武器来。它可能消灭或剥夺敌人的战斗力，而不破坏他们的军用物资。”

“荣”字部队也叫一六四四部队，是1939年成立的，创始人也是石井四郎。该部队共设有12个支队，总共有1 500人。石井离开该部队后，由石井推荐的太田大佐担任部队长。由太田设计的孵育室装有石井式培养器200多具，每一周能制出细菌10公斤左右。这一内部情况是小野寺中佐（曾在“荣”字部队担任总务部长）和板田对我说的。

小野寺亲自参加过石井部队远征队的协助工作。1940年在宁波一带，1941年在常德一带，1942年在浙赣一带，均使用过细菌武器。撒布的办法，都是用飞机撒放鼠疫跳蚤。他们还把散放过程摄成电影。我在关东军司令部看过这个秘密新闻纪录片。纪录片开头是把一些特种器皿挂在几架飞机的下面；接着是飞机飞到“敌占区”上空，下面有“敌军”移动，还有村庄；然后是飞机返回机场，银幕上出现“任务完成”字样，石井四郎和另一个日本军人走出机舱；最后是银幕映出“结果”二字，映出中国报纸和报纸的日语译文，写着宁波一带发生了鼠疫。

1942年，我在徐州平林师团司令部再次看到撒布细菌的纪录片。内容大体一样，只是镜头多些，解说词详细些。这次有一股烟气脱离飞机翅膀向下坠去和飞机着陆进行消毒的镜头，还有中国卫生队身穿白大衣在发生鼠疫的地区消毒的镜头。

七三一部队的“远征队”

听说，石井四郎在1940年夏季，亲自率领七三一部队的“远征队”，前往上海以南和华中汉口一带撒布细菌。据说，其目的是在具体战斗环境下进行一次大量散播细菌的实验。听小野说，鼠疫菌装在特制的瓶子里，这些瓶子装入金属制的盒子里，再把几个盒子装入放有冰块的特制大箱子里。飞机空投前，用鼠疫菌感染跳蚤。

1942年夏季，七三一部队派出100多人，与南京“荣”字部队共同组成远征队，撒布伤寒菌、副伤寒菌污染我国居民的蓄水池和水井。特别是在南京战俘营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

当时在南京有中国战俘营两处，约3 000人。石井四郎首先视察了战俘营，然后让战俘吃特制的烧饼。据参加这一罪恶活动的清水说，烧饼是由“远征队”做的，用注射器把细菌注入烧饼内。战俘吃完烧饼，就全部放走。其目的是引起伤寒和副伤寒病流行。他们还把这些细菌注入西瓜和香瓜里，强迫战俘吃。

1944年春，我由华北回到伪满，在元泉少将[1]家里见到宫田中佐（日本皇族）。宫田住处离我家很近，我们同坐一辆汽车回家。他下车时车上还有一个纸封筒，我招呼给他，他说：“那

① 元泉馨少将为关东军司令部附兼伪满军的高级顾问。

是给你的。”到家拆开一看，是日军十三军团的“秘密战勤参考”，其中有进行细菌战的材料。如要求日本士兵带着石井特制的烧饼，宿营时放在睡铺左右，当作忘带走的食品留给中国居民。

投放腊肠杆菌

1945年，铁华部队① 接受命令：限期“肃清”北宁铁路沿线的“赤色分子”。但搜捕扫荡不见成效。于是请求“荣”字部队的别动队支援。后来可知少校弄到腊肠杆菌，派李兴棠带3个人去执行任务。李回来对我说，他们的任务就是把一个用铅皮包装的木箱给铁华部队运去，是否使用和使用方式，他们都不知道。据说，那之后，在铁道沿线的两侧，一些蔬菜腐烂了，许多牲畜死亡了。这样，他们就可以把铁道两侧宣布为疫区，强迫老百姓迁移。

秦皇岛军事演习

1945年6月间，伪满军驻冀东宪兵团渡边科长和战地行动队可知少校，带翻译郝玉衡，到秦皇岛参加日军军事演习。郝玉衡回来后对我说，这次演习有一〇〇特种部队参加。一次演习是：先把两个“囚犯”放在指定地点，飞机低空飞行，在距前二三百米的时候，施放毒气和另一种化学毒品。结果两个被害者的皮肤都被灼伤，呼吸困难，两眼睁不开。30分钟过后，两个人的皮肤上都长出有扁豆大小的红斑，附近植物的叶子上也长出了白色的斑点。

另一次演习是飞机投放无声炸弹，爆炸时产生一股黑烟，接

① 铁华部队：冀东伪军“铁石部队”中的特务部队“战地行动队”的别称，曾执行过撒布细菌的任务。

着地面上笼盖一层黑绿色的烟雾，烟雾消失30分种后，才验证被害者的中毒症状。被害者呼吸困难、嗓子沙哑、晕眩、咳嗽、流鼻涕、全身软弱无力、皮肤发热、呕吐、口流白沫，最后口流鲜血而死亡。郝玉衡是伪满医科大学毕业的，对中毒症状说得比较详细，我青年时也学过医，所以记得比较清楚。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日军在诺门罕战争中的细菌战

内蒙古政协文史委

1939年7月初，在诺门罕布尔德诺尔和胡鲁斯台诺尔之间，日本关东军开来了一支奇特的部队。这支部队的周围布满了指向天空的高射炮，巡逻队牵着德国种的“黑盖”和日本种的“狼青”等优种警犬，戒备十分森严，即使是日军各作战部队，也不准许接近这片禁区。

当时日军的军服全是黄色，而这支部队的军人和文职人员的服装则是草绿色。军人上衣佩带着肩章、袖标、胸章，下面是马裤、靴子，帽子的前沿缀有一枚黄色的星星，翺着手枪和战刀。文职人员穿着草绿色的开襟西服，系草绿色的领带，也带肩章，胳膊上带“山”形臂章，胸前有的绣着一颗紫星，有的绣着黄星或白星。各种颜色的星，区别着每个人的等级。这支部队人数虽然不多，日军的各部队长们却都敬而远之。这就是日本陆军的秘密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细菌战部队的作战计划

关东军司令部在诺门罕战争一开始，就指示石井部队制定出在诺门罕地区和哈拉哈河两岸的细菌战作战计划。如果日军作战失利，细菌战应付诸施行。

石井四郎大佐拟定了3个作战方案：

1. 将装有细菌感染的小动物、物件及食品的炮弹，用皇军炮兵阵地上的大炮发射出去。

2. 使用飞机空投石井瓷壳炸弹，这种瓷壳炸弹，里面装有5 000只带有鼠疫菌的跳蚤。借助少量火药的作用，使它在稍为高出地面上炸开。每架飞机可携带数十个这样的瓷弹，去哈拉哈河两岸投掷。跳蚤一落地，就能发起一个扑寻热乎乎人血的行动了。

3. 派出一支敢死队，深入哈拉哈河西岸地区，往所有的水处投撒细菌和剧毒，使河水污染。为此，制作了精密的哈拉哈河西岸的供细菌作战的地图，上面标着可供细菌污染的饮用水源、河流、泉眼、湖、泡和水井等作战目标。

细菌战必须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甚至不能让友军知道。可是进行中又必须得到友军的协助，否则将出现误 伤本军的事件。

关东军诺门罕前线指挥官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凭他多年从事间谍与反间谍的经验，对照目前关东军司令官向苏蒙 军进攻的命令，认为石井四郎大佐的3个方案都不可行。

首先，用大炮发射细菌弹不可能保守机密。皇军炮兵阵地经常遭到苏军炮轰，细菌弹有可能在本军内被炸；用飞机空投有可能被苏军高射炮或苏机击落在东岸地区，将危及本军；敢死队深入敌后可能性不大，凡是有水源的地方，苏军都严密把

守，而没有驻军的地方是一片空旷的沙原，既没水源也没有敢死队生存的条件；最后决定由石井部队碇常重少佐组织敢死队，一旦战争恶化，敢死队在哈拉哈河上游撒布细菌，打击苏蒙军的战斗力。并派白俄中校郭索夫到上游地区防卫的兴安师，进行防谍保密工作。

7月10日，当小松原中将在西岸和东岸的军事行动都归于失败进行战线整顿时，关东军司令部石井部队开始行动。

哈拉哈河被细菌污染

7月13日午后1时30分，石井大佐在胡鲁斯台河南岸的步兵第71联队部里通知说："不要饮用河水，河水可能已被污染。"同时，日军第一线各部队普遍地使用了"石井滤水器"和"石井滤水车"，饮用过滤出来的水。

石井大佐到处"访问"，通知不准饮用河水，部队要喝过滤的水，并不是在搞战场卫生，而是他的细菌战敢死队开始了行动。

碇常重少佐带领着包括2名军官在内的22名敢死队员（这些敢死队员在哈尔滨平房防疫给水部出发前，都用鲜血签了名，宣誓不泄露任何机密，直至死去），偷偷摸摸地在兴安师后方距补给所不远的松林里，从汽车上卸下物品，然后，背起了沉重的行囊，沿着松林边缘向哈拉哈河岸走去。

用布包裹着的物品里有2只充气式大型胶皮船，十几个高大的金属容器，还有大型皮箱、玻璃容器、铁水桶、长柄勺和绳索等。

到了哈拉哈河岸边，碇常重少佐用望远镜看了看对岸，没有发现苏军，天空也没有飞机，虽从西北方向隐隐传来隆隆炮声，但距离这里不下20公里，少佐命令开始行动。敢死队就在

岸边一人多高茂密草丛中开始组装器材。胶皮船充气鼓起来后放进河里，又把两只船的船尾用绳索捆在岸边，把金属容器和铁水桶装进船里。他们上了小船，向河中心下游划去，当驶到岸上绳子拉紧的时候，两只船上的士兵同时打开了每个容器的盖子，然后将容器扔进河水中。

容器里装的是鼻疽菌，只要牲畜喝了被鼻疽菌感染的水，两周内就死亡，而人饮了就发高烧，浑身浮肿，四肢无力，最后死亡。在当时，还没有制服鼻疽菌的特效药物。容器里还有伤寒、霍乱、鼠疫等细菌。

容器在水底下慢慢地、不断地放出鼻疽菌，顺水向下游漂去，两只胶皮船顶着水慢慢向上游划着，伤寒、霍乱和鼠疫菌的容器被丢在水里，两名军官在提取水样，测试温度，做着记录，并进行拍照。

这样行进了1公里，将带来的全部容器都抛进河内。投入河中的各种细菌共重22.5公斤。

历史在作证

诺门罕停战后，1939年10月2日，关东军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向石井部队颁发了奖状。

诺门罕战场进行细菌战的照片底版及碇常重少佐等22人敢死队签名的血书，都保存在七三一细菌部队教育部长园田中佐的保险柜里。1949年12月26日在哈巴罗夫斯克开庭的远东军事法庭上，原七三一部队教育部长西军医中佐作证时，证明石井部队在诺门罕战争发生时，使用过细菌武器，他在接任园田中佐的教育部长一职时，发现保险柜里存有碇常重少佐在诺门罕进行细菌战的文件和照片。铁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

（摘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四辑）

大量捕鼠繁殖细菌

榊原秀夫　田村良雄
秦正氏　　荻原英夫

七三一部队及其支部，并不只限于捕鼠和繁殖白鼠，还令关东军的后方医院和物资仓库都饲育白鼠。也曾企图从伪“兴安南省”强制购买野生栗鼠代替老鼠。例如林口支部长榊原少佐即大肆宣传各种“鼠害”，从支部员到“开拓农民”皆被动员搜捕。只送到七三一部队的鼠类，4月为1 000只，5月1万只，6月8 000只，7月7 000只，共达2.6万只之多。6月以后，各支部也都进行“饲蚤教育”，并各分得1公斤蚤开始饲育。

石井四郎和关东军司令部的第四课参谋原守中佐，第一课参谋宫田协商“要伪满洲国每月搜交20万只老鼠”。7月中旬，派调查课长石光熏、课员秦中尉赴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物色生产鼠疫菌蚤的工厂。该月下旬，便以关东军嘱托的名义，派到司令部归原参谋调遣。还打算通过伪满洲国的警务总局，动员所有伪警，强迫每月从沈阳地区捕10万只，长春5万只，哈尔5万只老鼠，送到上述地区的生产工厂，尽全力生产鼠疫菌蚤，谎称为制造预防斑疹伤寒的疫苗。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一辑，标题由编者所加）

日本侵略者在沈阳市收购老鼠搞细菌战活动

马恕知

这是伪满时，我在奉天南市场警察署任警察交通中队长身历目睹的事实。康德7年（1940年）7月至8月间，日本关东军某部派遣一部分人到沈阳日军总后勤医院（地址在马路湾大街南），在奉天日本特务机关、日本奉天宪兵总队协同下，通令伪奉天市警察局转令南市场警察署长牧野亚一，召集署下23个派出所及街道保甲组织等人，叫该地区住户居民用耗匣子打活耗子。大的老鼠给1角钱，小的给5分伪币，每天送交当地各派出所，有专人负责收鼠付款。日军用军用汽车（带棚子的），从各派出所将收的老鼠送到陆军医院内存放。收老鼠的日军穿白大褂，带口罩和胶皮手套，每天到派出所给收放老鼠的地方消毒。对外就宣称：大小西关和商埠地一带老鼠太多，容易闹百斯笃（鼠疫），故而在重点处收鼠做防疫试验。在7至8月两个月内，共收老鼠十万三千多只。日军分批把收的老鼠全数用大汽车运送到洮南火车站，又用汽车转送交白城子地区关东军某部设立的制造鼠疫细菌站，进行试验培殖细菌。

在收老鼠的活动结束后，日军工作人员出钱委托南市场警察署长，对属下各派出所警官每人赏金5元，街道保甲长亦赏金5元，另外对负责收购老鼠的伪警另奖给10元。以此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第三辑）

七三一细菌部队的覆灭

韩　晓　辛培林

销毁罪证

在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前的半个月，整个七三一部队处于内紧外松的状态。中国劳工看到，他们行动匆忙，精神紧张，在背着中国劳工干些什么勾当；对劳工的管制也有些放松了；那些曾耀武扬威的雇员和士兵们却一反常态地萎靡不振，并唉声叹气地发起愁来；甚至有时吞吞吐吐地对中国劳工说，我们要走了，你们也要快回家了，那时，中国人当"掌柜"的，日本人"苦力"的干活。中国劳工从七三一部队队员的这些情绪中，觉察到日本侵略者即将垮台的预兆。

就在这时，在七三一部队的从事细菌战的骨干人物更处在慌乱之中。他们一方面纠集先遣人员，向通化转移，一方面全力以赴地清理文件、资料，并分别打成捆、装上箱，用汽车或马车，不停地往动力班锅炉房运送。已经停火的暖气锅炉又开动起来。每当满载资料、文件的汽车或马车到来的时候，即把中国劳工撵得远远的，由日本人亲自把成箱成捆文件、资料扛到二楼，从投料口扬进正在燃烧着的炉膛里，并一直监视着，到烧光时才肯离开。动力班中国劳工韩建国就曾看到日本人用汽车往锅炉房拉东西，把各式各样的纸张、不同规格的木头箱子都投进锅炉里烧了。他在下面给收拾灰烬，日本人站在旁边监视，发现没烧尽的纸张，他们就拿到楼上重新去烧。由于焚烧的文件、资料太多，两台锅炉烧不完。于是，他们又把那座不

经常使用的锅炉也开动起来。据中国劳工证实，日本人还把一些贵重的仪器和装菌的玻璃瓶、试管也打上包装，扔到膛里焚之一尽。七三一部队这样大规模地焚烧文件、物品连续进行了半个多月。

8月10日晚上开始，七三一部队各个班的院内也都成了火海，成堆成堆的文件资料扔进火堆化为灰烬。一个个日本兵被烟熏火燎变成了“黑花脸”。他们尽管忙得连饭都吃不上，还是烧不完，于是，就不得不把数百台精密的显微镜等贵重仪器摔碎；大量的一般性资料，无所顾及，任其飞散。八木班北边的场院里，原来为破坏中国或苏联的农作物而准备的三大堆黑穗病的麦秸也被点着了，大火照红了半边天。山口班贮存的大量细菌瓷弹壳，全部转移200米以外的地方砸碎。

与此同时，“四方楼”的院内更是浓烟滚滚，散发出一股扑鼻的腥臭味。原来，那两座“特别监狱”里还监押着没来得及使用的活人“实验材料”达400人之多，所以，他们采取了更加惨无人道的手段。他们为了加快速度，争取时间，使用了速效能的毒气，在不到几分钟时间就把这些“囚犯”置于死地。在他们施放毒气的时候，有的“囚犯”拚命地挣扎，甚至冲出铁制栅栏。但是，残暴的日本恶魔们开枪向手无寸铁的“囚犯”们疯狂扫射。然后，这些刽子手们把尸体拖进早已备好的大坑内，浇上汽油焚尸灭迹。由于尸体太多，摞了几层，加上他们逃跑心切，短时间内未烧透便匆忙地用土把尸体埋上。七三一部队的头目们觉得不彻底灭迹，会带来可怕的后果，于是，又下令把尸体再挖出来，进行第二次焚烧。一个在场的日本兵在自述中记载了当时的惨状：“许多尸体没有烧透，尸体溢出土坑，还有许多尸体，无法处理了。……一些烧得半生不熟的烂肉，和到处烧得糜烂的脏腑，简直叫人无法收拾。还有，仍带着像活

人的眼球，烧剩下的半张脸，……碎骨烂肉裹着血污，满地都是！使我精神麻木了，就像疯子一样失去了知觉。有些尸骨和陈列室里摆放的细菌实验的标本还装上汽车，在夜里，运到25公里外的松花江边，偷偷地投入江中。

据原七三一部队“运输班”司机越贞夫证实，除惨无人道地杀害了所有被关押在“特别监狱”的中国人外，对在日本战败前被抓进七三一部队并认为已经不再需要的中国人，还用注射氰酸化合物的方法毒死了一大批。他就曾在下雨天的夜晚用汽车把50个装尸骨的袋子运到松花江边，投进江里。

七三一部队列入破坏计划内的建筑物有“细菌实验中心”——四方楼、监押“囚犯”的“特别监狱”以及研制细菌武器的“兵器班”、装配与贮存细菌弹的“山口班”、培殖细菌传染媒介物的“田中班”和为细菌实验服务的“动物饲养班”、“航空班”和“动力班”的建筑。于是，自从8月10日中午接到关东军司令部的撤退命令，对这些建筑物陆续开始破坏。据目击者证实，他们对这些建筑物破坏方法是，轰炸、爆破和焚烧，或兼而用之。

当时，由于整个七三一部队里一片混乱，人心惶惶，谁也记不清日本鬼子破坏建筑物的准确日期，据大多数目击者追忆，8月11日开始放火烧毁田中班昆虫饲养舍和石井班动物饲养舍。“兵器班”大院里，百余辆福特牌大卡车和炮车被烈火吞噬着，成箱的有毒子弹爆豆似地响着；“东乡村”的日本官兵楼舍及大礼堂、神社等也燃起了大火；高等官宿舍西部地下的百余个燃料罐，先是一片火海，随即连声巨响，最后只剩下一片深坑了。

对重要建筑物的破坏措施是在最后时刻进行的，8月13日早晨，潘义明、李起余、王子余、侯安钦等中国劳工从正黄旗

三屯到正黄旗五屯的“劳务班”去上工，当路过正黄旗头屯的时候，他们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他们往东南一看，高大的“四方楼”塌了一大片，它的上空有一股滚滚的烟尘。他们改变了去劳务班的想法，从正黄旗头屯向南走，当临近设有电网的围墙西侧时，就又听到一阵爆炸声。他们看到高等官宿舍、日本小学校、东乡神社淹没在一片浓烟中。

“四方楼”等一些建筑物都是钢筋水泥导制的，普通炸弹难以破坏。8月14上午，七三一部队在“航空班”飞机库旁架起数门大炮，连连向“动力班”锅炉房炮击，但大烟囱只遭到轻微的损伤。这种破坏效果，是七三一部队早预料到的。于是，他们求援于工兵部队在“四方楼”、“特别监狱”等一些重要建筑物的地下室内，开凿放置炸药的槽孔。然而，这十分困难。他们不得不马马虎虎地装上黄色烈性炸药，进行第二次爆破。

七三一部队在毁灭各种罪证的同时，充当门卫的保机队员，奉命放弃了对大门的看守，转向了对营区内外的昼夜巡逻。他们个个凶相毕露，见人就打，还没来得及逃跑的中国劳工有的也被他们枪杀了。

杀人灭口

石井四郎认为，七三一部队有2 000余名队员及其家属，还有数以千计的中国劳工和那一些比较知情的中国翻译，在七三一部队溃败之后，如何防止泄露七三一部队的秘密是一个至关重要又十分困难的问题。为此，石井四郎在8月10日晚召开各部部长紧急会议，决定杀人灭口。石井四郎主张迫使全体队员及其家属服毒自杀；对中国人毫不客气地全部杀掉。他的这个主张遭到了各个部长的反对。首先反对石井四郎主张的是第一部部长菊池少将。他认为，对第七三一部队的队员及其家属应

采取积极措施，设法营救回国，不宜让他们轻易地死去；至于对待中国人另作别论，但也不必采取一概处死的办法，因为还有用着他们的时候。一向飞扬跋扈的石井四郎，在众叛亲离的处境中，第一次采纳了下级的意见。石井四郎等人杀人灭口的计划，首先选择的对象是几个中国籍的日语翻译，因为他们对第七三一部队的秘密知道得更多一些，留下来将会给日本带来后患。可是，有些中国翻译早有警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跑了。唯独与宪兵室的春日中一是拜把兄弟的李初亭没跑。他以为危难当头，日本人不致于背信弃义对他下毒手。然而，他错打了算盘。8月11日清晨，春日中一和劳务班头目工藤，带着上司的密令乘坐中国马车夫赶的“斗子车”去找李初亭。“斗子车”刚上去正黄旗五屯的土包，遇到装满箱箱柜柜、锅碗瓢盆一类家具和鼓鼓三条麻袋的两辆花轱辘马车迎面驶来。春日让马车停下，用中国话问：你们给谁搬家？车老板回答给李先生。于是，他立即放走了搬家的马车，催促着“斗子车”直奔屯内十字路口旁的李初亭家。李初亭迎出来后，春日用中国话说：石井部队长请他去一趟，有要事商量。

李初亭在春日陪同下，坐着“斗子车”来到本部大楼门前。春日让车夫稍等一下，然后和李初亭一起进了大院。不一会，春日出来对马车夫说：“不要等李先生了，他已经坐飞机去了东京。”当坐卧不安的李初亭的老婆孙爱珍得知这个消息后，一种可怕的念头使她嚎啕大哭起来。一个小时后，从“四方楼”里传出了连声巨响，使她更加意识到李初亭不会回来了。李初亭果然没有回来。后来得知，他被日本人杀死了。这件事，被一个曾在七三一部队当过宪兵的人证实。原来，李初亭被骗至本部大院后，春日事先安排的人在暗处用枪把他击毙，并从他腕上撸下金壳手表。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一是日本侵略者的阴险、狡诈、毒辣，当它需要你的时候，便装出一副亲善的面孔；当不需要你，甚至于对它不利的时候，便毫不留情，下毒手加以除掉。二是“走狗烹”，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

借机报复

七三一部队干完了毁灭罪证的勾当后，一些高级头目、上层人物差不多都仓皇地逃命了，留下一些下级人员处理善后，并准备同运送最后一批日本人家属的列车一起离开这里。

8月14日，几个日本小头目在劳务班院里就地铺着苇席，拎着酒瓶狂饮。其中有个叫加藤的雇员对菊池雇员说：“那天我打了你，感到很对不起。如果当时潘德亮不告你的‘状’，我是不会打你的。”当时是麦收季节，菊池到仓库领镰刀。第二仓库的中国劳工小队长潘德亮按加藤的要求把旧镰刀给菊池，菊池不同意，硬是把新镰刀拿走了。当加藤发现新镰刀少了的时候，潘德亮就把菊池拿新镰刀的事如实地讲了。因此，菊池挨了加藤的打。这时又有个叫“秋叶”的雇员也旧事重提。他也是因为在潘德亮没同意的情况下穿走了一双水靴子，加藤知道后责备了他。于是，菊池和秋叶就把仇恨都集中到了潘德亮身上。他们拾起战刀，走出大院，遇上了潘德亮，秋叶抡起战刀一下子把德亮的双手削掉，潘德亮忍痛跑到劳务班办公室，想找加藤论理，加藤却随手掏出手枪。潘德亮见势不妙，回身逃跑。当他跑到铁匠炉旁时，被加藤追上，一枪打倒，但没打死。这时，秋叶赶来，一刀从潘德亮的肩膀斜劈下去。赶车老板吴帮昌目睹了这一惨景。

日寇在失败之时，无端杀人，发泄兽性，对此，许多中国劳工早有预料。所以在此之前，不少人趁其不备，逃出了虎口。

但在要害岗位的劳工，由于日本人看管得很严而无法逃脱。8月14日，四方楼爆炸后，这些劳工也都千方百计逃出魔窟。这时，作威作福的日本侵略者到各班去一看，一个劳工都没有了。

乱作一团

七三一部队接到撤退的命令后，忙乱 地做着逃跑的准备。

当时，平房火车站通知七三一部队去接收从外地发运来的一车“大眼贼”（黄鼠）。他们已顾及不了这些事了，管事的日本军官说：“真他妈的，没事干！”随即把电话摔了。8月13日，铁路专用线上甩进了一列闷罐货车，日本人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集中几十名中国劳工，迫使他们往火车上装大米、白面、豆瓣酱、酱油、白糖、罐头和一些衣物，甚至还有备用的铁管、锅炉等物资。

这天下午，日军的家属挤到“酒保”内的小卖部抢购逃跑时用的必需品。高等官、判任官、雇员及教育部食堂里，都在准备食品。据王世友、鞠复家、韩建成等人证实，训练教育部的头目不许做饭的中国劳工离开，命令加班给他们赶蒸馒头。因为做的数量大，面来不及发酵就做，蒸出来的馒头都是硬的。

这时，七三一部队的营区里更是乱了套。后半夜里，七三一部队的队员们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窜来窜去；教育队的学员，忙着整理行装，闹得乌烟瘴气；东乡宿舍里，嘈杂声、谩骂声、哭嚎声连成一片；医院里的轻患者，不顾病痛奔回宿舍准备逃离，有的重患者，躺在病床上，看着床头上的一小瓶氰化钾流泪，有的在绝望地哭嚎；路上，日本妇女肩扛行李，手拎包袱或扯着小孩，鬼哭狼嚎地拥向铁路专用线，一窝蜂似地往闷罐车上拥挤，有的为争夺一块立足之地而当仁不让，甚至吵骂起来，昔日那种温文尔雅、谦谦让让、彬彬有礼的样子已

抛到九霄云外。事先制定的乘车计划、按部门分配车厢，统统没有人去管它，整趟列车挤得满满的。第一趟货车延续了几个小时后，总算是匆忙地开出了平房站。从这天开始，连续发出了几火车，但是还有些七三一部队的队员和家属挤不上车。此时，就是上了车，抢到座的雇员也大骂起他们的上司和本部的那些高级官员。原来，石井四郎一伙曾下令把航空班的大部分飞机烧毁，仅留下的两架飞机，由他的女婿增田义穗少佐亲自驾驶。那些坐不着飞机，又挤不上火车的日本女人，顾不得地上的泥水，一屁股坐在地上绝望地放声大哭起来；有的日本人看实在无法逃走，只好另找活路；还有些下级官兵在地下室、仓库里自尽了。光复后，人们在这些地方，曾发现了3名尉官尸体。

树倒猢狲散

七三一部队自顾不暇的时候，远离它的各支队也是树倒猢狲散各自逃命了。

当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传到林口第一六二支队的时候，他们立刻乱了营，捕捉的老鼠和饲养的白鼠、海猫、兔子、跳蚤以及培养保存的细菌也无法送交七三一部队本部了。

根据驻屯地司令部的通报，得知苏联红旗第一军的坦克部队迫近八面通（林口南50公里，牡丹江东北80公里）时，决定将所有房屋塞满稻草、备足燃烧用的汽油，将乌斯浑河水源地的抽水机筒砸碎；间所少尉以下25名官兵和汽车5辆，作为后队暂时留守待命。

8月10日，榊原秀夫率领200人和50辆汽车（包括滤水车、消毒车各一辆）向牡丹江溃逃。此前，他命令留守队接到七三一命令时立即烧毁营舍，然后追赶大队；如果苏军迫近林口还未接到上级指令时，亦应及时焚烧。结果，第二天，留守队就

将房屋、设备以及各种动物都烧毁后奔逃了。一六二支队逃跑时携带着两套器材，共66捆包。经过龙爪附近的高湿地带时，行车困难，要在苏军战车进攻前到达牡丹江是不可能的。于是，8月10日晚，榊原秀夫命令支队庶务室机要员奥村军曹带领两名护卫兵，携带机密文件，由龙爪乘火车送往哈尔滨七三一部队本部。

8月12日，逃跑的一六二支队到达七星时，苏军战车已迫近牡丹江。这时，他们不得不将卡车和器材一并烧毁。8月13日，在东安师团长的指挥下，一六二支队人员分乘两列火车向牡丹江逃去，但由于傍晚在桦林遭到苏军的攻击，队员四散，翌日集结了70名。榊原命令队员以10人为一组突围，由于苏军阻击，榊原和森军曹以及一名士兵掉队，于8月17日到横道河子。在这种情况下，榊原和牡丹江支队尾上少佐会面，并一起到牡丹江日军第五军司令部。军医部长佐藤少将转告他，七三一部队来电，命令一六二支队配属于第三军，令其速去延吉听从该军的指示。于是，榊原和集结在横道河子的70名队员，乘上了经由哈尔滨去延吉的火车，但火车只走一站就无法开动，他们只好徒步奔逃，最后，因走投无路不得不在一面坡解散了。

驻扎在海林镇北的第六四三支队，在8月9日晚接到了七三一部队本部昆虫动物研究班长田中少佐给尾上正男支队长的电话，要求火速把跳蚤发送到总部去。但由于形势紧张，他们只想逃命，根本顾不得发送跳蚤。8月13日，他们焚烧营舍时，把各种动物及跳蚤一并烧毁。北野政次于年初批准拨给他们的总重量为三车及75吨的细菌生产设备和蛋白消化素、肉精、肉汁及煮盐等材料，大部分都没用上，也都烧毁在仓库里。他们与一六二支队沿着一条路线，仓皇往西逃窜，大部分人战死。

第六七三支队支队长西俊英中佐从平房返回孙吴后，企图

与驻地日军一起退至大兴安岭林中，以便作垂死挣扎。为了销毁其进行细菌战的罪证，8 月 11 日，由大熊带领4 名日本兵，急忙把营舍、住宅、动物舍、设备、材料和各种文件等统统地烧掉了。为同样目的，在逃跑之前，给支队全体人员每人发一份毒药，以便在有被俘危险时服毒自尽。后来，这些队员并没按西俊英中佐的旨意办，大部分在败退的途中接受了苏军的劝降，只有1 人在绝望中服毒自杀。

8 月11 日，苏军飞机轰炸海拉尔。日军开始慌乱。他们想把关押在五四三支队附近第十军管区军法处监狱里准备用做细菌试验的人杀死，但没有得逞，10 名苏联人从浓烟烈火中冲了出去。8 月13 日，五四三支队奉命把营舍、实验室、动物舍以及所有设备、材料和重要资料付之一炬，然后，四处逃窜。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一辑）

杀人魔窟三岛理化研究所

刘天光　袁　丁整理

三岛理化研究所是伪三江省地方保安局的一所秘密监狱。它修建于1939 年10 月，坐落在佳木斯西郊万发屯的东北方向，东临佳——绥铁路，南面是一条坎坷不平的土路，隔路是一片荆棘丛生的荒地，北面是一片菜地。此地偏僻荒凉，很少有行人和车辆在此经过。

监狱东西长50 米，南北宽30 米，四周设有带高压电网的红砖墙，南面有两扇包着厚重铁皮的黑大门。院内是一圈四合房，共20 间，分别建成18 个双人牢房，窗上都安装着炉篦式的铁

条。被敌伪特务抓到这里来的中国人，只有两种结局：一是提供情况，然后被秘密处死；二是闭口不谈，即被送往七三一石井细菌部队当“马路大”（被作细菌试验人员的代称）。这里不是普通的监狱，而是地地道道的杀人魔窟。

血的证据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末日来临了。然而，自命对“东亚秩序负有使命”的日本侵略者，并没有放下屠刀，在行将灭亡时又犯下了新的罪行。

8月12日午夜，佳木斯市笼罩在恐怖之中。一部黑色轿车，从伪三江省警务厅门前驶出，直奔三岛理化研究所。大约10分钟后，汽车来到这所魔窟门前，鸣笛三声，两扇黑大门应声而开，汽车直入院内东厢房南头猛然刹车停下。从车内钻出5个穿着普通服装的日本人，他们是伪三江省地方保安局的特务桥本喜一郎、佐藤正熊、井光男、谷口传三、高桥大郎，他们是奉保安局长北原的命令，到这里对监狱所有的人进行“最后处置”的。

这5个日本特务下车后，便从东厢房南头的房门鱼贯而入，然后沿着走廊，走近几个鸽子笼式的监房小铁窗口前，用凶狠而又低沉的声调对着小铁窗叫道：“米那，他待！”，“奥马爷，他待（站起来）！”当被关押的形销骨立的人们站起来后，这5个人便拔出手枪，分别对关押在各个监号里的人们开了枪。……5名行凶者退回暗处。过了一会儿，他们又相互调换了各自行凶的监号，用手枪对着躺在血泊中的人们补枪，直到他们确认被关押的人已全部死去为止。

8月13日凌晨，这所孤伶伶的秘密监狱异常沉寂。经过这场血洗，共有36人惨遭毒手，就是平日为他们看大门、做饭的

白俄和朝鲜人也未得幸免。

然而，人们见到的仅是这次大屠杀的一角，更加令人惨不忍睹的事实还在这座院落西北角那个大坑内外。

1945年8月15日，苏联红军远东部队进驻佳木斯。8月21日，地方维护持会组织一些人到三岛理化研究所掩埋死难者尸体，当时目睹现状的李枢曾作过如下的回忆：

在这所阴森恐怖院落的西北角，有一个长约10米，宽8米，深2米的大坑，坑底横躺竖卧着14具无头尸体，已开始腐烂、变形，手腕和脚踝上都带着镣铐。在尸体下面和周围，还有一堆堆的白骨。坑南10米处有一堆被火烧过的各种刑具，当时尚可辨认出有绞架、电椅、电床、皮鞭、铁棍等。经过清点，院内共发现54具尸体，其中14具无头。当时院内腥风四合，空气窒息，目睹惨状的人们莫不潸然泪下。

同仇敌忾

地方保安局是一个秘密警察组织。它的任务主要有两条：一是对苏派遣特务，抓捕苏联谍报员，刺探苏联军事、政治等各方面情报；二是破坏镇压我抗日救国运动。所以在保安局下设的秘密监狱里关押的全是政治要犯，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

8月12日夜时保安局血洗三岛理化研究所时，那里只有41个人了。其中36名在押的中国人，还有看门、做饭的4名白俄和1名朝鲜人。当5名特务行凶逃窜后，却奇迹般活过来4个人，他们是：

张人天，国民党吉林省党务专员办事处第三督导区110支部书记长；

何家训，国民党吉林省党务专员办事处第三督导区108支

部党员；

李广德，国民党吉林省党务专员办事处第三督导区108支部书记长；

李遇迟，又名贾占河，共产党员、抗联战士、苏联谍报员。

上述4人也和其他死难人员一样，在凶手罪恶的枪口下倒在血泊中。

张人天左臂中两枪，伤势较轻；何家训身中三枪，其中一枪从左腮射入打掉四颗牙又从右腮穿出去；李遇迟连中八枪，胸部伤势严重；李广德身中八枪，伤势严重，右膝盖下骨折。当他们发现自己还活着的时候，首先意识到的是："日本侵略者完蛋了。祖国光复了。"但一时还摸不透敌人还有什么阴谋要施展，便各自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相应的保护办法。张人天醒后立即把身体靠在死难者何振国的身后，并用受伤的左臂搂着脑袋；其他各监号活过来的人也在装死。他们都屏息静气，细心判断敌人的动向和自身的安危。

距枪杀时间已经两个多小时了，天渐渐亮了。当时有5个人卧在血泊中还活着。他们全神贯注地谛听这恐怖之夜所能发出的一切声息。当确信敌人不能再来时，他们多么想即刻冲出这杀人魔窟。可是，敌人已经断绝他们饮食两天了，身上的伤口还在汩汩流血，窗口是粗重的铁条，房门还牢牢地紧锁着，幸而未死，却也无计逃离。在这濒于死亡的绝境，对敌人的刻骨仇恨促使他们艰难地活动起来。腿没受伤的支撑着站起来，腿不听用的爬着走。有的撕下衣角或用碎布卷起来蘸着地上的鲜血在监狱墙上写道："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等充满爱国激情的标语。

最先开始行动的是伤势较轻的张人天。他把砖头的一端磨成片状，用它抠开墙壁的灰口，这样每抠下一块砖都要消耗很

大体力，他那虚弱的身体累得汗流浃背。最后他终于把厚厚的牢墙抠出一个小洞钻出来，并用两个木杆爬上围墙，用棉被盖在电网上滚了出去。

接着，关在其它监号的何家训、赵连青也相继破坏了窗户或墙壁逃了出来。他们艰难地走到关押李遇迟、李广德的监号，打算把活着的两个难友救出来。但李遇迟和李广德都身中八枪，李遇迟仍处在昏迷状态，李广德神志清醒，但身体一动也不能动。当何家训说要救他们出去时，李广德呜咽了。他诚恳地告诉何家训、赵连青二人说："我身中八枪已经不行了，李遇迟也命在旦夕。这里不可久留，不要为我们这两人没有指望的人，再让我们民族的力量受到损失了……"李广德说着又昏过去。

何家训和赵连青眼含热泪离开铁窗。然而，赵连青因失血过多，走到监狱大门口便牺牲了。何家训悲痛地望着一起逃出来的赵连青，又回头看看关押李广德、李遇迟的铁窗，艰难地走出了牢门。

何家训走出牢门的时间，是1945年8月14日下午。此时，在三岛理化研究所的院落中，只有国民党员李广德和共产党员李遇迟还有微弱的气息。当初，李广德和李遇迟同关在一个监号里。李遇迟是个被关押一年多的"老犯"，李广德刚入狱时，二人关系还好，可是彼此知道对方政治身份后，问题就来了。每当政见不同时，两个同监难友就背对背地坐着，长时间互不搭理。可是，当涉及对付敌人的问题时，两个人不约而同地一致起来。李广德入狱第一次受审，李遇迟怕他受不了酷刑，就告诉他说，万一挺不过去，就抓几个垫背的。并告诉他要装得像些，要像经过"痛苦思想斗争"后，再把那些汉奸供出来。李广德如法炮制，在一次审讯中他供出作恶多端的伪铁路警察张世利、郑贵勋二人是自己的"同伙"。结果，险些把两个坏蛋打

死，而李广德却被敌人“闲置”了一段时间，得到了恢复体力的机会。

这种同仇敌忾的精神，还表现在他们生命垂危的关键时刻。

何家训走后，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李广德再次苏醒过来。看到身旁的李遇迟也奄奄一息，他深感已无力从牢房走脱，便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他拆了自己的线毯搓成绳子，用尽全力挂到窗上……。可是，他忽然感到脚下有人在活动，他也随着从窗上栽了下来。当他睁开眼睛时，李遇迟正在用牙齿从他脖子上一条条往下撕那绳子。他不敢想象李遇迟在四肢几乎不能活动的情况下，是以怎样的毅力支撑身体将自己救下来的。当李遇迟劝他：“你才22岁，中国要做的事情很多……”时李广德不禁失声痛哭。这两句质朴的语言，又燃起了他生的欲念。

8月15日晨，他们终于从牢房破墙而出。他们来到厨房找到六个鸡蛋和几条黄瓜，吞吃后感到体力好像有些恢复。他们又发现西大墙下有个汽油库，便又回到厨房找到火柴，把汽油点着。顿时，三岛理化研究所浓烟蔽日，火光冲天，这座杀人魔窟成了一片火海。

这时，日本武装人员已从市内撤走。附近居民见这里烟火冲天，便三五成群拥入这个黑大门。因为附近的居民都知道这里是敌人的秘密监狱，特别是从这里跑出两个“犯人”的消息不胫而走，居民们都互相传告，并四处寻找。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具有反满抗日思想的大学生李长青，他从邻居家借了一辆手推车，跑到这里认真寻觅，终于在齐腰深的荆棘丛中找到了李广德，用车推回家中。当李广德告诉他，还有一位难友被人冲散走失时，他又推着车子出来，最后又把李遇迟找到，用车推回家中。

李长青的家是孤儿寡母，家境贫寒。母子俩以最珍贵的食

物——大米粥、煮鸡蛋，奉献给两位身负重伤的同胞。后来，经过简单的包扎，李广德被送进启哲医院，李遇迟被送进苏联红军司令部。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

日本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

佟振宇

1936年春，日本天皇裕仁颁布敕令，在中国满洲地区建立两支部队，专门从事准备细菌战的研究。敕令中，指出这两支部队："担负的是特殊的秘密任务。"第一〇〇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兽疫预防部"。[①] 部队长是兽医少将、细菌学家若松次郎。其营地，设在长春市郊孟家屯，现为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散热器厂厂址。

第一〇〇部队与哈尔滨七三一细菌部队，是同一敕令建立的。所不同者，七三一细菌部队研制的细菌武器，即用细菌污染人类居住地区，制造人间疫病传染与死亡。第一〇〇部队，则是用病菌污染牧场、贮水池，制造牲畜间的疫病传染与死亡。这两支部队，名义上同属关东军司令部，但实际上直接听令于日本帝国大本营参谋本部。在关东军司令部里，除有专门委员会领导它们外，还各自有专职部门领导。第一〇〇部队，则由关东军司令部的兽医部指导，其负责人是中将兽医部长高桥隆笃。据有关资料证实，伪满洲国大陆科学院里，有个兽医处，对外

① 正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

称马疫研究所，其处长安建诚太郎、中将北野政藏，都负有指导责任。

第一〇〇部队所需的经费，实际上是“依据需要，无限制地拔款”。但平常的经费来源有二：一是由日本陆军省直接拨给，用部队员的给养费的名义；一是由并东军司令部呈报陆军省批准，用制造军马防疫药品的名义。据有关资料记载，自1941年1月至1945年4月1日，总计领到的经费，为100万日元。

一

第一〇〇部队建立后，分别于大连、拉古①、克山，设立有三个支队。据军方资料证实，自1941年7月起，即苏德战争爆发不久，它除在四平设有支队外，同时，在关东军司令部所指挥的部队里，都奉令设立军团兽医部队，分驻在克山、东安、鸡宁、东宁、四平等地区，配合第一〇〇部队的研究工作。

在第一〇〇部队总部指挥下，仅设在长春孟家屯营房的部门，便有第一、二、三、四部和总务部。在总务部下，还设有研究、设计等分部。

它的第一部，主要研究关东军司令部所属各部队的军马，以及其它动物的血液。通过这一研究，来研制鼻疽菌、痈疽菌、传染性贫血菌的方法，并研究导致马匹迅速死亡的病菌与生产它的方法。

第二部，在1943年前，设有五个分部。这个部，主要研究细菌战的方法。但各个分部，又各有分工。第一分部研究繁殖各种细菌，第二分部重点研究鼻疽、羊瘟、牛瘟、炭疽热等牲畜病毒，第三分部管理和繁殖供实验用的动物，第四分部研究

① 拉古位于牡丹江市郊。

有机化学（实为毒性的药物），第五分部研究黑穗病等毒害农作物的病菌。

1943年12月，增设第六分部。它的建立，是因为七三一细菌部队研究鼠疫细菌武器成功，所以第一〇〇部队也设立这个部门，研制鼠疫细菌武器。正由于它是个秘密部门，因而在成立大会上，关东军司令部兽医部长、中将高桥隆笃，亲临会场进行指导，第一〇〇部队长、兽医少将若松次郎亲自主持，并有许多高级官佐如：副部队长保坂斯道中佐、山口文二少佐、井田清技师等人参加。高桥隆笃即席讲话，强调“成立第六分部，具有战略性的意义”。会后，他亲自主持制订计划，决定建立大批仓库于地下，并各自成一系统，以保藏细菌武器之用。原国民党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寓春，在1947年到长春任职时，特地到该部队的残址参观。他目测之后，认为第一〇〇部队所占土地面积，至少有20余平方公里。

第一〇〇部队的人员，时有变动，故人数不定。但人员仍经常保持在600到800人左右。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员，是兽医专家、医学家或学者。而对其余三分之一的人员，也通过训练班的方法，进行细菌学基础知识的教育。曹长（上士）实验员三友一男，在其被俘时供认，他自1941年4月起，直到1944年10月，多次参加集训，学习炭疽热菌、鼻疽菌等的培殖方法。他主要管理孵育器，负责繁殖细菌。在他主管期间，每个月分别可生产炭疽热菌1 000公斤，或生产鼻疽菌500公斤，或生产黑穗病菌100公斤。

兽医师福住光由被俘时供认，第一〇〇部队研究用各种细菌毒杀牲畜的方法，是由许多兽医学家、细菌学家、化学家、农艺家等，共同配合进行研究工作的。

第六分部长平樱全作被俘时供认，第一〇〇部队制造出的

大量细菌和化学药物，都储存在地下特殊仓库里。进入地下仓库，需有特别许可证，并要用浸透特种防疫、防毒药水的口罩，将口鼻捂严严的。还要戴上特制胶皮手套，才能去拿特制的铁盒。因为在这些特制的铁盒里，装有最烈性的细菌或化学毒药，所以必须防备自身的污染。为保密起见，这些特制的铁盒上，只用油漆涂写号码，决不许写上细菌或化学药物的名称。

二

第一〇〇部队的研究项目，虽是毒杀牲畜的细菌或化学药物。但，在进行实验时，是人畜并用的，一律称为“实验材料”。

1941年1月，关东军司令部兽医部长、中将高桥隆笃，奉命监督和指导第一〇〇部队，以牲畜作实验，一次少则几十头，多者上百头，用来实验各种细菌的效力。

1943年9月，在中苏边境① 组织所谓“关特演”的军事演习，关东军司令部要第一〇〇部队参加，进行细菌战的实验。为此，用300头牛马作目标，用烈性细菌和毒物作实验。关东军司令部特派高级军官，乘飞机从空中视察。实验结果，300头牛马，全部倒毙死亡。关东军司令通令嘉奖了第一〇〇部队。

据军部档案资料记载，1945年8月20日，第一〇〇部队在日本宣布投降后，还继续犯罪。由其属下二六三〇支队技术员桑原明，在支队的马棚里，指挥士兵瀧田、池田、矢田、木村、石井、长谷川等6人，将鼻疽菌掺入燕麦里，喂给60匹马。然后，全部驱赶到附近的村庄里。结果，使农村里的马匹染上了鼻疽疫。

---

① 据查是在黑龙江省的安达。

日军曹长（上士）实验员三友一男被俘后，供认：他在第一〇〇部队里，经常参加用活人做细菌感染，或毒物药杀的活动。他也证实："用活人做实验，通常都以'实验材料'称呼他们。"但与七三一细菌部队亦有不同处，即除少数留做继续实验用外，大多数是"实验"后枪杀。1944年初，日本宪兵中尉中岛，就当三友一男的面，将两名"实验材料"枪杀。其理由是：已经做过多次实验，不能再做"实验材料"了。

特别是研究与制造化学毒物，大多是用活人做实验。1944年8月，三友一男奉命，在两周内，对"实验材料"连续进行多次实验。他奉松井技师之令，曾给"实验材料"注射了氰化钾。在注射前，谎说是给"实验材料"治病，从不同等量的氰化钾注射中寻求效果数据，经过连续实验结果，一些"实验材料"全被"实验"折磨致死。

1943年8月，三友一男在实验室里，按松井技师的安排，在7名"实验材料"体上做毒物实验。他给其中一位的稀粥里，投入一分克"海洛英"。过了三十分钟后，这位"实验材料"便失去知觉。又过了十五六分钟死亡。三友一男对其他6名"实验材料"，分别使用了"海洛英"、"朝颜"、"巴克塔尔"、"蓖麻青"等毒物。每个人和每次实验用的药量、致死时间，三友一男都留有记录，直到日本投降才烧毁。通过这些实验，寻找烈性毒物的使用方法。参加三友一男暴行的，除松井技师外，还有兽医师福住光山、实验员畑木章。

第一〇〇部队在公主岭的支队，还设有监狱和禁闭室。在这里的实验，经常由宪兵水野、畑木二人执行。只一次化学毒物实验，就有3名"实验材料"被毒死。

第一〇〇部队毒杀或枪杀的"实验材料"，大多就近埋在牲畜棚外的大坑里。家住大广村的农民刘方仁被拉夫当苦力，亲

眼见到一位姓杨的马车夫，被日本军医拖进隔离室，诬说他得了传染病。从隔离室推出时，混身已缠上白布，再也没放出来。刘方仁在日本投降后，特地到被日本人炸毁的残址去查看。他在牲畜棚外看见一个大坑。长宽四五十米。坑里，还能看见没有掩埋的人头、手、脚等。他在焚尸炉旁，挖出个大竹筐，里边装满了人骨灰。

日本投降前夕，大广村的农民阎洪喜被日本军医抓进去，强迫注射了一针药物。回家后，便得了伤寒病，并传染给妻子和儿子、媳妇。一个三代五口人的家庭，最后只剩下祖孙二人。

三

第一〇〇部队在中苏边境，曾组织了数次"远征队"，攻击目标是附近牧场上的牲畜。准备一旦日本战败，便进行细菌战。

1944年3月，关东军司令部责成兽医部长、中将高桥隆笃拟令，经司令部第二侦探部（特务部）批准，命令第一〇〇部队组织"远征队"，到海拉尔地区，侦察附近的道路、夏冬牧场、贮水池，以及当地饲养的牲畜头数和分布状况。其目的是：一旦日苏战争爆发，便在中苏边境进行细菌战，制造牲畜死亡和居民点混乱。

这次"远征队"写在军部档案上称"别动队"。队长由少将若松部队长下令，委任中尉军医官平樱全作充当。委任令是由第二部长、中佐惠坂下达。同时，配备了7名士兵和技术员。

别动队出发前，第一〇〇部队长若松少将，在向平樱全作进行训示的同时，亲自交给他一份盖有"极密"红印章的手令，严肃地告诉平樱全作：这项命令，是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的作战命令。命令内容是：日苏战争一旦发生，必须立即将染有各种病毒的牲畜，在日军撤退时，全部驱赶到大兴安岭以东地区。为

此目的，要查清这个地区的牲畜总量以及牲畜中的常见病。以便准备出足够用于传染牲畜的病菌，制造大面积的病菌传染。命令中还估计到，“此一目的若达不到，就应准备出就地消灭这些染有病毒的牲畜的地方。”这就是说，万一阴谋失败，也不要暴露出去。

别动队在“远征”期间，据档案资料证实，平樱全作先后向若松部队长、高桥隆笃兽医部长，做了两次汇报。

第一次的汇报时间是，1944年9月，即下达“远征”命令的半年之后，报告内容是：别动队的调查任务已经顺利完成，弄清了大兴安岭以东地区的牧畜总数，夏冬牧场的准确方位和面积，也摸清了道路、贮水池以及居民的聚住点和分布情况。若松部队长听取汇报，并留有记录。

第二次汇报的时间是，1945年3月，距第一次汇报时间又过了半年。由兽医部长高桥隆笃听录，并将平樱全作的汇报，全部标定在军用地图之上，在此次汇报前，关东军司令部拨款8万日元，命令平樱全作在海拉尔地区，购买了100头牛，3 000只羊，还有许多马匹，全都暂存于附近的山沟里。故此次汇报后，高桥隆笃立即召集高级军医官会议，有兽医中佐雄坂、井田，以及若松部队长等。作出四条决定：

一、在这批牛、羊、马匹中，准备使用炭疽热、牛瘟、鼻疽、羊痘菌等病毒，进行感染；

二、一旦战争爆发，除将这批染菌的牲畜驱入苏境内，还利用满洲第七三一部队的航空队，向苏军后方空投细菌；

三、设法将当地居民之牲畜，也都感染上各种病菌；

四、一旦战争爆发，将上述两批牲畜混合，制造大面积的感染区，以对付苏军的进攻。

为了达到上述要求，平樱全作率别动队，组织了频繁的实

验。只在1945年度的一次实验中，就在第二部长惠坂的指挥下，用氰化钾和马前霜等，毒杀了50匹马。

四

为在中苏边境上进行细菌战做充分的准备，关东军司令部再次发出作战命令，要别动队在中苏边境选择地点，做一次假想的“远征演习”。目的是考察一下在野战的条件下，或在寒冷的地带里，能否有大面积传染炭疽热菌、鼻疽菌的可能？为此，别动队“远征”前，先派出军医上尉浅尾带部分士兵，化装潜入北兴安省的三河区。在靠近中苏边境约1公里的地方，向河流中投放了鼻疽菌，作为试探性的“远征”。其结果，成功了。别动队才开始“远征演习。”

别动队携带的病菌，全是第一○○部队自己培殖的。在行军中，还携带了实验室，配备了技术人员。一路上，不仅动用牲畜做各种细菌传染实验，还对河流、水井进行了实战投放细菌的实验。

别动队在平樱全作指挥下，在“远征演习”中，做了两次“演习”：一次是在结尔布勒河和附近牧场的贮水池中，投放了鼻疽菌，考察牲畜在饮水时，能否感染病毒？二次是将鼻疽菌、炭疽热菌，投放在牧场上，考察能否制造大面积的病毒感染？

只因是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的作战命令，所以兽医部长高桥隆笃，自始至终听取汇报，做指挥，并先后三次向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汇报。

第一次汇报在1944年7月，即山田乙三接任关东军司令部总司令官一职后不久，亲自会见了高桥隆笃。在汇报时，主要询问第一○○部队的性质，以及研究牛瘟、羊痘、鼻疽、黑穗病菌等情况。

第二次汇报是1944年11月，主要汇报别动队的活动情况，以及组织“远征演习”的可能性。山田乙三大将着重问及，一旦日苏战争爆发，在细菌战中，将采用哪些细菌合宜？这次在座听汇报的还有参谋长笠原幸雄、副参谋长池田、若松部队长、部长松村知胜和笹井等将佐。

第三次汇报是1945年2月，在研究“远征演习”计划的同时，山田乙三大将传达了日本帝国大本营的命令，要求第一〇〇部队在日苏战争发生时，应成为生产各种细菌和烈性毒药的工厂。还要第一〇〇部队保证，在进行破坏性的细菌战时，应有足够的细菌武器供应需用。

在这次会议后，山田乙三大将以总司令的名义，分别命令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第一〇〇部队，都应在实际上成为细菌战的部队。同时，下令给兽医部、医务部，要两个中将部长高桥隆笃和梶塚隆二，立即给“两个细菌实验部队，配备足够的细菌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兽医学家，以及有关的技术干部，加紧研制各种烈性细菌和药物，探求大批毒杀人和牲畜的办法。”

1945年3月，平樱全作向高桥隆笃作了“远征演习”的汇报后，立即奉命出发，率队去海拉尔地区。行前，若松部队长下令，将藏在山沟里的牲畜，分别染上炭疽热菌、鼻疽菌、牛瘟、羊痘菌，等待日苏战争的爆发。后来，又将这批染病的牲畜，驱赶到海拉尔城西北约80里的山沟里。为指导这次阴谋计划的实施，若松部队长派出军医少佐山口、军医中佐雄坂远行。

1945年8月7日，苏军突破中苏边境的日军防线。别动队虽按原计划执行，将染有病菌的牲畜全部赶到苏军后方，但他们自己却没有逃脱惩罚，被苏军所捕获，并送上远东军事法庭审判。

第一〇〇部队实验用的牲畜从何而来。笔者从1941年日伪时期的报纸找到一些线索。日军以“剿匪”、“防匪”为名，在辽西省和热河省西部，以及长城以北的一带地区，推行“集家并屯”的政策。将这一带地区的居民，1 105万人撵出家园，烧毁房屋382万间，在175 000平方米的土地上，制造了无人区。就在这篇报道中，以“剿匪的缴获”为名，将居民饲养的748 700头牲畜，转交给第一〇〇部队。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遗迹的调查

邹世魁

一

日本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设立的细菌工厂之一。它位于长春西郊孟家屯（现今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散热器厂所在地）。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经几次反复调查和核实，基本弄清原第一〇〇部队现存遗迹。

一、现在的散热器厂的大门为正东向，往里走是一条笔直油漆马路，在120米处的路南（该厂十字路口的东南角）原来是一幢二层楼房框子，现已修建成完好的一幢二层灰楼。它原来是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司令部（设在二楼上）和细菌标本室（在一楼）的残迹。现在该厂的技术科和夜班宿舍。

二、原司令部的路北，还存有原来的“一”字形和“工”字形的三幢养马红砖房遗迹。它们之间相距15米。长春解放初期，

已是一片瓦砾和残垣断壁，经散热器厂的修复后，建为办公室和车间。

三、原司令部西20米处，是原“王”字形楼房残迹和原来“王”字形楼房旁的大烟筒根残迹。它是原第一〇〇部队“动物”解剖室和火化场，现改为红砖房。

四、原“动物”解剖室和火化场旁，现尚存原冷水塔残迹。

五、原“动物”解剖室和火化场楼房残迹西30米处，有三幢并排的红砖房残迹，它们原来是第一〇〇部队喂养小动物（鼠类）的地方。原只剩残垣断壁，现已建完好的红砖房。

六、原喂养鼠类的红砖房西南角30米处，现还残存一个碉堡残迹。

七、原喂养鼠类的红砖房西北角60米处，至今残存着大烟筒残迹。

八、在大烟筒西偏北20米处，还有四幢并排红砖房残迹，原是第一〇〇部队养牛、羊的房舍遗迹。

二

原司令部遗迹为二层楼，全长60米，高于地面6米，宽为12米，一楼原为细菌标本室，二楼是原第一〇〇部队司令部。现将它原来建制、规模、内部组织、研究内容等，搜集调查材料整理如下：

1935年，日寇组建的第一〇〇部队的最高将领，是当时关东军兽医部部长高桥隆笃中将，在高桥之下，由若松次郎兽医少将任第一〇〇部队的部队长。

这个制造细菌武器的工厂，从1935年开始筹建，到1939年建成一座坚固的混凝土结构的二层楼房和一些“研究”部门。这个工厂占地面积东西宽为500米，南北长为1 000米的范围。不

仅如此，高桥受审供认：还在拉古站设立了第一〇〇部队进行细菌战的一个支队；在大连市内设一个分部；在佳木斯、东安、东宁、克山、鸡宁（今鸡西）等城内设立了第一〇〇部队进行细菌战的据点。

第一〇〇部队以实验细菌为业，配备有细菌学专家、化学专家、植物学专家以及兽医学专家等，这个细菌工厂人数约达600至800人。

它的组织机构：第一〇〇部队设有司令部，另外有总务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和第四部。

总务部下，又分若干分部，例如：设计分部及研究分部，还管辖一处六十多垧地的“实验”农场和一个二十多垧地的大牧场。

第一部，主要是担任研究关东军各部队所属马匹以及关东军各部队所拥有动物的血液，目的是要确定鼻疽、炭疽、传染性贫血等病症。

第二部在初建时，即1943年前，分成五个分部，后增加一个分部（第六分部），主要是进行细菌战的研究工作。第一分部是研究实验和制造炭疽菌分部；第二分部是研究实验和制造鼻疽菌分部；第三分部是专门管理实验用的动物（鼠类）的分部；第四分部是有机化学分部。各分部的部长，是由细菌学专家、植物学专家、有机化学专家及病理学专家担任。其中有些是现役日本军官，有些是雇用的科学工作人员。

第二部拥有军官20名，科学工作人员30名，技术人员50名，共有100余名工作人员。

1943年12月间，日本关东军兽医部部长高桥中将巡视这个部队后，在第二部内又成立了第六分部，专门负责细菌战争的准备工作。第二部的第五分部，是负责探索用细菌毒害和传

染植物的部门。第二部当时采用的是鼻疽、羊疽、牛瘟及炭疽热等病菌，作为进行细菌战的武器。

第一〇〇部队各个支队和据点需要的人员，都是第一〇〇部队负责培训，换句话说，第一〇〇部队不仅是研究和制造各种细菌战武器的中心，也是从事细菌战争人员的培训中心。

三

尚存的原“一”字和“工”字三幢红砖养马房遗迹以及四幢并排养牛、羊的红砖房遗迹，它们之间相距为15米，每幢房各长为80米，高为6米，宽为12米（经该厂维修一部分新砖墙和新的房盖），原残迹尚清晰可见。现将利用马、牛、羊等牲畜，制造各种细菌和实验规模及其危害，搜集整理的资料简介如下：

第一〇〇部队所研究制造炭疽病菌，分为侵害人、畜和侵害植物两种，它是以动物为主体，这种疾病又称脾脱疽，富有耐久性的炭疽菌由伤口进入，或混在食物里进入动物体内就会发病，在发高烧条件下，全身粘膜出血，一至两天内就会死亡，它是一种剧暴疫病。

还有鼻疽菌，是马、牛、羊等牲畜传染病，注射过这种病菌的马、牛、羊，如果潜入所谓“敌占地区”放牧，军马和家畜就会接二连三地感染，从鼻子里流出大量鼻涕，两周内就导致死亡。养马牛羊的饲养员也会因感染而致死。

据《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以下简称“审判材料”）高桥供认：“首先是鼻疽和炭疽热细菌。”“第一〇〇部队在1941年到1942年，一年内就生产制造了1 000余公斤炭疽菌；500余公斤鼻疽菌；其他化学毒药为100公斤。”

第一〇〇部队的“实验研究”，并非仅仅停留在器皿和仪器

里，还惨无人道地使用活人做材料进行实验研究。据《审判材料》第343页记载："第六分部三友兽医供认：第一〇〇部队内用活人进行过实验"。当苏联伯力军事法庭，宣布前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等12名细菌战犯罪状的消息传出后，在1950年2月，《长春新报》记者王亚晖调查了"第一〇〇部队"废墟，并访问了当地受害最严重的大广村农民。

王亚晖在《孟家屯日寇细菌工厂纪实》中写道："100部队第二处的地下室里，从东往西数，第三第四两个连接的小屋，都是4米见方的屋子，里边都有着二重的保险门装置，门高不到2尺，宽仅1尺5寸，这两个屋子墙上还有依稀可辨的软木痕迹，这是专门设备的隔声装置。这两间小屋的对门是大化验室，同时还发现在'本部'的后边，还有个至少可容纳30到40人左右的屋子。'第一〇〇部队'第二处杀害多少人，谁也不能知道，但，1949年春天当地老乡，为了挖肥料上地，结果挖出来的有马骨也有人骨，后来越挖发现人的尸体越多，弄得大家谁也不敢挖了。据挖出尸体的老乡们讲，有男有女，有穿黄衣裳，也有穿蓝劳工服的。郑洪生老乡说：'掩埋场西边一里来地（500米）的一长条，完全埋的是人'。张子斌老乡讲：'不仅上面是人，挖到2米到3米深，还有人的尸体。'二处为了制造更大批残害人畜的细菌和烈性毒药，不知吞噬多少人的生命，到现在炼人炉里白骨犹存。地下室阴森得可怕，这是多么惨绝人寰，灭绝人性！'八·一五'光复那年，苏联红军快来到了，于是日寇就给每个劳工注射了一针，当时双阳县的300多劳工当中，就死了十分之二三。能够出去的，也都染上了严重的霍痢拉（一种毒性痢疾）。"现在尚存的"王"字房子，就是所谓动物解剖室、火化场及其大烟筒的遗迹，也就是以活人当"材料"，实验后焚化尸体的场所。现查北房长为80米；南北房长为45米；南房长

为80米。各房高为6米左右，宽为12米左右。在“王”字楼房旁，尚存两个原来大烟筒残迹。其中一个，高为4米，宽为2米；另一个直径为85厘米，高为130厘米，这是留下的实物见证。

四

根据调查，第一〇〇部队喂养小动物（鼠类）的三幢并排房舍残迹（原只残存有四面断壁，经散热器厂修整完好），各房长约为50米，高为6米，宽30米，它们之间距离15米左右。

据《审判材料》中平樱供认：“第六分部内确实制造了大量细菌和化学药品。我本人几次因事到过该分部附设的仓库，那里把细菌和烈性毒药保存在特种铁盒中。走进仓库时，必须用浸透特种药水和布片，把口鼻蒙上，只有戴上橡皮手套时，才准许用手去挨那些铁盒子，为了严守秘密起见，这些盒子外面只标有一个用油漆写的号码，并没有写上任何说明。并且在第一〇〇部队内还研究过进行军事破坏活动的形式和方法，例如：研究过用飞机来达到这种目的。”

据《长春新报》报道，1950年2月，长春医科大学教育主任孙瑞宗、细菌系教授刘[illegible]、讲师房希哲、药理师徐景达等一行，随着长春市政府视察团，先后二次到一〇〇部队废墟进行了视察，视察团在《视察一〇〇部队报告书》中这样写道：“在一〇〇部队的第二处西北侧，有四个大型的孵卵室，每个约有125立方米，总计有500立方米，都是用电力保持恒温的，是培养大量细菌用的，如果只为制造马等牲畜预防或治疗用炭疽、鼻疽血清疫苗使用时，则可能供几千万匹马之用。在这个庞大的孵卵室北头，还有三个大长圆形高压灭菌器，每个直径有1米半，高3米，在这两种东西的周围，有十几个实验室、灭菌室、准备室、材料室等，都是用很坚固的水泥制的台子，现在还能

很清楚地看出来。在这些实验操作室的中间的北侧，正如该部队兽医三友，在伯力军事法庭所供认的那样，有两个用软木隔音装置的禁闭室，是用来提活人进行实验的。老乡庄岐说："有几个带黑布窗帘的汽车，常常在夜间由街里回来，集在第二部的北面，拉的是什么都不叫看。"在那里工作多年的老乡们更证实了这个汽车是用来拉活人来进行实验的，并在烧却炉里及掩埋场发现了人的骨头及尚未腐败的着工人服装的尸体……。从三座长约50米，宽约30米的小动物饲养室来看，其设置，拿一般医学饲养场所来比较计算，总可养二十日鼠、荷兰猪、家兔等几万只以上。尤其二十日鼠一个月可繁殖一代，拿10 000只来计算，去掉死亡雄鼠，总可增到15 000只，经常保持10 000只活的，那么每个月最低也要有5 000只的二十日鼠供为试验。"

《长春新报》记者王亚晖在"孟家屯日寇细菌工厂纪实"中也报道说："在'本部'后面，现在地面仍残留下的不少耗子孵育装置，据说这些耗子种类很多，有的装在瓶子里，有的装在类似中医大药抽屉似的孵育器里。王吉老乡说，当初看耗子的李占发老乡和他是朋友，他听他朋友说，耗子房每天要供给第二部一大圆筐篮（直径约三尺）被解剖完死耗子的消耗量……，李占发必须每天早晨要往外运出一煤油桶（重约15公斤）耗子。据李占发说，这些耗子不时要受到注射，因而满身孕藏着厉害的病菌，不仅看耗子的人一定要有预防装置才行，就是经过严密装备的李占发，也因为一次在睡觉中偶一疏神，耗子钻进衣服里面咬了一口而染病，为了使他再继续看耗子，费了大力给他治，他几乎因此死去。"

据《恶魔的饱食》一书记载："1940年夏，奇怪的灾难发生了，在当时伪满首都新京（今长春市）北边偏西北约50公里处的吉林省农安县，突然发生了混合鼠疫，开始时发生在县城内

的鼠疫，没有几天就蔓延到县城外的农村地带，如燎原之火，吞噬了农安县一带。”

农安县那次发生的鼠疫是两种以上的混合鼠疫，而且“怪”就怪在本来主要应是在冬季流行的鼠疫，却在夏季开始流行起来。县以下各个地方，发病者接连不断，死人一个接一个的出现，死者就有300多人①。日本关东军把农安县因感染鼠疫致死的人数缩小，谎报为120多人。接着以哈尔滨傅家甸地区为中心，又发生了肠道伤寒病，一下子就蔓延到哈尔滨市，近10万日本人也身受其害。在哈尔滨市发生伤寒的同时，在“新京”（今长春）车站北约1公里的人口密集的“三不管”贫民街地带，也突然发生了鼠疫。山田清三郎在《细菌战争军事审判》中写道：“当时仅在‘三不管’的狭窄地区，就密密麻麻住了700多户，5 000多贫民，而穿着白衣的防疫队员冲了进来，隔离患者，强行检查诊断，打预防针，挨家挨户消毒，整个‘三不管’住户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陷入混乱之中。在鼠疫猖獗稍有缓和时，日本关东军就把所有的居民，强行迁移到离此地两公里远的临时村落宋家洼子。接着日本工兵以‘彻底防疫’为名，把‘三不管’街的房屋烧掉了。”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利用细菌武器，惨害中国人民的实例。

五

1945年8月8日至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山田乙三命令：“第一〇〇部队运走所有的贵重设备，并由工兵协助将建筑物毁掉。”据给这个部队当过杂役（工友）的刘方仁老乡说：“炸这座房子那天，我看见了若松

① 据农安县防疫站记载：死亡和被杀害298人。

（部队长）那小子直掉眼泪。”“八·一五”后不久，附近农民常来这里寻看。大广村农民王廷林说：“我进去那时候，楼上满是坏机器和破药瓶子，啥也没有。我进地下室里去，那时地下室也是些大机器，都被破坏啦！”它的外面冷水塔被炸的残迹尚存，塔基直径为8米，外厚为30厘米，高为90厘米。水塔基外有6个小垛，每个间距为4米，每个垛高为80厘米，宽为45厘米，厚为22厘米。这是日本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屠杀中国人民的实物证据之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历史和事实，是任何时候也毁灭不掉的。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日本关东军第一〇〇细菌部队拉古支队调查记

程吉恩

突然发生的传染病

1940年夏天，位于中东铁路海林站以东15华里，牡丹江站以西20华里的拉古附近村落，突然发生了鼠疫。

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传染病，最初是在距离拉古站以西2华里处的日本关东军第五军团第四五七部队劳工营里开始流行的。四五七部队里（老百姓俗称“天成”部队）囚禁着大约五六百从关内外抓来的劳工，劳工们接二连三地死去。几天以后，这种“瘟疫”便传染到附近的农村，并以烈火燎原之势在拉古站一带蔓延开来。

拉古站附近村屯发生的鼠疫，是两种类型以上的混合型。鼠

疫本身主要是在冬季流行，但这里夏季就流行起来了，“怪”就怪在这里。疫情在急剧蔓延，患者相继死亡。鼠疫发生的急报传到拉古以西1华里左右的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总部后，该部出于某种动机，马上派部队里的卫生兵去进行消毒，但对于鼠疫蔓延的凶猛势头，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这场鼠疫死亡人数确凿数字无人统计，据拉古村当地的60岁以上老人回忆，在“瘟疫”流行期，几天之内就死了几十人。有的一家几口人全部死光，关东军四五七部队劳工营里死的人更是不知其数。接着，在海林站以南30公里的新安镇一带发生了伤寒病（百姓称为“窝子病”）。新安镇一带是朝鲜族的聚居地区，十几个朝鲜族居民村，有无数朝鲜族农民染上了伤寒病。笔者调查了和平村和西安村，和平村死了30余人，160余户的西安村死了76人。

同时，驻在拉古以西2华里处的关东军四五七部队里饲养的2 000多匹蒙古马与新安镇以北北崴子附近的日本开拓团饲养的几千只羊，也得了一种原因不明的传染病，造成了大量连续死亡的事件。

在这一连串的传染病蔓延的背后，有什么名堂呢？

关于1940年夏，拉古附近村落及新安镇朝鲜族聚居的村屯发生各种急性传染病的原因，关东军部队作了各式各样的解释。他们说拉古站村落发生的鼠疫是“野外的老鼠窜入居民区把鼠疫跳蚤带到了住宅引起的”。关于关东军四五七部队饲养二千多匹马和新安镇北崴子附近日本开拓团饲养的几千只羊的死因，他们通过调查团进行调查，但结果是以“原因不明”不了了之。相反，深受“瘟疫”之害的老百姓凭着他们直观感觉，认为是“日本人在水源地撒了细菌”。还有的说是“与偷吃拉古以西一华里处的日本‘军马防疫厂’埋掉的死马肉有关系”。然而，不

管是什么原因，纵观各处急性传染病的蔓延和结束，都有些共同之点，那就是：（1）传染病都是突发性的；（2）为预防传染病向日本关东军驻地扩大，日本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派卫生兵紧急出动，进行“防疫”；（3）消毒在短期内即告结束；（4）强行赶走传染病发生地区的老百姓，拆毁或烧掉房屋；（5）整顿街巷，对患者强制检诊，对居民强行隔离。例如，当新安镇朝鲜族聚居区发生伤寒病时，驻在海林福利村的日本关东军第六四三部队（七三一细菌部队海林支队）就立即赶往现场，进行消毒，隔离患者。

写到这里，读者也许会对拉古、新安镇附近突然发生的各种传染病的“原因”就自然产生怀疑了。

关东军军马防疫场的真面目

战后，苏联将日本细菌战犯在中国东北地区大规模地、秘密地进行细菌实验，并且在局部地区已经使用这种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的审判供词公布于世，人们才知道在哈尔滨平房区有一支日本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并且它的魔爪（七三一部队第六四三支队）曾伸到了海林，即海林支队。其实，除了公诸于世的日本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以外，关东军还有一支秘密的细菌部队，那就是所谓的“军马防疫场”，番号是满洲一〇〇部队。它下设两个分支队，一个驻在大连，一个驻在拉古。

一〇〇部队，是以七三一部队的研究室实验为基础，新创设的一支以家畜和植物为对象的细菌战部队。该队的根据地设在距新京南10公里处的孟家屯附近（现在的长春市西郊第一汽车制造厂散热器厂所在地）。部队人数为800人，规模稍少于七三一部队。建有坚固的混凝土两层楼房和许多研究室，拥有宽大的房舍，特种设备和大片土地以供使用。日军统帅部为其单

独拨出巨款以供一〇〇部队及其支队制造细菌武器之用。

1935年编成的满洲一〇〇部队，它的最高负责人是当时关东军司令部兽医部长高桥隆笃兽医中将，由若松兽医少将任第一〇〇部队的部队长。

关于一〇〇部队的创建情况，前日本关东军细菌战犯防岛清有这样的供述："1935年至1936年间，已由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按照天皇裕仁的诸次秘令，在满洲境内成立有两个用来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极端秘密的部队在活动。"为保守秘密起见，就将其中一个以石井实验所为基础建立的部队命名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另一个部队则称为"关东军兽医预防部"。1941年，当希特勒德国开始进犯苏联后，这两个姊妹部队就用番号秘密称为"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〇〇部队"。七三一部队主要是承担制造以人为对象的细菌武器，而一〇〇部队主要是承担以家畜为对象的细菌武器。并准备在前线和"敌后"同七三一部队配合，大量散布染有鼠疫、霍乱、伤寒、鼻疽、炭疽热及其它烈性传染病的致命细菌。同时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传染居民点、蓄水池、水井、庄稼和牲畜群等。

一〇〇部队分为第一部和第二部两个部分。第一部负责细菌战实战研究，第二部的机构设置组成如下：

第一科　制造炭疽菌及研究实验；

第二科　制造鼻疽菌及研究实验；

第三科、第四科　制造其它流行性兽疫菌及实验研究；

第五科　制造黑穗病菌和花叶病菌及研究实验；

第六科　制造研究牛疫病菌及其它化学性毒菌。

一〇〇部队的工作人员的配备同七三一部队一样，都是根据各自部队的性质，所承担的任务，选择较为优秀的、并有一

定研究能力和创造性的细菌学家、化学家、兽医专家和农艺家组成的。这支部队所进行的全部工作，都是准备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该部队及各支队人员都各自进行一种科学研究工作，以专门探究使用各种细菌和烈性毒药来大规模歼灭牲畜和人命的方法。

一〇〇部队及其支队的主要任务

前边说过，一〇〇部队的主要任务并不在于单纯的实验、研究、生产细菌武器，而在于在实战中实际应用这种细菌武器，以达到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扩张，进行经济掠夺的目的。因此，他们所研究的炭疽菌，既有伤害人畜又有伤害植物的两种作用。一〇〇部队研究制造的细菌主要是伤害动物的一种。炭疽病也叫做脾脱疽病。这种病的发病，是由一种耐久性很强的炭疽菌从伤口或者掺在食物里边侵入动物体内而引起的。动物在发烧的同时，全身粘膜出血，一两天就会死亡。鼻疽病是马和骡子得的一种传染病。按照法律规定，患了这种传染病必须向有关单位呈报，进行隔离。牲畜一感染上这种病，从鼻子里流出很多鼻涕，两周以后，几乎都要死亡。除了传染马骡以外，还传染狗和羊。因为没有可靠的预防方法和治疗方法，所以这种病成了家畜的大敌。

炭疽病和鼻疽病也能传染到人身上。把注射了病菌的牛、马和羊悄悄地放到“敌人”那边去，“敌方”的军马、家畜就会很快受到传染；同时饲养牛马、家畜的人也会传染上疾病而死亡。这就是一〇〇部队及其支队的真正目的所在。

一〇〇部队及其支队，当时就是进行试验如何使用这种细菌，来消灭中、苏两国军队、军马和家畜的实验研究的。

从1941年到1942年，一〇〇部队及其支队研究制造的炭

疽热菌就有1 000公斤，鼻疽病菌500公斤，其它化学毒药100公斤。倘把这些细菌全部用在战场上，那恶果将不堪想象。

从战场上缴获的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明确证明："对苏作战一经开始，假如日军由于军事上的需要，转移退却到大兴安岭的话，就要用细菌或毒药对所有的河流、水库、水井进行污染，将所有的农作物毁掉，将所有的牛羊毒死。"——这就是关东军司令部给一〇〇部队及其支队下达的主要任务。

一〇〇部队及支队的实验情况

一〇〇部队及其支队的"实验研究"并非仅仅是停留在研究室内的办公桌上或限于牛、马、羊等动物身上，同时也偷偷地使用了"木头"（细菌部队把人作为细菌实验材料暗号叫做"木头"）。

"……1944年8月至9月，使用活人进行了实验。为使被实验者无法觉察实验内容，便使用了催眠剂和毒药。被实验者是七八名中国人和苏联人。用做实验的药品中，有曼陀罗花、海洛英、篦麻子。这些毒剂被放在食物里边。在两个星期之内，给每个被实验者吃了五六次掺上这些有毒剂的食物。在汤里主要是放曼陀罗花，粥里放海洛英，香烟里放海洛英特巴克特尔。喝了放有曼陀罗花的汤的被实验者，过半小时到一小时之后，就进入睡眠状态，睡眠持续五个半小时。"这个残忍的活体实验的事实，是一〇〇部队第六科科员三友在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供认的（以上所引用供词都摘自这个军事法庭的《战犯审讯录》）。

这种实验结果，使"木头"衰弱下去。待达到实验目的后，就叫体质极其衰弱的"木头"泻吐，再佯称是治病，给"木头"注射"氰化钾"，将"木头"毒死。

这里还需要补充一句，除了上述活体实验方法，还通过把伤寒细菌掺进豆包或饼干里扔到贫民的住宅区，使传染病蔓延流行，然后借着预防的名义，到疫区去观察传染病患者的各种极端痛苦的症状以及如何死去的情况，并及时做出记录保存起来。根据这些事实，不难看出，开头所提的发生在拉古与新安镇一带的突发性传染病，是一〇〇部队拉古支队通过一定实验媒介体所致。

一〇〇部队的特别演习

1941年夏，关东军司令部做过一个极端秘密的作战计划，这个秘密作战计划就是号召关东军各细菌部队在加紧研究生产各种细菌的前提下，加紧进行特别演习。按照这个作战计划，满洲一〇〇部队决定由村本少佐率领，组织了一个由军官、研究员、技术员组成的三十多人的小分队。1942年夏天，这个小分队沿着苏满国境的得尔布尔河域野草丛中行进。

这个神秘的小分队带着大批的装备器材。有两只大型充气橡皮船，十几个高大的金属容器、大型皮箱、玻璃容器、水桶、长柄勺等，外边用布包着，表面上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走在队伍前头的村本少佐举起望远镜向得尔布尔河的下游望去。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就是苏联的领土。在望远镜的视野以内，没有发现苏军人员的身影。

指挥官一举手，队伍就停了下来。在有一人高茂密的水草丛中，开始了器材的组装工作。把两只橡皮船充起气来，在两只船的船尾上都拴上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拴在岸上。

船上装载的是大型金属容器和水桶。每只船上都有一个一〇〇部队的研究员。研究员用短桨灵巧地划着船向得尔布尔河的河心前进。当第一只船走出大约100米远的时候，第二只船

开始进发。

当拴在船尾的绳子绷紧的时候，两只船上的研究员就分别打开自己船上容器的盖子，把容器浸到河水里去。容器里装着大量的鼻疽菌。前面已经谈到，鼻疽菌是马、羊等家畜的大敌。

容器在水下缓缓放出鼻疽菌。在得尔布尔河下游不远的地方，就和流入苏联国境的额尔古纳河相会合。说到这里，一○○部队的实验目的就已经清楚了。那就是在离苏联最近的国境上把大量的鼻疽菌放入河中，被鼻疽菌完全污染了的河水流入苏联境内，当家畜和人饮用了这些水，就会造成大量的人畜死亡……。当时日苏两国虽然尚未进入交战状态，但实际上这是在实验的借口下进行的细菌战争。

"这次演习的名目，是一○○部队第六科的夏季演习……这次一共从部队里拿走了12公斤的鼻疽菌，演习班归来后报告实验完了。"从这段原一○○部队部队队员的供词中，可以推知大概把带去的鼻疽菌全部放入了河中，至于后果如何，在下游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般队员就不得而知了。

进行这样规模大小的实验，是一○○部队及其支队的日常活动。

一○○部队一四一支队在拉古的活动

前边已经说过，一○○部队在性质上属于细菌部队，这种性质决定了它的一切活动都是极端秘密的，除了直接参与活动的部队研究人员，外界人是无法知道的。笔者根据前日本关东军兽医部长高桥隆笃的供词，知道在拉古曾驻扎过一○○部队的一个支队，这就是一四一支队。日本细菌战争战犯高桥隆笃在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军事法庭上供认：

问：除一○○部队以外，关东军还有什么兽医部队曾准备

对苏联进行细菌战和破坏活动呢？

答："第一〇〇部队有两个支队，一个驻大连，一个驻拉古。"

问：这些部队的细菌学专门干部是由谁负责训练的呢？

答："第一〇〇部队各支队长及各兽医部长均由细菌学医生充任；这些部队内其余的人员是些没有细菌学知识的兽医。为培养新的细菌学家，所有这些部队中的人员都在第一〇〇部队内受过专门训练。"

高桥隆笃中将还供称："自从'关特演'（即1941年夏季展开的关东军特别演习的缩略称呼）作战计划颁发之后，驻在满洲各日军军部内都组织了'兽医'部队。"这些"兽医"部队分别部署在克山、东安（现密山）、鸡宁（鸡西）、东宁等城市内。这些支队的位置与苏联国境相毗邻，各支队的主要任务、目的，就是准备要在战争中与各特种部队（即细菌部队）相配合，实际使用自己制造出的细菌武器。各支队直接受关东军司令管辖。"

为掌握一四一支队的活动情况，笔者按照《战犯审讯录》中提供的线索，顺蔓摸瓜，查找证人，走访劳工，实地勘察，进行了大量调查。

首先找到了曾在一四一支队当过3年劳工喂过军马和试验鼠的姚庆林老人，77岁。后又访问了当年在一四一当过伙夫的杨贵福，71岁；马夫林政广，71岁；喂鼠夫姚庆贵，63岁。另外还有给一四一部队干过活的林会云、张德志、常凤延、姚庆复等老人。

姚庆林回忆说：一四一部队给每个劳工发有贴本人照片的劳工证明书，同时佩带印有"一四一"字样的黄袖标。劳工在上下班时，必须向门岗卫兵出示证件，否则不准出入。日本人对劳工管制非常严格，他们对劳工规定只许在自己干活的指定

范围内活动，不许打听，不许走近日本人工作的场所。日本人工作的地方都用白布挡得严严的，就连火车通过拉古时都要放下窗帘，不许人们往外张望。日本人管一四一叫做军马防疫场，老百姓叫做马病院或西大营。

伙夫杨贵福证实：日本兵看守非常严，劳工在工作中稍不留心走出规定的范围，就挨嘴巴子，左右开弓，打完还得立正站着。他挨打大约就有十几次，这是轻的，重的则被打残或丧失生命。

关于一四一部队的人数，姚庆林证实，该部队有雇员三十多人（即细菌的专门研究人员），日本士兵二十多人（其中包括汽车兵、警卫兵等），中国劳工30人。这些劳工大多是拉古本地没有文化的老百姓。当时日本人在雇用劳工时，其中一个主要条件就是不要有文化的中国人，其目的无疑是为了保守秘密。

应笔者的要求，姚庆林老人不顾年高体弱，于1985年冬天领我们找到了一四一部队的驻地遗址。顺着哈绥公路，由拉古向西行1公里处，即海林县海南朝鲜族乡道北村（过去叫良种场大队）与海南朝鲜族乡乡办造纸厂中间，有一片不长庄稼的荒草地，这就是一四一部队总部当年的所在地。

一四一部队占地面积约有八九垧地见方，营房入口的西侧是卫兵所，卫兵所的东侧是部队长办公室（老百姓俗称“红部”）。部队长每天乘坐小汽车上下班，副部队长则由士兵用马接送上下班，军官宿舍设在现在拉古油库西侧，相距大约1公里左右。

通过考察遗址得知一四一部队的全部设施有：部队长办公室及细菌试验室一栋、马舍四栋、炼马炉一处、鼠类动物室一处、简易铁匠炉一处、地下室一处。全部建筑物均由关东军特种部队军事施工部门精心设计建成的。关于这一点，姚庆林老

人证实说："康德4年年底，发现开始有日军的部队监视着一些关里来的劳工在这里施工。"由此看来，一四一部队是从1935年至1936年初建成的。同时与日本战犯川岛清的供词也相吻合。为了适应研究细菌的需要，日军专门从海浪河引水，沿拉古西山坡（老百姓常把西山称之为马坟山，因日本人经常把细菌试验死的马埋在西山坡），安装上来自来水管道，一直通向一四一部队以及军官宿舍。此外，还把部队长办公室，细菌试验室以及士兵宿舍安装上暖气设备和热水管道，随时可以使用热水消毒，并设有下水管道将脏水排出。

1945年8月9日，以别洛鲍罗夫大将为指挥的苏联远东红旗第一集团军开始从密山以南至绥芬河以北的地段向中国东北的日军发起攻击，13日突破日军牡丹江防线。一四一部队与"四五七"部队的日军放弃未及炸毁的营房，仓皇出逃。战争结束，房舍内安装的各种设备全部被苏军抗议毁运往苏联。而后房舍的石头被附近的老百姓拆掉盖了民房。现在一四一部队遗址只剩下的地基尚依稀可辨。

一四一部队内部的机构设置，大致有如下各种：

第一科：负责细菌战的研究工作。

第二科：负责部队所属的马匹及部队内所有动物的血液破坏，目的是要确定鼻疽、鹅瘟、传染性贫血等病症。

第三科：负责供实验用的马匹和动物的运输。

第四科：负责细菌干部的训练。

这些科的负责人是谁，叫什么名字？因一四一支队在败前全部溃逃，所以无人知晓。劳工们只记得支队长叫下河边，副支队长叫铃人，负责伙房的叫横山，横山当时40多岁，管马舍的名叫吉田，吉田当时30多岁。据他们回忆，一四一部队还有

十多个日本女雇员，部队长下河边当时四十多岁，从新京调来时没带家眷，士兵传说他和一个日本姑娘有关系。

姚庆林老人还证实：一四一部队饲养马匹有二百余匹，其中中国马一百二十匹，日本马七八十匹，鼠类动物三千五六百只，其中花鼠三千只，白鼠五六百只，猪五六十头，羊十多只，兔子三四十只，鸡三十多只。这些动物都是用来供抽血研究，如何将细菌传染给家畜的试验。

平时穿着白大褂，带着白帽子的日本“马兽医”，每天拿着针管和一个大肚子瓶子给马抽血（大肚子瓶子里边放着一个手指盖大小的白东西），一匹马大约抽25CC左右。他们每天平均得在五六匹马身上抽血，然后将瓶子摇晃一下便走了。除给马抽血以外，还给花鼠、白鼠、羊等抽血，根据动物血量，各种动物抽多少不等。

劳工们普遍证实。我们每天看着日本人从好端端的马身上抽血，还看着他们每天给马打药针。马被打上药针后，先是浑身打一阵哆嗦，然后咚的一声便倒在了事先准备好的带有滑车的马床上，接着便由日本人把滑车推进火化炉进行火化。平时吃不饱的劳工们眼看着被送进火化炉的死马烧得吱吱啦啦直冒油，趁日本看守人员不在，常去火化炉偷撕被烧熟的马肉吃，日本人发现后，用手势阻止说：“药的干。”他们在火化炉炼不过来的情况下，经常分咐劳工事先在拉古西山坡上挖好一个个的坑，将马牵到大坑的旁边，然后马“大夫”拿着针管照马屁股上就是一针，马立时倒在坑里，随后让劳工把马埋好。劳工们下班之后，串联穷苦百姓连夜上山把死马挖出来割马肉吃。当劳工们和老百姓吃了这种马肉之后，只感觉到嘴发麻，有一个叫王万富的人吃了马肉后脸色逐渐发黄，很快就消瘦死了。

一四一部队利用“打药针”的方法，以平均每天一匹马的

速度大量屠杀牲畜。甚至每天就有几匹。为了使马的供应连续不断，每隔三四个月就从新京（长春）发来一批马，以一四一部队从1936年建立至1945年这10年计算，至少有三四千匹马死于这种实验中。

一四一部队的覆灭

1945年8月9日，苏军对日宣战。关东军司令部对细菌战研究人员组织了优先撤退。原因一是细菌战研究人员中大多是日本国内有名的专家、学者，优先撤退，可保留这些人才；二是细菌部队研究人员，占有多年的细菌研究资料，一旦落入苏军手里，日军必将受到国际公法的审判。因此，一四一部队所有人员及其家属提前做好了撤退的准备，等到苏军越过东部国境线，于8月13日进攻到拉古时，他们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所以一四一部队的人员没有一个被苏军抓获。然而，主管日本关东军一〇〇细菌部队的兽医中将高桥隆笃等却没有逃脱法网，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尽管关于一四一部队的详细情况无人得知，但我们根据高桥隆笃的点滴供词和劳工们的回忆，足以证实，一四一部队是在一〇〇细菌部队的领导下，确实干了大量准备进行细菌战的令人发指的罪恶活动。

（摘自《牡丹江文史资料》）

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
——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地区进行活体解剖等罪恶事实

谢玉叶　刘美玲

活体解剖（不包括侵华日军第七三一细菌部队的活人细菌试验和解剖）是日军侵华期间犯下的一种特殊罪行。它是用中国人作为研究和训练材料而进行的解剖活人的惨无人道的罪恶活动。这种罪不容诛的行为，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属罕见，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本质。除此之外，他们还经常用中国人进行毒药试验以及进行各种医学研究，其手段也是极其残忍的。

一

日本侵略者所犯的活体解剖等罪行，并不是一时的，个别的，在某一地区发生的偶然现象，而是在长达14年之久的整个侵华战争期间，在他们的侵略铁蹄践踏之处所普遍存在的诸多的罪恶事实。犯下这种罪行的单位有日军的各级陆军医院，各级卫生队，甚至到基层的小队。同时还有不少民间医院及医学院校（后边的单位在中国东北尤为突出）参加。涉及的人员不仅有日军的随军医生、卫生下士官、卫生兵，还有头戴“博士”桂冠的教授、专家、医生和医学院校的学生。由于他们身份不同，搞活体解剖的目的也不尽相同。对随军医生及卫生人员而言，目的之一是用活体做解剖材料，通过解剖人体的不同

部位与内部脏器，对医护人员进行有实感的教育，这自然要比空讲书本知识具体生动得多。目的之二是那些刚从日本院校毕业的日本军医，并没有实际经验，有的连简单的盲肠手术都不会做，用活人进行实际手术的练习，对于提高自己的本领真是再好不过了。至于那些专家学者则多是为了研究的需要。如南满医科大学的日本教授所干的。另据爱新觉罗·宪均的交待也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他说通辽医院院长山本升和军医少佐今村剑、米田等人，为了研究中国人的骨骼、皮纹，砍人头二百多个，剥人皮十五六张。以此为据，写成了《中国人头盖骨之形态》、《中国人的下颌骨》等论文，寄往九川医科大学。山本千和今村剑因此获得博士学位。

本文重点用事实来揭露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地区犯下的这一惨无人道的罪行。

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不久至宣布投降每年都有不少中国人惨死在那些“医生”们的手术刀及各种名目试验下。仅以抚顺战犯管理所曾被监押的日本军、警、宪人员所供事实为证。

据川口保（驻吉林海龙县日军独立守备队第6大队第4中队上等兵，第3分队长）供认，1934年间，中队将逮捕的10名中国爱国者交给一军医中尉做了活体解剖。那个军医中尉将被逮捕者带到兵营拐角处，先蒙上眼睛，为避免解剖动刀时被害者反抗，又用手枪将其击毙，然后命令士兵把该人衣服脱光抬到事先准备好的门板上，由他当场立即进行了解剖，边解剖边对集合起来的中队人员讲解人体构造。

据小林喜一（赤峰宪兵分队队长，宪 兵中尉）交代，1935年11月间，赤峰宪兵分队将1名反日的犯人交给一个名叫渡边的军医，让他练习做切割盲肠的手术。渡边将该犯人麻醉后，用刀剖腹，找到盲肠，因技术不熟练，用了20多分钟时间也没能

把盲肠割下，只好又把腹壁缝合好。练习没有成功，也不能让被害者活下去，最后用刀将该人砍死。

据片桐济三郎（哈尔滨日军陆军医院传染病室勤务，受教育者）供称，1936年6月间，医院以研究医学和教育40名新兵为目的，遵照院长笹井秀广少将的命令，将1名被抓的40岁左右的中国男子活着做了解剖，将被害者的内脏一一拿出，向卫生兵们讲解。

据宇津木孟雄（北新京宪兵分队队长）交代，1937年11月间，北新京宪兵分队，应新京第二陆军军医大尉小野的请求，把1名关押的中国人送到医院做了所谓病理实验。1938年还送去过两次。

据太田秀清（关东军承德宪兵分队警务，系上等兵）交代，1938年12月间，承德日军陆军医院从承德宪兵分队要了1名被俘的抗日军战士，做了活体解剖。

据长岛玉次郎（宪兵曹长，野副讨伐队第一工作队班长）供认，从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奉天南满医科大学学生十多人，来临江县八道江实习。奉司令官野副少将的命令，八道江日军守备队将诱降过来的义勇军战士10人交给学生，让他们在守备队的兵营里搞所谓病理实验而遭杀害。

据小野武次（富锦宪兵分队上等兵）交代，1940年10月，黑龙江富锦日军陆军医院，从富锦宪兵分队要了1名被捕的中国爱国者，由军医中尉金筑金吾做了解剖手术练习，并将其杀害。

伪南满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实验手张丕卿证实，1942年至1943年，该校解剖教授铃木真吉等先后解剖25人，其中多为中国人，也有苏联人、朝鲜人、德国人。

中岛宗一（西岗子警察队特务主任）交代，1943年，黑龙

江瑷珲国境警察分室抓了2名苏联间谍（中国人），以后把他们押送到西岗子日本陆军医院，供军医们进行解剖试验而遭杀害。

这是一份血淋淋惨不忍睹的侵华日军罪行录，我们也只仅仅选取了发生在我国东北地区的部分事例，但仅仅如此，就足以证明日本侵略者犯下的这种特殊罪行。特别是供认者均为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他们或为执行者，或为当时的负责者。如小林喜一，1935年时就是赤峰宪兵分队的分队长，他就有权批准送中国人去作解剖试验。再如宇津木孟雄，1937年时任新京宪兵分队长，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的部员，他亲自批准将3名中国人送到医院作试验。军医竹内丰也亲手将1名中国俘虏活活地解剖了。这些由他们自己供认的罪行，不但更能从反面教育人民，而且也给那些千方百计要翻历史案的军国主义分子当头一棒。

二

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实验和训练的目的，他们草菅人命，视杀人如儿戏，采用多种方式以极其残酷的手段用活人进行试验。下面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实，真是使人怵目惊心。

其一，进行所谓"复生"的试验"。浅井仙一（公主岭宪兵分队上等兵）交代，1937年秋，驻吉林省公主岭日军部队藤田军医少佐，搞出了一个什么"人工苏生器"。顾名思义，该器具大概有所谓起死回生之效能。藤田想验证其"发明"的效果，竟将1名40岁左右的中国人强行拉来，用绳子套住脖子挂在树上，将其吊成半死状态，再取下来用"苏生器"复生。结果试验没有成功，该人很快死去。这个"医生"为试验自己不成功的"发明"，竟然活活吊死了1名中国人。藤田的举动，说明了在这些帝国主义者的眼里，中国人的价值如同小动物一样，可以随意进行试验。

其二，拔取手筋和脚筋。筋络是联接人体各个部位，使之互相协调，能进行各种活动的纽带。人一旦断了筋骨，自然失去了活动的条件。俗话说十指连心，平时断一手指，其痛都难以忍受，更何况活活地把筋拔出。新京第二陆军医院外科军医大尉小野，这个曾多次用中国人做病理解剖试验的恶魔，犹感糟害中国人还不到家，竟从宪兵队要来被俘的抗日军战士，异想天开地做起拔取手脚的筋进行移植的试验。曾经被派遣押送3名俘虏去作试验的田村延夫讲："在陆军医院当外科医生的小野，因负伤手脚不能动，想从中国人的手脚拔下筋来作移植。因此，我奉宇津木孟雄之命，押去了3名中国人，医院将活着的中国人抬上手术台，用刀扎入心脏，将捆住的手脚解开，把筋拿下来。这样的事，安藤还看见过一二回。"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遍查历史，恐怕只有奴隶社会才有过。而这确确实实地发生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发生在一个披着"医生"外衣的法西斯暴徒之手，若不是日本战犯自己交待和揭露，一般善良的人们是很难想象的。

其三，剥人皮。据爱新觉罗·宪均（曾任伪满军政部医务课股长、课长、伪满洲军第二军管区军医处少将处长）揭发说，1936年他随检阅使于芷山检阅通辽医院时，在医院院长、军医中佐山本升的房子里，亲眼看见墙上挂了一张人皮，桌上还摆着四五个人头骨。山本升为了研究中国人的指纹、皮纹，在其任期内，从1934年夏至1937年夏，利用职务之便，竟从通辽监狱要来犯人，剥人皮达十五六张之多。除了供自己研究写论文外，还将人皮做礼物送给日本国内的专家教授们，供他们研究之用。山本升自己对宪均说，日本国内医科学校很欢迎整张的人皮，他给国内医科学校送去了十几张。山本升及其同行们的研究成果，就是这样置于中国人的磷磷白骨之上，透着浓烈的

血腥气。

其四，活切和活剖。通辽医院的医生们为了研究冻伤的防治，试验药物效力，同时也为了练习手术及采集标本，公然用因冻伤而被俘的抗日联军战士做试验。试验后，他们砍取了一百多个手指和脚趾留做标本，以供进一步研究之用。与此相类似的是细菌战犯田村良雄。他于1943年退出“七三一”细菌部队后，又来到南满医科大学神经科病理实验室当技术员。为了个人作手术练习的需要，竟不用麻药切断了一个中国病人的两只脚，致使他因流血过多而很快死去。

上面的例证只是活切人体的局部器官，而在东北日本人主持的各级医院里，为所谓科研需要，却经常进行着活人解剖，其中以南满医科大学为最大祸首。这个学校本身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侵略中国的产物。它表面上是个文化教育机关、治病救人的单位，实际上那里聚集着一批日本医学界的精华，他们披着教授的外衣，以占领者的身份，随意用中国人做为活体解剖的材料，致使南满医科大学成了残杀中国人的魔窟。我们从张丕卿的揭发控诉材料中能十分清楚地认识这个最高医务学府的真面目。

张丕卿1932年就开始在南满医大解剖教研室做实验手，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与他同时做实验手的还有刘学棋。他们负责做解剖前的准备工作，比如准备解剖器械、洗刷玻璃器皿，还要做解剖后的尸体处理等。因为他们是该校的老职工，长期在解剖室工作，因此日本人做什么事一般也不严格地防备他们，有些内情他们还是能略知一二的。

据张丕卿1951年6月29日揭发中说，在1942年秋到1943年春这短短的时期内，“日本人就进行过5次左右的极端残酷的活体解剖。解剖前，由当时的刘学棋实验手给日本人准备器具

与洗刷玻璃瓶子。解剖以后，由我、刘学棋还有一个日本人叫西村××等4人，一起收拾解剖后的尸体残骸，送往锅炉房焚烧或埋葬。""受难人数，据自己所知，约有25名左右。一次是3人，一次是7人，一是次是12人，另外两次是2至3人。均为男性，年龄约30～40岁左右。其中据自己所知，有朝鲜人1名，德意志籍1名，露西亚人5～6名，其余均为中国人。""这些受难者都是在夜间由日本宪兵押送到学校，当夜即进行解剖。在解剖的当时，于解剖室周围都由日本宪兵进行严密的警戒。""解剖过程中，完全由日本人进行。其中由解剖教授铃木真吉做技术指导，解剖者为照井××和助手西村××、坂村××。""解剖的目的是取出活体的脑脊髓、内脏、肌肉、皮肤等，进一步做成组织切片，进行研究。""日本人每次解剖完了以后，便扬长而去。具体整理工作都是在次日上班以后，由我、刘学棋、西村××等人来作的。在这同时，我亲眼看到，受难者的头颅已被锯开，大脑被取出，背部正中已被锯成一个深沟，脊髓已被取出，胸、腹腔均被锯开，心、肝、脾、肺、肾、肠均被切去一部分作为研究的材料，双眼也被挖去。整个身体无一完整之处。在身上、解剖台上、地下均是血迹，淋淋的鲜血（是鲜红色），皮肤颜色和硬度均和活人差不多。"这些被害者是从哪儿来的？张丕卿前面讲了，是由日本宪兵押来的。他还听西村说："这些人都是从衙门送来的，这些人来的时候都是醉熏熏的，呈昏迷状态。"

这些确确凿凿的事实，说明了日本的医学专家们与宪兵、警察相勾结，活生生的中国人被他们一刀刀切割得七零八碎。他们的医学成果是以残杀大批中国人的宝贵生命为代价而取得的。

为了证实这一结论，我们还可以看看以下的用活人进行手

术练习和各种试验的事实。

关于用活人进行手术练习。侵华日军训练医生和卫生兵，多由军或师团的军医部主持，在所属的医院里进行。参加者有十几人，几十人不等，多者达二三百人。这种训练的时间都不长，几天或者十几天。因为时间短，除一般的理论教育外，多采用实际练习的办法，就是用战俘或老百姓进行惨无人道地活体解剖。由执刀者讲解人体构造及各种战伤的防治，以求速成。被用作解剖实验的人，有时一次一人，有时多达十来人，由参训的人分组轮流进行。这些人受训后，回到原单位，则依照此法继续训练本单位的医务人员。

有的医院自己组织医务人员训练，也是用中国活人作材料，作解剖练习。

也有一些单位如大队、中队的军医甚至小队的卫生兵为了提高自己的技术，也从军队的战俘收容所、宪兵队要人练习手术，向一般的士兵讲解人体构造。

还有不是医务人员，而是那些大大小小的事军指挥官，随便侵入村庄，抓走老百姓，进行解剖，向士兵进行教育。

虽然情况不一样，但都用中国人作为解剖材料。在手段上，有的用手术刀，有的用剃刀，有的用刺刀，有的先砍死后解剖，有的活着解剖等等。从下面的几个事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野蛮的杀人情景。

雨海惠（日军黑龙江掖河宪兵分队警务股）交代，1935年9月间，宪 兵分队牡丹江分驻所，抓了1名中国爱国者，解送宪兵分队。宪兵分队把他交给了掖河陆军医院。该院的医生为了练习盲肠手术，就把这个人麻醉后解剖了，并将其杀害。

小川政夫（关东军第二独立守备队司令部军曹）交代，敦化市宪兵队经常砍杀中国人，砍杀后由军医进行解剖。1935年

9月，又砍杀了4个中国人。他因想看看怎么解剖人，所以也参加了。这次拉来了4个人，先把他们的眼睛蒙上，命令他们跪下，用刀把他们砍杀。军医马上作了解剖，向士兵作讲解说："这就是鼻茸。"完了后，又砍下1个人头拿走。

白井完夫（铁岭警察署直辖派出所巡查）交代，1936年9月，铁岭警察署直辖派出所一次就砍杀了6名抗日军战士。其中的1名被广濑军官用剃头刀解剖了。向士兵讲解内脏的名称、位置，摘取了胆囊，砍下了脑袋。他后来把脑壳洗煮制作后，送给了满铁株式会社大连柔剑道场的波多江教师作装饰品。

竹内丰（虎林医院中尉军医，后调山东济南，在那里他还参加活体解剖了11名八路军俘虏，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虎林医院时，于1938年1月8日，活体解剖了1名抗日军俘虏。先将俘虏绑在解剖台上，用绳子把四肢固定好，进行全身麻醉。这麻醉并不是为了减轻被害者的痛苦，而是怕手术过程中被害者挣扎和反抗。之后，就切开了腹部，先把盲肠取出，进行切除缝合。向卫生下士官、卫生兵讲解腹部内脏名称、位置；又把小肠切断，作了两肠管横断面的缝合，讲解了小肠受伤后的手术要领。接着又把胃、十二指肠切开，做了胃肠吻合术。最后做了腹壁缝合术。做了这种残忍的解剖后，又向静脉里注射了吗啡予以残杀。就这样他还不甘心，又将死者的头打开，摘取了大脑，练习了头盖骨缝合术。竹内丰利用这个俘虏作了他所能作的全面练习，他的技术就是靠残害中国人得到的。依此他晋升到军医大尉，并经常主持军医和卫生兵的集训，俨然以专家自居。

还有一般步兵队的军医，也作解剖练习。比如滨江省巴彦县日军独立守备队步兵第25大队的军医森某，就作过这样的练习。1940年12月，第4中队砍杀了3名中国人，他就把1个人

的尸体绑在树上进行解剖。当然，不砍杀他也可以解剖，砍杀后马上解剖，不仅方便，而且仍然保持活体的样子，同样可以比解剖一般尸体了解到更多的东西。于是他就把这个人的胸部，腹部打开，练习手术，摘取了胆囊，又解剖了睾丸、阴茎等。

三

关于毒药注射和空气注射试验。这两种注射，特别是毒药注射试验，可以说是日本侵略者经常使用的一种残杀中国人的手段。不管是医院的医生，或是宪兵队的医生，乃至宪兵或一般士兵，谁都可以随时使用。据小林喜一交代，1936 年9 月，赤峰日军宪兵队就将1 名30 岁左右的中国男子押送到满铁赤峰医院，先是进行毒药注射试验，以后又进行了解剖。据雨海惠交代，1937 年8 月间，黑龙江虎林宪兵分遣队，因怀疑倒木沟警察署署长某警佐及某警长、警士和1 名农民是情报人员，将他们逮捕，审讯后送密山日军陆军医院虎林分院，由该院院长军医中尉二宫进行毒药注射试验，毒杀后进行解剖，练习做盲肠手术。

尤为残暴的是，日本侵略者用毒药试验做为杀人灭口的手段。他们为搞所谓“北边振兴计划”，抓许多劳工赶修军事工程，为保守工程秘密，这些被折磨得九死一生的劳工，也不能逃脱死亡的命运。岛贯仓藏交代，1938 年5 月，他所在的关东军第6 国境守备队步兵第1 大队第1 中队本部，监禁有抗联俘虏约50 人，强迫他们修工事。工程完工后，为灭口就对这些人注射毒药全杀害了，并且焚尸灭迹。他还交代说，1941 年4 月初，他调任关东军大连宪兵分队码头分遣队警务系伍长，中国渔民在大连满三山岛遇难，当时宪兵们收容5 名遇难者，其中有两个人还活着，为怕他们暴露军事秘密，就让警察医生注射毒药，将

他们杀害了。

此外，还有一些军医纯粹是用中国人进行毒药或空气注射试验，从中观察人的生理变化，以做资料积累。重富广一交代说，1939年诺门罕事件中，参加作战的伪满军石兰部队起义，独立守备第16大队前去讨伐镇压，于7月下旬在兴安东省的喜扎嘎尔镇白狼东北，抓到1名40岁左右的伐木工人，大队随军军医青木亮向这个工人的静脉打了空气针，观察该人的生理变化。很快这个人呈半死状态，就将其砍了。小美野义利（新京宪兵队本部特高课情报班成员）交代，1940年9月，新京宪兵队逮捕了3名中国工人，军医大尉小管原武，想搞试验，就伙同卫生军曹户上，给这3个工人注射了空气，还打了毒药观察注射后的反映，在他们濒临死亡时，将他们的头砍下。为练习手术，又把1具尸体吊起来，进行解剖，打开胸部、腹部，取出内脏。据斋藤贤太郎交代，1941年他任滨江省哈尔滨分室收容所所长时，奉哈尔滨警察局特务科特高股泉屋警佐的命令，将伪新京保安局的1个日本医师带到监房。这个医师为试验他所研究的毒药效力，对4名在押的中国人进行了毒药注射试验，观察结果，4人全被毒死。

据原口一八交代，1942年4月，西额旗国境警察队抓了1名苏联情报员（苏联人），后来把该人送给海拉尔红十字医院进行毒药注射试验，将其杀害。

据三品彦八（伪首都地方保安局属官、股长）交代，1944年8月，奉伪中央保安局山田俊介的命令，审讯1名被疑为搞情报的中国人赵某，年约27岁，经讯问并无证据，但也并不想释放，由军医向其静脉注射了氰化钾，30秒后即被毒死。

据岛贯仓藏（伪满保安局齐齐哈尔分室派遣宪兵曹长）交代，1945年6月，当时他是伪满 保安局齐齐哈尔分室的派遣宪

兵曹长，奉该室事务官野明的命令，将正在监禁的1名朝鲜爱国者，注射毒药杀害。

以上我们从几个方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侵华期间在东北地区犯下的特殊罪行。由于日本当局和一些当事者为逃避罪责，一再掩盖犯罪事实，因此可以说有关活体解剖方面不少内幕事实，有待于进一步揭露。我们希望当事者能够深刻自省，真正向中国人民谢罪。否则，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令人深思的是，干这种罪恶勾当的人，竟多是以拯救人的生命为己任的医生、学者、专家们。他们这些披着神圣外衣的“天使”，却都成了手执解剖刀的杀人刽子手。他们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把抓到的中国人绑在手术台上、木桩上、门板上、甚至按在田地里，随意剖开中国人的胸部、腹部，取出内脏，挖掉双眼，切开气管，砍掉脑袋和四肢，甚至进行抽筋剥皮……不管被害人如何痛苦挣扎、呻吟，他们毫不动心，有的以杀人为乐，发出狞笑。是什么促使他们失掉人性，犯下了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一是长期的帝国主义教育和占领者的优越感，促使他们自认为是高人一等，可以颐指气使，为所欲为，他们从来都把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辱骂中国人是“肮脏的支那猪”。因此，他们就像对待牲畜那样随意宰杀中国人。二是侵略战争的特殊环境使他们获得了不易得到的好机会，作为解剖和实验的材料，除了使用大量的战俘外，还有不少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包括年迈的老人，不满周岁的婴儿，还有一些苏联人、朝鲜人和德国人等。只要需要，他们随时可以从宪兵队、警察局、监狱或是部队那里获得。有时他们自己也随便抓人，比如过路的百姓、正在田地里劳动的农民等等，也可作为解剖实验的对象。正像战犯竹内丰所交代的：“1938年1月，虎林（黑龙江省）陆军医院为了供

下级军官进行研究，从虎林宪兵队要了1名抗日军俘虏。当时我是军医中尉，我想不可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在日本是不易获得这样好的研究材料的。为了提高自己的医术，为了对日本的战地医学有所贡献，我请求进行手术解剖。”竹内丰的供词道出真情，侵华战争为他们创造了在日本国内难以得到的好机会。占领者对被占领者有任意宰割处置的权力，为此他们遇到机会谁也不放过，都争抢着干。随军军医汤浅谦，曾亲自参加活体解剖过18个中国人，他不仅在押进供认不讳，宽大释放回国后仍不讳避。事隔三十多年，在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时，仍然公开承认自己的暴行，并且还明确地指出：“陆军医院是侵华日军随军医生练习手术的场地。”“每一个日军医院都进行过活人解剖，只不过是后来回国的军医们不肯说出来罢了！”

血写就的历史事实，毕竟是客观的，不肯说出来，并不能将其抹灭。遭受过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中国人民和受害者的后代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中国人民将牢记这受屈辱的历史，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日本鬼子

——军医的露天解剖

小美野义利

（战务班长　宪兵曹长）

这是我在1940年9月上旬，奉新京宪兵队长近藤新八大佐的命令，在市内新发路宪兵队军官宿舍附近，对逮捕的3个中国工人直接犯下的罪行。

虽说是9月，仍然是灼人的暑热。用混浊的呆滞眼神浏览着报纸的特高股长小林少尉，把手伸向电话，拨动号盘。

“啊，是大尉吗？日前决定的事，今天做，合适吗？……好，那么等着！”

“咔嚓！”他把电话听筒一放，叫着常跟在身边的小美野伍长，命令说：“今天要干了，准备好！”

“国民党地下组织的3个嫌疑犯，什么也没有交代，终于决定要秘密地处理了。”回到屋里的小美野一边傻笑着一边摩挲着胳膊对桐原军曹说。

“哈哈……你，想杀吗？哈哈……”太田曹长显出轻视人的样子，大笑着说。

午后的阳光逐渐西斜，两辆汽车箭一般飞驶在大同大街上。

在前面车上坐着今天的指挥官小林少尉和山垣内翻译，再加上宪兵队司令部的小笠原军医大尉和土仓卫生曹长。紧跟在后面追逐似地奔驰的是太田曹长驾驶的车子。在这辆车中，穿着通红的长靴、握着日本刀的小美野伍长，和按着倒戗刺竹剑的桐原军曹，好像是踩在背手绑着的3个中国人身上进行押送，可以看到很刺目的套在左臂上的白地红色“宪兵”二字。

“就要到了。让你看看我的本领！”

小美野出发前，太田和桐原嘲笑说：“尽管是剑道三段，恐怕也不能把人头高明地砍掉吧！”小美野对这句话非常生气而又没有办法。同时，他也担心杀不好，感到焦躁不安。

车子卷起沙尘，在人烟稀少的郊外大道上往南岭疾驶。不一会儿，发出咔的一声，停在齐腰深的草丛旁。

急不可待的小林少尉对一下子跳出来的小美野抬了抬下巴。

小美野对拥挤在狭窄车中的中国人高喊：“下来！”然后抓

住他们的后脖领子拖了出来。

3个人都是经过几十天严酷拷问，饿着肚子，转动着敏锐的眼睛，摇摇晃晃地下来的，但是，急转过来，眼光往四周一扫，6只眼睛刚敏捷地一碰，就感到周围的空气紧张。一个十八九岁青年的喘息声逐渐大了起来，带着压制不住的怒火，厉声喊道："我国际运输的干（我在国际运输干活儿）！"他步步副近前面那威然而立的小林少尉。

小林少尉结结巴巴地说着"唔"，后退了一二步。在旁边的太田曹长立刻喊道："这个混蛋！"朝青年踢去。青年咂的一声仰天倒下，但是立刻站了起来，挺胸瞪着小林少尉。

"支那猪猡，还过来吗？"

桐原军曹用倒饿刺竹剑使足劲儿狠抽下去，竹剑弯成弓的样子抽进青年的肉体。在青年的面颊上倏地鼓起了大大的紫色道子，从嘴角到脖颈淌着鲜血。青年咬紧牙关，"呸"的吐出一口血后，愤怒地哆嗦着想要抬起身体。小美野也呆不住了，突然靠近，像要挫服他似的一脚踢去。随着"啊"的一声，青年一头栽倒在地，鲜红的血从鼻子和嘴里喷了出来。看到血后越发疯狂的小美野还要踢。这时，在旁边的中国人像要把小美野的耳朵撕破似的突然尖声喊道："鬼子不干（畜牲，别打了）！"

小美野的脚好像一下子被钉住了。对他的暴行不能忍耐的一个40岁左右、有着结实体格的男人，使劲迈着一步。

"畜牲！什么叫鬼子？……"小美野向这个男人的脸、胸胡乱踢去。此时在四十多米远的前面挖好坑的山垣内翻译和小笠原军医回来了。瘦削的身材，洼抠脸儿，在尖尖的鼻子上架着无杠眼镜的小笠原军医大尉，把单薄的嘴唇一张一合，惊慌地喊道："再不要动手了！弄伤了或是弄软弱了就不好研究了。"

山垣内翻译一边靠近太田曹长，一边接住捆中国人的绳头

说道："挖坑就挖出四具尸骨，这一带是杀不了少人的地方呀！"

像种猪一样肥的太田曹长环视一下四周说道："据说建国①时这里每天有几十个中国人被砍头，在哪里挖都是人骨。"

小林少尉高喊道："喂，从那个年轻的家伙开始收拾！"然后与小笠原和土仓一起走向挖坑的地方。

小美野走近那个要把流出来的血弄掉而抖动着头的青年，连续使劲把他背着的手往上反拧，猛推到挖坑的地方。

四具尸骨令人厌恶躺在坑前。坐在那里的青年，用力抬起满染血污的脸，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沉下去的夕阳。被这种平静姿态所威压，太田和桐原一边以嗤笑掩饰尴尬，一边看着小美野，小美野想起出发前的话已经失去平静，突然拔出日本刀，在小林的脸旁说道：

"少尉，可以干了吗""

小林看到小笠原军医和土仓卫生曹长拿出各种解剖器械，便慢腾腾地走近那青年。青年刚一站起来便"呸"的向小林吐出一口血痰。

小林"呀"的叫了起来，惊慌地踉跄后退，衣服粘上了一块带血的痰，脸上一下子变成土色，尖声高喊着："这个畜牲！哼，砍！"

步步逼近的小美野，咔嚓一声把青年的头砍了下来，骤然间喷出来的热血染红了草丛。小美野随即把面前残缺的躯体踢进了坑内。他完全因震惊而头脑发涨，血往上涌，对着桐原军曹拉过来的40岁左右的中国人，在刚想说"把这个家伙也给砍掉"的一瞬间，便把带血的刀挥动砍下。

这个中国人重叠地落在坑中青年的尸体上，还没有砍掉的

---

① 指伪"满洲国"建国。——译者

脑袋扭转过来，每漏出嘶嘶的一点气息，黑红色的血就咕嘟咕嘟地流出来，眼睛死盯着往下看的小美野，带上血的尸骨阴森可怕地排列着。

“啊！”小美野惊叫起来，像要推开什么似的，拼命挥动着双手，总觉得扭转着的那个头颅越来越大，要往自己身上压过来。

“嘿，顽固的狗东西！”

他一边喊叫，一边捡起脚下的石头，发疯似的对准砍口投去。

“混蛋，今天晚上可以下手了！”旁边的太田和桐原互相看着傻笑。

山垣内押着的三十五六岁的中国人，撕得破烂的上衣露出气得哆嗦的红铜色的厚肩膀。

小笠原军医好像在说“这次该看我的了”，指着因血湿得一塌糊涂的地面，吩咐小美野说：“在这里给我铺上草！”

桐原和小美野铺满了草，土仓卫生曹长拿着注射器站了起来。

“叫他在这里躺下！”

小笠原军医一边擦着眼镜，一边向山垣内和小美野使着眼色。

那两个人高喊：“到这边来！”不管是拖还是拽，中国人的脚都像陷进地里似的一动也不动。太田曹长一面吼着“走”，一面用刀背狠打着他的小腿。

从后面被敲打的中国人突然摔倒了。桐原和山垣内抓住他的脚脖子，拖拖拉拉地拽着。被愤怒的中国人砰的一声踢到腹上的桐原，像是要掉进充满血的坑内，“啊”的一声惊叫起来。

“反抗吗？”小美野喊叫着猛扑上去勒紧了中国人的脖子，桐

原拾起扔出去的竹剑，“这个也让他受受！”对准睾丸狠打下去。

中国人“喔”的低沉呻吟，急速蜷曲身体，忍受着痛苦。在小笠原军医的暗示下，小美野、桐原、山垣内、大田四个人像被弹起似的扑上去抓住了他。

在被卷起衣服的右腕静脉上，扎进了闪着银光的毒针，小笠原军医的纤细手指在微微的颤抖中推进了。3 秒、5 秒……毒素一会儿便浸入了体内。

男人“呜呜”呻吟着，愤怒和痛苦使得他嘴唇哆嗦、痉挛，逐渐苍白起来。用冰冷的蛇一样的眼睛死盯着他的小笠原军医，用眼神向土仓曹长示意，像是对小美野说让那男人张口，拿白色纸包蒙住脸。小美野在紧咬着牙不张口的男人嘴里插进棍子，企图撬开，土仓把白色粉末毒药倒了进去。那个男人的痛苦达到极点，疼得弯曲全身，想要压制腹部和胸部的痛楚，拼命反转手背，但是每用一次力，反而使麻绳深深陷进手腕，从紫色肿胀的地方渗出血来。

军医的薄薄嘴唇上浮出冷笑，一面看守着这个男人，一面看着表。25 秒、30 秒……男人咕咕地想要呕吐，哇的吐出血来。他喘了一口气，用闪光的锐利眼睛盯着军医尖声喊道：“鬼子！日本鬼子！”头发一根一根地倒竖起来。四个宪兵苍白的脸互相对望着，惊惧得呆立不动。

中国人痉挛地抽搐着身体，完全不动了。

小笠原军医想要用手术刀从胸部切到腹部，但是因为忘记带来大型手术刀，稍微犹豫了一下，一边对小美野说：“喂，用刀把这里给我切开！”一边用手术刀啪啪敲打着中国人的胸部。

小美野用带血的刀在乳部的上端噗哧扎了进去。小笠原操持的手术刀噗哧向腹部切了下去，接着，从相反的方向再切。然后小笠原军医带上白色的橡胶手套，开始把腹部切碎。

夕阳已经沉没，天快要漆黑了。在土仓准备好的蜡烛照耀下，6个人的脸色紫黑，抽搐，痉挛。军医伸手把切开的肋骨咔嚓咔嚓地拆下来。骨头下面那满是血的内脏，在蜡烛的亮光下陡然露了出来。军医轻易地插进两手，在当中搅弄了一会儿，取出红黑色像血块似的东西，在发红的眼睛前出示道："这是肺脏。"在熏人的血腥臭味中，6个人不由得把军医的脸和橡胶手套上托着的肺脏相比较。在挺直的尖头便帽下，笑得像抽筋一样的发青面孔，并不是人的形象，而是一只带血的野兽。

咕嘟一声咽下唾沫的桐原尖声喊道："混蛋！刚才还那样讨厌地胡闹，现在就老实了。"

"请您再把别的地方给我看看，军医先生。"小美野装腔作势地喊道。但这个声音却像卡在嘶哑的嗓子里。

军医把肺脏砰的一声扔进血坑里，又用沾满鲜血的橡胶手套在肚里开始搅弄。

没有一声咳嗽，在令人难受的沉默当中，只听到咕嘟咕嘟搅动内脏的声音。胶皮手套突然停止，军医激动地声音发抖地尖叫："活着！"小美野的心突突地跳了起来，不由得往坑内望去。

但是，在成为血海似的坑里，惨白的月光照耀下，只是躺着两具惨死的尸体和四具骸骨。吓得打了一个冷战的小美野，耳里听到不知所措的小林少尉的声音："什么活着！傻瓜。"

"哈哈……"太田曹长突然发出茫然失措的笑声。

"军医先生，断气已经20分钟啦，还有那种荒唐事吗？"他勉强大声喊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的确还活着。你看这个！"军医指着掏出来放在手掌上的心脏。

"喔，的确在动！"14只眼睛恐怖地战栗着。在朝鲜和中国

东北有20年宪兵侵略生涯的浸透着很多人鲜血的小林少尉脸色黝黑，毫无血色。7个人强烈的感觉到自己眼睛所看不到的中国人的反抗力量，都不作声，好像被迷住似的盯着那心脏。

“啊，回去吗?”桐原说。大家像被弹起来似的正要活动。

“稍微等等！平时也需要一个星期的解剖，现在再干一会儿。”军医又蹲下来，把手伸进尸体肚皮里。

“你们是砍活着的人头，而我可是玩弄死的人。嘻嘻……”笑着的小笠原军医的脸，在蜡烛光下像恶魔一样晃动。

“噢，这是膀胱。”“这是肝脏。”“这是胆。”

在军医手中接连不断切割的这个中国人被脔割了。

周围充满血腥气，骤至的夜色把这些魔鬼紧紧地包围住了。

“该回去了吧！”

难于忍受的小林少尉给山垣内使了一个眼色，向东方走去。军医仍然固执地想要干下去，但是因为大家都要溜掉，只好遗憾地轻蔑地看了一下。

小美野、桐原拖着腿，把割碎的尸体扔进了坑内，急忙把土盖好，象逃跑似地回到汽车里。

“喂，开足马力！”

载着鬼子们的汽车在灯光闪烁的新京街头疾驶着。

旧部队名：关东军第一特别警备队二大队本部

笔者的片言只语（1982年7月）

这篇文章是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战争嫌疑犯被拘留的时候所写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对于当时的上司和同事的具体描写，也许有欠准确的地方，谨在此表示歉意。

但重要的是，我在任职的时候，对很多的中国人曾给予难以言喻的困难和痛苦。现在想起来实在抱歉。我在表面上老实，

但在内心却想，这都是在长官的命令下干的——并没有谴责自己的心情。

中国的谚语说："牵牛到河边是可以的，但是强捺住牛脖子喝水是不行的。"

当时我想，我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样自我宽慰，因而把所有责任都转嫁给战争。

现在，在对自己犯下的罪行由衷进行反省的同时，我认为必须制止再次引起战争。我本身也打算要为曾经受过苦的很多人们，为了和平，贡献自己的余生。

小美野义利

（摘自《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版）

群　　鬼

——取被捕农民的活胆

藤冈顺一

（股长　警佐）

被悬崖峭壁所阻断，曲折的山路急剧向右拐去，眼前明亮地开阔起来。平缓地往上倾斜的村公路隔开北边的山麓和南边的梯田，成为弓形，大大地弯曲延伸着，消失在东南方重叠的秃山之间。四五天前下的小雪像被刷子刷过似的聚集在山麓，露出漆黑而荒芜的大田地表。

这一带是本溪湖东南方约10公里的山岳地带，是从所谓宝库的东边道前往三角地带的岫岩的交通要道。重叠的高山成为自然的城墙，易守难攻，完全是为游击战设置的坚固城堡。

沿着这个村公路，从头顶到脚尖都是黑色的伊藤警察队，由于连日行军，精疲力尽，脚步沉重，把枪当作扁担，排成两列长长的队伍慢腾腾地走着。也有人在腰里挂着西洋式军刀，再在背上背一把日本刀。

1936年2月上旬，为了防止东边道以及三角地带蜂起的抗日联军的汇合，想要进行夹击，调动在安奉线① 各站盘踞的警察队和进入这个山区的关东军奉天警察署伊藤警察队，乘着村人庆贺春节的时机，由村落到村落进行袭击，逐个践踏得乱七八糟，好容易才走到这里。

从早上就阴着的天空已完全被雪云笼罩了，山和树林都被灰色的烟雾覆盖着，看不太清楚，尽管还是下午3点左右，可是已经像傍晚的时候了。

我在昨天晚上喝白酒② 过量，醉得两腿摇摇晃晃的，按着时时作痛的肚子，可是神经却非常集中，盯着离开队伍两米左右、走在斜前方的一个中国农民的身影。他挑着五六个很重的大口袋，往前弯着身体，目不转睛地望着地面默默走着，那神态像是过度忧虑着什么似的。

“那个家伙果真是密探吗?还是象他一口咬定的是农民呢?”我感到有点疑惑。他看起来像是40岁上下，有结实的体格，像是握着锄头接连劳动过来的人，有满是大硬骨节的手，在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有一双善良的眼睛，在额头上刻着深深的皱纹，陈旧的帽子和补缀的棉衣浸透着土腥气，怎么看也是那种为每天生活所迫而刻苦投入全部精力的一直在种田的农民。

“是的，这个家伙的确是农民。可是，一旦捕住就不能放过了。不管是农民还是密探，无论怎么说，只有拷问和死在等待

---

① 安奉线即今丹东至沈阳的铁路线。
② 是日本酿造的白色甜米酒。

着他。那个时候，我虽然因为肚子痛而不能分得功劳，但是，作为弥补，在拷问的时候不是还可以参与吗？……尽量在现在这个时候想想妻子的事情吧！”我一面嘲笑，一面像在网里期待着食饵的毒蜘蛛一样，眯着惺忪而充血的醉眼，望着那农民的身影。

那是今天早晨10点前后的事了。我们沿着山麓的道路，从枝叶整齐的松树林木之间来到有七八户农家的村子时，小队长威风地挺立在足有两搂粗的老松树根下，发出了“一齐搜查！”的命令。红色的春联在每家的门旁或门板上贴得很好看。像焦急地等待着欢乐的春节似的这个安静的村子，一瞬间被狼一样突然扑过来的日本鬼子所蹂躏，门和门板被踢开，窗子被打破，家具等物被随手破坏，喜庆的春联也被撕成碎片，散落在院子里，被脏鞋所践踏。预知凶恶的野兽来袭的村民已经逃走了，我们便把所有的屋子逐一破坏。正当我们想要撤走的时候，四五个人以功臣自居，连拉带扯地把一个农民样子的中国人带到公路上来，然后在2月的寒天里光溜溜地加以踢打拷问，百般折磨。

“你是密探吧?”

“喂，坦白吧！”

那农民顽强地不断说着同样的话：“我是老百姓，什么坏事也没有做。”

久松分队长怒道：“好，那么你背上这些东西跟着来吧！要是逃跑就枪毙！”他强迫那农民背上塞满掠夺品的口袋，一走慢就猛推，一直拉到这儿来。

我一边想着这些情况，一边盯着那农民，那农民突然转过身来，视线相遇。他惊慌地把视线避开。看到这个样子，我吓了一跳。“混蛋！窥伺机会吗？想要逃跑吗？好，要是逃跑就逃

逃看！先开一枪……抓住逃跑的家伙也是大功劳，拿枪打死了就不能拷问了。不管怎样，最好先瞄准脚。杀死他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的……”我心里这样打算着，肚子疼痛也完全忘记了，不由得心中暗自得意，等候着那个机会。

道路再次弯曲起来，上了山中坡道，到了陡峭的半山腰时，听到“大休息”的命令。大家都选择个合适的地方，随意拿着枪坐下来，开始吸烟。也有因过分疲劳而睡在道边上的。那里一侧山坡像被切开似的可以看到红土的表层，形成墙壁，略微平坦而宽阔的空地是适宜的休憩场所。

分队长、警察部长久松和小队长正畅谈着什么，突然站了起来，走近成为墙壁的山崖边，注视着撕破秃山而形成的深邃的洼地，显出专心考虑什么事情的样子。不久，便像拿定主意似的把叼着的烟还未吸完就啪的扔进了洼地，向蹲在部队后尾的农民举起手来呼唤道：

“喂，到这儿来！”

农民正在想着什么，没有任何警惕的样子，大步走近分队长旁边。

“分队长这家伙又要拷问了！这家伙有意思。那个混蛋也许要逃跑。好，要是逃跑就开枪。”我这样想着，一下子拿起枪，跑了过来，想不到七八名同事手里拿着枪早已围了现场，筑成一堵无处逃跑的人墙。

“坐在那儿！”

分队长抬了抬下巴，向洼地的尖端示意，农民用探寻似的眼神看着分队长，他突然说：

“我是老百姓，什么坏事也没有干过，又把东西搬到这儿来了，就让我回去吧。我怎么也得回去呀！”他一心要求回去。

“喂，想回去吗？要是想回去就早一点说实话吧！怎么样？

你是密探吧？喂，快说！说是密探。”

分队长转过胖墩墩的不倒翁似的身体，歪扭着黝黑的脸，露出一大排镶金的不整齐的牙齿，像“祭神舞乐的狮子”那样，大声逼问之后，眼睛滴溜溜地转着看了一下周围的我们。“这小子要干什么？”我这样想着。他推测着大家的心情，显出得意的样子，眯着残忍的眼睛呆看着。要想随意指使鲁莽的部下，最重要的是使他们吓破胆子。他想发挥自己的残忍性的时候，总是叫人看见那阴惨的笑容。

果然，这个家伙迈出一步，猛抓住农民的左手腕。

“混蛋！还不坦白吗？”他象狗吠似的叫道。他在刚拉起来的时候就用力把对方的胳臂往后反拧。

“呜呜……”那农民发出痛苦的呻吟，被拧得趴在地上，哎呀哎呀地痛得浑身乱动。

“我是老百姓。你说我干了些什么啦？为什么非对我这样呢？让我回去！让我回去！”他不断地呼叫。

“这个家伙是顽固的东西！还不说吗？妈的！也要这个吗？”分队长朝那胳臂痛得受不了而微微颤抖的农民的肩头，又不断地用脏鞋猛踢。农民把痛苦得扭歪的脸拼命转向后边。他瞪着充满愤怒和憎恨的泪水而闪闪发光的眼睛。分队长厌恶地瞪着他的脸。

“混蛋！越来越不想说啦！好，叫你看看！”分队长把拧着的胳臂松开，突然拔出腰里的日本刀，明晃晃地指着农民的眼睛。

“怎么样？还说谎吗？这次可是这个啦！这次只有坦白啦！”他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按着农民的头往前推去。他嗖的把明晃晃的刀抡过头顶，狠狠地大声喊道：“说呀！”

凄惨的杀气像送出的电光一样飞快地射入人们的肺腑。一

瞬间，瞑目的农民睁开勃然大怒的眼睛，转过头来说道："魔鬼！我是老百姓，有什么罪！记住这个仇恨！"他牢固地握着拳头，极度愤怒，抖动着身体，瞪着久松。他眼泪已经干涸，目光炯炯，像要穿刺这群杀人鬼似的闪耀着。他样子可怕，好像马上就要咬断人的喉咙。

久松全身受到这种锐气的压迫，发出低低的呻吟声，摇摇晃晃倒下去似地砍了下去。一下子被喷出的鲜血顶起来的头颅，飞出三四十厘米，随后划成半圆形倒转过来，猛然睁大燃起仇恨烈火的眼睛，好像要把那群杀人者一个一个刺死似地瞪着，突然向洼地落去。

我好像听到落下去的头发出的咬牙切齿的声音，刺骨的寒气使我清醒过来。

久松分队长脸色苍白，像擦试冷汗似的用衣袖抚摩着脸，一只手提着滴血的亮晃晃的刀，放心地直立着。

这时，分开人墙的小队长藤泽警部补①慌慌张张出现了。他油光的脸上架着眼镜，镜片后面闪着细长的残忍的目光，进来之后首先对着久松心满意足地笑着，然后不管不顾地走近尸体，拽着脚从洼地的边缘拖拖拉拉的运走了。要干什么？人们用怀疑的眼光盯着他，他睬也不睬，像要遮挡住尸体似地弯着腰，很快解开尸体的棉衣，露出胸膛之后，一眨眼工夫拔出了军刀，从胸部到腹部直着切开，接着沿下部肋骨横着切进去，用手和刀撕下肉来，剥下沾满血的淡黄色脂肪和肉，露出白色的肋骨。

在我们屏住呼吸看着的时候，突然，小队长左手使劲插到肋骨深处摆弄起来。不一会儿，在满是血的手上抓出也不知是黑红色肉块还是血块的东西，用刀切取下来。啊，是活胆！

① 警察职级之一，地位次于"警部"的警察。——译者

是呀，这些家伙的目的原来是这个！疑云久久笼罩着头脑，现在突然被吹跑了。虽然逮捕了却放置不管，不捆上绳子而叫他当苦工，本应夸耀“功劳”却连本部也不报告，而拉到深山里面，仅仅在休息的时间就慌忙杀害……一切缘由就在这里。是呀，这是为了偷偷治疗淫荡腐败生活中得的恶性疾病，是为了过更加糜烂荒淫的生活，满足丑恶的欲望……只是为了这个而干的。

眼望滴着仇恨之血的人胆，心满意足地微笑着的小队长，撕开农民的衣服，把它包上，再用白色的毛巾裹好，随便放进口袋，把带血的刀擦完收回刀鞘，才像注意到什么似的回过头来，环视一下大家的脸。

“别在那里发呆，来帮忙！”他一面骂着，一面开始拉尸体。吓了一跳的我们，慌忙跑上前去，把农民的尸体拉着扔进深深的洼地。

小队长环视了这一带之后，想早点从现场逃脱出去，用嘶哑的嗓音高喊道：“准备出发！集合！”分队长抽搐着发青的脸，被什么东西迷住似的走了起来。

我曾经听到过取胆的话，可是为了取活人胆而杀人的这种事情不但没有听说过，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但是如今，我也实际上一起砍头，一起切取了活人的胆……不，是为了取活人的胆而惨杀人！魔鬼——是的，完全是魔鬼！

现在，在我的脑海里，农民最后的叫声和闪耀着愤怒、憎恨的炯炯目光，仍留下了活生生和深刻印象。啊，那个农民的仇恨，再加上紧靠着那个被残酷杀害者的尸体而哭叫的遗属的满腔仇恨，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房，惭愧得心如刀绞。我从心底非常憎恨我的过分丑恶的过去。

说到警察，在日本从很早就受到国民的尊敬，这是因为，他们是为社会服务的……我们受到这样的教育，因而这样想。但是，这完全是意料不到的错误。

现在，我还想有作为日本人的自尊心，把日本的警察在日本和中国所干的事实真相原原本本地暴露在人世上，要求必须认识过去的错误和可耻的行为。此外，我就是死也不会再重复过去的罪恶了。但我也必须告诉晚辈，劝告他们，再也不能走这条道路。并且，在亚洲想再重复这样的罪恶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了从全世界根绝侵略战争，特别是根绝和防止灭亡人类的原子战争，我认为必须倾注一切力量进行斗争。

简　历

学历：初中毕业

出身：小资产阶级（商店店员）

出生地：新潟县

旧所属：伪满奉天省警务厅经济保安科

年龄：49岁，笔者已去世。

（摘自《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谋　杀

——借口预防注射的毒杀

中岛宗一

（委任官）

铺着白瓷砖的地板用水洗得很干净，四面的电灯把大手术

室照射得通明，在中央的手术台周围，那全身穿戴着雪白的帽子、手术衣、口罩的两位大夫和几位护士小姐，是正在拯救受病菌毒害而濒死的重症患者生命的科学家及其协助者。全力以赴的紧张空气充满了室内。

手法熟练的护士小姐依次传递手里接到的刀、止血钳子、镊子、纱布等等，手术敏捷地进行着。在大切开的胸部露出的心脏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胀一缩的情景。

这里是武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手术室。为了学生的实地学习，手术室的顶棚是圆形玻璃盖的，从上面可以看到手术的情况——这是一种教室。我们靠近，屏住气息，凝视大夫精巧动着的手指。

“这是在手术中最为困难的心脏部分的大手术。”听到给我们作向导的护士小姐这样低语，我清晰地想起11年前的一件事情，自责的念头不由得冲击着我的胸膛，心如刀绞。在齐齐哈尔市全福胡同，有一所挂着北满资源调查所牌子——粗体字写成——的房子。从正面出入的人不多，在后门有时可以看到出入的人影。不知真相的人，总觉得这是一所冰冷凄凉的房子，这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这幢房子原是龙江省地方保安局军官宿舍，现在充作龙江省警务厅特务科特别搜查班的工作室。

1945年6月中旬的某天，我在这幢房子的一间屋子里，和同事中的龙江省地方保安局第一股股长委任官袁胜、委任官荒木彻志、岩木清人、福津精治、大仓参次，以及警务厅特务科警尉小林芳郎、成田正一等一起，在有些不平静的轻微兴奋中，预想今后会出现的事件而热烈谈论着。

“龙江省的成绩上不去，莫非都在睡觉吧！”在中央的督促下，特务科长齐藤润吉叫来了科员河野明，进行了申斥和鼓励。顺次轮班，担任这项工作的该第二股股长荒木了。

"快点搞个什么事件!"河野催促着说。如果不搞个事件，不但有关成绩，对于获取工作费的预算也有影响；不仅不能搞豪华宴会，对于河野来说，还面临着不能养活在龙江饭店用女招待名义窝藏着的小老婆的切身问题。所以，无论如何，必须制造一个事件。这样，根据荒木的情报工作，就出现了所谓"苏联在满谍报工作员"的案件。在1944年初，齐齐哈尔市逮捕了一个30岁左右的朝鲜人。

尽管用吊起来、灌凉水、殴打等刑罚连日连夜地逼迫招供，但是，那朝鲜人嘴里吐露不出这样的事实。荒木害怕他的计划落空，发疯似的更加残酷地拷问。但是，不论怎样拷问，这个人都不屈服，坚持说这没有事实根据。在他前面，荒木已很快地感到束手无策。荒木把那朝鲜人受到残酷拷问而受伤、身体极度衰弱当作好事，仿佛认为"就这样死去反而倒好"，没有予以任何治疗，扔在单人牢房就不管了。朝鲜人不屈的气魄使自己肉体恢复了健康。

此后，对于这个朝鲜人的处理，荒木同河野和齐藤商议过。由于已经作为重要嫌疑犯报告上去，也有体面的问题，还希望找到什么更好办法，但是从科长那里没有得到什么明确的指示，不能一直关在保安局的单人牢房，只好又把他转移到齐齐哈尔市警察局的拘留所去。这样也有一年多了。

特务科长更换，中央保安局的科员春口宗男作为新任特务科长到任了。那时，正是日本处于最后紧要关头，盛传将在日本本土作战。在东北，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也进行得越来越公开和活跃。预料到由于苏联参战而出现的紧急局势，日本急于加强镇压人民。这是1945年5月底前后的情况。春口办完事务，遍访了有关各机关，这些工作告一段落后，6月中旬的某天，在保安局官厅的事务官室，听取了河野和荒木的报告。

“警察局急于清理拘留所，催着要赶快处理这个家伙，怎么样？和科长谈谈对他的处置吧？……”荒木对河野小声说道。

春口问河野：“什么事呀？”

“老实说，有一个人很不好办……”

河野把自己的问题放在一边，把责任都推到前任科长齐藤的身上，报告了这个案件从逮捕到今天的经过。

“这样一来，事到如今，打发也打发不了，又不能解送。”河野感到为难地说着。

“还说什么！他们打算把这件事还拖到什么时候？”春口责问道。

“我也不想把这件事总拖下来，打算早早处理掉算了。我好几次和科长商量，但是无论怎么说，科长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指示，所以就……”河野稍微看了一下荒木的脸说道。

还没有听完河野辩解的话，春口就好像是让人看到他气量大似的下了指示：“好，我负责，马上就干掉！”

“荒木君，科长这样说了，就要赶快去办！”河野用兴奋的语气回过头来看着荒木说道。

“要是干掉，那用什么办法才好呢？……”他又自言自语道。

“怎么样？使用过去的注射办法试试看！”荒木提出了早就想好的计划。

“注射吗？唔，那也很有意思呀。我从元吉科长那里听到过他担任这项工作的宣传。究竟是有多大效力的东西呢？试一下看看也好嘛！”由于春口赞成，事情就这么简单地决定了。

所说的这种注射，是1938年4月的事。那时，随着中央保安局的成立，担任防谍工作的第三科设立了“特别室”，研究试制在跟踪、谍报、伪装、变装和爆破、防火等活动中使用的器械、药品。到了1941年，特别室扩大成科，成立第八科，聘请

东京帝大医学院毕业的元吉为科长，录用了几名高等工业应用科学和药物专门学校毕业的技术人员，研究和试制向来用于阴谋策划的杀人注射液、麻醉药、催眠剂等各种毒药。并且，委托奉天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几名医师合作研究。就这样，在这里极其秘密地制造了各种药物，分发到地方保安局去使用。

被铃声召唤，我到了事务官室，当时，他们三个人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老实说，是处理一个朝鲜人的问题，也想请你帮帮忙。”河野对我说。

我代替荒木担任第二股股长刚到任不久，听到河野这样说，不了解是什么意思。

“对你来说，还没有交接完毕，所以，关于详细的情况，以后再谈……”荒木于是简单地说明了这件事情的原委。

“是吗？那就干吧！”我高兴地接受了。

为了让那个朝鲜人在打注射针的时候老实一点，不得不对他进行巧妙的欺骗。荒木对他说：“明天释放，决定让你回朝鲜。但是，现在传染病正流行，必须进行预防注射，否则不能乘火车，所以必须打完针后才能出发。”这样一骗，那朝鲜人同意了。为了防止泄露秘密，注射在旧保安局军官宿舍内进行，到场者只限部门的有关人员。注射由曾经担任过卫生兵的成田来做。具体问题就这样商定了。

“可千万别出错！”在河野交代完之后离开事务官室的我和荒木，面对面傻笑着小声说道。

“明天可有意思了！”

第二天，我们就在这旧保安局军官宿舍等着把那朝鲜人带来。

“怎么啦？怎么费了那么大的事！……”荒木等得不耐烦，

从椅子上站起来，开始围着屋子转。

“嗯，该来了吧。”我也站起来，透过窗户眺望着街头。

大陆特有的夹衣季节很快地过去，一下子暑热来临，午后两点钟的太阳今天也像是火烧似地照射着大地。拉着客人跑的人力车夫，脸上充血，通红通红的。

“来了！来了！”出去了解情况的神津的声音，使我们慌乱起来，曾经商量好的准备工作似乎混乱了。看到额头上出着汗进入屋内的志村，荒木等不及地说道：

“怎么啦？很费事吗？”

“一走到外面，那家伙就脸色苍白地倒下了！”志村一边用手绢擦汗，一边开始谈起那朝鲜人的情况。

根据志村的报告，昨天荒木对那朝鲜人宣布“明天释放”，晚上他就几乎没有睡觉。今天，从早晨起，他就注意外面什么时候来接他，坐也坐不住。带他走的志村等两个人陪伴着他，他很精神地走到屋外。不过，走了几米，他就晃晃悠悠地东倒西歪起来，一下子就像塌了似的摔了下去。

他坐在太阳光线照不到的微暗的单独牢房里，一步也不许走到屋外去，过了一年多，突然受到强烈阳光的照射，一时经受不住而出现脑贫血。

“经常说的无精打采这个词，说的就是这样。人是格外脆弱的东西。只一年左右没有晒到太阳，就成那样了！”志村一边傻笑着一边这样说着。他突然又严肃起来。他说，把那朝鲜人抱到军官宿舍里，泼上冷水，让他稍为休息，担心他是否能活动，就申斥地问：“你这样回得去吗？”他紧咬着牙站起来回答道：“没有问题。”

“一心想要回去的家伙是很担心的呀！就是那样，也还是要回去！”

志村奇怪地补充道。

“是吗？这个家伙看来是完全相信能够回去了！”

荒木对着我的脸傻笑。我也笑起来，大大点头表示同意。

“这个家伙现在怎么样了？”我们正经地问志村。

“因为他太难受了，正让他休息。”

“快一点叫他去舒服不好吗？还不开始吗？”我和大家商量着说道。

“哈哈，让他舒服去吗？那么带他来吧。”

在荒木指示下，志村出去了。

“喂，科长先生，好好干呀！”他嘲弄似的从外面喊着，伪装成科长的我，体会到一种滑稽心情，一屁股坐在铺着漆布的大桌子前面的转椅上，俨然一副科长的样子，伺机行事。

砰，砰，一阵敲门声。

“嗯！”随着我傲慢的回答声，那朝鲜人被志村抱着似的进来了。

“这是科长，想要和你谈点什么。”我装着好像是以我为中心正在开着什么会议似的，荒木在当中告诉站着的朝鲜人。朝鲜人听到荒木的话，对我恭敬地低下头来。我对他抬了一下下巴说道：“你坐下！”他坐在志村拿出来的椅子上，仍然不停地喘着气，痛苦地大口呼吸着。

在我前面的他，高高的身材，健壮的骨骼，使人感觉到他的身体本来是很健康的。现在看起来，颧骨高高地突出，眼窝塌陷，在宽阔的额头上垂下来的头发蓬乱，红褐色，完全失去了光泽。

“我想，荒木君已经对你说了，调查的结果，搞清楚了你没有嫌疑的事实，因此决定今天释放。”我装摸作样地说着。他凝视着我的脸。我和他视线相遇，不觉又有那种滑稽的心情。我

对他露出安慰似的笑容，说道："长期的拘留给你带来了不幸呀！"

我想，自从用没有事实根据的罪名加以逮捕，一年有余，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出去，也没有向谁申诉的办法，充满怨恨和苦闷的长期狱中生活，只用一句安慰的话是不能消除他所受的那种程度的痛苦的。但是，想不到现在就要从绝望中解放出来，他相信这一点，那种痛苦和怨恨便好像能由于今天的喜悦而抹掉。他用无言的微笑回答了我的谈话。

"听说你想回朝鲜去，回去打算干什么呢？"

"是的。因为家里是干活的农民，我也想回去当农民。"

"噢。那么，你们家几口人？"

"妈妈和妻子，再加上孩子，有三口人。"

"是吗？那个孩子很让你挂念了吧？"

处于不知道明天是什么命运的境遇，怀念那等待丈夫的妻子、盼望父亲的爱儿，悄悄流着的眼泪濡湿了枕头，难于安眠之夜不知有多少。现在，可怜的妻子不久就能够会面了，他的眼睛闪耀着生气勃勃的光亮，他的思念飞向了遥远的故乡。他透过窗子盯视着空中的远方，不由得稍微叹了一口气，轻轻点了一下头。

"你没有旅费吧？虽然少了一点，你就拿去吧！"从河野那里拿来的准备好的10元钱一沓的200元钱，从桌子的抽屉里取出来，我当面交给了他。他惊奇地直盯着我的脸，畏缩地后退着。荒木对他说道：

"是科长特意给你的，你就不要客气了。还是收下的好！"

"谢谢！"

在荒木催促下，他从我手里接过钞票，放在膝上，用两手摸弄着，从俯视的眼里，喜欢的泪水一滴一滴把这沓钞票都弄

湿了。我看到这个样子，和同伴们一起在现场久坐，细看这个逐渐钻进圈套的即将被捕获的东西，像不断舐着舌头的魔术师那样，心中暗自高兴，一致点头会意。

随着一阵砰砰敲门声，没有等里面回答，大仓就进来了，向我报告说：

“科长，请的大夫来了！”

“是吗？已经请来了吗？在哪儿打针呢？”荒木和我商量似地说道。

“马上就完，就在这儿吧！”我说道。

“那么就领大夫到这儿来吧！”荒木对大仓指示道。

由大仓领着进来的成田，穿着白衣罩衫，戴着口罩，一只手拿着注射器。“呀，您辛苦了！”我致意道。他沉默地轻轻点了一下头。

“那么就请快一点吧。”荒木催促着说。朝鲜人把手里拿着的钞票很郑重地放进上衣口袋，脱却了因有污垢而连条纹也看不清楚的衣服，把已经磨破仅有残余样子的衬衫袖子卷了上去。

“不用站着，坐下也可以！”成田不叫他站起来，仍旧让他坐着。

“那么，借一下您的桌子用吧！”他说着，在我前面的桌子上伸出了手臂，开始用脱脂棉擦拭。一下、两下……在那被污垢弄得看不清楚本来面目的胳臂上，显现出苍白的肌肤。在肌肤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粗大的静脉。在静脉上，猛一下子扎了进去。刚一扎进去的时候，他意外地看了一下成田的脸，什么也没说，一动不动的。

一秒、两秒……我们用眼睛把注射液量的减少和他的脸频繁地进行比较。注射液还没有减少到一半，他“呜”的低沉呻吟着直立起来，突然当场朝天仰倒。

在屋外偷看情况的人蜂拥跑来，和我们一起围上了他，注意看他胳膊交叉在胸前的样子。

“呜！呜！”他横眉立目，从嘴里吐着白沫，呻吟着。

“喂，快点！快点！”荒木害怕呻吟声音传到屋外，慌忙大喊着。小林抬起一只脚，用脏鞋踩上去，堵住他的鼻和嘴。

“哈哈，看样子好像是完蛋了。”

看来，他连哆嗦一下都不行了。小林收回踩上去的脚，露出咬紧的牙齿，看见了那副惨相：往上翻着的眼睛半开着，唾沫泡和土玷污了面部。

“特意叫你早一点去舒服，干吗露出这么怨恨的叫人害怕的凶相！”小林说着，呸的吐土一口唾沫。

抓到了很大猎物的猎人，沉浸在兴奋之中，在尸体前畅所欲言地谈笑着。我们连话也说得厌烦了，在全关闭的屋子时感到暑热突然袭来。

“喂，冰镇啤酒等着呢！快收拾！干干净净地来一杯！”我督促大家着手处理尸体。

我们把尸体放进准备好的棺材里之后，到委托医生那里，让他写好注明是心脏麻痹致死的验尸证，叫来了市卫生队，就要送火葬场去了。

“闻到给阴曹地府送礼的钱的气味了！”我们这样说着，从死者口袋里抽出泪迹未干的钞票，塞进腰包，抢先跑到外面，拥进街上的高级饭馆。

于是，“为庆祝赫赫战果，干杯！”我们忘记过了多少时间，发疯似的一边喝酒一边敲敲打打，喧闹了一个通宵。

日本的医学在世界上仅次于德国，高度发达，我曾经引以为荣。但是，我所夸耀的医学，现在在我的眼前，却不是用这种力量救活处于濒死境地的人，相反，像用我的手所做的那样，

是杀害本是身体健壮的善良而和平的人。在中国，现在正期待用10年的时间消灭地方病，并倾注全力进行扑灭细菌的科学研究，而我们的医学却是培养细菌以促进传染病流行的医学。

简　历

原籍：长野县下伊君子郡

出身阶级：农民

最终学校名称：南信学院二部毕业

学校毕业后的职业：农业

最后所属：旧龙江省警务厅特务科

被捕时间、地点：1945年10月8日，旧齐齐哈尔市白济工厂。

笔者的片言只语（1982年7月）

搞阴谋，这是侵略者贪图自己的利益、侵犯其他民族而惯用的伎俩。

当时统治东北三省号称精锐的张学良军队，仅在一夜之间就受到铁道守备队少数兵力的毁灭性打击。满洲事变①的起源——柳条沟事件就是关东军策划的阴谋。他们甚至抬出引退的清朝末代皇帝。用那皇帝，以“日满一体”、“一德一心”、“五族共和”为建国大计，以建设“王道乐土”为目标，建立了“满洲国”。日本帝国在那陷入贫穷和军阀压制的困境中的东北三省，伪装成救世主的模样，可是，在这背后却建立了731石井细菌部队，并以“反满”、“抗日”、“盗匪”、“间谍”等罪名逮捕了很多民众，不经审讯就作活人实验，反复进行残害，这就

① 即“九·一八”事变。——译者

是关东军。

如果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那么，我作为它机构中的一员，从1932年起担任“满洲国”警官，迈入侵略中国的行列，直至日本战败，13年间大部分是过着特务警官的生活。我对善良的居民使用阴谋手段，把他们培养成密探，操纵他们，玩弄权术，把中国人民投狱杀害，等等，我是一直埋头于这些阴谋工作的。

1956年，我作为中国在押战犯，从拘留到缓期起诉，终于回国。当时，使我最感痛苦的事情之一，是见到带有星条旗徽记的在空中飞行的军用飞机，见到乘着吉普车到处跑的美国兵。一旦有事之时，他们果真会为了我们日本国民而战，流尽最后一滴血吧？我不得不抱有这种深深的疑虑。

1945年8月，苏联军队开始进攻满洲，关东军以执行作战计划为借口，不战而暗地里一齐向朝鲜国境退却，铁路全线不通，开垦团、少年义勇队和一般日本人都被弃置不顾，为此自杀、饿死、得传染病而死亡的不计其数。今日中国的日本遗孤问题就是因此而带来的。对同胞尚且如此的关东军，对原来的当地居民那就更加无法说了。例如，为了阻止苏联军队的进攻，听说计划炸毁松花江大坝。如果这个计划实现，那么，吉林、长春两市市民中几万人的生命财产将会被全部吞没，这种结果不是很明显吗？日美安全保护条约，美军的核保护伞，对于我们日本国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通过本身的体会，不得不强烈反对。

我当年在苏联拘留时，从一个苏联人口中听说，“不论是什么国家，只要留驻别国的军队，就绝对不会带来和平。”这样的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年轻一代的人们，必须警惕统治者的阴谋！

中岛宗一

（摘自《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侵华日军在敦化遗留的废、毒弹及处理

王义杰　王仁学　陈廷生

自1931年9月23日，日本关东军天野旅团清水支队，从吉林经蛟河侵占敦化时起，至1945年8月19日苏军进入敦化，日军投降为止，敦化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之下，煎熬了整整14个年头。

日军在侵占敦化期间，曾先后修建了许多军用设施。1938年5月，首先在城区西郊原回民义地修建了一个永备机场（西机场）并修了一条铁路专用线。1942年，在敦化沙河沿又修建一个大于西机场的永备机场，亦修了一条通大桥车站路专用线。1944年还在官地的八棵树、秋梨沟、大蒲柴河三处各修建了一个野战临时飞机降落场。在敦化北山、小山嘴子535.5高地上，日本人修建了炮台，小山嘴子山上配置的是要塞炮，口径为240毫米，因此535.5高地亦称炮顶子。

同时，日本侵略军在敦化还驻有重要指挥机关和大量部队。据资料记载，日军投降前，敦化驻有日本关东军第1方面军第139师团约2万余人，指挥官是富永恭次中将，所属各部主要分布在沙河沿和敦化城内。此外，还有日本宪兵分遣队、日本独立守备队第8大队及满军两个团。1945年8月10日，日本关东军第1方面军司令官喜多诚一大将，将他的司令部从牡丹江市

迁至敦化。同年8月下旬，在敦化神社（现农机公司一带），喜多诚一率僚属及两个师的兵力向苏军及88独立步兵旅分遣队（原抗联队伍）投降。

妄图负隅顽抗，运进大批毒弹

德国法西斯投降前后，日本关东军妄图延缓其注定失败的命运，于1945年4月至1945年7月间，从外地向敦化运来大批弹药，其中大部分是化学毒剂弹。

据目睹者陈延生（原市民政局局长）讲："当时我是火车司机，经常在图们至敦化区间跑车。公元1945年4月至7月间，日军就从五常、图们等地运来大批弹药，每天约有4列车（每列38节），均运到东机场，存放在河沿屯。东机场专用线以北的山沟里，没有库房，只露天堆放。当时卸车的人，基本上都是从农安、榆树抓来的劳工，这部分劳工在日本投降后，基本上都回乡了。"

据查，日军在秋梨沟站东也卸了大量弹药，主要存放在秋梨沟至河北屯沿途。另外还用汽车向大山、马鹿沟、江东等地运送了部分弹药。这些弹药在日军投降后分散遗留在县内各处，后因各种原因，部分弹药散落到存放点附近的沼泽、草丛、灌木林中。这些毒弹，使曾遭受日军蹂躏14年之久的敦化人民在日本投降后仍继续遭到危害。

仅在敦化，因废弹造成的伤亡人数达五百多人，包括处理废毒弹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到现在几乎每年都发生的废毒弹伤亡事故。仅举几例如下：

（一）1954年，在搬运毒弹时，有1名车夫和1名民工中毒。

（二）1954年，在挖弹坑时，1名工人被炸伤。

（三）1958年，废委会工人傅立叶，因毒剂容器破裂而中毒。

（四）同年，处理废弹工人刘洪亮、刘庆阳，因毒液泄露，造成糜烂性染毒。

（五）1969年5月20日，官地公社官地大队铁匠炉用废弹打铁时，1发105口径的糜烂性毒剂弹破裂后，使在场的工人和社员9人染毒，经抢救脱险。

（六）马鹿沟1名村民因在六二三（今三三〇五厂）厂处理废毒弹现场活动，被染毒，腰部糜烂，经抢救治愈。

（七）1956年，废委会工人因废弹爆炸，造成庄明有、李宝成、张守荣3人死亡，于志一、李万乐2人重伤。

（八）1958年，因废毒弹爆炸，造成废委会工人孙福臣、孙炳杰、戴吉学等5人重伤。

（九）1968年，贤儒铁木社工人张祥被废弹炸死。

（十）1987年，大桥乡办企业的梁××被废弹炸死。

动用大量人、财、物，搜集埋藏废毒弹

为保障我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解放后东北军区决定对日伪时期遗留的废毒弹进行搜集、处理。遵照上级指示，于1951年成立了“敦化县废、毒弹处理委员会”，由县长隋振任主任，六二三厂（三三〇五厂）厂长张克文任副主任，成员有田玉才、陈延生、张洪斌、谢树春、杨俊峰、吕文良等人。

敦化曾是日军对苏作战的重要防线，实属战略要地，故日军在此存放了大量弹药。日军准备对苏作战时使用，所以在清理搜集弹药时发现存放在县境内的废弹中，化学毒剂弹占有很大比重。数量最多的是大桥，其次是秋梨沟、沙河沿、马鹿沟。在大山、尔站、江东、凉水泉子等地也发现了废毒弹，这些废毒弹主要是320毫米、240毫米、150毫米、105毫米、90毫米、75毫米等几种口径的炮弹，其中含相当数量的化学毒剂弹（75

毫米、90毫米、105毫米、150毫米及500公斤、800公斤航弹），多是毒弹，有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全身中毒性4类。含芥子气、路易氏气、光气、双光气、二苯氯西申、氯化苦、苯氯乙酮、亚当氏气等多种化学毒剂。普通炮弹多半是分坑埋在地下，一般坑长7米，宽3米，深1.5米，每个坑存放2汽车左右，弹箱上盖有油纸和草席，然后用土覆盖。

1952年秋，吉林省军区后勤部军械科长刘可鞠率参谋张福恒、傅立叶等人来敦化处理日遗弃的废、毒弹。

1953年，在哈尔巴岭南炮弹沟、四棵杨树两侧的山坡上，由季光明负责，组织二百多名民工，昼夜分班，长达两个多月，挖了一个长25米、宽12.5米、深10米的大坑（土质为风化沙石），将本县境内各处搜集的毒弹（以大桥为主）埋在坑内。这些毒弹分别标有红杠、黄杠、绿杠、白杠。那时，上级一再强调“宁可错埋10发榴弹，也不漏掉一发毒弹”，所以将部分标志不明、种类不清的废弹也埋入坑内。此坑于1945年4月间装满毒弹后封顶，坑顶覆盖土3米左右，在坑四角各置有一个刻有“日遗毒弹埋藏处”字样的石碑，这就是现在所说的一号坑。

当时上级下达的任务是两年处理完，但因毒弹数量大，分散，又都散埋在地下，短期内未能清理完，故于1954年4月15日结束第一阶段工作后军方人员撤回，由县政府废弹处理委员会负责全部废毒弹处理工作。他们先后在各地采取拉大网、钢针探查等办法，又搜集到大量毒弹，并于1954年11月17日至1955年2月5日在原一号坑下方40米处，又挖一长20米、宽10米、深8米的大坑。此事先由杨俊峰负责，后谢树春接管。当年埋入废毒弹占全坑1/4，并简单用土覆盖，剩余部分每年冬季封冻后用爬犁将当年搜集的毒弹运入坑内掩埋。至1958年坑内毒弹基本装满，本县内毒弹亦基本清理完毕。之后，用风化砂覆

盖，覆土厚度约3米左右，并将一号坑石碑移过来两个，以标示坑的位置（即二号坑）。

二号坑内，除本县废、毒弹外，还有从沈阳运来的1车皮、梅河口运来2车皮、集安运来1车皮、保康1车皮，计5车皮废毒弹，合250吨左右，有毒弹和燃烧及不明标志的废弹等。

另外，在本县秋梨沟明川村西南山也埋有在敦化北片发现的废毒弹3万余发，`坑长5米、宽5米、深4米，也是以毒弹为主。

敦化县废毒弹处理委员会于1963年撤销。

1965年至1966年，三三〇五工厂分两次将10万余发废毒弹埋入2号坑内，其中有苏式燃烧弹，也有毒弹。

在处理整个废弹期间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常年从事搜集、处理废毒弹的40余名正式工人，每年还需动员大批民工挖、运、埋毒弹，最多时一冬天动用民工500余人。仅1954年冬天就动用大车37台，牛马爬犁40余张，用工3 060个，支出现金17亿多元（旧人民币）；1953年前的第一阶段处理工作中，还动用汽车35辆，牛、马、爬犁50张，运了近半年时间。

（敦化市政协供稿）